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

日军侵华

(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罪行

纪实



中共党史出版社

前 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们组织编写这本《日军侵华罪行纪实》，就是为了再现那段血泪斑斑历史中的一些惨烈场景，提醒今人并昭示后代永远不忘侵略者的凶残、暴戾和狡诈，牢牢记住我国人民遭受的牺牲、蹂躏和苦难，以史为鉴，面对未来，激励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为振兴中华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息。

从本世纪 30 年代初到 40 年代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神圣的中华大地上，野蛮的侵略者制造了一幕幕人间罕见的惨剧：

日本侵略军铁蹄所到之处，一座座美丽、宁静的都市和村庄，很快就被嗜血成性的侵略者变成杀人屠场，成千成万的和平居民、战俘和难民，被刽子手们乱枪扫射而死，被进行杀人比赛和活靶训练的日军砍下头颅；我们的妇女同胞，被一群群日寇禽兽般地扑上去进行侮辱奸杀，姐妹们发出撕裂人心的愤怒与悲鸣；在日机轰炸的废墟上，婴儿啼哭喊着妈妈，可是年轻的母亲却倒在了血泊里。

侵华日军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痛击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华北“大扫荡”中制造了无数起惨案，成千上万个家庭被杀绝。

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在我国建立细菌部队，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在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城镇上空，投下大批鼠疫、霍乱病菌的物体，引发瘟疫流行，使大批中国人感染惨死。

日本军国主义依靠武力霸占中国的土地、矿山、工厂、铁路、电力、通讯设施，掠夺走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他们诱骗、强征、抓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和压榨，为其高速转动的战争机器补充廉价劳动力。

日寇在占领区强迫推行奴化教育，不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办学校和使用中国教材，甚至竟不让中国人在公开场合称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还抢劫了中国数不清的价值连城的珍贵历史文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国军民伤亡达 3500 万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 5000 亿美元。

中国人民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以自己前仆后继的斗争和英勇无畏的牺牲，战胜了强暴的敌人，换来了最终的胜利。日本侵略者亡我中华的罪恶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而我们的民族为此承担了无比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极为沉痛的代价。

本书反映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若干侧面，但它真实地将日本法西斯主义这个怪物重现出来，不仅记录了侵略日军肆虐的场面，而且对其行为的凶残、心灵的丑恶也作了一些粗略的、点睛式的剖析。当然，文章并不都已达到预期的效应，但作者们确已付出了大量心血，把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仇恨与痛苦、悲壮与希望，饱含激情地倾注到自己笔下和文章中来了。本书既为专家、学者研究抗日战争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又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留在地面上的痕迹许多已经消失，但是留

在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却依然存在。试想，失去母亲的儿女和失去亲生儿女的母亲，他（她）们心灵中荡起悲愤的波涛能平静吗？“决不许历史重演！”这是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包括日本广大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心声。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连同那个苦难年代的硝烟与血泪，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去，让先烈的英灵和民族的浩气化为反对侵略、捍卫和平的强大动力，这无疑是对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一种很有意义的纪念。

本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史工作部门和中央、地方有关单位协作编写而成的。参与编写的作者共撰稿 111 篇，选入本书 77 篇。无论是入选文章的作者还是未入选文章的作者，大家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都是这份集体创作的幸献者。未入选的文章中有些也是写得好的，只是由于全书的布局、体例要求的限制而没有编入书中，不能不留下一点遗憾；

全书的编审工作由李传华主持；编审组成员有胡丹、孙瑞鸢、许祖范、姚佩莲。

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在内容、编辑、编排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5 年 6 月 20 日

日军侵华罪行纪实

一、惨绝人寰的杀戮

“一二八”期间日军在上海的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上海觊觎已久。在“一二八”前夕，上海已成为日本在中国的贸易、航运及制造业的投资中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更为嚣张，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在上海发功进攻。

“一二八”事变给上海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据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处不完整统计，在上海市政府管辖区内（包括闸北、吴淞、江湾、真如、引翔、殷行、彭浦及南区、特区等），这次战争被日军蹂躏的区域面积达3297平方公里，其中上海市区被侵占面积达474平方公里，损失总数达15.6亿元，遭直接损害达18万多户，814万余人，死亡6000余人，受伤2000人，失踪1万亲人。房屋损失达2.4亿无。全市其他地区财产受到直接或间接损失尚未统计在内。

这次战争主要在闸北、吴淞、江湾等民族工商业集中的地区进行，上海民族工商业受到摧毁性打击。这些地区有597家，工厂占全市1/4，其中受损失者过半数。全市工人因事变而失业的达80%，上海的民族工业由于遭受这次打击，很快衰落下去，如橡胶业，全市34家，倒闭了14家，其中国民、厚生、溢中、福星、永和五家直接毁于日军炮火，大华、大新等9家因战后市场萧条而倒闭，到1933年、1934年其他几家也濒临破产。上海缫丝业，战前属民族工业的有70家，因战争破坏的影响，到1933年，只剩下10家。这些地区的商店有12915家，受损失达70%，损失价值总数为近6亿元。上海百货业1932年前的营业额只有1931年的50—60%杂货业的营业额下降一半以上。全市银行与钱庄营业，因事变而减少85%。

交通运输业，日军占领区铁路损失之价值占全部铁路40%。战区内的道路、桥梁、航运也都遭到严重破坏。

公用事业，被侵占区内之损失达1,742,025元（包括水电、电气、电话、长途汽车等）。

财政收入因事变减少40%，治安设备受损也严重。

文化教育事业所受损失，许多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战争结束后，据上海市教育局统计：

劳动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商学院、省立水产学院、持志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国公学、艺术专科等资产全部被毁，中学和小学及其它各类学校也有大批全毁。学校被破坏，势必对学生和教职员带来影响。据上海市教育局统计，因此而失学的学生近4万人，占全市学生的1/4，失业之教职员3000余人，占全市教职员的1/3。当时被称为供应全中华民族知识之粮食的商务印书馆工厂、编辑部等等也被日本弹火吞噬殆尽。有形的直接损失近1.5亿元。被人们称为“东方唯一的知识宝库”——东方图书馆，拥有大量图书，古今中外各科学学术上必需的参考书，基本备齐，还存有大量古籍孤本，都在这次战争中被日机投弹焚毁。

在这段时间里，在战争所涉及的地区，日军对中国人民极端残暴和凶恶。

纵火当时上海《时事新报》记者曾持工部局之通行证，到战区进行调查。他报道说：市区的虹口，自老靶子路向北至虬江路，直达邢家桥一段，全部焚毁殆尽；水电公司至狄思威路口高屋亦均焚毁；麦拿里、永安里都遭炮轰倒塌；江湾路及六三花园、林肯坊全遭焚尽。等等。

1933年出版的《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在大批发表的日军暴行的实况照片说明中讲到，市区的闸北、宝山路一带是华界精华地，居民众多。可是

由于 32 天战争炮火把它变成一片焦土。由宝山路至永兴路一片残垣断壁。周围数里，没有一幢完整的房子。各处马路，都坍屋倒地，道路不通。

郊区的江湾镇也成为一片焦土，瓦砾成堆；尸横遍野。《画史》中讲到：江湾街市、寺庙、乡公所机关、医院、火车站、学校、不少居民住宅等全被烧毁。“总之凄凉景象，有非言语所可形容”。庙行、真如、宝山也情况类同。

屠杀据《大美晚报》报道：住在市区虹口林肯路的德国籍居民皮克夫妇，英国籍居民克利恩·爱理斯夫妇，他们在这一带亲睹被日军杀害尸体满街纵横，饿犬争噬，人体内脏、脑浆遍地，只要有一点人类的理性的人都会心酸和愤慨。据 1932 年 10 月出版的《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作者华振中、朱伯康经过认真详尽的调查，讲到：在浏河镇上，外科医生何少章，因为反抗日军暴行，日军把他衣服剥尽，以刀割肉千百块，何少章痛极，就地乱滚，将坚硬之街石猛噬，成为碎粉，整整一昼夜才痛死。而日军在旁边鼓掌取乐，毫无人性。在江湾，日军沿途遇见中国人一律捉住捆绑，有的群集一起，以机关枪扫杀，有的把人劈为半截，有的把头分裂，脑浆溢流，惨不忍睹。

奸淫至于日军奸淫妇女的罪恶，不仅大量发生，而且十分残酷、无耻。据当时上海报刊登载，许多日军驻地、办事处等都成为日军奸淫中国妇女的场所。如虹口日人俱乐部，北四川路的东方剧场，俭德公寓，江湾六三花园等都经常有妇女被日军拖入奸淫。从老年妇女到十几岁的女孩都会遭难。1932 年 1 月 30 日，有一大批难民从战区逃往市区。半途中，日军抓去一批妇女，凡十余岁以上妇女尽皆遭奸。邢家宅子祥里，一名 12 岁女孩惨遭一群日军围奸，直至死去。那些兽兵在路上见到妇女就进行调戏奸淫。妇女呼救惨叫、痛哭欲绝声时常能听到。在江湾杨家弄一户人家，日军十余人突然闯入。先是勒索柴米，后见到只母女二人，竟丧尽人伦，同时轮奸母女二人。殷行乡一妇女坚拒日兵兽行，日兵以刺刀破其腹，肠流于外，该女未死，日兵竟将其奸于血泊中，直到该女气绝。在江湾孟家宅，对一批中年妇女先行轮奸，然后再断其四肢或割伤各部，听其在地上辗转呼号，惨状不能以笔墨所能讲明。

上面讲到日军的纵火、屠杀、奸淫等暴行，仅仅是一小部分。当时上海的中外报刊书籍，都有报道和记载。《中报》、《时事新报》、《大陆报》、《大美晚报》等报根据实地调查，记实突出，并且还配有当时日军暴行的照片，真是一幅人间最野蛮、最无耻、最悲痛的惨境。复旦大学教授朱伯康等根据他亲见所闻，详尽调查后曾讲道：我读满清入关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被难者私家笔记，“常常发指目裂，掷书大叫，以为于地昏黑，是人类兽性的大惨现。不意在这 20 世纪一切进步的今日，号称有组织有秩序近代文明国家的日本，居然在我们堂堂中华民国的领土内，干出比《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记述的惨酷更多至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甚至万万倍。”一点也不错，这些日本“皇军”是一群衣冠禽兽，甚至连禽兽都不如，他们的罪恶是日本民族的耻辱，也是全人类的耻辱！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张义渔）

抚顺平顶山大惨案

昔日的平顶山村位于今抚顺市区南4公里处，两露天煤矿的东部。当时，那里居住着400多户人家，3000余口人，其中大部分是贫苦的矿工，还有少量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几处铺面、作坊虽说不大，倒也兴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四个多月后侵占全东北。从此血腥镇压我骨肉同胞达14年之久，其间，制造了多起大惨案。抚顺平顶山大惨案就是其中之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2年9月15日，即农历中秋节之夜，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李春润部所属大刀队进攻抚顺，路经平顶山，烧了日本人的配给店，然后便奔向东岗、老虎台、杨柏堡、东乡和古城子。半途杀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夜袭时打死了自卫团长平岛善作和劳务系佐场弥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并烧了杨柏堡采炭所。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使东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在辽宁，以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已发展到36路，李春润率领的第六路是最强的。因此，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存在和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当局深感不安。大刀队袭击抚顺，更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惊恐。他们决定进行疯狂的报复，于是预谋了一场狠毒、血腥的大规模屠杀计划。

川上岸（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陆军步兵大尉）和小川一郎（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宪兵准尉）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为血洗平顶山，他们给平顶山居民罗织的罪名是：大刀队路经平顶山时，此地居民没有及时向日本宪兵队报告；大刀队袭击抚顺时是由干顶山人带的路；平顶山居民同大刀队里应外合，串通一气。

关于大屠杀的策划经过，伪抚顺县长夏宜的外事秘书兼翻译于庆级供认道：

农历8月16日，早6时许，召开了由守备队长川上岸、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日本参事官山下满男和于庆级参加的去议，地点在小川办公室。会上，小川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的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可以肯定是通匪的。现在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在谈到如何对付平顶山居民时，川上丧心病狂的叫嚣：“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

接着，上午8点多钟，又在炭矿办公室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川上岸、小川一郎、前田信二、山下满男、久保孚、伪警察局长佟世勋、伪抚顺县长夏宜等。会上仍先由川上岸大放厥词：“这次大刀队进攻抚顺，是由平顶山方面来的，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以前对平顶山附近几个村屯的居民，曾再三告诫他们，如果发现大刀匪的情况，要立刻报告日本分所。他们不但没有报告，而且大刀匪在他们的掩护下，竟在那里出现了。这些村屯统统的通匪，我们要用烧光、杀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会上作出决定：执行屠杀任务交给守备队，宪兵队配合守备队完成屠杀任务。下一步就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实际上，川上的屠杀准备工作早已开始，他一边召集首脑人物开会，一边派守备队的人去察看屠杀现场地形和进行其它各项准备，包括屠杀完毕的处理工作。

当年在宪兵队任翻译的王长春回忆了川上布置这个任务的经过，他说：

到了守备队，川上把参加屠杀平顶山的人员全部集合在一起，把守备队和宪兵队在执行任务中的分工和有关事项向大家讲了话，他说：“从现在开

始扫荡平顶山，先是用宪兵队和守备队的密探把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宪兵队的任务是掩护工作，但在现场执行中如果守备队方面兵力不敷分配时，宪兵队亦应参加扫荡。宪兵队必须得到守备队联络兵扫荡完了的通知，才算完成任务。现在开始出发，守备队和宪兵队的密探、通译（即王长春）先生。如果用软的办法哄不出来，就必须使用硬的办法跟上去，软硬兼施，务必把这些活东西都赶出来，无一漏网。”

川上所说的软办法，就是用欺骗的办法，即：昨晚大刀会袭击抚顺，平顶山居民没有一个受到伤害，为纪念大家太平无事，给大家照像，全部到南边草坪上集合。

中午时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日军共 190 多人分乘 4 辆大卡车向平顶山方向驶来。其中一辆车直接开进平顶山街，其余三辆车的日军把平顶山全村包围起来。开进平顶山街的这辆车上的日军，又分成若干伙，从北到南挨门挨户把居民往外赶。这一伙说：“快走！红胡子要来，快到南边草坪上，给大家照像！”而那一伙又说：“快走！红胡子要来，快躲到南边去！”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逼着人们快走。

此时，许多人还没有吃午饭。对这突如其来的逼赶，预感到一场灾难将要降临，很多人不想走，日军一边嚎叫着，一边把刺刀直指人们的胸膛。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病残者，因为走的慢，有的被日军连推带拖赶着走，有的被就地杀死。就这样，3000 多手无寸铁的居民全被驱赶到平顶山南端的一块草坪上。

突然，人群中有人尖叫：“不好！日本人放火烧房子啦！”人群开始骚动，大家试图冲出去救火，但很快被日军拦住了。不一会儿，只见整个平顶山村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大火吞噬，人们的心如刀割。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开始了。

草坪上，一家人挨着一家人，四周已被日军严密地包围起来。草坪中央，立着一个用布蒙着的带腿的东西。人们不知道那是何物，有些人还以为是给他们照像用的像机！

这时，一个面目黝黑、个子高大的日本军官走了出来，他叽哩咕噜地乱叫一阵，紧接着，蒙在“照像机”上的布被掀掉了，里面是六挺机枪！“突突突突……”机枪开始扫射！围在四周的守备队亦同时向人群开枪！倾刻间，人群一排排倒下去。人们的惨叫声和突突的机枪声连在一起。平顶山淹没在日军疯狂的大烧杀之中。

人们不顾一切往外冲，企图寻找一条生路，可是，往哪早逃呢？东面是持枪射击的日本兵，北面是用铁刺网围住的奶牛饲养场，西面是断崖陡壁，约两三丈高，只有南面一个缺口可以冲出去。但是，慌乱的人们已经分辨不出方向了，从南面缺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六七人。枪声停止了，四周死一般寂静。日军看看草坪上的人都躺在血泊中，便蜂涌上车准备撤退。当最后一辆车刚启动，突然响起了孩子的哭叫声。日军马上调转车头，进行第二次屠杀。这一次，不是用枪杀，而是用刺刀扎。手持刺刀的日军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统统往腹部深刺一刀。这样，似乎还没有发泄他们的兽欲，残忍的日本鬼子又把孕妇肚里的婴儿用刺刀挑出来抛到半空。更可怜那些不懂事的孩子，此时还爬起来爬去地呼爹唤娘，全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据这次惨案的幸存者赵树林回忆：

有一妇女，当日军的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她身上带着刺刀猛然坐了起来，双手攥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狠狠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刷地一下被割落在地。仇和恨，使她瞪着愤怒的双眼，至死盯住刽子手，凶手吓得呆若木鸡。

大屠杀历时3个小时，天色越来越黑，乌云密布，平顶山村没有一丝光亮，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渐渐地，下起了蒙蒙细雨，雨越下越大，苍天在为死难的同胞哭泣！

第二天一早，日军派人用大钩子把尸首钩到山崖底下，浇上汽油焚尸。其中还没有死的，也被扔在死人堆里烧死。焚尸之后，他们还怕掩盖不了罪迹，又从别处找来两名矿工，逼令他们用炸药把山崖炸塌，掩埋未烧尽的尸骨。据这两名矿工韩凯、傅少孟证实，他们是被日军用刺刀逼着，双眼被蒙住后拉到山崖上，又强令他们打眼放炮，谎称是开矿，并威胁他们不准向外界泄漏此事。

大屠杀后的平顶山，“瓦舍茅庐，竟化残灰。圃园蔬禾成焦土。人踪灭迹，鸟影绝空。……闻者惊心，观者闭目。”

这次大屠杀，生还者只有34人，杨占有就是在这次惨案中死里逃生的一个，当时的惨景，使他不堪回首。下面是他的口述节录：

平顶山事件当时，我在日本霸占的煤矿当矿工，日军灭绝人性，血洗平顶山，我是身受重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没等我定神，只见我旁边的一位山东老太太举起血淋淋的双手，我方才明白这不是照像机了。山东老太太倒下去，我老婆接着也中了弹。我赶紧蹲下去，问她怎么样，我同她还没说完话，我左臂一凉，一颗子弹穿了进去，这时，我老婆又中一弹，来不及说一句话，就倒在我两条腿上。我左臂流血很多，痛不堪言，半昏过去。我不知道紧挨在我身边的弟媳什么时候受了伤，迷迷糊糊之中，只听她对我说：‘六哥，起来吧，让他们打死痛快，何必这样受罪呢？’她挣扎着坐起来，没等坐住，一头栽下来，压在我的头部和胸部，再也没有吭声。弟媳的鲜血，直往我身上流，往我嘴里流，往我眼睛里流，一会儿我的眼睛被蒙住了，睁不开。这时，我身上压了好几个死人，我在最底下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半边脖子露在外边，我又动弹不得。也许是因为压在我身上的死人多，没有被日军罪恶的子弹打着。机枪连续打了近一个小时才停下来，我在昏迷中听到日本兵咕噜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一会儿又听到汽车的开动声，我知道日本兵屠杀完要走了。最后一辆车刚刚开走不远，我听见有说话声，没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这一跑糟了，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有死，马上车头一转，再来第二次屠杀。这一次屠杀要比机枪扫射要惨得多。日本兵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此往南挨个地用刀刺，只听见日本兵“库啦，库啦”的喊杀声和刺刀刺到人身上的“克刺、克刺”声，刺到活人身上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特别是刺到孩子们身上的尖叫声，人间再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了。刺刀声越来越近，很快轮到我这来了。我整个发痴了，简直不知道害怕，心想这一下报销了，我咬紧牙，屏住气，只有等着日本兵刺。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在我上面的死人身上乱扎，而我在最底下，全身沾满了血，日本兵以为我早死了，这样，我才幸免遇难。

这回日本兵走了，再没有听到有人吱声，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有点动静。我知道，这回日本兵确实走了，我使尽全身力气，推开身上尸首，挣扎着爬起来。我用手搓搓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想用衣服搓，衣服也成了血板。我费了好大劲，才睁开眼睛。一看，黑压压一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露出内脏，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再往远处一看，整个平顶山堡子全被烧平了，只剩下一点余火。整个草坪成了一片血海。

同杨占有一样，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几乎都被压在死人的最底层而幸免于难的。

另一位幸存者方树荣 1954 年 12 月 3 日的控诉书写道：

我本姓韩，父亲叫韩延东。平顶山惨案前我家共有八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姑、两个弟弟和我。平顶山惨案后只剩我一人。

1932 年农历 8 月 15 日晚上（中秋节），我听到外面有喊“杀、杀”的声音，当时我很害怕。第二天，我和弟弟在门口玩，看着很多汽车载着戴铁帽子，扛枪的日本鬼子，我问我的祖父：“爷爷，那是什么？”我父亲看情况不好，乘机翻墙逃走，鬼子就“叭”的一枪，把我父亲给打死了。接着鬼子就连推带拉，把人都赶到山顶，说要给我们照像。到了山上，妇女、小孩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鬼子就向人群开枪。我爷爷抱着我，把我压在身底下，这时我昏迷了。后来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母亲的头被打破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很多，两岁的小弟弟还在我母亲身边爬着叫：“妈呀！妈呀！”鬼子用刺刀一扎，往远处一摔。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受伤而未死的人都哭着叫着：“救命呀！救命呀！”这时我才回家，看房子已被烧了，我又回到死了的爷爷身边呆了一宿。

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单身宿舍）里，就被煤矿工人藏起来了。当时我满身是血，好几处伤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处还有八处伤痕。事后鬼子还出布告：“不准收留平顶山的人，谁要收留就把谁处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后，才把我接到家里。为了避免别人怀疑我是平顶山的人，只好把姓改为我姥姥的姓，姓方。

建国后，在平顶山惨案遗址大约长 80 米，宽 5 米的地带，出土遗骨 800 多具。1972 年 9 月 16 日，平顶山惨案四十周年之际，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在馆内，可看到有的头骨大张着嘴，那是在惨叫的瞬间绝命的样子，有的肩膀上留下深深的弹洞，有的头颅骨被子弹穿透，有的尸骨还留下了累累刀痕，那细小的肢骨无疑是襁褓中的婴儿。在遗骨馆陈列的死难同胞的遗物中，有儿童的小手镯、长命锁，老人的烟斗，妇女的戒指以及手表、铜钱，人们在中秋之夜没有吃完而被烧焦了的月饼、芋头；还有日军在屠杀现场留下的子弹壳、汽油桶……，这一切，象一份又一份沾满了血泪的控诉书，写下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抚顺犯下的滔天罪行。

遗骨馆建成后，先后接待了无数的国内外观众。在国外观众中，日本人占多数。无论是当年的战犯还是平民，在参观遗骨馆后，每每都感到万分羞愧和震惊！原日军 59 师团中将藤田茂，1957 年从抚顺战犯监狱获释回国后，曾三次来馆凭吊谢罪。他说：“侵略战争的苦是绝对不能忘掉的。现在，当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追念着诸烈士的时候，面对着各位英灵烈士遗属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之心情使得我们肝肠俱裂。”

日本友好人士参观遗骨馆后也表示：“我们要为争取和平做出努力，不能再使这类事件重演。”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刘一力）

下五家子惨案幸存者的诉说

下五家子村位于原锦西县缸窑岭北四公里处。北与朝阳县根德营子接壤，是锦西与朝阳的交界处。全村 84 户，400 多口人。这里群山环抱，山清水秀，果树成林，地下煤炭资源丰富。是下五家子人们世代繁衍，美丽富饶的山村。

1935 年 11 月 16 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驻锦西县缸窑岭的近百名日伪军，由侵华日军驻缸窑岭小队的“小疙瘩胡”队长和副队长井上正光指挥，对下五家子村进行了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大屠杀，制造了一起惨无人道的大惨案。

早在 1932 年 1 月 6 日，侵华日军古贺传太郎中佐的第二十七联队和归其指挥的部队计 131 人进占锦西。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有民族气节的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和地方民众武装团体——西五会（县城西的五个联庄会的简称）首领、锦（西）朝（阳）边界的绿林头目以及东北军黄显声余部赵雨时营长等，很快就组成了有三四千人的地方抗日队伍，而且迅速包围了日军占领的县城；1 月 9 日引其出洞，当日分别于旦城两菜园一带和县城东钱搭屯将其围歼。共毙伤日军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以下官兵 71 人；迫使敌人于 1 月 16 日携县长张国栋等撤离。把锦西县政府迁往连山（今葫芦岛市连山区）。对此，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哀叹：“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腥也，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这对长驱直入、横行无阻的日军确是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小县城的民众就能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劣势的装备歼灭日本皇军。就当时来说，这确是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我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此事，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恼羞成怒的日伪军对锦西、朝阳边界地区的抗日爱国武装进行连续“围剿”，但都被下五家子的抗日群众击败了。为此，日军对下五家子村抗日群众恨之入骨，一心想血洗下五家子。下五家子人们为提防日军袭击，白天在地里干活，夜间住在山沟里，用分散、隐藏的方法和日伪军日夜周旋。使日军的扫荡都落了空。

1935 年快入冬时，人们陆陆续续从山沟里、地窖里回家了。哪知万恶的日本强盗，正预谋一场狠毒血腥的大屠杀。

这天凌晨，日伪军突然包围了下五家子村，封锁了所有的村口、要道、高岗，村子的前山、后山和东山也都设了卡子。初冬夜寒，天还下着小雪。日本兵在街上怕冷，硬逼着村东头的刘明善在大门口为他们点火取暖。火刚点着，突然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就往刘明善后身刺去，另一个日本兵又冲他前胸刺去。刘明善身子一晃，避开了敌人的刺刀，一把抓住一个日本兵的枪使劲拽，日本兵往后拉，他猛踢一脚顺势一推，日本兵“扑通”一声倒在火堆里，刘趁势转身就跑，日本兵放了两枪，没打中刘明善，他逃出了虎口。枪声却惊动了整个村子。

天刚蒙蒙亮，汉奸带着日本兵挨门挨户用刺刀逼着青壮年男人到村西头河套去听皇军“讲道”。有 100 多名青壮年被赶到西河套，还用绳子、裤带、腿带子把这些人捆绑起来。村民白金祥、刘勤一看跑不掉了，自己把手一背装成被绑的样子，钻进了人群。人们感到不对头，有的说：“这回可不是好样子啊”。有的说：“注意点，鬼子要下毒手，能跑就跑，不能跑就拼了。”当人们看清了前后山头上架着的三挺机枪和端着大枪、张牙舞爪的日伪军时，完全明白了。日寇说开会是假，杀人是真的。这时，日本兵把姜佐周、

杨树祯、张臣三人推出来，叫他们说出抗日群众的名字，三人至死不说，当场被杀。随后枪声大作，有计划的大屠杀开始了。人们呼喊“快跑啊！”、“跟鬼子拼啊！”沙滩上，野地里人们奔跑着，呼唤着亲人的名字。随着三挺机枪的扫射，人们成排地倒下。顷刻间，西河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100多具尸体浸泡在血泊中。西河套的枪声一响，村子里的日伪军也开始了野蛮的烧杀抢掠，对老人、妇女、儿童下了毒手。

在这一惨案中，下五家子村有378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当天从西河套和村子里死里逃生的11名幸存者目睹了这场惨案中的部分真实惨景：

幸存者刘国廷，当年16岁，家住村东山底下。当日伪军挨家挨户往西河套赶人时，他趴在后院墙头上，亲眼看见白尚文、白金样父子因不想去西河套而被砍，赶紧跑回家里和他二哥藏在草栏子里，屋里有他母亲、嫂子、妹妹和同村的刘国文、姜香春。快到中午，两名日本兵进屋用井绳把她们五人捆到柱子上。接着，日本兵从刘国廷藏身的草栏子旁边的草垛上拽谷草往屋里扔，随手就点着了火。他大嫂一看不好，解开井绳拉着刘国文、姜香春从窗户跑出来，藏到猪圈的旮旯里，他母亲边呼喊着他嫂子，边往院心走时，叭！叭！两声枪响，母亲和妹妹只哼了哼就倒下去了。在东山上的日本兵发现猪圈里有人，朝猪圈里打了一阵枪。接着，一个日本兵从东山跑下来，跳进猪圈，抓住刘国文她们的头发猛往地上撞，直到把她们撞死才撒手。这时火苗窜进了刘国廷藏身的草栏子，烧着他哥俩的棉衣。哥俩禁不住火烤，就往外跑，刚跑出几步，刘国廷就晕倒了，脸被火烤着，手插进火堆。他二哥帮他脱棉袄时，往下捋，左手上的皮都捋掉了，筋一根一根露出来。为躲避敌人来抓，他二哥把他扣在铁桶里。由于火势不断漫延，大火围着铁桶烧。他光着膀子蹲在铁桶里，连烤连烙，肉皮吱啦吱啦地响，顺着胳膊流油，刮心地疼。直到日伪军走后，才被二哥从铁桶里救出来。他二哥搀扶着他，他刚要迈步，两眼冒金花，用手一捂脸，捋掉一层皮，疼得直蹦高。但这时日军还在西河套，刘国廷顾不得疼痛，哥俩顺着河沟子，一气跑出了村子。

刘治武一家老小25口人，当天在家的18口人全被日本兵残害了。惨案幸存者刘国珍目睹了他们全家惨遭杀害的情景。日本兵一进村就闯进他们的老院，从下屋杀到上屋，随后就把房子点着了。屋子一起火，刘国珍就泼水，泼了一缸水，又泼了一缸泔水，怎么也救不了，连烟加火一个劲往她身上扑。眼看在屋藏不住了，她心一横，从菜板上拿起一把菜刀，从后门跑出来。到处是日伪军，往哪儿跑？一看街上有个小庙，她就钻了进去。在庙里摸到一把尖刀，她也操在手里，身子倚在旮旯里。她心想敌人要进来，因门小，也得爬，一探头就砍死他。日本兵果然没敢往里钻，用刺刀往里捅了一阵，然后把谷草堆在庙门点着了火。当她听见日本兵走了，就用尖刀把草往外捅。日头偏西，她才悄悄地钻出来。

村民刘治忠是从火坑里逃出来的。那年他才13岁。当他被赶往西河套的路上，刚走到卢水财门前，随着军号声枪就响了，一眼就看到两河套忽拉一下倒下一排人。子弹从他耳边嗖！嗖！往后飞，一瞅身边倒下好几个人，姜佐文女人的脖子上直喷血。趁敌人不注意，他跑进卢永财的院子，一说外面的情况，在屋里的20多人都哭了。过了几分钟，日本兵端着刺刀进院了。一日本兵看一位40多岁的妇女抱着用小红被包着的孩子，就用棒子打小孩的脑袋。小孩越哭越打，直打到小孩没有哭声，那个妇女还哭喊着紧紧地抱着孩子。随后，日本兵把村民几个人一串几个人一串的绑起来并全部赶进屋里，

紧接着就往屋里扔秫秸，浇上汽油点着火。屋里大火一起来，妈叫孩子，孩子喊着妈，喊声震天。就在日本兵往屋扔秫秸的时候，刘治忠就解开了绳子，火一起来，他就大喊一声“快跑！”说着他顶着浓烟烈火踢开门，猫着腰跑到门口，一抬头，看见日本兵在大门口端着枪看着呢，他急中生智，跳进锅里，用锅盖挡着火。和他绑在一起的另四个孩子往外一跑，叭！叭！一阵枪，就都“扑腾”、“扑腾”地倒下了。眼看房子要落架了，他顺着往外窜的烟火穿出门外，一气跑进西房山的胡同里。屋里的30多人都被烧死了。

午后，日本兵开始了第二次屠杀。先从西河套下手，逐个查看尸体，凡是有一口气的，就乱砍乱扎。补完刀之后，两个日伪兵拽一具尸体，往旁边大菜窖里扔。扔一具尸体，放上两捆秫秸，浇上汽油点着。惨案幸存者刘国珍亲眼目睹了焚尸的惨景：沙滩都是血，顺着河沟淌。尸体被烧的直蹦，胳膊、腿直抽劲，像一堆树枝似的。后山沟尽是妇女和儿童，尸首成堆，枪打的，刀挑的，斧子砍的，缺胳膊少腿的，还有脑袋被砍掉的，连模样都认不出来。村子里被烧的更是惨不忍睹，风卷着烈火，忽忽直响，烟借风势，黑冬冬的满天翻滚，墙上的石头被烤的卡卡响，一具具尸体赤身露骨，倒在血泊里，大火过后，一堆堆的灰来回打旋。此时的下五家子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

白金祥是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在日本兵焚尸灭迹时，两个日本兵一拽白金祥，白金祥突然站起来了，他没有死，也没有受伤。当西河套的机枪一响他就躺在地上了，刘喜、卢老生中弹倒在他身上，日本兵补刀时也没发现他。白金祥站起来，两个日本兵都愣住了。突然间白金祥一轮拳头打倒一个日本兵。随后撒腿就往村里跑，两个日本兵一前一后穷追不舍。白金祥到家门口一看两间房子起了火，一头冲进火海。可两个日本兵没敢往里进，只往里边打了几枪就回去了。白金祥急于救人，冒着烟火跑到上屋连喊带摸，啥也没摸着，转身又往后门跑，他刚迈出后门就听“咕咚”一声房子落架了。到后院一看，白金祥脑袋嗡一下子。他眼前是他女人手拉着孩子倒在枣树旁，满地是血。突然间又听到了几声呻吟，往后墙的枣树下一瞅，他喊了一声“妈！妈呀！妈，您睁眼看看我是金祥啊！”老人家听到儿子的呼唤声挑了挑眼皮，摇摇头，又用手指了指肚子，白金祥赶紧解开母亲的长袍，一看他就愣住了，老人的肠子都露出来了，他心如刀绞。不一会儿老人就悲恨地死去了。面对死去的老人白金祥说：“妈！这仇我一定要报！”他擦了擦眼泪，最后看了一眼母亲，纵身跳过院墙，逃出虎口。

刘勤是从大菜窖死人堆里逃出来的见证人。日本兵往西河套赶人时，他大腿挨了一刀。日本兵用机枪屠杀时他中了两枪，浑身是血。两名日伪兵往大菜窖拽尸体时，他的胸脯子都被拖破了。日本兵把他扔在尸体堆上，又往他身上扔了两捆秫秸，这一切他都知道，他没有死。整桶汽油泼向尸体堆，“扑”的一声火着了，他身上着火了。这时他打定主意，选准地点，猛然间从火堆里站起来，直朝东南跑。等日本兵弄明白过来，刘勤已经跑出四五十步远，跳进井里。日本兵追到井边，照井里打了几枪，没有打着刘勤。

当时在西河套和村子里逃出的人还有刘明善、刘国凡、贾卢氏、杨宝玉等，共11人。

这场屠杀持续一天，余火燃烧约两昼夜。全村84户，400多口人，被杀害的有378人。400多间房屋只剩下三个门楼，门庭院落是一片残墙断壁，整个村子是一片焦土。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下五家子同胞，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我国的滔天罪行，歌颂锦西人民抗暴救国斗争中的英雄气概，颂扬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1972年锦西县人民在下五家子村修建了下五家子阶级教育展览馆和下五家子惨遭日寇杀害的死难同胞纪念碑。

（中共葫芦岛市委党史研究室李勤）

移民侵略与土龙山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是它侵略中国的主要国策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实行血腥镇压，疯狂围剿东北抗日武装，同时加快了移民步伐。日本实施移民计划是以掠夺中国农民土地为先决条件的，这就触动了中国农民的命根子。为了生存，土龙山地区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为了镇压这次暴动，日本关东军出动了大批兵力并洗劫了土龙山地区。土龙山事件后，日本移民侵略的国策化和向东北的大规模移民，给东北人民带来了灾难。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明治维新以前一直处于封建幕府制的统治之下。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政府制定了一项“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扩张政策。日本军国主义把扩张的目标首先对准中国东北，与沙俄帝国争夺在东北的势力范围。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皇俄国手里夺得了我国东北南部的大片领土，设置了一系列侵略机构，主要有“满铁”、“关东部督府”（1919年起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

向中国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略措施，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军、政界要人频频提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扩张主张与办法。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鼓吹向“满洲移民”的必要；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也高唱“满洲中心论”；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在其就职书中露骨地说：“经营满蒙的诀窍，在于实现满洲移民集中主义”，“我们在满洲应占有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经营”满蒙的办法“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畜牧，其中以移民为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在东北站住脚并以此为基地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称霸亚洲，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策划向中国移民，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精心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1932年2月，关东军统治部确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三个文件，将移民战略具体化。同一时期，拓务省也向内阁临时议会提交了第一、第二、第三次移民案。第三次移民案即“一千户移民计划案”。这个计划案提出的1932年秋应向中国东北输送500人的主张，得到日本内阁第63次临时议会批准。就在这一年，拓务省选出了“第一次试验移民”。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第一、镇压东北人民，巩固其殖民统治。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日本移民到东北农村定居落户，才能实现对中国广大农村的控制。日本进行移民活动的急先锋关东军东宫铁男说：“移民要支援满洲国中，恢复地方治安”，“在满洲国内，担任关东子维持治安的一部分任务”即协助军队担任镇压东北人民的任务。其次，日本要通过农业移民加强经济掠夺。东北土地肥沃，是生产粮食的理想之地，而粮食又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所缺乏的战略物资。日本移民到东北后，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粮食，使东北发挥日本粮食基地的作用。第三、对苏战略的需要。在

〔日〕《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第33—34页。

满洲事情案内所：《近世满洲开拓史》第104页，满洲事情案内所出版，1941年9月。

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92页，明文学1944年2月。

日本制定的移民方案中，都写有“对苏国防”的内容，即“解决国防才是第一要务”。因此，日本移民主要都安置在东北北部，以便在进攻苏联时，使其成为侵苏的桥头堡。第四、缓和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的压榨下，本已非常贫穷，加之日本扩军备战而对人民的搜刮，更使农民生活陷于破产的边缘，为了生存，农民对地主展开了广泛的斗争。“1929年有2434次，1930年增为2478次，1931年则达3419次。”“为了缓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日本政府遂将一部分农民移往中同东北。

日本向中同东北移民的侵略计划开始实施于1932年。最初的农业移民主力全为日本的在乡军人，携带武器、集团编队移入，因此称“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军事、政治目的上，即“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文化之成就为重“点”。

日本武装移民的首选地点是三江平原的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一带。因这一地区与苏联远东地区毗邻，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斗争极为活跃，对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威胁极大，武装移民迁居这里，对镇压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强化日伪统治力量，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地区又正处于三江平原的腹地，物产丰富，是一座天然的大粮仓，是日本侵略者资源掠夺的重要地区。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团492人于1932年10月抵达佳木斯，翌年2月移居桦川县永丰镇，第二批武装移民团494人于1933年7月到达依兰县上龙山区的七虎力河。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与大量掠夺东北农民土地同时并进的。1932年2月关东军统治部确定的《移民方策案》和《日本移民案要纲》提出：“作为农业移民用地，应该确保的土地面积，预定为‘新国家，的‘无偿提供地’1031500町步，‘收买地’636500町步，合计1668000町步”。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迁入永丰镇时，移民团强行和永丰镇达成《第一次特别移民用地议定书》，把移民用地的区划定为：“以永丰镇东门外的孟家岗为基点，从基点到西南约8000米的高地，向东沿山脊至青山嘴。从基点至正西的铁岭河，向北沿河至孟家岗北沟山坎，向东沿山脊至七星碾子”。这样，就有大约4.5万町步的土地被强行征用了，永丰镇原有99户共400名中国人被强制迁出移民区，每人只象征性地发给迁移费5元。移民团全部侵入永丰镇时，“在农场的满人农民已无一人”。

1933年，根据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的指示，当时驻屯在哈尔滨的第10师团又提出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村、密山等县强行征用165万垧可耕地的“报告”，规定不论生地、熟地，每垧一律一元钱。如此低廉的价格实际上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杨辉译：《日本近代史》下册第547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北京。

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农业移民方案（2—1—1）》第141页、1936年。

参见常好礼：《东北抗联路军发展史略》第133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中译本第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町步：日本土地面积计算单位，1町步约合1488亩。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选编的档案史料《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第337页。

满洲开拓史刊行会：《满洲开拓史》第99页。

为了实施这一强行“征用”土地的方案，1934年1月，关东军司令部、日本拓务省及关东军部分师团等联合成立了土地“收买”机构，并由第10师团等组成特别工作班第2班，具体执行“收买”任务。2月初，第二工作班召开依、桦、勃三县联合“收买”土地会议。2月中旬，第二班又移到依兰县，日军手持刺刀闯入农民家，翻箱倒柜，强收地照。这种“收买”手段是日军掠夺农民土地的普遍行为。

二、土龙山事件

土龙山是依兰县的一个行政区，其中心为太平镇。土龙山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当地人民曾自动组成武装，跟随李杜将军奋起抗日。“九·一八”事变后，这里被选为日本移民的重点地区。1933年春季以来，伪依兰县公署按照日本人的旨意，曾几次开会部署关于移民占用土地问题和收缴私枪问题。夏天，他们收缴了湖南营和孟家岗部分农民的地照“以不适当的低廉价格甚至连学校用地都强行收买”。至秋，又开始在各保进行私枪登记，准备缴枪。土龙山地区农民感到，土地是命根子，枪支是保护生命财产的自卫武器，失去土地和枪支，就等于失夫一切。因此，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准备奋起反抗。一些地主富农对日本强征土地也不满，他们深感生存受到威胁。在农民群众反抗精神的鼓舞下，也加入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列，中共土龙山地下党组织深入到各保去鼓动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移民的侵略行径，号召农民起来，进行武装暴动。

1934年3月8日，在依兰土龙山地区五保地方终于爆发了由谢文东、景振卿领导的农民大暴动，参加暴动的农民有2000余名。3月9日下午，暴动队伍兵分两路，向土龙山街里进发，二保队伍由南门先进街，解除了伪警察署的武装，五保队伍在东门外阻截敌人进攻兵力。

当时在依兰地区主持移民工作的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第63联队长饭了大佐亲自出马镇压暴动。3月10日清晨，饭冢率一批人马向土龙山进发，遭到预完埋伏在公路两旁院套内暴动农民的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饭冢大佐被击毙，其余日伪军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获，无一脱逃。土龙山农民的暴动，在当时震动了中外，《大公报》和《纽约时报》都作了报导。

土龙山农民暴动震撼了口伪统治当局，关东军立即调集兵力前往镇压。3月10日夜间，依兰县敌人接到饭了下落不明的报告，佳木斯日军警备队立即派出部队增援。日军的横山部队也从依兰出动，直奔土龙山。3月12日，暴动队伍主动撤出太平镇，经五道岗到达半截河，在此召开整编会议。会议决定将暴动农民组成“民众救国军”，推举谢文东为司令、景振卿任前敌总指挥。一时前来投奔救国军的群众达万人之众。

关东军认为如不彻底镇压暴动农民，以后将无法维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和向这一地区移民，于是调集大批兵力杀气腾腾地向土龙山进攻。暴动队伍坚持斗争，使敌人受挫。到4月初，日伪当局又指派远腾总务厅长出面，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多方研究与策划，派伪吉林省总务厅长三浦前往镇压。在日军第3师团和伪军第4军管区的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讨伐”和分化瓦解，暴动队伍人员伤亡严重，谢文东不得不率队转移。同年10月12日，暴动队伍在桦木岗附近渡河时，突遭日军出其不意的袭击与包围，经一场激战，暴动队伍惨败，谢文东仅带少数部下退入深山中。历时七个月

的轰轰烈烈的土龙山农民暴动，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在日军“讨伐”、围剿暴动队伍的同时，土龙山地区的百姓也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上龙山地厂的农民袭击强占他们土地的移民团并帮助民众救国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关东军对这一地区的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在这一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日军在北半截河子一带。

“1934年3月12日的早晨，日本骑兵队和弥荣（孟家岗）开拓团守备队，以三辆汽车开路，满载日本兵，带着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马队在后面，向北半截河子杀来。光到后居园屯开始烧杀，屯里20几户人家，除不在家的人外，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柴禾垛甚至垃圾都用火点着了。”日军在后居园屯烧杀后，又血洗了马青山、崔和、秦奎武、韩国文、王德花、兰西先生等村屯。日本兵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尤其在血洗韩国文院套时，把附近村屯逃难到他院套里的200多乡亲，全部用枪扫死。从韩国文门前到西沟于六里地的大道上，死尸横躺竖卧，遍地是血。有不懂事的孩子还趴在死去妈妈的怀里找奶吃。

日军在九里六屯：

九里六屯是上龙山区的一个村屯，分为上九里六和下九里六，是个有200多户人家，几条大街并有各种工商门市的一个较大的村子，然而一夜之间就被日军毁为一片废墟。

据梁文秀、许庆、李福中等老人回忆，连下了几天大雪后的3月19日早8时，从阎家方面来了三辆日军侦察车，冲当时驻守在屯子里的民众救国军和大排队100多人阻击。没被打中的一辆车跑回湖南营报信去了。下午2时许，日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进攻九里六屯，战斗直打到半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民众救国军和大排队掩护部分百姓撤走。

日军听屯里枪声不响了，冲进屯子开始血洗。日军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下屋、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屯里火光冲天。日本兵见人就杀，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钻进炕洞里的人也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日军对逃难的百姓也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3名群众，用草绳子一个一个捆起来。并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把他们全部打死；日本兵又把80来名躲在草房内的百姓活活烧死。在下九里六屯，日军打死因恐惧而逃跑的小女孩，把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挑死在炕下，把20多岁的姑娘奸污后枪杀，把躲在萝卜窖的人用机枪扫射死。——日军在五保地区：

据亲眼目睹日军残暴行径的徐万福、尚春岐、张洪仁回忆，日军在五保地区的徐爽屯、四合屯、老张乡屯也进行了烧杀。日军把无辜百姓都称为“马胡子”用刀砍死。在四合屯烧掉70多间房屋，在老张乡屯烧掉37间房子。

日军此次在土龙山地区的屠杀是极其残酷的，在这次惨案中，土龙山地区被血洗村屯12个，房屋被烧毁1000余间，遭杀戮的百姓1100多人，被毁粮食70余万斤，死伤牲畜290余头。

三、日本移民侵略的国策化

土龙山事件是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之一。然而，土龙山地区农民的武装反抗，也给日本移民侵略政策以一定打击。事件之后，移

桦南县委文史办：《土龙山地区惨案》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2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前引《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28、131、132页。

民团内部有强烈的动摇情绪，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减少到 320 名；第二次移民减少到 313 名。一些退团移民归国后进行种种宣传，使人产生“移民悲观论”，有些人开始怀疑移民能否维持下去。受此影响，1934 年 10 月，日本派出的第三次移民团减少到 259 名。为了稳定已经动摇的移民情绪，贯彻移民侵略的政策，关东军于 1934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6 日在伪满新京召开“第一次移民会议”，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在会上强调：“应排除万难，移民的重点首先是满蒙，必须由此从根本上来把握满洲事变的本质”。而“满洲事变的本质”即日本要变东北为自己的殖民地。由日本人来统治。要使日本人成为“五族协和”的核心，就要大量向东北移民。会后，日本加强了移民侵略。1935 年 6 月和 1936 年 7 月，先后向密山县迁入了第四次、第五次移民团。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及在“试验移民期”取得的移民侵略经验，决定大规模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1936 年 4 月，关东军又在伪满新京召开移民会议，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伪满政府、“满拓”、“满铁”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讨论了关东军制定的大规模移民计划《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和具体实施的《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1936 年 7 月上旬，关东军以上述两案为基础，制订出“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的《满洲现地案》，并送交拓务省。拓务省以此案为基础制成日本政府方案，并于 7 月 23 日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进行咨询，至此，《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正式确定为日本政府方案。

《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即 1937—1956 年的 20 年里，日本要向中国东北移民 100 万户，每户按五口人计算，约 500 万人。1936 年 8 月 25 日，日本广田内阁阁议决定此计划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自此后，日本进入了正式大量向东北移民阶段。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进行移民和土地掠夺，从“九·一八”事变到战败投降，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采取“强制征用”、“有偿收买”等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到 1941 年 3、4 月，已达到 20026000 公顷，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已达到 2552 万公顷，为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 4.5 倍以上。

在掠夺农民土地时，日本侵略者还强占农民住房以安置日本移民。例如：1933 年，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雇用 500 多名土匪，指使其在海伦“扫荡四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 650 名日本人居住”从而使几百个中国农民无家可归；在瑗辉县，1939 年，由于日本移民和军事用地，伪黑河省次长中井久二曾指使开拓厅和警察署协同对上马厂，扶别拉等 12 个村屯土地和房屋强行收买，将村民撵出家园。失去土地和房屋的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沦为“具内开拓民”被日伪当局指定到偏远地区重新开荒种地；有的沦为日本移民的佃农和雇工；有的四处流浪，靠乞讨和打零工度日。

日本移民回来东北后，自称“优等民族”，对中国农民肆意欺压和迫害。他们经常抢夺当地中国居民的家禽和财物，并随意殴打当地住民。例如，1940

据第一次移民团团团长山崎芳雄的报告，见前引《满洲开拓史》第 159 页。

据第一次移民团团团长山崎芳雄的报告，见前引《满洲开拓史》第 159 页。

前引《满洲农业移民方案（2—1—2）》第 12 页，1934 年 11 月。

〔日〕满洲开拓史刊行会：《满洲开拓史》第 395 页。

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第 170—171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

年 10 月 6 日，甘南县丰荣训练所学员 6 人，在当地村屯买鸡，有一村民把门关死。他们于次日组织移民训练所的 95 人袭击该村屯，使 6 名中国村民负伤。又如，1939 年 7 月 10 日，五常县朝阳川日本开拓团静冈班团员铃木久想雇中国农民做苦力，因时值农忙，当地村民不愿意应雇，他竟将村民李洪玉用枪打死。

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移民，清楚地表明了其殖民主义的侵略本质。可是，时至今日，日本一些军国主义的孤臣余孽竟无耻地抵赖说他们当年“无意侵略亚洲”。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警惕。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杰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血泪斑斑的“集团部落”

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酷杀戮、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的汤原县境内，抗日游击队十分活跃。为了隔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消灭游击队，1936—1937年春，日本侵略者在汤原县的黄花岗、吉祥村、永昌屯、东江沿、施家亮子、五堡，二堡和太平川等处，共建立了八个“集团部落”。他们强迫农民归屯并户，迁到指定的“集团部落”居住，把原有村庄全部烧光，变成“无人区”。下面，我们通过两个实例，看一看日本侵略者对沦为殖民地的人民残暴到了什么程度。

一、太平川“集团部落”

太平川“集团部落”是日本侵略者建立的一个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部落”，位于汤原县城东35里处。

在建立“集团部落”前，太平川有500余户人家。日伪当局在这个屯的中部划了一块东西长600米，南北宽660米的地区，作为建立“集团部落”范围。在建立“集团部落”时，他们将屯西部300余户约1800余间民房和大量粮草、家具等烧毁，将屯东部民房全部扒掉，仅将屯中部10余户往地被划进“集团部落”，强令屯东、屯西农民往到屯中部的“集团部落”中来。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强迫太平川周围远至17里的齐家屯、姜家屯等12个村庄的居民一律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把这些地方变成“无人区”。

为了建立太平川“集团部落”，日军在1936年11月和1937年2月在太平川周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清乡围屯”活动，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在太平川屯，残忍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挨家挨户清查、摧促，对拖延和反抗迁村并户的人，或者当场残杀，或者逮捕起来。一些人被抓进县城日军守备队，备受酷刑折磨，直到死去：一些人被扔进水井中活活淹死；一些人被杀死后扔进水井中。前孔家井里，一次就被推下去20多人。董家大井紧靠在一堵墙下，归屯并户时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人被淹死，天长日久，人们发现井旁野鸡逗留，并且飞下去啄食，下去探查，才发现里面有6具尸体。此外，在黄有、安洪富家的井中，也发现有被日军杀害后扔下去的尸体。

距太平川三里远，只有15户人家的刘盛金屯农民，不愿搬迁到太平川，日军守备队就将全屯的男女老少赶到村头场院，用木棒逐个毒打被迫跪在地上的群众。人们被打得头破血流，皮开肉绽。刘奎昌拒绝搬迁，日军就用机枪扫射刘家房屋。刘的妻子和女儿趴在炕沿下躲避枪弹，母女俩因惊吓成疾，不久就病死了。日军驱赶全屯人到村头场院时，农民刘其昌的妻子正在产期，日军惨无人道地让她跪在地上并毒打她，日军撤离后，她卧床不起悲惨死去。日军放火点燃所有房屋，刘盛金屯的百姓无奈被赶进太平川“部落”。

1937年农历春节，天没亮，日军严密包围黄有屯，敲门砸窗，挨家抓人，除了女人和孩子，全屯男人都被驱赶到李长顺场院，毒打之后，将其中康正发等40余人押往太平川日军守备队。被抓者受尽酷刑，十人九不还，有的被活活拷打致死，有的被拉到汤旺河塞进冰窟窿里。黄有屯破日军烧毁后，全屯百姓无家可归，被逼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

日军动用民工 4500 余人，修筑太平川“集团部落”，修筑起了道高 9 尺，宽 6 尺，长 2532 公尺的围墙。墙内筑有两层台阶，墙外挖有 1.5 米深、3 米宽的水沟，水沟外安设 5 尺多高的铁丝网。日军还强令民工修了大小炮台 9 个，分布在“部落”四门（每门一个）、围墙四角（每角一个）和“部落”中心（一个）。太平川周围 12 个村庄的居民，除部分逃散他乡外，约有 270 余户被赶入太平川部落。

日本侵略者对并入太平川“部落”内的人民实行残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部落”内设有伪警察署、拘留所，配备十人以上的武装警察，并驻有日本守备队、治安队。“部落”内实行严格的保甲连坐制，组建伪自卫团。伪警察和伪自卫团一方面担负部落警戒，同时还进行户口调查，收集民情、岗哨盘问等活动，协助武装“讨伐队”搜查部落内的通“匪”者和所谓的“潜伏匪”——即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

被赶入部落的居民受到严格控制和监视，毫无人身自由。日伪当局为使“匪”民分离，对“部落”居民中 16—60 岁的男子采取指模，进行指纹登记，以此做为分辨“匪”民的重要凭据。“部落”内无论男女，凡 12 岁以上者都发给居住证、通行证，携带物品许可证、购物证等，随时受到军警宪特的检查。

“部落”内三五人不得结群走路和谈话，夜间不准插门、点灯、说话，警察特务经常潜在居民房前屋后暗查偷听。农民荣德库，天刚一黑，躺在炕上和家里人闲唠，被偷听的警察发现，闯进屋里严加盘问、毒打。警察特务两天一查户口，三天一查夜，并规定外出、来客必须到警察署报告，经批准后才能外出或留宿客人，否则以所谓通“匪”、思想不良等罪名加以毒打和拘禁。“部落”实行日出群集一起外出劳动，太阳偏西日本旗落必须归宿。农民李仁外出办事回来时稍晚，部落四门紧闭，只好在野地里受冻，实在冻得熬不住，冒险爬墙回家被警察抓住，关押在炮楼打得死去活来。

日本守备队在“部落”内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据张和等 11 人控诉：“日军守备队在太平川竭尽残暴，昼夜侵入百姓居室，强奸妇女。张禄之妻被日军强奸致死；汪某之妻被七名日军轮奸后，夫妻被迫逃散在外，至今没有下落”。太平川居民刘萧氏控诉：“日军毫无人性地残害和污辱妇女，在太平川东门外刘正刚的女儿就被日军给强奸了”。

太平川归屯并户给人民造成了苦不堪言的灾难。归屯并户时荒芜土地 4000 多垧，人们被集中在“部落”内，耕地又被严格限制在“部落”附近的一定区域，难以满足众多人口的需要。而日伪当局在实行归屯并户时，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许多人来不及带上口粮，大批粮食连同房屋被日军烧毁，以致许多人归屯后因无粮可吃被活活饿死。“部落”内的民房极少数是归屯前筑成的，迁往“部落”内的农民多数没有住房，只得在露天地搭起小草棚安身，有的挖个地窖子（半洞穴式的简易房屋），阴暗潮湿，风吹雨淋，染病死亡者甚多。“集团部落”中的各项设施都是以“部落”居民的义务劳动进行的，“部落”内青壮年被编入的自卫团或警备班，参加义务性的军事训练和各种劳役。部落内的农民平均每年每户被强征劳工 30 余次，全“部落”每年还要付出约 300 吨粮食的杂税。

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 年，第 193 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 年，第 200 页。

二、西二堡归屯并户惨案

西二堡（今裕德乡）又名刘侉子屯，位于汤原县城东 70 余华里。1937 年，日本侵略者在西二堡地区实施圈屯并户，烧毁于家沟、毛家街、尚家街、套子里、高殿元等村落，将这些村庄的百姓驱赶到西二堡屯和卯家街（今加兴）居住，枪杀不愿搬迁的百姓。

农民赵世德、刘子臣控诉说：伪康德三年初冬（1937 年 12 月），从鹤立来了百余个日本兵，同西二堡日本守备队三百余人，全副武装，分东西两路，向西二堡周围各村屯扑去。东路日军从大脑山直扑于家沟、卯家街。日军进村时，鸡飞狗咬，子弹尖叫，卯家街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杂沓的皮靴声和鬼子的喝骂声交织在一起。惊慌中人们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被集中赶到李宗哲家院子里。逃跑的人被陆续抓回来，躲在屋内的居民被赶出来，接着，日军将卯家街的民房点燃，火光冲天。

在李宗哲家场院里，混乱的人群被日军用刺刀逼着站成两排，日军在人群中将赵景春等八人拖出，毒打一顿后用铁丝捆住穿成一串，连同从于家沟、大脑山抓的 14 人一起押往两二堡守备队。

与此同时，西路日军直扑高殿元屯，然后向北回经套子里和尚家街。他们一路烧杀抢掠，永发乡红旗大队的于跃江控诉悦：“日本人烧尚家街，我家住在尚家街东头。日本鬼子进屋后用刺刀把门帘挑开，妇女孩子逼到一边，我那年 11 岁，父亲、伯父、舅父被绑上逼到乔三矮子家烧死了。”原来，日军将尚家街 70 多名被抓来的农民（壮年男性）分别关押在乔三矮子、白桐林、老丁家房子里，房门被紧紧拴住。尚家街的妇女及孩子哭喊着涌向这三家宅院，她们哭天喊地，哀告日军放了她们的亲人。然而凶残成性的日军毫不理会，他们在这三家宅院附近架起机枪，将房子点着了。留在院内的妇女和孩子哭叫着，向关着亲人的房子冲去。大火吞噬着房屋，关在屋内的人们在烈火中齐心破门窗向外涌。这时，宅院周围的机枪响了，房内房外一片大乱，人被焚烧的惨叫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房屋燃烧的噼啪声混成一片。房内 70 余人全部葬身火海。

日寇驱散了悲痛欲绝的妇女孩子，押着王宝坤等 10 人，逼着李德山等 10 余人套上马车，返回了西二堡守备队。惨遭洗劫的当天夜里，妇女、儿童和老人又被逼迫顶着夜晚呼啸的风雪，分别进入了鹤立和西二堡的“集团部落”。

尚家街的大火熄灭了，被烧死的人有的在炕洞里；有的在灶膛里；有的头插在水缸里；有的相互抱在一起，横躺竖卧，惨不忍睹。这是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但是，惨案并没有结束。东西两路日军共抓来群众 32 人，被关进西二堡日本守备队司令部院内，翌日晨，日本守备队，警察特务，伪自卫团全部出动，押着用铁丝拧在一起的 32 名群众，朝距西二堡二里远的车喜云家多年不用的 18 丈深的大片（也称北井）走会。当时伪自卫团员赵喜的证词说：往北井送人时，我在西南炮台站岗，两人拧在一起。车家废井周围布满了日军，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当 32 名群众被推向井边打开铁丝后，日军凶狠地用刺刀逐个从农民的背后扎进胸膛，然后挑进井里，32 名无辜百姓无一幸免。刽子手的刺刀扎弯了，在第 31 位遇难者被日军挑入井中时，他顺势紧拽

日本兵的枪，想同日军同归于尽，吓得日军松开了手。最后一位遇难者是一未成年的半大小伙了，日军骗他说：“用绳子把你送到井里，把枪拿上来就放你回家”。然而，当他把枪拿上来后，没等站稳脚跟，就被日军一刺刀挑进了井里。

侵华日军在黑龙江省汤原县进行的归屯并户，建立“部落集团”中所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罪行，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曾恬不知耻地向全世界宣称，他们入侵中国是为了中日“相互提携”，与中国“共存共荣”，在中国建设“王道乐土”，让贫穷落后的中国人过美满幸福的生活的最好的写照。

日本帝国主义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实施的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其罪行昭著，铁证如山，不仅有中国农民刘奎昌、李仁、张和等人的控诉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认罪签字，还有曾是罪行制造者的日本人在战后正义审判台上的认罪书。曾任伪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就汤原县“集团部落”的认罪书上交代：

“汤原县刘其昌等十五名控诉书、汤原县人民检察院的鉴定书，以及查讯证人笔录，经翻译向我宣读，其内容全部是真实的。我任总务厅主计处长兼中央治安维持会委员参与策划所谓‘匪’民分离政策，编制有关的实施预算的责任。由此在汤原县设立‘集团部落’，不仅完全剥夺人民的自由，破坏其生活，并以逮捕、拘禁、拷问、屠杀等对人民犯了极其严重的侵害罪行。”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车霁虹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大连“抗日放火团”惨案

大连市（过去称旅大）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共扼渤海湾，素有京津门户之称。1905年1月2日，日俄战争中俄军失败后，大连市从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下转手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强化，大连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经济上遭到野蛮掠夺与剥削，所受剥削压迫之深重，生活境遇之悲惨，实属罕见。不仅如此，日本统治当局更是把大连作为侵华战争的基地，大批制造并积累军用物资。

为磨灭大连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日本统治当局严密封锁一切消息，妄图使人们淡忘祖国。大连人民被囚禁于殖民主义的牢狱之中。

然而，同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大连人民终究是不可侮的。他们不甘受奴役和被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抗日斗争。其中，抗日放火团就是同日本殖民统治进行英勇斗争的典型事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以破获放火团事件为由，实行一系列恐怖政策，残酷镇压和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惨无人道的大搜捕、大迫害案。

据不完全的材料证实，从1937年底到1940年5月，关东州厅警察部因放火团事件捕捉了两千多名工人和居民，许多人被施以酷刑，并被迫害致死，至于被毒打丧失健康或致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放火团成员12人被处以极刑。象这样大规模地逮捕、拷打、监禁与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一）

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派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由哈尔滨去苏联莫斯科郊外秘密训练所，进行了6个月的电台联络法、燃烧爆破术、秘密联络等技术训练。1935年由苏联回国，分别被派往上海、天津、大连等地建立地下抗日组织——抗日“放火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热潮风起云涌。为了配合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放火团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数次烧毁日军军用工厂、仓库及破坏铁路。仅在大连就放火50余次，先后烧毁大连码头仓库、大连满洲石油会社工厂、130、131、132三仓库、伪大连日清、三泰油坊、大连关东军被服仓库等。复仇的火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热情，激发了许多仁人志士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使日军侵华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统治当局的嚣张气焰。

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地下放火团，1938年4月，选拔了134名特工人员，组成了特殊的警察队。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大和田任队长，高等课刑事课长潮梅辰亥任副队长；下设7个班，各警察署署长分任班长。特警队象恶狼一样扑向抗日放火团。

尽管如此，抗日放火团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侵华基地放火事件时有发生。日本侵略者更加惊恐万状，又增设了外事警察课，建立了各级“防谍委员会”，收买了一些汉奸、特务以十倍的疯狂来破坏放火团。关东州厅警察部除每次在火警现场实行非常警备外，还对工人进行严格的盘问，如被看作“不顺眼”者，即成了“嫌疑分子”，加以逮捕。

逮捕这些“嫌疑分子”后，日军以及汉奸大施淫威，施以灭绝人性的刑罚，如灌凉水、压杠子、吊打、过电、皮鞭抽打、竹签等，迫使其“招供”。其中惯用的毒刑是灌凉水，尤为残酷。日伪大广场警察署特高刑事巡捕长刘

会川这样供述灌凉水、吊打的残酷情形：

“各警察署都设有灌凉水的小屋子和胶皮管子、皮鞭子、板子等刑具。每次在审讯时，先用胶皮管子、皮鞭子等拷打，再把人拖到小屋子里施行灌凉水，把衣服剥去（哪怕是严寒的冬天也是如此），令其躺在离地半尺高的板凳上，将四肢绑住，用一个木盒套在头上，用水笼管子往嘴里灌，小肚子即涨起，再将肚内的水压出，凡遭受灌凉水的人两三天吃不下饭，大部被灌得了胃肠病或肺病。除了灌凉水刑罚外，还有一种刑法是吊刑，就是把受刑人反背用绳子吊在空中，双脚不得着地，用棒子打，受刑人脸部即出现黄豆粒大的汗珠，将其放下时，脸无颜色，象死过去一样，然后用凉水喷其头部，待苏醒过来继续审讯。”

1938年4月，大连满洲石油会社起火，日伪大广场警察署及宪兵队派人前往捕人。据当时受害者王毅、杨忠海、王殿臣等揭发日军罪行时说：

“日寇把山九窝铺工人全部集中在石油工厂排成一行，然后命令工人从工厂的一个小门出去，朝对面的小汽车里看，两面站满了鬼子和汉奸，一个一个地验工人脸色，如有‘面目改色’者，即视为可疑分子加以逮捕，这一次共逮捕了百余人，其中李境等工人被屈打后判处徒刑，工友卢某被打死了。”

1938年6月，码头4个军用仓库起了大火，日伪宪警特把住整个码头不准工人出入，还把前几天在4个仓库附近干活的工人全部逮捕，大约有300多人。

1940年正月十五日夜，大连日清、三泰两个油坊起火，日伪宪警立即前往捕人，前后共捕捉了70多名油坊工人，两个月间不许工人出院，一律遭到非刑拷打，工人孙吉尧及马车店的一个老工人，抓捕后被活活打死。

日伪关东州厅警察部采用这些高压手段并不产生效力，于是，又想收买一些人，混在工人中间，充当其耳目。大广场警察刑事小林清。一就曾把名片发给日清、三泰油坊中的工人，企图进行收买，但工人并未按他们的意图办，后来他不得不将名片收回去。

关东州厅警察部除了在起火现场逮捕工人外，还不分昼夜地到旅馆、茶社、市场和工人居住区进行搜查、逮捕。从大广场警察署特高刑事刘会川供述中，便可见一斑：

“1938年大广场警察署特高系副主任侨本保之，带领高等系全体人员和警务系10余名警察，到转山屯、石道街进行大规模的搜索，搜查方法是在晚间半夜，首先在村头政上岗哨，然后挨户进行搜查，把门踢开，吓得老婆孩子叫，有的警察特意揭开妇女的被子，用手电照其裸体，任意打骂老百姓。”

由于捕捉过多的放火“嫌疑分子”，市内拘留所已经人满为患，各拘留所传染了斑疹伤寒，据特警队副队长潮海辰亥1954年8月11日口供：

“对这些非法逮捕的中国人民不但进行了刑讯，并且由于拘留所过于拥挤，设备极差，再加上百般虐待，引起了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当时患者约60余名，得不到医药治疗而死亡的约10余名。”

1940年5月，福昌华工公司工头牛嗣义，从工人许元丁口中听到黄振先、王有佐是抗日放火团人员之后，即通过福昌华工公司大工头宋洪泰报告给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警察课。汉奸巡捕长隋云葑又命牛嗣义进一步地了解抗日放火志士黄振先、王有佐的住址及每日活动情况，并捕捉了许元丁，强逼讲出黄、王情况（许元丁被押在大广场警察署，放出后数日即死去）。汉奸隋

云葑遂带领牛嗣义等人去荣町抓捕黄振先、王有佐。当时，抗日放火组织领导人赵国文在东关街大桥洞子与黄、王约会，分手后，赵被逮捕。

日军加藤广治、滨本清道、小林恒雄与汉奸隋云葑用酷刑强迫赵国文供出了放火组织情况，于是，日伪关东州厅警察部布署了有 60 多人组成的逮捕队伍，不分昼夜到沈阳、山东、天津、上海等地开展了空前的搜捕。至此，抗日放火组织人员 13 人及其外围帮助工作的人员以及并未参与放火只是与放火人员相识的又有 100 多人被逮捕。

日军逮捕这些人后，经过近一年的审讯，有四五十人被警察部外事课移送关东高等法院检察局，检察官长池内真清充任总指挥，次席检察官西海枝信隆、检察官田中魁口、后藤范之、安藤国次担负审讯工作。1941 年 10 月，关东高等法院以检察官长的名义，将放火团案起诉到关东地方法院，请求公判。经过关东地方法院数月的审理后，于 1942 年 3 月进行了宣判。判处纪守先等 12 人死刑，判处李泽民等 4 人 10 年徒刑，判处邹包氏等 13 人 7 年徒刑。

被捕人员在日伪警察署关押期间，受尽了灭绝人性的酷刑虐待，被他们活活折磨而死的，经查明的就有王芝盛、赵锦江、孙中桂、王进臣、李顺滨、徐高氏、张守仁、邵世仁、王世安、刘文禄、唐中选、于守安、陆炳义、黄老太太等 14 人。其中除了于守安是放火团成员，唐中选、刘文禄是知情不报者外，其余全是毫不知情的人！

李泽民在 1951 年 12 月 3 日的控诉书中写道：

“有一天，鬼子梅崎孝和汉奸张子久把我提到楼上过堂，我见到秋世显（放火团成员）在那里被审问，就推翻了以前的口供（日警和汉奸多次对其毒打，迫使其承认给放火团成员卖过硫酸等物），凶狠的梅崎孝拿起胶皮管子又要打我，可是我已被打得皮裂肉烂，无处可再打，就叫我伸出手来，按在桌子上用方棍子和胶皮管子打，手被打后肿得象玻璃瓶子一样亮。我所穿的衣服得时常的掀动，否则即被血粘住，往下脱时疼痛难忍，这种痛苦实在无法形容。后来我被转押到洲厅新修的监房里，被梅崎孝和张子久继续审讯了数日，后又被更残暴的下松兼雄和特号汉奸隋云葑、张庆和过了六七次堂。”

李泽民还证实：于守安的手脚都被打残废，耳朵也被打聋了，小便不能自主，站着也尿、坐着也尿，最后惨死在监所。

关东州厅警察部，国破案有“功”，被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授予奖状，同时还设宴慰劳参加逮捕与审讯抗日放火团的人员，并颁发奖金，论功提级。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用中国人民的血肉换取功名利禄，罪该万死。

（三）

1942 年 3 月以后，被判刑人员先后被押往岭前监狱和旅顺监狱，在这人间地狱，他们又受尽了残酷的虐待，秋世显、吴成江、马永佐因受刑过重，惨死在岭前狱中。

当年在旅顺监狱当过伪职员的马本源 1952 年 11 月 7 日写的见证书就可看到：

“在这里被押的人没有一点身心自由和人身保障。被押的人进去先换上红色罪衣，然后押在三楼“被告室”里，面向墙，背靠背坐着，不准说一句话，不准动一动，大小便撒在监房便桶里。吃的饭分为七等，按犯罪的轻重和劳动的情况分给一定的数量，最少的七等只有二三两。每天一顿菜汤，连油都没有，是用盐水煮的。

“作苦工的工厂有 15 处，一天得干 12 小时的苦工。为防止“犯人”逃跑，监狱看守要犯人每天早晚脱下全身衣服，从走廊到检查室（相距百米远）接受一遍检查，检查时每一个都要用日本话向看守报号，再张嘴、摇头、抬腿、伸胳膊，全身验完后，跨过一根木杠，才许换上衣服，赤着脚随穿随走。不管是春夏秋冬和风雨冰雪，每天要做两次。许多人在冬天因赤身裸体冻得说不出话，叫人不忍看下去。

“这还不算，凡是在窑厂和菜园子干活的人，每人带一付脚镣和铁锁。不但活累，而且身上还带着 20 多斤重的刑具，用一丈五尺多长的铁链子把两个人连锁在一起，带着脚镣干活慢了还要挨打。菜园子的“犯人”在看守高野熊人的严管下，得不到一点休息时间，成天锄地，抬大粪水。一个粪桶能装 100 公斤的大粪水，两个人用大木杠子抬着紧走，身上还带着铁链，若走得慢些，就得遭受看守一顿毒打。

“1942 年秋，用囚车送来二十几个抗日放火的人，初来时被押在三楼‘被告室’里，后来有十几个人，大概是被判徒刑的，被分配到各工厂干苦工……”

被判刑人员张玉江在 1952 年写的控诉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狱中见闻：

“1942 年 3 月的一天，日本鬼子把我们捆绑在一块，用车拉到关东地方法院判罪。在这里我看见了邹立升，他的脸面和以前大不一样，被日本鬼子折磨得光剩骨头架子了，面如土色。……邹立升对我说：‘我被判了死刑，你要好好保住身体，用不到 10 年你就出去了，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我听了这个话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回到岭前监狱不几天就被转到旅顺监狱。第二天押我们出来干苦工，累得全身酸软无力。吃饭的时候，小鬼子强迫我们面对面跪在一起‘默祷’、念标语，用日本话报数。谁要不用日本话报数，就遭到鬼子的毒打和不给饭吃，天天有挨打的。

“每天上下班，不分春夏秋冬，都得把全身衣服剥去，光着屁股张着嘴，摇着头，举起双手，抬起腿，经日本鬼子看守检查完了，再过一道木杠，才准穿衣服。就这样苦苦的过了三年，受尽了日本鬼子的虐待。”

放火团成员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他们明知行将死难，但是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自编抗日歌曲及诗词相互鼓励。这些歌曲在“八·一五”光复后，流传到社会，至今许多人还会唱：

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起来反抗，掀起革命狂澜。武装工农几百万，抵住强敌五六年。要生存，不怕斗争久，决战死，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看敌人进退两难。铁血冲开自由路，奋勇打破胜利关，建设起中华苏维埃，死无憾。

1942 年 12 月 9 日、10 日，纪守先等 9 名抗日爱国志士被处以绞刑（有 3 人已死在狱中）。临刑前，他们视死如归，高唱着抗日歌曲走上刑场，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那些残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刘一力）

安东教育界大惨案

1936年11月12日夜，沉寂的街市忽然警笛四起，警犬狂吠。转瞬间安东宪兵队谷口少佐指挥数十人包围了安东教育局长邓士仁的住宅将其逮捕。从这一天到1937年1月12日，在短短四个月里，日本宪兵在桓仁、安东、宽甸、岫岩、凤城、庄河、辑安、临江、长白、通化等10多个县进行了三次大逮捕。被捕者从教育界到商业、金融界人士都有。如此重大案件究竟缘何而起？伪安东省长黄富俊于1961年8月所写交代中道出了部分真相。他说：这次案件“完全是日本宪兵队望风捕影、假想捏造，并非真正的事实。是关东军有计划有目的对东北人民实行一次惨无人道的暴力大镇压。”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安东一带有一支义勇军一直在坚持抗战。这支义勇军的活动得到了当地由一些进步人士组成的秘密组织救国会的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镇压救国会，也为了迫使中国人当顺民，便在“治安肃正”中，在逮捕救国会的名义下滥捕滥杀。实际上，他们所捕杀的许多“思想犯”、“国事犯”，绝非真正的救国会成员。

先有安东教育局长邓士仁、安东县教育局会长、金汤小学校长张镇藩、安东县教育局副会长、新安街小学校长于学礼被捕。继而凡是中国人当的中小小学校长，统统被抓。后来连安东商务会副会长、地方储蓄会长、银行行长和经理、孔教会长和一些商号经理也在被抓之列。

与此同时，日宪在各县也大肆搜捕。据伪满中央警务统治委员会《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反满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被日本宪兵逮捕的安东县有97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合计311人，其中被处死和其他刑罚的249人。其实被捕被抓者，又何止这300多人，据当事人王奉璋事后回忆：“我所知道的被捕去的五六百人中，就有200多人被装在袋里，用汽车拉到桓仁镇扔到冰窟窿里了，还有十人被押到本溪棘沟连山关，活活地喂了日本狼狗。和我一起约有200多人被押到沈阳小南关军警执法处，内中就有二十几人被砍了头。”

被抓去的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思想犯”、“国事犯”，先羁押在警察厅看守所里，后被分批押到一所日本武士道术的演武厅内，被逼环坐在地上。有些人不经堂讯就被反背着手脚吊在屋梁上，名之曰“坐飞机”。这些人常常是早五时被提到讯房，晚九，十点钟才被拖回。这期间是打一阵问一阵，昏过去用水浇，醒过来，接着打。

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在受审时宁死不讲，日宪使用地板刷子把邓的头捺到水锅里“灌凉水”，直到把他活活灌死。安东商立小学校长刘景芳被提审时，日宪问他做过什么事，刘答，“只教书，没做过别的事”。只这一句话，日宪便吩咐打手把刘的头、手、脚绑在一个长凳上，用水壶往他鼻子里灌凉水。刘不招认，便被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又变换花样，把刘的两手背到身后绑吊起来拷打。刘仍不开口，日宪又用一根杠子压在刘的小腿上，开始上去两个人压，后增加到4人、6人、8人，只听“咔嚓”一声，杠断腿亦断，刘当即昏厥过去。

伪满中央银行宽甸支行经理李介夫被捕后，日宪在审讯时先问，“为什么逮捕你知道吗？”他当然回答“不知道”。于是敌人一拥而上，四个人一

齐把他捆吊起来，离地不高，四个人拳脚棒一起上，踢来打去，直打得他哀号声声，气息奄奄，再将他放下来。待喘息片刻后，再架出去打，如是三番。第二天，日宪见打不出口供，又用辣椒水灌。后来见他确实有心脏病，又改用恐吓的办法，让他去看别人受刑。

宽甸财务局长率继先在安东受审时全身被扒光，先灌凉水，然后再满身浇水，放到外边冻，待结上薄冰后再用铁刷子狠狠刷去冻结的薄冰。此刑犹如从人身上活剥下一层皮。

这些人白天受刑还不算，到了夜间，常常是两个人锁铐在一个刑具上躺下过夜。有的白天受了一天刑，晚间躺下，不一定什么时候，看守会大喊一声“坐起来！”大家就得痛苦地挣扎起来。对那些受刑过重，动作不灵的，看守即走到跟前痛打。

日宪不仅对这些“思想犯”、“国事犯”用刑，就是对他们的老人和孩子亦不放过。安东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本属第一批羁捕之列，只因他在日宪搜捕时躲到门后，才暂得脱身。但日宪抓走了他的妻子、儿子及年近九十的老母和年仅八岁的小女。八岁的孩子能知道什么，敌人对她也大打出手，由于每天哭叫，险些双目失明。日宪对秦有德九十岁的老母也不放过，在给其孙子灌辣椒水时，让老人在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孙子受刑。不仅如此，豺狼成性的日宪在刑讯中还用竹尖刺指甲，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全身。有的还把人打得血肉模糊后扔到狼狗圈里喂狼狗，真是惨无人道！

残酷的事实教育了这些平素只知安份守己教书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顿悟，这哪里是什么搜查救国会成员，分明是“杀一儆百”，籍此灭绝东北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思想，俯首贴耳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任凭他的宰割。”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表现出“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爱国气概。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被捕后，用手指在毯子上划“不知道”给难友们看，积极准备与敌人斗争。岫岩中学教务主任曹甫瀛被捕后，借孩子送饭之机，悄声让孩子转告家属，“一要立志，二要放心”。当曹被拉回原学校让其上课，敌人好拍照取证时，曹还向学生发出“不当亡国奴”的庄严号召。曹破日宪昼夜拷打，遍体鳞伤，终未变节。岫岩农务会长于瑞庭被审讯时，不但不供认，反怒骂敌人“口唱王道，实是霸道”。结果被敌人活活打死。岫岩中学校长关英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义愤填膺，乘敌不备，抓起案上的刀向敌人砍去，当场壮烈成仁。还有王贡生受刑时，其不懂事的孩子王明鼎不忍看着父亲受罪，便劝其父招认算了，其父厉声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真是正气凛然！安东总商会会长孙朗轩，为了使自己的同胞免受刑难，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忍辱说：“各商号捐的款都是我给救国会的，下边他们并不知道此事。”一个人承担了“罪责”。

敌人见硬的难以奏效，便改用了软的。王奉璋被敌人连灌四次凉水，也未问出个子午卯酉。这时翻译凑到跟前说：“救国会，日本人也知道不一定有。但这是日本的国策。你若老不承认，把你打个腿断胳膊折的，出去也是个残废。你不如轻溜溜地承认点，判上几年徒刑出去，还能做点什么。”不管敌人怎样花言巧语，王奉璋始终没有上当。敌人在第五次审讯林贵家时，日宪没露面，而是让翻译将林领到街上的一家客店里，摆上香烟水果，先以

宾客相待，继而许愿要把他救出去，林问怎么个救法，翻译说：“你就把救国会里都是谁，你们募捐了多少钱，在哪儿存的告诉我们，今晚就放你回去，照样当你的女师校长。”林当即回答：“生死我都不考虑，任凭你们处置。”敌人一见此招不灵，就又把林押了回去。

这样，这些人在安东受审后，又被押到奉天陆军军法处开庭审理。在庭审中，大部分罪犯都翻了供，日宪仍未问出什么结果，便继续按照他们的既定国策于下去。分三批将这些人分别处以徒刑、极刑。孙朗轩、秦有德等 11 人被判极刑，临刑时，孙朗轩神态自若，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从容就义。

凤城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在临终前，于狱中写给其妻信中道，“余此次舍生救国、以身殉难，因属尽国民之义务，亦正是救家救汝也。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歌。面对敌人的屠刀而毫无惧色，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英勇精神和对祖国的一片赤诚。这些爱国志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敌人一面用公开的残杀手段镇压，一面又暗下毒手。当宣判凤城县清真小学于松涛主任和风城文庙小学关子荣主任无罪释旋后，却在释放前给他们注射了慢性毒针，结果在释放后不久也因毒发身亡。

“安东教育事件”中殉难者的血不能白流。1945 年“八·一五”光复后，我民主政府即于 1946 年 1 月 24 日在安东宝山剧院举行大会，追悼教育界惨案中的死难者，公审并处决了伪安东省视学官小林博和前田好久等三名罪犯。1948 年安东市公安局又处决了 27 名当年参与惨案的反革命罪犯，为死难者昭雪沉冤。

（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朱秀兰）

丰滦密“无人区”

日本军国主义者既残暴又怯懦。他们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特别是武装反抗。入侵中国后，他们在所占领的地区实行血腥的高压政策。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把抗日武装与人民隔离开，他们在抗日根据地及其附近进行“大扫荡”，制造“无人区”。北京北面的丰（宁）滦（平）密（云）“无人区”，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华北制造的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的一部分。它以密云县西部的云蒙山区为中心，东起密云县半城子、西至滦平县渤海所（现属怀柔县）、南起密云县白道峪、北到滦平县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120华里，包含了当时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所辖的全部山地。日军采取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集户并村等毁灭性政策，疯狂地制造这块“无人区”，罪行累累。

1910年6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创建了平北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它象一把尖刀深插在伪满洲国与伪华北统治区的接合部上，既严重威胁着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干线平（北平）古（北口）铁路，又使冀东、平北、平两三大块抗日根据地得以连通，从而被敌人视为心腹之患。1941年10月，由日军第二十一师团师团长盘井虎二郎统一指挥，调集日本驻华北及伪满洲国军队共万余人，对丰滦密发动了持续两个月的“大扫荡”，并自此开始制造无人区。

日军把丰滦密山地全部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采取“分进合击”、“纵横扫荡”、“梳篦情剿”等极端野蛮的战术，交叉反复“扫荡”。“扫荡”中实施“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把百姓的粮食、畜禽、衣物全数掠走，家什用具捣毁殆尽，房屋草棚一概烧毁，甚至连能客人遮雨避风的山洞、石窟窿和长城楼子悉数炸毁。不愿离山的百姓被迫躲进密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于是日军又开始烧山毁林，先后烧光了牛盆峪、大关上、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村的数十万亩山林。

日军在“扫荡”中疯狂捕杀手无寸铁的百姓，制造了一系列血腥惨案。1941年10月30日，日军把密云县朱家峪、罗圈厂、石湖根等村共33名无辜百姓抓到下营据点，当晚分两批砍杀在据点外的坑里，只有罗圈厂村民郭凤山在被砍头之前挣断绳索，乘夜黑跑掉，幸免于难。此后不到1个月，日军又两次将“扫荡”中抓到的共47名百姓带到下营据点集体杀害，无一幸免。同年11月初，日军把从密云县孟思郎峪村抓到的27名百姓（多数为老人、妇女、小孩）集中到该村场院内用机枪射杀，后又架起柴堆，焚尸灭迹。霎时，烈火冲天，腥臭弥漫，一些受伤未死的百姓在火中痛苦地惨嚎挣扎，日军则围着火堆观赏取乐。在这次惨案中，只有10户人家的孟思郎峪村中就有9户遭血洗，其中文海江、文士英、文士清3户被杀绝，全村71间房屋都被烧毁。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丰宁、滦平、密云的结合部建立了丰滦密县委。据《中共丰滦密县委1942年总结报告》记载：仅在万人“大扫荡”的两个多月里，日军就抓捕山地群众800余人，其中300余人被杀害，500人被送往满洲或日本国内作劳工。

1942年，日军又以6000余兵力长驻丰滦密地区，广设据点，一面对山地“无人区”反复进行“肃清扫荡”，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一面加紧实施

其以“民匪隔离”为目的的“集家并村”计划。

日伪军采取先用沟壕碉堡将平原和山地分割，然后“集家并村”，作为制造“无人区”的第一步。1942年4月，日军强迫平原区百姓沿着丰滦密山边突击挖掘“治安沟”。“治安沟”西起昌平县桃峪口，东至密云县辛庄，全长90公里，大沟深5米，宽11米，沟边每隔500米修筑一座炮楼，日夜监视周围百姓行动。为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日军无偿征用了平原区的所有青壮年，仅密云县西部平原区就有5000多青壮年被征用，出工日累计达30多万个。挖沟百姓被迫自带工具和干粮，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动作稍慢就被打骂，许多百姓连累带饿晕倒在沟里，却被视为有意怠工，横遭毒打，被打致死者抛尸荒郊。春耕和夏收季节，日军不许挖沟百姓回家种地、收割，大片土地因此荒芜。

1942年10月，大沟挖成，日军宣布：长城以南、大沟以北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命令沟北百姓限期搬到沟南指定地区居住。随后，日军即开始对“非治安区”反复“扫荡”，逐村驱赶百姓，赶不走就杀。除留下少数村庄的房屋，贴上封条留作“扫荡”时的落脚点外，将其余沟北100多个村庄全部烧毁。一时间，沟北到处烟火冲天，哭声震野，多数百姓被押送沟南“集”入指定村，只有少数百姓躲进了深沟密林中。长城以内、大沟以北遂成为废墟遍地、人迹罕见、鸡鸣犬吠不闻的荒芜地带。

集村并屯，建立所谓“部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这时也搬到了华北来。1942年，日军选定一些相邻的村庄，筑起1丈多高的石墙围圈起来，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口设岗楼，墙内四角建起炮楼，由日伪军警、特务驻守，这种用炮楼和高墙围起来的村庄，即为“武装部落”。到1942年3月底，日军在丰滦密长城沿线及其以北地区共建起四合堂、白庙子、番字牌、白马关等29个“部落”，命令山地百姓统统迁入指定的“部落”，居住“部落”外的村庄全部烧毁或拆除，抢走财物，捣毁其他一切生产和生活设施。这样，丰滦密长城以北方圆百里的山地除29个“部落”外，全部被夷为废墟。

日军宣布每个“部落”外10华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只允许“部落”百姓耕种但不许住人，10华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严禁居住和耕作。“部落”百姓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生活处境极其悲惨。他们终日受到监视，男人每天被迫出外去为敌人种地，上午10时集体出去，下午4时集体归来；“部落”驻守的日军规定：晚归者罚，借机逃跑者杀其亲属。青壮年全部被编入所谓的“团员队”，发给长矛棍棒，每天种地之余，强迫接受“军事训练”，夜里必须“站岗巡更”。妇女的处境更凄惨，不许她们出“部落”，每天服役干活，经常遭日伪军凌辱。日军以“防八路”为借口，命令各家日夜不得闭门，经常随意闯入民家奸污妇女，甚至连幼女也不放过。多少受害者身心受到摧残泪往肚里咽，敢怒不敢言，稍有反抗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有些妇女不堪忍受凌辱，便服毒、上吊而死。

日军在“部落”内实行“米谷统制，碾磨封锁”的法西斯政策，规定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百姓私留或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国事犯”等罪名严加处罚。白庙子“部落”百姓王金鼎，仅因饥饿难忍摘了自家果树的几个果子吃，被发现判为“经济犯”惨遭枪杀。“部落”内实行生活“配给制”，规定每人每年配给少量混合面（一种用高粱米、玉米骨、白薯秧等掺杂一起磨成的混合粉）、1盒火柴、半斤盐、3尺布，经过日伪层层克

扣，到百姓手里所剩无几。以布为例，据调查，多数“部落”平均每人每年仅实得布9寸，百姓穿衣极其困难，日子久了，旧衣穿破、破衣穿烂，以至多数人衣不遮体，褴褛不堪；许多老人全身只围着一块羊皮或麻袋，小孩一年到头光身子；有些姑娘、媳妇只在腰间围一块布，为了遮羞，只好在住屋的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部落”内地狭人多，居住和卫生条件恶劣至极。百姓大多住在一种用木料作架、柴草围墙的“马架房”，有的几家人挤住在一起。屋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天瘟疫流行，无医无药，体弱者成批染病身亡；冬天冰雪封门，青黄不接，缺衣少食，很多人受冻挨饿而死。据《中共丰滦密县委1942年总结报告》记载，“每个部落里四百人，今年（1942年）一年多则死亡百六十余，少则死亡八十六个，死亡数目真是不常听到的，由此可知部落生活苦到什么地步了。”百姓进入“部落”，就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等一切自由，只能象牛马一样任凭日伪役使和宰割，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因此百姓都愤怒地称‘部落’为‘人圈’。”

对待誓死不进“人圈”、不迁居、留守家园的百姓，日军采取了残暴的“剿灭”政策，长年不断地反复搜寻“清剿”，见一个杀一个，许多百姓被杀害。据《中共丰滦密县委1942年总结报告》记载：该年“被杀的村干部、群众有431人，被捕的村干部和群众有1111人，被烧掉房子有25581间，群众损失粮食3634石，牲畜2124头。什物折价98008元。”日军在捕杀山地百姓中制造了多起血腥惨案，密云县小西天惨案即为一例。小西天是丰滦密无人区内的小山村，全村11户誓死不进“人圈”，躲进村南沟深林密的南天门一带，住炭窑，蹲山洞，坚持斗争。1944年1月27日，后小铺“部落”的日伪宪警突袭南天门，抓住了小西天村王庆德、王庆海、王庆田、王庆堂、王庆顺等户和从后山铺“部落”逃出的李生一家等男女老少共37人，当天押进后山铺“部落”。日伪把男人、妇女逐个酷刑拷问，未得到抗日政府和八路军的任何情况，便下毒手。30日凌晨，敌人除留下两名年轻妇女外，押着其余35名男女老幼来到后山铺东南的一条山沟里，刽子手们架起机枪扫射，霎时间百姓纷纷倒在血泊中。

日军自1942年春开始，还连年对丰滦密“无人区”发动季节性的“割青扫荡”，实施阴险毒辣的“片光”政策。所谓片光，就是把地里的庄稼割片净。每年当春庄稼刚吐穗灌浆的时候，日军就对山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强行驱赶大批平原区百姓进入“无人区”割片庄稼。日军逐村逐沟的搜寻，发现庄稼就强迫随行百姓割掉，哪怕是只种有几棵庄稼的石缝石坎都不放过。春庄稼被割后，山地抗日军民只好抓紧补种晚秋庄稼或萝卜、白菜，希望多少能收获一点，但当禾苗、菜苗长出时，日军又来“扫荡”，连割带放牲口，毁得一干二净。日军毁灭性的“割青扫荡”，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寇投降。山里可耕地少，日军年年割青又使很多土地有种无收，加之日军严密的经济封锁，给坚持丰滦密“无人区”斗争的抗日军民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生活困难。百姓除偶尔能吃到抗日政府发放的少量救济粮外，几乎主要靠野菜、树叶度日，野菜、树叶吃光了，就吃树皮、草根。由于缺盐和严重营养不良，多数百姓患有浮肿病，身体极其虚弱，且时常有人饿死。仅密云县冷风甸村17户，1942年一年内就饿死12人。

日军在制造丰滦密“无人区”犯下的罪行举不胜举。尽管这段浸满人民血泪的惨痛历史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和侵略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曹友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血雨倾盆天镇城

1937年9月12日，侵华日军的铁蹄踏入山西省天镇县城，连续进行了三天的大屠杀，2300余群众饮刃喋血，死于非命。因这一于是农历八月初八，当地人称这次历史灾难为“八·八”惨案。

9月初，日本关东军纵队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平绥铁路西犯，进入天镇县境。奉命固守天镇防线的国民党晋绥军，遂即从北起袁治梁、瓦窑口，南至罗家山、大桥等阵地，展开抗击。6日，日军攻克防线的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县城东南方向8里处），天镇县城已失去屏障，担负守城的晋绥军第十一军二旅三九九团仍孤军顽强地坚守。日军绕过天镇城，西取阳高城，继而回围天镇城，三九九团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于11日夜间，从城西撤出。即9月12日晨6时左右，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东北角进入城内，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战事初紧，日军飞机时来轰炸，县城有少数居民将妇女、老、弱者向山区亲戚家疏散。大部分居民以为有晋绥军守城，可保无虑，对日军的入侵缺乏思想准备，更有一些富户则是为守财产，不愿离开家。

日军从轰塌的城墙处入城后，便兵分三股：一股沿东城墙向南，一股顺北城墙往西，另一股直入城内街巷。住在城东北角的刘五全义，清晨上城墙搬自家门板（晋绥军作掩体借用），被登上城墙豁口的日军手起刀落，将头砍落城下。继而日军闯入东北角居民院内群众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人都是在刚起床不及躲藏，便被杀害。据统计，仅这一处遇难人数就达百余人。

就在城陷民危之时，城内一些绅士、商人和富户，对凶残的日军竟抱有幻想，张罗着烧茶、备饭、制小旗，准备“欢迎日军”。以东北街街长王国安为首，敲锣集合起200余名居民去北城门搬运堵门的装土麻袋，以示欢迎日军，致使日军坦克、汽车入城。这些军国主义者入城后横冲直撞，杀人放火，先将这200余名搬完麻袋的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瓮城（北门瓮圈）奶奶庙中，对这些无辜同胞用刺刀追杀，一时人群乱成一团，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西北街侯裕破口大骂日军，被日军一刀将头砍下。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庙内碾道或门口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出魔鬼的罗网。日军见状就改用枪射和往人群密集处掷手榴弹，在爆炸声和射击声中，200余名徒手民众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个和尚也未能幸免。这是天镇县城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第一桩法西斯暴行。

上午9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西北街一马姓大院共十几口人除一名8岁幼女因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70岁老奶奶死尸边幸存外，余皆惨遭枪杀。同街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坐在炕沿边给孩子喂奶，被日军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怜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吮不出奶汁大声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西北街贺贤身中9枪幸存下来，至今活着。请看对他的采访笔录：

“上午9时许，我听见附近有日军砸门声音，我刚想躲藏起来，谁知已来不及了，我的腿还未迈出家门，大门已被打开了，日军比划着把我叫出去，又连着走了几个院户，连我在内一共叫出14个人后，由7名日本兵把我们逼到紧靠我家的高明院内，让我们站成一排，7名日本兵7条枪同时开火，我当时也不知是害怕还是怎么的，下意识的抱头躲闪，身中数枪，昏倒

在地。后来我母亲等人将我抬回家后，我才醒过来，经家人检查，我身上共受9处伤：左胳膊6处，头部、右手中指、背肩胛部各1处，养了好长时间才幸存下来。至今我的背肩胛部仍有明显的伤疤，当时被日军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到处可见，仅我知道的就有隔壁王三和吴三的儿子。西南街郭举子被日军逼着撕掉南街马王庙（原牺盟会会址）墙上抗日标语后，也遭杀害；郭的儿子见状爬在父亲尸体上边哭边骂日军，被砍头。张永胜父子4人全被刺死，家中只剩69岁的母亲抱着6岁孙女痛哭。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来，无处躲藏，慌忙中从炕上摸起一把剪刀自杀。王面匠一家3口人，在日军的屠刀下，为保全尸，投井自尽。”

与此同时，日军将城内古建筑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放火烧毁。继而对城内商号大肆抢掠，西街“积厚成”、“庆福元”、“德庆隆”、“义和成”、“天德公”等商店门窗洞开，货架狼藉，珍贵轻便之物和细软尽被掠走，不值钱的货物弃掷满街。劫后，又将这20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时，各处起火，烟罩全城。

闯入民宅的日军，肆意抢掠。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与一名日本兵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惨遭杀害。日军每到一家，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怕收藏武器，二是要白洋。东南街王炽和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衣扣，因搜不出白洋，被打得死去活来。闯入西街王振文面铺的一伙日军，在王家吃喝一气，临走时，用食指和拇指圈成个圆圈，比划着要白洋，因逼不出大洋，用刺刀尖将王振文胸脯划了好几道血口子。

从上午10时许，日军分别在四道街道沿门逐户地将难民驱出，分别押往南街马王庙、西城门云金店前、北城门外霜神庙三处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大屠杀。次日又在东北街大操场进行大屠杀，使一座古县城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二）

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500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小孩多跟随母亲。南、北、西三面架着机枪，四面有日军把守。马王庙分里外两院，里院有一个长2丈5尺、宽深各一丈5尺左右的大坑子（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日军比划着先让男人们这边的阎毅、张凤祥等5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被杀在坑内。随后又有几批被撵进庙院，人们只见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后来有人间或听到几声惨叫声，方知鬼子在下毒手。有几个胆大的青年想偷偷溜走，当即被看管的日军拦回。杀人成性的日寇在里院坑后站成一排，端着刺刀，在指挥官的指挥下，一齐动手，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前，再一使劲，便把尸体挑入坑内。刽子手们杀人杀累了，就吃喝一气。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就强令人们进庙前脱掉衣服，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32刀，大坑堆满了尸体，就用棉被盖实，上边压上大石块。余下的尸体，又逼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然后再杀，直到死尸堆满了3间房子。

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窖，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进去躲藏，被日军发觉后，用刺刀猛刺，日军犹恐有活人逃出，又把窖边一堵土墙推倒，将窖口盖住。从上午10时一直杀到下午1时许，除路西侧跪着的妇女、小孩被放回外，300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其中有跟随大人的十几名儿童），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于进海身负七处伤，待晚上无人看守时，从死人顶层爬出，解下

死人的裤带作绷带，包住伤口逃回家。教员任定国身中 11 刀，幸存下来。西南街高瓚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四口，均被残杀。孙子高辅，年仅 13 岁，被刺杀在坑沿。第二天苏醒过来后，口渴难忍，挣扎着爬进北屋，在被日军砸烂的半截水缸前喝了几口残留的脏水，因流血过多死亡。（三）

与马王庙惨杀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城西门南侧的大屠杀。城西门附近路南云金店前有一片空地，东、北、西三面都是民房。日军把从西南街、西北街逐户赶出的 300 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店前高台阶上一挺机枪对准人群，然后分 10 人一批，用机枪狂扫，顿时积尸成垒，尸堆下淌出来的鲜血，殷红了土地。住在附近的侯二，虽双目失明也被拉出残杀。张进恩在逃跑时被日军追上去用东洋刀砍断腿，张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被枪击而死。住在西门附近马路南侧的张凤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个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被忽然从东面大街上过来的一伙日军撞见，一名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 3 人倒在血泊之中。加上云金店前的大屠杀，张家共有 9 口人丧生。与张凤有隔路在对面开车铺的吴唐（张的女婿），眼看亲人被杀，同胞遭戮，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辮为武器，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掩蔽，与敌周旋，接连砍死 4 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 11 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 40 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抗拒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中间设有一厚木门框掩蔽，有 10 余人死里逃生。趁黑夜缒城而出的周炳，奔跑了一夜，第二天到达薛辛天时，脱下棉背心，抖出一颗只划破前胸的废弹

（四）

12 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人也被日军队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县政府大照壁后及公安局院内。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俩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哩嘟噜”地喊叫着，威胁民众。在公安局院内的 200 余人被日军用 3 尺多长的木板追打着囚进东、西各 3 间房子里。刚结婚不久的 17 岁小青年李喜和，因抗拒入房，被日军残忍地用东洋刀从后脖颈砍下脑袋，因气管未割断，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又被补了一发子弹而死。约下午三四点钟，三处难民共 500 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南洋河北岸霜神庙后崩楼坡下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深 3 尺余。在大屠杀前，人群中有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料到凶多吉少，就向大家高喊：“哥哥兄弟们，日本人要杀人呀，能跑就赶快跑吧！”话音未落，即被日军开枪打死。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日军听见后就用刺刀尖朝下象捣蒜似的乱捅一气。临走时，日军还往壕内尸体上埋土，因时值下大雨，只仓促地埋了一层薄土。未被刺死的少数人因此得以逃生。任宏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得以幸存。王振文在控诉日军罪行的材料中叙述了他死里逃生的经过：

“……我家两代 4 口人在一批被万恶的日寇刺杀的，我被扎了 3 刀，最初一刀是扎在肩胛骨处，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后来右肋下又被扎了两刀，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已昏迷过去，所以对身边跪着的二伯、四叔、堂弟是怎么被扎死的情景，就记不清楚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脸上象针扎一样的疼，我逐渐苏醒过来，张开嘴，

觉得有水珠掉入口中，等我睁开眼，才知道天正下着雨。看天色，约摸是黄昏时分。我用手一摸，身上有泥土，在我脸边有几株蒲草（被日军埋土时连根挖出的）摇曳，不时地抽打着我带血的脸，我这才弄清刚才疼痛的原因。我用双手撑着下边的尸体试着想爬出来，可是由于腰部伤重，怎么也爬不起来。就在这时候，我身下的尸体竟蠕动起来，还发出哼叫声，让我往开掀一掀，我身子动不了，只好用手搬他的头，使他头先钻出来，他钻出来后，又往出拉我，我说：‘我在顶层一时死不了，你拉出我也站不起来，还是你先逃命吧！’他向北逃走后，我又昏过去了，后来在模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衣服，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东街的王君，他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因赤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剥件衣服，竟把我当成死人了。后来他硬是将我抱出来，又扶我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忍着剧痛，摸黑向东面鲍家屯方向逃去……”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 30 余丈的一段壕沟内，几乎堆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

（五）

13 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把来不及残杀的难民们，控囚在北城瓮圈中过夜。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均掉在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他们强逼着灭完火的青壮年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 500 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也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 40 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 40 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 3 条大壕，壕深约 3 米；东西长 11 米，南北宽 2 米，3 条壕互相勾通，原用于防空用。被囚的难民，分 10 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上午，500 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像。

（六）

14 日，残杀仍在继续。这些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唯恐还有躲藏起来的男人没有被杀绝，是日又对四周城墙的洞、坑，进行了一番“清理”，见到洞、坑，就用机枪扫上一梭子。

被日军洗劫后的县城，象死一般寂静。连日来，白天乌鸦盘旋乱叫，黄昏狗咬狼嚎。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据西南街幸存者高弼亲眼所见，马王庙院内，猪狗成群结队地撕啃腐尸，狗吃死人眼都红了。

大屠杀过后许多天，日军才让居民清理死尸。大多数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家人只能凭亲人衣服的布料和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上认尸。在霜神庙蒙难的高峨的尸体只剩下一条胳膊，是家属从裹胳膊的那只破袖子上认出来的。死在城内无人认领的尸体，由七八辆大车拉到南城门外偏西一里许的三官庙一带，挖坑掩埋。有个幸存者王家珍数过，仅一个坑内就有 286 具死尸。

日军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刀刺外，

还用尽了种种其它杀人方法，诸如：砍头、劈脑、分尸、切腹、刺穿阴户等等。西街魏科子的头被日军劈为4瓣而死。至于被杀或被奸杀后扔入水坑的男女尸体，更是数不胜数。东南街一个大水坑内几乎漂满了死尸。一位妇女见后，误认为里面有被抓走的自己男人尸体，对生活失去希望，悲愤地将亲生男婴溺死后，自己跳入水中自尽。

被日军奸淫的妇女，更难以计数，凡是躲藏不及的年轻妇女多被糟蹋。东南街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被一伙日军发觉后尽行奸污，有一位姑娘竟被这群野兽整整轮奸了一天。同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出嫁吉日临期，却被几名日军轮奸后，扔进大水坑。更有甚者，一些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被7名日军在街上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撕裂。西街刘银兰、刘玉兰两名女学生，破日军强奸后上吊自尽。西北街、东北街妇女被兽军奸污后跳井自尽的最多。据一些老人回忆，井内尸体女多男少，有几口井几乎填满了女尸，除少数是因受惊吓轻生外，多数是受辱后觉得无颜再活于人世而跳井自尽。还有不少妇女为逃避灾难，剃发扮男，毁容换装，在脸上抹锅底黑或藏在山药窖，多日不敢露面，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内中也有为保护自己人格而奋勇抗击被敌人残杀的，西北街姑娘贺月娥，面对衣冠禽兽，奋力反抗，抓打敌人，被敌人枪击腹部，流肠而死。后来埋在北城门外，被人们追誉为“贞女坟”。

日军兽性令人发指，还有为取乐而肆意侮辱妇女。9月14日，几名日军把从四处搜寻出来的一大伙妇女赶到东北街，在头天枪杀过人的大操场上，强迫这些妇女把裤子褪到膝下，用枪托抽打着绕圈子，妇女们饮泣吞声地在横七竖八的同胞尸体边转着，日军却站在一边开心地狂笑。

1945年9月天镇光复后，天镇人民在县城建造了“天镇县蒙难同胞纪念塔”。经过较详细的调查，计被杀害者西南街332人，东南街368人，东北街258人，西北街290人，总共1248人，铭刻姓名于碑上。另外，估计有绝户者400余人，加上外籍客商及本地受害不知姓名者约700余人，共蒙难2300余人。至于被残害致伤及被抢劫财物者，则更难以计数。

日寇在天镇的大屠杀，仅是其侵华史上的残暴记录之一，也是现代战争上最野蛮最残无人道的兽行，它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共山西省天镇县委党史研究室曹宏顺整理）

注：本材料依据吴自成同志的“天镇人民蒙难记实”，又采访了贺贤、段丕功、周炳、王家亮、展贵、高弼、王振文、吴兆吉、安进邦、高日融、马瑞等当事人整理而成。

古城正定血泪仇

正定县位于冀中平原，历史悠久，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南侵。9月24日占领保定，10月6日2000多日军进至正定新安车站一带，随即朝正定一路烧杀而来。

岸下村惨案

1937年10月6日夜，日寇出动步兵1000余人，携炮10余门，向罗家庄、五里铺、东柏棠进犯。是夜，国民党守军派便衣队，手持大刀袭击岸下村日军，毁敌炮两门，炸死、砍死部分日军。气急败坏的日寇，于10月8日清晨将岸下村团团包围，随后闯入村中搜人抓人，用绳子将村民捆绑成串，拉到村外即用枪击、刀砍、火烧、刺刀挑等残忍手段进行屠杀。在村北口张居亭家坟地里，日军用机枪一次就打死了155人；在农民于黑仁家白菜地里，杀死了26人；日军凶恶之极，边搜边杀，在张花子家地窖里发现了三个避难的村民，当场杀死后，又用木棒把死者的头颅砸碎；在张轱轮家发现二人使用火烧死。日军在残杀无辜的同时，还到处糟蹋残害妇女，使许多妇女含恨而死。日军的猖狂屠杀使街头巷尾尸体横陈，惨不忍睹。在被杀害的村民中，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被斩成数段，有的被奸杀的妇女裸露着身体，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岸下这个250余户的村庄，在这次惨案中死在日寇屠刀之下的就有350人，负伤18人，有55户被杀绝。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岸下惨案。

今天还健在的张黑妮老人，就是岸下惨案的幸存者之一。在访问他时，他说了亲眼见到的情况：“那天，因我娘有病，我正给她做饭，几个日本鬼子闯了进来，把我抓走。出门后碰到了黄五保，给鬼子拉着几匹马。鬼子叫着，比划着，让我给他们喂马。喂上马后，我趁鬼子不注意，溜进了一个茅房，在茅房一直等到那个鬼子走后才回了家。第二天，我在我家柜底下藏了一天，第三天10月8日早饭后，我娘让我到村西头看看情况。我一出门，就看到街里一片惨景：张五妮、张小鸡、张窝狗被杀，尸体横在街头。我赶忙回家又在柜底下躲起来。鬼子到我家搜查几次未被发现。快到中午了，我想：光在家里藏着迟早会出事，于是，我背着我娘出门往北逃，看到张秋奎被杀在王家道口，那里还躺着四个人，学堂门口也有一具尸体。走到十字街，看到远处有五个鬼子，他们叫我，我急忙钻进胡同，拐弯抹角地到了张喜成家藏起来，傍晚天凉了，我回家给我娘取棉袄，走到官井那里被鬼子抓住。鬼子撕了我的衣服，把我绑起来。他们叫喊着，不知道问我什么，我没答话，他们就按我的头撞地。这时，一个翻译问我：‘你家有没有姑娘，你老婆那里去了’，我说：‘没有’，这伙强盗才放了我。10月9日、10日这两天，鬼子抓民夫去铁路上扛枕木、我也被抓去，扛枕木往三角村送。10月11日，我找张洛灰、张秋成商量：村里死了这么多人，四五天了，无人收尸，狼吃狗啃，实在不忍看，咋办？我们商定，找人先掩埋。我们邀集了半天，集合了五六十个人。我们分头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先把张风鸣埋了。又到村南口，被杀死在张振中家家里有30多人，武术教师张辰也死在这里，真是尸横遍地，触目惊心啊。掩埋好这些人后，又到张香保家，见黄小河死在张家门口，张香保父子三人都死在他家山药窖子里。村北徐二改家一口井内就跳下去28个妇女和6个小孩，我们只救活了10个妇女，其中于黑仁的叔伯奶奶丁竹姐现在还活着。为了使死者家属能认领尸体，我们一边埋尸一边在坟头上用草

棍和砖头标上了记号。日寇欠下这笔血债，我们全村的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

日寇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岸下村民的强烈反抗。村民黄骠驹手持菜刀，在家门口同冲上来的日寇搏斗，劈死一个，重伤一个，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寇打死。村民张丙辰，手持粪杈迎击闯入他家的两个日本鬼子，杈死一个，杈伤一个，待他越墙逃脱时中弹身亡。拳师张秋，被日寇追赶，他拼力跑回家中，拿出砍刀，在院子里与追上来的日寇展开肉搏，他先砍死一个，退至二门，鬼子一拥而上，他又砍死一个，而后，跃上了房顶，又用标枪刺死一个，日军追到房顶，张秋攀到树上，因再无退路，被日军开枪打死。有两个鬼子窜到杨金姐家里，看见杨金姐的儿媳马风菊，兽性发作，把枪支和东洋刀扔在外屋企图强奸。杨金姐听到儿媳的惨叫操起敌人扔在外屋的东洋刀冲进里屋，趁敌不备，猛地一刀将一鬼子砍死。另一个被吓惊的日军企图外逃，被婆媳俩死死扭住，杨金姐咬牙切齿的骂道：“王八羔子，老娘跟你拼了；”举刀将这个日寇杀死。婆媳俩急忙将日寇的两具尸体和枪支、洋刀、钢盔扔进猪圈埋好，上面覆盖一层树叶和乱草，然后离开险境。

北兰村惨案

10月9日凌晨，村民们被枪声惊醒，发现日军进了村庄。人们有的趁大雾逃到村外躲避，来不及外逃的就在村中藏身，晨雾消散后，日军挨户破门进行搜捕屠杀，在南街先抓住张洛万，又捉住吕洛旦。三个日军用刺刀挑起一件国民党部队的军衣叫吕洛旦穿上，吕洛旦拒绝，当场被杀害。日军还把他的尸体扔到大路上，先让汽车轧烂，然后浇上汽油纵火焚烧。在崔云鹤家的地窖子里，一次就被杀死了18人，董歪脖被捅了一刀，肠子流出体外，他钻到死尸下面隐藏，待敌人走后，才抱着肚子逃往村外。村民崔洛合，连拉带背领着三个孩子向村西棉花地逃跑，被日军发现开枪射击，连打三枪，把他和两个孩子打死，另一个孩子跌入水沟里淹死了。崔福堂被捉住以后，日军叫他跪下，然后一手掰住下巴，一手拿着匕首，把他的脖子割断。

日军把捉到的群众赶到陈洛开家院子里，哄骗群众说是开会，可他们一面说着皇军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的鬼话，一面下令用机枪扫射。瞬间，一排排人群倒下去了，80多名无辜同胞的鲜血流成了河，屠场变成了一片血海。北关这个170多户的小村，被日军杀害145人，杀伤11人，直到11月14日幸存的人们才悲愤地掩埋了亲人们的尸体。

朱河村惨案

10月9日日寇进攻朱河时，国民党军队两个连分别在村东口和北口防守。防守村北口桥头的鲍连长带领全连战士三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在最危急关头，鲍连长从房上跳下抓起一大铡刀闯入敌群，一气砍死8个日寇。后因中弹牺牲，至今朱河村民还在怀念鲍连长。

守军因弹尽无援，朱河村民奋起助战，同仇敌忾、视死抵抗。守军全部战死。在阵地上助战的村民张双庆、马计皂、赵满圈、马傻辈等18勇士拣起阵亡士兵的枪支、投入战斗，因寡不敌众，全部被俘。除张双庆逃出外，其余17人全被日军杀害。

日军攻入朱河村后，见人就杀、见财物就抢，抢后就一把火把房屋烧掉。尤其是朱河村的付家角最为惨烈，百余户被惨无人道的日军夷为平地，这条街的成年男子几乎全部被杀光。日军在一天时间里，在朱河村杀死无辜百姓283人，杀伤20人。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屠杀，有血气的中华儿女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材民张雨子，把一家老小藏在地窖里之后，便往村南突围，走到村口，被六七个端着刺刀的日军团团围住。敌人用刺刀扎他，他凭借自幼练就的武功，赤手空拳与敌人周旋。他先打倒了二个日军、双臂受伤 30 多处，因流血过多，力不能支，被敌刺中腹部，肠子流出，倒下后敌人又向他刺了两刀。日军走后，张雨子还剩一口气，被他的母亲救走。当日军在付家角残杀百姓时，村民焦小多手持铁锹，从敌包围圈的空隙处突围，刚越过他家院墙，遭遇日军，他劈头一锹，打倒日军脱险。村民张三月，去村西挖战壕，回来被 8 个日军包围，张三月挥锹与日军搏斗，他劈死一个，劈伤一个，其他日军开枪将他打死。后来人们称张三月为“孤胆英雄”，他的事迹在朱河一带广力流传。

牢记血泪仇

10 月 18 日，日军攻入正定。进城后，他们兵分三路：在 13 个地方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共残杀了平民 1506 人，重伤 103 人，烧毁房屋 106 间，抢走牲畜 80 多头。这是日本法西斯暴徒欠下正定人民的一笔血债。

为了纪念被日本侵略者屠杀的死难同胞，让子孙后代铭记日本强盗在正定的凶残大屠杀，牢记这国难家仇和民族血泪，激励后人致力振兴中华之伟业。1984 年 5 月 30 日，中共正定县委，正定县人民政府在日本侵略军杀人最多的岸下村中心，树起了一座庄严肃穆的“岸下惨案死难同胞纪念碑。”每逢岸下惨案纪念日，岸下村村民扶老携幼，来到纪念碑前凭吊、悼念亲人的亡灵。

“岸下惨案死难同胞纪念碑”碑文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起日寇大举南侵十月六日窜入我县境内十月八日围掠岸下奸淫妇女屠戮村民全村二百余户千二百人死于寇之兽行刀弹者计三百六十五口绝五十五户尸横血淌惨不忍睹乡众恨怒充膺不甘其侮纷起而抗击有黄姓名骠驹者拼生死以卫乡土持厨刀搏入寇群劈毙一寇重伤一寇挫敌凶焰张我正气黄骠驹力战血拼终以身殉国壮哉此举中华之浩气可歌民众之伟力见存国难家劫尔来四十有七年矣前事不忘我中华民族之能屹立于世界不再任人欺凌者端赖中国共产党之图划领导全国人民之艰苦奋斗耳喜看今日之域中人民十亿尽砺中兴之志神州万里已呈崛起之势四化伟业必实现于祖国大地中华富强必瞩目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党史办杨博先)

血洗梅花镇

1937年10月12日至15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藁城县梅花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九”（农历九月初九）惨案。5000多名日本鬼子四天三夜残杀无辜群众1547人，46户被杀绝；100多名妇女被侮辱糟蹋，600多间房屋店铺被烧毁，粮食财物被抢劫一空。繁华富庶的梅花镇变成了满目凄凉，断墙颓壁的废墟。

地处藁城、赵县、栾城三县交界的梅花镇，是藁城县南部闻名遐迩的商贾重镇。“七七”事变前，镇内有550多户人家，2500多口人。镇周寨墙高筑，镇内街道宽阔，房屋整齐，有较大的银号、棉店、粮店、煤店、药店、染坊、饭店、澡塘等80多处，经常驻有平、津、保、石等大中城市的豪商巨贾的代理人，是冀中、冀北、冀西交界地带重要的粮棉集散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1937年10月11日，原国民党53军吕正操部691团，掩护53军大部队南撤，营进驻梅花镇。这个团的官兵多数是东北人，参加过西安事变。1936年，团内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进驻梅花镇后，吕正操团长征得共产党代表孙志远同意与支持，决定立即构筑工事，堵死四门，在梅花镇抗击日军。西门是日军从西北方向追击来的要害处，全部用麻袋装土堵死。东门靠近煤店，全部用大块煤堵严。梅花镇人民听说要在这里打击日本侵略者，纷纷行动起来，烧水、做饭、烙大饼、煮鸡蛋，热情慰问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11日傍晚，日军坂垣师团的两个大队，从西北方向直逼梅花镇。9点多钟日军开始向镇内进攻。吕正操部691团一营利用寨墙、寨门掩护，居高临下，猛烈袭击日军，连续9次打退日军进攻，使日军伤亡惨重。12日黎明，日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一营弹药已快用完，又无援军，为避免过重损失，团长吕正操果断决定：北上找共产党，抗日打游击！一营奉命从东门撤出，会同进驻赵县四德村的二、三营转移晋县小樵镇。在撤离梅花镇时，战士们在大街上喊话：“老乡们都走吧！日本军来了，逃命吧！……。”镇西部当时战事正紧，多数人家没有听到喊声，未能撤走；镇东部多数人家听到喊话后，一小部分人从东门逃走。有些人虽听到喊话声，但认为兵与兵打仗，不至于杀老百姓，存有侥幸心理，躲在家里没走。就在这一天（农历九月初九）天还未亮，多数人家门还没开。5000多名野兽般的日本鬼子兵从镇两南翻过寨墙，打开西门扑向镇内。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见门就砸，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顿时，整个梅花镇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砸门声、大人的惨叫声、孩子的哭啼声响成一片。

血染梅花九月九，家家户户血泪仇。日本侵略军砸开马二黑家的大门，把马二黑临产的妻子用刺刀刺死，还挑开小腹，把血肉模糊的胎儿挑在刺刀上狂笑取乐。面对日军的暴行，马二黑怒不可遏，猛地向日本兵扑去，凶恶的日本强盗连开几枪，把马二黑和他的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打死，马家连同尚未出生的胎儿全家五口全遭惨害。几个日军闯进王淘气家，一进门就杀死了王淘气的母亲，其父王保云按捺不住心头怒火，随手抄起一把三齿，喝令全家人：“跟我往外冲！”话音刚落，三齿就铸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当他刚提起三齿，又扑向另一个日本鬼子时，中弹身亡。王淘气乘机跑了出去。日本兵将他怀孕的妻子开了膛，两个孩子也被用刺刀挑死。鲁全成家大院住有6户人家，20口人。鲁全成早晨起来上街，刚出门，看到满街都是穿黄衣裳的日本兵，端着枪在街上乱跑，挨家挨户砸门，他急忙跑回家，关上大门，

告诉家人及同院人家，日本兵进村了。正说着，门被砸开，三四个鬼子端着枪、拿着绳子进了院，哇啦哇啦乱叫，气势汹汹地把同院屋里的人，全赶到院子里，示意大家都蹲下，然后把大人、孩子都绑了起来。鲁全成年轻，被绑后边骂边反抗，一个日本兵边打他边把他往外拉，一家人见状，拼命上前阻拦，日本强盗开枪打死了他两个不满 10 岁的儿子，并将其 5 岁的女儿踢昏在地。鲁全成的姥姥哭喊起来，被日本兵一脚踢倒，日军先把老人的双脚剁掉，再割下乳房，老人活活痛死。鲁全成的母亲、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孩子被推入院内井里，被日军用轱辘、砖头砸死在井内。在鲁全成的院里，15 人被杀死，2 人被打伤，3 户被杀绝。

大屠杀从拂晓到深夜，大街上、院落里、粪坑猪圈里……，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尸体。12 日这一天，日军残杀百姓 300 多人。日军在镇内各处杀人的同时，又把一批青壮年抓了起来，30 人一伙、50 人一串绑在一起，强迫他们跪在大街上、真武庙前和镇内几个较大院落里，被看押起来，日本兵把他们一批批拉出去残杀。鲁全成没有马上被杀，他们在真武庙前一直跪到下午四五点钟，然后被赶到轱辘把水坑。全镇大的杀人现场有 10 处：镇西头轱辘把水坑、地主尚五子家长工大院；镇东头臭碱水坑、打坯坑、血井；镇南头三十六口坟场；街内的染坊大院和杨洛风的粉坊大院；西门外寨墙沟桥头和南部的水沟旁。在这 10 处，日本兵共残杀无辜百姓 1200 多人。

轱辘把水坑是最大的杀人场。12 日中午，几百名日军端着刺刀，站在水坑周围，坑的四周架起数十挺机枪。为显示小日本的威风，他们派飞机在上空盘旋。日军从真武庙前和大街上把群众驱赶来，再用枪托、棍棒打，用刺刀威逼，一边强迫人们往水坑里跳，一边用机枪扫射。那年雨水多，坑里水很深，人们被强迫跳进去，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淹死。日本兵一旦发现没有淹死的老百姓，远处的，他们用枪扫射；近处的，他们用刺刀挑。一霎间，坑水成血水，尸体横陈，惨不忍睹。血水溢出坑外，顺道沟流了半道街。在被强迫赶下水坑的 600 多人中，只有鲁全成、张满仓、刘小三、刘小四等 8 人幸免一死。趁鬼子不注意，鲁全成一头扎进坑里，他不会凫水，一下去就喝了许多血水，被淹得迷迷糊糊晕了过去。后来，不知怎样被坑里的死尸挤到了西北角，飘出了水面。他一睁眼，看到身边的舅舅张洛东也没有死。他舅舅让他跑，他起不来，就躺在成堆的尸体里边，露着脸的上半部装死，没被日本鬼子发现。等到天黑伸手不见掌时，他乘机越上寨墙，溜到墙外寨沟跑出了村。张满仓被驱赶到水坑边，没等鬼子往里推，便一头扎进坑里，他会凫水，进坑后，他慢慢往西潜游，不敢露出头，憋得连喝了几口血水，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慢慢露出点头来，吸一口气，赶紧又潜入水中，等离岸远了，才露出水面，半睁半闭着眼睛，仰卧在水面上。为了不让日本兵发现，他把头夹在一个死尸的大腿中间，靠近他的张秋夫，头被子弹打中，脑浆和血水溅了他一脸，已看不出他还象个活人的样子，才幸免一死。

一坑尸骨一坑恨，满坑血水满腔仇。惨案过后，乡亲们在这里整整打捞了 5 天尸体，有 100 多具尸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一起埋到了镇西一个坑里。1958 年，在挖坑泥时，发现血水渗地一尺多深。

在宽大而空旷的地主尚五子家长工大院，日军把 100 余老百姓强行赶到院内，强迫他们跪了一天一夜，不让吃一口饭，喝一口水。13 日，一群日本兵进来，把这 100 多人全部枪杀和挑死，尸体被扔到院内两个大菜窖和一个大粪坑里。

12日，万恶的日本强盗，把从各户抓来的部分妇女，强拉到地主杨洛风的粉坊大院，强奸侮辱。有11名怀孕临产妇女被日军剖腹，并将胎儿吊在树上练习打靶。有个日本鬼子用刺刀把胎儿挑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孟小庆妻子被扒光衣服，吊在门梁上，打得皮开肉绽后，剖出胎儿，用刺刀挑着狂笑取乐；郑小娥被扒光衣服，割掉乳房，两个孩子爬在母亲身上哭叫，也被日本鬼子挑死。还有很多年轻妇女、姑娘被强奸后，割掉乳房活活地痛死。

被赶到染坊大院的100多名妇女，受到日军同样的摧残。30岁的蒋玉氏、34岁的张邓氏、25岁的魏武氏等先后被十几名日本鬼子轮奸，光着身子，被日军百般戏弄，取乐够后，用刺刀将她们一一挑死。唱戏出身的青年妇女张风兰，两个哥哥和丈夫被日本兵残杀后，她又被日本兵绑来轮奸，并将其裸体绑在染布桩上，打得鲜血淋漓。日本兵以为她已被打死就走了。深夜，她挣开绑绳，赤身越过寨墙而逃，幸免于难。

一群群日本鬼子，晚上经常打着手电筒进家串户，抓去年轻妇女、姑娘，野蛮地进行奸污和残害。一些妇女、姑娘不敢在家，都躲在村东南角马家卷子坊里，整整挤满了三个屋子。怕被发现受辱，几个老太太在外间屋，不料还是被日军发现，三五成群打着手电筒涌进屋里，将妇女们一个个进行奸污。

梅花儿女面对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赤手空拳同鬼子搏斗，拿起大刀、木棒同鬼子撕杀。10月13日和14日，张里等62人，拿起棍棒，冲出封锁线逃跑时，不幸落入日军手里。他们被捆绑起来，打得腰折腿断，然后又推入打坏坑里，填土活埋。200多名青壮年被日军捉住后，绑到东门外一处空地，毒刑拷打后，将他们用刺刀挑死。马胜福、马喜福等11人，在豺狼成性的鬼子的枪口屠刀下，宁死不屈，怒骂不止，气得鬼子哇哇狂嚎。鬼子用铁丝穿透他们胳膊，将他们打得奄奄一息后，往身上浇上汽油，推入火堆烧死。

樊保全等63人，被日军绑到东门外臭碱水坑旁，先被挖掉眼睛，再被剁掉四肢，然后日军残忍地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扔进臭碱水坑。

东门外有一口大眼井，14日下午，日本兵将45名青壮年绑到这个大井旁，日军嚎叫着，举着战刀，强逼他们跪下，但人们毫不畏惧，宁死不屈。日军恼羞成怒，将45人全部砍死。头被挂在树上，尸体扔进井里。

南门外大屠杀更令人触目惊心。10月13日，200多名妇女、儿童被绑到南门寨墙角下，日军想找到吕正操部队的下落，在妇女和儿童身上打主意。先是哄骗，而后恫吓威逼、追问部队去向。日军见人们不吭声，即拉出四个不满10岁的女孩追问，女孩一声不语，狠心的日本兵用战刀将四个女孩活活劈成两半。他们严刑拷打仍然问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象野兽一样将那200名妇女、儿童全部枪杀，尸体被扔到寨沟里。惨案过后，赵二满等五名老长工，在这里整整打捞了三天尸体，并把36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埋在一起，被人称作“三十六口坟”。筹建“梅花惨案”展览馆时，从这里挖出三颗头骨，其中一颗头骨，从左耳打进去的一颗子弹还在右耳骨上长着。它将永远记载着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

1937年10月14日，从小逃荒来梅花镇的张玉振等6人，被日军毒打整整一天，被打得满身是血。晚饭后，日军又将他们捆绑到东门外残杀。看到这满地尸体满地血，树上又挂着血淋淋的人头，他们肺都气炸了，面对日军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迟早要跟你们算帐！”他们挣断绳子，赤手空拳与日本鬼子拼搏。凶恶的日本强盗端着刺刀，乱扎横刺，5人惨死在

电子的屠刀下，张玉振被刺 11 刀，倒在血泊里，夜深了，他苏醒过来，强忍着剧烈疼痛，爬到镇外较远的地方，被人救活。解放后，还健在的张玉振身上仍然留有 11 处刀痕和半截拇指。这伤疤铭记着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海深仇。

贫苦农民张二白，从小给地主当长工，受尽剥削压迫之苦，在地主的皮鞭下，从不低头。在日寇的屠刀面前，更是坚强无畏。他被鬼子抓住后，押上大街，几个鬼子拿着推碾棍边走边打。张二白见大街上血迹片片，乡亲们的尸体横三竖四，禁不住怒火冲天起。他冷不防回身，夺过鬼子手里的推碾棍，手起棍落，一个鬼子的脑袋开了花。二白抡动大棍左劈右打，打得鬼子滚爬在地，鬼哭狼嚎。几个端枪的鬼子跑上来，二白大喊一声：“狗东西们，叫你们尝尝老子的厉害。”举棍猛扑过去，鬼子射出罪恶的子弹，张二白英勇牺牲 50 多岁的阎老聪，沿街乞讨来到梅花定居。当一批批父老乡亲被赶到轱辘把水坑残遭杀害时，他恨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蹿地从人群中跳出来，振臂高呼：“乡亲们，跟小日本拼！”一个鬼子向他扑来，他顺手抄起一块砖头，把鬼子的一只眼砸瞎，那个鬼子疼得嗷嗷叫。几个鬼子齐动手把他绑在树上，他破口大骂。残暴的鬼子兵割去他的舌头，他怒目而视，运足气力，喷了鬼子兵满脸血浆。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一刀一刀刮他的肉，他手不能动，口不能合，两脚跺地蹬蹬响，鬼子又剁掉他的双脚，砍去他的双臂。阎老聪虽壮烈牺牲了，但在他铮铮铁骨的威慑下，鬼子们被吓得目瞪口呆。

大屠杀持续了四天三夜，到 10 月 15 日中午，日军才离开梅花镇。日军撤离后，外逃的乡亲陆续回来，隐藏的人们相继出来。看到梅花镇内镇外，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水坑里，水井里，山药窖里，菜窖里，寨沟里，桥头上等等，到处都是缺头断腿、少胳膊开腹、割乳、赤条条的死尸，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的情景，无不悲愤满腔。家家户户嚎啕恸哭，四下寻找，辨认亲人的尸体，进行安葬，一直忙乱了一个月。有 200 余人的尸体因辨认不清，分几处进行葬埋，梅花镇四周变成了坟场。

骇人听闻的“九·九”惨案，给梅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不幸，也使全县人民认清了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激发了全县人民的抗日热情。梅花惨案之后，即在藁城大地上崛起了一支支抗日武装。以共产党员马玉堂为首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带着中国人民和梅花儿女对日寇的深仇大恨，联合李小贞地方武装，一举攻克藁城县城，俘虏日军 40 余名。从此，独立支队、平汉挺进队、石东游击队、县大队、农民大队等抗日武装相继建立，四处出击，抗击日寇。梅花镇和藁城县人民，主动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布匹、军鞋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进山区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部队。1938 年，藁城县被冀南区党委命名为“抗日模范县”。

建国后，为使广大人民群众牢记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暴行，党和政府在梅花镇建立了“梅花镇惨案”展览馆，并在惨案旧址树碑修亭。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和清明节，热爱和平的梅花镇人民纷纷到遇难者墓地，悼念死难同胞的英灵，永远不忘侵华日军的血腥暴行。

（河北省藁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王增辉李香芝常玉梅桑管东整理）

注：

- 1、轱辘把水坑（残杀 600 余人）6、真武庙
- 2、血井（残杀 45 人）7、杨洛风粉坊（残害妇女儿童处）
- 3、臭碱水坑（残杀 63 人）8、粉坊大院
- 4、三十六口坟（残杀 200 余人）9、染坊大院（奸污残害妇女处）

5、打坯坑（活埋 60 亲人）10、（残杀 100 余人）

冀中区第十一专区藁城县第二区梅花镇被敌杀绝户统计表

家长姓名：（四十二户）（注）

王保云靳洛翔宋洛身杨喜珠

王洛套马洛书王小喜马二黑

王大秃张如意王洛振阎洛聪

李秃子宋洛普王金锁关洛钦

杨洛德杨混麦霍五科白大头

尚来福丁小六郑二喜吴一

丁小六程全喜马洛庆耿毛山

任顺德柴哭粪王明和张贵山

姚洛祥张连新李洛陵奕兴奎

李恒福马孟氏高瑞生蒋王氏

马如心杨士诚

注：一九七 年调查为四十六户。

南京大屠杀实录

钟山卧虎，长江伏龙，具有 2400 多年悠久历史、荟萃六朝文化、人杰地灵的世界名城南京，58 年前却遭受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公元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指挥下，对被俘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长达六周的大屠杀和“三光作战”等暴行，惨遭屠杀者达 30 万人以上。这些数字都是战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后证据确凿作出的结论。日本史学家伊豆公夫、羽仁五郎和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等也纷纷著书，以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就连当时希特勒法西斯德国驻中国的代表，就日军暴行向他的政府报告中也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日本）陆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他们是“兽类的集团”。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严密意义上的战争犯罪”，并对这一事件负有罪责的元凶松井石根、武藤章处以极刑。

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经过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取证、审判，弄清了事实真相，作出了判决，并将《判决书》公诸于世。这本来是证据确凿，铁案如山，无可辩驳的事情。可是，事过几十年后，日本国内却有一些军国主义余孽居然出来为日军的暴行翻案。他们妄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虚构”。他们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等书是这种翻案活动的突出表现。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一种怪物，给中国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为了驳斥日本国内少数军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的谬论，教育中日两国人民记取历史教训，永远世代友好相处，我们不得不用颤抖的手，再一次书写这段沉重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践踏公理攻占南京

采取恐怖手段，纵兵滥杀无辜，以武力迫使中国畏服，达到“速战速决”以吞并全中国的目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就迅速发动对中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并把进攻上海作为进攻南京的第一步。

8 月 9 日，日军在上海虹桥机场滋事，要挟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否则以“4 个钟头占领上海，24 个小时占领南京”相威胁。8 月 13 日 9 时，日军以租界为依据，突然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和持志大学，并以海军炮舰猛轰上海市区。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上海抗战开始。

8 月 15 日，日本以松井石根为大将司令官，组建了上海派遣军。“松井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经想好了在预定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他在离东京前，要求给上海派遣军 5 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所以他对进攻南京作了实际的准备。”

松井在接受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时，还向首相近卫文麿表示：“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他还与近卫讨论了进攻南京的政治目的，如果中国人“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就必须付出代价”。显然，所谓的“代价”，就是血洗南京城。

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12 月 1 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下达了华中方面军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年中文版。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年中文版。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年中文版。

的战斗序列令，以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山室中武的第十一师团、荻洲立兵的第十三师团、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和以柳川平助为司令官的第十军（谷寿夫的第六师团、牛岛贞雄的第十八师团、未松茂治的第一——四师团和第五师团国崎支队），开始了进攻南京的罪恶计划。

经过周密策划，松井石根将八个半师团的兵力分为三路，直扑南京。右路以第十一、十三、十六师团，沿京（宁）沪铁路向西进犯，攻夺乌龙山要塞；中路以第三、九师团，循京（宁）沪公路直逼南京；左路以第六、十八、——四师团和国崎支队，沿广德、宣城，直取芜湖，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

这支侵略军遵照松井石根关于“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的命令，在入侵南京途中，对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江阴等地许多城乡，进行焚烧、抢劫、奸淫和屠杀，江南同胞陷入了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从8月15日始，日军多次出动飞机对南京狂轰滥炸，最多的一天竟达90多架次。近千名南京市民被炸死炸伤，2000多间房屋被日机摧毁。

12月5日至8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先后夺取了守卫南京各部队的第一线阵地，在围攻南京城时，向已丧失战斗力的战俘和无辜百姓举起了屠刀，拉开了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在城东仙鹤门附近，日军第十六师团根据中岛帅团长关于“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的命令，将7000多名中国俘虏兵全部射杀。

在城北尧化镇北家边，日军把乌龙山炮台被俘的中国守军和筑路民夫约6000人，全部射杀。

在城南花神庙、凤台乡一带，日军第六师团和——四师团屠杀难民5000余名、战俘2000余名。

12月10日下午一时，日军开始对南京发动总攻。步、炮、空协同作战，猛烈进攻中国守军腹廓阵地。双方在雨花台、上新河、紫金山、光华门地区展开激战，古城墙遭敌炮轰击，多处出现豁口。

11日，蒋介石电令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12月12日13时，唐生智仓促下令撤退，守城部队争相涌向长江边。南京实际上已成为一座“无抵抗城市”。

13日上午，日军第六、第一——四师团首先从中华门侵入南京城，第九师团从光华门、第十六师团从中山门和和平门相继入城。

午后2时，日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而上，抵达下关。午后4时，日军国崎支队沿长江北岸攻至浦口，切断了中国守军的退路，南京城遂告陷落。

南京沦陷的消息传到日本，被军国主义思想蛊惑而又不了解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的日本国民举灯涌向街头狂欢，把日军的兽行给日本民族带来的耻辱当作光荣的胜利来庆祝。当它们为“日本军人用武力征服了南京”而兴高采烈时，南京的平民和战俘却在被他们视为民族骄傲的日军的屠刀下惨遭屠杀。

凶狠残暴杀人如麻

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攻陷南京城前夕，命令谷寿夫、牛岛、中岛、未

《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11月出版。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

松四个帅团长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日本强盗的“武威”就是屠杀平民，他们要用法西斯暴力来压服中国人民。

12月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六师团首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市，接着，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相继进入南北市区，血洗聚集在中华路、中山东路、中央路、中山北路等地难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根据中国军事法庭查证，这种集体大屠杀共有28案，有的几万人、有的几千人、有的几百人，都有确凿的证据。在所有的证词中，都写明了被害人数、地点、罪行事实。这里仅举几个案例：

12月13日，约有二万多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士兵，逃到三汊河边，被日军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杀害。这场屠杀的幸存者骆中洋说：“从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到天黑，残暴野蛮的日军，就在三汊河沿岸，杀害我军民同胞二万多人。”在中华门附近，日军凡见到中国人，一律格杀毋论。这种屠杀完全是组织有领导的暴行，是蓄意杀害。一名叫宫本淳的日本兵曾参与了这场屠杀。他说：“在中华门外用刺刀杀了不少的奔跑的人，杀到后来，执刀的手都颤抖起来，这时长官的命令不许停刀，但也只好违命了。”

14日，日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7000人。据中国军队第87师准尉仲科详述他目睹这次屠杀的经过说，14日午后，他看到难民千人和数百军警被日军机枪扫射。“回顾东岸，尸体纵横，瞬息间弹雨已旋踵而来……如此者，一而至再。”同日，日军在太平门城门口，500余名俘虏被日军集体枪杀。在石观音17号，日军将居民柯大才、柯徐民、柯荣贵、柯方氏、柯荣春、柯根荣、小巧子、赵雪美等8人集体枪杀。

15日，日军在汉中门外集体屠杀难民和警察2000余人。这些人事先被勒令排成四路纵队，驱赶到汉中门外，一出城就遭到埋伏的数挺重机枪的扫射，扫射后，又用刺刀捅，然后浇上汽油焚尸。屠杀整整进行了4个小时。这一惨案的受害人伍长德作为证人，曾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同日，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军民3万人以上。”其中鱼雷营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受害人殷有余曾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时作证。他说，在南京城沦陷的第三天，被敌俘虏的南京军民9000亲人，被押往上元门外鱼雷营江边地方，突遭埋伏的机枪扫射，除殷有余等9人逃生外，其余全部遇害。幸免者是因屠杀在夜间进行，他们一闻枪声立即躺倒在血泊中才免于死难。

16日傍晚，日军在下关中山码头集体屠杀5000余人。对这一惨案，被害人梁廷芳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时说，他于16日上午，被日军押至华侨招待所大空场，一直到下午5时，捕捉人数达5000人以上，日兵指令四人为一列，被带到下关中山码头人行道上，又用麻绳把难民绑起来，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黄昏开始开火，一直屠杀到夜间10时。梁廷芳认为总是一死，与另一受害者携手跳江，伏于水中，他虽中弹负伤，但侥幸未死。同日，

转引自左禄主编：《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第1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

转引郭士杰：《日寇侵华暴行录》，联合书店，1951年出版。

转引郭士杰：《日寇侵华暴行录》，联合书店，1951年出版。

今水西门。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中文版。

在江东门，日军将囚禁在陆军监狱内的俘虏和难民一万余人，集中到江东镇至大士茶亭约一华里之内，点燃民房以照明，用机枪集体射杀，无一生还。

17日，日军在下关煤炭港集体屠杀从各处搜捕来的中国军民和电厂工人3000余人，死尸推入扬子江中。这场屠杀的幸存者陈德贵作证说，从早晨杀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未被枪杀。日军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扫射。在三汊河放生寺及慈幼院，日军将在这里避难的四五百名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用机枪扫射杀害。亲见这一惨案的证人毕正清在证词中说：“目睹河岸死者四五百名。”

18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集体屠杀5.7万余人。目睹这一惨案的鲁苏在证词中写道：“倭寇进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57000余人，围进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饿死者甚多。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夜，复用铁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骸骨悉数投入江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也证实这一惨案。在下关，还有两起惨案：一起是日军将大方巷难民区内搜捕来的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送下关用机枪扫射，无一生还；一起在下关南通路之北，日军将被俘军人及难民300余人，集合于该处麦地里，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免。

19日，在龙江桥口，日军将被俘的中国军民500余名绑后，以机枪射杀，凡尚有气息者，复以刺刀连续刺毙并纵火烧尸。

12月中旬，日军在燕子矶江边集体屠杀5万余人，在上新河地区屠杀2.8万余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证实：约有10万多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士兵，逃到燕子矶江边，不料，他们正在通过八卦洲往江北避难时，陷城日军蜂拥而至，把难民围在沙滩上，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尸体蔽江，至少5万无辜同胞被杀害。证人陈万禄在证词中说：“在燕子矶滩屠杀我无辜平民和解除武装士兵在5万人以上。”南京沦陷时，居住在上新河地区的湖南省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在1946年1月15日的证词中说：“日本军杀害我国被俘军人及逃难人民，共计287630人，毙命于上新河地区。”他们的这一证词，得到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认定。

日军占领南京后疯狂地对南京人民的屠杀持续6个星期之久，连寺院的僧侣也不能幸免。12月13日，日军在门东小心桥38号消灾庵内，将该寺尼姑真行、灯亢、灯高和在此避难的卓吕同、卓三元、吴朱氏等8人射杀。在武定门444号正觉寺内，将该寺僧人慧兆、德才、廖宏、德清、道禅等17人集体枪杀。

日军除有计划的进行集体屠杀外，还在南京城大街小巷、庭院住宅展开分散的屠杀。曾担任南京守军营长郭歧是目击者之一，他说：“日本兵完全像一群放纵的野兽似地污辱、蹂躏这个城市。”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被日军枪杀的市民、难民数以万计；在建康路、白下路、大光路、石鼓路、中山路、中央路等地的马路和街巷，尸体纵横、重叠，血肉模糊。仅在中山路、鼓楼、新街口等地区以及难民区内，就有数以万计的居民被屠杀。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都亭于1938年12月18日报导说：南京“市区南部和西南部没能逃出来的许多中国市民，都被杀了”，“到处横陈着普通市民的尸体。”1947年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时，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有据的零散屠杀

共 858 案，被屠杀者达 15 万以上，尸体掩埋工作进行数月，作证人 1200 多名。据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计，他们掩埋尸体 43071 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尸体 112226 具。两个慈善机关合计掩埋尸体 155297 具。

如果说，由于当时南京全市居民都处在随时被屠杀的大难之中，即使是后来的幸存者，都不可能将日军在各处的大屠杀的细节一一讲得清楚的话，那末，下面笔者节录的当时参与大屠杀的战犯、日军士兵的手记、日记，却明明白白地记录了他们集体屠杀和零散屠杀中国难民和俘虏的某些过程和具体细节。

第十六师团（京都，中岛今朝吾中将）的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在自己的作战手记中说：

[十二月十三日]拂晓前，我先头部队插入敌人阵地，接着紧追敌人，轻装甲车中队在上午十时左右向下关挺进，聚集于江岸，或扫射在江面上逃跑的残兵败卒，大约打完了一万五千发子弹。……

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地区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以上。

下午二时左右，扫荡大致结束，接着安全无事，于一边整顿部队，一边前进，到达了和平门。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十二月十四日，城内外的扫荡全由两个联队的部下掌握，潜伏在各处的残兵败卒都被拉了出来。……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他们有的潜伏在村庄和山区里，继续进行阻击。因此，进行抵抗的人 and 不愿顺从的人，当即被无情地杀戮。整天可以听到各地传来的枪声。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

下关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烧毁。数百辆汽车被扔在江边马路上，数百具死尸从岸边漂流出去。有一个隶属佐佐木支队的卫生担架兵外贺关次，他生前有一本当时所写的随军日记，在福知山的家里被人们发现，日本《每日新闻》（大阪总社版）在 1981 年 9 月 21 日那天作了详细介绍。外贺日记中写道：

[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攻击，一边逼近手举白旗的敌军，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中国士兵，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南京南门车站（中华门火车站），工兵队的小伙子们刺杀了 70 多个中国士兵，城外敌人尸体很多，其中还有痛苦呻吟的，他们就给他补上一刺刀，送他上西天。

[十二月十五日]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道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

[十二月十七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十三年一月十二日]来到太平门，前几天用担架把患者抬到野战医院

〔日〕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第 12—13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 8 月出版。

〔日〕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第 13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 8 月出版。

去时所见到的五、六百具中国兵的尸体，全都不见了，他们已被苦力埋入土中，附近散发出尸体腐烂特有的臭味。

[一月二十四日]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中国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

杀人竞赛杀人祭马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曾用大标题报道两个少尉，一名叫向井敏明，一名叫野田毅的“杀人竞赛”实况：

（日期）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

（标题）刀劈百人超纪录向井 106 野田 105 两少尉更作延长战

（内容）（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发自紫金山麓）

“如所周知，相约攻到南京为止，作罕见的‘刀劈百人竞赛’的片桐部队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10日，在紫金山攻略战的匆忙混乱之际，作出了106对105的纪录。10日正午，两位少尉终于并非吹牛地各提着砍缺了口的日本刀，碰到了一起。

野田：喂！大爷我砍掉105啦！你小子成绩如何？

向井：老子是106喔！

两少尉哈哈大笑。但还是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候谁先劈到了一百个？只有付诸不问。结果同意不分胜负；同时立即决定：更自11日开始，杀到150人的目标为止。”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东京《日日新闻》在刊登这两个杀人魔鬼的兽行时，还洋洋得意地说：此两“皇军”将继续进行杀人竞赛！并将他们的照片登在报上。更可悲的是，与时这则消息风靡了日本，这两个杀人恶魔竟成了男女青年所崇拜的“英雄”。时至今日，日本国民中仍有一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日本政界的某些人士仍不忘到靖国神社去对这些杀人魔鬼顶礼膜拜！

与此相类似的是，谷寿夫部队有个名叫田中军吉的中队长，手持一把“助广”大军刀，竟连续砍杀中国男女老少平民300多名。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写的《皇兵》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田中军吉的杀人经过，并以此来炫耀“皇军”的军威。

公元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分三路包围南京。其中从芜湖方向来的数百日军骑兵队，一路扫荡，奸淫掳掠，经双闸乡逼近棉花堤。中国军队抵挡了一阵，开始后撤。

日军在棉花堤，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进行了血腥屠杀。一时间，棉花堤尸横遍野。

日军的两匹牟马，拴在当地居民郭光贵家（现雨花钢窗厂内）的屋角，被流弹打死了，日军硬逼着街上的方斗斗、熊顺尧、邓银苟、高来生等老人，把马抬进郭光贵家后院，逼他们挖坑葬马。在此同时，他们又从附近居民家中抢来了几床棉被，抓来了木匠宋士波，迫令宋士波做了两块有门头高，一尺宽的木牌位。用日文写上什么军马之墓。

随后，日军用刺刀逼令宋士波、方斗个等九人，用棉被把马包裹好，放

旁注原文如此。——译者

〔日〕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第18、1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进已经垫了棉被的土坑里，培上土，插上牌位，象安葬什么达官贵人一样，做了两个大马坟。善良的宋士波、高来生等老人满以为没有事可以走了，岂知杀人成性的日本侵略军，竟惨无人道地把九位老人的头砍了下来，一字儿排在马坟前，用以祭马。

日本侵略军竟然杀死九名中国无辜百姓来祭他们的两匹死马，可见他们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就连战争罪犯松井石根也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白：日军“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

这些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腐蚀人的一种可怕的毒素，它可以扭曲人的灵魂，使人堕落，使人发狂，使人失去人性，变得连禽兽都不如。这些法西斯分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当时兴高采烈地在报刊、书籍中宣扬“军威”和“武七道”精神的这些事实，恰恰成了战后审判他们罪行的铁证，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奸淫烧抢无恶不作

伴随着大屠杀而来的，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城乡丧尽天良的奸淫烧抢，其暴行残忍至极，令人发指，全世界为之震惊！

奸日军入城后，在军官“特许”的纵容下，兽性大发，8万多名无辜妇女被强奸、轮奸后杀害，其肆虐残暴程度，是人类自文明史以来绝无仅有。

《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判词》中说：“日军陷城后，更四出强奸，一逞淫威。据外侨所组国际委员会统计，在12月16、17日，中国妇女遭日军蹂躏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所未闻，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轮奸后，又被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萧余氏，16岁少女黄柱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同月13日至17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在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称：日军的“强奸暴行，亦极为普遍，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即使迁入难民区以内者，亦被逾墙而入的日军肆意蹂躏。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人之多，且强奸之后，又施以剖乳、刺腹等种种酷刑，必置死地而后快。”

上海《大公报》1946年7月30日报道，当时日军几乎“每日24小时，无一时无妇女被日军拖出。”军医蒋公毅在《陷京三月记》中说，他曾亲眼目睹日军的罪行。日军“赤身裸体，公然白天宣淫，迭逢中外人目睹，当场斥为禽兽。”一位外侨说：“实际上，三分之一的强奸是在白天干的。”12月10日下午4时，4个日军闯入江苏路23号难民收容所办公室的邻室，将男人驱入一室，当场强奸了3个妇女：次日午后4时半，两个日军又去强奸了一个妇女，一个男子想加以阻止，竟遭日军枪击。

日军把老百姓的住宅、集体宿舍、图书馆、办公室、门房、寺庙，甚至在街头巷尾，都变成了他们发泄兽欲的地方。在档案中有记载的闯入民宅强奸的事例，不下千百件。在国际安全区内，日军差不多每天将大批妇女抓去强奸，到晚上越墙而入，摸索强奸。又据《大公报》（武汉版）1938年2月

《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物志》，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

见松井石根：[日]《阵中日记》。

《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 日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妇孺约 9000 人，数日内，“被其奸淫之妇女约占半数。”非安全区的难民妇女，只要被日军碰到，必遭奸淫。不仅如此，日军还在宗教场所奸淫妇女。12 月 17 日，日军闯入南京神学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群中公开强奸妇女。又有一次，17 个日军在这里连续强奸一个女人。有的妇女，即使避入地洞里，也不能躲过日军的蹂躏。妇女杨周氏，躲入黄泥塘地洞内，被一群日军发现后轮奸，并遭枪杀。生威尔逊在 12 月 21 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士兵们（日本兵）再次闯进了汉口路 5 号家中，在里面耽了三个小时，尽管日本人的军事当局曾宣布他们被告知不得进入室内。当室内的人声明他们中没有妇女（有几个在地下室里），他们出来看到一个女孩就将她抓上楼消磨了三个小时。”

被日军奸淫的妇女中，有教授夫人、牧师的妻子、女教师、女职员、女护士、女工人、女学生和农妇等。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妪，下自未成年的幼女，均成了日军发泄兽欲的对象。12 月 26 日，在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 11 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据目睹者讲，她那两腿间血污和肿裂的情况，叫人不敢正视。1938 年 2 月 5 日，三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家中，一个把守大门，两个轮流奸污了一位已经 60 多岁的老妇。有一个年仅 9 岁的女孩与其 75 岁的老祖母，在家中同遭日本兵的奸淫。

可怜的妇女有的一夜中，竟被汗污了 30 多次。许多妇女遭强奸后，被卑鄙无耻的兽军逼迫裸露身体供调戏拍照。日军还用极其野蛮手段折磨妇女，让他们惨痛怪叫，日军则在一旁拍手大笑。有的孕妇被日军强奸后，残暴的日军竟割去她们的乳房，挑出腹中的胎儿在街上玩耍。李克痕在《陷京五月记》一书中揭露说：“街头上有许多被轮奸致死的女同胞的尸身，通身剥得精光，赤条条的，乳房被割了，肠子涌出来，堆在身旁边上，阴户里有的塞一卷纸，有的塞一块木头，令人惨不忍睹。”在南京还“发生了四、五起日本兵逼迫儿子奸淫母亲的事，如果不从，即将儿子杀死。这简直是千古未闻的野兽行为。”谁无母亲？谁无姐妹？可是在残暴的日军面前，没有人类的伦理道德，没有人的尊严，他们已无异于禽兽！

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调查确认：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 2 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郭歧在《空前的大奸淫》一文中愤怒责问：“日本兽兵所到之处，恃强逞暴，遍地淫掠，竟将我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破坏罄尽。时至如今，我仍然弄不清楚，日本国内到底是人的世界，还是兽的境域？”

烧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指出：“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的损失不可以数字统计。”美丽而繁荣的南京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焚烧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被毁了。”

1938 年 2 月 15 日下午，蒋公毅曾搭乘美侨李格斯的汽车到难民区外，车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到中山路，只见“沿途房屋，万不存一，屋已烧成灰烬，而它的两壁却依然高耸着，这可见敌人纵火的情形，确实是

郭歧著：《血祭》第 134 页，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出版。

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判词。

档案资料：《南京抗战损失调查》，南京市档案馆藏。

挨户夹的。”日本法学家泼川政次郎博士写道：“当时我住北京，因为盛传南京大屠杀，故于昭和 13 年（1938 年）夏季经津浦线入南京旅行。南京市面上的民房大多烧毁了，起初我以为是是由于日军的轰炸而烧掉的，对轰炸的威力感到吃惊，但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些民房全都是在南京沦陷后，由于日本兵的纵火而烧掉的。”

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纵火，使南京的工业、商业、市政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都遭到严重破坏，暴行的影响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工业方面。日军占领南京后，即炸毁有百万元资本的大同面粉厂，还纵火烧毁了通济门一带的机米厂，连烧毁的机器设备也全部送往日本，原先人烟稠密的通济门地区，竟成为一片死寂的无人区。

商业方面。南京的主要商业街区都受到严重破坏。太平路被烧去了 90%，中华路北段自内桥至三山街口尽为废墟。南街自三山街至中华门则隔两三家即有瓦砾场一段，全路房屋被烧掉 70%，长乐路由武定桥至中华路一段全毁，中正路上的中央商场和大华影戏院全被日军纵火。日军还纵火烧毁了整个夫子庙地带，大成殿荡然无存，周围的金粉楼台部化作焦土，六朝居、奇芳阁、得月楼等著名老店付之一炬，屋宇被毁的十之六七。城南这样，城北也是如此。日本记者长野即当时到达下关，他写道：“下午 7 点天将黑时，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几个月以前还以首都大门自诩的下关车站，现在也烧光了，片瓦无存。”江岸上的中山码头、首都码头、三北码头、招商码头等烧得一个不剩，所剩下的乃是劫后焚余的残砖碎瓦。

市政方面。南京的供电、供水、交通、道路、桥梁均遭到日军的破坏，蒋公毅在《陷京三月记》中写道：“南京失陷后，一切市政及建筑等等，都被破坏摧毁殆尽。”仅以桥梁为例，被炸或焚毁的重要桥梁有文德桥、利涉桥、淮清桥、大中桥、九龙桥、江东桥、石城桥、南门桥、锁金桥、蒋王庙桥、毛公渡桥等 10 多座。当时的南京，交通中断，电厂、水厂被烧，白日阴风惨惨，路上极少有行人。到了晚上，大半个城市漆黑一片，宛如一座“死城”。

文教卫生方面。日军无视国际法规，对南京的文化、教育、卫生机构恣意破坏。如中央大学的建筑设施先遭日机轰炸，又遇日军抢劫焚烧，校园内到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日军将牛首山的幽栖寺和观音洞寺庙纵火毁掉。成为一片瓦砾，还纵火烧掉了中华门两街年代久远的清真寺和普德寺。日军还轰炸和焚烧了中央护士学校，广东医院总院、南京市政府卫生局等。

此外，日军在农村大肆焚烧农民房屋。南京烟草公司的退休职工马明福回忆说：“日本兵闯进了沙洲圩村子，争先恐后地用棉花蘸上汽油往房子上点火，片刻功夫，全村家家户户都已烧着，日本兵却端着刺刀站在房前狂笑，当火焰吞噬了整个村子的时候，日本兵这才退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克鲁治曾在 1938 年 1 月 9 日设法到东郊农村观察，结果：“所经过约二十英里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杳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侵华日军对南京的纵火焚烧，据不完全统计，破坏高大华丽房屋 784 幢又 3.1 万多间，器具 2400 多套又 30.9 万多件，衣服 5900 多箱又 590 多万件，

蒋公毅：《陷京三月记》。

[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 12 月版。

长野郎：《北支中支游记》，原载《外国的新闻杂志》第 397 页。

金银首饰 1.42 万多两又 6300 多件，书籍 1800 多箱又 14.86 多万册，古字画 2.84 万多件，古玩 7300 多件，牲畜 6200 多头，粮食 400 多石。

陷城后的南京，是日军横行的天下。凶恶残暴地屠杀与焚烧并行，杀人放火与贪婪的抢劫同时进行，是日军血洗南京的又一特点。举凡钱财、粮食、机器、牲畜、图书、古玩，莫不劫取。

日军占领南京后，或公然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或拦路搜身，凡稍值钱的东西都要掠去，就连穿在中国人身上的皮袄，放在床上的被褥也全部抢去。市民陶秀夫在《日寇祸京始末记》一文中揭露：“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当时留在南京的李克痕也在《陷京五月记》中揭露：“敌人又想出抢劫的妙法，在路上以检查行人为名，搜索行人衣袋，于是我同胞所有的钞票及其他贵重物品，尽被掳去，即或有稍美好之衣服，亦被强行剥去。”

机关、学校、工厂、仓库、店铺这些地方财物比较集中、日军一次行动便掠得大批物资。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撰述：“南京的店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用仓库未蒙日军光顾，大多数店铺先由日本兵争先恐后地打开大门，略事偷窃，于是在长官的监视指导之下，有计划地用卡车搬运一切，再付之一炬。”日军抢劫机关、学校、工厂、仓库，莫不采取此法。

攻占南京的日军接到上海派遣军关于“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的命令后，9 个特务乘上三辆汽车搜索了 70 多处，把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的藏书抢走，据统计，日军共出动 697 人，另动用苦力 830 人，卡车 310 辆次，共掠夺南京名贵藏书 85 万册。仅在大石坝街 50 号石彼轩家，就被抢去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 2000 余件，木器 400 件，衣服 30 余箱。

日军有计划地掠夺各种生产资料不可胜计。潘伯奎老板经营的仁德印刷所里的转盘印刷机、铅字机和纸张，被日军抢走了 17 卡车。水利铪厂是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化肥工业中心，它造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享誉国际。1938 年 1 月，该厂被日本三井物产会社侵吞。以后，又将全套硝酸生产设备，包括八座吸收塔、一座氧化塔、一座浓缩塔在内共 1482 件，550 吨设备运往日本，安装在九州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用于军事生产。日军还大肆抢劫铜铁战略物资，用于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他们将南京“僧寺之大钟铁鼎”，以及文德桥铁栏、商店的铁门、自来水厂铁锅炉等，用车运至日本。

据当时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社会学家路易斯·史密斯在《南京战祸写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抢劫大体上涉及到城里 73% 的房屋，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 96%。房屋总数的 89% 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了。”又说：“南京市民每一家平均损失 838 元，总损失达二亿四千六百万。”

南京 30 万以上无辜人的性命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无数温馨的家庭毁于一旦。南京大屠杀事件成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无数起骇人听闻惨案中最集中、最突出的一案，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血证，它与希特勒纳粹屠杀犹太人同是魔鬼毁灭人类的悲剧。

档案资料：《南京抗战损失调查》，南京市档案馆藏。

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判词。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时间虽然过去了58年，但是，中国人民对这场灾难至今记忆犹新，国恨家仇将永远留在南京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心中。同58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尽管日本国内尚有极少数顽固分子仍然对“军国主义”念念不忘，但他们最终必然被人类进步的历史所唾弃。

历史是最生动的教材。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浩劫，也教育了世界人民。世界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和平与进步。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落后就要挨打。国家不强、百姓遭殃。

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历史的教训不可淡忘，历史的悲剧决不能重演，也绝不让重演！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中共江苏省党史工委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组稿）

冀东潘家峪惨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冀东先后沦陷，丰润县潘家峪因之也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和践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始终坚持抗日爱国斗争，比较早的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是冀东坚强的抗日堡垒。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的记事本记载：“从1938年夏到1940年底的两三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130多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人进行大小战斗50多次。”日军为扑灭抗日斗争烈火，在丰润各地建立了许多据点，普遍设立伪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定“门牌”，实行“五家连坐”，但都遭到了潘家峪人民的公开抵制。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极端仇恨，不断疯狂地对潘家峪进行“扫荡”、“清乡”。日军（驻唐山第二十七师团第一联队）在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制造一起有阴谋、有计划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一次杀戮平民百姓1230人，有33户被杀绝，烧毁房屋1100间。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拂晓，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遵化等据点的3000多名日伪军，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面把潘家峪包围的严严实实。此时，潘家峪的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光景，日本鬼子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没有逃出去的1400多人逼进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连在村里搜了二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潘凤柱的母亲70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鬼子一战刀砍成两段；潘忠元的祖父80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起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90多岁，拄着拐杖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膛上一连刺了九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长约百尺，宽约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堤，坑里是厚厚的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也被赶来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起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人们紧紧的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女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不让他在鬼子面前哭出声来。

这时候一个约40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他对人们讲了一通“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鬼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问，人们一言不发。腰挎战刀，满脸络腮胡子的佐佐木兽性大发，“铮”的一声拔出战刀，象一只恶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围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

站在坑边的伪丰润县长度以忠见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晃脑地讨好佐佐木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但无论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鄙视的目光。

敌人从西大坑破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日军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鬼子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

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午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与此同时，日本杀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杀人场。据当时担任现场翻译的董逢林在战后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指他随丰润县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指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集中，顾问看到这里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个大院可容得下，就迁到那里，把村民们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伪军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鬼子兵便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有100多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鬼子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个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鬼子兵。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严森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哧”一刀，孩子被砍倒了。她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鬼子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1000多人一起怒吼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里抵挡得住这些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杀死，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鬼子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后，日军机枪队队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边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的通八路，今天统统死啦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

“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的祸，因为你们一贯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出院，“嘎”地一声，院子大门关上了。

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守在那里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地冲进来，照准人们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望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鬼子们放过妇女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直喷出来，大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泊的柴草，霎时烈焰四起，机枪、步枪子弹象冰雹般地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到：“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着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爬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向日军砸过去。一群日军扑了上

丰润县档案馆《一号全宗，61—65》，县志编写委员会潘家峪惨案回忆录第18号卷。

丰润县档案馆《一号全宗，61—65》，县志编写委员会潘家峪惨案回忆录第18号卷。

丰润县档案馆《一号全宗，61—65》，县志编写委员会潘家峪惨案回忆录第18号卷。

来，潘国生壮烈牺牲。

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拼，只有拼！

潘树密的母亲 50 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萝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伶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了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捅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一时拔不出来，这十多个人才逃脱了。日军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 30 多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屋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后，屋内的人被邻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然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 50 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丧生。

西院柴草房与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 200 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窄人稠，死后多数还都站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后，又从尸堆中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 岁的潘春元。63 岁的潘刘氏，33 岁的潘张氏等 6 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有死，便往尸堆里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燃烧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有死，在尸堆里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有发现，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烧身，从尸体下爬出来，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 32 人，大部分是孩子的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 32 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碳化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 10 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村一片大火，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气味污漫着整个山沟。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 1230 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含受伤者），仅 276 人。

日军制造潘家峪惨案，却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县长凌以忠供认：“日

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命令，不准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任何人也不能掩盖的。

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等来到潘家峪，慰问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拍下许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1942年4月2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后来在历史档案中发现一篇未发表过的《惨案现场视察记》的遗稿，记录了记者目睹这场大惨案的真实惨景。现摘录如下：

翻过一条山梁，我们遥望到群山环抱的山村。

走进村头，招人注意的白粉墙上刷着三个大字“潘家峪”。道旁大路上钉着两块长方形的松木牌写着“排共彻底”、“亲日和平”。在我们眼前尽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再往庄里看：看不见烟囱，更看不见袅袅炊烟，只有几堵白墙耀眼，已经看不见昔日的黑瓦与草屋了。

极目展望山坡野地，看不见昔日的羊群与拾柴草的孩子；也没有一个下地的人，走下庄头的高坡，过了庄头的石桥到岩石下，有一个不过二尺宽三尺深的岩洞，塞满着苍绿的松枝，洞外散乱一地玉米秫秸、尚有未烧尽的夹杂在其中。

拿开松枝，使我看到四具焦黑的女尸。

石桥边就是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门，眼前尽是尸首，恶腥的气味迎面扑来。……

敌人是把这大院当做杀人场，我来视察时，有许多惨状是看不见了，这天我看到的不过是十分之四五而已。据来认尸的李某告诉我：“烧杀的第二天我来认我姐夫的尸首，这大院是死尸盖着死尸，满大院都是，火苗还旺，我们这些来认尸的就挑水泼了半天，水泼下去人肉发出吱吱的声响，发出焦臭……把火苗灭后，稍微可以辨认的尸体已抬出去埋了。

虽然我看到的是十分之四五，然而已经到处是尸首，可见当时死难之多与死难之惨了。

最使我愤慨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的惨死。这些弱者的尸首，也触目皆是，单就大院里来说，孩子们小小的尸体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就很难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弯曲乌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时可见。

半焦黑的孩子身上还能发现三八式刺刀的戳伤，还有血污，受伤的孩子先是遭受杀伤的痛苦，痛苦中又遭烈火煎熬。这样的痛苦，我们就不忍想象了，我们的孩子，中华民族的儿童，在不忍想象的痛苦中，被鬼子惨毒的毁灭了。

我们站在倒塌空洞的宅子里，似乎听有人在哀号、惨叫！举目四望，落日里，只看见恶腥的黑烟……

时隔50年，看着这篇血淋淋的报导，仍然使我们的的心灵强烈的震颤，永远不能忘记这血泪仇。

（三）

日军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对此我们曾查阅有关资料。从伪丰润县长凌以忠（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日军驻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等人档案材料中，证实日军驻唐山指挥部发布“扫荡”潘家峪的命令后伪县长凌以忠于

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招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警备队副大队长李继贵、警察所所长王国治、警察系长赫孝鹏、特务系长李连生、合作社翻译董蓬林，还有县署日本指挥官田中、新民会的日本人秃山、日本宪兵队长和县署秘书陆心谭。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传达日本军部命令：“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逃跑，倘有逃跑的，许可立即开始射杀……”随后，伪县长凌以忠发言：“我们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凡是今天到会的人，是县署系统的，除陆心谭秘书留在县城里办公以外，大家都应当随军同往。当时在会的都表示赞同，到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部发令，立即开拔出发。丰润县伪军由警备大队长李继贵带领200来人分乘三辆大卡车，挤不下的一部分挤到唐山来此集合的敌人车上。到后半夜，等丰润日伪军到达潘家峪村庄时，迁安、滦县、遵化等据点的队伍已经把村庄团团围住。天亮后大多数居民已被集中，将近中午，佐佐木对人们说：“今日的事你们自己也是很清楚的，你们是一贯与日本人为仇敌的，所以今天讨伐必须要把你们全部杀光，绝不饶恕。”这时，伪县长凌以忠走到潘家大院南口，看见院子四面墙头上，以及房屋顶上，都架有机枪，并顶备了许多煤油，地上都铺着杂草和柴草……一会随着一声枪响，大屠杀开始了。据惨案参加者李继贵交代说：“枪杀、烧杀共1000余人……”。惨案后，伪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伪省政府，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惨案发生后，我抗日根据地地方党政负责人丁振军等人来到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的指战员也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认性别、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上写“男”字，女尸上写“女”字，童尸上写“童”字。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集中起来，然后，用炕席裹了128个席包，把尸体放在松柏常青的高山脚下。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等七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农历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等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在丰润、迁安、滦县一带不断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200多人。杀人魔王佐佐木于1942年7月16日终于在甘河槽战斗中彼击毙，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丰润县人民从1952年开始，先后建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座。后来又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

苍海可以改变良田，用血谱写的历史却永远不能忘记！

(冯伯英)

在上海青东的暴行

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军占领，成为日本侵略者全面进犯我国的战略基地。

离上海三、四十公里的青东游击根据地，是中共青浦工委领导的拥有数百人武装的顾复生三支队的沪郊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7月以来，他们密切配合东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打击吴淞江日军、汉奸、伪军。袭击上海虹桥机场，屡建战功。震惊了淞沪地区敌人，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人民军队军威四扬，对日军构成了直接威胁，为此他们加速“大扫荡”的步伐，妄图彻底摧毁青东游击根据地。

1939年12月初，日驻沪兵团团长松井少将。师团长土桥中将先后抵达青浦。召集日军驻青浦守备队长岛田大佐。日驻青浦特务机关长掘川班长，伪青浦县知事姚明仁、伪青浦保安司令部副官长周子文密谋策划。1940年3月驻沪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译田茂中将制定“扫荡”方针：“确保治安作战，给敌军痛击。”使其丧失战斗力为第一位。夺取物资为第二位。并与日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前田中将、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长长谷正宪少将、驻松江日警备队长市川寿三郎等共同商定了围剿抗日力量的计划。

他们专门建立沪西指挥部，在沪西的重要交通枢纽上设据点，除日军外，还派伪保安团第三大队100余伪军开赴重固镇。派青浦县伪卫队司令部特务营进驻余山；确定七宝、诸翟、纪王庙以西，黄渡、白鹤以南，香花桥、重固以东，余山，泗泾以北力包围圈。重点进剿三支队和青浦工委经常活动的观音堂、陆家角、刘夏等地。对重点乡村重固、余山等地实施编查保甲，发放“良民证”，在街头巷尾大量张贴悬赏通缉三支队队长顾复生的“97号布告”，气焰十分嚣张。这一次日寇改变过去“早出晚归”的扫荡办法。采取了统一时间，长期驻剿。四面包围，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拉网梳篦式战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屠杀开始了。

4月14日凌晨，日本侵略军上海警备司令官长谷正宪少将指挥并调集上海郊区第一部队、松江第三部队、战车部队、日驻青浦守备队、汪伪袁英杰许连生部、青浦县保卫司令部等4000余人，从叫面进攻青东游击根据地，长谷川、市川率领日寇主力从青沪公路向北；今井带领青浦守备队。第三保安大队由青浦县城出发。经重固向东；黄渡的日寇和许连生部经纪王庙向南；驻沪的日军经华漕、诸翟向西。他们荷枪实弹、迅速占领观音堂、陆家角等地。日军官兵手持军刀三五成群，挨家挨户搜查，把所有老百姓统统驱赶出门。在团团围住的群众前面。歇斯底里地对大家吼叫：“顾复生到哪里去了？”“谁是新四军三支队的统统站出来。”“你们知道的要报告，不报告的，统统死了死了的。”“三支队的枪支埋在那里？”当场将说不知道的或者说不出来的无辜群众严刑拷打或枪杀。15日上午，日寇长谷川、今井带着一百多名日伪士兵在观音堂继续搜查，然后把群众驱赶到顾泉林家门前，当众责问顾复生和三支队的去向。忍辱含愤的人们当作没有听见，个个昂首而立，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声不吭。当大家拒不交代时，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今井野蛮地用烧红的铁条去烙老百姓的皮肉，群众疼痛难忍发出的嘶叫声和痛斥声撕人心肺。下午日寇威逼朱阿虎、徐道明等17人，去朝阳门挖齐腰深的大坑。作业完毕后，杀人不眨眼的鬼子兵把这些农民连推带拉弄到坑边，一个个当

活靶子用刺刀刺死，惨叫声阵阵，最后推入坑内活埋。其中农民邱百亮因未刺中身体要害，混在尸体中而幸存。凌晨，市川等到陆家角、马家浜等村逐户搜索抓人，适逢韩银如家做道场，日军见人就打，把道士周逸君和他儿子一起绑起来，连同从和睦桥村抓来的张毓文、姚枚生等人关押在屋里。傍晚，两个日本兵将他们十几人轮番用刺刀戳死在坑内。张毓文、陆宜康等6人因未刺到要害，乘夜色掩护死里逃生。

与此同时，日军队长小铃等人在和睦镇扫荡时，杀害17人，当他们见道士姚锦华肩上背着东西走来，喝令站住，经检查，原来是做道场用的法具。日寇硬说是枪支，就将道士和他的母亲施行暴行，用开水泡死。在章家角的日伪军将章伯英、章金荣、章小弟等20多人抓捕后，百般拷打，再捆扎起来拖到场地上，放在稻床上面，下面堆满了稻草，浇上火油，在熊熊烈火中焚身。只有陆富泉1人幸存，日伪军以为他已被打死，未放在稻床上烧。醒后死里逃生。

16日在嵩子庙，日寇用机枪扫射群众，施子良父子三人当场被击毙。顾复生的警卫员徐小毛被他们吊死在观音堂镇。第二天下午在沙家村，翟小和尚、张阿炳等5人被枪杀在田野里。有一户农民马进良正在造房子，泥水工在屋面上盖瓦，被日军指控是替新四军望风放哨，分不清红皂白捉去毒打，做工的8个人全部戳死。香花桥虹桥头村的钱浩生、钱宝仁等4人摇着船去亲戚家，经过火烧桥村时，飞来横祸，被一群日本鬼子当作活靶子全部射死。18日，秦家宅的农民秦阿二的母亲在家被日军鬼子子弹击中，父亲又被他们绑上大石沉河淹死。他自己正好回家，前来看望父母，不幸又遭枪杀。蟠龙镇有15个农民被日本兵抓到后重刑逼供三支队的枪支存放处，受尽严刑拷打，拖到荒地用刺刀乱戳致死。马小弟中17刀，朱小桂中13刀，惨不忍睹。

这天早上，家住幡尤镇的林顺余正准备和爷爷到地里干活，爷孙俩刚走到庭心，突然，对街冒出一个身穿“黄狗皮”，头戴军帽的日本鬼子，林顺余避之不及。日本兵围着林转了一圈，突然，抓起他的手，一边看他的手掌，一边嘿嘿冷笑着用中国话说：“你的，是抗日分子吧，这手上肩上的茧一定是枪压出来的，是不是？”不容林顺余分辨，那个日本兵拖起他就走……

走了约10分钟，又出现一队趾高气扬的日本兵，林顺余看到隔邻三家村的高全生也被日本人绑押着。当走过一染坊时，染坊小老板被那群日本兵发现，也被五花大绑捆了出来。

中午11点许，一行人来到金联沙家村的一间厢房里，房内到处是刑具，整间房子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林顺余等3人不敢说话，被日本兵关进了隔壁一间屋，没过多久，又有12个村民被日本兵绑进屋子。不一会儿，屋门被打开，林顺余3人被带到上刑的那间屋，刑具已准备好，几个日本兵正虎视眈眈地瞪着他们。日本兵先是把高全生痛打一顿，要他说出游击队在哪里，谁是游击队员，把他打昏后，拖在一边，以示“杀鸡做猴”；随后，把林顺余拖出来问道：“某某部队在哪里？某某人知道吗？你手上的茧是哪来的？肩脊上的茧又是哪里来的？”林分辨道：“这是干农活干出来的。”日本兵那里肯信，也把林顺余打昏后丢在一边，那个小老板同样遭毒打。就这样，日本兵轮番地将他们3人又是打又是用火烧，逼他们说出游击队员的下落，见实在问不出什么，最后快天黑了，就把3人拉到外面的油菜田里，

指着被他们杀死在地里的横七竖八、惨不忍睹的尸体，恶狠狠地说：“你们再不说，就是这个下场！”说罢，一个日本兵一脚把高全生踢倒在地，用锃亮锋利的刺刀一连向高全生刺了7刀，可怜高全生活活一个人就这样被鬼子残酷地刺死了。正当林顺余看得怵目惊心时，那个日本翻译已从身上解了宽厚的皮带，狠命地向林的脸上抽去，毒打一顿后，又一个鬼子解开林顺余的衣服，全身上下搜摸（他们每人身上都搜，想搜摸钱物），搜不到什么，又重新把他绑上，然后用枪托把他砸倒在地，随即用那冒着寒光的刺刀狠狠地向林的身上刺去，一刀、二刀……一连刺了十多刀。林顺余已奄奄一息。

夜深了，油菜地里一具尸体稍稍动了一下，口里含糊不清地吟着全生、小老板……那是林顺余，他还没有死，他可能比别人多穿了一件棉袄，和脖子上被裹着一条桌裙的缘故吧！他竟还活着！他全身的力气慢慢地挣脱了手上的绳子，挣扎着向田埂边爬去。天亮时被三个老人救起。九死一生的林顺余经过医生两个星期的治疗，终于脱离危险，奇迹附地康复了。

事后，林顺余才知自己在4月18日那天晚上被鬼子刺了12刀，而高全生、小老板以及后来关进屋内的12个人无一生还。

19日，在嵩子庙80余名群众全部遇害。有的农民硬给几个鬼子抬起来摔下去活活折磨而死。有的人被鬼子乱刺致死，在一个近3亩田的竹园内，陈尸纵横。村里一些四出逃难的群众，一周后才悄悄前来辨认亲人尸体，这时许多尸体已腐烂发臭，身首异处，群众悲痛欲绝。驻扎在秦家湾的日伪军，抓到连庵村朱其昌、朱阿六后拷打勒索。当他们可怜的母亲送钱赎命时，嗜杀成性的日伪军竟剥光他们衣服，寻欢作乐，最后割掉两个青年的睾丸，杀害了他们的母亲。道士王湘涛被鬼子抓住后，硬说他是游击队，用吊打火烧等刑法折磨而死。接着，日军对他怀胎六甲的妻子肚子连戳几刀，胎儿和母亲惨死在血泊中，丧尽天良的日军还不罢休，戳死了王湘涛的两个女儿，又将刺刀插入王湘涛7岁儿子的口中。挑起来再把头颅分成两半，好端端的一家全部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

22日开始，日寇部队除留市川带队驻扎南岭塘，伪军许连生部留守观音堂。其余部队都从青沪公路北面转向南路。日军调整兵力，确定青沪公路以南，泗泾镇以北，青沪公路以东，七宝以西为屠杀重点。在刘夏、老宅、平日桥、杨家巷、狗颈骨、南岭等地设立10余个临时据点。一队队鬼子兵，象鬼人幽灵似地窜入附近乡村烧杀。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生。23日，市川将南岭塘、南和尚泾、方家窑、孔巷等地抓捕的查品连、王树生等98人全部杀害。同一天，刘夏镇上30多个日军穿便衣，潜入村里乱抓百姓10多人，逼迫他们下河摸枪支，晚上又把他们捆紧手脚关在室内。然后纵火烧房。大火吐着浓烟，劈劈啪啪地烧着房屋，不屈的人们奋起拼搏，推倒墙壁，用嘴咬着把菜刀，相互割断捆绑的绳子，冲出烈火，得以逃生。前明村的汤伯松在逃回家的途中，不幸被日军拦截刺死在军刀下。

24日，作恶多端的市川搜查武器弹药，恰好被同时关在梁家的陆进余发现子弹。千钧一发时，陆进余机灵地伸出脚将子弹踢进墙壁洞内，使日军没有搜出一枪一弹。恼羞成怒的日军把梁阿金的妻子戳死在水桥头，杀死了陆木生的母亲，最后再把陆木生、梁阿金、陆富根、陆进余等20余人押至小船，摇到塘桥，在外扑桥百家村杀害。仅这一大，从打铁桥、刘夏、沿姑步泾、新浜、吴泾三条河西岸20余个村庄全部被日军焚烧殆尽。据徐泾乡金三、前明、联明等村调查，有279户的1908间房屋被毁，粮食、耕畜、生产、生活

资料付之一炬，138 人被杀害。金荣村袁国祥的父母没有逃脱虎口，尤其是他母亲被杀害后，日军竟令军犬撕咬尸体，目不忍睹。日寇暂时撤离观音堂后，留守在那里的许连生部串村走户，在村民中大肆散布“大扫荡已经结束”“大家可以回家种田经商”的谎言，在观音堂、蟠龙等地的墙上到处张贴“平安无事”告示，制造假象，欺骗老百姓，不少群众信以为真，纷纷返回家园。诡计多端的日军，27 日再杀回观音堂。市川等率领部队在陆家角，南墅泾，范家浜等地杀害 40 多人，张家浜村 18 户有 17 户有人遇难，周浦氏全家 4 人被杀，一天之内有 200 多人遭不幸。长谷川率领日军持着刺刀，严密封锁道路，行人只进不出。他们对开棺材店的陈松林家也不放松，撬开空棺材检查枪支，一无所获时，用刺刀刺入陈松林的脑门惨死在地。在文公浜，日寇将刷布路村姚锦清、袁小二等 23 人押到庙场西南角的大土坑内，采用刺刀逐个戳死，推入坑内，尸体上浇上火油焚烧，杨家庄的董仁余、邱昌时等 28 人被抓后，日寇强迫一部分人挖坑，其余人跪在坑边。坑挖成后，日军用刺刀刺死一个，就推一个人入坑。邱昌时身受 13 刀。未伤到要害，佯装已死，扑在坑内，拖尸盖身，因而幸存。

日军在观音堂纵火，一个村接一个村，一幢房挨一幢房，听到之处狼烟四起，火舌冲天，房屋夷为平地。后筑碉堡，建据点，设瞭望台，胡作非为。为虎作伥的许连生部控制黄渡、纪王庙、诸翟等地，布设特务网，监视和侦查坚持斗争的抗日人员，欺压百姓。

总之，从 4 月 14 日至 27 日，日军在青东游击根据地这场大屠杀中，作恶多端，骇人听闻，1940 年 4 月 22 日《申报》报道：“沪西五千余村，悉惨遭蹂躏，周围达百余里，受灾五万户”。这次大灾难中手无寸铁的群众有一千余人被杀害。仅从青浦县凤溪、徐泾、赵巷、重固等乡镇 224 个村的不完全统计，杀害群众达 915 人，387 户房屋烧毁 2287 间。观音堂（今凤溪镇）附近村庄受灾最重，十余里内荒无人烟，一片废墟。

青东大屠杀使五万户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时隔五十多年，这里的老人仍记忆犹新，切齿痛恨日军暴行，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这场历史大灾难！

（中共上海市青浦县委党史研究室）

豫北两大惨案

从1937年11月河南安阳沦陷到1945年3月南阳失守，八年间侵华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生灵涂炭，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难以估量。据《河南统计月报》记载，全省人口战后比战前减少672.44万人。本文仅从日军侵占豫北后制造的两个惨案，来看他们的残暴本性。

长垣浩劫

1938年2月，日军第十四师团沿平汉铁路向豫北地区进犯，3月底，豫北地区几乎全部沦陷。日军在占领区制造了许多大血案，1938年3月25日的长垣惨案就是其中的一个。

2月24日，日军第十四师团馆支队侵占长垣县，扶持汉奸成立了伪维持会，并将一批军事物资留在长垣县城，由伪维持会保管，而后再调头西犯。不久，国民党第六十八军一部收复县城，留下一个连配合地方武装防守县城，主力东撤。3月24日上午，日军30余人分乘4辆汽车由封丘直奔长垣，打算运走所存物资。在长垣城南门遭守军伏击，两辆汽车被击毁，10余名日军被击毙。另两辆汽车，仓皇调头逃走。当晚，日军第十四师团所部1000余人分乘数十辆汽车，拖着十几门大炮，围攻长垣县城，进行报复。他们用大炮轰击县城，城内一片火海，许多居民在日军炮火下丧生。守军抵抗至25日拂晓奉命撤退，日军蜂拥入城，找不到守军，便对着没有逃出城的居民发泄兽性，日军沿街搜索，破门入室，毁箱捣柜，不分老幼，见人就杀，小南拐街杨连喜家11口人全部被日军枪杀于家中，胡大门街韩德润家9口人也全死在日军屠刀下，从城南门往北，尸体枕籍，遍地血红。日军见了妇女就强奸、轮奸，奸后又把妇女杀害。

25日下午，日军把从各条胡同街道抓来的群众集中到城内黄学的经祠大殿里，门口架着三挺机枪。一个日军军官对着群众叽哩哇啦讲了一通，然后翻译官向大家说：“皇军爱中国人，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的。”日军官突然一阵狂笑，架在门口的机枪便向手无寸铁的和平群众疯狂扫射，群众一个个中弹倒地。许多还在母亲怀中吃奶的孩子，甚至来不及惊叫哭喊，就同母亲一起倒在了血泊中。

枪声过后，日军对着倒下的人群喊道：“有活的没有？活的站起来，就没有事了，可以回家。”有一位中弹负伤被尸体压在下边的老人，扒开死人，颤颤巍巍地刚立起来，日军官又狞笑起来，鬼子兵马上走过去，将刺刀捅进老人的胸膛，鲜血顺着刺刀往下淌。老人怒视鬼子兵，骂道：“畜牲！……”鬼子兵将刺刀一挑，老人仰倒在尸堆上，日军唯恐还有活人，用刺刀在尸体堆乱挑乱捅，一些中弹未死的群众，又被日军刺刀捅死。在黄学的集体屠杀中，除了城北街城隍庙道士侯嘉修、城西街居民周高升、城南甄庄农民甄五妮压在死人身下，幸免遇难外，其余数百名群众全部被害。

日军一直烧杀抢掠奸淫到26日清晨，才带着掠夺的财富，离开长垣城，据事后调查统计，在这次浩劫中，日军共杀害无辜群众17000余人。

浚县大屠杀

长垣血腥未散，1938年3月29日，日军又在邻近的浚县进行了另一场大屠杀。

3月15日，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数百人进犯浚县北部裴庄，遭到当地民众自卫武装迎头痛击，100多名日军被打死打伤。日军攻进村子后，杀害村民70余人，纵火焚毁了村寨，之后，日军又占领了县郊的屯子和码头。城郊

100多名爱国青年自发联合，抗击侵略者。3月26日夜，他们袭击了屯子、码头的日军，毙敌98人，伤6名，缴获步枪20余支，机枪一挺，迫击炮二门。日军进行报复，以重兵“讨伐”浚县人民的正义反抗。

3月27日，日军第十四师团所部1000余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进犯浚县城。国民党县长石铭臣指挥守军一个营和地方民团迎战来犯日军。数百名热血青年自带武器，主动参加守城战斗。浚县军民同仇敌忾，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敌军大炮的轰击，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3月28日夜，日军用大炮将城墙东北角轰塌，大批日军攻入县城。群众闻听日军从东边进城，便纷纷涌向城西门，争相往城外逃命。在日军的追赶射击下，一时间城西门人山人海，死伤数百人。

3月29日拂晓，日军在县城开始了野蛮的大屠杀。他们从东边破城，在城东杀人最多，恶魔般的日军把没有逃出城的群众100多人，推进城东门内的一座房子里，地面挤不下，日军就往人身上撂人，再泼上煤油，反锁房门，纵火焚烧，屋内群众哭喊惨叫，鬼子兵却站在附近又蹦又跳地狂笑。青年农民耿玉春，被撂在人堆的最上边，当敌人纵火烧人时，他奋力跳起来，使尽浑身力气，把房顶捅破，纵身爬出屋子，穿过浓烟烈火，跳过几道房顶，死里逃生，成为这一屠杀事件的唯一幸存者和历史见证人。

丧心病狂的日军烧死了这群百姓后，又纵火把文治阁周围的数百间房屋烧光，躲藏在屋子里的群众也被活活烧死。有十几个青年从火海中逃了出来，又被日军用刺刀捅死，或捆绑起来，再扔进大火中烧死。

一股日军闯进城东大伾山庙院，把庙院经卷文物洗劫一空。日军用明晃晃的刺刀逼着禹王庙老僧人慈海给他们烧开水，这帮强盗喝足了茶水，反而将慈海捆绑起来，吊在八丈大佛殿前的大杨树上，练起刺杀来。一个日本兵怪叫着在慈海身上猛戳乱捅，慈海惨叫不止，一群鬼子兵在旁边狂笑不止。鲜血溅满了那个日本兵的双手和脸，嗜血成性的日本兵一下子将刺刀扎进慈海的胸膛，慈海垂下了头，身子在空中荡来荡去，殷红的热血浸透了脚下的佛教净土。日军见慈海已死，又窜到天齐庙院，把该庙院的海登喜法师和本东和尚绑在一座石崖前的树上，石崖上还保留着明朝弘治年间雕刻的“有僧东渡留禅杖”的记载，这是一处象征中日友好历史的地方。残暴的日军就是在这里用刺刀将本东和尚活活刺死，又残忍地挖去了海登喜法师的双眼，剖开了海登喜法师的胸膛，嗷使狼狗扒出法师尚在跳动心脏吞食。日军看着狼狗吃了人心还不满足，又让狼狗咬掉了法师的鼻子和耳朵。这时，日军发现在刘公泉下面的山沟里躲藏着300多名逃难群众，立即用机枪扫射，除少数逃跑外，大部分群众被杀害。接着日军用迫击炮击毁了大伾山顶的八卦楼，毁坏了文昌帝君圣像和魁星像。明代王阳明在此讲学的阳明书院也被日军焚毁。

在城东南侧的浮丘山上，一股日军窜进浮丘山庙院，把庙里的道士张殿、宋太贵、王太仲、李宗杰、孙祥怀、何玉秀等人一一刺死。藏在庙里两名老太太，一个是城内居民王生吾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个是辛庄街的李王氏，不幸被日军发现。日本兵用刺刀撬开两位老人的嘴巴，一个劲地往肚子里灌冷水，活活把两位老人折磨死。日本兵一边狂笑，还一边用脚踢踩灌满了水的尸体。日军临离开庙院时，用炸药炸塌了三仙殿。

在城南关，日军挨着房门搜查，见人就杀。南街居民张柱、刘长德和陈奇科三家数十口人，竟被日军杀绝。70多岁的老翁王老清，被日军砍下头颅，

日军的狼狗衔着血淋淋的人头四处乱跑，有个一岁的小孩被日军用战刀劈成两半，挂在树枝杈上，令人惨不忍睹。在南关小庙躲难的8名妇女，被日军发现，先被轮奸，又遭杀害，有的被割去乳房，有的被日军用木棍从阴道捅进腹腔而死。日本兵闯进李金录家，枪杀了李金录和他的老伴，又将其两个年仅16岁和13岁的女儿轮奸。而后，日军又用刺刀捅进阴部，将两个女孩活活绞死。另一股日军把抓来的数十名青年妇女，关进一个院子里，扒光衣服，供其发泄兽欲，最后又把这数十名妇女全部杀死，菜园街李老香的老伴，已经五六十岁了，也没有被日军放过，几个日本兵将她轮奸致昏，又用刺刀扎死。

南关后城沟街王保善家的院子里，藏着40多名避难群众，被日军搜索发现，用机枪屠杀，除5名青壮年逾墙逃生外，其余全部遇难。在南山街附近的一个地洞里，藏着200多名群众，日军用机枪堵住洞口，向洞里扫射，扔手榴弹，除一位老太太被压在死尸下，侥幸逃生外，其余全部遇害。在菜园街和鸡胡同两处，日军集体屠杀民众500余人。

在城北门，日军将搜查出来的数十名群众捆绑起来，押到西门城楼上，强迫群众跪在城垛边沿。然后从身后开枪射击，遇难同胞中弹后纷纷坠入西城门下，摔得血肉模糊，鬼子兵却兴奋得拍手嚎叫。

黄昏，整整烧杀奸淫抢掠了一天的日军，离开了血与火的浚县城。幸存者告诉后人，日军走后，城里还是浓烟滚滚，火光熊熊，尸体成堆。遍地血迹。城东南角的几口水井被尸体填满，几个土坑里也填满了尸体。城西门内的十几间马棚里堆满了尸体，大王庙前的尸体垛了一丈多高。据调查，日军在这次惨案中，共杀害群众4500余人，奸污妇女5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这是日军在河南制造的又一惨案。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贺明洲）

在临沂杀烧抢劫

1938年4月21日，在台儿庄大战遭到重创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国崎旅团攻陷鲁南重镇临沂城。临沂的劫难就伴随太阳旗的飘扬和日本法西斯铁蹄的践踏接踵而来。

首先，临沂人民面临的是血腥大屠杀。

3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日军闯入城北古城村。惊恐的村民四处躲藏。农民王汉友一家4口躲在自家地瓜窖里，被日军发现后用点燃的秫秸堵住窑口活活烧死。接着，日军到处放火。农民王殿恩背着被烧伤的母亲冲出火海，被日军开枪打死。不到一天，古城村成为废墟，全村有62人被杀。逃难的群众在渡笊河时，又有几十人被抓，他们在刺刀下被强迫脱光衣服向河里跳，谁不跳就是一刺刀。他们大多数惨死在水里。日军在大岭村更是无恶不作，村民姜志敏的祖母、父亲等27人被枪杀，王富德的母亲被割掉乳房。躲在村西观音庙里的47名村民被日军机枪打死45人。

在临沂城沦陷前两三天，日军飞机每天都对城里狂轰滥炸，日甚一日，其中一枚炸弹投到北大街路南王贞一的杂货店防空洞里，洞内避难的30多门老小全被炸死。两门里天主堂内的避难群众，有300多人被炸死炸伤。住在洗砚池附近的刘玉芝老人在回忆日军飞机轰炸惨状时说：“提起这些事，就恨得俺打哆嗦。俺父亲当时52岁，就是被炸死的。浑身炸得成了肉渣子，只剩下一个头。送殡时是配上假身子下葬的。那次鬼子轰炸，光俺小院就炸死4口人，唐大娘藏在地窖里，被炸得鼻口窜血而死。卖炭的老张的老婆被炸飞了，只在院子里扒出一条腿，他的小女孩才1岁，脑瓜被炸得稀烂。”

日本侵略者进城了，更大更残忍的杀戮也就开始了。日寇在大街小巷布满岗哨，架起机枪。挨门搜查，见人就杀，老人、小孩无一幸免。对青年妇女先奸后杀，西门里太公巷、老营坊巷东各有一女青年被日军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西门里的天主教堂外聚集了700多个走投无路的难民，疯狂的日军从各个路口向手无寸铁的人们用机枪扫射，人们大片大片的倒在血泊中。事后用车拉了好多天，才把尸首清理干净。

日军进城当天在西北坝子发现了防空洞里和西城墙根都躲藏有大批群众，于是先用机枪扫射，后用刺刀乱捅，有480多平民被害。住在书院街老营坊巷的宁振芳是唯一的幸存者，她哭诉着说：“我当时是个娃娃，躲在娘怀里吃奶，俺家10口人让日本鬼子用刺刀穿死9个，就剩下我，幸亏街坊陆大爷后来收尸时发现我还有口气才被救出，由养母宁孙氏抚养大。我的右眼被俺娘热血喷的，至今看不见东西。”住在书院街的孙建芝讲起亲人被杀的经过，浑身发抖，她说：“鬼子进城时，许多人家跑反走了，俺家因老的老，小的小，走不了，吓得躲到城墙洞里。一天下午，我跟母亲出来找水喝，不料被鬼子发现。鬼子先是往洞里打枪，接着放毒气，三舅当场被打死。三舅母腿被打断。大舅、大舅母和表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一起爬了出来，都被鬼子刺死。在洞里的俺几个心想，与其叫鬼子杀死，不如自己死了好。于是趁鬼子不在爬出洞，跑到丁家园跳了井。姥姥、姐姐先跳后沉到井底。母亲、三姐和我是后跳的，因井底填满了人，所以没淹死。事后，俺娘仨被救出，又在徐家园地窖里藏了100多天。在火神庙附近住的李树英大娘提起她的亲眼所见，气愤地诉说：“鬼子进城时，许多街坊往俺住的旁边地窖里跑，有一个鬼子抓住了郑嬷嬷，俺三公爹在旁边说了声‘她老了’，就被鬼子一刺刀捅死。郑嬷嬷被强奸后也被刺死。和俺三公爹一块被杀的还有两个邻居。”

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在临沂城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崔家巷一户小孩出疹子，按中国人的惯例，在门前挂了个红布条，日军却借口“传染病”，点火将小孩烧死。北门里路西一老太太，年过70，病卧数月，生命垂危。全家7人围守病床，未及躲藏。日军闯进院内，将在场男子全部杀死，逼迫女人背起病危老人跳井。城外古城村一个吓昏的老太太躲在墙角里，被几个日本兵拖到街上，泼上汽油点火焚烧，老人的惨叫声，日军的狂笑声，真叫人毛骨悚然。

10余天以后，万恶的日本强盗又在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设了两处杀人场，抓来无辜的平民百姓以驯练军犬、演练军刀、刺刀劈刺。王学武的父亲被用军刀剁成三截，徐廷香的父亲和吕宝禄等被军犬活活咬死。

在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临沂大屠杀中，城外有134人、城里有2840人惨遭杀害。

日军在血腥屠杀的同时，还到处纵火。从火神庙以西、僧王庙前玉聚福街东、洗砚池以南，直到石碑坊、杨家巷至刘宅一带，大火一直延续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南关老母庙前、阁子内外，房屋全被烧光，被毁坏、砸烂的财产无法统计。

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对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和经济掠夺也就开始了。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强化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先后在临沂城设立子临沂中学、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沂州模范小学、兴亚小学和励廉小学，在汤头、独树头等十几处农村集镇设立了小学。学校主要由日本教官管理，所开“修身”、“体育”、“历史”等课的内容大都是宣传“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和武士道精神的东西。

为了把青少年“务期养成兴亚中坚分子”，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通过汉奸、警察加紧监视、控制，还在1941年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强行在沦陷区的学校里推行“自肃训练”在学生中加强“思想之考查”。1944年春，日军在临沂城里原“大夫第”旧址设立了安放战死日军将士骨灰的“神社”，日伪人员强迫学校师生去开追悼会或吊唁，并明令各校每月8日和9日上午，一律为日军侵华举行“必胜祈祷式”。

日军在占领区的奴化宣传由“宣抚班”操纵。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各部队连队以上都设有“宣抚班”组织。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教化安抚”、“剿抚兼施”的工具。占领临沂后的日军山本旅团，该部“宣抚班”编号为九九三，组成人员中日本人和汉奸各半，班长中山幸夫，系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特务。汉奸多为通日语的“满洲国”人。

临沂大屠杀不久，“宣抚班”就把“宣抚”临沂头面人物和哄骗逃反居民回城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查出逃反在外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地址，施以威逼利诱和手段，使他们回城。清末民初的中将参军统领钱广汉、区长钱广湘就是这样返城的。

日军“扫荡”我根据地时，在日军的烧杀抢掠之后，是“宣抚班”带着医护人员，除医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偶尔对伤病群众进行诊治，借以规劝老百姓作皇军“顺民”。“宣抚班”还利用节日和农村大集，在群众中鼓吹“中日亲善”、“东业共荣”。

侵占临沂的日军对临沂人民群众财产的掠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由于日军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据《大众日报》1942年4月4日报道：“台（儿庄）潍（坊）公路两侧的民众苦不堪言。时粮价昂

贵，小麦每升涨至 17 元（战前每斗 0.9 元——编者注），高粱每升 12 元（战前每斗 0.5 元）。民众用花生壳充饥。”敌占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警备费”、“建设捐”、和平救国活动捐”，每亩地就摊 100 元，贫雇农简直无法生存。

日本法西斯早就对齐鲁大地的矿蒲资源和文化宝藏垂涎三尺，临沂沦陷后，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除是镇压统治人民的专门机关外，还兼有文化掠夺之职能。

1937 年秋，临沂城南郯城县农民罗佃邦翻地时得一特大天然金刚石，重一两八钱（合 281.25 克拉），大如核桃，色黄而透明，状如出壳小鸡，当地农民喜称其为“小金鸡”。消息传出，当地保长朱希品带人将其抢走。日军占领临沂后，伪临沂道尹公署顾问川本定雄得知此事，又将“金鸡钻石”劫去。在我国迄今发现的 4 颗特大钻石中，“常林钻石”重 158.786 克拉、“陈埠二号钻石”重 124.27 克拉、“蒙山一号钻石”重 119.01 克拉，“金鸡钻石”居重量之首。这一珍宝，至今未归神州。

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下，还设“东洋文化社”和“中兴煤矿沂州联络所”。“东洋文化社”负责临沂文化遗产调查，以便窃取回国，“金鸡钻石”的掠夺，就是他们干的。“中兴煤矿沂州联络所”则负责维护日军对枣庄矿区煤炭的掠夺，日军经临沂运走中兴煤矿的多少吨原煤，已无法统计。

历史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日军的入侵给临沂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魏训洲中共临沂市委党史委唐士文供稿）

在江西烙下人类的耻辱

1938年6月29日，日军波田支队使用化学毒弹武器攻破了江西北部长江上的马当要塞。侵略军沾满血污的铁蹄自彭泽登陆，窜上了江西大地。此后，彭泽、湖口、九江、星子、瑞昌、德安、永修、安义、奉新、高安、新建、武宁、靖安、南昌等县市先后沦于敌手。都昌、余江、景德镇、乐平、万年、铅山等县市部分沦陷。修水、宜春、抚州、上饶、鹰潭、萍乡、新余、吉安、赣州等42个县市遭日军严重骚扰破坏。日寇恶魔的黑翼遮蔽了文明千载的豫章古郡。

自马当失守后的七年间，盘踞江西的日军经常保持在10万人左右，其中主要作战部队是日本陆军第二、第六、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四十、第一一、第一六等8个师团和独立第七、第二十两个旅团，及第三飞行团和海军航空队，还有海军舰艇10余艘。这些军国主义的杀人机器，奉行“烧杀以扬军威，掳掠以助军需，奸淫以供军乐”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给赣江两岸的炎黄子孙留下了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深仇大恨，在江西烙下人类的耻辱。

一、毁灭文明

自日军的铁蹄一踏上江西的土地，毁灭性的浩劫便接踵而至。日本侵略者公然推行种族灭绝主义，肆意践踏人类公德，毁坏社会文明。在狂轰滥炸和熊熊烈火中，城市被化为废墟，村镇被夷为平地，古建筑和历史文物被抢劫、破坏殆尽。全省48个市县被日军毁坏建筑物均达千栋以上，其中有24个县市城区几成焦土。

德安在南浔铁路线上，县城有700多家商店、作坊和行栈。繁荣为赣北各县之冠。1938年8月8日，日军飞机一再轰炸德安县城，县城96.4%的房屋被炸塌烧毁，火车站一带化作焦土，全城成了一座废墟。7年沦陷期间，仅德安有7080人死伤于日军之手，占总人口的11%，房屋被毁6397栋，财产损失达当时货币81亿元。

南城是赣东重镇，位于江西中部，1942年6月12日被日军攻占。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城内四条大街被烧光。据1942年11月25日《新民报》载，大火之后，全城仅存26间破烂小屋。重要建筑和历史遗址如九厅十八房、进士第、金斗窠、福音堂、华光庙、玄妙观、南城乡师、医院等都成了瓦砾场。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南城死伤于日军之手的有4633人。其中，中学教师尧孝杰一家五口只剩下他一人；孝子巷一对张姓新婚夫妇的洞房被炸飞，两人尸体悬挂在电线杆上晃悠；永丰坊附近的一个防空洞被近旁楼房倒塌的砖石堵塞了洞口，洞内60余人全部窒息死亡。被毁房屋4596栋，财产损失达当时货币153亿元。

赣州是赣南最大的城市。1942年1月15日上午9时，日机28架在市区轮番投掷炸弹102颗、燃烧弹13颗，当时正刮5级北风，风助火势，整个城区成了一片火海。阳明路、中正路、天后宫、华兴街等处均成焦土，千年古城毁于一旦。敌机走后，残墙断壁旁尽是缺头少腿的碎尸，其中有一名妇女，一手抱着婴儿，一手还紧抓着奶瓶，其状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炸死200多人，炸伤300多人，炸毁烧毁房屋1200多栋。赣州于1945年2月2日被日军占领。

二、残害平民

入侵江西的日军先后在彭泽、湖口、九江、瑞昌、永修、德安、奉新、南昌、临川、高安、余干、万年、崇仁、进贤，以及主要交通线上的县市野蛮制造了多起集体大屠杀事件。下面是几笔血泪账：

1938年7月20日清晨，初入江西的日军包围了湖口县的周玺村，将周元沃、周世太等百余村民用刺刀捅，用机枪扫，全部杀死。7月24日，日军骚扰周家坞，残杀了周文力等70多个农民。8月2日，日军闯进孙百仓村，把没来得及逃走的孙菊娥、孙汝荣等29人集中关押在一栋大房子内，用机枪对准他们扫射。8月23日，日军将乌林峦材的50多个农民集中杀害，烧毁民房76所。原有600多户的湖口县棠山镇，在日军屠刀下仅存50来户，500多平民死于非命。

8月5日上午，一队日军窜到九江沙河镇的曹家垅村，为防村民外逃将村庄团团围住，挨户翻箱倒柜，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抢光，又将全村男女老幼百余人集中到祠堂里，日军爬上祠堂对面的屋顶，用重机枪对人群狂扫。鲜血从祠堂里一直流到屋外的晒谷场上，惨烈的哭叫声嘶心裂肺。日军将祠堂四门堵死，浇上煤油，点燃火把，顷刻间偌大祠堂被烈焰吞没，全村上至90多岁的老者，下到未满月的婴儿，无一生还。

12月26日，日军分乘数辆汽车窜到瑞昌县的洪岭。兵分两路，一路扫荡尹范垄，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另一路日军窜到常丰畈，将几个村庄包围，抓住200多群众，押到张村背后的大草洲上，强迫民众搬来箱柜桌椅，摆成半亩地大的圆圈，威迫人群蹲在圈里。日军在圈外四周架起重机枪，齐向圈内扫射，顿时血肉横飞，草洲尽赤。枪声停后，日军泼洒汽油焚尸，300多无辜民众丧生，原有32户的张村，18户被杀绝；原有140多口人的黄村，只剩下几个老人和儿童。

1939年夏，日军摸黑侵犯奉新县的曼头岭。随着日军的砸门声，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老老小小都被赶到晒谷场上。日本兵将一个小女孩从母亲腋下扯出抛进了水塘，又返身来拖大人。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反正是死，不如同鬼子拼了！”人群向日军冲去，几个鬼子兵被打倒在地，但手无寸铁的村民们很快就在刺刀、马刀、火器的夹攻下，成片成片地倒卧在血泊之中。没有气绝的皆被鬼子抛入塘中，又被机枪狂扫。当晚，曼头岭村除陈正根、廖家忠两人幸免遇难外，全村其余男女老幼皆被日军杀死；肖家、邹村120多户700多人，逃得性命的不足20人。

1939年中秋节后一天，日军扫荡队发现奉新、高安两县交界处密林中的桥上庵里藏有80多个外地难民，立即开枪击毙了正在前厅天井中吃饭的一个女人，接着用刺刀残杀前厅内的20多个难民。枪声和哭喊声惊动了后厅的群众，他们急忙打开后门四散奔逃。余柳珍抱着两岁的孩子刚出后门，迎面碰上了鬼子兵。凶残的日兵一刀捅进女孩的大腿，刀尖又扎进了余柳珍的肚子，刀子拔出时，肠子也流了出来。接着两刀，母女都身首异处了。刘玉珍搂着8岁的儿子躺在墙角发抖，两人皆被乱刀捅死。躲在夹巷内和用晒垫遮着身体的难民，也都没有逃出魔掌，都被一一用刀砍死了。日军撤走时放火烧房，倒在死尸堆里受伤未死的刘永智、刘永发、刘烈料在日军走后从火焰中爬出，成为这场大屠杀的三名幸存见证人。

1939年9月18日，日军在高安县芦桐村把群众100多人关在屋里，纵火烧死，毁屋210间，同月24日，日军在肖家村投掷了数十枚手榴弹，炸死

炸伤村民 520 多人，烧毁房屋 300 多间。同日，日军在大族村把群众逼到一口水塘里，当场枪杀 400 多人，烧毁房屋 1600 多间。也是这天，日军在马鞍岭将抓住的 330 多名群众用绳子 5 个一组捆绑起来，然后用刺刀一一捅死，同年 9 月 29 日，日军在大屋场纵火烧村，烧死群众 280 多人，烧毁房屋 700 多间，全村顿成废墟。仅 10 月 5 日这一天，日本将 600 多个村民围困在团山寺，先把寺内财物抢劫一空，然后将庙门紧闭，泼上汽油，放火焚烧。顿时 200 多群众葬身于浓烟滚滚的火海之中。其余 400 多村民愤怒至极徒手与日军搏斗，冲出了庙门。打长工出身的徐福明冲在最前头，挥拳打死一个日兵，但不幸又被尾随而至的日军刺倒，被当场砍成了四块。日军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又有 200 多人倒在血泊中，剩下的 100 多人被日军逼困到庙前山脚下一丘晚稻田里。日军在山腰架起机枪，对人群狂扫。被围困于团山寺中的 600 多人，只有冯佳瑞、邓芒英、彭麦英和几个小孩在尸体遮蔽下幸存下来。

1942 年 6 月 26 日，日军进犯进贤县城。当时城内大部分居民已外逃，但仍有百多人留恋故土，其中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这些人躲进天主堂，乞求外国友人和神灵保佑。哪知凶残的日军根本不管什么教堂和天主，把这百余入捆绑起来押到东门桥头，全部推下河里淹死。教徒杨万春，一家老小 8 口全部遇害。

日本侵略军杀人手段极为残忍，暴行骇人听闻，诸如枪击、轰炸、捅刺、刀劈、砍头、腰斩、断肢、开膛、割乳、捅阴、奸杀、灌溺、火烧、晒烤、裂体、狗咬、虫叮、碾压、铡切、刀刷、活埋、剥皮、割耳、剜目、刖足、斫手、踢死、摔死、勒死等等，受其残害的人中，有白发苍苍的耆老，也有幼弱稚嫩的婴儿，有健男秀女，也有孕妇哺娘。仅在江西最早沦陷的彭泽一县，死于日军酷刑的就达 547 人。这帮残无人道的杀人凶兽，肆意亵渎人性，在江西这块土地上，可耻地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泯绝人类天良的血腥记录，如：

1938 年 10 月 8 日，中秋节，星子县朱家港村的几十个农民藏在羲之洞内，被日军抓到三祖庵，全部用酷刑杀害了。其间，日军选用 5 根不同方位的山竹，把它们弯下来，将村民卢善敏的头、手、脚各系在一根竹梢上，再猛地松开山竹，把他的身体撕裂成了鲜血淋漓的 5 块。

1938 年冬月，驻扎在德安永安堡岑家的日军，用刺刀将抓获的 50 多名村民戳杀死，又将一个 1 岁的婴孩和两个大人塞进油榨榨槽内，用榨筒打得稀烂。当时孩子的母亲哭喊着上前阻拦，被日兵一刀将双手砍掉，数日后亦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间。

1939 年 3 月间，日军围攻德安冯家岭，将村民冯必辉用铁丝穿进脖子，捆在村前大樟树上，把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喂日军的狼狗，一连割了三天，留下一付白森森的骨架。在此期间，日军还将 20 多名村民押到村边枫树旁活埋。遇难者身埋土中，头露于地面，被慢慢折磨死去。曾家岭青年农民曾宪恭、曾广元等。被日军疑为中国士兵，百般酷刑后用石碾活活压死。

1939 年 4 月 24 日，日军在奉新县赤墩材短嘴塘边用机枪对数百村民扫射。枪声停后，日军对还会动的逐一补上一刀或一枪，又从村里抬来两架风车斗，倒放在水塘边，装上铡刀，将奄奄一息者拖来，或铡头，或铡腰，铡后抛到塘里。水塘成了粥状的血浆池，风车斗上的木板被铡出了两寸多深的刀痕。

1939 年 9 月 29 日，一伙日军窜到高安县的杨林村，轮奸了村民况志驰

的妻子和儿媳，又将她们锁在屋内放火烧死。大火升起后，日军拎起他的小女儿抛入火中。况志驰愤恨已极，冲向日军搏斗，被鬼子兵捆绑在碾槽架上，上压门板世石，下烧熊熊烈火。将他活活烤死。日军又把他的儿子况起气五花大绑，拖到碓口下活活舂死。一伙日军窜到高安市的米岭，杀了彭家村彭火秀的哥哥和嫂子，将彭火秀6岁的小妹掷昏在地，敲开她的脑袋，取出脑浆，和入酒内，喝酒作乐。彭火秀的父亲见亲人惨死，冲上前与日军拼命，被鬼子兵反绑在一棵大树上，泼上汽油，纵火烧死。接着，日军又当众轮奸了彭火秀的伯母。轮奸后用刺刀把她捅死。浩劫之后，彭家仅存彭火秀母女两人。

据1942年11月25日《新民报》载：“浙赣之役后的赣东，一片凄凉。……敌此次进扰时，口号有口：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其杀人方法有二十六种。临川文昌桥下，被害者数千人，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

侵华日军是一群完全丧失了人性的野兽集团。请看看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实例吧。

德安沦陷期间，日军每到一个村庄，见了妇女，不管老少，先奸后杀。奸后，日军还惯用刺刀逼迫父亲奸女儿，孙子奸祖母，或当众将妇女裸身捆住手脚，再指使日军的狼狗军犬扑上身去淫辱，撕咬摧残。1940年8月，驻扎在彭山尖峰博碛堡里的三个日兵窜到山下爱泉垅吴善发家，年方18岁的吴家闺女正在洗碗筷，猝不及防，被日兵剥光衣裤拖到堂屋中间轮奸。奸后，日兵从后屋搜出她的爷爷，用刺刀逼迫爷爷奸淫孙女，爷爷坚决反抗，日兵举起刺刀将老人捅翻在地，狂笑着扬长而去。姑娘原已许配了人家，原定年底出嫁，遭此横祸，痛不欲生，主动退婚后，悲惨地上吊自尽了。

在高安九江、上饶、南坡、吉水等地沦陷期间，全县遭到日军奸淫的妇女达15300余人。1939年9月18日，庄上村的青年孕妇胡锁凤被日军强奸后，鬼子兵剖开她的肚子，用刺刀挑出胎儿，高举在空中耍弄。

日军曾两度严重骚扰破坏泰和，沿途驻地见女人就追，不论老妇、少妇、少女、幼女、产妇、病妇、不择室内野外、厅堂灶间，抓获即奸、抗拒就杀。冠山乡田村的郭东妹等妇女被日军轮奸后杀死。碧溪乡大湖村的张贞妹年届三十，手中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为抗拒日军强奸，母子二人被推下河淹死。塘洲乡的少女严秋菊年仅十五，拒奸不屈，被日兵倒提双脚，侵入水中，几起几落，窒息而死，冠朝乡65岁的郭元婆，视力不明，行动困难，被日军抓住强奸。塘洲乡龙口村的妇女白润秀被日军奸淫后，推下塘里淹死。云谷乡胡元培的妻子被日军奸污后，又被刺刀戳死。万台乡下塘村一名产妇卧病在床、被日军三人轮奸。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42年10月6日赣州电讯说：“敌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兽行，无恶不作……有敌酋一人，率领敌军十余人在距南昌市60里之岗山附近强奸玉华观尼姑，并将寺内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扬长而去，尼姑痛愤清门受玷，复以生活无着，全寺尼姑14名举火自焚。”

日本侵略军这群法西斯野兽对中国妇女的暴行，有许多实在太残忍，太丑恶以至他们好意思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而我们却不好意思用笔墨写出来。在这里我们只说，他们根本忘记了自己是由妇女生养长大的，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姐妹也是妇女，他们简直是一群连禽兽都不如的人渣。他们的出现是人类的耻辱。

三、施毒散疫

日军侵占江西期间，多次使用化学毒弹和细菌武器，散播瘟疫，在水井水源里投放毒药，给江西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8年6月下旬，日军第27师团的波田支队在进攻彭泽马当要塞时大量使用化学毒气弹，使中国守军伤亡十分之七。

6月下旬，日军在进攻彭泽的抗日军民时，在南垄阳村一带施放了大量毒瓦斯，使中国军民受到巨创。

9月下旬，日军飞机在南义乡张家铺东面的羊虎尖山、梅山等地投下毒气弹、细菌弹多枚，使瑞昌武公路东侧一带的村庄发生了严重瘟疫，当地群众大量出现手脚溃烂的特异病症，死于非命。

10月，在德安战役中，日军106师团每个步兵队都配带了3100多发“特种筒”毒气弹在战场上使用。

1939年1月3日，日军进犯张公渡，大量使用毒气弹和化学武器，给中国守军和当地人民造成极大危害。

1939年3月20日，日军攻打南昌外围时，在修河南岸一带用烟雾喷射器向中国军队发射了两万多只毒气弹。26日，日军第101师团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进攻南昌，作战时大量使用毒气弹，得以由牛行车站及生米街附近渡过赣江，攻入南昌。

自1938年9月到1939年2月，日军在德安投放、发射了多枚有毒炮弹和窒息性毒剂，致使许多中国百姓和抗日战士遭到严重伤害。其中有的很快就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有的全身溃烂，烂脚生疮，慢慢拖死。据1987年8月7日北京中国新闻社的《我首次披露日军侵华时使用毒剂情况》揭露：“日军在江西省德安县就使用红筒（系窒息性毒剂）12000个，并发射毒剂炮弹3千余发，造成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

1939年8月27日清晨，6架日机在高安旦吴珠岭一带投下大批细菌弹，给这一带群众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当地民众及外来难民7000多人受到细菌和毒气的严重感染，全身溃烂，2100多人很快被断送了生命。吴球长一家18口全部被毒害而死。

1939年9月19日，日军106师团从北、101师团的157联队从东合攻高安，在战场上施放大量毒弹，中国军队139师很多官兵中毒，阵地被日军攻占。

1942年6月上旬，占领鹰潭的日军窜至江上艾家，一面抓人当苦力，一面向水井里投毒，当时即造成55人中毒死亡，水井亦被废弃。

194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载讯：“赣东于战争中遭敌寇烧杀洗劫者有十余县之多，灾民在300万以上。灾情以内城、金溪、崇仁、宜黄、南丰、波阳、清江等县最为严重。灾民多四散逃亡、十家九空。目前灾区传染病极流行，饿毙及因传染病而死者极多。”

近年，上高县泗溪乡官桥村扩建圩集时，挖出200余枚当年侵华日军使用的毒剂罐。这批毒剂罐埋匿在官桥祠堂的一个房间内，全部排列盛放在一个单砖砌成的长2.2米、宽1.5米、深1.3米的长方体大坑里。毒剂罐为圆柱体，直径约0.11米，高约0.22米，罐壳为铁皮夹纸结构，一端有拉火装置。罐体因年久腐蚀糜烂，露出白色药物，散发出强烈刺鼻的怪味，使在场人员出现打喷嚏、胁紧胸闷、干咳等症状。经有关部门取样检测，鉴定为氰化物毒剂。据调查考证，这批毒剂罐是1941年“上高会战”时，日军第34

师团留下的。

四、劫掠财富

日军在江两推行“以战养战”的罪恶政策，疯狂地掠夺物质资源和经济财富，每到一地，都大肆幼掠各种战略物资，从车船矿产、机器设备、工商业产品、粮棉油杂，畜禽桑麻，到老百姓的饰品衣被，都厉行“抢光”政策，其抢夺的重点是钢铁、粮棉油和民众的财

五、残害劳工

日本侵略军在江西大肆抢劫，并到处设立据点，四处抓掳民工，强迫他们为其搬运物资，建筑碉堡工事。日军对待中国民工极端残忍，其恶行罪不可赦。

1940年间，日军在交通枢纽鹰潭设立物资转运站，盗运抢掠来的铁轨、钢材等物资，在各地抓来两千多民众关进劳工营充作苦力，入营劳工都被剃了头发，当作标记，每天食不裹腹，累死累活。被抓入劳工营的小学教师刘家有、况有生不甘屈辱，结伴逃出，却因头发标记明显，又被日军抓回。日军将刘家有手脚叉开，绑在两条扁担上，用铁路道钉活活钉死在地上。又将祝有生绑在天主堂门口的树上，点火活活烧死，随后命令全体劳工绕尸一周，以作威吓。钢村、铁轨等物资运完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屠杀劳工。日军将60个劳工为一组，用棕绳串连捆手，押到项家岭峭壁上，开枪打倒第一个人，使他坠入崖下的信江，并将其他人也连带拖下峭壁。日军还在信江中部署了几只汽艇，用机枪对落水劳工扫射。2000多名劳工或被机枪打死，或因绳索的串连捆绑而被溺毙，只有宋龙儒、黄佑林、夏伙泰等数人，因伤不重，水性好，得以在日军撤走后游到了岸边。

1942年6月，日军侵占广丰县后，烧杀抢掠，大筑工事。被掳民工当牛作马，苦不堪言。当工事建筑好之后，日军将民工押到虎头背山边，逐一处决。日军在几十丈深的悬崖陡壁边搁置一块木板，一头用山石压住，一头悬空伸出崖外，将民工们蒙上眼睛，捆住双手，赶到木板上。民工们不知深浅，一踏上木板就滚落下山谷，摔得粉身碎骨。日军撤走后，乡辛们到虎头背掩埋尸首，共装了18担大箩筐白骨。从此，这条无名谷被称作杀人沟。

1942年7月18日，驻在南昌的日军骚扰市郊附近的塘南地区，大肆抢劫，掠夺甚多，并在当地抓获了数十名农民充当苦力，逼迫他们搬运抢来的物资。在协成乡樊家村停歇时，日军用刺刀威逼民工们向正在沸腾的油锅里伸手捞起食物，把他们一个个烫得肉烂骨现，围观的日军哈哈大笑。货物运到麻丘后，日军又将拌有人畜粪尿的饭菜倒在地上，强令民工们趴在地上当狗舔食，同时还逼迫民工们喝桐油。有个小伙子宁死不从，抓起脏食用到日兵的脸上，被鬼子们连捅十几刀，鲜血四溅，倒地惨死。随后，还有几个不甘受辱的，也都被日军当场活活打死。在快要到达日军据点时，鬼子们又把民工们和沿途抓获的80多人赶到一处叫做野猫洞的地方，强令两人一排，列成4队，拿这些人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子，逐个用刺刀捅死，被抓民工陈风水是第5个被刺杀的。日兵先对他腰背上猛刺一刀，穿透了肚子，拔出刀后，趁他未倒，又从他背部捅刺一刀，穿透了胸膛，他当即昏死过去。半夜，在尸体堆中陈风水苏醒过来，爬行了4个多钟头，皮肤磨烂，指甲脱落，终离险境，成为这场残杀民工血案幸存在世的唯一目击者。

1942年8月中旬，在搬运完物资后，日军将余干各地抓来的百多劳工关入念佛堂庙内。午后，日军将他们10人一串，用绳子捆住，然后用刺刀一个

一个捅死，遇难者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劳工中略会武术的徐贵发、高南山寻机打倒两个把守庙门的日兵，一边跑一边叫：“大家冲出来呀！不要等死呀！”念佛堂里的群众跟着四散狂奔。日军立即用机枪封锁了大门，并开枪追杀逃出者。随后，日军在念佛堂四周堆柴泼油，点燃大火，庙内人全被烧死，逃出念佛堂的人在弹雨中只有少数几个受伤后侥幸逃离险境。

祸赣日军自 1938 年 6 月在彭泽登陆，到 1945 年 9 月 14 日在南昌签字投降，在江西欠下了累累血债，滔天罪恶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 84 县，就有 78 县遭日军严重烧杀淫掠，难民和伤病员达 510 万以上，土地荒芜 300 多万亩，全省人口由战前的两千多万锐减至 1300 万以下。在那生灵涂炭的 7 年血雨里，江西伤亡了 504450 人，其中死亡 313249 人，重伤 83529 人，轻伤 107672 人；伤亡者中，男约 309101 人，女 137481 人，儿童 57868 人。在那兵燹战乱的 7 年凶焰中，江西被毁房屋 301874 栋，城乡残破，民不聊生。在那人间地狱的七年凌迟下，江西财产损失达 1007202334 千元（法币），民脂民膏尽付东洋，财富基业毁于一旦。这些历历在目的泱泱血色，正似勒山刻石的利刃，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永远凿嵌在了炎黄子孙的忧患意识中。今天，当历史的沉淀被纪念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正义之风拂去尘封，再现民族衰败时期亡国丧家的凄沧悲愤时，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赣江两岸的惨剧，将激励我们牢记历史，以史鉴今，振奋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国强，才能民安！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蒋伟）

穷凶极恶毁洪都

“沦陷区”，这个沥血蒙耻的称谓，半个世纪前曾在南昌鬼影憧憧地悠荡了7年。在那国弱家贫，民族萎靡的岁月里，日本侵略军犯境，山河破碎，强寇凌锥的尖齿将誉满华章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啃噬得斑驳淋漓！

江西省会南昌古称洪都，地处浙赣、湘赣和南浔铁路交汇处，位于长江以南，赣江下游东岸，是江南鱼米之乡，汉初已为南方昌盛之地，因而得名南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昌，人口约有30万，是一个比较发达的消费性商业城市。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昌告急。7月18日，被称为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日本海军航空兵南乡茂章大尉，率舰载战斗机6架、攻击机5架、掩护轰炸机14架，由安庆起飞，轰击南昌。中苏空军架机迎敌，展开激烈空战。我空军一机被击伤，英勇的飞行员驾驶着烟腾火冒的战机向其附近的南乡茂章的飞机撞去，两机一同坠落于鄱阳湖中。8月4日，日本飞机两批共27架侵入南昌市上空滥施轰炸，投弹百余枚，炸死近百人，炸伤200多人，毁坏大批建筑，城内市民仓皇逃迁，8月7日，又有日机18架在昌北牛行火车站等处投弹60余枚，炸死87人，炸伤63人，摧毁房屋300多栋。8月25日，日机49架袭击南昌，再次造成严重破坏和伤亡。9月上旬，日军开始由九江进犯南浔铁路线，多次派飞机反复轰炸南昌。日军对南昌的毁灭性空袭一直延续到省城沦陷，仅1939年3月，日机就在南昌地区进行了40多次轰炸，投弹1559枚以上，中弹地点达431处以上，市内77.9%的房屋被摧毁。

自1939年3月23日起，侵华日军岗村宁次所属部队的井村支队、石原支队、一六师团、一一师团和海军炮艇在空军掩护下对南昌发起猛攻，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军竟在26日的空战中投下大量毒气弹，南昌军民中毒者无数。27日，南昌沦陷。日军入城后，到处纵火滥杀无辜。数日内，章江门、广润门、中正桥（现八一桥）头一带，尸体遍卧，肝脑涂地，血聚成洼，赣江中浮尸如鳞，江水赤赭，市内到处火滚烟腾，受害民众凄厉惨烈的哭号声日夜不绝。在日军铁蹄的摧残下，千年文明古都毁于一旦。

日军占领南昌后，除了继续野蛮烧杀来摧残民众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法西斯统治手段，培植亲日政权，强化法西斯统治，妄图迫使江西人民就他的险恶目的。

日军在南昌市内实行军事管制，东自渊明路起到东郊，西自合同巷起至赣江边，划定为军事区，戒备森严，区内住户居民全被强行驱走。环绕军事区筑有电网，严禁市民逾越。市内主要街道、路段，设卡、搜查、巡逻、辱虐行人。市郊区，每相隔十来里路或在要隘关口，都驻有十多人数十人不等之日伪军，把守据点，管制交通，搜检行旅，实行军事封锁。

为了强化军事统治，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日伪在南昌组织起了“建国军”，又于1940年在南昌纠集一批认贼作父的乌合之众，拉起了“和平反共建国军”，为虎作伥，欺压民众，破坏抗日，防共反共。

日军占领南昌之初，将南昌市划属汪伪湖北省政府管辖，令南昌和近郊新建县的居民组织维持会，并推荐汉奸担任会长。同时，设立南昌、新建两县伪县政府和南昌市的伪市政府筹备委员会。日军在伪市、县政府内设置辅佐室，由日军司令长官委派辅佐官三至四人。凡伪县长行文及采取重要措施，均需通过辅佐室，由日军直接控制行政领导权。为遮人耳目，辅佐室后来又

改称联络室，但其性质与职能未变。

以残酷方法强制减少城市人口是日军强比行政方面统治的一个罪恶手段。入城前，日军飞机对南昌连续狂轰滥炸，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群众被迫离家出走，使南昌人口由抗战前的 30 万锐减至 8 万。日军入城之初四处纵火，滥杀平民，市内人口进一步锐减，很快降至 4 万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日军仍嫌太多，于是下令不准薪炭入市，迫使市民、店铺拆下房屋楼板、梁柱、门窗当柴烧饭取暖，用破坏房屋的作法，逼迫民众离开城市。深街幽巷的住宅，往往是砖墙、门面尚在，屋内则被劫拆一空。房主逃空的房宅更是徒存四壁，草木尽罄。日本的驻军单位如野战仓库之类，也常勾结汉奸、伪军，径直进入逃往后方的富贵人家，抢劫未能带走的家俱、衣物、珍贵藏书字画、磁器古董等，拿到日本商人那里去出卖。随着市内房屋的不断减少，南昌市人口也随之进一步减少，总人口曾一度降至两万左右。

厉行保甲制度是日军在行政方面强化统治的又一个手段。日军入城后对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已实行的保甲制度加以改组，指派南昌市伪警察局直接经办，进一步加强控制。不久，南昌、新建市县被强迫合并，保甲制度又交由南昌县伪警察局继续控制。

在日军操纵下，1943 年夏成立了伪江西省政府，由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先后任命了几任寡廉鲜耻的汉奸任伪省长，俯首贴耳为日军统治江西。

日军侵占南昌后，大肆劫掠，市内十室九空，滞留未走的百姓成了俎上鱼肉，逃离南昌的工商界人士也因此倾家荡产。在市区，日军仅放行中正路（现胜利路）及叠山路为南北通路，仅允许进贤门外大街、猪市街等交通要道旁小商小贩开门营业，而将市中心的洗马池一带开辟为日本洋行区，专门管销日货。敌占南昌 7 年，交通被破坏，经济交流停滞，商场凋敝，生活必需品匮乏，虽有少量日本货应市，实为杯水车薪，民众受尽煎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市更是死气沉沉，一片阴暗惨淡。但与残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内嫖赌流行，鸦片烟馆比比皆是。

为强化经济方面的统治，日军还采取了如下一些罪恶做法：

征收“海关税”。凡从市外来的货物，都要由电网入口处日军检查，按一定百分比交纳“海关税”。例如香港来的手表、上海来的小件机器或海产品、丝绸等，均由日军检查后，信口估价，抽收“海关税”。对于没按此法入市的货品，一概算作“走私”，不但吞没全部货、款，而且对货主处以重刑。

推行侵略性的金融政策。日军初占领南昌市时，尚准许使用原有的国民政府法币，每元折合现洋一角六分。不久，即推行使用日本银行发行的军用票，其价与现洋相同，其票面以拾钱（一角）的居多，五拾钱的次之，壹元的又次之。1940 年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在南昌开设支行，发行“储备券”，面额有一分、二角、一元，最大面额为十元。这种伪币直接进入流通，到 1943 年，又发行了面额为 100 元和 500 元伪币，到 1944 年，出现了面额为 1000 元的“储备券”。其时，这种伪币比已经暴跌的法币更加贬值了，中国民众和中国经济受其祸害的程度十分严重。

回笼“军用票”，是抗战后期，日军在金融方面采取保护日本既得利益的政策。日本投降前半年，南昌市面上各种货物之所以匮乏，日本“军用票”又很少见到，原因全在于日军借回笼“军用票”搜刮一空。居民中持有“军

用票”者和索赔者在日军投降时只向汪伪储备银行兑取四成现金。

搜刮贵重金属，掠夺战略物资。日本的资本集团在南昌开设办事机构，当时六眼井的洪都公司就是其在南昌的代理者。这些所谓公司，趁火打劫，在市内外低价收购、聚敛金银，大量劫取铜元、铜器，掠夺的数量难以统计。佑民寺的铜佛一度被日军盯上，但因朝香的市民很多，才侥幸得免。至于铁器，则由伪市、县政府和保甲长挨户搜缴，以至连门铰、门环、铁锅、铁炉等一律被无偿征收，老百姓的日用铁器几乎被抢夺一空，府背咸宁第的“三国时代铁香炉”，就是在这时被日军劫走的。

控制食盐买卖。南昌市及南昌、新建两县的居民，均必须向维持会或伪市、县政府申请，在保甲证明文件上盖章，始可持证购买每户每月的半斤食盐。日伪据此种方法既使自己获利，又可控制抗日游击队藏入民众之中。一旦发现走私买卖食盐的，即认为与游击队有勾结，格杀勿论。

日军对南昌平民百姓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也很残酷。日军占领南昌后，控制舆论传播媒介，查禁所有报刊，推行奴化教育。日军入城之初就出版发行了为其侵略行径张目的《贯冲日报》。这份敌报后来又改称《江西南昌日报》。此外，还出版日文的《赣报》。这两份敌伪报纸都是四开小报。月刊方面，敌伪发行南昌市、县公报和新建县公报。到1940年间，又新出刊了《南昌青年》月刊。日军和伪政权利用这些宣传工具，为侵华战争制造舆论，粉饰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凶恶嘴脸，鼓吹“投降论”、“卖国论”等。日军还开办了以奴化教育为宗旨的所谓实验学校，强迫各小学和当时南昌仅存一所中学，开设日语课。各校日语教员大都由日本人担当，向学生直接灌输侵略者的思想。日军还在南昌设立了一所小学，学生都是日本儿童，约有50多人，专为侵略者培养统治殖民地的后备力量。

1939年9月，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后，南昌于1940年步其后尘，成立了汪伪国民党部，组织起了类似三青团的青年协会、青年模范团，以组织形式钳制民众，特别是禁锢青年人的思想，妄图进一步强化侵华日军在思想方面的统治。

日军侵占南昌后，残暴屠杀民众，血债累累。市郊瓜山葬有2700多中国同胞的“白骨坟”、向塘附近尸堆血聚的“万人坑”、平安堡令人一见寒心的“鬼门关”、市内原中央银行（现址为中山路中国人民银行南昌支行）内的水牢，都是控诉日军残无人道杀戮江西无辜平民的铁证。在南昌沦陷后的7年腥风血雨中，日军多次制造了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并屡屡以极端残忍的手段摧残迫害抗日志士，其倒行逆施，罪不容诛。

1939年5月2日，驻莲塘镇岗前据点的日军倾巢出动，对附近的黄台、罗坊、黄家、涂家、杨家、流芳等村进行扫荡。先放火，后抓人，将100多名群众关进岗前村宗家祠堂，分批绑押到祠堂门前大粪坑边枪杀了。

5月9日中午，日军分两路窜进向塘镇河湾村。一路日军用机枪点名，逼迫抓来的40名群众往井里跳，不肯跳的被刺死在井台上。另一路日军将30多名群众关进一幢房子，放火将他们全部烧死。

5月15日，驻沙潭据点的日军闯进沙潭村龙南天仙庙，借口找“中国兵”，将庙内370多名难民围住，先用机枪将50多名青壮年男子射死，又用石头把庙门堵住，架柴点火，将庙内320多人活活烧死。

5月28日，日军因6个士兵被当地荷埠周村民众击毙进行报复，分兵三路包围周村，见人就杀。被困在司马地的400余村民，除1人幸免外，全被

日军杀死；集中在四川地的 50 多村民，被编成 8 人一排的 7 路纵队，日军迎面开火，一枪击倒数人，试验子弹的杀伤力；在烟地场，村民奋起反抗，日军或用手捅，或用机枪扫，杀死了场上的 200 多人；在练武场上，枪声大作，除少数人跳水逃脱外，113 人惨遭日军杀害。周村历经烧杀，1000 多民众死于敌手，52 户人家被杀绝，881 栋房屋被毁掉，一个原有 6000 多人口的大村，变成了一片废墟。

1942 年 7 月 17 日始，日军对敌我两军交界的南昌塘南地区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烧杀掳掠的集体大屠杀。当日深夜，日军从河埠周家、尤口范家两据点出动百余人，由汉奸带路，血洗了张家山、吴家祠堂、柘林街等 14 个地点。仅以 7 月 18 日这一天计，塘南地区就被日军杀死 860 多人，数十户被杀绝，先奸后杀妇女 30 余人。凡被日军撞见者，从白发老妇、怀孕妇女，到幼童婴儿，皆无幸免。柘林街上数百具尸体横陈，抚河流水都被鲜血染红。以下仅祖师坛、令公庙、西塘沟三处情景，已足见骇人听闻。

祖师坛位于柘林街东，南面是河，北面是水塘。日军一进街，就对街口炸油饼的老头当胸一刀捅死，并立即堵住街口两头，在街上大肆屠杀抢掠。日兵从妇女耳朵上连肉撕扯下耳环，砍断妇女的手指、手腕抢夺戒指、镯子。随后，日军将东港头、陈家两地抓来的农民 50 多人和藏在街上盐店里的 10 多名群众押到祖师坛的场地上，对这些手无寸铁的民众用刺刀捅、军刀砍。群众奋起拼搏，有 40 多人跳入河中和水塘，日军就用机枪对水中反复扫射，直到杀死所有群众为止。

令公庙内住有各地逃来的难民 120 多人。日军进庙后，将机枪架在戏台上，强迫群众在院内排队集合。日本兵首先对卖熟食的吴先露老人当胸一刀，老人倒在地上挣扎，日本兵又上去再捅一刀。人群骚动起来，大家欲与敌人拼命。当日本兵用刺刀向一个木匠捅去时，他毫不畏惧，侧身夺过刺刀，使劲插入一个鬼子的胸膛，鬼子当即毙命，木匠被群寇乱刀砍死。后来，日军将男的以 6 人为一组，用绳子串连捆绑在一起，押到河岸上枪杀。接着，把魏奶妈子等老年妇女和三影嫂子等中年妇女拉出来，反绑双手，两个一组，将她们披散的头发缠绕在一起，用刺刀逐一捅死。最后对青年妇女先奸污，后用刀杀死。不少妇女不甘受辱，有当场碰死在麻石上的，有用剪刀戮穿喉头的，有用绳子勒颈自杀的。混乱中日本兵从一个少妇怀中抓过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倒提双脚朝大石上用力一摔，婴儿脑浆迸裂，母亲昏死过去。有两个被日本鬼子兵踢得满地打滚的小孩，对着被捆绑住的母亲哭喊，被日兵用枪刺插进腹部高举起来，孩子在刀尖上撕心裂肺地惨叫，鬼子用力一摔，小小的躯体在石地上摔得血肉模糊。日军残杀儿重，手段毒辣，对 10 岁以下的儿童或用刺刀捅入肛门，或倒提两脚甩入河中。浩劫之后，令公庙内外掉头、断肢、肠子外流的尸体横七竖八，抚河里死尸漂浮，河水尽赤。

张桂香是令公庙大屠杀的幸存者她控诉说：“日军动手杀人时，我丈夫魏益良被首批拉出门外，婆婆扑上去阻拦，我 7 岁的女儿紧紧抱住父亲的腿大哭。日军一脚踢开我婆婆，提起我女儿狠狠抛出门外，捉走了我丈夫魏益良，在河边将他击毙。70 岁的婆婆和另一个老大娘头发被结在一起，被日军用刺刀捅死。我那已被摔得奄奄一息的小女儿被日军丢入河中淹死。我怀中 3 岁的小女儿被日军抓起摔得头碎脑流，我扑在 9 岁儿子魏金山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遮挡直刺过来的刺刀。恰在这时，庙门口屋角边的那口大破钟响了一下，日兵冲过去，从钟内搜出一个少女，鬼子们狞笑狂叫：花姑娘，大

大的漂亮，成群的日兵在姑娘‘救命哪！救命哪！’的惨叫声中，对她轮番强奸。此时，我们母子趁机滚进戏台底下的乱草堆中得以保住了性命。鬼子走后，我们母子俩到钟边一看，顿时眼黑心绞，几乎昏厥。那个可怜的少女赤身露体，秀发披散的头颅被砍掉滚落在一旁，整个下身凝满血污，胸乳上被刺刀戳了两个鲜血直冒的窟窿。”

西塘沟是日军在塘南残杀群众的最后一个屠杀点。这里三面环水，一面是岸。日军将 200 多个群众押解到西塘沟河岸边，强令平民排成几行，然后用刀砍，用刺刀挑，用机枪集中扫射，半小时之内，把人杀光。有一个男孩中枪后在地上挣扎，鬼子兵对准他脑袋又是一枪。日军临撤走前，一把火将西塘沟比成一片火海。在弹雨和烈焰中，仅有 5 个人受伤后躲在尸堆中保住了性命，其中陈全婆身上至死都有取不出的子弹，陈竹根身上留下了十多处枪痕刀疤。

日军不仅在南昌地区滥杀平民，而且以百倍的疯狂残害抗日志士。因其恶行不胜枚举，以下仅记南昌军民遭日军荼毒的两个实例，以洞烛其凶残、暴戾，灭绝人性。

1940 年间，中国军队南昌潜伏组组长、南昌人史忠在刺探敌情时不幸落入敌手。在日本宪兵队里，史忠遭到残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日军妄图用严刑拷打逼迫他交出电台，供出其他潜伏人员的行踪。在百般威逼利诱不能得逞时，日本宪兵队用狼犬将遍体伤残的史忠活活咬死在黑牢之中。此后，南昌邻县的安义人高岳继任南昌潜伏组组长，在虎口里与敌人周旋。由于汉奸出卖，高岳不幸被捕。日军责令交出电台及其他人员，高岳拒不承认是潜伏人员，遭日宪兵队酷刑拷打，被烙铁烫背及用钢针钉入十指，高岳多次晕死，但拒不招供。在一天深夜，遭日军残杀而死。

徐疤女是南昌近郊青云谱机场附近的村民，她多次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帮助抗日游击队，在协助破坏日军青云谱飞机场电话干线后，不幸被敌人抓住。日军队长亲自审问，要她说出谁是游击队和剪断电线的人。日军小队队长掏出大沓伪钞，当面利诱说：讲出一个游击队员奖 100 元，讲出两个 500 元，讲出三个 1000 元，讲出剪电线的人奖 3000 元。但徐疤女一口咬定“真的不晓得”。日军见诱骗不行，立即凶相毕露，先用香烟头烧她的后颈窝，后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抽打。一个鬼子把她当胸抓往，撕开衣襟羞辱凌虐。已受重伤倒卧在地的徐疤女愤怒已极，站起身来狠狠回击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一记耳光。兽兵象豺狼一般咆哮起来，把她勒捆在一根柱子上，扒掉了衣服。徐疤女怒目圆睁，朝敌酋脸上狠吐了一口唾沫。日军小队队长象疯狗似地扑上前，拳脚交加，把她打得面颊紫肿，口吐鲜血。见她还不屈服，鬼子队长倏地抽出军刀，刀尖顶戳到她的乳头上，面目狰狞地威胁她说：“再不说出游击队和剪电线的人就割掉你的乳房”，徐疤女视死如归，依然不吐一字。僵持之中。汉奸伪保长昧着良心上前劝降，徐疤女愤然詈骂：“呸！不要脸的东西！贼骨头！”敌酋鬼叫一声，军刀横举，“嚓”的一声削下了一只乳房，徐疤女惨叫一声昏死过去，胸前碗大的创口鲜血直喷。在场的中国人大多转过脸去闭上了眼睛，个别日兵也把头扭到了一边，门外围听的乡亲中有人当场晕厥过去。徐疤女稍醒，口齿中挤出几个字：“强盗！畜牲！”日酋又一次举起森冷的屠刀，用刀尖指着她另一只乳房狂吠：“讲出了剪电线和游击队的人，就给你留下这只奶子”。疤女没有反应。鬼子们再次逼问时，徐疤女断断续续地说，“全、村、的、人，个个都是游击、队！全南昌的人都是！畜

牲，你们杀、不、尽！”敌人再问是谁剪的电线，已浑身是血的徐疤女拼命挣扎抬起头来，顽强地用尽全力喊出一句话：“我剪的，我！”日本强盗们厉厉狼牙咬得格格作响，明晃晃的东洋长刀再次举起，血光闪处，又一只乳房被齐根剃下，鲜血喷溅，徐疤女全身抽搐，扭曲蠕动，但一声不吭！在一个普通而又非凡的中国人面前，兽兵们一无所获，懊恼沮丧地抓住军刀，向那宁死不屈的血肉之躯捅去。那个鬼子队长还声嘶力竭地狂嚎：“真是铁打的，支那婆！”徐疤女的遭遇是她的亲孙子，曾任中共南昌市青云谱区徐家坊街道办事处书记徐金根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给我们讲述的。

在那暗无天日的七年沦陷时期，南昌中县共有 46423 人惨遭日军杀害，房屋被毁 75147 栋，财产损失约台当时货币 2314 亿元。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火，焚毁了华夏东南昌盛之地，也烧穿了从当时到今日企图为侵略行径辩护的一切谰言妄语。南昌方圆百里内数十处碧血白骨垒砌的碑冢，永不停息地向后人呼号着：“绝不能当亡国奴！”在炎黄子孙的眼里，早已刃残锋折的东洋长刀成为历史的一个惊叹号，向中国人标示着世代难忘的警醒和激励。国家衰败难免挨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今天，我们更需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更需要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努力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蒋伟）

血洗三灶岛

三灶岛是广东省珠海市百岛之冠，位于西江出口处，岛之南海面辽阔，水位很深，与万山群岛遥相呼应，又与南洋群岛相连系；岛之北尽属海滩，形成一个天然的海、空军供应基地。早在1927年和1934年，葡萄牙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就觊觎三灶岛，先后派兵登岛，插旗屯驻，构筑工事，均被三灶人民赶出岛外，今圣堂山改为“扯旗山”就是由此而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8月间，强占荷包、高栏各岛，欲将这些岛作为海、空军根据地。后因发现这里高山矗立，道路崎岖，地势不很适宜，遂改而觊觎三灶岛。12月4日，日军出动两架飞机，盘绕侦察三灶地形，翌早8时许，日军从高栏岛抽调军队400多人，分乘舰艇两艘，汽船10余只，直向岛南海面驶来，停泊莲塘湾一带。有一架敌机低飞向地面散发传单，假称登陆演习，要当地居民勿自惊忧，同时警告称：（一）日本“皇军”到乡，所有父老，应排列村口，两手高举，以示欢迎；（二）须将私藏刃枪利器缴出……等。当日军登陆进犯三灶时，百姓惊惶出遁，逃避不及者，女被奸，男被杀，残暴行为，所在皆有。但日军不谙地形而不敢深入岛内，只在莲塘附近各乡占驻，并修筑码头，企图久住。后因敌兵水土不服，多患足疾，即行撤返。

此次敌据该岛共24天，掠夺财物牲畜不计其数，连小刀门锁铁钉，都搜刮而去。1938年2月13日，中山县府派视察和救济委员周守愚，携带赈款衣物，到三灶莲塘上表各乡放赈。并视察形势，指定人员，准备今后防御方针。一方面召集乡民组织自卫力量，另一方面成立第七区社训大队，由公安局长蔡栋村兼任大队长，吴发为大队副，并配发枪支，集中训练，戍守沿海各处。

正当岛上组训民众，防御日军再度入侵时，汉奸汤聘臣卖国求荣，将这些防御措施向敌方密报。于是日军在2月17日正午12时，第二次出动4艘炮艇，满载敌军600多人，遁旧道驶抵莲塘湾登陆，先将五堡海岸线封锁，然后派出200多日军，窜入春园乡一带滋扰，占据雅塾乡碉楼并攻占公安局，将附近民房焚为平地。于是，孤悬海中的三灶岛，复又沦入日寇手中。

自从三灶岛首次惨遭日军蹂躏之后，一切均陷纷乱状态中。由于岛上武装力量准备未周，无力抵抗，岛民只得俟机杀敌。日军看到岛民有反抗情绪，当场残杀百姓十余名，许多妇女遭敌淫杀。两天后，日军又出动4艘运输舰，载有诚弹、杉木和货车4辆、东洋车巨余辆、自行车数十辆、摩托车4辆及被俘充苦役之我东北同胞400余人，开进岛内，登陆后即在田心乡前的新村仔盖搭木屋数十间，驻扎军队。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司令部，司令员是腾田中将，且配有陆战师、海军防御大队和空军师，设海军供应站和飞机场，配备军用船只20多艘（其中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2艘），飞机百多架。从此，三灶成为日军在华南海陆空军调度的基地。

日军登岛后，就立即加紧在海澄、田心与莲塘之间的村前构筑飞机场。其劳工除了在东北、台湾、朝鲜抓来的“猪仔兵”外，还迫令本岛各村征送20名壮丁服苦役，如稍有迟到，即惨施毒刑。3月27日，日寇竟以壮丁迟到为借口，派兵窜入月堂乡，以密集机枪扫射。被强迫服苦工的300名壮丁，每日自晨至晚，不停挑石挖土，而日寇只给白粥两餐，入夜又将壮丁囚集室内，历时一月。岛上工事、机场等全部竣工后，日军在机场四周开凿一条深约七八尺的小河，围以铁丝网，直通靠河之日军司令部，并筑一条公路直达

英表乡的炮台山，同时建筑油库、机坪、开挖山井、装置电话等。飞机场的地形是三面环山，东隅海滩，共占地 1800 多亩民田。建成机场后，日军每天都从这里出动飞机轰炸广州、佛山、石岐等地。当时中国军队还不知敌机是从何处飞来的，对其快速的突袭感到惊异。1938 年 5 月 4 日，中山县石岐镇的 7000 余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进行抗日救国的大游行。日军获悉情报后，于 5 时 25 分，从三灶派飞机飞到石岐长洲码头上空，狂轰滥炸，当场炸死 20 人，伤 33 人，这是敌机在石岐的一笔血债。

期间，日军又把三灶作为补充兵源的军事训练基地，在各地强拉壮丁集中岛上军训，其数每期均以千计。三灶岛是一个天然的海港，日寇企图久占，筹划将它建成一个象香港一样的国际贸易基地，他们毫不掩饰地把三灶岛改为“新长崎”埠，并开始将黑沙环、田心、下表、莲塘等改为日本的村名。

自从三灶沦陷后，岛民纷纷外逃，忍辱留在岛内的只剩下 5000 多人。日军知道当地民性倔强，为巩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采取怀柔政策，利用汉奸在岛上组织两个维持会；同时，在岛上办日语学校，对岛民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但是，三灶人民不屈外来的压迫，同仇敌忾，组织了多次突击行动，毁工事，剪电线、夺枪支、砍日寇，开展抗日斗争。当时从三灶岛转入内地的社训队和逃亡岛民，结集一批青年志士，潜返大小霖岛中，乘夜渡海袭击敌阵，经十数日的艰险斗争，夺得日军长短枪 40 多支，子弹 400 多箱，击毙 40 余人。

恼羞成怒的日军，派飞机 10 余架四处侦察，于 4 月 12 日上午开始疯狂报复。先在鱼堂、月堂、列圣等乡狂轰滥炸，焚烧屋宇数百间，惨杀我乡民百余人。下午再到北水乡投弹，全乡尽成焦土。次日，日军对全岛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他们派军队窜入月堂、鱼弄、雅塾等乡，强将我乡民 400 多人。囚禁于吴家祠内，并预先在祠前挖两个深横二丈的泥坑。至下午，谎称将被囚乡民，传集讯问，以麻绳捆绑，铁丝穿掌，5 人一串，10 人一排地全部押入泥坑内，随即在敌营天台上架起二挺机枪，丧心病狂地对准坑内扫射，被囚乡民，除了莫洪等 10 余人在乱枪下奋力逃出外，其余 386 人尽遭毒手。当时丁莫洪等人逃入山林中隐蔽时，看见日军搜索民房门榻，叠在尸堆上，浇上汽油焚烧，见者无不伤心惨目。下午 7 时，日军在全岛 80 多个村庄同时放火，共烧毁了 3264 间房屋，164 艘渔船。

14 日，日军又继续在岛上的草塘沙岗、莲塘沙栏、春园祠堂、石湾关帝庙、鱼林先锋坑、青湾等地实行大屠杀，遇难群众共有 2000 多人。日寇的法西斯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抓到男的用大棒活活地打死，抓到女的先强奸后砸死或戳死，抓到小孩投到水中淹死或抛到空中刺死。单春园祠堂，就有 60 多名妇女和小孩被日军杀害。15 日晨，日军潜到春花园、草堂、茅田、屋边、六灶、杭坑、横石基等乡又作更残酷的屠杀。汉奸李宏乐（伪维持会主席）奔走骗诱，将 400 多群众骗到莲塘乡的敌处杀害。事后认贼作父的李宏乐和汤聘臣也相继被日军以情报不周所杀，落得个可耻的下场。从此，十三乡连日烽火，岛上的妇女幼童惊避山林、石洞间，日军仍每日搜索，乱枪扫射。更有甚者，日军从海面抓了 60 多个渔民，押到莲塘湾沙滩，强迫他们挖沙坑自埋，当埋至颈项，日军刽子手就用大刀将一个个头颅横劈下来，其惨酷情形，裂人心肺。

日军血腥的镇压未能平息三灶人民的反抗，反而使三灶人民的复仇情绪更加高涨。6 月 16 日，逃难在外的三灶鱼弄乡民关少霖、袁定池等 11 人，

携带枪械暗渡回岛，突袭东咀敌营，杀死日军曹长等 12 人。7 月 17 日又实施第三次袭击，在木头涌敌营，挥刀杀死日军 5 名，伤 7 名，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经过日寇几天的大扫荡，全岛尸横遍野，断壁残垣，满目苍凉，虎口余生的群众纷纷离乡背井，向外逃生，而被日寇抓到的即押到海澄修建机场和到大霖矿山当苦役。据统计，沦陷前，全岛有 18 个乡，大小村庄 99 个，2716 户，12577 人，在日寇侵占三灶岛的 8 年间，被杀害同胞 2891 人，饿死 3500 多人，卖儿鬻女的 186 人，战后只剩下 914 户，6000 余人。1949 年，三灶人民为了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此一民族灾难，由华侨和港澳同胞集资捐款，收集骸骨，在茅田、鱼弄两地分别建造了二座“万人坟”和“千人坟”。其中万人坟牌坊对联写着“建斯坟纪斯迹聊以苦果死后魂饮敌血寝敌皮未能忘却生前恨”，横额写“万古英风”。

1979 年，三灶区人民政府对“万人坟”拨款重修，并迁坟于圣堂村竹沥之山坡，建墓碑、凉亭、牌坊等，格外庄严肃穆。牌坊上用黄油横书“悲恨长天”四个大字，两柱对联为：“日伪凶狂血洒人间千载愤，中华抗暴气贯山河万古存。”

（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何志毅）

下壟村“百人坑”惨案

日前，笔者走访了博罗县下壟村村民聂桂明和聂国泰。聂桂明是下壟村百人坑惨案的幸存者，聂国泰是下壟村死难者曾月桂的后裔。他们向笔者诉说了下壟村百人坑惨案的始末，愤怒控诉日本侵略军在下壟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1938年10月11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淡水、惠川、博罗，转眼间相继沦陷。自1938年10月16日，日军铁蹄踏进博罗城之日起，至12月13日日军退出博罗城之日止，在57天时间里，博罗城和附近村庄就被日军杀了200多人，约有数百间房屋被烧毁，被日军抢掠的东西有多少没有谁说得清。

更为残暴的是，日军一手策划的下壟村百人坑惨案。

一天，几名日军士兵窜到承良陂仙人井抢劫，在尤窝桥地段，遭当地抗日武装和村民袭击，当场将几名日军击毙，其中一名日军负伤逃走，死于归途中下壟村外桥边，日军以此为借口，要向下壟村报复。下壟村村民拖男带女逃难到天上园、莲湖、响水等山区，一个120多户、700来人的村庄，很快疏散一空。日寇三次围捕下壟村，却一无所获。日军指挥官便变换花招，施用诱捕的阴谋诡计。11月间，日军见下壟村民栽下的晚稻快熟了，村前村后的稻田呈现一片金黄，便以准许下田收割为饵，诱骗村民回村，在日军的诱骗下，村民们陆续回到村里，日军就把他们看管起来，还派出小分队进村搜捕，发现一个捉一个。

日军自村头至村尾地毯式进行搜捕，约搜了两个小时，全村被捉去的200多人，全部被押解到村头的地坪，集中用武装看管起来。还未押去云禾岭（被村民辟为晒场，地势较平坦，又叫平顶岭）集中屠杀之前，一位有良知的日本士兵，趁身旁的一位指挥官远离他之机，走到被捕村民聂德顺的跟前，随手拾了一根树枝，在地面用中文写了14个字：“你村的人供我日军当天射杀之用”。聂德顺一看到这几个字，知道中了日军的圈套，情不自禁对聂观祺等人大喊一声：“日军起祸心，大家赶快走。”站位紧挨树山的聂桂明、聂南庆、聂花仔、聂德顺、聂淑湖等人，见势不妙，乘日军疏于监视的一刹那，拔腿就跑。日军发现以后，拼命开枪扫射。这些村民闪身钻进树山，借助树林的掩护逃出了虎口，幸免于难。聂桂明他们逃离后，约过了几支烟功夫，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事后聂桂明他们得知，自他们逃走后不久，日军就着手屠村。数十名日本士兵一齐动手押解村民奔赴屠场，像赶鸭子一样，把捉到的上百名村民，一步一推押赴屠场，——云禾岭。待村民全部被押到屠场以后，日军指挥官把令旗一挥，刽子手就发疯似的开枪屠杀。下壟村无辜的村民，一个个应声倒下。顿时，整个云禾岭，鲜血滩滩，尸横遍地。屠杀之后，凶残的日军刽子手还不罢休，逐个查验。凡是未死者，就再补上一枪，或用刺刀捅死。大屠杀中只是被击中腿部的聂苏发，机警地躺在前面的低洼地，藏头露尾地隐藏在杂草丛中，并轻手轻脚地用毡帽遮往头。日军往他身上踢了一脚，见他没有动弹，以为他死了。他趁日军全部进村搬木料焚尸时，爬进了丛林逃脱。后来，他虽然医治好，却成了终生残废。落入日军魔掌的百多个村民，除了聂苏发、聂桂明等10个村民外，其余都被日军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并被日军用汽油和柴火烧成焦炭状。日军把捉到的村民杀光了还不算，还放火烧屋，全村300多间房屋全部被烧毁。聂国泰的母亲曾月桂和伯母，被活活烧死在屋里。日军这次大屠杀，前后长达好几个小时。事后

清点，一共被打死、杀死、烧死 108 名村民。

日军走后，人们在处理后事时，因遇难者的遗体全被烧焦，无法辨认，只好集中埋葬在一起。为了不忘记血的教训，人们称这里为下壑村百人坑。解放后，博罗县的文物部门还在这里立上碑坊。

日本侵略军一手策划的、骇人听闻的下壑村惨案，虽已成为历史，但这一历史悲剧，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一充满血泪的历史惨剧，我们永远不该遗忘，永远不能遗忘，决不能让惨案重演。

（中共博罗县委党史办供稿执笔人：李春水）

鹭岛悲歌

觊觎厦门已久

厦门，又称鹭岛，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是南中国著名的货物集散、华侨出入的天然良港。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又是维系台湾与大陆交往的主要口岸。

日本对厦门觊觎已久，早在 1874 年 3 月出兵侵犯台湾前后，就曾经派遣军舰以“借地操兵”为由，前来厦门刺探港湾地势，接着又派日轮到厦门海面测量水深，甚至派兵登陆，架设大炮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经秘密来过厦门，亲自策划侵占厦门。1894 年日本发动了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政府因这次战争的惨败而于次年 4 月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等给日本，使日本获得了南进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日本为了巩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增兵华南，进而实现其独霸东亚的野心，就加紧了对福建的侵略步伐。

抗战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在《对华作战的设想》中拟定：“必要时使用约一个师团的兵力。以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如需要可占领汕头。”

1936 年 6 月，日本政府派 10 艘军舰到厦门港口附近武装挑衅；同年 8 月 5 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大将高桥三吉率领大小军舰 76 艘、官兵 2.8 万余名，其中将校级军官达 1600 余人，从佐世保军港出发驶到厦门港口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此后，日本的“秋风”号等四艘驱逐舰，经常在厦门与汕头之间游弋，日本第五水雷舰队司令细萱、第三舰队司令及川、第五驱逐舰司令江户兵太郎等重要军事长官先后抵达厦门，窥探我闽粤防务，随时准备袭击厦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更加频繁。当时“厦门、汕头间日舰如穿梭”，8 月 3 日晨，日本驱逐舰“疾风”、“追雨”两舰，自台湾直抵厦门，“夕张”、“吴竹”两舰，则时来时去，飘忽不定”。1937 年 9 月 3 日，日本军舰在飞机的配合下，连续炮击、轰炸厦门、金门，驻守厦门屿仔尾炮台的国民党守军 175 师将士发炮还击，击中日舰“若竹号”，紧接着厦门港白石炮台的大炮也怒吼起来，日舰见势不妙，仓皇逃离厦门港口。但日寇贼心不死，对厦门空袭、炮击不断。仅 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 2 月，日舰炮击厦门就将近 30 次，日机空袭厦门 137 次，并派陆战队偷袭厦门多次。与此同时，还派遣大量日籍浪人到厦门，收买流氓土匪，到处骚扰。1937 年 10 月 26 日，与厦门唇齿相依、相距仅三千多米的金门岛沦陷，唇亡齿寒，厦门的局势更加紧张。

1938 年，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势力积极制造投降舆论，悲观消极的阴影笼罩重庆。在福建，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入侵的同时，加紧推行所谓“自治”运动，企图利用汉奸走狗策划福建“自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寇实行武力威逼和收买拉拢兼施的手段。5 月初，日本帝国主义派海军少将大野一郎率领的第 14 舰队运载陆海空军 3000 余人，偷偷向厦门进犯。5 月 9 日晚，正当厦门各界人民隆重举行纪念“五九”国耻火炬

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工人运动史》第 52 页，第 206 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第 270 页。

厦门大学出版社：《福建海防史》第 330 页。

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工人运动史》第 52 页，第 206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福建地方史》（下）第 827、920 页、917 页。

游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 20 余艘军舰已停泊在厦门东北方五通海面。10 日凌晨，日军陆战队分乘登陆艇向厦门郊区的浦口、何厝、泥金、凤头村齐头并进，强行登陆，30 多架日军飞机对厦门东北海岸的守军阵地反复轰炸，开始了对厦门的进攻。在飞机、军舰的狂轰滥炸和陆战队的疯狂扫荡下，日寇登上厦门岛并不断向厦门市纵深攻击，厦门军民浴血奋战四天，伤亡惨重，终因兵力悬殊，弹药不继，厦门岛于 1938 年 5 月 13 日沦陷。

日寇铁蹄践踏下的鹭岛

日本侵略者一登上厦门岛，就兽性大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郊区禾山一带，青壮年农民几乎被杀绝，被枪杀、活埋、烧死的民众达 500 余人；五通这个仅有 70 多人口的小村子，就有 24 人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弹下。其中有一个叫陈秀治的阿婆全家七口人死得十分凄惨，激烈的枪炮声吓得她全家人紧闭房门，不敢外出。枪声暂停了一段时间，阿婆想到外面看看动静，谁知刚一出门就被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倒在地上。她的丈夫和五个女儿急忙跑出来救她，这时，几个日本兵过来了，其中一人端着枪走到他们面前，用刺刀尖对着他们，命令他们跪下，然后走到一旁向几个同伴挥了一下手，几个兽兵狞笑着朝陈秀治老少七口人疯狂扫射，可怜一家人就这样无辜惨死在自己的家门前。在泥金村，兽兵见到妇女就抢，连 60 多岁的老太婆也被糟蹋。有一家四个儿子、三个媳妇全被活活刺死。日军进入曾厝垵时，借口搜查抗日分子，抓去男女村民 10 多人，押至曾厝垵港口一颗桃树底下，集中用机枪扫射，全部打死，全村的房子被烧成一片废墟。

在厦门港，渔港遭到空前的浩劫，沙坡尾、民族路一带渔民居住的船屋、铁板屋被烧毁或拆毁，来不及逃命的渔民，不是被烧死，便是被枪杀。

在梧屿岛，日本兵在一个山洞里发现避难的居民 23 人，便驱赶绑押到海滩上集体枪杀，暴尸海滩，惨不忍睹。

在市区，日本兵乘摩托车，车上架着机枪，沿途屠杀无辜百姓，碰到青壮年男子，见一个抓一个，分别押到宏汉路（今镇海路）、大生里、市警备司令部门口（今文化宫），令站成一列，然后用机枪扫射，死尸东倒西歪，不计其数。蓼花溪尾一带的居民听到枪声四起，知道日寇已来到，匆忙躲避到附近的一座古庙——万寿庙，但杀人杀红了眼的日寇追至古庙，把躲难的 30 多名男女，统统杀死；市区一批来不及撤退的义勇队队员和国民党官兵，被日寇逐至鹭江道的轮渡码头，用机关枪集体射死，推尸海中。全市壮丁无辜被杀戮者达 7000 人，有的人跳海逃生，日寇以机枪猛烈扫射，无人幸免。鼓浪屿与厦门岛之间的海面，一向因有自鹭嬉戏而被称为鹭江，此时却血浪翻滚，死尸漂浮，成为一片恐怖之海。

日军将抓到的妇女拘禁在中华戏院轮奸，轮奸至死及自杀者极多；日籍浪人助纣为虐到处抢掠，稍有拦阻，即行枪杀。市民们纷纷扶老携幼，渡海往对岸的鼓浪屿避难。日本侵略者则出动飞机，丧心病狂地扫射、轰炸难民，许多小船被炸翻，落水丧命者、断臂折足者，比比皆是。5 月 13 日，日寇登上鼓浪屿，借口鼓浪屿有大批抗日分子，派兵四处搜查，将被捕青年壮丁百余人杀害。海滨一带的兜仔尾、帆礁、提督路头、水仙宫、厦港等处的民房、工房被日军尽行烧毁。并拆卸石路街、大悲阁、瓮王等地方楼屋上千座。

日本侵略者在进犯厦门的过程中，大批文物古迹被摧毁：在中山公园内

镌刻有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纪念碑被毁；公园内宋代抗元民族英雄陈文龙祠被夷为平地；禾山五道宫旁记载南宋幼主在此登陆的“此地曾迎天子”的石碑及保存于鼓楼社的陆秀夫手书“官荣”石刻，均遭破坏。

根据救济总署沦陷区损失调查的不完全统计，厦门沦陷仅几天，民众死亡达一万人，烧毁房屋 7651 座，汽船 100 艘，民船 1260 艘，汽车 61 辆，公路被破坏 63 公里；根据福建省抗战损失调查团的不完全统计，仅 1938 年沦陷后的几个月中，厦门财产损失达国币 192.4 亿余元。

厦门原有 18 万多人口，由于大量惨遭杀戮和逃难外地，沦陷后岛内人口只剩 1.3 万余人。市区十室九空，街道七零八落，繁华的市区，变成满目萧条，一片荒凉。

“以华制华”的残暴统治

日本侵略者占领厦门后，采取了“以华制华”的毒辣手段，到处搜罗民族败类，建立汉奸政权，收买和利用一些甘心为日本侵略军卖命的日籍浪人作为其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蹂躏厦门人民的忠实走狗，这是它们统治厦门的一大特点。所谓浪人，即不务正业之人。这里所说的日籍浪人与上海等地的日本浪人是有区别的，它是专指加入日本籍的台湾不法之徒，虽拥有日本国籍，却来自台湾省；虽算是日本国民，却与厦门人使用同一种语言——闽南语，祖先大都是闽南人。20 世纪初，日籍浪人来厦仅 100 余人，至 20 年代已达 5000 余人。抗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大量派遣他们来厦门，从事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罪恶活动，后来日籍浪人数量激增，高达 1 万多人。

早期的日籍浪人来到厦门后，凭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权和势力，专门从事抢劫绑票、走私贩毒、赌博诈骗、放“日仔利”（即按日生息的高利贷）、逼良为娼、窝赃军火、刺探情报、斗殴火并、煽动暴乱等罪恶勾当。厦门沦陷后，他们与汪伪政权的地方官吏互相勾结，与伪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的侦缉人员狼狈为奸，残害厦门人民和进步人士。

同时，日籍浪人还在厦门开设了大量的烟馆、赌场和妓院，对厦门人民实施毒化政策，千方百计搜刮钱财，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日籍浪人林济川、陈长福、蔡培楚、陈裕乞是贩卖鸦片的四大巨头，他们创办的福裕鸦片公司制造的鸦片，最多时每月达万两，这些鸦片除在厦门销售外，还运到内地套取粮食，牟取暴利，厦门人民和内地人民都深受其害。据当时报刊揭露：“厦门烟馆多达 132 间，仅局口街至大同路即有 30 余间。”在厦门市，几乎“五家就有一家烟厠”、“十家必有一家娼寮”，“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一、二个赌场”，“全市乌烟瘴气，俨成人间地狱”在这些遍布市区的烟馆、赌场、娼寮中，规模最大的大千、兴南两个烟赌俱乐部，就是日籍浪人头子陈木春、林清埕等人开设的。赌窟里没有鸦片烟馆供人吸食，有餐室供人吃喝，还有一批被称为“女招待”的娼妓。可以说这些地方是集烟、酒、赌、嫖之

福建总工会工运研究室编：《福建工运史研究》第 72 至 75 页。

《厦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选编》（上）第 419、411 页。

《厦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选编》（上）第 419，411 页。

中国计划出版社：《闽南革命史》第 232 页。

《厦门日籍浪人记述》，载厦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1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福建地方史》（下）827、920、927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福建地方史》（下）827、920、927 页。

大成，而日籍浪人却将这些掠夺厦门人民钱财的罪恶巢穴，无耻地标榜为是“中日亲善”的表现。据不完全统计，仅“大千娱乐场”从1938年6月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七年多时间里，剥削厦门人民的资财就达200余万美元以上。

日籍浪人在厦门开设的妓馆，厦门人称为“台湾祠仔”，里面的妓女多数是台湾人，少数是本地人。这些台湾妓女大都受过特别训练，日本侵略者不但利用娼妓作为“摇钱树”，为其赚取外汇，还利用娼妓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日本领事经常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民情报告”，其情报的来源主要就是来自“台湾祠仔”。厦门沦陷期间，“台湾祠仔”盛极一时。厦门不少家庭因受尽日籍浪人“日仔利”、“十二支仔”、“小典”等高利贷残酷的盘剥，无法还清“阎王债”，而被迫将妻女卖到“台湾祠仔”。日籍浪人头子柯阔嘴、矮子木就是因惯于逼良为娼而臭名远扬的。当这些良家妇女被迫到“台湾祠仔”卖淫时，柯阔嘴、矮子木还要享受初夜权。至于被日籍浪人高利盘剥而沦为暗娼的良家妇女，就更不计其数了。

日籍浪人的魔爪也伸到郊区农村，他们秉承日寇旨意，以开办“农田实验地”、“海军农场”、“嘉禾果植公司”等为名，强行霸占禾山一带1200多亩的土地，垄断了禾山粮食、食盐、果蔬的专卖权。

对无辜农民，动辄以“抗日分子”、“不法分子”的罪名擅加捕杀；为了修建飞机场，他们强占高崎一带农田数千亩，夷平14个村庄，占用民宅数百幢。百姓无以为生，被逼卖儿卖女，乞讨漂流。在厦门沦陷期间，日伪当局向禾山强派苦役修工事、公路、码头，致使农民无力顾及农业生产，造成田园大量荒废。据统计，抗战前禾山耕地有4.2万亩，沦陷后的1940年减至2.0462万亩，粮食总产量从战前的24.22万市担，骤减至1939年的7.266万市担。1942年，日军粮食供应紧张，就规定农民所产粮食除自食外一律作为“征购粮”，但付给农民的粮款，却不及市价的1%。同时，日本侵略者在厦门市实行粮食配给制度。刚开始每人每月30市斤，儿童减半；随着日寇在各战场节节失败，美国海空军封锁海道，来粮告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月分配的粮食连续骤减为24斤、20斤、16斤、8斤。到1944年只剩2市斤掺杂发霉的碎米。而同一时期日本人每人每月却仍有24斤粮食，连日本狗每头每月也有12斤。由于粮食奇缺，米价暴涨，粒米珠价，大米从沦陷前的每市担6.40元，涨至沦陷末期的5.3万元，上涨8400多倍，同一时期食用油上涨1909倍，面粉上涨3678倍。平民百姓根本买不起大米，多数人只能靠煮食碎豆饼拌野菜、树叶、海苔来充饥，加上当时厦鼓两岛山岩尽秃，燃料奇缺，每斤柴价值好几元，居民只能吃米生不熟的野菜和食物。路上饿殍随处可见。

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和日籍浪人的助纣为虐，使厦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镇压人民的抗日行为，侵略者用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对付民众和抗日志士。据幸存者回忆，除常见的灌辣椒水、压老虎凳、坐电椅、吊打、

《厦门籍浪人记述》，载厦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页。）

《日伪时期厦门的粮食与民生》，载厦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77、78页。

《日伪时期厦门的粮食与民生》，载厦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第78、77页。

狼狗咬之外，有一种刑罚是让受刑者爬下，背上铺湿毛巾，用熨斗使劲压烫直至毛巾烫干，猛力揭去，受刑人的皮肉与毛巾一起被剥掉，痛得死去活来。有一种刑罚是把烧红的铁条放入受刑者口中，美其名为“吃雪茄”，受刑者终生成为残废人。还有一种刑罚是用细竹鞭打男人阳具，用竹签扎男女生殖器，手段下流而残忍。

凡破日籍浪人迫害或不幸被拘入日本警察本部的民众，绝少生还，无辜罹难者数千人。日本人对文化人的迫害尤为残酷，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乘机占领了公共租界鼓浪屿，将鼓浪屿60多名中小学教职员“全数予以拘捕”，该批被捕者除10余人因受毒刑已成残疾准予保释外，其余均被拘留在磐石炮台集中营中，“日供霉粥两碗，日夜拷问，刑死、病死、饿死，惨不忍闻。”更有甚者，许多人无端被日本侵略者强行注射毒针而变成哑巴。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入侵和残酷的血腥统治，国家仇、民族恨，更加激起了厦门人民的爱国情感和反侵略斗志，厦门人民奋起抵抗。抗战一爆发，在中共厦门工委的领导下，“厦门文化界救亡协会”、“鼓浪屿青年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总会厦门分会”、“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沦陷时期，厦门人民组成抗日团体，尤其是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厦门中国青年复土血魂团”共300多人，就是一支活跃在沦陷区与日本侵略者直接展开生死拼杀的战斗队，他们的英勇斗争令日寇心惊胆寒。血魂团的宗旨是“汉奸倭寇一日未除，则本团责任一日未尽”，除了散发传单、开展抗日宣传、警告汉奸等外，他们还在夜色的掩护下杀敌除奸，鼓舞人民的斗志。使媚敌亲日分子惴惴不安、不敢出门。

在血魂团不畏强暴、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精神感召下，厦门青年纷纷投入抗日斗争。由50名青年组成的“鹭江游击队”于1939年4月袭击吴仓敌军军营，缴获日军步枪5支，子弹380发。同年5月，又袭击何厝日军军营，击毙日军8名，缴获步枪6支，短枪2支，还炸毁了日军的防御工事。“青年恐怖团”、“抗日除奸团”等以青年为主的抗日组织，伺机打击敌人，使敌人有如惊弓之鸟。1941年10月，日寇华南情报部长、厦门全闽时报社社长泽重信被击毙于厦门大中路喜乐咖啡馆门口。1942年1月，鼓浪屿工务局日本警长忠山贞夫被击毙于康泰路。1942年1月，抗日群众组织袭击鼓浪屿工部局，击毙日军官兵百余人，接着又袭击禾山，击毁敌人炮台多处，斩杀日军官兵百余名。厦门工人阶级还用突然停电等办法对付日本侵略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满目疮痍的鹭岛经过厦门人民的艰苦整治，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解放后，勤劳的厦门人民把这座海上花园装点得更为妖娆，如今它已成为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令人瞩目的经济特区。但是，厦门人民遭受日本法西斯占领时期那地狱般的生活，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也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刘正英黄顺通）

福建省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福建工运史研究》第72至75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福建地方史》（下）第827、920、917页。

载《福建民报》1939年10月2日。

施暴滇缅路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上海，侵略魔爪直指南京，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由于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相继沦陷，中国抗战的国际补给线大部被切断。中国军民依托西南大后方，并经贵州、云南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互相支持。云南在西南边陲，当时，境内已有滇越铁路与国外联系相通。由于战争发展的需要，决定修筑滇缅公路，扩大与美、英等同盟国的联系。1938年8月31日，滇缅公路竣工通车，从昆明经保山到缅甸北部重镇腊戍，全长1146.1公里。滇缅路横贯云南境内的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德宏五个地州市的30余个县，成为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家联系的重要通道。同盟国援华物资大量通过滇缅路运进中国内地。据1939年11个月的统计，经滇缅路运入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质有17980吨；在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运入的物质达132193吨。1942年初，十万中国远征军也是经滇缅公路赴缅与日军作战。滇缅路在抗战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日本当局也注意到滇缅公路的战略地位。根据日军大本营“为完成征服中国，要进行彻底作战和完全封锁中国”的部署，日军开辟了东南亚战场。并派飞机大肆轰炸滇缅路。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切断了中越铁路。1942年4月28日，日军攻占缅甸腊戍，中国通往缅甸的国际交通被切断。日军攻占缅甸北部后，加速向中国云南推进。其56师团在松山佑三中将的指挥下，于1942年5月3日攻占云南边境重镇畹町和芒市，4日占龙陵县，10日占腾冲县，侵略魔爪伸入怒江西岸。怒江西岸3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数十万人民生活在日军的奴役之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云南各族人民世代都忘不了日军在滇缅公路沿线所犯下的种种暴行。

狂轰滥炸

日军带给滇缅路沿线各族群众最大的灾难便是空袭轰炸。1938年9月，滇缅公路刚一通车，28日，日军飞机便首次轰炸昆明。这天上午9时，9架日本轰炸机沉闷的隆隆声划破昆明上空，顷刻数十枚炸弹从天而降，全部落在居民区，炸死平民64人，炸伤26人。从此昆明市民“日避空袭数次，惶惶无宁日”。日军为彻底封锁滇缅公路，于1940年10月7日，成立“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由侵华日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大川内传七少将出任总指挥，调集100架飞机，以河内机场为基地，对滇缅路沿线村镇、桥梁实施毁灭性的轰炸。据统计，从1938年9月到1943年5月，这四年多的时间内，日机轰炸昆明达508次，炸死炸伤平民7154人，炸毁房屋29704间。日机轰炸昆明，出动飞机最多时达77架。最密集的时间是1940年10月到1941年8月。在这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日军出动336架次飞机，对昆明及城郊狂轰滥炸，炸死无辜居民861人，炸伤1442人。造成昆明民房、学校、机关、工厂、街道、娱乐场所等1万多间房屋被毁。

保山距昆明700公里，是滇缅公路上的重要城镇。地处澜沧江和怒江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有：“扼滇西之门户，居两江之要津”的誉称。1941年1月3日，日机9架从越南海防起飞来轰炸保山，于午后2点40分左右，飞到保山县城投下50枚炸弹，无辜平民猝不及防，120多人被炸死，128人被炸伤，529间房屋被毁。

1942年5月，缅甸沦陷，中国远征军失利，数以万计的难民沿滇缅公路潮水般涌来，充盈保山城的大街小巷。5月4日保山又逢集市，四乡八寨百

姓来赶集，肩挑车载，熙熙攘攘。上午 10 点，省立保山中学、县立保山中学和华侨中学师生 1000 余人在保岫公园举行“五·四”庆祝集会，发表抗日演说、朗诵诗歌、演出歌舞话剧，吸引了城内上千观众。集会后举行田径运动会。正在这时，日本轰炸机 27 架，排着三角队形突然出现在保山城上空。飞机隆隆的马达声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无人报警，加之城里传闻美国飞机将进驻保山城，人们都以为是美国飞机来到，毫无防备。只有运动场上一名教师认出飞机上的日机机徽，连忙呼唤学生隐蔽，但已为时过晚。日机在上空盘旋一周，低飞投弹。第一批重磅炸弹落在县城中心大街上的人群堆里。在炸弹的轰鸣声中，血肉横飞。人们一时之间被惊呆了。紧接着第二轮呼啸的炸弹又炸塌了附近多处民房，到处黑烟冲天，人们这才意识到祸从天降，慌乱地呼叫狂奔向城外逃散。日机仍不肯放过，追逐人群扫射。硝烟未散，人们惊魂未定，第二批 27 架日机再次轰炸。保岫公园运动场上未撤出的师生和观众被炸死 400 多人，其中有青年学生 100 多。省立保山中学校长段宝光及学生 30 多人被炸死；县立中学校舍中弹着火，130 多男女学生被炸死烧死，英语教师雷祖荫殉职；华侨中学 200 多师生伤亡过半，女生部 10 位女同学被活活烧死。城中居民有的全家死亡。5 月 5 日，日机再次轰炸，将来挖埋死人的民工炸死许多。

日机的轰炸，使一座历史悠久保山城成为焦土，90%的民房被毁，事后，据当时县政府统计：有主收尸者 2800 多人，无主收尸由县府发动四乡民工掩埋者 6000 多人，共计 8800 多人，还有房屋炸塌被埋在下面未挖出来的死者人数未统计出来。如果加上大量负伤者，那么 3 万多人口的保山镇死伤过半。五月的保山，炎炎似火，大量死尸腐烂，随后爆发恶性霍乱，以后疫情越出保山城，向四乡八区扩散，并沿滇缅公路蔓延至永平、下关、南华、楚雄、禄丰到昆明等地。据统计：全省 58 个县疫情严重，6 月到 7 月进入高峰，病死人口达近 10 万，仅保山地区就病死约 6 万人，龙陵 11000 多人死亡，滇西北的鹤庆县 12658 人病倒，7796 人死亡。随后，瘟神沿着滇缅公路蔓延辐射到全省各地，蔓延至四川、贵州、广西。爱国老人李根源哭吟：“滇西道上疫鬼哭”！飞机难躲、炸弹难防、瘟疫难逃。滇缅路上的灾难是日本侵略者造下的孽债。

烧杀抢掠

1942 年 5 月，日军侵占缅甸，5 月 3 日，日本侵略军 3000 多人闯入我国境内，沿滇缅公路烧杀，从畹町、遮放、芒市到达龙陵，5 月 4 日晚，日军在龙陵杀死平民 160 人，随后追杀到怒江西岸惠通桥下，数以万计的难民被追杀，500 辆汽车被截抢，5000 多员工难民被杀害。在 200 多公里滇缅公路上到处血迹斑斑，尸横遍地哭声震野。

从 1942 年 5 月到 1945 年 1 月，日军占领怒江西岸，滇西各族人民被蹂躏达两年零 8 个月。日军残暴至极，靠烧杀抢掠来维持其法西斯占领。

惨无人道，杀害俘虏和敢于反抗者及其亲属。1942 年 4 月 28 日，日军袭占缅甸腊戍。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日美两国开战。就在这一天，日本侵略者得悉美国飞机轰炸日本东京的消息，就拿中国人泄愤。他们将 50 多个被俘的中国远征军人“砸成了肉酱”。

1943 年端午节刚过，日军在龙陵县抓捕参与反对日本占领活动的余在海、张德周、赵金开、张小贵 4 人。对他们施行烙铁烫、棉球烧等酷刑后，于 7 月 20 日杀害，并将他们的头割下，悬挂在龙陵县镇安区小学门口示众。

不仅如此，日军还把余在海的母亲、妻子、儿子，张小贵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赵金开的弟媳和一个女儿等 8 人抓起来，于 21 日全部枪杀。

追杀难民。1942 年 5 月 18 日，300 多个从缅甸逃出的华侨和从腾冲逃出的平民，部分海关人员和家属，到达上江栗柴坝渡口待渡。19 日上午 11 时左右，70 多个日军在一个叫松田的军官带领下追到渡口，将难民包围，把男子全部捆绑，拉出难民中的妇女轮奸，沙滩上哭喊声撕肝裂胆，不甘受辱者，愤然跳江自尽。从腾冲逃出的 4 个女学生抱成一团跳入江中，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同孩子一起投江。日军发泄完兽行后，集体射杀难民，仅有几个华侨难民冒死冲出逃生。栗柴坝渡口尸积成堆，鲜血染红了半条江水。惨案传到内地，闻者无不痛绝。

焚烧村寨。怒江西岸地广人稀，零零落落的村寨没有多少，尽管如此，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期间，先后焚烧村寨达 100 多个。1943 年 3 月 12 日，日军驻盈江的部队到芒允镇焚烧 170 户，又奔袭太平街烧毁 250 户。粗略统计，被烧房屋，盈江县 297 间，潞西县 535 间，梁河县 889 间，陇川县 1500 间，莲山县 801 间，瑞丽县 843 间。日军第 56 师团 113 联队一部在龙陵县松山区纵火烧毁永兴、马鹿塘、三眼井、大垭口、小水沟、梅子村、黄家、水井、杞木寨、马黄水、大寨、大水平、小松林、油竹林、麦地等 16 个村庄。龙陵县先后被日军烧毁房屋 9000 多间。在腾冲，1943 年 2 月，驻腾冲的日军“扫荡”腾北，焚烧桥头、瓦甸、曲石、回街、腊幸、固东、碗窑、马站、小新街等村寨，使 1043 户人民无家可归，100 多人遭杀害。日军在腾冲保家、三联“扫荡”三天，抢走牛马 260 匹、粮食 42 万斤，杀害村民 137 人。日军先后在腾冲县烧毁房舍 5000 多间。1943 年 6 月，日军窜到泸水县蛮云街火烧民房 100 多间，使村民无处安身，逃进深山老林，避居于悬崖之下，靠采野果度日。1943 年 5 月，驻片马的日军“黑风队”袭击泸水县城鲁掌，焚烧房屋，并大肆屠杀。

残酷屠杀，手段残忍。1942 年 7 月 13 日，日寇从腾冲县两北的西山坝，分兵两路扫荡中和，杀死 39 人，和顺乡的刁长宝到中和串亲被抓，日军强迫他带路，到达目的地后，又叫他去找葱姜，葱姜找来后，日寇把他绑在大树上，用刺刀划开他的肚子，肠子流了一地，心肝被日寇掏出炒吃。1943 年 10 月中旬，片马日军“黑风队”在上江赖绒上排村，杀吃了傈僳族 68 岁的普几张扒和侄女光学玛，把吃剩的人头骷髅和人骨头放他家门口。日寇之毫无人性，一至于此，简直叫人难于置信。1942 年 11 月 28 日，驻龙陵黄草坝的日寇 300 多人，扑向湾塘、茄子山、老亮坡等村进行烧杀，抓无辜群众 250 多人，施以灌开水、勒脖子、火烤、活埋等酷刑。湾塘村 70 多岁的匡开文，背着他 90 多岁的老母躲到村后，被日寇抓获，日军将两人衣裤剥光，用稻草裹扎，泼上火油点上火，两位老人被烧得皮肉焦黑，筋骨收缩，惨不忍睹。腾冲中和乡的郭汝兴被日寇抓获绑在绷杆上，日寇每日用刀在他身上剜一片肉，将近一周才被剜死。在保家乡，日寇对老百姓施行一种非常恶毒的酷刑，把抓到的人捆实后，用刀挖出肛门的大肠头，把毛竹压低，将肠头拴在毛竹尖上，一放毛竹，人的肠子全被反弹力拉出。日寇的残暴确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日军还用灌开水、油炸、水煮、锯解、打气等手段残杀村民，被各种残暴手段杀害的腾冲民众有 6400 多人。龙陵松山 18 个村寨 245 户人家，209 户房屋全部焚毁，549 人被杀害，29 户人家被杀绝，龙陵全县先后被杀害和因战祸死亡的人也达 6800 多人。

残害少数民族同胞

怒江西岸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世居这里的有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阿昌族和彝族等。除腾冲、龙陵两县汉族居多外，其他泸水、潞西、畹町、瑞丽、陇川、盈汪、莲山、梁河等县主要是少数民族。日军侵占期间，大肆残害少数民族同胞，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仅德宏境内焚烧少数民族房屋达 4865 间，使 1 万多人无家可归。

畹町法波村傣族老人恩赛亲眼目睹了日军残杀傣族青年的罪行。日军占领畹町后，在法波村放置了一些汽油。一天，被日军拉去做苦力的傣族青年帅罕毛等 4 人，回村时路过汽油桶，日军说他们破坏，抓捕吊打，残忍地砍掉 4 个青年的手、脚，最后砍下头，将身子斩成两段。

勐卯土司街景泰生前回忆了他所见的日军暴行。日军侵占勐卯期间，强迫他学日语达两年之久，并把傣族青年 60 人强招训练，进行奴化教育。有一次，两个傣族青年被抓捕，借口是他俩偷了汽油，将他俩捆起来放在大火边烘烤，被活活烤死，成了人肉干巴。

1942 年 7 月一天，押运物资的日军路过潞西县勐目寨。日军士兵进入岩放家，叽哩呱啦又叫又嚷。岩放听不懂日军士兵讲什么，吓得不敢动。他家二儿子从田里做活回家，扛着锄头，见家里有日寇，吓得呆站在门口。日军见他扛着锄头，举枪射杀。又把岩放拖出去，枪杀在路边。

最令人憎恨的还有日军在占领区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凌辱。日军占领芒市后，专门修建地下通道，强拉傣族姑娘奸淫。经常到附近的风平、芒波、项允、那目、芒里等寨子里奸淫妇女。有的妇女受辱后或变疯、或自杀。一次，十多个日军士兵窜到芒市允门寨，挨家逐户抓妇女，拖到一家牛圈楼上轮奸。

1943 年 10 月中旬，占领片马的日军窜到上江赖茂村，抓捕了在赖茂河边岩洞避难的傈僳族农民杨启周和汉族农民周洪顺两家。日军用刺刀逼着周洪顺奸污他的亲生女儿，杨启周对日军的残忍行为怒不可遏，拔刀相拼，被日军刺死。

日本军国主义在云南西部肆无忌惮的兽行，写下了日本历史中丑恶恐怖的一页，千里滇缅公路是这种可耻的历史的见证。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魏先忠、杨新旗）

日式集中营——留置场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占领山西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治安肃正”，尤其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以后，日军为了达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进行了一系列“强化治安”活动。他们除了构筑据点，控制交通枢纽，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外，还实行灭绝人性的“囚笼”政策，进行惨无人道的狂杀滥捕。

1940年8月以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所属第一军驻阳泉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为了加强对八路军太行革命根据地二分区的控制，实行了密如珠网的“格子网”政策，并派号称“华北六大特务之一”的宪兵队伍长，杀人魔王清水利一到昔阳，配合驻军第12独立步兵大队，开展了“治安强化试验县”计划。

清水利一到了昔阳后，大肆推行“三光”政策，杀害大批当地抗日干部和革命群众。竭尽其所制造和扩大“无人区”，同时主持策划成立了活动范围包括昔（阳）东、昔（阳）西、平定、和顺、寿阳、辽县（左权）的特务机构“晋东部”和“政治部”等，并在所属各乡（镇）派驻“警察署”。他组建起宪兵队、警备队，收买、纠集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治安团、灭共队等爪牙组织，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武装机构和组织。清水利一在大规模修筑、加固据点的同时，建起了关押“政治犯人”的场所——留置场。

留置场——独特的监狱

“留置场”，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建造的法西斯集中营，人称人间“活地狱”。抗战期间，日军在昔阳县城，沾尚、东冶头、夙居、三都以及和顺县的马坊等据点内都设立了这种留置场。仅昔阳县就先后有4000多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在这里惨遭杀害，致伤致残者无数。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用心恶毒，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一个留置场可关押600余人，最多时关押1000余人。其建筑物就是把原有的房子、窑洞的门窗全部用砖石封死，形成一所所囚笼；还有一种囚笼是就着土崖，挖进去高1米，宽2米，长5米多的长洞，然后用石头封住洞口。这些囚笼都是在靠近底部的地方留一个只能让一人爬入的小口，日夜插着铁插，用铁锁锁着。囚笼顶部留有透气孔，用石板盖着，除每天定时搬开透一次风外，里面暗无天日，昼夜不分。更有甚者的是一种形如民间的菜窖、旱井的地牢，地面是一米见方的口子，地下的结构有的似地洞，有的形状似葫芦，上小下大。深3米多，底部能容十多人。人一旦被囚下去，就根本无法爬上来，如同蛙落井底一般，再没有复出的一天。

留置场关押的“犯人”分三种：第一种是民兵、革命群众、无辜百姓以及伪职人员中的“不稳定分子”，这类人占大多数。第二种是地方上的商人和富有者。第三种是抗日干部、八路军战士等相对重要的人物，这一种占少数，但日军专门为他们配有特殊的审讯室。这里是敌人施行各种残酷刑罚，发泄淫威的试验场所。

非人的生活

留置场，就象阎王殿，被抓进去的人十有八九会被害死在其中。被关押的人，除每天放出一次透风外，吃饭、睡觉、拉屎、撒尿都在里面。空气污浊，憋气闷人，加上被关的人大都经过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腐烂腥臭味更熏人。一些刚被抓进去的人，一闻到这恶臭味立即会被熏得晕倒。身体虚弱者，进入这种留置场多则十余天，少则五六天就会毙命，单因为这混浊的空气每天就有十几个人死去。到了夏天，情形更惨了，发病率高，苍蝇、蚊子、

臭虫等在里面四处叮咬，瘟疫便流行起来，死的人就更多。

留置场的生活，每人每天只有6两粗粮。除去汉奸、看守的克扣、剥夺，留下的不过一二两。甚至连续几天不给吃饭。即使有吃的也是一把玉米豆，加水煮成半熟，掺上土糠搅拌一下，犹如猪狗食。人们吃饭没有碗，只能用手捧着吃，幸运的人会得到一个罐头盒或破锅片。尽管食物酸臭，吃下去就想吐，但还是得勉强吃下去。人们饿得实在忍受不过，就撕吃衣服，咬鞋帮。有的人精神错乱，变得疯狂。

那些被关的商人和富有者，要比他们好一点。敌人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其钱财，谁能交出赎金或粮食、财物，就可以被“保释”。

抓进留置场的女人们，被单独关在一处房子里。等待她们的是另一种悲惨命运。除没吃没喝外，白天被押出来干杂役活，晚上又被抓去训话、毒打，或是被当作发泄兽欲的工具轮奸。有时会被一群日伪军围在中间，把她们的衣服剥光，迫她们跳裸体舞或被推来搡去，胡抓乱摸，任意侮辱。稍有反抗就会被枪杀刀刺，火烧水淹。

侵华日军在留置场犯下的累累罪恶，铁证如山。据南郝峪村的幸存者刘华回忆说：

我从1941年3月初被关进沾尚据点的留置场后，在一个多月内就看到日军又抓进去3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酷刑中先后死去，有90多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被活埋掉。紫坪村的受害者李进昌回忆说：我于1941年8月29日（农历七月七日）被关进马坊留置场，和我一起被抓的还有14个，中途跑了一个。当时留置场内已挤满了人，可日军硬是拳打脚踢，用棍棒顶住我往里推。一进洞里，漆黑一片。只听见“唉呀！压死人啦！”的喊叫声，随后就被反涌过来的人压到了下面。当下就有几个人被压死、压伤。农历七月，天气闷热，死去的人没办法往出抬。活着的人就象装进个罐头里的鱼，上蒸笼蒸着的鸡一样，无法忍受。人贴人，人挤人，好多人的皮肤都烂了。洞里稍有一点安静，蚊蝇就爬到身上吸血、吸脓、吸汗水。长岗村的肖二孩就是被日军用开水烫得全身都是血水泡，最后被蚊蝇虫蛆叮咬而死的。

有些从留置场侥幸出来的人，由于被百般折磨，有的染上瘟疫，有的致伤致残无条件医治，加上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因此很少有人活下来。

留置场，骇人听闻的刑罚

留置场，以其杀人如麻和众多酷刑而闻名太行。当地老百姓一听到“留置场”三个字，就会毛骨悚然，心惊胆颤。至今老人们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

受害者刘华回忆说：

我被关时，亲眼见到有人被木棍打得皮开肉绽，接着又用开水慢慢从头上浇下来，烫得全身都是血泡，最后被推进留置场。有一个人的锁骨被铁钩勾起吊在树上，再用锯子锯他的腿骨。这人声嘶力竭惨叫不绝。随后日军又把椅子、凳子挂在他身上，锁骨处伤口裂开，流血不止……还有一个人被脱光后，日本兵把他绑在木架上，两腿分开，用烧红的铁丝从他的阴茎孔中刺进去，这人惨叫着晕了过去，残忍的日军还不罢休，又用烧红的火柱往他的肛门里穿，这人全身痉挛着渐渐停止了呼吸。

我也被日军拉出去绑在木桩上，用来练习枪法。几个日本兵边议论着什么边端起枪向我射击。我的头部感到一下猛烈的撞击后，就昏了过去。当痛醒时，感到头上在不住地流着血。

昔阳县三都乡西峪村刘九生老人回忆：

在震惊太行的西峪惨案中，即 1940 年 11 月 18 日（农历十月十九日），清水利一及其宪兵残酷杀害了全村 386 人。最后把活着的 27 人（20 名男子、7 名女人）抓到县城 3 号留置场里，进行各种折磨。

一个名叫白守林的被用小细绳子捆住双手大拇指吊起来，让他说出谁是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他一声不吭，日本兵就用木棍、水蘸麻绳、皮鞭一齐抽打。打得他全身是伤后又用开水从脖子向下浇，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北方的冬季来得早，数九寒天更是刺骨的冷。有一天日伪抓来 4 个人，说是要给他们“换脑筋”。于是把他们的衣裤脱光，强迫他们在院子里转圈跑。日伪军还不时间他们冷不冷，如果说冷，辟头盖脸一顿巴掌后再跑。如果说热，就把他们推到南墙根下，躺到冰地上用凉水往身上浇，然后再追问，继而让他们轮番举凳子，说是要“让他们多出些汗”。西峪村的人被赶出来观看，许多人都目不忍睹，谁不看日伪军就举棍子打。

在狱中的 42 天中，西峪村的 27 人只有 12 人（6 男、6 女）活着出来。

有一名抗日干部，被日本兵用棍棒打得体无完肤，日本兵仍不罢休，又将他仰面绑到长凳上动弹不得。再用一个特制的大漏斗往他嘴里灌大桶凉水，直到把肚子撑得鼓胀起来。然后再把凳子翻过来，使他面朝下爬到地上，20 多个日军穿着大皮鞋在凳子上跳来跳去，直到把他肚子中的水挤出来。如此往复几次后，他被折磨得七窍流血而死。

有的则被架到弯成弓形的树枝上，然后突然松开手，树枝强大的弹性把人象箭一样抛向空中，远远地摔在地上的石渣里。十有九死。

1942 年秋，马坊留置场已关满抗日军民，日伪就把抓来的 600 余人露天围在山坡上，谁逃跑就被机枪扫死。朱峪沟青年张扣妮，以“共党分子”罪名被抓出来，先将他的生殖器割下来塞进他嘴里，然后开膛剥肚，把心挖出来让杀人魔王清水利一吃掉；大汉奸李文魁步其后尘煮吃了他的肺。有 18 名无辜群众被以“通匪”罪名押送到沾尚留置场，被日军当作活靶来练枪刺致死。

此外，日本侵略者对抗日军民的酷刑还有：“吃红枣”（即把烧红的炭块塞进人嘴里）、“戴亮帽”（即把烧红的火圈套在人头上）、“蒸饺子”（即把人倒吊起来，将头压进开水锅里煮）、“坐东洋车”（即让人光着屁股坐到烧红的铁锹上）、“坐飞机”（即把人的双臂倒吊起来，在脖子和四肢上挂些大石块）、“压蛤蟆”（即把人头垫高，漏斗插入口中，将冷水灌入肚子。再用杠子压肚子，把水挤出来）、“坐莲花盆”（即把筛子吊起，里面栽满针刺，把“犯人”脱光衣服放进去后来回拉筛）、“接葡萄”（即挖掉人的眼睛）、“点洋腊”（也叫“点天灯”，即在人头顶或背上放油后点着）等等 40 余种举不胜举，罄竹难书。

在漫长的 8 年中，日本法西斯在留置场中残害抗日军民数以万计。惨痛的历史是永远不会被中国人民遗忘的！

（王敏政王敬山赵江波王彬兰）

花峪惨案

1940年，日本侵略军对冀东西部盘山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施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残暴手段，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企图以此摧垮盘山抗日根据地。位于盘山东侧的花峪，是个四面环山，地形隐蔽的村落，全村70口人，群众基础好，是冀东八路军十二团、十三团体整、驻扎的堡垒村。花峪被日伪军划为“无人区”，先后六次遭到焚毁洗劫，村里几乎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但村里群众不畏强暴，在被焚毁的家园上，一次次地搭起窝棚，在极为严酷的条件下，配合八路军指战员顽强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1941年1月21日，日伪军又一次到花峪“扫荡”，遭到八路军十三团的沉重打击，日伪军被打死多人。五天后，驻平谷县独乐河据点的日伪军纠集其他据点的日伪军共400余人，疯狂报复，对花峪村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花峪惨案”。

是年1月26日，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年关在即，逃出村子躲避日军“扫荡”的群众已陆续返回村里。天刚蒙蒙亮，村北山坡上，十几个青壮年正慢慢地把一口薄板棺材放入墓坑。死者是村民刘子珍的哥哥，是头一天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这时，冷不丁地不知是谁喊了声“瞧，鬼子！”人们抬头一看，只见不远处的山梁上日伪军黑压压一片正朝村子涌来，刺刀亮晃晃地闪着寒光。刘子珍等人顾不上埋土，撒腿就跑。刘子珍一口气跑到家里，急促地让父亲和家人赶紧外出躲避。丧子之痛使刘子珍的父亲心情十分沉重，他流着眼泪对刘子珍说：“你们几个年轻力壮的走吧，我们上年纪的看家。”在父亲的催促下，刘子珍背起筐，假作拾柴禾出了家门。这时日伪军已经闯到村口。刘子珍不顾身后日伪军的喊叫，快步跑出村子，在村西一条山沟里藏了起来。

日伪军进村了。村里立时乱成一团。妇女们抱着吓得哇哇哭叫的孩子，搀着步履蹒跚的老人凑到村里一处被烧得只剩下四壁的几间破房里，为的是人多能壮点儿胆儿。这几间破房子是惨案幸存者刘国仁的家。当时刘国仁只有七八岁。据他回忆，当时几十个端着刺刀的日伪军把几间破房子团团围住。一个个面目狰狞，满脸杀气。接着，其他日伪军挨家搜人，把没能逃脱的十名青壮年抓住，押往北山梁拷问。

刘国仁的叔叔刘长江没能走脱，混在妇女和孩子中间，几个日本兵恶狠狠地把他拽了出来，逼问他八路军的下落，刘长江回答：“不知道。”日伪军抡起枪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刘长江咬紧牙关，仍是回答：“不知道”。接着豺狼成性的侵略者又把刘国仁的六叔刘长青押到这儿。日伪军知道他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把他吊到房椽上，残酷拷打。棍子噼噼啪啪雨点般地打在刘长江身上，功夫不大，刘长江凄厉的惨叫渐渐微弱下来。这时，日伪军驱赶着妇女、老人和孩子，连同刘长江一起，到了村子里的空场上。离开刘国仁家时，日本兵把刘长江挑死在院子里。

村子街中的空场上。十几名在北山梁遭拷问的青壮年也被押到这儿。日伪军把村民们团团围住，空场四周架起了机枪，村民们望着这群持枪的野兽，预感到一场灾难将要降临。

严刑拷打丝毫没能使花峪村的群众屈服，穷凶极恶的日伪军举起了屠刀。他们先把村办事员刘广元拉出，头朝下吊在一棵枣树上，在刘广元身下堆起了柴禾。柴禾被点着了，火舌吞噬着刘广元，衣服、头发很快被烧着，皮肉被烧得吱吱作响，刘广元拼尽气力怒骂这帮强盗。突然，绳子被烧断，

刘广元栽落在火堆上，他猛地从烈火中窜出来，带着满身火焰向前冲去，没跑多远，便被一群手持刺刀的日伪军围住。一个日军小队队长嚎叫着挥起战刀向刘广元砍去，刘广元的头滚落地上，被日军小队队长上前一脚踢进火堆。接着他们又把刘广元的尸体扔进火里。

日本兵再次扑向人群，他们把刘子珍的爷爷拽了出来。四个日本兵分别拽住老人的手脚，架到火上烧。老人在烈焰中痛苦地挣扎着，日本兵却发出阵阵狂笑，然后一齐松开手，将老人扔进火堆活活烧死。刘子珍的曾祖父刘祥已年近90岁，被日军从人群中拉了出来。残暴的日本兵抡起棍棒把老人打倒在地。刘祥老人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一个日本兵举起棍棒朝老人的脑袋恶狠狠地打去，刘祥被打得脑浆迸溢，当场毙命。

恶魔又一次扑向人群。刘国仁的三爷刘永高被几个日本兵摁到在空场上，灭绝人性的日本兵架起耕地用的犁，然后将铁犁头插向刘永亮的心口窝儿，“呀”，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鲜血从刘永亮的胸口喷了出来。日本兵仍不罢手，用力把犁往前拽，刘永亮的胸膛被犁开，五脏流了一地。刘国仁的二奶奶已经70多岁了，两个日本兵用绳子绑好套儿，套在老太太脖子上来回拽，将老人活活勒死。

惨剧令人不忍目睹。场上十几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青壮年恨不得和日本鬼子拼了，但是被绳子牢牢地捆绑着。接着，恶狼般的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呲牙咧嘴地朝着青壮年一步步逼了过来。随着日本兵的声声嚎叫，刘长福、刘长江、刘永朋等10余名青壮年先后被刺死。

寒风凛冽。空场西头几间破房子的墙跟下，妇女们把吓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们紧紧地护在身边。上午9点多钟，日军又把魔爪伸向了妇女儿童。他们以开会为名，将30多名妇女和孩子往房子里赶。几间破房子外堆满了干柴。有几名妇女拼死从门口往外冲，当场就被刺死。日军把妇女儿童逼进房子后，四面围住，然后把成捆的干柴点燃向民子里扔，一时浓烟滚滚，烈焰冲天。年轻的妇女们一边怒骂这群日本强盗，一边往外闯，又有几人被刺死在门口。刘国仁后来讲述当时亲眼所见的情形说：“张海亭的媳妇从火海中冲了出去，没跑出多远，被日本兵追上一刀刺死，日本兵在她的尸体上点燃柴禾焚烧。我姐姐当年13岁，性情刚烈，她不顾身上多处被火烧着，一边骂着一边从屋里地上捡起石块向外面的日军砸去，后来被日伪军用点燃的柴禾捆砸倒活活烧死。”

刘子方和刘子会当时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俩全身被火烧着，本想扒开土炕钻进去，可一时又扒不开，就一齐从屋里冲出去，被外面的日军用棍子打倒，抬着扔进火堆。他俩带着满身的火从火堆中冲出来。日军追赶刘子会，在后面打了两枪没打着，一个日军小队队长手持战刀追上去，挥刀砍向刘子会。刘子会一头栽倒在一块石头旁，悲惨地死去。刘子方趁日军追赶刘子会，跑进自家房内钻进墙柜，得以幸免于难。但是全身都破烧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此时，房里的火越烧越大。刘国仁在浓烟烈火中四处乱撞，头磕破了，满身都是火。突然发现地上有个倭瓜，就用脚踩开往身上脸上蹭。后来他发现门旮旯是个死角，柴禾扔不到那里，就爬了过去。他见刘子珍过门儿刚几天的老嫚不顾自己身上的火。忍着伤痛给几个孩子脱下着火的棉衣，使他们能躲到门旮旯侥幸逃生，而她自己却被烧死。当时这个旮旯里藏了9个小孩。刘国仁爬到门旮旯不大会儿，就见刘子珍的奶奶头顶着个洗脸盆，全身都起了火。挣扎着在地上爬，爬到门旮旯就再也爬不动了，突然墙上的土坯块儿

稀里哗啦地直往下掉，门旮旯的墙被掏了个洞。原来外面的日伪军发现门旮旯是死角，知道里面藏着人，便用刺刀在墙上掏洞，想要斩尽杀绝。洞越掏越大，正这时，集合的哨声响了，日伪军匆忙中向洞里打了几枪便撤走了。结果刘广明身上中了两枪，没打中要害，幸存下来。

午后，逃出村的刘子珍从山沟里摸回村了。刘子珍讲述惨案后目睹的情景时说：“进村不远，就看见村中空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具尸体。我跑过去，见我爸爸、老叔、兄弟都躺在血泊中。我爸爸、兄弟身上都被刺了七八刀，早已气绝身亡。我老叔身上也中了数刀，但还有一口气。他看见我，拉着我的手哭了，他说饿，让我给他做点饭吃。我回到家，在一片瓦砾中，找到一块较大的破锅片，捧起一把没完全烧透的小米，给老叔熬了点粥。我把粥给老叔灌下去，可是又从他胸部的伤口中混着血流了出来，人很快就死了。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刘国仁的爸爸，就上前询问我妈她们的下落，这位同族的爷爷指了指场西边的破房子，忍不住哭出声来。我走到那里，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只见房门口尸体堆得有半人高，尸体都被烧着了，蓝色的火苗窜起足有一人高，地上流着一层人油，屋内东一具西一具都是烧得焦黑的尸体，有的烧焦了头，有的烧焦了四肢。20多具尸体根本无法辨认是谁家的亲人。在这些遇害者当中，有我的奶奶、妈妈、婶子和媳妇。我强忍着悲痛。在破房子门后找找到了6岁的妹妹和本家一个6岁的弟弟。两个孩子赤裸着身子，连吓带冻瑟瑟发抖。我把他俩抱回家，用两条破褥子将他们裹起来。由于担心日本鬼子再回来，顾不上掩埋遇害的亲人，便带着弟弟妹妹投奔县城附近大刀剪村的亲戚家。过了些天，风声不那么紧了，我才带着弟弟妹妹回家，安葬了遇害的亲人。这次惨案仅我一家就有八位亲人被日本鬼子杀害。”

花峪惨案中，全村50余名未逃脱的群众，惨遭杀害者38人，受重伤者11人。

转年秋天，八路军十三团在蓟县下营镇洪水庄村附近包围并全歼了独乐河据点一个小队30多个日本鬼子，这些制造花峪惨案的刽子手得到了应得的下场，人民子弟兵为花峪的乡亲们报了仇。

（天津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杨福臣于健）

血染青山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长沙作战》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1941年9月，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平野支队。“于17日16时在海军舰艇第一遣华舰队司令官小松辉久中将的护卫下，从城陵矶出发，经洞庭湖向湘江方面开始进击。……于18日4时50分在下青山强行敌前登陆……10时30分扫荡了全岛”。

这个被日军平野支队强行登陆并扫荡的小岛——青山，是南洞庭湖中的一个岛屿，现在属于湘阴县浩河区青山乡。严格他说，青山实际上是由2个相邻、并未截然分开的岛屿组成：北端的叫青山，地形狭长，南北约3公里，分上山、中山、下山三段，彼此没有天然界限；南端的叫严家山，距青山约1公里。两岛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岛上所谓的山，只不过是略高于滩涂的几座小山包而已！不过，由于这个湖中小岛，距湘江、资江二水的入湖口均不远，是处于循洞庭湖水路进入湘、资二水的咽喉要地，故而成了日军“扫荡”的目标。而平野支队的这一次“扫荡”竟在这个当时只有1700余名居民和不列500名中国守军的小岛上，集体屠杀了800名中国军民，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1年9月18日凌晨，为了配合日军在湘北发起的第2次长沙会战，平野支队500多人乘一艘登陆艇和40多只汽艇，在海军舰艇的护卫下，包围了青山。他们登陆后，在3辆坦克的掩护下自北向南横扫，守岛的第九十九军一九七师的一个营，在日军的猛烈进攻面前，不到半天时间即被打垮，除了严家山守军一个排仍在坚守抵抗外，日军占领了青山全岛。一场灾难立即降到青山人民头

在三圣庙前的稻田里，300多名当地百姓和200多名守军俘虏，被日军用绳子绑着，用铁丝穿着，一排排密密麻麻地站立着，他们的周围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前面的小山坡上架着几挺机枪，后面，是浩瀚的洞庭湖，插着太阳旗的舰船往来游弋。下午2点钟，随着日军指挥官的一声令下，数挺机枪吐出火舌，稻田中的人一排排地倒下，不一会，就血流成河，500多生命惨死在血泊之中。残忍的日军仍不放手，还逐个在尸堆中踩、踢，发现仍在蠕动、呻吟的，又补上一刀……

稻田的水都变成了血水，泥都染成了红色，血肉模糊的尸体一个挨一个，惨不忍睹。天快黑了，3名中弹未死者在尸堆中渐渐苏醒，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不巧又被日军哨兵听见，于是，一群兽兵扑过来，从尸堆中翻寻出2个幸存者，一阵乱枪打死。只剩下张子仁的妻子这一唯一的幸存者，躲过了此劫，夜深时才拖着伤残的身子，偷偷爬出了死尸堆。

三圣庙前的大屠杀震惊了岛上居民，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日本法西斯这种征服欲望下的恐怖手段，随着19日凌晨严家山阵地的失守，守军抵抗枪声的最后停息，人们更为恐惧，他们纷纷出逃、躲避。然而，四面环水的自然环境，逃走谈何容易！虽说是名叫青山，其实只有几个光秃的沙丘、几个荷塘、几条水沟及儿片竹林，藏身也难。于是，年轻人只好白天潜入芦苇荡中，在水里泡上一天，到晚上才偷偷地回家弄点吃的；老幼妇女就只能在附近就地藏匿。然而，许多人还是未能逃脱。

三圣庙前的集体大屠杀后，日军继续在岛上四处搜索，行凶杀人。

周家嘴一个人工挖凿的小洞中，一群妇孺老人挤着躲在里面，不幸被日

军发现了。对付这一洞的老幼妇女，日军先是用棉絮、门板泥土三层堵住洞口，然后扔进毒气弹，将洞口封死，将洞中的人全部毒死。事后，人们从这个洞中清理出 24 具尸体，有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抱在母亲怀里的婴儿，他们就象睡着了似的一个挨一个屈身坐在洞的两侧。但他们却永远醒不来了。

一伙日军从一个洞中抓出来 29 个老百姓，要把他们带走。12 岁的张竹松跟在被抓的父亲身后，边哭边喊。父亲不愿儿子跟他一起遭难，泣不成声地对他说：“孩子，别哭！，回去吧，爸爸会回来的！”然而，他的爸爸没有回来，两天后，日军将这 20 多人全部屠杀了。因天气炎热，这些遇难者的尸体很快腐烂，当后来张竹松在尸堆中寻找自己父亲的尸首时，竟无法辨认，他哭得死去活来，最后他记起祖母曾说过他父亲的裤带一头是黑的，一头是白的，这才辨认出自己的父亲。张竹松从此成了孤儿。

两个被打散了的守军士兵，满以为放下武器即可保全性命，他们向两个日军士兵投降。然而，日军对放下武器的俘虏也不放过，他们押着两个守军士兵来到一个小山坡上，命令守军士兵用随身携带的军用铁锹挖了一个坑，然后逼迫守军士兵躺在自己挖好的坑中。日本兵随即往守军士兵身上填土，当两个守军士兵意识到将要被活埋时，已经来不及了，日本兵用刀刺伤了他们，接着铲上将挣扎呻吟的两个守军士兵活活埋掉了……

日军，人性已经完全丧失，他们丧心病狂用世上最野蛮的毒刑对中国人民实行灭绝人性的暴行：

肖茂生的不满 1 岁的孩子被日兵抛向空中，接着用刺刀尖接住活活挑死；而肖培胜的不满 1 岁的哥哥被日兵用刺刀刺入肛门，抓住两条腿撕成了两块。

一个日兵强奸了一位姓黄的孕妇后，竟剖开孕妇肚子，取出胎儿抛置路旁；一伙日兵轮奸了一位女青年后，竟持刀威逼一个村民再行奸污，他们则围观取乐。

驻岛守军营长刘儒卿被俘后，日军将其先剥皮后火焚折磨至死的。

青年农民肖胜文，被抓后作为“苦力”，受尽虐待。他无法忍受，一天身藏菜刀，准备在僻静处伏杀日兵未遂，日兵将其杀害后，剖尸挖出内脏，然后用树枝撑开肚皮，吊在树上示众。

面对侵略者的屠刀，面对疯狂的杀戮，青山人民恨之入骨。一些守军官兵及普通百姓，抱着“置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与日军进行搏斗。

一位姓高的排长孤身一人持一挺机枪在上山与敌人周旋，打死数名日兵，直至子弹打尽，被日军俘获后壮烈牺牲。

青年农民易志明被日军抓去当“苦力”。一天，一名日军军官令他打热水洗澡，他趁其脱去衣服之机，提着一桶开水迎头泼去，直烫得那军官鬼哭狼嚎，全身起泡，眼睛烫瞎。

农民王吉生被日兵抓去带路，他巧妙地带着日兵走进地雷圈，与 3 个日军同归于尽……

这些反抗和斗争是英勇的，它反映了青山人民在不甘为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是，势单力薄的少数守军官兵和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毕竟难与全副武装、占据优势的日军相抗衡，阻止不了日军在青山的烧、杀、淫、掳。短短的 18 天时间，日军在青山横行肆虐，杀死无辜百姓 524 人、守军官兵 300 多人；烧毁房屋 280 多间；宰杀耕牛 43 头、猪 550 余头；破坏和抢走渔船 70 余艘；奸淫妇女多人，抢走财物不计其数。青山人民

为此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无尽的灾难。胡复兴、周继初等 24 户村民被斩尽杀绝；胡寿清一家 10 口被杀了 9 个，黄跃文一家 8 口被杀了 7 个……许青梅一家 9 人，被杀得只剩她一个。

后来，青山人民在三圣庙前建起的“死难军民的纪念碑”，在周家嘴敌人用毒气杀人的地方建起的“纪念洞”，告诉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这血海深仇！

（中共湖南省委党支部刘建平）

四次洗劫惠州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先后向中国的华北大举进犯，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之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到华南。从1938年10月开始，日本侵略军先后四次侵占惠州、博罗。日军占据惠州、博罗期间，大肆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罄竹难书。据概略估计，屠杀居民5000多人；城内民房数度被焚，几成废墟；受害民众数以万计。

1938年10月上旬，日军在台湾集结陆军两个师团，海军两支舰队共大小舰艇30余艘，各种飞机60余架，合共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后藤中将指挥向南海进犯。其先头主力舰艇于10月9日14时从澎湖马公岛启航，11日下午5时抵达大亚湾口外的虎头门洋面上。12日凌晨，日军在强烈炮火的掩护下，分别在大亚湾的霞涌墟、岩前港、盐灶背南岸、玻璃厂北面海岸等地登陆。中国守军一五一师罗懋勋团的一个营，与登陆之敌接战，因众寡悬殊，伤亡重大而退出沿海阵地。日军第十八师团右翼部队。步兵五十六联队，独立机枪第三大队、山炮兵第一——联队登陆后，12日傍晚进入通湖墟以北地区；左翼部队步兵——四联队、独立机枪第二大队、野炮兵第十二联队在岩前登陆后，向淡水进逼。13日占领淡水，随即侵占永湖、镇隆、陈江，对惠州形成包围之势。

10月14日，日军由冷水坑、陈江分两路进攻惠州，抵达城郊。这时，中国守军一五一师师直部队、四五一旅何联芳部，凭借飞鹅岭附近的大、小挂榜山堡垒抵抗，激战数小时。因受日军炮火及飞机猛烈轰击，伤亡惨重，纷纷向博罗方向溃退。所有重兵器、车辆等尽落敌手。由平潭方向进攻惠州的日军，于15日7时攻占惠州东侧的县城。16日，日军派出兵力进占博罗。惠州、博罗第一次陷入日军之手。

各路日军进入惠州城后，大肆烧杀。首先纵火焚烧惠州城区最繁华的水东路店铺，继则在其它街道纵火，大火十余天不熄，城内街道店铺、民房被焚毁、成为一片废墟。据不完全统计，仅商店被焚毁就达200多间，损失资产200多万元。日军进入惠州后，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看见妇女则施暴强奸，不论是六七十岁的老妇，还是十二三岁的幼女，一旦落入日军之手，无一幸免。12月7日，日军退出惠州时将连结惠州东、西两城的唯一桥梁东新桥也炸毁了。

同期占据博罗的日军，同样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杀死70多名留城看家的老人，全城90%的民居、商店被焚毁，财物、牲畜被抢劫一空。此外，日军在博罗城郊的塑下村杀害村民100多人，制造了“百人大惨案”。白礼村被杀害5人，百足岭被杀害10多人，水西被杀害30多人，鸡麻地、三徐、何岭、仙人井各村，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烧杀和抢掠。

日军撤出惠州后，仍然占据博罗、东莞及增城一部分乡镇，并常常派出队伍对乡村进行骚扰和掠夺，或杀人，或放火，使民众惶恐不安，居无宁日。日军还接连不断地从广州派出飞机，轰炸惠州、博罗等地。一次，日机对东江江面停泊的木船，先用机枪扫射，继而低空投弹轰炸，江面上运载煤油的木船中弹着火，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停泊于油船附近的木船也顷刻起火，化为灰烬。有一次，日军飞机偷袭惠州，居民急于逃避，进入水东路西门口处的意大利天主教会开设的若瑟医院，人们认为若瑟医院瓦面上挂有意大利国旗，日机不会轰炸。岂料日机见人群涌入这座楼下，旋即投下一颗重型炸弹，医院被炸毁，避难者200多人全部伤亡。又一次，日机投弹轰炸水东路

尾西门口，炸毁商店十余间，数十名居民被炸死炸伤。

1941年5月初，日军出动第十八、三十八师团各一部，以大包围的战术进攻惠州、博罗，企图歼灭中国守军独立第九旅。日军兵分三路，一路经石龙沿东江而上；一路由东莞樟木头绕道而出；一 189189 路从博罗至岭头渡江，形成对惠州的合围态势。5月9日，日军分别派出飞机侦察、扫射轰炸独九旅各部前沿阵地，又派汽艇巡逻东江惠博江面。然后，陆军分别向博罗城、沿惠樟公路陈江以至飞鹅岭高地攻击独九旅六二七团；又由淡水、永湖直下，以袭击西枝江之线，围攻独九旅六二五团。担任正面对敌作战任务的六二七团，与日军战至5月11日，撤出惠州，向梁化、大岚方向转移。日军遂第二次侵占惠州。

日军此次侵占惠州，因居民事先已疏散躲避于山地乡村，日军进入城内一无所获，因此便扑向乡村搜捕抢掠，在蓬瀛村屠杀居民和城中逃难者达400多人。日军于5月14日撤退。当天早晨他们出动数百人，各携燃火工具，分别到水东路、塘下、打石街（今中山西）、万石路（今中山南）等处，纵火焚烧房屋。一时，府、县两城一片火海，市区房屋80%被焚毁，成为废墟。此外，西湖周围的栖禅寺、永福寺、元妙观等名胜古迹也被焚毁。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之后，获悉香港居民陆续向惠州一线转移，独九旅也重新集结于惠州、博罗一带。于是，日军策划第三次进犯惠州，1941年2月3日，日军酒井部中川联队，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沿惠樟公路进犯惠州。设防于飞鹅岭和挂榜山的独九旅，待日军进至半径乡牛峡坳时，即奋起反击，日军联队长被击毙。日军老羞成怒，遂于次日调兵遣将，对独九旅进行疯狂的反扑。独九旅因孤立无援，于当晚10时撤出阵地。惠州第三次陷于日军之手。

日军进城后，进行疯狂报复，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军见中国人便屠杀，连白发老人、占卜算命盲人也不放过。“屠杀三日，尸骸遍地，血水满城；尸体最多者，在淡水码头晒布场，水门仔各处，计约千人之多，大多数被砍去头颅”。全城数千居民惨遭杀害。水门沙下、埔头、五眼桥、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南津牛颈岭等地成了日军集体屠杀市民的场所。在埔头和叶屋巷口惨杀200多人，在南津牛颈岭杀死300多人，在五眼桥河边活埋近百人，而用汽车拉出城郊残杀者不计其数。尤为惨烈的是在沙下这一地方，日军将抓来的市民600多人，用铁丝穿掌穿肩，连成一排排，押至西枝江边（今水运公司门口），一个一个地用刺刀捅死。愤起反抗者，则被刺死后推下西枝江。据估计，这次惠州城区遭杀害的人数达3000多人。

1945年1月，日军侵占韶关各地之后，为防止盟军在华南沿海登陆。在沿海地区增兵一个师团，重新占据沿海地区各重要据点。在东江地区的日军分两路夺取惠（州）博（罗）。一路由深圳入侵惠州，另一路在大亚湾、澳头再次登陆，侵占淡水、惠州。

由于经过前三次沦陷的蹂躏和残害，民众早已有准备，绝大多数人都逃居乡村或山地，所剩无几的财物也早已转移匿藏。日军入城后，采用“怀柔”、“以华治华”的政策，收罗汉奸，组织“维持会”，派出伪县长，设立伪政权和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并开设赌博公司、鸦片烟公司、彩票公司、出口货物附加征收处及妓院等。对民众进行残害和剥削。日本驻扎期间，随意捕人，

严刑审讯，肆意屠杀，企图扑灭人民抗日的火焰。日军这次侵占惠州、博罗等地，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从 1938 年 10 月到 1945 年 1 月，日本侵略者四次侵占惠州、博罗，屠杀中国人民，抢掠人民财物，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是任何笔墨都难以完全记录下来的。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悲惨的历史。

（中共广东惠州市党史办公室何焕昌）

血满厂窖河

1943年5月9日至11日，日本侵略军入侵洞庭湖滨的时候，在南县的厂窖地区也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血案：3000多名日军，血腥屠杀我无辜同胞3万余人（其中本地居民7000多人，附近地区居民6000余人，外地难民12000多人，国民党溃兵5000余人），打伤3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焚烧船只2500多艘。大劫过后，断墙残垣，枯树焦土，遍地尸首，满河血腥。听不到婴儿的啼哭，也听不见鸡犬的鸣叫，连掩埋尸体的人都很难找到，留下的是血水河、千人坑、绝户堤……

这就是50多年前日本法西斯铁蹄入侵中国后在湖南境内制造的最大惨案——厂窖惨案。

水陆空军事合围

厂窖，位于烟波浩淼的洞庭湖西北岸、南县的两南角上，原名汉太垸，属汉寿县辖，1955年划归南县，总面积50平方公里。100多年前，这里还是汪洋一片，水草繁衍，鱼虾栖息。后来由于泥沙淤积，逐渐形成了这块洲土。这个由13个小垸组成的湖洲大垸，沟港纵横，土地肥沃，盛产稻谷、棉花、苕麻、湘莲、鱼，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它三面临水，水路交通畅达，为扼洞庭湖西北水路的要冲。

提起厂窖惨案，还得从日军发动的“江南歼灭战”说起。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黔驴技穷的日本侵略军，为了掠夺滨湖物资，充实给养，歼灭驻防洞庭湖西北地区的中国部队，进而威胁常德、长沙，给国民党重庆政府造成更大的军事压力，达到以战诱和的目的。继3月发动的江北歼灭战之后，又于5月集结重兵，发动了江南歼灭战。厂窖惨案就发生在这个战役的过程中。

5月5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七旅、户田支队、小柴支队、针谷支队等部15000余人，自荆江南岸沿线据点出发，兵分几路向华容、安乡、南县等地水陆并进，开始了江南歼灭战的第一期作战。

面对日军的猖狂来犯，驻防这一地区的国民党第73军等3个军、1个师的10多万兵力，发起了江南阻击战，后来战斗失利，华容、安乡、南县相继陷敌。

为了摆脱日军的追击堵截，国民党部队，向西、向南方向撤退。地扼洞庭湖西北水路交通要冲的厂窖大垸，成了国民党军两撤的重要通道。

5月7日，从南县、华容、安乡一带撤下阵来的国民党第73军主力一万余人奉命向厂窖方向撤退，随军而来的还有沦陷区的两万多难民。他们准备经厂窖西渡汉春的西港，前往常德等地区。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抵达厂窖一带之际，日军已从水陆空三方面完成了对厂窖的合围。

5月8日，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七旅为主力，出动3000多人，汽艇60多艘，兵分多股气势汹汹向厂窖地区水陆并进。陆路两股日军，分别从南县、安乡出动，直抵厂窖大垸东、北各堤垸；水路两股日军，分别自岳阳港湖北太平口启航，进逼厂窖垸外的东西两侧水域，封锁水上交通和淤澧洪道各渡口，截断国民党军和难民西撤的退路。与此同时，数十架日本飞机从汉口、当阳等地起飞，分批窜至厂窖上空轮番轰炸，配合地面部队的合围。

是时，云集在厂窖地区的一万余名国民党官兵和两万多名随军难民，加上本地的1.5万名居民，除少数突围逃出外，绝大多数被日军合围在这个东西宽10多华里、南北长20多华里的陀螺形“口袋”中。日本侵略军就在这

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进一村，杀一村，抢一村，烧一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河里，燃烧着的船只，浓烟滚滚；岸上，各处村庄农舍火光熊熊。

永固垸尸骨累累

位于厂窖大垸中心地带的永固垸（即现在的新春村所在地），是个仅有六七平方公里的小垸子。

5月8日下午，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不堪。听说日本鬼子沿东西河道向厂窖地区来了，住在东堤一线的上千名村民、外地难民和一小部分丢枪弃甲的国民党溃兵，都以为永固垸离河道较远比较安全，便纷纷朝这里逃命。

5月9日清早，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日军从东堤一线搜索着向永固垸这边扑来。不一会儿，永固垸被围得水泄不通。一边是日军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一边则是手无寸铁的同胞呼爹唤娘的哭喊声。杀红了眼的日军，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抓，抓到就杀。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将抓获的群众，一串一串捆绑起来，驱赶到各个禾场上，集中进行屠杀。

在戴吉禄禾场上，日军把120多名群众五花大绑地捆起来，四周架起机枪，用刺刀逼迫人们成排地跪下，要他们交出国民党溃兵和枪支，见无人作声，便恼羞成怒，大开杀戒。只听见日军发出的一阵阵“呀呀”嚎叫声和“扑哧，扑哧”的刀尖刺肉声，120多名男女同胞除3人生还处，统统倒在了血泊中。整个禾场上，血流成渠，惨不忍睹。

类似这样的集体屠杀，还有永固垸里的袁国清屋场70多人，肖吉成屋场约100人、罗菊东藕塘40多人、王锡坤麻地20多人82岁的幸存者肖明生老人悲愤地谈起日军杀害他家24个亲人的往事：“我家住在临近汀浹洲不很远的永固垸，四代同堂，共有29口人。1943年5月9日午后，突然枪声由远到近，一阵紧一阵，敌机低空盘旋，嗡嗡怪叫，紧接着，10多个日本鬼子如狼似虎从北面直朝我家冲来，瞬间我父亲肖美和、叔父肖桂生和两个堂伯伯、一个哥哥、一个姐夫、一个侄儿共7人躲避不及，都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在我家同时被杀死的，还有4个难民。我另一个哥哥也被杀了两刀，虽然未死，但流了好多的血。

“次日上午，我家死难的亲人还未来得及掩埋，魔鬼又入村作乱了。当时，全家还剩下22人，除我和大哥及侄儿外逃，其余的都呆在家里。那时，老祖母已80多岁，侄儿侄女小的只有岁把，女的又占了一大半。鬼子窜入我家，见几乎尽是女性，兽性大作，但遭到拼命反抗。鬼子老羞成怒，将我祖母、母亲等18人押到附近一口深水塘边，连成一串推入水中。入水后，鬼子还用竹篙、土块仆打，直至淹死为止。后来，只有那抱在手上没被捆绑的小侄女毛毛，侥幸爬上了浮在水面的尸体，才得救。至此。我家先后惨遭鬼子杀害的共达24人之多。我自己因全家遭此横祸，疯癫了近一年。”

在日军的疯狂杀戮下，永固垸里尸横遍地，被杀村民、难民1500多人。外地难民，尸首无人认领，只得由当地幸存者挖坑集体掩埋，一个墓坑被埋无名尸首上千具。至今留下了白骨累累的“千人坑”遗址。

甸安河血水横流

与在永固大垸屠杀无辜的同时，日军在厂窖大垸西部的德福垸一带也举起了罪恶的屠刀。

总面积4000多亩的德福垸（包括现在的德福、汉新两个村），是南县通

往汉寿、常德的必经之地。垵子西头，有一条贯通南北、长约5华里，宽200公尺的甸安哑河，是阻隔东西交通的一道天然深堑。当日军合击厂窖时，几千名国民党溃兵和大批难民逃到了这里。他们本来是想经此穿过澧水、奔往汉寿的，可是日军已抢先把这一带包围了。

5月9日早晨，日军出动数架飞机在这一带上空盘旋侦察，飞得很低很慢，转上几圈便开始投弹扫射，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早饭后，1000多名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张牙舞爪直奔德福垵而来，走在前头的是日军的马队，紧随其后的是步兵。

云集在甸安河以东各个村落里的数千名的国民党官兵、难民，前有哑河挡道，后有步步逼近的追兵，欲进不得，欲退不能。日军的包围圈越压越小，人们东躲西藏。

在包围圈里，凶残的日军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甸安河边，3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在身处绝境下，被迫跳进了甸安河中，结果不是被日军的机枪扫射而死，就是被飞机轰炸而死，几乎无一生还。日军随后又对剩下的人进行大搜捕。他们不放过一个屋场，一块庄稼地，反反复复地搜，把抓到的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用绳子一个个串起来，集中到甸安河边的几个禾场上。然后，日军展开了残酷的杀人大竞赛，看谁在同样的时间杀死的人多。就这样，数千同胞的生命在魔鬼的竞赛中化为了冤魂。

日军在李正生禾场一次就杀害无辜百姓80多人。厂窖镇供销社退休职工郭鹿平老人是这次屠杀中的唯一幸存者，他回忆当时惨景时说：“李正生夫妇是专搞迷信活动的人，他们声称已求得菩萨保佑，只要躲到他家，日本鬼子就不敢来杀人。愚昧善良的村民信以为真，纷纷来到李家躲难。我父亲带着我和表哥也躲在那里。9日那天下午，日军一个小分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李家，杀死了端坐在神龛正中的李正生夫妇，接着将躲在这里的100多人统统赶到一块空地上，剥光衣服，用绳子捆住手，连成了串进行砍杀，我父亲、表哥在第一串，杀得最惨。我躲在床底下的一条沟里，听到外面乱哄哄的，怕日本鬼子来烧屋，只好出来，但一出来就被逮住了，并把我串在第三排的末尾，好在他们没有脱掉我的旧棉衣。第一排、第二排的纷纷倒下，这时，只见刺刀向我捅来了，我已经麻木了，但隐隐约约感到捅了好几刀，立刻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苏醒过来。强烈的求生欲驱使我拼尽全力解开拴在手上的绳子，爬到不远处的一块田里。在那里躲了三天三晚，后被人发现才保住了这条命。”郭老的前胸、右肋、背部留下的6个刀眼，至今赫然在目。

在日军的连日屠杀下，德福垵一带被杀的国民党溃兵、难民和本地居民多达4000人。甸安河边的田里土里、房前屋后、河中岸边，到处是尸体。昔日清澈的甸安河水，被鲜血染得通红，特别是一场暴雨过后，岸上的尸体被冲入河中，北风一吹，又将尸体吹集到甸安河南端，塞满了一里多长的河道。尸体腐烂后，臭气熏天，几里之外还可闻到。从此当地人不再叫它甸安河，而叫它“血水河”。并且流传着这么一首民谣：

“甸安河，甸安河，尸体挤得个挨个；五里长河成血海，野狗无桥可通过。”

这正是甸安河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

瓦连堤人间地狱

瓦连堤是横贯厂窖大垵东西、长约7华里的大间堤，堤上居住着几百户

农家，5月10日在日军的血洗下，变成了屋毁人亡的废墟。

日军在永固垵、德福垵滥手无辜的消息传到瓦连堤后，堤上的居民和外逃来的几千名难民，觉得坐着等死不是个办法，便纷纷逃往沿堤一线的沟港、草丛和庄稼地里藏身。

5月10日这天，天刚蒙蒙亮，大批日军沿着东两两线向瓦连堤扑来。看到多数家庭关门闭户，顿时兽性大发。一部分跑到各家各户，桶开大门，翻箱倒匣，抢劫一空，然后一把火将房屋烧掉。霎时，堤上烈火熊熊，一栋栋房屋在大火中倒塌。另有大股日军，跑到堤线两侧的田野港汊上，梳篦式地进行大搜捕，见人就杀，一个不漏。

杨凤山屋场的巷口里，60多个避难同胞躲在这里。正当大家挤作一团不知所措时，一队穷凶极恶的日军出现了。日军迅速在巷外架起机关枪，10多个平端着上刺刀的枪的鬼子冲进巷里来。生死关头，几个大胆的青壮年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起来，都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日军又对剩下的人下毒手了，先是把30多个男人逐个捆绑，连成一串，赶进一口深水塘中全部淹死，又把20多个妇女赶进一所民房，逐个轮奸后，活活烧死。农民毕成举的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被日军抛入了熊熊烈火中。

瓦连堤西端的风车拐，方园不足半公里，被杀同胞700多人。幸存者王长生回忆说：“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风车拐，仅两天时间，他们就将这里及其邻近地区糟踏成一片血泊世界。挨近风车拐南边的莲子湖，300多名同胞全被赶进湖里活活淹死。在风车拐的堤面、堤坡上被杀的有200多人。汤二秀屋台上也被杀了100多人。我家附近有个4岁的小孩，鬼子用刺刀捅进他的肛门，再用绳索将他绞杀。风车拐共28户人家，被杀绝的，就有13户。我躲在蚕豆地里，日军发现了我，对我刺了5刀，不知流了多少血，终归捡了一条命。”

日军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了刺刀刺、机枪扫、飞机炸、马刀砍外，还有剖腹、割舌、挖眼、取胆汁、分尸、剜耳、割奶、敲脑浆等等。家住瓦连堤东端全成村的幸存者刘银生谈到了他所知道的几桩血淋淋的事实：农民陈腊九被日军抓到后，被绑在树上拷打，打得奄奄一息后又被尖刀剖开肚子惨死。农民汪宏奎，年过60，耳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便用刀将他的舌头与下颚割掉，使其巨痛几天后死去。一个性周的农民，被日军剁了好几刀，通身抹上盐，再用坛子在其身上乱滚，周身被磨得皮开肉绽惨死。两个难民被日军绑在树上，先用刺刀剖开肚子，取出胆囊，再用小瓶汲取胆汁“珍藏”起来。农民贾运生被日军抓住后，因想逃跑，日军竟用刺刀捅进贾的耳朵，来回刺戳，至死方休。……

这桩桩事实，真是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然而，受害最深最惨的还是我妇女同胞。日本鬼子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他们见妇女就强奸，小到八九岁的童女，老至70多岁的老妪，概莫能免。整个厂窖地区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多达2500多人，仅瓦连堤上就有67名。

提起日军奸淫妇女的兽行，瓦连堤一带的亲历者们无不切齿痛恨。

厂窖镇肖家湾村村民吴桂清回忆他的所见所闻时说道：“当时我才10岁，亲眼目睹了鬼子在瓦连堤上奸淫妇女的情景。一位20来岁的姑娘躲在一个涵管里头，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把她拉出涵管，扯掉衣裤进行侮辱。这姑娘拼命反抗，鬼子便对她下毒手。先将她的手捆住，倒插在水沟烂泥中，然后扳开双腿，举起东洋刀从姑娘的阴部使劲劈下去，变成了两块，真惨哟！”

还有一个 15 岁的少女，与家人躲在自家屋后竹坡的土坑里。4 个鬼子发现后，先用刺刀捅死她的父亲、母亲和妹妹，然后对她进行轮奸，奸完就用东洋刀剜掉了她的两块屁股肉，并在全身捅了 14 刀，最后丢进了水沟。78 岁的黄凤英老人也诉说了她亲眼目睹的几桩事：一位 70 多岁姓帅的老婆婆，两个儿子被日军抓住枪杀时，拼命跑过去呼救。几个鬼子狞笑着把她推翻在地，轮流强奸，奸后用刺刀从阴道处刺进腹部，老婆婆就这样惨死了。青年妇女熊桂元，被三名日本鬼子反复轮奸后，当场流血而死，死后还不放过，日军竟用一个酒瓶插入阴部，收尸的时候，只见她全身浮肿，面目全非。一名未婚女子，相继被 13 名鬼子轮奸，昏迷之后，鬼子用糠灰搅入她的阴部，再插入刺刀。

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日本法西斯，简直丧尽天良，当地百姓骂他们是比四脚兽更凶恶的“两脚兽”。

经过日军残酷的烧杀淫掠，瓦连堤上变成了一片焦土，到处都是惨死同胞的尸体，到处都是被大火焚毁后的残墙断壁。事后统计，瓦连堤一带被杀死烧死及奸淫致死的无辜群众有 3000 多人，其中 73 户被杀绝，330 多间房屋化为了灰烬。昨天还是炊烟袅袅的 7 里长堤，顷刻间变成阴森森凄惨惨的人间地狱。

厂窖河尸断水流

当陆路上的日军在厂窖垸里疯狂烧杀的时候，水路上的日军也在厂窖河中干着同样的勾当。三天之内，日军在北起太白洲，南至龚家港的厂窖东西两侧河段中，屠戮船民、难民 6800 多人，烧毁船只 2500 余艘。

三面临水的厂窖大垸，水上交通发达。就在日军合击厂窖的前两天，大批逃难的船只，包括不少的下江船、本地的乌蓬船、渔船和帆船，有的从左边湖北的太平口经安乡沿澧水而下，有的从右边藕池河驶来，纷纷涌向厂窖大垸两侧大河里。这些载有近万名逃难群众和大批粮食、布匹的船只本打算向常德、益阳等安全河港驶去的，没料到，却陷入了全副武装的日军汽艇包围圈中。几天前还是风平浪静的河面，顿时乌云四起，恶浪滔天，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无辜船民难民的身上。

5 月 9 日清晨起，日军沿河炸船、烧船。先是飞机轰炸，继而武装汽艇沿河窜扰，来回追捕，逼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沿岸一线停靠下来。

他们先是上船搜索，掳掠财物，继而放火烧船。只见河中火光冲天，大火昼夜不熄。船民、难民哀嚎之声不绝于耳，数里可闻。

厂窖大垸东南部的龚家港河段，是藕池河中支下游横穿澧澧洪道、西洞庭湖的通道，也是国民党军后撤的主要水路。日军堵住两头入湖河口后，上千条船只塞满了河面。日军的大烧杀首先从这里开始，结果连船带人烧个精光。

厂窖港女船民陈腊梅在当年的惨案中不仅被日本鬼子弄得船毁家破，而且目睹了日本鬼子在厂窖港一带烧杀的惨景。她说：“日本电子糟塌厂窖那年，我 30 岁，全家 4 口，以驾船为生。5 月 9 日吃完早饭不久，水上的电子乘着汽艇沿藕池河中支下边的茅草街开上来了，同时，天上鬼子的飞机象老鹰一样盯着厂窖打圈圈。那班黑良心的鬼子真是疯狂得很，他们用步枪、机枪猛烈地扫射，枪子象雨点一样飞来，天上的飞机则不时丢下一串串炸弹，到处狂轰滥炸。这时厂窖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船只。我们水上船民，以船为家，船就是命根子。鬼子来了，大都舍不得抛开船逃命，不少人躲到船尾梢，吊住舵把子余入水中，只留张嘴巴在水面呼吸。结果不是被炸死、烧死，就

是被淹死。厂窖港里上千的难民、船民，大多数与船同归于尽。后来，这一带的水面上，各种奇形怪状的尸体，浮满一港，连横渡船过渡也得用篙子拨开死尸才过得去。我婆母和公爹就是被鬼子杀死的，我家停靠在厂窖港的4只船也被烧得精光。讲起这些，我心里就恨，这个恨到死也忘不了。”

日军对船民的屠杀，与陆地上一样的残忍。在汀渎洲一带，日军汽艇堵住湖口子后，将船上的船民、难民赶到附近河洲上，把人们三、五十人为一群，用绳索连串捆绑起来，再将绳子首端拴在汽艇后面，开足马力，把这一串串的人拖入河中淹死。在玉成堤上的河洲上，日军将捉住的30多个船民，用一根10来米长的纤绳，套住船民颈项，然后将在场的日军分成两队，各握纤绳一端，象“拔河赛”一样，不一会，这些船民便被勒死了。在厂窖港的河堤上，日军用绳索做成活套，套住船民们的脖子，然后用另一端绑住船民的双脚，一拉紧，人便弯曲成一个圆球状。日军将这些人从高高的河堤上向深不见底的水中，一推，就象滚石头一样，越滚越快，直向河心奔去。有的当即被滚死，有的落入水中淹死。日军站在岸上拍手狂笑，以此为乐。

在日军的反复烧杀下，停泊在厂窖河中的上万吨船只全部被烧毁。一个多月以后，《阵中日报》记者袁琴心亲眼目睹的情形是：“两岸烧焦的船，象晒鱼一般的摊摆着，真令人目不忍睹。”“厂窖河里的死尸，简直使船只不能通过。只要船身往河里一动，前后左右都翻出死尸来，腐烂的肉浆，会将船身四周粘着。草草掩埋的尸体，数十人或百余人共墓一穴，到处都有。现在经过，犹闻臭气，骸骨且有被雨水冲露在外面的，真是悲惨啊！”

厂窖惨案发生后，湖南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报刊如《国民日报》、《力报》、《阵中日报》及国民党政府中央社等相继作出了报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洞庭湖滨犯下的滔天之罪。

1943年6月6日《阵中日报》报道：“此次厂窖、鸡窝岭、丁家洲、肖家湾一带，被惨杀军民同胞，为数万人以上，该地同胞均已全部杀光，无幸存者，河水为之变色，迄今死尸仍未全部掩埋，当日河内之浮尸，有如厕内之蛆虫，无从估计数目。此即中古时代所作之‘血洗’，今日亲见于厂窖丁家洲者。”

6月26日《国民日报》也发表了记者兰天所写的《滨湖浩劫记》，称厂窖惨案堪比“扬州十日”，“惨遭屠杀达数万之多，满地尸首，河水为赤，浮尸断流，惨绝人寰。有一船夫头部被砍12刀，胸前4刀，背后3刀，极人间之悲惨。”

时过4年，长沙《中央日报》记者李震一通过实地采访写下了《湖南西北角》一书，书中这样写道：“写到厂窖大屠杀，太悲惨了！这是我国八年抗战稀有的惨案。事隔四年，河岸还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还有烧余下来的船板，我到厂窖，秋风秋雨的重阳刚过，云愁雾惨，草木萧萧，听一个身杀七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画着当年悲剧的演出，觉芦岸浅汀之间，犹森森有鬼气。”

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奔流，但永远淹没不了这一页鲜血淋漓的痛史。日本侵略军在厂窖地区杀害我无辜同胞3万人，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为了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国耻家仇，党和政府在厂窖镇建立了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厂窖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还组织编写了乡上教材《厂窖惨案》，

拍摄了“勿忘家耻、爱我家乡”的电视专题片，向人民群众、干部、学生进行经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如今，厂窖已建设成全省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王文珍）

琵琶山“万人坑”

位于济南市西郊西十里河庄的琵琶山正南方向，有一处占地1680多平方米、四周高墙、里面大大小小分布着8个坑洼的院落旧址，这便是当年侵华日军屠杀山东抗日军民、爱国志士的刑场——琵琶山“万人坑”。

琵琶山“万人坑”属于驻济日军第十二军（1944年换防后，为第四十三军）所建立的“济南军法会议”，由“济南防卫司令部死刑执行队”把守。在日军占领期间，凡是由宪兵队、特务机关及日伪军在“扫荡”时逮捕或俘虏的山东抗日军民、爱国志士，被押解到济南，由“军法会议”判处死刑者，即在这里惨遭杀害。

“济南军法会议”是日军在山东的正式军事法庭，而且是借“天皇”的名义最高、最后的审判机关。实际上是专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机构。

1954年底至1955年初，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先后两次对琵琶山“万人坑”进行发掘，并在现场勘验，拣取尸骨及检验鉴定，拍摄照片和影片留证。整个工作经历4个多月。

第一次从1954年12月10日开始，勘验3天，挖掘“万人坑”两个，拣取尸骨4木箱、8席包，提取完整枪弹1发、枪弹头16个。根据当地群众的回忆，该处有6—8个坑。因此，报请省院检察长批准，继续进行现场勘检挖掘工作。第二次挖掘在省检察院检事员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进行，历时13天，挖掘大小坑6个，拣取尸骨557蒲包，提取枪弹壳14个、弹头204个，运往山东省医学院进行了鉴定。

经法医集体鉴定，被发掘出的有746人的遗骨。其中：男性283人，女性7人，性别难以判断者456人。年龄13岁左右者1人，15岁左右者18人，20岁左右者47人，25岁左右者56人，30岁左右至40岁左右者265人，50岁左右至60岁左右者9人，年龄难以判断者268人。火器伤杀害者173人，火器伤及钝器杀害者15人，钝器杀害者22人，锐器杀害者3人，颅骨粉碎骨折致死者210人，尸骨完整主要损伤肉体组织致死而未作鉴定者97人，尸骨零乱无法进行鉴定，只依股骨计数者207人。日本法西斯暴徒所采取的杀人手段主要有：枪杀、砍杀、刺杀、绞杀、殴杀、烧杀、活埋、犬咬等十几种。

在现场勘验工作中，除拣取尸骨、勘检笔录外，还由摄影队（包括拍照片、摄电影）与法医配合，重点拍照留证。破日军屠杀的我抗日军民遗骨惨状不忍目睹。如呈仰卧、俯卧、右侧卧、跪、坐和全身骨骼蜷曲于一处等各种姿势，尸骨互相重叠，且有很多两上肢骨的关节弯曲，其两腕关节在腰椎或髌骨的背侧处交叉。常在此交叉处检见有腐朽的土褐色的绳索缠绕，有的绳套因已腐朽，触之即碎，无法拣起。亦有的绳索尚未完全腐朽。这样的形状能认出的有310具尸骨。还有很多颅骨因暴力所致而粉碎，有的颅骨四周缠有腐朽的绸布蒙蔽两眶部，在枕部打成一个死结。

在两次挖掘前后，检察院的检察员结合进行调查讯问见证人、犯人等工作。

根据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管押的日军侵华战犯园田庆幸（伪山东省最高顾问）、水野义雄（日伪大汶口煤矿矿警队队长兼情报主任）、反革命犯王铁民（伪新民会山东总会调查室主任）、张文书（伪省会警察署特别安全科课长）等犯，加之东北日籍罪犯的供认，同证据是符合的。证实了前日本侵华“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十二军（仁第4221部队）和第四十三军（1700

部队，简称秀领部队）先后盘踞山东省济南市，在琵琶山下犯下大肆屠杀我抗日军民的罪行。

据战犯园田庆幸供认：1943年2月中旬，日军细川五十九师团长指挥隶下长岛、吉川两旅团“扫荡”鲁中沂水、莱芜、蒙阴一带，逮捕八路军军政人员及抗日群众800余人。施以殴打，水刑、火刑、吊刑残酷拷问致死200余人，作为将校练习“砍头”或作为训练新兵刺杀实验杀害450余人，其余的除几十人由“军法会议”判以徒刑外，有75人（八路军军政人员69人，抗日群众6人），以载重汽车押往琵琶山“万人坑”杀害。1945年2月中旬，日军上坂旅团又在上述地区“扫荡”，逮捕1000余人，拷问、虐杀870多人，押往济南130人，由“军法会议”判处死刑，在琵琶山“万人坑”杀害70人。

战犯难博供认：1943年1月，日军建立的“济南救国训练所”解散时，将病俘人员80余名在琵琶山“万人坑”杀害。据伪青岛《新民报》报道，1942年5月16日，在琵琶山“万人坑”屠杀“民先队员”44名。驻济日军第五十四旅团司令部卫兵中村顺一郎和萱治明道供认，1943年9月和1944年7月，在第五十四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的指挥下，在琵琶山“万人坑”亲手杀害24人。

受害者亲属田振安控诉说：我的侄儿田瑞符，1941年间做地下抗日工作，被日本宪兵队于正月初抓去。1942年5月间，我从敌伪报纸上看到田瑞符等44人被日本鬼子枪杀。

傅许氏控诉说，1942年11月16日半夜，日本鬼子把我两个儿子逮去，受尽了拷打。20天后放回了家，但不久又把我大儿子押送日本军法处，将他的衣服扒光“消毒”，最后把他杀害。

沈寅青大娘控诉说，1942年10月4日晚上，日寇无辜抓去了我的两个儿子，硬说他们是“共产党”、“八路”，拖到门外，戴上手铐，装上汽车，送到了日本宪兵队。在那里，对他们用了酷刑，香烧、盐水搓、铁棍打，就这样给活活折磨死了。

据西十里河庄的群众揭发，当时常常见到日军用汽车装着我抗日同胞到琵琶山“万人坑”去杀害，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次屠杀，枪声大作，狼犬狂吠，惨叫之声不堪入耳。被屠杀的抗日军民，有时尸体上只盖一层薄土或撒一层石灰，有时尸体全部暴露在外，任凭鹰犬撕咬。当地群众说，日军在琵琶山“万人坑”杀人最多的时间是1941年至1943年间。在这3年中，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屠杀一次，有时是下午，有时在夜间。每次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上百人。在“万人坑”修建不久，有一次就屠杀满满3汽车人。

就这样琵琶山“万人坑”旧骨托新尸，年复一年，层层叠叠。以上初步挖掘出的遗骨鉴定及数字，据日本战犯供认：“这些暴露出来的和他们所犯的莫大罪行相比，真是不及九牛一毛。”

时至今日，在这里施工动土时，经常挖掘出大量尸骨。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暴徒在琵琶山“万人坑”残杀抗日军民为数之多，驻济日军罪孽之深重！

为掩人耳目，掩盖其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和事实真相，驻济日军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将所存有关档案全部转移销毁。50年代我地方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对琵琶山“万人坑”的发掘及其大量的证据，雄辩地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杀戮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从而更加启发和唤

起了广大人民痛恶日本帝国主义、珍视世界和平的正义之心。
琵琶山“万人坑”的罪恶铁证，值得后人永世记取。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肖夏)

虎口余生

我叫范羊羔，今年68岁（采访者注：1984年），原籍井陘县桃王庄乡胡仁村，后来种山地搬到菩萨崖。41年前，日本侵略者大扫荡，在老虎洞放了毒气，躲藏在洞里的男女老幼150多人，就活下了我一个人。事情过去40多年了，那悲惨的往事，还象是发生在眼前。

那是1943年农历十月后半月的一天，日本兵杀过来了。天不明，我赶着牲口往山梁上跑，刚上山梁，就听到枪声一片。这时候，从平山逃难的人也一窝蜂地涌了过来。我白天钻到山里，黑夜回到窝棚。这么过了几天，看看日本人搜山搜得紧，山上没个好藏身，就想到了北柴沟的老虎洞。它在半山腰，日本兵不容易搜，我们全家人就上了老虎洞。到了那里，才听说，头天，日本兵也把老虎洞搜到了，点上被子、柴草，熏了一顿，熏死了个孩子。眼看着，这里也躲藏不成。我父亲说，要不然到桃林坪你妹妹那儿躲几天吧。桃林坪是敌占区。这时我正病着，走不动，没走成。眼看着天明了，没处躲，没处藏，急得团团转；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老虎洞离得近，再去那儿躲一天吧。

吃过早饭，我和我妻领上两个孩子又钻进了老虎洞。洞里已经藏了一百几十人。我心里总是嘀咕，踏实不下来，就对妻子说：“咱走吧，这儿不保险。”她愁眉苦脸地说：“天都这会儿了，能走脱？出去就叫日本人抓住了。咱躲上一天，躲过今儿，明儿说啥也不来了。”

还不到晌午，日本兵就来了，围了洞口。有几个打着手电钻进洞，拿刺刀逼着，把人们一个个往外赶。赶出一个男人，就用绳子拴个，等把我赶出来时，已经拴了七八十人了。妇女孩子没拴。虽没拴我，但心里一沉，想起我身上还揣着个皮包，里边装了四五十块边区票，我想这不怕，边区人用的就是边区票吗，怕的是别的东西。这年，我当了村民政委员，皮包里还掖了不少粮条子，就是群众交公粮的收据条子，没来得及发下去。如果一搜身就露了馅，就凭这东西，日本人还不逼着向我要粮食？当时把我愁坏了，蹲在地上，抱着头。一个日本兵狠狠地踹了我一脚，让我站起来。我说有病，日本人不依，我只得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这时，日本兵把许多年轻的妇女拉进洞里糟蹋了，男人们个个受到了毒打。敌人把黑水坪一个叫二贵的拉出来，说他教过书，是个八路军，把他衣掌撕开，要剐死他。二贵说：“我不是八路军，不信，你们问我们村里人。”二贵的父亲和其它很多人都站起来，提保二贵不是八路军。我五爷范富良，种山地，他并不知道二贵的底细，也站出来说：“你们可别杀他，他确实是个老百姓，成天上山割柴，常在我这儿打歇。”

日本兵放了二贵，又把李昌生拉了出来，李昌生是威州人，当过八路军，后来往在了胡仁村。敌人用枣木棍子打他，让他说出藏粮食的地点，他不说不让他带路去挖粮，他不去，被日本兵推下山崖，用石头活活砸死了。

敌人逼问拷打了一气，什么也没得到，就又把女人和孩子往洞里赶。在洞口，碰上了我妻，我急忙把身上披的破被子扯下给了她，顺手把身上的皮包递到她手里。她一接住，心里也就明白了，看了我几眼，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我给她使眼色，让她快走。她含着泪，钻进了洞。鬼子赶进去了女人和孩子，又把男人往里赶。我一直低着头蹲在地上。这时又被一个日本兵踹了一脚，一看，人们都进去了，我也只得往里钻。一边钻，心里就嘀咕：这回日本人不把人带走，也不杀，都往洞里赶，是啥意思？平时就听说，日本

兵用臭炮熏人，是不是这回轮到熏我们了？我妻听到我也进了洞，想我有病怕冷、就喊着我，要把被子传递给我。洞里很黑，谁也看不清谁。我喊了一声：“你披着吧，别管我了。”喊完，我就从内洞爬出来。老虎洞分里洞外洞，我爬到外洞，向一个大石头缝中钻去。这里边已钻进了人，我一直往里挤，爬到了一个高坎上，钻进另一条石缝中。我钻得深，敌人没发现。这时，我因有病，直想咳嗽，又怕敌人听见，就双手紧紧捂住嘴，也不动弹。

不一会儿，只听“砰”的一声响，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往嗓子里钻，呛得我出不了气，胸口憋得要炸一样。我顾不了别的了，连滚带爬，从高坎上跌到下面，也辨不清东南西北，直朝透亮处跑去。跑出洞口，我赶紧伏下身子，见敌人走远了，又钻回洞，想喊洞里的人快往外跑。这时候，我站不起来，喊不出，只是一声接一声的咳嗽，鼻涕、眼泪止不住流。我只得滚爬出洞。一会儿，洞里又爬出一个老头，是米汤崖的，叫三贵子。我叫他快跑，可是说不出话，急得打手势，乱比划。他也比比划划，要我走。我正要走，又爬出两个人来，认得一个是黑水坪的，忘了他叫啥名字；另一个人我不认得，长得圆脸，几个人中顶数他胖，一出洞口，“嗒嗒”喘个不停，鼻孔里、口里全是血。一共就爬出我们四个人。

我们分散着往外爬。我爬离洞口不远，就被日本兵发现了，“当、当”，冲我就是两枪。我急忙躺下装死，直到日本兵走远，看不见了，才又爬起来，向东梁上爬去。我只觉得心里火烧火燎，嗓子里象冒烟，直想寻口水喝。跌跌绊绊地爬到东洼里一家住山庄的窝棚，见锅里有水，可能是煮白萝卜的汤，我一气喝了两碗。歇了会儿，身上才有了点力气，脑子也清楚了一点，试着站了站，能站起来。心想：赶紧去喊人救洞里的人。四处寻找，也不见一人。这时天已大黑了，也转得认不得路了，就在野地里蹲了一宿。第二天早才跑到胡雷村，人们见了我说：“你不是死在老虎洞了？”我说：“我跑脱了”。

后来，我就躺倒了，不想吃也不想喝，昏昏沉沉，象要死的样子。听说老虎洞逃出来的那三个人都死了，我母亲整天含着眼泪守着我。六天以后，我才有些好转，能吃点东西了，便的全是黑屎；十几天后方能下地。我痛心地说：钻洞的时候，是一家四口，她还怕我冷着，喊着要给我那条破被；这会儿，只剩下我一个，她和两个孩子全没了；一洞子 150 多个人，就活下了我一个……石头人听了也得落泪。

听我叔伯兄弟范庚羊说，那天，他跑去救人，黑水坪的一个人先进去被毒气熏坏了，昏倒了，口流粘液。庚羊要进去，乡辛们扯住他，怎么也不让他进。庚羊急得要死，因为里边有我们奶奶、他媳妇、一个孩子和弟弟、弟媳。他不顾乡亲们阻拦，硬钻了进去。哪有一个活人，全都死了！头胀得像柳笆斗，没有一点人模样，一个也认不出来了。洞里还是烟雾弥漫，只得跑了出来。过了几天，人们进去收尸，皮肉全烂了。那 150 多男女老少，死得好惨呀！

（范羊羔 1984 年 5 月口述刘育书栗水记录整理）

人间地狱——抚顺矫正辅导院

抚顺矫正辅导院始建于1943年4月27日，地点设在当时的抚顺高尔山下日伪抚顺监狱内，由日伪司法矫正总局委托抚顺监狱代管。后迁往抚顺新屯南山，1943年12月1日，正式建立抚顺矫正辅导院，又称“新屯辅导院”。1944年后，《时局特别法》出笼，罪名增多，被捕人员日益增多。日伪为加强统治，又在抚顺增设了“东洲矫正辅导分院”和“大瓢屯矫正辅导分院”。同时，在东制油厂和煤矿机械厂等单位也设立了“思想矫正”机构。新屯矫正辅导院随之变为“抚顺矫正辅导总院”。

抚顺矫正辅导院的建立，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伪满洲国穷途末路之时的垂死挣扎，是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奴役中国人民，掠夺我国物质资源，推行法西斯残暴政策的铁证。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发展得很快，特别是欧洲战场发生了伟大的转折。

在亚洲大陆的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者也完全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为了挽救即将失败的命运，他们作垂死挣扎，加紧对各国人民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和对殖民地物资资源的疯狂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1941年12月27日颁布《治安维持法》之后，陆续的公布了一系列法西斯法令。1943年春，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使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和伪司法部次长太田耐造，共同策划制订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残酷迫害和屠杀东北人民的“矫正辅导院”就是贯彻上述反动法规的产物。

《保安矫正法》于1943年4月，经伪满洲国国务院“次长会议”通过，经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裁可公布实施。

所谓《保安矫正法》就是把日伪“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送进特设的矫正辅导院，在进行非人道的“精神训练”的同时，强制从事超负荷的繁重劳役，而《思想矫正法》则是对可能犯有政治罪者，实行“预防拘禁”，同时也强迫从事繁重劳役。为了统治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作了许多可以随意扩大迫害范围的规定。例如《保安矫正法》第一条规定，“保安矫正为预防犯罪，拘置认为有练成（即训练）辅导之需要者，谋其矫正，以资治安之保持之目的。”所谓“有犯罪之虞者”包括“被处刑已终了其执行”者，“无诉追之必要者”和“因浮浪或劳动嫌疑而有犯罪之虞者”。《思想矫正法》则规定，被“预防拘禁”或“保护监禁”者，是可能犯有下列之罪：“对帝室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家罪”、“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军机保护法之罪”、“治安维持法之罪”、“国防保安法之罪”、“国防资源秘密保护法之罪”等等 这里的对“有犯罪之虞者”和“有可能”犯罪者，采取“预防犯罪”、“预防拘禁”和“保护监禁”，就是对行为人还没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认为”其“有可能”犯罪，就将其拘禁或监禁。根据这样的反动法令，日本军警可以用“有犯罪可能”为借口，随心所欲地抓任何人。事实上，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上起，就已经毫无顾忌地任意捕人杀人，而这两项反动法令的公布，对这一法西斯行径进一步提供了法律根据。这个“决战下的行刑及保安拘置

制度”，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它既对中国人民实施了法西斯高压统治，又获得了掠夺我国物资资源所急需的无偿劳动力。

（二）

随着上述各反动法令的公布，日伪当局强化了法西斯机构，在伪司法部刑事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司法矫正总局，由伪司法部原刑事司长中井久二任总局长。司法总局是一个特殊的法西斯机关，它除接管原刑事司所掌管的伪满监狱行政外，主要指导与监督设立在东北各地矫正辅导院，对“保安矫正制度”中的“预防拘禁”的执行情况。事实上，伪司法矫正总局权力之大，不受任何机关的约束，在伪满洲国境内，通过下属的矫正辅导院，可以直接捕人、关押、行刑，乃至以各种凶残手段置被“矫正”和“辅导”者于死地。这些法西斯暴行，不须呈报任何机关，办理任何手续。

抚顺矫正辅导院建院初始，伪司法矫正总局委托抚顺监狱代管，并由监狱副典狱长曾我宗次兼任院长，在新屯正式建立抚顺市矫正辅导院后，司法矫正总局重新任命了古川英一、横田武极为院长，曾我宗次、小川文为副院长。院下设3个职能科，科下设6个股。

抚顺矫正辅导院中，辅导科为主管职能科，权限最大，负责管理、教训“辅导工人”，以及出劳役。抚顺矫正辅导院机构中，日伪人员构成比例为：“日系”人员占56.5%，“满系”人员占43.5%，辅导官佐以上均为日本人。

抚顺矫正辅导院建立以后，以“预防犯罪”为名，到处肆意抓人，抓人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日伪军警宪特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判断，对于处在任何行为中的人都可以随时抓捕。包括外出上街和旅行中的人。许多人就是因为说一句话，或是对日伪当局稍有不满意，就被认为是危险分子抓进矫正辅导院。1944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抚顺炭矿总务局长板仓真五在《辅导工人管理状况调查报告》中称：对特殊工人“有必要事态时，将队长进行隔离监禁进行削弱之，而认为更有必要时将其全部收容到矫正辅导院，采取强行管制的方针。”抚顺“特殊工人”中的宋庆昌（新四旅连长）、夏俊卿等人就是这样被逮捕的。

二是“一齐索出”。这是一种大规模的，更残酷的集中抓捕中国人的办法。日伪当局称之为“抓浮浪”。采取这种方法，就是在某地把人围起来，或是把街道两头堵起来抓人，想抓多少就抓多少。有时组织“一齐索出”“防范周”，连续几天抓人。1944年春，日伪抚顺市警察局，按照抚顺地方检察厅长野田实次的命令，在抚顺闹市区以“抓浮浪”为名，一次就抓了无辜群众300余人，经严刑拷打后，把其中250人送进了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

三是“平时索出”。就是不间断地逮捕。日伪军警宪特机关，根据两个《矫正法》，随时把“可能犯罪者”押送进矫正辅导院。日伪抚顺警察局特高课特务股长森川孝平（全国解放后，曾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1944年至1945年间，曾以取缔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流言蜚语”为借口，在抚顺市内逮捕87名所谓“造谣犯”，逮捕了125名所谓的“思想嫌

是指被强制驱使从事繁重劳役的被俘中国抗日军人、抗日干部和平民百姓。

抚顺矿务局档案馆“抚总庶文04第22号1—25。”

《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125页。

疑犯”。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共逮捕各种“案犯”2265人，绝大多数是“特殊工人”和平民百姓。其中有900多人被押送到新屯矫正辅导院。1944年以后，“全市被收容人员达2000多人。”

日伪抚顺矫正辅导院是一座残害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人间地狱。新屯矫正辅导院戒备森严，杀气腾腾，这里有16栋大房子，两个大院，可容纳近2000人；大瓢屯矫正辅导分院有四五个院，关押几百人；东洲矫正辅导分院，辅导警就有十五六个人。这些辅导院四周电网环绕，由武装人员把守防卫，“辅导工人”住的大房子阴暗潮湿，每间有一道铁门，一个上了铁栏杆的小窗户，屋子里有一个能挤下五六十人的大炕。进了辅导院的人，身上的外衣全被扒下来，换上紫色或黄色的号衣。为了防止逃跑，带上沉重的脚镣。冬天，两三个人盖一个又脏又破的薄被，难以抵御寒冷，就拥挤在一起靠相互间的体温取暖。晚间不准出屋上厕所，只能在屋子里拉屎撒尿。到了夏天，炎热气闷，蚊蝇扑面，气味难闻，根本谈不上卫生条件，疾病流行，矫正辅导院设置的保健科是专为辅导警察服务的，“辅导工人”根本享受不到医疗的待遇，由于生病得不到救治，几乎天天死人。有的人外伤严重，全身浮肿，伤口化浓生蛆也得不到治疗，只能等死。传染病流行时，谁得了病，就被送进隔离室，不给吃喝，不给治疗，直到死亡。曾被关押在东制油厂矫正辅导分院的高振华回忆：“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疗，也不让人照料，往往尸体放在屋里几天无人理睬。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因卫生设备之不完善，及防疫措施不够，以致罹恶疫而死亡之不幸事件甚多。”据抚顺保健院04第1号之五文件《抚顺炭矿保健院现业指导系野獭善胜、谷日升、中村义人在抚顺矫正辅导院的调查报告》记载：“该院以矫正辅导为目的，在抚顺炭矿东露天掘和东制油劳动生产，按昭和20年（1945年）2月1日当时收容的总数为1498人，其中自报有病休息的127人，占总人数的8.5%，被认定为有明显疾病的241人，占总人数的16.1%，今年1月份死亡39人，占总人数的2.6%……。”

抚顺矫正辅导院设在龙凤采炭所和老虎台采炭所之间的新屯南山上，其它分院也都设在工厂和煤矿附近。其目的就是能使抓来的“辅导工人”就近从事苦役。每天，“抚顺矫正辅导院到抚顺煤矿劳动的有500—1000人”，关押在这里的“辅导工人”的劳役十分繁重，为了加速开采抚顺的煤炭和油母页岩，支撑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工业和侵略战争，矫正辅导院的辅导警察，天不亮就把“辅导工人”撵到劳役现场，铺铁路、挑土筐，挖土方。超负荷的劳动，使“辅导工人”不堪忍受，他们的生活待遇低劣而艰苦，吃的是发了霉的又脏又酸的高粱米饭团，玉米面窝窝头和无油少菜满是泥沙的淡汤水。加上伤痛和疾病的折磨，个个形如枯蒿。日伪统治者就像榨油机一样，把“辅导工人”的油水压净榨干。在这样的情况下，“辅导工人”在警察的刺刀和皮鞭的驱撵下，支撑着干10至12小时以上的活，用警察的话说，“只要你的脑袋壳还硬，就得给我出工！”许多“辅导工人”经常是拖着病残之躯，走出矫正辅导院的大门去出工，晚上却象死人般的被难友拖回监舍。有

《中国特殊工人史略》第59页。

抚顺市档案馆“其它”38号卷。

伪满第十二次司法官会议录，第104页。

抚顺市档案馆，敌伪0068号卷。

的就于死在劳役现场。“辅导工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几乎天天有人死去，“有时最多一天就折磨死60多人”。新屯山上有几个大坑，人死了就被日军往里扔，大坑总是满满的。东洲矫正辅导院有个活底棺材，专门往出运死人，抬到东洲后山，一抽底板，就把死人漏在地上，任凭风吹雨打，狗撕鸟啄。东洲后山到处是人的白骨和尸体，十分凄惨。

在抚顺的矫正辅导院，无论是“日系”的辅导官佐，还是“满系”的主任辅导士和辅导士，都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身着日伪辅导警察制服，跨着短枪和战刀，对待“辅导工人”如同凶神恶煞，残忍成性，杀人如麻。“拘置者”被收容进矫正辅导院后，不愿出工就是“思想不良”，要加戴刑具干活。稍有不满和反抗，立即进行所谓的“精神训练”和“矫正辅导”。《矫正辅导令》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收容的人必要时可以使用刑具，包括捕绳、联铁、手铐、防声具、保护衣，而且根据情况，可以并用。对收容者进行“精神训练”和“矫正思想”的办法是“皮鞭抽火”、“镐把炖肉”、“灌凉水煤油”、“压杠子”、“钎子烙”、“进滚笼”、“上大挂”、“夹指甲”、“举板凳”、“冷冻”、“倒吊”、“戴防声具”、“穿镇静衣”、“暗室监禁”和“减食”等名目繁多的酷刑。“镇静衣”是用厚牛皮制作的，穿上后，往上洒水，牛皮遇水逐渐收缩，挤压胸部，使人呼吸困难，异常痛苦，时间长了可以把人憋死。1944年9月孙怀俊被关进矫正辅导院后，看到辅导警一次就把四个人活活整死。据林德才回忆，1943年5月，一个叫焦青山的，因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逃跑，辅导人员非常恼火，立即把挨他睡觉的陈亮和张某捆绑起来，动用各种刑具拷打。最后用火烧，拿他们两个出气。把这两个人折磨得死去活来，险些丧命，有的被收容者仅仅问了问什么时候释放，就被活活打死。矫正辅导院中，被各种酷刑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有许多，有的尚未断气，就被扔到野外喂狼狗，不准同屋难友收尸。当时在群众中流传这样两句话：“‘辅导院’是阎罗殿，进去容易出来难。”

日伪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矫正辅导院在押人员的强烈反抗，“辅导工人”不堪忍受死亡和痛苦，痛打和杀死辅导士的事件经常发生，还经常出现单独逃跑和组织集体逃跑事件。但是，关押“辅导工人”的监舍和“外役场所”，都是高墙壁垒和层层电网、铁丝网，加上戒备森严的固定岗哨和流动岗哨，逃跑很少成功，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抓回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不死就继续从事更加繁重的劳役。

“1944年1月，新屯矫正辅导院100余名被关押者集体逃跑，伪抚顺警察局特务科长小林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特务科特务股劳务系执行警尉矢内正美，带领特高股员会同龙凤的警察前去追捕。在新屯南山打死一名“辅导工人”，40名被抓回”

“宋庆昌（新四旅连长）同志在矫正辅导院又很快团结了一些人，并以怠工的形式进行斗争。原冀东八分区的张继武同志（副营长），趁敌人不备，夺下了看守的枪，然后带领几个同志暴动逃跑。由于枪内没有子弹，结果暴动失败，被抓回来，遭至残酷迫害。”

《抚顺文史资料》第六辑，第48页。

《伪满洲国史》220页。

《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第11页。

《抚顺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6页。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使日军节节败退。消息传到矫正辅导院，无不欣喜若狂。为防止敌人下毒手，集体屠杀，暴动不断发生。8月14日，在原新四旅一连长宋庆昌、八路军田指导员和贾连长等人领导下，新屯矫正辅导院举行了大暴动。敌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据日伪抚顺矫正辅导院辅导士傅洪恩回忆：“1945年8月14日下午，搭连分院押解400余名‘拘置者’送往新屯总院，当队伍走到阿金沟桥头时，‘拘置者’举行了暴动，被辅导官及辅导士开枪打死1人，打伤多人。当晚9点，新屯总院1000余人举行大规模的逃跑暴动，被开枪打死20余人，打伤多人”。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随着日伪的法西斯统治的日益加剧，这种状况日甚一日。这些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最后，新屯矫正辅导院的暴动取得了胜利。暴动群众出狱后，大多数人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王宝来）

中山石门九堡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仅广东中山地区，就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惨死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其中仅“石门九堡惨案”，就有41名无辜群众惨遭活埋。

石门村，位于现中山市东南部，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居翠亨村侧的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风景秀丽，那里的人们勤劳纯朴，热爱家园。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山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1944年初，五桂山抗日游击队粉碎日伪的十路围攻后，又出击了驻守唐家、下栅、南朗一带的日伪军。日伪军恼羞成怒，从广州、江门等地调来了大批的军队围剿五桂山区，对山区实行疯狂“扫荡”，滥杀无辜，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石门九堡惨案”。

这一年农历六月初一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上千名日伪军由大汉奸梁孔先、梁鼎先引路，从唐家向石门方向远道奔袭而来，妄图搜捕我抗日游击队。那天正值下栅墟日（农村集市日），一些起早赶集的村民在路上被抓住了。日伪军一到达石门，立即把九堡的几个自然村团团包围起来，村民们要转移已来不及了。全副武装的日伪军进村后挨家逐户地搜索，见人就抓，见牲口就杀，抓不到人就摔盘打罐砸锅，毁坏农具，野蛮至极。日寇把抓到的村民用绳子一个个五花大绑，赶至村中心的园岗埔地坪处。走得稍慢的就被其拳打脚踢。书房坳的年轻妇女董顺意走得慢一些，一日本兵朝其背脊就是一枪托，董顿失重心，跌倒在地，那个日本兵还不罢休，一手揪起她又是一耳光。日伪军在九堡折腾了近两个小时，也没有抓到一个游击队员，便用明晃晃的刺刀威吓群众。日军一个队长目露凶光，在村民面前来回踱步，呲牙咧嘴地逼村民说出游击队的下落；大汉奸梁氏兄弟为虎作伥，狠毒地向日军诋称我山区群众很多都是双重身份，既是老百姓，又是游击队，个个都有嫌疑。日军队长听了二汉奸的诬告，便恶狠狠地逼道：“皇军是来报复的，你们要放聪明些，只要说出游击队的下落，便平安无事，否则，把你们统统杀掉”。被抓的群众中，青壮老妇孺皆有，然而，他们全部毫无惧色，怒视敌人，谁也不开口。这天气压很低，一丝风也没有，闷热异常，村民们手被反绑着，蹲在中心地坪处忍受烈日蒸烤，与敌人对峙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是鸦雀无声。日军队长伯逗留时间过长会被我山区游击队前来袭击，于是，下令将抓到的93名群众全部带走，押至上栅外沙村（当时日军的驻地，今属珠海市）村口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街市庭处囚禁起来。

大汉奸梁孔先兄弟威吓村民们道：你们要听皇军的话，一个都不准逃走，倘若有一个走的话，就把你们全部杀掉。当晚刮台风，风雨交加，整个街市庭都遭水淹了，村民们连坐的地方也没有。翌日，翠亨村的村长陆宪山前往外沙村想求日军允许把村民们保释出来，谁知这帮没人性的家伙不但不准保释，反把陆宪山的衣服剥光毒打一顿。陆被打得遍体鳞伤，抬回家后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床。

日伪军进一步威吓村民们，又对一些在路上抓来的老百姓实行严刑拷打，有的当场被打死。这些侵略者及其帮凶对我群众实行非人的虐待，既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妄图以此手段逼群众说出我山区游击队的情况。在饥渴煎熬下，孩子们嘶哑的哭声，被外沙村在街市庭旁的水井打水的一青年女

本文根据中山市翠亨村镇石门村群众、“石门九堡惨案”生还者董顺意、遇难者家属何兰宽、群众贺炳文，珠海市金鼎镇北沙管理区外沙村群众麦锦兴、陈名达、陈文有、盛云等人的回忆整理而成。

子听见。就提桶水给他们喝，不幸被日军发现；也被毒打一顿的关押起来。日军还恶狠狠地警告外沙村的村民，不准再送水送食物给被关押的群众，否则格杀勿论。日伪军从群众中得不到任何山区游击队的消息，又进一步对村民进行酷刑逼供，他们把青年村民吊在村口的榕树上用皮鞭抽打。青年群众何社土，陈润湖等人被捆绑在竹梯上，往鼻子里灌水至肚涨后，又用竹杠压其腹部，吐出水后又再灌，灌至鼻血直流。日军小队长大野见何、陈等人不屈服，又命令把老虎凳抬至井前的空地，用坐老虎凳、钉竹签等酷刑对付村民。尽管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坚强的群众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们始终不吐半字，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日伪军半点办法也没有。于是，在农历六月初三那天，用寒光逼人的刺刀，押着一批村民，把他们赶至离外沙村约两公里的骆仔沙岗，逼他们挖了两个3米多宽，2米多深的大沙坑。农历六月初四早上，由日军一小队长大野带领1个小队的日军和10名伪军密侦队员，把抓来的村民赶到骆仔沙岗，把青壮年的村民挑出来，共41名，逼他们站在大沙坑旁，用刺刀再次逼他们说出游击队的下落，坚强不屈的村民们视死如归，痛骂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日军小队长大野歇斯底里地咆哮着：你们统统地死了死了的。边骂，边命令日本兵将村民一个一个地挑进沙坑，有的群众不畏强暴，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活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侵略者，还我河山！”遇难者悲壮的呼声久久地回荡着，41名无辜群众就这样被强行活埋了。被活埋的村民中有20名是妇女。有些是兄弟、父子。

目睹着亲人们被活埋，人们悲痛欲绝，有个妇女忍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当场疯了。据外沙村群众麦锦兴老人回忆说：“当天上午我正好在外沙村背后的山岗上放牛。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悲惨的哀叫声，远远望去，只见日本兵用刺刀将村民捅一个就推一个落沙坑，虽事隔50年，那凄厉的哀号声及血淋淋的悲惨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磨灭。”

41名无辜群众遇难的消息传开后，震动了整个五桂山区，人们义愤填膺，国难家仇一齐涌上心头。要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复仇的烈火在民众的心中燃起。一时间，仅石门乡九堡的几个自然村就有50多名热血青年参加五桂山抗日游击队，拿起枪杆上前线杀敌人。青年谢金带的妻子被活埋了，他决心为妻报仇，毅然参加游击队，英勇杀敌，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不少工作。遇难者何社土的胞弟何水堂，参加了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后，在战斗中机智勇敢，表现十分出色，在“五·九”反扫荡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虏，在押途中何水堂趁日军不注意时，机智地用脚拉响了我游击队预先埋好的地雷，炸死几名日军后自己得以脱险，立下战功，受到部队的嘉奖。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乡里的人们及海外侨胞为了纪念这41名无辜遇难的同胞，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共同集资筹款建造公墓，埋葬了死难者们的枯骨，并立碑文记载日本侵略者之凶残、汉奸之无耻和41位同胞的悲惨遭遇。在殓葬时，挖开沙坑，只见白骨累累，一层叠一层，真是见者伤心，闻者落泪。1986年，旅美华侨谢月英女士又出资重建公墓。这座公墓是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黄敬潮）

“三光”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中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处于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德石路以南，横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它地处平原，与平汉、津浦、陇海铁路相接，是山西和山东、华北和华中联系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把它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消灭这里的抗日力量，日军频繁地进行“扫荡”，并在这里实行了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其中，给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害的“扫荡”有三次，即1940年6月“五·五大扫荡”、1941年4月的“四·一二大扫荡”和1942年9月的“九·二七大扫荡”。

被俘日军士兵富田说：在内黄、清丰，三十五师团长命令枪杀了上千名无辜百姓随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成为敌后游击战场的主力，日军的主要目标也转向了英勇的八路军和抗日军民，日本军界认为，“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1940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制订了两期治安肃正计划，其中第一期的重点就是“扫荡”平汉、津浦路之间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是年6月5日，日军调集驻开封、新乡的第三十五师团和驻商丘的第四旅团共8000余人，配备汽车、坦克170余辆，分三路向冀鲁豫边区进攻。在濮阳西部地区，八路军二纵队新三旅八团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30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这是“五·五大扫荡”的先声。

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五，故称“五·五大扫荡”），日军更猛烈的进攻开始。他们又调集驻山东兖州、泰安的第三十二师团、徐州的第二十一师团和安阳、邯郸一线的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分12路向清丰、南乐、内黄等冀鲁豫边区中心区“扫荡”。在“扫荡”中，日军改变了以前长驱直入的方法，而是集中兵力，夜行晓袭，分进合击与突然袭击相结合，反复扫荡这些地区。天上有飞机，地上是坦克、大炮、汽车、摩托——机械化加骑兵，来势极为迅猛。在反“扫荡”战斗中，有700多名八路军战士遭到伤亡。

日军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在清丰梁村，日军一次烧毁民房900多间。在濮阳，日军把20多个村庄的财物抢掠一空，房屋烧成灰烬。对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或推到井里，待人填满后，再压上石硫或石盘，封住井口。景象惨不忍睹。在这次扫荡中，仅濮阳九区的大保、古堤口、余庄、东大保、薛村等15个村，被杀群众就达1147人，伤残129人，失踪258人，48户被杀绝。

参与此次“扫荡”的日军士兵富田后被八路军俘虏，1944年2月8日，他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一次反省活动座谈时说：1940年，在内黄、清丰交界地区，三十五师团长召集了1000余名老百姓，在讲完“日军拥护中国人民”的话后，就命令轻重机枪从四面将这些人打死。同时，将老百姓的房屋烧得一干二净。

这次“扫荡”过后，日军占据了清丰、濮阳、内黄、东明等县城，并在滑县、濮阳等地设置了34处据点，形成了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包围。冀鲁豫边区的党员总数由4月份以前的26284人减少为11205人，地方武装损失过半，抗日根据地缩小成了以濮阳以西、内黄以南、滑县以北、卫河以东方圆50里左右的沙窝中心区。

杨得志说：“四·一二大扫荡”后，沙区变得我们不敢认了。

1941年4月12日，日军调集主力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骑兵第4旅团和李英、杨振兰、孙步月、程道合等部伪军，以及司华生、韩老俊等土顽部队总计1.5万余人。其中骑兵1200余人，配重炮20多门，汽车、坦克110多辆，飞机两架，分五路向沙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垮沙区抗日根据地。日军为了抢劫沙区的财物，断绝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来源，日军甚至带来了百余辆大车和钢锯等破坏性工具。沙区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

在沙窝中心区，日军实施了大抢大杀大烧的三光政策。内黄、高陵、顿邱、卫河（后3个县为冀鲁豫根据地所设，后撤销）等四县受灾村庄达141个。其中，内黄的南丈堡、杨固，高陵的薛村损失最大。薛村被杀180人，伤38人，被毁房屋931间；南丈堡被杀110人，伤7人，被毁房屋1432间；杨固村被杀175人，失踪192人，被烧毁房屋787间。整个沙区被杀人数达2307名，伤186人，失踪263人，53家被日军杀绝。

这是日军对我冀鲁豫根据地规模最大，使根据地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扫荡”。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回忆说：“这天傍晚，只见东西南北沙土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的坦克、汽车和骑兵蜂拥而来。远者相距五六公里，近者不到三四公里。不一会儿，敌人发起猛烈的炮击，炮弹接连不断地落在我们周围的村庄、田野、沙岗和枣林里。弹片如雨，爆炸声震耳欲聋。”

在这次扫荡中，日军杀人手段之卑鄙、残忍，令人发指。

在内黄的杨固村，日军把900多名从各村搜捕来的老百姓集中在一起，对他们讲述“大东亚共荣”之道。讲完之后，一部分人被日军活埋在村东头的水沟和村西头的道沟中，其余大部分被填入了杨固的水井中。疯狂的日军把人们一个个往井里推，稍有不从者就是一刺刀。待水井被填满时，日军就用开水浇井里的人们，然后压上石碾，用炸弹炸。井口的石头也被炸得稀烂。最后，日军用土封住井口。杨固村的7口水井，有6口就这样被用活人填满。

在内黄余庄村，日军把7个老百姓套在大车上，让他们在余庄街上来回奔跑，牛马一样驱使作乐。最后，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捅死。

在内黄城布村，从沙窝中被捉回来的20多名青年妇女，被强迫脱掉衣服，在街上任由日军侮辱取乐。然后，在日军的狂笑声和机枪声中，这些人纷纷倒地而死。

在桑村，一个小孩被撕成两半，在张六村……这些暴行一桩桩、一件件相继发生。日军的人性在这里完全泯灭，兽性被彻底发挥，好象一群群野兽在沙区的土地上横行。狼烟过后，到处是惨死人民的尸体，到处是被害人民嚎哭，沙区昔日在共产党领导下那种温馨和平的气氛荡然无存，到处留下的是日军的罪恶和凄凉景象。劫后的141个村庄，好象是141个瓦砾场。

沙区的主要经济作物是大枣和花生，它们是沙区人民赖以生存的支柱。日军杀人之后，就把目标转到了这些作物上。他们用带来的钢锯将一片片枣林锯掉，一袋袋花生被抢被烧。日军开进杨周村时，用4挺机枪把100多名群众围在不到百米的枣树林里，逼着他们砍树，不砍就用机枪扫射，当场有50多人被打死。据不完全统计，千口村的枣树被砍达3349棵，破车口的枣树全被砍光。锯倒的枣树大部分也被日军装在汽车上拉走，剩下的横七竖八地乱倒在凄凉的沙丘上。

日军对沙区的“扫荡”持续了9天，在他们的摧残下，沙区变得面目全非。杨得志回忆说：“血与火的9天过去，我们再回到沙区中心地带的时候，

除了人民的心，几乎一切都变了，变得我们都不敢认了。”

日军的暴行并没有吓倒边区人民，他们反而变得更坚强。一年后，在日军屠杀冀鲁豫人民的土地上，冀鲁豫边区军民各界联合为死难者建立了公墓，树立了“四·一二”阵亡将士暨遇难同胞纪念碑。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为此题词：

忆去年今日沙区碧血积尸遍野满腔怨忿犹未消愿边区同胞痛定思痛同声杀敌血债需用血来还这就是沙区人民对侵略者的回答。

曾思玉说：随着敌人的狂轰滥炸，人群里血肉飞溅，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黄河故道。

随着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再度缩小。人们形容说：“一枪可以穿透根据地”。日军为彻底摧毁这个抗日堡垒，于1942年9月下旬，再次调集重兵，对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式的“扫荡”。

9月27日拂晓，日军调集第三十二师团、五十九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和伪军共1万余人，坦克10辆，分兵8路扫荡根据地，并形成以范县城附近的单堂村为中心的半径约30公里的包围圈。被包围在合击圈里的八路军部队、机关发现敌情后，立即带领群众分头突围，但大部分仍被包围在里边。

时任八路军教导三旅政委的曾思玉率领一部分人在参加军区训练比武大会的途中，被日军合围在范县的甘草固堆一带。他带领战士们英勇反击，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他回忆说：

“日寇的战斗机一队队从远方飞来，象穿梭一样在我们的上空不断地俯冲扫射，疯狂地进行轰炸；……随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密集的人群里血肉飞溅，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黄河故道的黄沙……凡是日寇所经过的村庄，都是浓烟滚滚，烈火冲天，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

在范县旧城的西南寨附近，200多名学生和机关于部被日军围住，全部被用机枪射死。在天主教堂，日军把被围的筑先师范、陆军中学学生和群众全部捆了起来。捆人的办法很多，绳捆、铁丝拧，有的则被用解下的腰带捆住。由于腰带被解，裤子脱落到脚脖，成为“脚镣”。行走人一不小心，踩着裤子就跌倒了，这样，接二连三地就会倒下许多人。日军就用枪刺扎这些人的臀部，直至血肉模糊，鲜血淋漓。

在江庄村，日军抓住4个年轻姑娘，逼她们裸体蹦跳取乐。有个姑娘宁死不从，被日军打得满脸是血。最后，4个姑娘被用汽车拉走，生死不明。

在张庄村，日军把两个男青年捆起来，活生生地剥下两张人皮。两个被害者在惨叫声中活活地痛死。

在这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中，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伤亡279人，被俘116人，失散873人、1200多名男女同胞被杀死，被强奸妇女达300多人。铁壁合围圈内外村庄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烧光，粮食、鸡、鸭、牲口被抢掠一空。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就是日军“扫荡”过后的真实写照。

1942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对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日军对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次数作了一初步统计，其中5000人次上的扫荡有152次，万人以上的扫荡有37次。在这五年中，对冀鲁豫边区的扫荡日数为329天，每次参加的人数平均为6100人。除了“五·五大扫

荡”、“四·一二大扫荡”和“九·二七大扫荡”这比较大的三次扫荡外。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同样给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带来人民被惨杀、房屋被烧毁、财物被劫掠。冀鲁豫边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自己造成的苦难。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秦相启）

平阳大惨案

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阜平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是侵华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先后在这里制造惨案 70 余起，其中最为残暴的是平阳惨案。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反侵略阵营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为了确保“华北兵站”，用这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太平洋战争，借以扭转被动局面。在“分块剔抉”的方针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北岳区实行了空前持久而残酷的“扫荡”，妄图彻底摧毁这个根据地。

9 月 16 日，4 万多兵力按照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年度治安肃正作战方针指向共军”的部署，分别从保定、正定、阳泉、忻县、繁峙、张家口、宣化等地出动，向以阜平为中心的北岳区进剿。其中日军荒井混合大队 500 余人以平阳、贾家口为据点，以篦梳式的战术在平阳地区反复“扫荡”80 余天，残酷虐杀无辜百姓千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阳惨案。

9 月 21 日，荒井率部队从邻县曲阳出发，兵分两路夹击平阳镇。在日军未到之前，根据地军民已实行了坚壁清野，粮食衣物和器具全部藏匿，人畜迁居野外。日军既抓不到人，也找不到物。第二天日军从各老村出发，兵分南北两路合击平阳南山。一路由山麓向主峰搜剿，另一路由主峰向下压。藏在山上的大多数人陷入了包围圈中，日军从北、南、东三面开枪扫射，顿时尸横山野。

落入日军的包围圈的人们手无寸铁，难以同日军搏击，然而高尚的民族气节又使英雄的人民在暴力面前没有低头，他们横眉冷对日军的屠刀。

60 多岁的杨贞老汉一直认为日军不会登山，所以他隐蔽在南山的最顶端，心想爬得越高越安全。日军抓住他后，说他是“红胡子”，一把将他拉出来，让他说出八路军的去向。老人比比划划说自己不是八路军，是种地的，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挨了日寇一记耳光，接着被拳打脚踢。日军急于从他口中得知所需要的东西，愈加折磨他。日本鬼子逼他脱下鞋袜，在布满蒺藜的山坡上奔跑，停下来之后接着审讯。老人被打得昏昏迷迷，语无伦次，日军把两把刺刀捅进了老人的两肋。

首先是搜身，日军在杨贞老伴赵金福身上搜出两角边市，就认准她是“女胡子”，硬要她说出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隐蔽地。杀夫之仇使她五脏俱裂，怒不可遏，怒视日寇。日寇见她缄默不语，便前推后揉，老人依然颈直胸挺，顽强站立。日军将她推下深渊。8 岁的次子见母亲遇害，奋不顾身地冲出人群，日军开枪射击，孩子滚下了山坡……

日军又审讯杨贞的儿媳妇赵喜英。她口袋里原来装着本村妇女做军鞋的名单，在日军搜身时悄悄掏出来放在嘴里嚼烂，心里踏实了许多。日军问不出什么口供，两把明晃晃的刺刀抵住了喜英的前胸和后背。惊恐不安地依偎在喜英身边的 9 岁的外甥女赵小多吓得死死抱住赵喜英的腿，哆哆嗦嗦地嗷嗷道：“妗妗，我怕……”第二个“怕”字尚未说出口，瘦小的身体便被鬼子踢倒在地，孩子哭叫着从地上爬起来，撒腿就跑。刚迈几小步便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幼小的生命，孩子在一息尚存的短暂时刻，两只小嫩手还痛苦地拽扯着坡上的小草。赵喜英悲愤交加，日军两把刺刀仍抵着她的前胸和后背，但日军从她口中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把她与其他几个年轻妇女带走，她在途中逃了出来。

11月5日，日军搜剿寺沟，被抓的大都是山嘴头村人。14岁的孩子韩文秀同大人们一起被押到贾家口村。第二天他亲眼看到大人们大多已遭杀害，最数韩文才死得惨。日军把他吊在房梯上，在乱棒拷打下进行审讯，但韩文才一声不吭，直到昏死过去未吐一个字。日军骂着“八格亚鲁”，说“装死的干活”，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精致的小刀，刺韩文才的脚心，韩文才的下肢抽动了几下，嘴张了张仍没出声。这时一个汉奸提着一壶开水走来，日军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烫活鸡的干活，死了死了的”。奴才领会了主子的意思，爬上房梯，把壶嘴对准韩文才的头，徐徐向下浇。韩文才从昏死中猛醒过来，“哎哟”惨叫一声，身子剧烈地抽动一下，似乎把生命最后的一点力量使出来了，再往后一点声息也听不到了，带着黑发的头皮一块块脱落下来，裸露出生生白骨……

在五花八门的刑罚中乡亲们一个个丧了命，最后包括韩文秀只剩下8个人，日军放他们“回家”，他们信以为真。然而，日军并不是真的发了善心，而是在搞心理测试。半路又被截回来，其中刘建勋当下被活埋。

日军剥光韩文秀的衣服，用稻草绳蘸了水抽打，左眼被打伤后，疼痛难忍，倒在了地上两个日军分别抓住他那细瘦的前后肢，在一块石头上猛墩他的屁股，直至失去了知觉。

当他苏醒过来以后，被带到一个酒作坊。酒作坊虽然停业多时，主人也许遭了难，但空气中依然散发着浓烈的酒糟味儿。那些没有来得及坚壁的大缸还整齐在排列着，但缸内不是醇香的酒液，而是一具具中国人的尸体和污浊的黑血汤，在韩文秀被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两个日本兵架着一个赤条条的中国人，将他面朝下横担在大缸上，一个日本兵跳上去猛踩脊背，另一个日本兵在一旁观看，随着一声声惨叫，中国老百姓的身子一颤一颤地窝下去，头和双脚慢慢地搭在了缸沿上，口中吐出了鲜血，舌头伸在张开的嘴巴外面，但气息还未断。

下一个就轮到了韩文秀，倏然之间，他萌生了一个念头——逃跑，即使被枪打死也比那样惨死好受。

韩文秀趁日军不注意，猛地跳进作坊边的小溪，三步两步淌过河，很快钻进一片小树林接着扒上山坡，赤条着身子钻进芒刺如针的葛针林子。好不容易登上了山顶，但当下坡时，由于左眼失明，右眼视线模糊，一下子跌倒山崖下面。当苏醒过来时，已失去了行走能力。

10月13日，日军搜剿了北水峪一带的山场在惊慌的人群中发现了一名孕妇，四五个日本兵见她肚腹高高隆起，行走艰难，便用枪托驱赶着她在山坡上奔跑。孕妇拖着笨重的身子实在跑不动，日军就让作深度弯腰，还用枪托敲击她的肚腹，孕妇疼痛难忍，蜷卧在地上，日军揪住她的头发提起来，然后解开她的裤带，用力按捺头和脖颈，将头塞在自己的裤裆里，最后推下陡峭的山坡，活活摔死。

平阳交通站长张卫生的弟媳王贵亭她不幸落入了日军的魔掌，衣服被脱得精光，赤条条地站着，7个月的胎儿将小腹顶得老高。这时荒井走过来，打量了王贵亭一会儿，让部下把她押到各老村崔国瑞院内。

荒井叫出翻译官，指着王贵亭的小腹打赌。荒井说是男的，翻译官说是女的。两个决定剖腹验看。王贵亭的肚腹被剖开了，四脚蜷曲的胎儿随着惨叫的母亲滚落到地上，一日本兵用刀尖剥开胎衣，胎儿是男性，荒井在翻译官的恭维声中得意地笑着。……

日军残害孕妇的事件枚不胜数。

在“扫荡”后期，加强了对关押妇女的蹂躏和迫害，不论黑夜还是白天，不断有人被叫到日军住处，不甘心受辱的女同胞就冒死逃跑日军为了杀一儆百，选择了20岁的王青开刀。

日军将30多名青年女子从牢房中赶出来，押到李兰新的羊圈里，那儿放着一口棺材。几个日本兵将棺材盖打开，又把王青的衣服脱下，按倒在棺材里，然后又逼迫其他妇女也脱下衣服，站在棺材周围。

日本兵死死按住不断挣扎的王青，另一个日本兵手执利刀从王青的脖颈下横切一刀，刀锋一转，从切口处往下划，剖开胸腔和肚腹，挑出胎儿，然后用凉水浇灌胸腔，取出王青的心肝。最后又把胎儿的胸腔打开，也取出心肝放在一个白瓷盆子里端走了……

日军杀害了王青母子之后又恐吓围观的其他妇女：“你们要回家，统统这样的杀了，心的炒了吃！”

在平阳惨案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日军吃中国人的脑髓及心脏。

立彦头村人刘克水，是11月20日被抓捕的，日军当时没有杀他，让他做了苦力，专事劈柴烧水，给日军洗澡。

12月1日晚饭后，刘克水被莫名其妙地从牢房中叫出来，屋外站着几个日本兵。李克水困惑地问：“干什么？”一个汉奸喝斥说：“不用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原来岩田晚饭吃得不顺心，要喝酒，用人心做下酒菜，便想到年轻而体魄健壮的刘克水。日军将他押到村外喝令他止步。眼前是杂乱的尸体，还夹杂着牲畜骨骸。

汉奸强令他脱下衣服，解露出胸膛和肚腹。一名日军在他胸膛上拍了一巴掌，握着刀的另一只手猛地一挥，刀锋便扎进了刘克水的胸膛，残忍地挖出了刘克水还在跳动的的心脏。一颗活人的心脏便成了野兽的下酒菜。

日军吃中国人，还可以从一名叫韩文仲的汉奸口供中得到证实：“在上平阳期间，一次一天吃晚饭后，日本岩田、崔翻译官（朝鲜人）和我把一个老百姓叫到村东南角，崔翻译官杀了那个人，叫我取了脑子……另一次，日本军曹青田和崔翻译官在一起唱酒，崔炒的菜，叫我也喝酒吃菜。崔说：‘老韩，你来吃一下，真香啊你长了这么大，也没吃过这肉，这是人肉……’”。自至12月10日凌晨，日军撤出平阳时才暂时中止对根据地人们的屠杀，但身后却留下了一片片遇害者的尸体。位于上平阳村外的五个屠杀场尸骸横陈，黄土被血濡染成黑紫色。在一个高岸下面，象草垛一般放着70多具尸体，村外7个山药井也塞满了尸体，仅其中一个就有30多具，在村边一个广场上还有60多具女尸。在上平阳至平阳之间的道路两旁，树上到处悬挂着尸体。平阳一个农家院落里躺着八具尸体。院外是烈士刘旭梅的尸体，但已身首异处。头被扔进一口水井里，躯体躺在井旁的菜地里。她的两臂和前胸的肉已被旋下，不堪入目。

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大多无法辨认，除很少一部分被认领外，大多成了无主尸骸。晋察冀边区政府和阜平县政府派遣清理惨案现场的工作组，将这些有头无身、有身无头尸骨收敛起来埋在一个墓塚中，命名为“千人墓”。

如今，岁月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当年惨案的受害者和目击者大多已过世，但偌大的千人墓塚和竖立在坟丘前的石碑依旧以历史的证据向人们控诉着日军的侵华暴行。

(中共阜平县委党史研究室赵宪)

二、狂轰滥炸

血染三秦

用狂轰滥炸来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迫使中国人民屈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如意算盘之一。陕西为西北咽喉，是中国坚持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就把陕西列为轰炸的主要地区之一。

日机对陕西的轰炸遍及全省 55 个市、县、镇，西安、延安、宝鸡、潼关等地是他们轰炸的重点。

“七七”事变后，从 11 月 7 日，日机首先轰炸潼关，6 天后轰炸西安，直到 1945 年 1 月 4 日，最后轰炸安康，在 7 年多时间内，共轰炸 560 余次，投弹 13600 余枚，炸死炸伤 1 万多中国人，毁房 43000 余间。一次死伤在百人以上市、县有：西安、延安、宝鸡、汉中、安康等地。空袭所到之处，城市顷刻成为残垣断壁的瓦砾场；成千上万之我国同胞，躯残肢断，血肉模糊、死于非命。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陕西人民偿还不清的血债。

麦炸延安

1938 年 11 月 20 日清晨，太阳照耀着初雪后的延安，冰雪开始融化，和往常一样人们利用星期天，陆续进城赶集。9 点后，街上人群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景象。正在这时，突然响起呜呜警报声，日机 7 架，首次对延安进行轰炸。顷刻之间，炸弹呼啸而下，隆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惊恐万状的人群，不知躲到何处才安全。在南大街上，被炸死的很多人。最惨的是西山脚下的光华书店。在星期天，这是一个最拥挤的地方，大多是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在这里买书、看书。警报发出后，人们来不及疏散，敌机的炸弹正命中书店，地面上躺着横七竖八、残缺不全的尸体，死尸旁边还散落着抗日书籍及笔记本。有一位抗大的同学受重伤，当知道死神来临之际，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喊道：“同志们！加紧学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安祥地瞑目了。他们是一批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为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却蒙难牺牲在这里。

第二天日机又一次轰炸了延安。

延安遭受日机连续轰炸，死伤军民 152 人，毁坏房屋 380 多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狂轰滥炸的两天里，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进了凤凰山麓防空洞。毛主席在防空洞里泰然自若地看书学习。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深切关怀延安城内蒙难群众和机关干部，亲自部署救援工作，慰问伤病员，听取汇报和延安群众一起度过这不平常的日夜！

为了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边区政府和延安防空司令部对防空事宜做了认真的部署，延安《新中华报》在 1938 年 12 月 5 日，又发表了题为《加紧防空与锄奸》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加紧防空，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绪，做好锄奸和各项工作，以英勇顽强的精神，与日机残酷轰炸、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作斗争。

以后，日本飞机对延安的轰炸更加频繁。飞机由开始的每天 7 架增加到 10 余架，最多时达到 71 架；投弹每天由数十枚达到 200 余枚；轰炸时间由上午改到下午，最后发展到全天；轰炸次数，由开始时的一天一次，达到一天四次轮番轰炸。1939 年 9 月 8 日晨 5 时 30 分，当防空司令部接到有敌机向延安飞来的报告后，立即发出空袭警报。不久，敌侦察机 3 架，轮番前后 3 次飞到延安上空盘旋侦察，9 时许，便有重型轰炸机 15 架，由东南飞来，

投弹后向东北方向飞去，接着又有 28 架，由东面飞来作第二次轰炸，直到 11 时才解除警报。两批 43 架轰炸机，共投弹 200 枚，多数炸弹落在城内北街和西山上，计毁房 150 余间，死伤 58 人。其中：遇难的有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他是来延安汇报工作的），还有 129 师政治部第三科科长钟方申等人。

9 月 10 日下午 6 时，延安各军事机关代表百余人，在八路军政治部为钟蛟盘等 50 名同志举行了追悼会。由谭政致悼词。

不久，敌机又疯狂肆虐，于 10 月 15 日出动 71 架飞机轰炸延安。上午 9 时，第一批 36 架进入延安上空，盘旋投弹 103 枚，即向东逸去，下午 1 时 45 分，敌机二次来袭，敌侦察机一架窜入上空，往返盘旋近一小时。2 时 40 分，敌轰炸机 35 架分三批相继窜入，轮流轰炸，计投弹 122 枚，直到下午 4 时 30 分才离去。我军民死伤 60 余人，大批房屋被毁。

从 1938 年 11 月到 1941 年 10 月近二年的时间里日本飞机对延安轰炸 17 次。其中轰炸最残酷的是 1939 年，共轰炸 10 次，出动各种飞机 187 架次；投掷各种炸弹 1189 枚；我军民死伤 229 人；毁坏房屋和窑洞 7882 间。整个延安城基本上已被炸成废墟。

1946 年 3 月 10 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关于日寇轰炸延安损失的文章：“延安市南关乡代表顾宗仁，提出要求日寇赔偿轰炸延安损失案，并请国内外救济机关、团体救济以重建延市。兹将损失情况调查统计如下：

轰炸次数：17 次（投弹 1690 枚）；

伤亡人数：伤 184 人，死 214 人；

毁建筑物：公共房产 1176 间、石洞 5 座，民房 14452 间；

另有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屋 94 间；天主教堂房屋 75 间；

死牲畜：197 头；

毁粮食：344,000 斤。

此外，尚有其他损失……”

西安平民遭浩劫

1938 年 11 月 23 日，一个昏沉朦胧的清晨，乌云密布。西安市西区回族同胞正在这沉闷的氛围中隆重举行开斋典礼。各清真寺大殿内跪着一排排的伊斯兰教徒，在虔诚地向真主祈祷和平。突然警报声紧急地响了起来。瞬间 20 架敌机，由远而近，以市中心及西北隅大、小皮院一带和各清真寺为目标，投弹 80 余枚，爆炸巨响不断地响起，火光、黑烟、敌机狂吼声，把整个西安城震荡起来。人们不知道熬过了多少时间，警报才宣告解除。受惊的人们在街道上奔走，忐忑不安地张望着，这儿是焦椽破壁，那儿是血肉残骸，昔日巍峨的大殿，如今已成为瓦砾，被压在瓦砾下面的人们在呻吟呼救、惨叫……。救护队正忙着抢救受难同胞。

这次敌机集中轰炸回坊清真寺和住宅区，灾情惨重，计被炸清真寺 4 座，民房 150 余间，回教难民收容所全毁，死伤 160 余人，惨状令人目不忍睹。一位 80 岁的回族老翁，对拥挤的人群高喊道：“日本强盗的野蛮暴行，残忍毒辣，我们绝不能忍辱偷生，唯有遵循真主‘给打击者以打击’的命令，抗战到底。真主一定会怜悯我们，给我们最后的胜利”。

1939 年 3 月 7 日下午 4 时，日本飞机 14 架狂炸西安市区，投弹百余枚，死伤平民 600 余人，毁房屋千余幢。这是西安古城的一次空前浩劫。被炸地区有东大街、东木头市、西大街、糖坊街、土地庙什字、莲湖公园内、大麦

市、桥梓口等平民住宅区。东大街从大差市口到北柳巷口，长达约一公里的商业区内的大火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才得以熄灭。土地庙什字街天主教堂和糖坊街天主北堂均被炸毁。该教堂屋顶都悬挂很明显的意大利旗帜，而炸弹却正好落在旗上爆炸。

狂炸武功农学院

1939年4月成立的西北农学院，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座农业高等院校。

1940年8月30日上午10时，24架日机，分二批对西北农学院进行狂轰滥炸，共投掷杀伤弹、燃烧弹120余枚，计毁校舍136间；不同程度的震坏房屋366间；蓄水池2个；炸死马2匹，伤3匹；毁蜂30余箱；美国种猪2只和其它物资、器皿、仪器等。这次轰炸，无辜农民被炸死8人，伤15人。

1941年8月5日上午8时30分，日机7架第2次空袭农学院，投弹20余枚，图书馆、印刷室、合作社、附设高职办公室等多处被炸，师生3人遇难。

1941年11月30日上午8时，日机进行第3次轰炸，紧接着于下午4时，又来飞机4架进行第4次空袭，计投弹30余枚，大礼堂、宿舍等多处被炸毁，一名校警受重伤。

滥炸申新纱厂

抗战爆发后，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为躲避战火，于1938年8月将其在武汉的纱厂迁至宝鸡，连同一些小厂，形成十里铺一带的工业区。

1939年8月，宝鸡申新纱厂开车生产。这期间，敌机轰炸日益频繁，西安大华纱厂被炸毁。为防止申新纱厂重蹈覆辙，经理李国伟于1940年1月，在长乐塬山脚下动工兴建24个窑洞车间，几经周折，终于在1941年2月建成，总面积为4847平米的大型地下窑洞工厂。安装纱机3万余锭，70%的纺部设备皆安装地下，被命名为“纺纱第二工场”。既保障了工厂的生存，又增加了生产。李国伟经理说：“在这紧急时刻，多一分生产，就是多一分国力。”“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家，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居民，均有赖吾等接济。”

1941年4月19日地下工厂正式生产，棉纱产量达到开厂以来最高水平。著名文学家林语堂称地下工厂：“是他所见别的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1940年8月31日上午10时，日机36架，分批袭击宝鸡。第一批12架，对纱厂、车站等地区投掷炸弹、燃烧弹，接着第二批、第三批轮番轰炸，投弹百余枚，一部分落在申新纱厂周围，厂区中弹20余枚，厂内各处顿时起火燃烧。瞿冠英、蒋叔澄两位厂长带领防护团全体成员，在警报声中出动，个个奋不顾身，冒死抢救。

这次轰炸炸死建筑公司一名工人，4名警卫受伤，地面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财产受到很大损失：1114包棉花被焚毁，60台织布机、1部码布机、1部打印机、1台伸幅机、10辆布车被炸坏·修理间机房、栈房、宿舍屋瓦和墙壁等多处被震毁。

1941年5月22日，日寇又重点轰炸申新纱厂，敌机8架列队进入申新上空，盘旋多次后，即轮番轰炸，投下各种类型炸弹40余枚，都落在申新纱厂内，炸毁房屋20余间，炸毁一些机器，烧毁棉花千余包。

日机对陕西的疯狂轰炸制造血腥屠杀的罪行，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不仅是为了不忘记过去，更重要的

是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从而振奋民族精神，为加快经济建设、搞好人防、强儿国防、早日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宏伟目标而奋斗。

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历史的悲剧决不许重演。

（陕两省人防办肖银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重庆大轰炸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党、政首脑机关相继移驻重庆。沿海及其它沦陷地区的工商业、金融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学校团体也纷纷内迁重庆。重庆这一战时首都就成为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的重要目标，犯下滔天罪行。

阴险的战略残暴的计划

1938年武汉、广州战役以后，日寇“速战速决”的阴谋破产，转而采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方针，一方面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时加紧策动汪精卫集团叛逃，扶植汉奸傀儡政权；另一方面，配合军事进攻，实施以重庆为中心的“战略轰炸”计划，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达到其动摇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最终迫使中国屈服投降的罪恶目的。

日军经过1938年1月17日、2月18日两次对重庆市郊广阳坝的试探性空袭轰炸以后，日本天皇于8月2日下达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的命令，由大本营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侵华日军传达“第241号”大陆敕令，要求对中国的航空作战，尤其要压制和扰乱中国的战略和政略中枢，并尽力消灭中国航空军力，整个轰炸任务由华中派遣司令官负责，海军密切协作。

为实施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侵华日军迅速抽调了由陆军第12、59飞行战斗队；航空兵团第1、3飞行团；海军第1、2联合飞行队、第3航空战斗队合成的空军兵力，拥有多达402架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攻击机、战斗机。

日寇采用了长达数月、不分昼夜的“疲劳轰炸”，大批飞机的“轮番轰炸”，少量飞机“乘隙骚扰”和利用夜间、黎明的“月光轰炸”等战术。统观日机迭次轰炸的特点：一是规模大。日空军每次轰炸重庆，出动的飞机，多则百余架，少则数十架，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倾巢出动；二是持续时间长。日空军避开重庆每年从秋未到初春的雾季，轰炸多集中于5月至9月间，以求“辉煌战果”；三是具有明显的大屠杀性质，每次轰炸都以人口稠密、工商繁盛的市区为主要目标。日寇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性与疯狂性，在重庆大轰炸中暴露无遗！

灭绝人性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5月的山城重庆，已摆脱了近半年的浓雾和连绵阴雨，到处阳光灿烂，春意盎然。

5月3日上午，日本侵华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部队第13、14航空中队的36架攻击机，从武汉起飞，沿长江越过宜昌、奉节、万县，朝重庆飞来。这天一早，鄂西第六战区即电告敌机西进，似有袭击重庆企图。最高军事委员会转告驻渝各军事机关，重庆防空司令部一直到中午12时45分才发出空袭警报，12时55分发出紧急警报，重庆全城顿时人拥车挤，堵门塞路，乱作一团。1时17分，敌机飞临重庆上空，中国空军30架战斗机升空迎战（后击落敌机两架），日机以18架为一队，分二队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弹，燃烧弹。三个一束、五个一群，直泻而下，顷刻间，重庆全城淹没在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焰之中。

敌机投掷的98式250公斤级炸弹，爆炸时约有一万块弹片呈15—25度扇面向四周迸发，可把45公尺以内的人杀死，把200公尺以内的人杀伤，在重庆的岩石地面，也能炸出一个直径8公尺，深1.5公尺的大坑。而98式7

号、6号燃烧弹靠落地冲击力引燃内装17.8公斤的铝热剂或镁合金、释放出2—3千度高温,燃烧时间达10—15分钟,具有烧穿20公分水泥房顶的威力。

在敌机的猛烈轰炸下,闹市区的新丰街、陕西街一带被炸得满目疮痍,不少街区一片瓦砾,几成废墟。许多市民来不及进入防空洞,纷纷拥入中央公园。随着隆隆的爆炸声,孙中山先生雕像被炸毁,花草树木成片连根掀起,“树上七零八落地挂着被炸死的人腿和胳膊”,“地面上乱七八糟地躺着许多尸体”,“公园里一片喊叫声、呻吟声”,垂死的人“在血泊中痛苦的扭转着身体,周围一片火海”。美丰银行大楼、四川盐务银行大楼等全市最高大的建筑被撕裂,在燃烧。《新华日报》社、《大公报》馆、《新蜀报》馆等均被炸,学校、商店、工厂被炸,一栋栋民房被大舌舐光了。由于人力不足,药品缺乏,医务人员面对众多的负伤市民“毫无办法”;由于自来水管炸裂,道路堵塞,消防队员眼看着茫茫火海“束手无策”。

刽子手仅用了13分钟的时间,在市内40余处街区27条主要街道投弹,顷刻间,大梁子、左营门、苍坪街、新丰街、都邮街、一牌坊、储奇门、太平门、商业场、神仙口、陕西路、西四路、朝天门、玛瑙溪等17条街道几乎被炸成废墟,到处是焦土烟火,断垣残壁、死尸枕藉、血肉横飞……。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当时粗略统计,5月3日一天造成673人死亡、350人受伤、毁房近千栋的深重灾难。

残暴的日寇紧接着又进行了更加疯狂更加野蛮的大屠杀。

5月3日夜,日塚原少将决定于第二天傍晚再度对重庆进行全面的“猛烈轰炸”。轰炸目标,是3日未遭大规模轰炸的另一半城市街区,即习惯上称为:下半城的沿嘉陵江边毫无军事设施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日本帝国主义官方宣称,重庆大轰炸只是“偶然有炸弹伤及市民”。这是恬不知耻的谎言,是对全世界的欺骗。塚原少将关于对重庆下半城进行轰炸的决定是赤裸裸地把中国平民作为直接屠杀对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5月4日下午,日军27架攻击机分3批由武汉起飞向重庆。17时17分,重庆拉响空袭警报,18时20分,拉响紧急警报。日机从四面八方朝市中区扑来。敌机投弹集中在小梁子、都邮街、夫子池、七星岗一带的近40个街区。由于大量投掷燃烧弹,而下半城居民商肆多为木板房,故火灾比3日更为严重。仅朝天门到七星岗东西2公里,中山公园至嘉陵江边南北700公尺的区域内,就引起14处大火:“不一会便成了一片火海”。都邮街15家丝绸店悉数烧塌,损失绸缎167200匹;整条鸡街全部被炸毁,国泰电影院被炸弹直接命中,死伤民众200余人;商务印书馆全部焚毁;全市37家银行中就有14家被烧毁;几乎所有的广播、报馆、出版社均毁于一旦位于上下城之间的罗汉寺,是已有近千年历史的重庆第一禅林古刹,正在做佛事的僧侣们刚听到紧急警报,还没来得及进防空洞,无情的炸弹便从天而降。爆炸声中,一片火光中8个和尚当场丧生,其中一个和尚事后挖出来时仍保持着盘膝打坐的姿势。整个罗汉寺连同神态各异、精美绝伦的500尊罗汉以及四周许多民居,全部被熊熊烈火所吞噬。美国记者罗伯特·马丁和塞德·怀特目睹了这座历史文化古迹和佛教圣地的毁灭:“房屋烧塌,佛象露了出来,寺庙倒塌,崖面一边的巨大青铜佛象显现出来,火光照射得光辉灿烂。坐佛的慈善面容,含着微笑,凝视着哭泣的首都”。

除了罗汉寺之外,还有长安寺、二郎庙、离明宫等寺庙,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和教堂也同时罹难。

驻重庆的外国使领馆也未能逃脱大轰炸的厄运。重庆市警察局长徐中齐在当年5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记录：“1.领事巷英副领事馆大班房间被炸、被毁，死伤妇孺数十人；2.领事巷三号英国大使馆落一巨弹，死男女各9人，压在瓦砾内尚未掘出者未详，毁房屋50余间；又燃烧弹一枚，落于英大使馆厨房附近，幸未起火，但全部房屋震塌；3.英领事花园内落一弹，炸死二三十人，重伤30人；4.德国领事馆附近中弹起火（震塌使馆门窗墙壁并延烧使馆房屋——作者注）；5.法国领事馆被焚”。日寇无视国际公法，狂炸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各国使馆，对此暴行竟然辩称只是出于“自卫”！这就是侵略者的强盗逻辑。

著名作家老舍记述了当夜所见到的情景：“这晚上有月，可是天空中的光亮并非月色，而是红色的火光！……只见满天都是红的。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人骨、财产、图书为柴，所发射的烈焰。灼于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

第二天中午，记者梦醒从光华街大阳沟走到油市街，一路上火继续在燃烧，房屋还在不断倒塌，沿途到处是尸体，稍不留心，“脚下往往会踏到断肢碎肉，那般红的血渍，虽给泥尘瓦砾吸收了，尚可很明显地看出来。”最怵目惊心的是那些被活活烧死的人，我虽竭力缩小我的视野，但那烧焦了的尸体，还是不断地跃进我的眼帘，有的横卧在铺店的门首，有的横七竖八地倒在街头，被火烧焦了的尸首像烧焦的木头，辨不出四肢来了；有的给火力的压迫腹部异样的膨大，肠子也爆裂出来了，眼珠鼓凸着像是切齿痛恨敌人”。和平居民何罪之有？竟遭如此惨酷的劫难。

据重庆防空司令部不完全统计，5月4日这一天，被炸死3318人，炸伤1973人，毁房2840栋又2963间。因一次空袭死伤5000多人，创下世界空袭屠杀史上罕见的记录！日寇对此却得意忘形地宣称：“为事变以来最猛烈之轰炸”，“轰炸尤其燃烧弹命中之正确，殊为惊异”，“商业中心区及住宅区破破坏甚重，兼以当日风势极强，致燃烧波及各方，七日方始消灭，全市约有三分之一化为灰烬”。

“五·三”、“五·四”大轰炸，敌机共投掷爆炸弹262枚，燃烧弹168枚，仅从“重庆空袭救济紧急联合办事处”截止5月31日从事救治、掩埋的统计，两天内共炸死4572人（包括伤重不治致死），炸伤3637人，已大大超过防空司令部的统计，实际伤亡人员肯定不止此数。恰如日本学者前田哲南所说，日寇没有踏上重庆这块土地，没有持刀握枪面对重庆的中国人，他们在高空只是搬动投弹杆，就像操作汽车变速杆一样，疯狂而卑劣地制造了这一人间惨

坚不可摧的“重庆精神”

日寇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使重庆人民屈服，更动摇不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5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用战斗回答敌寇轰炸》的短评，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敌人的每次兽行，只能更坚强我军民奋斗的决心，鼓励我全国抗战的勇气。”“我们要以工作和战斗把日寇葬送在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血火交流的愤怒中”。

幸免于难的“生活书店”照常营业，吸引了更多的青年阅读和购买各种书报。

南开中学在5日、6日照常举行运动会，校长张伯苓勉励师生，“敌人想威胁屈服我们，我们偏不怕他的威胁，我们规定要做的事情，必须按着规

定夫做，我们要于到底，要顶到头”。

救护队、医疗队、服务队、军队、工友、学生分赴各灾区为清理、抬埋、治疗、抢救而汗流浹背、废寝忘食。

生活教育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慰问、赈济、输送难民、为介绍、帮助工人、厂商复业而不分昼夜忙碌。

各工厂迅速迁入防空洞、山洞或乡村日夜开工、加紧生产。

日寇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曾与蒋介石及其他包括共产党方面之要人会见，彼等不顾日本之空袭，精神饱满，一般人民亦较武汉、广东陷落之后士气旺盛，且皆发奋自强，”“空袭之结果，与其谓四川人对战争之惨酷起恐怖之心，毋宁谓徒使增强其抗日气焰而已”。

日本侵略者从1938年1月17日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到1943年8月23日为止，共空袭重庆218次，（其中122次在市区内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主要集中在1939—1941年，平均每年空袭70次，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2312枚，（爆炸弹15476枚，燃烧弹3751枚，空爆弹2791枚，未爆弹294枚）。其间又发生了1940年“八·一九”、“八·二”大轰炸和1941年“六·五”大隧道毒气窒息等惨案，分别伤亡数千人。累计被炸、焚、震毁房屋11510幢34854间和542艘船只、57辆汽车，共炸死2万余人，炸伤15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公私财产损失超过692亿元。

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轰炸”计划并没有得逞，重庆人民并没有被狂轰滥炸所吓倒，而是与之展开了顽强的、持久的反轰炸斗争，直至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驻渝空军（包括苏美盟军）和高炮部队浴血奋战，先后击落击伤数百架日机，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寇的狂妄气焰。全市防空设施日趋完善，拥有可容纳44万余人的公私防空洞，建立起适应战时需要的情报、警报、消防、救护、赈济体系，并积极疏散市民近百万，有效地减轻了无谓的牺牲。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得到了包括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在内的全国军民的配合和支持；得到了广大爱国华侨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慰问和援助。重庆人民在轰炸声中坚持生产、发展经济；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拓展城区。战时重庆的钢铁冶炼业、军工兵器业、化学纺织业……迅猛发展，为支持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重庆人民节衣缩食捐献数千万元购买飞机、枪炮、药品、衣物，支援前线；有数十万子弟从军参战，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愿尽天职。

遭狂炸的山城重庆巍然屹立、雄姿英发。在反轰炸斗争中磨炼出来的重庆人民不屈不挠、抵抗横暴的精神光耀日月、彪炳千秋！

（重庆市档案馆程雨辰）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资料来源：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译，1987年1月出版。

[日]前田哲南著《重庆大轰炸》，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出版。

《新华日报》1939年5月4日第2版。

《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渝市灾民临时救济会第四次会报记录》，重庆市档案馆藏《卫生局全宗》。

《日本当局收集重庆大轰炸情报史料一束》。重庆市档案馆藏。见《档

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3期。

老舍《五四之夜》，载《七月》第4集第3期，1939年7月出版。

《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档案馆编，第90页。

《本市历次空袭损害统计表》，重庆市档案馆藏，《市政府全宗》。

《全民抗战》周刊第70号。1939年5月13日出版。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稿程雨辰撰稿)

滥炸浙江蒋经国生母罹难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地处东南前哨的浙江省备受日军铁蹄的疯狂蹂躏。日本侵略军自 1937 年 11 月 5 日从杭州湾的金山卫和全公亭登陆后，12 月 24 日攻陷杭州，之后陆续窜扰了除昌化、遂安、仙居、泰顺、龙泉、庆元、云和、景宁、磐安等 9 个县以外的所有地区，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罪行滔天；同时还轰炸了除磐安、泰顺、景宁、庆元等 4 县以外的所有地区，数十万间民房被毁，无数平民百姓血肉横飞。

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真实地记载了日机在浙江领空肆意穿梭、炸弹遍地开“花”的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幕悲剧。浙东的奉化溪口、浙北的萧山、浙西南的丽水可谓多灾多难的重灾区。

奉化溪口，是个山清水秀的要镇，也是蒋介石的老家。日军于 1939 年 12 月 12 日至 1941 年 4 月 22 日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对溪口实施 13 次狂轰滥炸，致使百余人丧生、数百间房屋被毁，风景如画的溪口镇，顿然失去了往日的美丽。

在屡次劫难中，最惨重的莫过于 1939 年年底和 1940 年年初的两次。

1939 年 12 月 12 日，天气晴，远山若黛，溪口镇显得异常宁静。下午 2 时左右，隆隆的飞机声划破上空，6 架日机从溪南新建岭山岙方向冲出，直扑溪口镇而来，并在溪口竹林上方散开队形，插向东西两侧。毫无防备的当地居民好奇地抬头张望，没料到飞机扔下一连串炸弹，人们被震得晕头转向，在外面的人拼命往屋里逃，在屋里的人又拼命往外面跑。一时间，天上的刺耳机声与地面大人的呼叫声、妇女小孩的哭喊声交互夹杂，乱作一团，整个溪口镇成为一片火海。

此次轰炸，日机的靶心集中于蒋介石故居丰镐房和别墅文昌阁，这一带连落数弹，创伤甚重。

其实，在扩建丰镐房时，按照蒋经国的要求，建立了防空设施。可是，当敌机在头上盘旋寻打目标下“蛋”时，丰镐房内的人一个个慌了手脚，竟忘了家里有防空洞，一个劲地往外跑。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晚年患有腿疾，行动极不方便，出逃时，发现忘了带房门钥匙，又急忙返回去取。教授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中文的董姓女教师抱着毛氏再次逃出后门，刚到后墙弄，三枚无情的炸弹便在她们的周围开花了。

敌机远去，警报解除后，出逃的人陆续归来，唯独不见蒋母毛氏和董老师，焦急的人们四出寻找，萧王庙村舅家、岩头村娘家、石鳍岙祖坟等等，凡是她们可能去的地方全找遍了，都不见他们的身影，只得向县政府、省政府求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曹仲麟奉命驱车赶到溪口时，奉化县长何扬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已在丰镐房查勘多时，三人见后墙弄倒塌处微微隆起，分析可能底下有人，立即雇了 12 个民工，点起汽灯，连夜小心翼翼地清理现场，终在塌墙底层发现两具尸体。只见毛氏身体上部完好，下部中弹，其腿上有弹洞，肠子流出；董老师血肉模糊，一条大腿不知去向，两人均早已停止了呼吸。毛氏遗体由武岭学校校医包扎整容，入殓后停放在蒋氏家庵摩诃殿。

《奉化市志》，第 646 页。

《蒋介石家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第一版。

《蒋介石家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第一版。

蒋经国闻此噩耗，悲痛欲绝。即吩咐司机毛宁邵备车，带妻儿星夜兼程，于14日下午赶到溪口，一跳下汽车，就直奔其母灵堂，扑在灵床前抚尸恸哭昏厥过去。人们急忙用茶水把蒋经国救醒后。他依旧跪在地上悲号。12月25日，他手书“以血洗血”四字，刻石制碑，立于其母罹难处。他在武岭学校向师生发表讲演时，以拳击桌，咬牙切齿地陈词：“当前我们的第一个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个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个敌人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其丧母悲痛之情及对日寇的愤恨之心在这寥寥数语中可表露无遗。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1945年6月他在《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说：“先母罹难，此余一生最痛心之事。”

这次轰炸，日机共投弹13枚，丰镐房5死1伤，文昌阁被夷为平地。在丰镐房遇难的除蒋母毛氏外，还有蒋经国的表兄、帐房宋涨生，蒋氏族人、雇工蒋昭明，蒋方良的家庭教师、慈溪人董女士和一名烧火老妈。女佣江山凤被炸断右腿，后经及时送往宁波华美医院抢救，幸免于难，她成了此次日机轰炸溪口的最好的历史见证人。

此外，武岭学校、汽车站等场所也遭轰炸，共计死亡19人，受伤30余人，100多间房屋轰然倒塌。

事隔不久，日机再度轰炸溪口，这次的轰炸是直冲蒋经国来，欲置他于死地。

奉化有个旧习俗，人死后家属要“做七”，每隔七天祭奠一次，做完七次为止，所以第七次成了最被人们着重的一次，俗称“满七”。1940年1月29日，蒋经国为母亲毛福梅做了个隆重的“满七”，消息为日本间谍探知，于是导致了1940年2月10日的轰炸。

那一天，适值农历正月初二，天气晴朗，人们虽屡遭劫难，仍沉浸在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中，不料又一次大难临头。午饭后不久，9架意大利制造的日机从西北方向窜入溪口上空，镇上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呼喊声、哭叫声不绝于耳。居民扶老携幼，纷纷向四周逃散，以躲避空袭。上街至武岭公园的住户，大多涌向与公园隔溪相望的上山村竹林中藏身，连奔驰在奉新公路上的运货车也一辆接一辆地驶往上山村隐蔽。

谁也没有想到，被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恰恰成了日机这次轰炸的重点目标，敌机散开后，连续倾投48枚爆破弹和燃烧弹，顿时浓烟腾空、烈焰冲天。在不远的周坑乔，贮藏着一些液体燃料，火花所及，立即燃起熊熊大火，那儿成了一片火海。许多人受不住硝烟的熏烤，四处奔跑，敌机见状，低飞扫射，刹那间，不停的机枪声、凄惨的哭喊声响彻乡村山谷。

在这次轰炸中，共有180余间房屋被毁。整个上山村130多幢房子，只孤零零地留下村外一座凉亭，其余全部倒塌。溪口上街头靠近武岭公园的28间崭新楼房原是蒋介石扩建丰镐房时专门为从那里迁出的邻居建造的，也全部变成瓦砾场。死伤民众达40多人。上山村竹林附近尸横遍野，断腿残臂散落各地，随处可见进出的脑浆，其惨象令人永难忘却。溪口无辜百姓又一次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萧山地处宁波与杭州咽喉部位，也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萧山

《蒋介石家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

《奉化市志》，第646页。

县志》载，自 1937 年 11 月至 1939 年 9 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萧山各主要集镇均遭日机轰炸。日军先后出动飞机 192 架次，轰炸 72 次，平均每 10 天就有一次空袭，投弹 530 枚，炸死我同胞 605 人，炸伤 2227 人，毁坏房屋 4585 间。

萧山县城城厢镇，在诸多城镇中首当其冲。1937 年 1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许，日军出动 28 架次，从东北方向侵入该镇上空，进行了历时两个小时的长时间地毯式轰炸。

国民党萧山县政府，是日军这次偷袭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带落弹特别密集。当时萧山县县长厉家祯刚刚陪同中央党部指导员张效良等结束调查户口、清除汉奸工作，10 时 30 分左右，县长“回府正在赶作报告时即闻空袭警报，越五分钟又闻紧急警报……随闻机声已临办公室上空且在室之东南，沙田股方面落弹，各职员闻声躲避”，“时敌机十余架集中上空投弹，机枪如雨，县长于枪弹纷飞之下，冒险入内躲避，复越办公室至防空监视哨预筑之防空壕内，幸免于难”中山公园、县前街、南街、城隍庙前一带（现人民大道与市心路交叉口及其以南地区）也落下不少重磅炸弹。

在震耳欲袭的阵阵爆炸声中，县政府、县党部，县卫生院、救济院、县监狱、县农会、长途电话局、河南小学、河北小学、仓桥小学等机关、团体、学校均遭破坏，东起水亭址、西至湫口坝、南至南街（现人民医院）、北至运动场（现大会堂背后），大半个萧山县城约 5000 间房屋被炸毁，损失十分惨重。

在进行轮番轰炸的同时，日机还不断地向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扫射。发现街道上人群密集的地方，日机便超低空飞行，用机枪猛扫。为躲避机枪和炸弹的袭击，许多群众逃到大弄东面的竹园，他们一心以为茂密的竹林能保佑他们相安无事，谁知连这块地方也没被放过，日机发现竹园内有人藏匿，便疯狂地射出一串串罪恶的子弹，园内近百名平民无一生还。直至 12 月 1 日晨，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冯华熙赶到竹林时，“还有七八具尸体未曾收殓。”

炸弹引燃的大火，“燃烧至烈，至晨一时犹未熄灭，情形殊惨”，整个萧山城浓烟滚滚，火魔狂舞。大批民房、大量财物被大火吞噬，更有为数众多的人活活葬身火海。

狂轰滥炸后的萧山城，到处弹坑累累几乎找不出一块完整的地方，交通、通讯完全中断。横贯城中的城河被炸塌的房屋墙土填满，被鲜血染红的河水四溢横流。无论走到那里，都可以见到断垣残壁，可以见到神态不同、身首异处的尸体，前往采访的《东南日报》记者报导：在大弄口放眼望去，但见“四周砖瓦断壁，焦木堆积如山，把一个阔不到 5 尺的路面完全阻隔住无法前进”；府前街的“县法院的办公室已炸得七零八落，县政府前面办公室尚余火未熄……”；“县府隔壁的县监狱署。门面已被炸塌，内部监房也被炸毁，听说囚犯死伤很多，监狱署对面的几间平房也被炸塌了”；在中山公园

《萧山县志》第 782 页。

1937 年 12 月 21 日萧山县县长厉家祯关于“萧山县惨被敌机轰炸情形及办理善后经过”致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电。

《东南日报》1937 年 12 月 3 日、1937 年 12 月 2 日。

《东南日报》1937 年 12 月 3 日、1937 年 12 月 2 日。

附近数具备不完整的尸体旁，“三只野犬正争啖几块零碎的尸肉”；“无家可归的人们不得不风餐露宿、沦落街头，情形至为凄凉”；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具具“烧得如焦木似的尸体横卧在道路旁边的瓦砾中”。

据《萧山县志》记载，1937年11月30日日军对萧山县城的轰炸，共投下炸弹与燃烧弹120多枚，使近200名群众丧失性命、死无完尸，1000余人被炸伤炸残，以致昔日繁华的萧山县城城厢镇几成废墟。

浙西南重镇丽才，曾一度为浙江省教育厅、建设厅所在地，加之建有一个飞机场，虽然机场没有什么军事设施，仅是一片空旷的平地，难得停有一二架飞机，但早已引起日军的注目，也成了日军轰炸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抗战八年中，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晴天还是雨天，日机都会在丽水上空神出鬼没出现，这一地区的人民始终处于恐惧状态。太保庙顶的那口大钟，是丽水城传递空袭警报的唯一“设备”，当地人民只要听到钟声一响，就会马上扔下手中活，正在烧饭的丢下柴火，正在吃饭的丢下饭碗，正在田间干活的丢下农具寻找栖身之地。只要能藏身的处所，哪怕再脏再臭也在所不惜，甚至连一些墓穴也成了“防空洞”。

历次轰炸中，大凡房屋稠密的地带，大凡设有重要单位的区域，大凡入多的地方，都遭到了日机的重点轰炸。飞机场、政府所在地、英士大学、医院，中小学、救济堂、育婴所等都连遭数劫。桐油公司、食盐公司被毁坏殆尽。

在日军对丽水的总共360多次狂轰滥炸中，有23次特别严重。仅这23次空袭中日机就投下740多枚炸弹，其中燃烧弹68枚，大批房屋被破坏。据幸存者林宝全老人回忆说，1942年他家的房子被炸塌，此后的1944年，他在桂山书院当来一幢房子，当年又被燃烧弹烧毁，仅剩一堆焦土，于是其妻再也不让他置房产，所以直到解放，他家除留下几个人外，其他一无所有。与此相仿，高井弄口有个开南货店的姓吴的入，房子被炸毁了又盖，盖了又被炸毁，如是反复三次。

相形之下，他们还是幸运的。有更多的人，不仅房屋被毁，而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次日机抵丽水空袭，丽阳门外碧角桥边有个叫王满的青田人，一家10口想逃往防空洞避难，不意途中他的儿子被弹片击中，一家人情不自禁扑在孩子身上放声大哭，岂料敌机掉转机头又掷下一颗炸弹，在剧烈的爆炸声中，10口之家当场被炸死6人。在1942年3月20日的轰炸中，白塔头的吴政伟家三代人一次就被炸死11人之多。另有一次，白塔头蔡卫兵妻子的头盖骨被弹片整个儿掀掉粘到了树上，连手上抱着的两三岁的孩子也一同遇难。

丽水空袭史上最惨的一次要数1941年4月23日。这一年的4月3日，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宁波、镇海、鞞化、上虞、绍兴等县相继沦陷。4月17日，日军一部在瑞安登陆，侵犯浙南沿海各县、温州所属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玉环，台州所属临海、黄岩、海门等县，在22日前后相继沦陷。为给地面部队扫清道路。4月23日，日机对丽水再度实施狂轰滥炸。日机在槐花树下邮电局的防空壕上方投下一枚炸弹，防空壕炸塌，壕门被泥土深埋无法

《东南日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2日。

《丽水文史资料》第二辑。

《丽水文史资料》第二辑。

开启，致使壕内 60 多人全部窒息而死，其中多数是邮电局职工和家属，有的全家罹难。仅这一次，就炸毁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及民房 2200 多间，尸体拖出后摆满了整整一条街。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丽水被敌机炸毁的房屋多达 7000 余间，炸死的民众上千人。

日军在奉化溪口、萧山、丽水等地的狂轰滥炸，仅仅是日军轰炸浙江的缩影，类似的事件在浙江其他地区也时有发生。在众多轰炸事件中，一幕幕悲剧在浙江各地重复着上演不胜举。日本帝国主义对浙江狂轰滥炸的残暴行径，有浙江的山为证，浙江的水为证，浙江的人为证，有十万平方公里的浙江的每一寸土地为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谁也抵赖不了的。

（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黄梅英吴永良）

我家在日寇大轰炸中的遭遇

八年抗战中，在远离沦陷区和抗日战争前线的四川大后方，也有数以万计的同胞，在日寇另一种屠杀方式——飞机的轰炸之下，悲惨死亡或被炸成伤残，我家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倾刻之间家破人亡

1941年7月27日，日寇出动103架飞机对成都进行狂轰滥炸。这一天，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永世难忘的痛苦的日多少年来，我不愿回顾、不忍回顾这惨痛的日子。一想起这段往事，我的心要淌血，我的泪忍不住要流。可是，为了让在和平环境中无忧无虑成长起来的青年朋友们了解过去，珍惜今天，我还是拿起了沉重的笔。

1941年，我只有13岁。在7月27日日机轰炸的这一天之前，我是一个天真、快乐的小女孩，我有一个虽不富裕却很温馨、和谐的五口之家。全靠父亲工薪为生，父母感情甚笃，姐姐就读于树德中学高中，我就读于成县女中初中，妹妹不到三岁。

可是就在7月27日日机轰炸的这一天，38岁的父亲和17岁的姐姐惨死在敌机的轰炸之下，我和妈妈被炸伤致残，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倾刻之间家破人亡！

在国弱民穷的旧中国，敌机来炸，偌大一个成都，上无战机拦截，下无供人民栖身避难的“防空洞”。当时，每当市政府发布敌机来袭的“预行警报”后，惊恐万状的成都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跑”，跑到空旷的地区，跑到郊外的竹林茅屋下隐蔽起来，当时人们称之为“跑警报”，那时节，人们成天生活在“跑警报”的恐怖与慌乱之中。“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逃离家门时就不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着回来。成都地处四川盆地中，本是一个常年阴云笼罩的城市，偶尔天空放晴，太阳出来了，人们总会感到精神爽快，心情舒畅一些。可是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一遇到艳阳高照的大晴天，成都人就不由得提心吊胆，因为这正是敌机前来轰炸的有利时机。

我们举家遇难的那一天，正是成都难得的一个万里无云，碧空如洗的夏日。由于连续20多天阴雨，没有敌机前来骚扰，人们沉醉在这难得的宁静与风和日丽的气氛之中，惊恐不安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下来了。

这天刚刚吃过早饭，就听见街上有人在喊“预行警报！”当时成都市的警报分为三个层次：“预行警报”是在各个街口挂出黄旗，表示敌机已经向大后方飞来，通知市民提前出城避难；“空袭警报”由警报器发出的长声，表示敌机接近；“紧急警报”则是急促的短声，表示敌机已经临空。听到发布“预行警报”后，在家里一向诙谐、民主的爸爸笑着问姐姐：

“大姐，跑不跑？”

“我要跑，不管你们跑不跑！”

姐姐一向是很有主见的。

于是，全家便连忙提着早已收拾好的“家当”，从四道街家中出发，翻越城墙缺口，跑到两门外的四座磨附近。我们城内的房东在那里农田中修建有几间专供城里人跑警报躲避敌机空袭的茅屋。

那一天，在这座茅屋的屋檐下、堂屋里挤满了跑警报的人。男人们高谈阔论，妇女们窃窃私语，气氛并不算紧张，大概人们以为敌机不会到城外来轰炸，到这里就安全了。我父亲坐在屋檐下。由于他的健谈和诙谐，身边聚了一大堆人。一贯爱听大人谈话的我，也和姐姐一道挤在爸爸身边，听他们

谈天说地，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了。

上午 11 时左右，敌机排成一字形从成都市方向低空朝我们的茅屋飞来，只听得炸弹爆炸声和机枪扫射声惊天动地。我吓呆了，本能地拔腿跑向躲在堂屋中的妈妈身旁。一刹那间，天昏地暗，我两眼一黑，右手一阵麻木。屋顶上的泥土、竹片不断打在我们的头上，我一边摆动双手抵挡，一边护头部。一会儿，硝烟散去，我看见自己右手的三根手指正在汨汨地流着血，妈妈右眼被炸伤，血不断地往外流。她定了定神，急促地拉着我往屋檐下走，一边走一边说：“快去告诉爸爸，我们被炸了。”

刚跨出堂屋，我们顿时惊呆了：屋檐下横七竖八躺倒了一地尸体！爸爸的头被炸碎，已无面目可辨，妈妈好不容易从枕藉的尸体中，从亲手为爸爸缝制的袜底辨认出了爸爸。妈妈一头扑在爸爸的身体上嚎陶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她猛地站起身来、拉着我，抱起身边吓呆的妹妹，直奔离茅屋不远的小河边。盛夏时节，小河已经涨水。妈妈奔到小河边后抱着妹妹，毫不犹豫地跳下河，拉着我直往河中心深处奔去，嘴里不停地说：“我们跟爸爸去！”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妈妈要投水自尽。我大喊一声：“我不死！我要活！”求生的本能。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不顾手指伤痛。拽住妈妈直往岸上奔。一些在一起躲警报的好心人也帮着我把妈妈拉上岸，这时，妈妈怀中的妹妹吓得哇吐大哭。我突然想起姐姐，赶快跑回到遇难者中去寻找，却不见姐姐的身影。我边找边喊。终于在离茅屋不远的田中找到浑身是血、两眼紧闭的姐姐。我使劲地摇着她。喊她。她嘴里不停地哼，不知是听见我的叫声在作答，还是因为伤痛在呻吟。我一直守在姐姐的身边。直到一些闻讯赶来的亲友把我从姐姐身边拉开。

亲友们找来一付门板，准备把我抬去救治。这时，妈妈把当时全部家产—140 元法币（注：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分了 50 元放在我身上。那个时候，在民族危难面前，同胞们见义勇为，两个陌生人把我抬到附近的救护站，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又把我从城西门抬到城东门的四圣祠医院，放在医院附近一个礼拜堂地下的草垫上。

劫后截指手术

只有 13 岁的我躺在草垫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熟人、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受伤的手还在不断地流血。饥、渴和伤指的疼痛折磨得我精力疲惫，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晚 10 时左右，我在昏迷中，隐约听见有几个陌生人的声音在说：“这个孩子的手还在不断流血，失血过多的话，恐怕性命难保，必须赶快送医院做手术，止住血才行。”后来，我被抬到四圣祠医院手术室门外的地上。

大轰炸之后的成都，不少的家庭举家遇难。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被炸死的人的尸体用卡车运了好几天。医院里更是人满为患，不断有浑身血淋淋的伤员被抬进手术室。人们很难注意到我这个躺在地上的小孩。我知道不止住血就保不住性命之后，就强忍住饥渴和伤痛，只要手术室的门一打开，就拼命喊道：“阿姨，快抬我进去把手指拇截了！”但这微弱的喊声，湮没在来往运送伤员的嘈杂声中，根本无人理会。偶尔一次，手术室的护士回了我一句：“肠穿腹破比你伤重的人多得很，你那点伤吵什么。”直到凌晨一两点钟左右，手术室关门后。我又昏昏沉沉地迷糊过去。我仿佛觉得有人把我从手术室门边抬开，边抬边说：“抬了死人又抬活人。”

第二天，7 月 28 日一早，我刚醒来，看见自己已被放在医院顶楼的走廊

上。我身边仍然没有一个亲人，伤痛麻木的心，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到底出了什么事。突然街上又有人在大声喊：“预行警报！”我马上从担架上爬起来，顶着象铅块般沉重的头，迈着棉花般软脚，扶着楼梯，一步一拖地从顶楼挪到医院大门口，我要去跑警报，躲避日机的袭击。当时，我身边没有任何大人照顾，只记得东门猛追湾有我的一位舅爷，我要想方设法到那里去“躲警报”，我得自己救自己。

一走出医院大门，意外地看见我姐姐的同学屈文彬姐姐正来医院找我，大难之后，亲友相见，真是倍感亲切。我一下扑进她的怀里，眼泪忍不住直往外流。屈姐姐给我带来一件罩衫，罩在我那已被鲜血浸透的衣服上，又找了一辆人力车，把我和她一起拉到舅爷家，这一天敌机没有来。直到傍晚警报才解除，屈姐姐又把我送回医院，我的手仍在流血，我又被抬到手术室门口的地上，等待做截指手术。屈姐姐刚从威远来成都，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社会治安很差，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不敢独自在成都市区的街道上深夜行路，临近黄昏时，她不得不赶快离开医院前往下榻的旅馆。

这天夜晚，尽管我又不不停地喊：“阿姨，把我的手指拇截了！”但由于重伤员太多，我始终没有机会进入手术室。晚上10时左右，一位在成都市政府当勤杂工的陈二哥来医院看我，他是我们原住乡下时的邻居，我央求他说：“快去市政府找余伯伯（当时的成都市市长余中英）给我开张条子，请医生把我的手指截了！”余中英是我父亲的朋友，又是郫县同乡，我父亲也曾在市政府供职。陈二哥很快拿来了余市长的条子，于是我才被抬进了手术室。施行了全身麻醉之后，我在手术台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被安置在大病房的一间大床上，医生已根据我的伤势情况将我的右手除拇指和食指外，截除了其余三个指头。早上医生来查房，街上又发出了“预行警报”。我只好又在屈姐姐的陪伴下去舅爷家，直到傍晚警报解除才回到医院。

第三天早上，查房的医生刚刚把我受伤手上的绷带拆开，正准备清洗上药，突然又有了“预行警报”。慌乱之中，医生顾不上诊治，匆匆地照原样把伤口包上。于是不得不再“跑警报”。当傍晚又该回到医院时，我那麻木的神经似乎才苏醒过来，哭喊着要找妈妈。声明决不一个人回医院。屈姐姐无奈，只好陪着我到城内各处亲戚家找妈妈。最后，我们在城外一个亲戚家打听到妈妈的下落，原来她已住进陕西街存仁医院。

当妈妈看见我时，第一句话竟是责怪我不该离开医院来找她。她坚持要屈姐姐再把我送回四圣祠医院。因为她所在那所专治眼耳鼻的医院不收普通的外科病人。她怕耽误我的治疗。我却执拗地哭着说：“决不离开妈妈，伤治不好，死也要死在妈妈身边。”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三舅父的一个朋友，我们喊任雨苍伯伯的，在斌升街开私人诊所，我央求妈妈，允许我作为陪伴和她住在一起，白天到任伯伯家医手，妈妈这才允许我住下。

7月31日，屈姐姐陪我来到任伯伯的诊所。这时离开7月27日受伤已经整整四天了。炎天盛暑，伤势恶化，任伯伯一拆开我手上的绷带，就失声喊道：“哎呀！伤口生蛆了！”在任伯伯的精心救治下，我的伤手终于逐渐好转。我记得，那断指根部残存的几块大骨头，是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剖开血肉，一块块用钳子钳出来的。任伯伯一边做手术，一边连声称赞我，“真是坚强的孩子！”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情况，正象一位哲人说过的：忘掉忧愁的最好办法，就是有更大的忧愁。比起父死姐亡的巨大伤痛来。这

点小小的皮肉之苦又算得什么呢！

就这样，我和妈妈躺在存仁医院的病床上，纵然再有“警报”。我们也不跑了。因为妈妈说：“死了，就跟爸爸、姐姐一起了。”我和妈妈厮守在一起。这时城内许多亲戚都疏散到乡下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医院也没有多少病人，一个正在读高中的远房舅舅整天来陪我们。我手上伤口日益愈合，妈妈被炸坏的右眼却不断流血。医生主张摘除受伤的眼球。这个现在看来不算太大的手术，在当时却颇有风险。当时，妈妈一则怕手术出现万一，我和妹妹无人照应，则怕手术花钱太多，断了经济来源的家，无力承担，因此不愿作手术，想拖一天算一天。我劝妈妈说：“长痛不如短痛，治好了，保住了左眼；治不好，我们就和爸爸姐姐在一起了。”这样，由我这个13岁的孩子作为亲属签字，妈妈的右眼被成功地摘除了。

由于我父亲遇难前，已辞去了市政府的工作，父亲死后，没有任何抚恤费，一家三口，生活无着。我的四姨父，一位中学国文教师，为我们在报上“募捐”，我至今还记得那篇募捐文中的几句话，说我家“上无片瓦之覆，下无一垄之植，敬请亲朋好友，移香帛之祖国的繁荣富强，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百年来那种备受列强欺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痛历史可能会重演，家破人亡的命运，也可能再次从天而降。年轻的朋友们，请记住：45年的和平生活，凝聚着老一代的浴血奋战，荃萃着各条战线无私奉献的人们的辛勤劳作。当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享受和平幸福，享受美和爱时，也想一想自己将为下代贡献什么？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张明绵）

在西江空中滥炸，地面洗劫

一、狂轰滥炸·西江人民生灵涂炭

1933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日寇继续两犯·佛山、南海、三水等地相继陷落，西江地域成了粤两地区的抗日前哨。敌机狂轰滥炸，西江两岸的城镇与乡村，尽是触目惊心的场面。

在江北，具有悠久历史的古端名郡肇庆镇，自1938年5月至1943年冬，敌机轰炸城区不下60次，投弹近1300枚，50多条街巷备受遭殃，死者近300人，伤者近600人，毁商店、房屋560多间，损坏学校3所（肇庆中学、肇庆师范、高要县中学）。附城各乡（岩前、出头、厚岗、黄岗、桂林、小湘等）“无论繁庶冲要与否，多遭其残害。”高要县地跨西江南北、属内之沙浦、金刊、金渡、大湾、新桥、山土、水安、水坑、广利诸圩镇、先后遭敌机多次轰炸。敌机往往在炸后又折回低飞，向地面无辜居民扫射。据于三水县境的日军还不时向高要贝水圩炮击。自1938年1月15日至1943年10月17日止，日机主袭高要200多次，投弹3000多枚，死1150人，伤1822人，毁房屋店铺5000多间，炸沉船艇逾百，死伤牲畜无数。

四会县靠近前线，自1938年11月至1943年1月间，四会县城乡遭敌机轰炸数十次，伤亡损失惨重。最甚者为1939年3月中旬某一天，6架敌机空袭县城，分成两队，品字形排列。前面三架投下大量炸弹，人们躲避不及，多被炸得血肉横飞，“在桥头的木棉树上也挂有人的手足”，轰炸完毕，紧接着后面三架低飞盘旋，向着人群猛烈扫射，不少男女老幼倒在血泊之中。1942年12月中旬的一个圩日，敌机轰炸四会江谷圩，死伤数十人，“江谷桥下的一段小河成了‘血河’”。

从1938年8月至11月间，日寇先后4次轰炸广宁县。农历十月初四那一天，3架敌机在广宁县南街镇上空盘旋，投下3枚炸弹后继用机枪向地面扫射，死3人。3天后，7架敌机又来空袭，投弹后，“南街镇顿时变了火海”，死者互相枕藉，有一孕妇腹部被炸开，腹中胎儿被抛到树上。匿于竹林的人群频遭敌机机枪扫射，血染竹林。几次空袭，共炸死77人，重伤30多人，后因众多伤者医治无效，死亡人数遽增。

1937年农历十一月初五，11架敌机侵袭封川，城内“共死伤民众32人，被炸毁的民房近百间”，还“炸塌了封川古城墙西面的一段”。次年农历十月初十，27架敌机又炸封川城，“民众伤亡20余人，炸毁房屋60多间”。

1938年秋，敌机首袭德庆县城，死3人，某米店老板娘肩膀中弹片致伤。敌机又多次轰炸县境内地，其中新地村下深降山边有7人被炸死。

1939年2月25日，日机轰炸罗城，城内外居民多来不及躲避，有被炸死的，有被机枪击毙的，有因房屋倒塌而被压死的，殃及过路行人、老者、孕妇和儿童，是时城内有一家正在办喜事，来饮宴者及厨师皆被炸死。此次轰炸，死者近百，伤300多人，毁坏商店民宅80多间。

二、肆虐凶残，乡曲南井祸劫加深

日寇不仅从空中向我西江居民施暴，同时还在地面上推行“三光”政策，其凶残手段已是登峰造极的了。

杀戮纵火施酷刑

1938年秋冬间，一队日军侵扰高要县金利镇播村、军屯、禄村和上下良江村，见人便杀，村民纷纷匿于山坑。禄村有二三十个老妇因年迈走不动，便各自躲在家中，日军进村后把她们赶至一间大宅，一把火把她们活活烧死，

1943年秋，一队日军犯高要水坑，有七八个村民被杀。次年9月，日寇从高明新圩来犯高要、白土、新桥、莲塘诸镇居民惨遭其祸。为了打探民众之反日行为，日军在各区乡随意捉人拷问。金利镇五甲村有一村民被捉去，日军先是灌水，继用电刑迫供。不少人死于酷刑之下。1945年4月7日，肇庆镇“正兴隆纸店”一店员因日军诬其拾获军靴一只，并胡诌该店“有冲爆炸队行为”，被扭至警备队施刑，肩膊及手掌被刺伤，血流如注，日军目睹此状，竟狞笑取乐。

1942年农历五月初三，天还未亮，3000日军渡过四会县榄江，包围附近的南岗乡，用机枪、钢炮向各村扫射、轰击和纵火。尚在酣睡之村民被惊醒了。霎时，不少人家破人亡，始院村有一家只剩下一个八岁的小孩；马房村有一户房子被轰平，人亡物毁；村民在慌乱中逃生，不少人在乱枪声中倒下；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被捆绑在树上，日军先用刀割下他额上的一块皮，接着便一块块地剥，老人惨叫而死；榄岗村有一村民被打伤在地上，日军用马踩踏其身体，脑浆，五脏迸出……1944年夏，一支日寇小分队占驻四会黄冈乡园村，以该村“大岗顶”为据点，常对过往行人开枪射杀。

1944年中秋，日寇进犯开建县长安乡，烧毁了一个地方军用物资仓库，又捉了两个自卫队员，吊于榕树上毒打。后用军刀将二人剖腹，盛其血于桶内，拌和饲料喂马。

1944年9月中旬，日寇沿水、陆两路进犯德庆县。在马圩，仅一天时间，“铺户遭焚三十多间”，其他各乡亦遭此劫。是年冬，日军又到官圩江村扫荡，把失去抵抗能力的自卫队员和一些无辜巨姓押至登云乡阿谷先生的沙田抽园内杀害和活埋。

1944年9月20日，罗定县金鸡石围前村村民为避敌寇而匿于石山洞，后“被日军发现，向洞内施放毒气，6人惨被熏死”。22日，日军抵苹塘，一部分经郁南连滩向建城（当时的郁南县城）进犯，一进城就纵火烧南门大街，“整个县城霎时烈焰腾空”，店铺民宅多成灰烬。后又作践平台乡，乡民匿于山林中，有一年仅十一岁的儿童被日军捉住“当活靶射击”。

野蛮劫掠强拉夫

日寇的抢掠行为充分暴露其贪婪、野蛮之本性，其占据各城镇后，必疯狂劫掠一切公私财物，损毁各地的名胜古迹（肇庆七星岩、德庆悦城龙母庙等风景胜地），还盗走了一批珍贵文物。进入乡材，又大行其破坏性的掠夺。田野上的庄稼遭其放纵的马匹践踏、吃掉；他们逐户破门而入，把群众的粮食、禽畜及一切物品抢掠一空。这些东西除供他们临时吃用以外，还要带走，不能带走的就肆意糟踏，损毁。劫后的千村万落，所见者皆为：被糟踏的粮食，禽畜被屠宰后留下的皮毛、内脏，被砸碎的锅盆碗盏，门、窗、家具被焚烧后的余烬，撒满地上。敌军随处大小便。还故意撒在床上、灶上和吃不完的食物上……肮脏污秽，恶臭熏天。

日军除了抢掠，还强拉民夫，各地被抓的民夫往往有几十、几百，多至一二千人，有青壮年男子，也有妇女。他们多是被捆绑着、在日军的钢枪和刺刀押解下挑运日军抢掠来的物资及军用物品。他们步履艰难，每当跟不上队伍时，就要挨拳脚、枪托、刺刀，轻则被殴伤，重则被枪毙、刺死。有些挑夫伺机逃脱，若被逮住则无一生还。有些人一去数年杳无音讯。除了青壮年，老人和儿童也被捉去当作挑夫，许多被折磨的老人死于途中，不少儿童劳累致残，日寇当年曾在德庆永丰镇希伯仑儿童院内抓走了十多名年纪稍大

的难童作挑夫，被押至广西后就不知下落了。

奸淫污辱逞兽性

日寇践踏西江各地，兽性大发。他们不仅向中青年妇女下毒手，对孕妇、产妇、病妇、老嫗、少女也不放过。在众目睽睽的场合下，十几个日军轮奸一个妇女；为追逐“花姑娘”弄到各处鸡犬不宁。许多妇女被摧残致疯、致病、致死。四会县南岗乡马房村有几个妇女遭日军奸污后不能动弹，终被日军刺刀刺死；榄岗村有两个妇女遭鬼子轮奸后被抛入大火之中；开建县长安圩忠良村有个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木柱上惨遭一群兽兵轮番蹂躏；长安圩一些妇女被掳去作挑夫，白天替日军挑东西，夜晚供兽兵淫欲；日军占领德庆永丰圩后，常把捉来的妇女推入新成岗的“静养轩”内轮奸；肇庆镇忠勇路一间大宅被强占后变作日军的“慰安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日寇凶残之兽行，令人发指。

八年艰苦抗战，胜利来之不易。50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国耻难忘。西江籍海内外同胞铭记，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乃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强有力之保证。

（广东省肇庆市委党史办冯绍愿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三、残害中国劳工

地狱中的东北劳工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东北期间，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压榨是极其残酷的，尤其对劳工的迫害更是令人发指。在东北沦陷的 14 年里，每年被役使的劳工，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对战争资源掠夺的加强而增加。残酷榨取劳工的血汗，直到置大批劳工于死地，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罪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劳工的主要来源

关内涌入东北的劳动力。东北，水土丰润、地旷物博，历来为关内贫苦农民向往的生存之地。“九·一八”事变前，每年来东北“闯关东”谋生的人达百万。东北沦陷后，日伪统治者出于伪满“治安”等原因，采取限制关内劳动者进入东北的政策。其结果是进入东北的劳动力逐年减少，1935 年为 44 万人，1936 年约 36 万人，1937 年仅为 32 万人左右。“七·七”事变后，伪满为配合日本的侵华战争，从 1937 年起，开始实施“产业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因而劳动力的供给明显不足。日伪统治者一方面调整劳动政策，放弃限制关内劳动力入境的规定，一方面又调整劳动机构，利用满洲劳工协会等机构在关内华北等地以欺骗、诱骗等手段招募工人。这样，关内每年进入东北的工人数又呈上升状况，1938 年为 49 万人左右，1939 年近 100 万人，1940 年高达 130 万人之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的日本占领当局加强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需要大量劳力，从而到华北招募工人日趋困难。即使这样，1941 年仍有 91 万多人，1942 年约有 100 万人。关内进入东北的大量劳动力，是日伪役使对象的重要部分。

勤劳奉公队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劳动力不足现象已相当严重，因此，日伪当局实行了“国民皆劳”的劳动统制政策，而“勤劳奉公制”是其重要一环。1942 年 11 月 18 日，伪满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 21—23 岁的男青年，没有充当国兵的均每年服 4 个月劳役。据战犯武部六藏笔供，一般的勤劳奉公队的人数，1943 年“因为是最初年度，动员了 6 万青年，令他们平均从事 4 个月的劳动。1944 年动员了约 20 万人，1945 年预定动员 30 万人，后因日本投降而停止”。

强征、摊派、抓捕的劳动力。伪满后期，劳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强征、摊派，日本人把这叫做“行政供出”。1942 年 2 月 9 日，伪满“民生部”以部令公布了《劳动人紧急就劳规则》，明确规定了这种强行摊派的办法。即有紧急需要劳动力的部门，可以提出申请，经伪满“民生部”大臣许可，通过伪省、市政府部门层层下达摊派指标，最后摊派到各村各户，强迫中国人无偿地为他们服劳役。他们还规定：“就劳义务人不得为避免就劳而行逃亡或潜匿或伪装疾病，或为其他诈伪之行为，若有就要受到严厉惩处。”据战犯古海忠之笔供，1942 年被动员的 100 万劳工中，其中强征、摊派的劳工就有 35 万人，1943 年 120 万“动员”劳工中，其中“供出”劳工 50 万人，1944 年 130 万劳工中，“供出”劳工 50 万人，1945 年 130 万劳工中，“供出”劳工 60 万人。

《满洲矿工年鉴》1944 年版第 70 页。

1946 年 8 月 30 日武部六藏笔供，见中央档案馆等选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东北经济掠夺》第 857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

古海忠之笔供，见前引《东北经济掠夺》第 861 页。

除强征、摊派外，日伪还以强行抓捕的手段来补充劳动力不足。在街上抓“浮浪”，这是伪满后期在光天化日之下经常发生的事。1943年10月3—4日，伪齐齐哈尔警察局的警察上街盘问搜查行人，逮捕约190名无辜百姓。1943年4月19日过午，伪满首都警察全员出动，使“各闹市一变而成为地狱，进行大逮捕，夜间又进行一次全市大逮捕，两次共抓捕3160人，最后将其中的1287人强迫就劳”。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抓去当劳工的。

“特殊工人”和矫正辅导院里的“收容者”。所谓“特殊工人”是日军在关内“讨伐”、“清乡”、“扫荡”中俘虏的抗日武装人员及抓捕的和平居民。被俘人员中，有八路军干部战士，也有国民党军队官兵。他们被日军押运到东北，在一些军事工程和矿山从事劳役。矫正辅导院里的“收容者”是日伪实行司法矫正制度，依照“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对所谓“有可能犯罪”的人“预防犯罪”而抓捕的无辜百姓。他们被关在矫正辅导院里，每天被强制去矿山等作业场所进行劳动。这些“特殊工人”和辅导院里的“收容者”，遭受着比其他劳工更惨的奴役与迫害。

二、劳工的悲惨遭遇

日本帝国主义者役使劳工的多是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的军事工程、矿山、电站等偏远的地方。劳工的运送也非常野蛮。劳工多是被装上闷罐车，车门在外边上了锁，大便、小便、吃饭睡觉全在车里，而途中时间往往是十天半月，许多劳工没有到达服役地点就被折磨死了。1942年3月，负责招募工人的长滨组在华北招募了50名劳工，准备运往伪兴安北省五义沟服劳役，途中由于冻饿就死亡8名。甚至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一个车站，一闷罐车劳工，被甩在一个闲道上，两天后打开车门时，劳工已全部冻饿而死。

到达施工地点的劳工，其惨境也是苦不堪言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大多是无房可住，只能在用草席搭成的棚子里歇息，夏天，棚内潮湿闷热，蚊虫叮咬，无法入睡；冬天，棚子又冷又潮，无法抵御寒冷，劳工们每晚都要冻醒几次。在虎林的劳工，一年到头住在席棚子里，长筒形的席棚子，两头留门，两边搭通铺，离地一尺来高，下边是一汗汗的水，中间有条过道。夏天阴暗潮湿，闷热得喘不过气来。冬天，冻得打哆嗦，睡觉得蒙着头。虱子满铺爬，跳蚤到处蹦”。劳工们说：“人住的地方，真不如有财势人家的牛马棚”。东北劳工普遍住这样的席棚。

劳工的伙食就更糟了。日本侵略者对劳工粮食配给标准很低，再加上包工头、把头的层层盘剥、克扣，劳工能吃到口中的粮食所剩无几。

劳工们穿的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有的劳工开始还能得到一套发给的更生布（旧布重新加工纺织成的布）劳动服，后来就什么也不发了，磨破的衣裤褴褛不堪。有的为了遮体，只得把水泥袋子抠二个窟窿套在身上当衣服穿。1941年秋，北安、孙吴集中了修军用道路的三四千名劳工。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而劳工们穿得破破烂烂，甚至用洋灰袋绑在身上御寒，多数还没鞋穿光着脚。1942年夏天，在依兰县修机场的富锦县供应的300多名劳工

《满洲新闻》1943年4月21日。

“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报告”，见《东北经济掠夺》第968页。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39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刘翰章：《虎林伪满劳工初记》，《虎林文史资料》第3辑，第179页。

于镜涛证词，见《东北经济掠夺》第874页。

没鞋穿，全都光着脚在碎石子上走，脚磨破了，鲜血直流，仍要干繁重的活。

劳工们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情况下，还要担负异常繁重的劳役。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伪满一般工业部门工人平均劳动时间是 9 小时或 10 小时，有的达到 11 小时以上，矿山工人劳动时间竟达十三四小时，1941 年以后，一些军事工程、矿山等部门使用的劳工，其劳动时间普遍是每天十三四小时，甚至达到十五六小时。伪龙江省景垦县耶尔河筑堤工地，“从 1944 年 4 月 3 日左右至同年 9 月底止，对 1000 名中国劳动者经常从早 5 时到下午 8 时止，强迫作 15 小时的无报酬劳动”。

为了加紧对战争资源的掠夺及对苏作战等军事工程的修筑，各用劳工部门毫无限制地延长劳工的劳动时间，加大劳工的劳动强度。据 1944 年破日本鬼子抓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当劳工的张彬回忆：“每人一天给三个雷管，挖煤定额七吨，三个雷管只能炸下二三吨煤，剩下那四五吨只好一镐一刨，手都震裂了，累得精疲力竭。”又据曾在伪满出过劳工的曹德贵回忆，1943 年 5 月，他出劳工到奈曼八仙筒修黑龙坝，中队 300 多名劳工由一日本人和十几个伪警察监管。每天要从几十米外取土，装进草袋往十几米陡坡的大坝上扛。每人每天必须完成 11 方土的任务，所以，每人得肩扛一百五六十斤的土袋子，一个跟一个小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谁要是跟不上，就要挨扁担，打得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然后还得补上没完成的任务。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劳役，使劳工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生病的人比比皆是，许多人丧生。“据的滨江省统计，勤奉队员死亡率为 8%”。曾在伪双城县勤奉队第一大队服役的李荣涛回忆，他们队患伤寒、痢疾、风湿症的人很多，生病后没有药品，经常发生死亡，一次一个大棚子里就死十二三名。1943 年 3 月至 9 月，吉林省为伪交通部东安土木工程处“供出”的劳工 7000 多人，到归还时，生病者 6765 人，死亡 340 人。”这些劳工生病和死亡是因为“在潮湿地带作业受凉；宿舍设备与饮水不良；因雨水，宿舍经常浸水”。1942 年 8 月 3 日，通化宪兵队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报告：东边道开发会社大栗子沟采矿所工人因气候不调以及在运输中取暖供给不好，自本年 1 月至 6 月患多种疾病，患病者总数达 1000 多名，其中死亡 268 名。

由于居住条件和劳动条件极端不好造成事故伤亡的情况多有发生。1942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 点 30 分，在虎林县泰和村北，日军满洲 211 部队采石包工商高原组的 181 名劳工住的砖窑突然倒塌，死伤工人 73 名。在矿山服役的劳工，被虐待、折磨以及事故而伤亡的更是屡见不鲜。1939 年 2 月中旬，阜新煤矿五龙口一名工人带有采煤用火药、雷管等，劳务系的日本人星原稔

卢元善口供，见《东北经济掠夺》第 880 页。

铃木义夫证词，见《东北经济掠夺》第 883 页。

张彬：《我给鬼子挖煤》，载《虎林文史资料》第三辑，第 199 页。

曹德贵：《劳工的苦难说不完》，见《伪满兴安史料》第 186 页。

王承礼等：《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 518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年北

前引《东北经济掠夺》第 905 页。

前引《东北经济掠夺》第 971 页。

前引《东北经济掠夺》第 972 页。

1942 年 5 月 7 日《东安宪兵队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报告》，见《东北经济掠夺》第 967 页。

发现后，对他毒打、刑讯，将其折磨致死。1937年11月至1939年3月，日本人明知五龙口栗煤矿并有冒顶危险，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仍继续强迫工人采煤，结果造成多次冒顶事故，压死采煤工人8人，压伤多人。由于日伪统治者视劳工如牛马，野蛮驱使，也造成多起重大事故，使大批劳工死亡。据战犯古海忠之交待：“1943年在本溪湖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夺去了1800多名劳工的生命，1944年关东军直辖工程，即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发生死亡6000名劳工的事件；同年，伪满交通部直辖工程，即改修穆兴水路工程中，发生死亡1700人的事件”。

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下，劳工们不堪忍受，于是就设法逃亡。1941年8月，伪龙江省詹榆、洮南、开通、安广、大赉等县根据齐齐哈尔营林局的要求，紧急募集1180名军需制炭工，除病死17名、伤病176名外，逃走的有550名。据孙吴宪兵队的报告：1941年10月24日至11月15日，在黑龙江省神府服劳役的南满各地“供出”的5300名劳工中，逃亡者达5109名之多。这些能够逃出去的劳工是幸运者，但也有很多人又被抓回来，有些被活活打死。

三、死难劳工的铁证

日伪统治时期，东北一些矿山，较大的工程和军事设施，都是大规模奴役劳工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劳工冻死、饿死、病死，事故致死等每天不断。这些地方都有大量集中埋葬死难劳工尸骨的场所，这个场所因埋葬的人太多而又无法计数，所以人们称之为“万人坑”。有的一座矿山就有几个“万人坑”，这些“万人坑”和遗留的工程，就是死难劳工的铁证。

尸骨垒成丰满大坝

丰满大坝是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修建丰满水电站中的一项巨大工程。在修建过程中，有8万余名中国劳工被奴役，数以万计的人被折磨致死。据有关人员供认，丰满水力工程平均每天使用劳动力1—1.2万人，总劳动人次达2250万。劳工的劳役十分繁重，在施工中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劳工经常死于事故。一次，日本人强逼劳工们掏洞取土，结果冻土坍塌把劳工砸在里面。劳工金孝发亲眼见38个人进了洞里，塌方后只跑出6个人。前去救人的劳工被日本人用锹砍死，边砍边喊：“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在放炮炸面工地，监工往往强迫劳工在有哑炮的原地继续凿眼，从而引起哑炮爆炸，把劳工炸得血肉横飞；大坝越修越高，劳工们坐吊缸上坝干活，吊机开得快，吊缸周围又没有扶手，所以吊机升到高处，经常把劳工从空中掉下来摔死，有的竟摔成几截；在大坝浇注混凝土时，劳工须下到平仓去，而开起重机的日本人不管下面有没有人，就把大桶混凝土往下倒，把人活活浇在大坝里；大坝合拢时，要劳工们用棉被和麻袋堵塞激流，结果被奔腾的江水冲走100多名劳工。因此，劳工们悲愤的唱道：钢筋是我们劳工的骨头，水泥是我们劳工的肉，水是我们劳工的血呀，大坝是用我们劳工的血肉筑成。

1954年9月28日，星原稔口供，见《东北经济掠夺》第973页。

1954年6月3日，古海忠之笔供，见《东北经济掠夺》第862页。

见《东北经济掠夺》第967页。

见《东北经济掠夺》第965页。

刘桂琴：《日伪统治下的丰满劳工》，《吉林百年》（上）第27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鹤岗东山万人坑

鹤岗东山万人坑是日伪当局埋葬鹤岗煤矿死亡劳工的地方。这个“万人坑”的一角就堆积着千余具死难者的尸骨。据调查，这些尸骨主要是死难的矿工、外包工、矫正辅导院的收容者。死难原因是：1. 劳累致死。1939年为修南——东线铁路，从天津招来了外包工600多人。日寇为加快施工进度，不顾他们的死活，铁路尚未修成，已累死500多人；1942年，兴山二坑入关内招来1000多名18岁至30岁的劳工，因干活时间往往从早3点到晚9点，吃的又全是橡子面和发霉的苞米面，喝的是臭水沟的水，到后来只剩90多人。2. 事故伤亡惨重。日伪为加快掠夺煤炭，实行野蛮式开采，强令工人在瓦斯聚集区作工，1943年1月6日下午1时，南山三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保住井口，在工人没出来的情况下，将井口堵死，到晚上9时扒开时，94人死在井口附近；1945年6月，西三槽作业场一次冒顶18架棚子，除了在掌子面上干活的5人外，其余30多人全被砸死。3. 病死者甚多。劳工们生活条件非常恶劣，霍乱、伤寒等瘟疫流行。工人李连义得了病，夜里还会说话，但把头却硬把他扔到工棚后边野狼出没的荒山坡上。第二天早上，山坡上只有一只鞋了；1942年，日伪把头从黄河招来400多人，天天有人生病，病了就往外拽，最后只剩30人。4. 迫害致死。矿山的工人和矫正辅导院的“收容者”常常进行反抗和暴动逃跑，日伪对他们血腥镇压，除被枪杀的外，大部分被抓回并惨遭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扔到东山乱尸岗子。因此，有的死者还带着脚镣子。

累累白骨的五顶山

五顶山位于黑龙江省富锦县城东南20公里，日本侵略军在这里修筑极端秘密的军事工程。劳工2万余人都是来自热河、锦州、河北等地的外地人。其中有华北、山东地方抗日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所谓“政嫌”人员及当时抓的“浮浪”。他们每个人都是被套上“黑帽子”，用车运到五顶山的。在五顶山他们每天都是在日本兵的监押下，戴着“黑帽子”出工。出工时，每个班一条绳子，每个人都左手扯着绳子，右手拿着工具，进入施工现场后方可摘下“帽子”。夜间睡觉也是每人左脚用大绳拴住，5个人拴在一起。每棚劳工（100—150人）有一个日军小队看押，并配备三到五只日本狼狗，以防劳工逃跑。五顶山的劳工大致分两部分，一种是可以转移工地的，如修盘山道、盖席棚、打石头等的劳工；另一种是挖山洞、挖秘密军用仓库、修碉堡、地下道以及绝密工程的劳工。但无论哪一种都不许活着出五顶山，工程结束之日，便是他们死亡之时。日军屠杀劳工的方法很多，手段也很残酷。他们一是把生病劳工送进“医疗所”和“狗圈”。二是让劳工们全染了鸦片瘾，工程竣工，马上停发大烟土三日，全棚劳工便就地而死。三是工程结束，借开“庆祝会”之机给劳工吃放有毒药的饭菜，使劳工一排排地死去。四是对违纪、反抗、逃跑乃至干活“磨洋工”或不慎损坏工具的劳工，当众用战刀砍头。对临时抓到山上的车夫，干杂活的普通老百姓也从不放过。五是当工程结束时，日本人便以送劳工回家种地“出荷”为词，把劳工们骗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并戴上黑帽子，拉到“万人坑”一车一车将其杀掉。

鹤岗矿务局矿志办：《鹤岗东山万人坑调查》，《东北经济掠夺》第976—980页；鹤岗市政协：《鹤岗东山万人坑》，《不能忘记的历史》第251—254页；《鹤岗文史资料》第2辑95—101页。

《累累白骨五顶山》，《马铁脖子》，《富锦文史资料》第2辑。

虎头要塞上的劳工尸骨

虎头要塞是日本侵略军在黑龙江省虎林县虎头镇构筑的庞大的军事工事。其规模之巨大是世界上少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在此之前，日军对构筑它的十几万中国劳工进行了野蛮大屠杀。修筑虎头要塞的劳工，多来自华北等地，其中很多是在关内作战被俘的中国军队官兵。在虎头，他们总是被蒙上眼睛带进地下工程现场，在日本技术人员监督下施工，完工后即全部被杀死。据当年在虎头要塞服役的日军士兵揭露：“昭和18年（1943年）某日，因要塞设施大致完工，日军举行庆祝竣工的宴会，将俘虏劳工人员集中在猛虎山两麓（猛虎谷）的洼地里，用酒肴欺骗劳工说犒劳他们”，“在一片怒吼和杯盘狼籍声中，突然重机枪喷出了火舌，宴会场顿时比作血腥的屠场和尸体的堆积场”当时，在猛虎山里，到处可见裸露的劳工的磷磷白骨。

大石桥万人坑

大石桥万人坑是埋葬大石桥镁矿劳工的地方。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不顾矿工的死活，疯狂掠夺镁矿。因此，大石桥镁矿被折磨和迫害致死的矿工很多，并都被扔进了万人坑。大石桥有几个万人坑，其中虎石沟万人坑位于大石桥镁矿东北两公里小圣水寺虎石沟里，附近是营口第二监狱、大石桥矫正辅导院、劳工棚子，山上是采矿场。在矿山、监狱、矫正辅导院里被折磨死的矿工，大部被扔到这个万人坑里。当时虎石沟万人坑尸横遍地、白骨成堆。在这些死难人中，有的是特殊工人，有的是被诬为思想犯、政治犯、经济犯的无辜群众，有的是抓来的劳工和奉公队员等。虎石沟万人坑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从现在仅挖开的一小部分看到，深不到3米地土中就露出白骨7层，在不到140平方米的地方就有尸骨171具。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8月的7年当中，被扔进大石桥的马蹄沟、虎石沟等处万人坑里的死难矿工达1.7万多人。从万人坑尸骨形态上，可以看出死者当时死亡状况。有的尸骨是用铁丝绑着双脚，显然是被绑着活埋的；有的是十几具尸骨毫无间隙地排在一起，说明是被集体屠杀的；还有的头骨被打裂，脚骨被砍掉，证明是被打伤后惨死的；而那些右手捂头、左手支撑挣扎的姿势或侧着身子、张着嘴、弯着腰的，显然是被活埋的。由此可见，矿工们受到的迫害是多么残酷！

（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郭孝美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日〕冈崎哲夫著，肖炳龙译：《日苏虎头决战秘录》第7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大石桥耐火材料厂宣传部：《大石桥万人坑》，《东北经济掠夺》第982—983页。

血肉筑大坝

气势磅礴的松花江从长白山顶峰天池奔腾而下，江水落差形成的巨大能量，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正是这条资源丰富的母亲河，养育着千千万万的东北人民，也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垂涎。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将铁蹄踏遍东北，为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他们妄图把东北变成侵略战争的基地，把罪恶的目光投向了水力资源丰富的松花江。开始谋划建设丰满水电站。

1933年，日本侵略者以伪满洲国产业部国道局的名义组成满洲河川综合调查队，全面勘测了松花江的水力资源。1937年1月，日本水电建设专家本间德雄提出了“第二松花江堰堤建设的五年计划”，为日本当局制定了建设电厂的蓝图。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在这里建造当时亚洲第一大工程——丰满发电所。在松花江的第二山岳部，两岸耸立的千米高峰间，构筑高约80多米，长约1000多米的呈“一”字型的大坝，湖面延绵160公里，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二大人工湖。

1937年4月，丰满发电所大坝工程开始破土动工。从此，一幕幕人间惨剧开始了。

日本侵略者要建造如此大的工程，需要大量人力。他们决定强迫中国人民来修建这座大坝。从1936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10年间，日本侵略者采取欺骗办法在关内外招募劳工，并使用勤劳奉仕队、摊派劳工、用犯人充当劳工和就地抓劳工等种种手段，把十几万中国劳工从山南海北骗、逼、抓到丰满，投进这人间地狱。

劳工们在这里失去了最起码的人身自由，在日本监工、特务、警察的残酷统治下，从事世间少有的繁重劳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奴役，使数以万计的劳工惨死在他们的皮鞭、棍棒、刺刀和苦役之下。这座大坝与其说是用钢筋水泥筑成，不如说是用中国劳工的血肉白骨筑成的！

劳工们的生活苦不堪言，每天吃的都是发了霉的玉米面和橡子面，吃下这种东西后，大小便非常困难。长年见不到蔬菜，偶尔吃上一顿土豆白菜汤就算改善生活了，多数是以盐豆和盐水当菜。到了冬季，劳工们吃的都是带冰碴的饭菜，不少劳工因长期营养不良，染上了疾病，还有的因食不果腹，被活活饿死。

东北的冬季气温很低。号称“风门”的丰满工地，气温常常在零下40左右。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劳工们没有棉衣，个个穿着破衣烂衫。初期，每个人还发一件再生布的棉背心和一双布鞋，但穿不了几天就磨坏了。随着劳工人数增多，后来就连这种再生布也没得穿了。一到冬季，劳工们只好把被子披在上当衣服穿，被子“穿”破了，就披麻袋片，把麻袋抠3个窟窿，伸出头和手当衣服穿。后来麻袋片也找不到了，只好披草袋子和水泥纸袋档寒，他们将水泥纸袋揉软后往身上套，然后用草绳缠住。劳工们悲叹道：“苦力，苦力，刚来时连铺带盖，最后剩下一条麻袋，狗肚子是苦力的棺材。”

劳工们住的是临时搭起的简陋的半地下工棚。工棚里长年见不到阳光，只在棚顶有个通气口。工棚大都用高粱杆和木板搭成，夏季漏雨潮湿闷热，蚊、虫随处可见，冬季透风，彻骨冰寒，还常常发生火灾，被烧死的劳工就有几十人。劳工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一个个浑身长满了疥疮，得不到医治，多数人被折磨致死。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随意虐待、摧残、屠杀。他们公然说：“满洲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在工程施工中，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和安全措施，电死、炸死、摔死的劳工数以百计。在大坝截流合龙时，由于缺乏安全措施，激流一下将 200 多名劳工冲走。象这样的恶性事故在施工中屡屡发生。

苦难的中国劳工，在饥寒交迫中度日，苦役、棍棒、瘟疫、疾病、事故、迫害，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他们的生命。真是“进了小丰满，如进鬼门关，鬼子汉奸似虎狼，十人九死去黄泉”。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6 年至 1943 年 7 月间，劳工的死亡人数就达 6500 多人。仅 1936 年一年就死亡 1651 人，有时每天少时要死十几人，多时几十人、上百人。由于日伪当局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没有严格的死亡记录，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当时，劳工中流传着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谣：

日本鬼子狠又凶，
拿咱工人不当人，
冻饿摔死上千万，
丰满东山有个万人坑。

“万人坑”位于距大坝 6 公里的东山上，日本人称它为“中国人的墓地”。死难的劳工都被扔进这“万人坑”。

起初，死亡的劳工还可以得到一口薄木棺材，装殓起来，埋在工棚附近。后来，死亡的劳工越来越多，工棚周围坟墓林立，日本统治者怕引起劳工的反抗，于是，在丰满江东五垧地北约 4 华里处，找了一处荒山，作为埋葬中国劳工的地方，这里山岗起伏，沟壑纵横，偏僻荒凉，正好避人耳目。死难劳工被他们垛在爬犁和马车上，一车车地拉到这里，扔进深深的沟壑。山沟就成为“万人坑”。

当时，有一个专门拉运死难劳工尸体的机构“拉尸队”。拉尸队的队长叫杨世汉，外名叫“杨尸爷”，此人凶狠残暴，十分歹毒。他每天巡视于工棚之间，遇有死难劳工，便叫拉尸队拉往万人坑。为了多领赏钱，他恨不得每天多死几个劳工。劳工死后，他只叫人用席子一裹，抬走了事。到后来，不但不用席子了，就连劳工身上最后的一件衣服，他也要扒下来卖钱。一次，有一个重病劳工还活着，就被他拖出去。劳工哀求说：“尸爷呀，我还明白！”。杨世汉却恶狠狠地说：“什么明白不明白的，赶快去吧，早去还能占个好地方”。说罢，将这个劳工一脚端进了万人坑，扬长而去。当年的万人坑，暴尸满山遍野，白天野狗成群，乌鸦满天飞，夜晚野狼成帮，争吃人肉。它们撕扯着劳工的尸体，血淋淋地拖得满山都是，真是惨不忍睹。它们吃死尸都吃红了眼，连话着的人都不敢靠近这里。

那时，有许多人千里迢迢满怀希望来丰满寻找亲人，可亲人在哪里？见到的只是满目尸骨，只好悲愤的含恨而归。有些人不仅没找到亲人，就连自己的性命也葬送在这万人坑里。

日本侵略者为了粉饰自己，修建了一个“工人慰灵塔”，想以此来平息劳工们的愤怒情绪和反抗斗争。

但是，地狱般的现实世界是最有力的课堂，劳工们日益认识到，要生存，就要反抗，就要斗争。劳工们不断觉醒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的提高，使丰满有如一座巨大的火药库，只要有一点火星，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爆炸。

日本当局为了镇压劳工的反抗，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在丰满设置宪兵

队、警察署、警备队、特务等统治机构、残酷统治镇压工人。

然而，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从丰满电站开工那一天起，劳工们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怠工、破坏工具、逃跑、纵火、罢工、炸狱、暴动等等，从个人抗争到集体反抗；从暗地斗争到公开斗争；从小范围斗争到大规模的斗争；前仆后继，一直没有间断过，从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拖延了修建大坝的工期，使电站不能如期建成发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满电厂已成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当年，日本侵略者建造的所谓“工人慰灵塔”早已被推倒，代替的是在当年“万人坑”旁的丰满陵园和丰满劳工纪念馆。一座高高的纪念碑屹立在山岗上，上面刻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十个大字。

陵园内，一堆堆白骨被玻璃橱窗罩着，供人们凭吊。这些白骨是从1945年到1972年这27年间四次清理出来的。这些白骨，有的缺头、有的断肢、有的头上钉着铁钉，露着黑洞、有的还被铁丝捆绑着，张着嘴似乎在呐喊……

站在陵园中，望着纪念馆里的白骨，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奴役、掠夺和压榨中国人民的罪行。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晓华）

仇满大同煤矿“万人坑”

山西大同，曾为北魏之都城，历代边塞重镇；今被誉之为“煤海”，是我国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大佛为百里矿区吐瑞增祥，名重全国的九龙华壁为千年古城流光溢彩，这是一片宁静、祥瑞的土地，休养生息着淳朴、善良的人民。然而，这里曾历经劫难，一片焦土，满目疮痍；这里曾暴行肆虐，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热爱和平的人们应当刻骨铭心地记住：那白骨累累的“万人坑”，是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铁证。

1937年9月13日，黑色的一天，血雨腥风，日寇的魔爪扼住了古城大同的咽喉。此后八年时间，在日本侵略者“以人换煤”的血腥统治下，有6万名矿工丧生在日寇铁蹄之下，被日寇掠夺的1400万吨煤炭，沾满了大同矿工的血和泪。

蓄谋已久的掠夺野心

大同煤田储量丰富，煤质优良，享誉中外。日本帝国主义对大同煤矿覬覦已久，他们对大同煤矿的地质考察一而再，再而三：

——1918年，日本临时产业局工程师门仓三能受命往大同调查煤炭资源，历时4个月之久，写出《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

——1923年，日本的上野、太田等人来大同作了长时间的“考察”；

——日寇侵占大同后，日本人森田日子在大同煤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测绘，制作了十几幅万分之一的口泉沟煤田地质测量图，每幅图都附有钻孔柱状图，并写了《大同炭田之研究》一书；

——日本对华侵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将掠夺大同煤炭看作是华北产业开发的中心目标，对大同的储煤情况进行了两次调查，分别写出《山西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和《华北矿山调查报告》：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掠夺大同煤炭上升为基本国策的高度，声言“控制华北煤，实际上等于控制了中国的煤业，进而控制了其它产业，因而实在有着深远意义，并在完成我国经济政策上又将会起很大的作用”。而大同煤在华北煤矿之内是最能对此作出贡献的煤矿之一，它担负国家的使命将是重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为大肆侵吞大同煤炭，掠夺计划定而又定，改之又改：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北支那矿业开发计划案”提出，要在大同煤矿当时产量的基础上增加4.5倍；

——1938年，日本政府按捺不住膨胀的掠夺欲火，在“大同煤田开发计划”中，要求“大同煤矿于昭和17年（公元1942年）能向日本输出1000万吨煤炭，于昭和22年（公元1947年）能向日本输出3000万吨煤炭，以此作为大同煤田的开发目标”；

——1940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详细的“宫本计划”，计划中对大同煤炭的掠夺数字为：1941年计划掠夺300万吨，1942年掠夺380万吨，1943年500万吨，1944年630万吨，1945年760万吨，并计划把掠夺煤炭的58%运往日本。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对我国重要矿产资源的全面勘探和侵华战争中各种政策都集中到战时紧急物资的增产和扩大对其本土物资需要的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报告《北支那炭矿开发计划案》。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报告《北支那炭矿开发计划案》。

支援上，更加鲜明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疯狂的资源掠夺

1937年9月上旬，日寇分两路侵入山西北部，日本坂垣部主力由察南地区南下，日干田、板仓诸部沿平绥铁路侵占了山西北部的大同，早已张开血盆大口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受日本关东军军部的委托，开始了对大同煤矿的掠夺。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迫不及待地侵占多年的抚顺煤矿将各类管理人员直拨大同，并从各地抓骗来5500名矿工，利用原晋北矿务局、保晋公司近代半机械化矿井永定庄、煤峪口、忻州窑开始出煤。

1938年，大同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从而将保晋公司、晋北矿务局、恒义公司、宝恒公司、四老沟、同家梁、胡家湾、南子沟8大煤矿尽归己有，并将庄瓦沟、大青窑、马口窑、杏儿沟、泉子沟、大北沟、三道沟、杨树湾等17处小煤窑悉数劫夺。对其余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的小窑，一律关闭。大矿、小窑所产煤炭一律由“华北炭贩卖公司”经销，多数运往日本，少数销于平津一带和山西内地。在日寇的严密控制下，遍地煤炭的大同，竟无煤可烧。天寒地冻，附近农民到停开的小煤窑上挖点煤，一经发现，不仅车辆和牲畜被没收，而且难逃活命。日寇只在大同城内财神庙设煤场一处，每天早6时排队发号，下午3时卖煤，每人只卖二角钱的土煤面。煤场每天拥挤不堪，大人小孩哭叫吵嚷，甚至有的被挤碰得头破血流。

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大同煤炭，他们不惜追加资本，建电厂、修铁路、建矿井，并严格控制煤炭销售。他们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采用破坏性开采方法，乱采乱掘，吃肥丢瘦，取易撇难，严重地破坏了大同煤矿的资源。他们对采空的掌子面，不做任何填充，甚至连掌子面煤柱，大巷煤壁也盗采一空，致使许多掌子面不等采完就冒了大顶。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后的接收报告中写道：“日人占领期间，专注采煤，井下工程多有未尽合理者，如主要巷道的煤柱，竟有薄至5米以下，……各巷道中未建水沟，积水漫漫，低洼处多被淹没”。

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

日本侵略者掠夺大同煤炭，丧心病狂地残害大同矿工，人性泯灭，骇人听闻。

日寇以种种欺骗手段募集劳工。以“盖房”、“筑路”为名，在山东、江苏、湖南、河北、安徽、天津、北京、山西等地设立“招工事务所”，哄骗大批破产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到矿山当劳工。日军还以“剿匪”为名，到乡下四处抓人，甚至连老人和十二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为补充劳工之不足，日军还把战场上的俘虏、监狱里的犯人押到矿上为其出煤。煤矿附近的农村，更难逃厄运，日寇不仅于各乡各村摊派招工，还以组织“勤劳报国青年队”为由，将大批青年强行押解到煤矿为其服劳役。

当时的大同煤矿，如同人间地狱。劳工住的是大房子，大房子对头两条炕，一间大房子挤沙丁鱼似地要装下140—150人。房内光线暗淡，空气污浊，窗户全部被木板、铁条封死。夏天，臭热不堪，苍蝇、蚊子、臭虫到处都是；冬天，严寒侵袭，许多矿工没有行李，只铺些烂麻袋片，洋灰袋纸片，冻得瑟瑟发抖。劳工吃的是黑豆饼和用发霉的高粱、糠、花生皮等混合磨成的“兴亚面”窝头。

矿工每天顶着星星下窑，顶着星星出窑，在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事变

前，大同煤矿大型矿井多为三班制，日军统治后，除白洞坑为三班制外，其余各坑均为两班制。日寇以延长劳动时间来弥补工人数量的不足。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在《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对此亦供认不讳：“从三班制向两班制改变，工人被强制地在两班制下完成三班制的工作量”。日寇还经常组织“努力出煤日”，并用“赶煤”的方法，就是规定头天出了几车煤，第二天必须赶上或超过头天的产量，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

日寇象急红了眼的野兽，他们要的是煤，至于煤矿工人的生命，在他们的眼里，不啻于蝼蚁。他们从不考虑井下的安全设施，强迫工人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下出煤，“宁肯多出一吨煤，不怕多死几个人”，“中国的劳工大大的有”，他们的政策就是以人换煤，以牺牲矿工的生命作代价。日本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在《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中，对此亦有记载：“大同煤矿作业环境恶化，为节省必要的坑木等……根本谈不上采煤粗放化以至安全等考虑”。劳动条件恶劣，工人伤亡惨重。《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曾做出这样的统计，1941年在籍人员为6934名，死亡869名，死亡率为12.5%，负伤者2983名，负伤率达58.1%。1942年，死亡人员增加到1700多名。

井下生产条件恶劣，事故屡有发生。矿井犹如吞噬矿工生命的巨兽，煤矿成了日寇虐杀矿工的刑场。

——1938年春，煤峪口坑九号掌子面透水，100多名矿工被围困在井下，日寇无动于衷，并阻止矿工救助，除白洞郭四龙，曹家窑张佃成、郝六虎等12人靠喝井下污水、吃衣中棉花死里逃生外，其余全部死于非命。

——1941年9月，白洞西坑掌子面因开采日久，又没有支护，顶板眼看要塌落，日军还用刺刀逼着工人进去采煤，结果大顶塌落，70多名矿工全部葬身于此。

——1943年春天，忻州窑南四号采煤掌子面顶板塌落，压住了八个工人，其中一人半截身子犹在外面，人还活着，工人们前去救助，而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竟将这名矿工活活砍死，然后挥舞着刺刀，驱使工人抢救掩埋在塌方下的机器。

——1943年，煤峪口南大巷24号掌子面大顶已响了两三天，工人们不敢进去，一个叫“小高桥”的日本人，硬逼着工人把里面的二节车皮、10节8米长的道轨和十几根柱子拿出来，人们不去，他就用镐把打，结果工人刚被逼进去，顶板便轰然塌落，19名矿工被压惨死。

这样的悲剧在大同煤矿时有发生，“只见矿车天天走，不见矿工几个活”，就是当时大同矿工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了防止工人逃跑，日寇将工人的像片、指纹、身体特征、皮肤颜色都注册在案，并在工人住的大房子四周垒起土墙，墙上架设电网，门外设立岗楼，有日军和矿警日夜站岗。日寇为了镇压矿工，强化法西斯统治，他们成立了宪兵队，下设矿警队和督察队，任用汉奸、豢养狼狗，残害矿工。如若矿工逃跑被抓，不是活活被打死，就是被狼狗咬死，惨不忍睹。宪兵队和矿警队、督察队严密监视矿工行动，每天押送工人上下班，稍有反抗，便遭榔头打、皮鞭抽，以至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

“万人坑”累累白骨冥冥冤魂

恶劣的生活环境，残酷的劳动条件，摧残着矿工的身体，吞噬着矿工的生命。尤其病疫流行，因无医无药，矿工成批倒下。开始矿工死亡，日军还雇用拉尸队将人拉出去掩埋。后来流行性传染病几次蔓延，大多矿工病卧不

起，日军在荒郊野外十多米长，八九米宽的“炼人坑”里面架起炭火，将一息尚存的矿工扔进去，浇上汽油焚烧，数以千计的矿工被活活烧死。1942年，矿区传染病流行，忻州窑南山劳工房里的劳工大多一病不起，日军调集部队，将工人病轻的送到“隔离所”，病重的马上用铁丝将手脚捆住，拉到小南沟“炼人坑”烧死。当时，忻州窑每天都要被烧死几十人。后来，传染病仍在蔓延，病人成倍增加，日军干脆停止了检查，凡被认为有病的，一律烧死。那一回，忻州窑整整烧了四天，“炼人坑”浓烟滚滚，悲泣声遍布四野，真是惨绝人寰。于大女是浑源县人氏，带着孩子跟随丈夫来到忻州窑，不到一年，丈夫惨死井下，依靠17岁的儿子背煤度日，儿子因染病在身，被日军拉到“炼人坑”活活烧死，几天后，13岁的女儿也被烧死。于大女被送进了“隔离所”，留给5岁小儿子的是惊恐、疾病和饥饿，没过多久也死了。象于大女一家这样的悲惨遭遇，在大同煤矿真是数不胜数。

染病在身的矿工惨遭日寇荼毒，丧失劳动力的矿工也逃脱不了被虐杀的命运。日军统治下煤矿环境的恶劣、劳动强度的超量，均非常人所能忍受。矿工每天的劳作都是在挤兑自己的血汗，一旦倒下，便厄运临头。日军根本不问死活，只要下不了井，就被拉尸队拉到荒郊野外、山谷沟壑或废旧矿井。日积月累，这些地方白骨累累，腐臭熏天，“万人坑”即由此而来。煤峪口矿钱奎保的父亲就是被活活扔进“万人坑”的。1941年底，钱奎保和父亲、舅舅一家八口人，从河南汤阴被抓骗到大同煤矿，不到三个月，就有六口人惨死在矿上。一天，钱奎保的父亲因劳累过度，挣扎不起，没有上工，被日军查房时发现。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举起留榔头就打，几个拉尸队员一拥而上，拖了就走，就这样被活活扔进“万人坑”。晋西北边区1940年10月19日的《抗战日报》上曾刊登这样一则消息：“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行人总络绎不绝。今天，这条路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即使有人走，也是寥寥无几。原因是由于黄土沟的死人臭气太大了，每天从口泉煤矿被拉到黄土沟的死人总有三五个，这不是病死的就是自缢或被打死的煤矿工人，总是浑身被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让野狼、野狗信口大嚼，咬得血肉狼籍。有脚无手或有腿无头，伤心惨目，莫过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灭绝人性，就是顽石也要为之叹息！

大同煤矿究竟有多少“万人坑”，确切的数字已很难查清。据老工人回忆，比较大的“万人坑”就有20多处，如忻州窑的杨树湾，同家梁的黄草洼，永定庄的大南沟，白洞的老爷庙，煤峪口的南沟等。其中，煤峪口南沟的“万人坑”，是现存“万人坑”中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万人坑”位于煤峪口南沟的北坡上，分上、下两个洞。上洞宽6—7米，深40多米，下洞宽4—5米，深70多米，洞内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体。从尸骨的姿态可以看出，许多矿工还没有死亡就被扔进了“万人坑”，他们有的仿佛挣扎着向洞口爬去，有的则痛苦的抚摸着臂上的伤痕；还有的被截掉了四肢，击穿了头颅，扭断了脊骨。洞中情景，惨不忍睹。

反迫害求生存大同矿工奋起反抗

日寇残酷的迫害，血腥的统治、疯狂的掠夺，激起了大同矿工的无比仇恨，他们想方设法要逃出这人间地狱。他们有的单独潜逃，有的结伙而逃，有的在上、下工的路上伺机逃跑，有的被送进“隔离所”后，设法脱难。1942年，忻州窑矿工中病役流行，大批矿工被活活烧死，面临被扔进“炼人坑”的绝境，在一个当过海员的山东小伙子小韩的策动下，在一个姓宋的矿警帮

助下，忻州窑的矿工打死门岗的日本兵，拉掉电网的电闸，夤夜而逃。许多矿工在逃跑中被日军用机枪打死，但上百名矿工终于逃离了魔窟。

消极怠工也是矿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斗争形式。矿工下井后，为对付日本兵的监视，经常用“放炮”、“危险，要落顶”等阻止日本兵进入工作面。后来，日军采用了计件出煤的方法，规定每个工人出煤若干，否则不准出井。为了反抗日本兵，矿工还故意破坏机器设备，制造停产事故。1940初，煤峪口主井发生了严重的跑车事故，全矿停产一个星期。1942年，日军东京运一台割煤机，并调入工程技术人员10余名，永定庄矿工将钢丝绳锯断，运送割煤机和部分日军的罐笼失去控制，直撞井底，割煤机被摔坏，日军被死。其他割电缆、破坏机器的事也时有发生。

工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日本侵略者。1937年9月，八路军宋时轮支队驻扎在大同矿区后山区的长流水、挖金湾、马脊梁带，发动组织矿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组织了几支矿工游击队。当时彭明旺矿工游击队、李有福矿工游击队、穆大虎矿工游击队都曾活动在大同矿区。后因形势严峻，活动转入地下，但党在矿工心中埋下了火种，种下了希望。

在党的领导下，大同矿工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同矿工终于摆脱了悲惨的命运，重见了天日。日本侵略者残害大同矿工的罪恶史实将永载史册，任何人也抵赖不了。

（中共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

沦陷时期的天津劳工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天津。他们十分重视天津在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就我津市而论，虽系处于后方，乃为兵站，物质之重要基地，所以后方一切工作，如努力建设，增加生产，物力、人力、心力之贡献等，其重要性，实不减于前方”。日军将天津当作“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和“物质基地”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残酷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国内青壮年被强征入伍，劳动力极为缺乏，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深感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于是在加剧经济掠夺的同时，更疯狂地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天津首当其冲。

日本军部命令日本军队、特务机关及伪政府的警察局等部门参与办理中国务工事务，并专门组建了一系列的“招募”劳工的机构，如“华北劳工协会”、“华北满蒙劳务联络会议”、“天津地区劳力统制委员会”等组织。这些机构完全由日本军界控制。如1941年建立的“天津地区劳力统制委员会”，委员长是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雨宫巽，副委员长是天津陆军特务机关长山下哲夫，其余委员片有19人，其中除三名是汉奸外（这三人是伪天津特别市政府的社会局、警察局、工务局的局长），其余均为日本人。

此外，日军在津还搜罗一批为虎作伥的青帮恶霸、汉奸流氓分子，帮其抓捕华工，残害中国人民。汉奸恶霸袁文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大恶霸袁文会，天津芦庄子人，兄弟排行第三，也称“袁三爷”。早年父母双亡，靠其叔脚行把头袁八生活，“七·七”事变后，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踏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力，甘心充当走狗，积极参与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策划的“天津便衣队”暴乱。天津沦陷后，日军在天津日租界的福岛街（今多伦道），专门设立了一座劫掠“华工”的魔窟——“大东公司”。袁文会便与“大东公司”勾结在一起，进行贩卖“劳工”的勾当，为此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名曰“会德号”的机构。大东公司“招募”劳工时，形式上付给一笔“安家费”，预支一部分“工钱”，这些实际上是劳工的卖身钱。袁文会的会德号代大东公司“管理”劳工，在南市三不管地区租用几家说书场和南开体育社，临时搭盖几间房子，四周砌起围墙，作为劳工的临时食宿之地。劳工一进入这些院落，就如同掉进了人间地狱，院门口及周围都有流氓持刀棒把守，劳工只许进、不许出。袁文会还在里面开设饭馆、赌局等，想尽一切办法把劳工手中的“安家费”榨干净。此外，袁还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处诱骗青壮年劳力，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为日军修筑地下军事工程。

青帮恶霸王士海，也是协助日军劫掠“劳工”的汉奸之一。王士海是天津丁字沽一带的流氓头子，其父王福田是盘踞在丁字沽、堤头、东于庄、小王庄、北开一带的脚行把头，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王士海子继父业，为非作歹，成为天津的一大恶霸。日军占领天津后，王士海甘心作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日军侵占徐州、连云港等地后，为了修码头、造船坞、筑兵营、建仓库，急需大量的劳动力，王士海就派人到农村去为日军诱骗，胁迫，绑掳大批青壮年。如同押解犯人一样，把一批批的劳工，用闷罐车押送到徐州、连云港等地。这些劳工在日军的刺刀、皮鞭下，忍饥劳累，干着超重的体力活，累死者不计其数。

日本侵略者推行招募华工的政策，是经过日本统治集团，特别是经过日本军界精心策划的，是对华实行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七·七”

事变到 1942 年 7 月，日本在天津招募和抓捕的劳工约有 5 万名之多，劳工被送往外地做工，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成了异乡之鬼。日伪当局招募劳工，除使用欺骗的方法外，有时竟把卡车开到闹市区，将人强行拉走去当劳工。

1939 年秋，天津受到水灾的危害，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日伪政府假惺惺地设立了“天津水灾救济会”，对难民进行收容，每日在收容所内发放二次杂合面熬的稀粥，由于收容所的难民日渐增多，伪市长温世珍怕难民“闹事”，便与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暗中勾结策划“疏散难民”。日军一方面加强了对收容所的监视与控制，增添岗哨；另一方面将难民中身体健壮的青壮年劳力驱逐出收容所，并以“疏散到唐山安排就业”为名，发给每人一条写有本人姓名的布条，强迫这些壮劳力登上东去的火车，还说：“将来凭这一布条可以免费乘火车回天津”。实际上，日军将这些壮劳力送到伪满和日本当劳工去了，此后并无一人凭布条返回天津。

日伪时期，华北地区最大的日军军谷农场是天津军粮城的“华北农事试验场”，占地 43000 余亩，每逢农忙季节，日军便到津郊葛沽、咸水沽，小站等地抓捕劳工来干农活。

1941 年 9 月，数百名日本兵突然包围了小站镇西头老大桥的“入市”，随后用武力掳走 350 名青壮年劳力，到华北农事试验场收割稻谷。在抓到劳工后，他们谎称“按人包活，干完后给钱，用汽车送回家”。两个月后，收割完毕，稻谷入库，日军既不给工钱，也不让一个短工回家。在一个漆黑的雨夜里，工人史东祥和马光海，决心逃出牢笼，结伴回家。日本兵发现后，迅速追捕，并将二人枪杀，随后日军便将劳工们严密地监禁起来。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军官带着翻译，把睡梦中的工人挨个叫醒，然后用绳子捆绑成一串串的押到军粮城火车站，装入闷罐车运往塘沽，一下火车日军就把工人们赶进了挂着“大东公司”的院子里，院门口有日本兵把守着。当工人们明白事情的真相后，纷纷找翻译官索要安家费和工钱时，翻译官却高声喊叫道：“安家费由‘会德号’袁三爷替你们收了”。袁文会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李子扬掏出手枪，横眉竖眼地威胁工人们说：“谁嚷就打死谁”。过了几天，一个风雪交加的黑夜里，日军把这 350 多名工人分作两批，一批运往东北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去代木；一批押上日本的“大正丸”送往日本北海道的矿山去挖煤。直到抗战胜利后，仅有一人从东北逃回家乡，其余工人皆惨死异国他乡。

日军把天津作为抓捕、转运劳工的基地。他们在北京、青岛、河北、河南、山东、淮海、冀东等地区以及从昌黎、乐亭、滦县、丰润、宁河、武清、安次、静海、青县、仓县、南皮、东光、吴桥、故城、景县、德县等地抓捕大批劳工，集中到天津，然后在刺刀的威逼和镣铐、绳索的捆绑下，从铁路运到满洲、蒙疆、华北、华中等地。

日军在塘沽新港以“劳工协会”的名义设立一个“冷冻公司”，专门从事劫掠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的活动。他们把抓到的劳工先集中在“冷冻公司”里，然后再从海路运往日本等地。“冷冻公司”就是监狱，就是集中营。这里有一排排用木板修建的房子，每间木房里搭有通铺，住一百余名劳工，四周围安装有铁丝网和电网，四角修筑了高大的碉堡，并架上数十挺机枪。劳工们在日军的监督之下，不许乱动和相互交谈，大小便也要向哨兵“请假”，劳工们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个干硬的混合面窝头和一点白水煮的菜。酷夏时，木板房如同一个大蒸笼，加上蚊虫叮咬，劳工生活十分悲惨。这种生活

条件，使许多人患病，每天都有数名劳工死去，开始每天拖走几具尸体，后来竟用马车一车车地往外拉，这些尸体全部运到塘沽四号码头的“万人坑”里。日军在塘沽四号码头设有一个“病号房”——也称四号牢，这个“病号房”既无医也无药，是日军专为因病不能走出牢房的劳工所设的“死囚牢”，病人进入“病号房”只有等死，有的生病劳工气息尚存就被扔进万人坑活埋了。

日军在天津“招募”输出的劳工，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据档案记载：

——1943年6月，经华北劳工协会“介绍”的南满铁道公司铁道总局与华北交通公司商定：介绍赴满工人数目为6000名。

——1944年7月18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日本的“中兴碳矿公司”在津“招募”的劳工，两次共有1411人。

——1944年8月25日，日伪警察局开始为日军1800部队招募劳工，每日招募劳工500名，送往1800部队谷保队仓库工作。24天中，共“招募”劳17175名。同年，日本特务机关“联络部”在天津直接抓走的劳工就有1800余人。

——1944年8月，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交给日本1820部队的劳工有1000人。

——1944年9月20日，日伪警察局为日军联络部代募修理张贵庄机场的劳工2000名。“自9月14日陆续招送，至19日共计招送劳工1929名”。

——据华北劳工协会《业务概况报告》第4号记载，仅1945年1月至2月，由天津塘沽向日本的三井矿山、日本矿业等组织输送劳工就有6次之多，共输送劳12183名，其中一次输送594名劳工。

据日本官方的材料，截至1945年8月15日，输送到日本本土的劳工约为31601人，分别分布在日本北海道、岩手县、福岛县、山形县、秋田县、茨城县、杉木县、新潟县、长野县、群馬县、静冈县、岐阜县、洞爷湖县、石川县、京城府、大阪、安子县、爱媛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福冈县、长崎县、宫城县、熊本县等25个县中的135个工矿场所中，从事采矿、开渠等重体力劳动。

中国劳工按工作性质区别，可分为：

土木建筑工人约为12000名；

煤矿工人约为12000名；

码头苦力约为4700名；

矿山工人（煤矿以外）与造船工人600名。

这些在日本的苦工，“自昭和18年（1943年）起移入日本之华工，总计37183名，除去其中自华中移入之1487名外，大部分均系自华北移入，途中死亡者计839名，到达日本后至本年（1945年）8月15日止，其间因疾病死亡者计4957名，现有人数计31601名。

另据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的粗略统计，从1940年—1945年，日军仅由天津抓走的劳工约为73374人，而抗战胜利后返回祖国的劳工（在天津共有19批）人数只有22832人及1561具劳工的骨灰。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残酷迫害罄竹难书，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天津市档案馆王成）

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金乡三千民工遇难记

残缺不全的文峰塔是一首历史悲歌，记录着金乡人民的不幸和侵华日军的暴行。站在文峰塔下，如同面对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仿佛能听到他低声诉说着57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悲剧，诉说着3000民工惨死日军刀下……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沿津浦线大举南下，年底渡过黄河，占领山东省城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长驱直入，泰安、肥城、兖州、邹县、济宁等地相继沦陷，金乡危在旦夕。

金乡是山东西南部重镇，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意欲夺占。1938年3月，日军在台儿庄之战中受到重创，4月初，日军决定会战徐州，调集8个师团20万人气势汹汹地从津浦路南北两翼向徐州以西之陇海线迂回，企图在徐州以西地区一举歼灭中国抵抗部队，扫清其继续南犯的障碍，金乡便成了日军实现这一侵略野心的重要目标之一。

5月9日，日军中岛今朝吾部从济宁出发，直扑金乡。11日，进入金乡北部胡集一带，并不时炮击县城。防守在大义集的中国军队一部，凭借深沟高垒，顽强阻敌，日军一时受挫。狡猾的日军看到正面进攻受阻，便留小部兵力正面佯攻，主力进犯东南，在柳河防线东鱼台境内的清崖河以西过河，再折向西南。同时，日军还组织了一支机械化部队由金田带领，经鱼城以东丰县西侧挺进陇海路。13日下午，敌一部占领金乡城东的鲁庄集、王楼等村，其主力快速经城南向西运动城西南五里的苏楼村，击溃中国守军孙桐的一个营。金乡城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

而此时，布防金乡的中国军队被调往皖西，以掩护第五战区各部的退却。柳河防线和大义集守军知其后路被断，纷纷逃命撤走。柳河防线不攻自破，城北之敌随即占领大义集，越过柳河，兵临金乡城下。

日军进犯金乡，铁蹄过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

城东王楼村，是个只有70多口人的佃户村。13日下午，日军占领该村时，抓住外村逃难的老百姓100多人，驱使他们为其挖战壕修工事。劳累了一夜的逃难群众被集中到一个大院里，一部分群众乘机逃脱，余者被捆绑起来，拉到村南柏树林中。日军撕掉他们的上衣，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插进他们的胸膛，32人倒在了血泊中。被刺三刀幸免于难的解景言讲起这血淋淋的惨状，老泪横流，该村瘸子王小孩在给日军挖枪眼时，日军说他挖得太大，两名日本兵将其捅伤，又把他绑在柳树上，砍掉其双臂，王小孩被折磨致死。14日这股日军离去时，王楼村一片狼藉，半熟的、烤焦的、缺腿少肉的鸡猪牛羊，到处可见。米缸面盆锅灶内，许多被拉上了屎。

13日下午，日军一部进入城北大义集，见人便杀，未逃脱的19个村民无一幸存。年逾古稀的独身老人刘明余，被日军按倒在地象杀羊一样地抹了脖子。年过七旬的李洪前老人，被活生生地肢解。王永吉被剖腹，肝肠涂地。村西门外一位60多岁的老妇和一名15岁的少女，被数十名日军轮奸后，又被挑开了胸膛。侵略者的兽行令人发指。

死里逃生的陈玉坤回忆起自己的悲惨经历，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说：13日下午日军侵入城西南的张草庙村，我从城里逃在此村被日军搜出。晚上八九点钟，这伙日军闯至城两北李双楼村，把我们9个人捆起来，关进一间牛屋。14日下午，我乘机逃回家中。傍晚，一伙日军进入我家院中，挑死我的叔父陈景彬。我被三名日军绑上带到后邻申方举的院中，一名日军持刀猛刺我的腹部，我侧身，刺刀从腹部偏右侧穿透，眼前一黑扑倒，另外两

名日军，一人一刀又刺进我的后背。我昏死一个多小时后苏醒过来，爬回家躲进床下。两名日军发觉追了进来，往床下乱刺，我的后脑勺和头部右侧都被刺破，右耳被穿开。日军又把我拖到院中，在前额连砍三刀，又昏死过去。拂晓，我再次苏醒过来，浑身是血，艰难地爬到屋中，心想，反正活不成了，扯一领破 盖在身上等死。不久，又来了几名日军，一名日军挑起我的右腿，看是死还是活。我装死任其摆布。一名日军临走时朝我面部狠踹一脚，牙齿脱落一半，我又昏过去。日军走后，我第三次苏醒过来。

今天仍然活着的陈玉坤历经了三死三生，从头到脚留下 11 处伤疤，这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金乡县城周围，日军所经村庄皆遭血洗。

在金乡告急时，国民党军队曹福林部令金乡县政府征调民工，修筑工事，抵御日军。4月下旬，日军进犯全乡前夕，3000 民工从全县 50 个乡镇聚集柳河。国难当头，民工们日夜赶修，“固若金汤”的柳河工事，留下了民工们辛勤的汗水，也包含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修好柳河工事，民工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于 5 月 9 日被调往城内加固城防。11 日下午 1 时许，4 架日军飞机从东北方向呼啸而来，倾下数十枚炸弹，城北门到西门一线，顿时淹没在硝烟火海中。炸弹的爆炸声，墙倒屋塌的砸地声，唤儿呼娘的叫喊声，令人心碎。马家胡同的徐占安家正围桌吃饭，一颗炸弹从天而降，一家三口血肉模糊。刘伦山的餐馆在爆炸声中消失，跑堂的伙计没了踪迹，寻了很久，才找回来他的一只脚。这是日军进攻金乡县城的先声。金乡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居民纷纷逃到乡下去了，守卫部队只有孙桐萱一个团的兵力，还有被困在城里的 3000 民工。他们在守军的催促下，以最快的速度抢修防空工事，日夜不息，两三天内将四周城墙防空洞全部挖好。

5 月 13 日上午 10 时，日军从城北方向射来一颗炮弹，将文峰塔塔顶打飞。金乡县县长王冠一吓破了胆，带领县政府大小官员逃往城南徐油坊。傍晚，日军开始攻城。敌人的一颗颗炮弹在人群中炸开，民工们横尸街头，血流成河。日军逼近了，活着的民工别无选择，手持铁锹镐头毅然登城，参加战斗。至 14 日凌晨 3 时，守军伤亡惨重，残部从东南角的城墙洞中逃出，少数民工随出，其余民工奋力抵抗，与敌血战。拂晓，西门被破，继而全城陷落，多数民工战死城墙之上，死的悲壮，死的惨烈，催人泪下。

日军进城后，大施淫威，疯狂屠杀。躲在城墙洞中的民工，或被枪击而死，或被火烧而亡。在奎星河前的天主教堂中，躲藏着民工和附近教民 180 余人，他们被赶至文峰塔附近，日军先用机枪扫射，又投掷手榴弹，180 余人全部遇难，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尸体也难找到。在南家后坑边，日军三次屠杀民工和居民 400 余人。刘玉章、许守文、王克芹等 21 人被押到东南城墙角上的筒子屋里，几名日军用刺刀堵住小屋的东门，周围站着一圈日本兵。两门站着个挂短枪的军官，他右手伸出一个指头，喊着：“出来一个！”就这样，只见出不见回。年近八旬的罗化章，被一棍子打了下去。不满 10 岁的孩子李大路，被刺刀挑起扔了下去。事后，20 多个日军每人丢下一颗手榴弹，在尸肉横飞、鲜血四溅中，日军发出狼嚎般的狂笑声。鬼子走后，刘玉章、许守文、王克芹带着满身血迹，从尸体下面爬出来，扒开城墙洞口逃出幸免于难。北门里的女子学校内，在二楼上横躺着 30 多具尸体，尽是十几岁的姑娘，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裸露身躯，他们是被日军奸淫后残杀的。日军在县

城捕杀 4 天，3000 民工除极少数脱险外，全部丧生。

金乡 3000 民工国难当头表现出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日子里，3000 民工的亡灵昭示着我们，悲剧决不能再重演，和平是历史的潮流和人类永远的追求。

（山东济宁市委党史委王炳良）

残害战俘

日寇对中国战俘的杀戮、折磨和奴役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下面是他们在河南境内这方面暴行的部分数字：

1938年6月1日，在杞县杀害战俘100余人；

1944年5月，在陕县温塘村把20多名战俘扔进大火中烧死；

在陕县县城会兴街山西会馆将被俘的300多名军官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一一杀害；

1944年11月26日在上蔡县王庄村将被俘民团112人砍头，只有2人死里逃生。

河南战役后，日军将数万名战俘分别关在郑州、洛阳等地的战俘营，肆意杀戮和奴役。

涪阳西工战俘营

日军设在洛阳两工的战俘营，简直就是一座杀人魔窟，在半年多的时间就有1万多名中国战俘被折磨致死。从景云样的苦难经历中即可看出日军在这个战俘营所干的罪恶勾当。

景云祥是河南省南召县铁牛庙村人，在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第三二八团一营一连一排当下等兵。1944年5月，河南战役中在渑池县被俘，和他一起被俘的1000多人被关在一个土窑洞里，6天不给东西吃，第8天日军令他们到洞外集合，只有400多人能走出来，另600多人已不能站立起来。日军用机枪向洞内扫射一阵，然后炸塌洞口。日军将剩下的400余人押到洛阳西工战俘营，里面被关押的战俘已达2万多人。西工四周是一丈多高的围墙，墙内架设了能报警的铁丝网，墙外挖了壕沟，四角筑有碉堡，可组成控制整个战俘营的火力网，只有北边一个大门供进出，防卫森严。景云祥回忆说：“6月中旬，日军把所有战俘都押出去扒陇海铁路，从渑池西的观音堂车站一直扒到洛阳车站。在挖钢轨时，每根钢轨两头各站一个日本兵监工，见谁不顺眼，就用枪托打，刺刀捅。钢轨挖出来后，由12个战俘扛一根。那时大家饿得头晕腿颤，实在扛不动这么重的东西，完全靠求生的本能勉强挣扎。有时，一个人摔倒，其他人也都被压在钢轨下。日军不由分说，就用刺刀捅人，有的人虽然连忙爬起来，也不被放过，许多战俘就这样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每天收工时，那些被折磨得跟不上队列的同胞，全被日军捅死在路上。有一天傍晚收工后，有三个日本兵来到我们住处，拉出原来在我们营当勤务兵的一个小战俘，叫他两臂平举站成一个‘大’字形，两个日本兵一人拉着他一只手，另一个日本兵站在他的身后，举起寒光闪闪的东洋刀‘嗨，嗨’大叫两声，将这个小战俘的两只胳膊砍落在地，第三刀从头顶上劈下去。一直劈到腰部。然后，三个日军大笑着扬长而去。还有一次，一个被俘的学生兵在刨枕木时，砸飞一个石子，不巧将监工的日军官的眼镜片打碎了。这个日军官拔出东洋刀，只听‘嚓！’的一声，那个学生兵的头就骨碌碌滚到我的脚下。由于日军砍得又凶又狠又快，我看到那颗人头上的眼睛还在惊恐地眨动，嘴巴一张一合地痉挛。这一幕，我至今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啊！当铁路扒到新安车站时，住在我旁边的一个工棚里的战俘集体逃跑了几百人。其中有两个胆小老实的人，呆在工棚里不敢跑，结果被日军抓了起来。第二天清早，日军把我们全部集合到一个广场上，把两个没逃走的战俘的衣服全部扒光，绑在事先埋好的木桩上。有两个日军各牵一只高大的东洋狼狗，哇啦说了一句什么话，两只狼狗一下子扑到被绑的两个战俘身上，直起前爪往上一伸，只

听一声惨叫，俩人的腹腔已被撕开，狼狗的嘴巴熟练地伸进热血喷流的胸腔里，掏食内脏。不一会儿，两个人的内脏被狼狗吃光。日军头目指着两个被难同胞的尸体，对我们恐吓道：‘谁敢再逃跑，就象他们两个那样，死了死了的！’

“扒完洛阳西边的铁路，日军又押着我们把钢轨和枕木运到洛阳东，修复洛阳到郑州的这段铁路。这段铁路是河南战役前我们自己扒掉的，那时是想防止日军运送兵力和辎重，想不到没有防住日军，反而又轮到这批俘虏兵来修铺这段路，修铺这段铁路比扒洛阳西那段铁路死人更多。我们在数九寒冬，忍饥挨饿，卧冰踏雪当苦役，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倒在雪地里死去，我干活时常常会踩到埋在雪地里的死尸。到12月底，这段路才修复完工。短短几个月，一万多名战俘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日军的魔掌下，铁路两旁尸骨累累。回到洛阳西工，战俘已不足三分之一了。我看到每天都有拖尸队从各个囚房往外拖死尸。拖尸队也是由战俘组成的，每人拿一根绳子，绳子两头拴着铁钩，用铁钩钩进死者的脚踝骨，背起绳子往外拖，雪地上尽是拖尸留下的痕迹，十分恐怖，1945年初，日军把洛阳战俘往外地运。1月中旬，我和另外500多人一起被日军运往山东济南，关在济南日军集中营（对外称‘济南新法院’），据统计，这个集中营从建立到1945年8月，共杀害中国抗日军民10万余人。抗战胜利，我从济南日军集中营出来，一打听，得知我们这批从洛阳西工押来的500余人，除一人听说被送到东北下煤窑外，就只剩下我和郭水志2人，郭在狱中还被日军打瞎了一只眼睛，其余的人全死在这座魔窟里了。”

送到日本当劳工

日军还把大批战俘从河南运到日本本土做劳工，使许多战俘惨死在异国他乡。1944年6月，日军一次从郑州运走1万多名战俘去当劳工。内乡县胡庄村胡云泽就是这一次被运到日本当劳工的。胡云泽1943年刚满18岁就被国民党抓到第三十八军当兵，河南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又参加了抗日游击队，1944年6月12日，他和40余名游击队员在登封被日军俘虏，关押在郑州的地洞里。胡云泽在回忆被俘后的遭遇时说：

“我们被关在地洞里整整三天四夜。6月17日早上，日军将我们赶了出来，每60人用绳子拴成一串，牵进闷子车里。上车前，我们看到这列火车有一里多长，除了车头和车尾是全副武装的日军外，所有的闷子车里全是被俘同胞。这时天气很热，火一样的太阳晒着车厢，车厢内又不通风，同胞们在车厢里蒸闷得嘴里冒火，许多人晕倒在车厢里。当晚，火车到石家庄，同胞们被牵下车，每人只准喝两口水，有的渴急攻心，猛喝完一杯水，立时死去。我们这一根绳子所串的60个人，就有12人喝水后当场死去。6月27日，日军又将我们运到北平俘虏集中营。先到这里的同胞已有几万人。日军将我们每100人编为一个中队，我的编号是269号，日军每天要按代号点三次名，回答稍迟就被毒打。在集中营里，每天都可以看到有几辆马车从里边往外拉死尸。8月21日，日军又把体检合格的战俘装上火车运到青岛。22日夜，又把我们赶上轮船。8月29日，我们在日本九州岛福冈县门私港下船，日军又把我们运到警刑炭矿（地名），这里有三层电网，三层岗哨。9月17日，日军强令我们下煤窑挖煤，一个井口300人，分两班，一班从凌晨4时于到下午4时，另一班从下午4时于到凌晨4时。每班12小时，下井前发两盒饭，一盒下井时吃，另一盒带到井下吃。在矿井口，我们被强迫剥光衣服，发给

一只矿灯帽和一块兜裆布，然后坐上电车。沿着陡峭的滑车轨道，向下滑行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采掘面（距井口五六十里）。在井下，每10人一个窑坑（工作面），每个煤窑有一个日本监工，专门打人。采煤用的是风钻，3人掌钻，7人往电车上装煤，每班开采7~8万斤煤，必须全部装运出来，每人一个班下来得装一万多斤煤，累得死去活来，稍不随日本监工的意，就遭毒打。在井下干8个小时，吃一盒带下来的饭，喝几口地下巷道煤层上滴下来的水。随着折磨的加剧，同胞们患病的越来越多，日本监工不准病号请假，许多人被累死、病死、打死。一次塌方，我旁边那个煤窑里的10名同胞全部丧生。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干活的这个矿井有109名同胞被折磨致死。”

洛阳西工的日军战俘营，也有许多战俘被日军押送到日本做苦役。襄城县人耿纯，被俘前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营长、社旗县人张清选，被俘前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五师工兵连司务长。他们被俘后不久，即被运往日本做苦役。张清选在回忆这段苦难经历时说：

“我们被押到洛阳两工俘虏营，正是收麦的时候，天气很热。日军不给我们水喝，很多伤病战俘得不到治疗，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死去。日军不让埋尸体，逼迫我们把尸体抬在一起垛起来，上边盖着一层烂席。几天功夫，死的人就垛了一大堆，尸体腐烂，臭气熏天，惨不忍睹。到俘虏营的第8天上午，日军把我们集合起来，一个日军官从中挑选了300多人，我和耿纯、李克金、张金亭都被挑了出来。这时从外边开来几辆汽车，日军让我们上车。我们一上车，就被日军用草绳捆绑在汽车上，拉到郑州，关进郑州第二监狱。两天后，又用火车把我们押到石家庄。半月后，又转运到北平南苑，随后又转到青岛，把我们押到一艘轮船上。这时，一个日军官宣布要把我们运到日本本土去。我久久凝望着越来越远的海岸线，就象被强盗从母亲怀中抢走了的孩子一样，心中难受极了。从洛阳被俘一直到青岛，我受尽种种毒打屈辱，但都没有掉过一滴泪，只是把仇恨深深埋在心里，等待时机逃出去报仇雪恨。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刷刷流下来。轮船在海上航行八天八夜，在日本九州下船，接着坐小船到下关，然后又乘火车向北走，一直到日本本州岛最北边的秋田县。我们从秋田又坐了七八个小时的汽车到花岗。从花岗步行六七里，在一个山湾里的几排简易木屋前停了下来，旁边有个牌子，写着‘中山寮’三个字。后来才知这里是一个名叫鹿岛的资本家刚刚勘探出来的铜矿。

“日军把我们编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九个小队，大队长是耿纯，张金亭、李克金是中队长，但他们只能领着干活，有10个日本兵监工。日本人强迫我们开山洞，挖河道，修铁路，做铜矿开采前的准备工作。这里气候恶劣，夏秋阴雨连绵，冬春风雪漫天，而生活比气候更恶劣，每人一顿只能吃到一个比鸡蛋稍大一点的橡子馍，吃下去胃里象火烧一样难受，肚子胀得象鼓一样，拉稀不止。没多久，就有很多人病倒了。1945年春，日军又运来700多名劳工，这是日军在山东大‘扫荡’时抓来的农民。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恶劣，到1945年5月，先后两批押去的1000多人，已有500多人被折磨死了，此外还有100多人患病，几十人奄奄待毙，能上工干活的只有300多人。日本人为了提前完成基础工程，宣布实行‘突贯期’，把每天的施工时间又延长几个小时。我们每天凌晨4时多上班，晚上7时多下班。中午给每人发一个掺了一多半野菜的橡子馍在工地上吃，咽下最后一口馍就得干活。慢一点，监卫举鞭就打，眼看又有100多人快不行了。是默默等死？

还是想个死里逃生的办法？我和社旗老乡张金亭商量准备逃跑。并把这一打算告诉了耿纯和李克金。耿纯说：‘偷跑肯定是跑不了的，要干就得拼上！’李克金也说：‘依我看咱们拼也是死，不拼还是死。与其活受罪，不如干脆跟他们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

“1945年6月30日，我们经过秘密串连、准备后，在耿纯指挥下，花岗中山寮的400多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打死9名日本监工，另一名日本监工逃到警察所报案。我们放弃了袭击日本警察所的计划，连夜带着伤病劳工向山上转移。7月1日凌晨，日本警察和当地居民1000余人包围了我们。我们用石块、铁镐和木棍与敌人搏斗，打死打伤了数十名日本警察。因为我们没有枪，日本警察紧追不舍，许多劳工英勇牺牲。这天下午，我和耿纯等40余人撤退到山顶后，再次被俘，其余的人员全部被杀害了。虽然这次暴动失败了，但对日本震动很大，各家报纸都发了消息。就在我们即将被日本法西斯枪杀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我们才幸而获救，成为国际法庭上审判日军罪行的证人。”

日军残害奴役战俘的滔天罪行，难以尽述，文中所提到的事件，只是日军惨杀、侮辱、压榨、奴役战俘的千万个罪行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侵略军野蛮、狠毒、贪婪、狡诈的本性。花岗中国劳工暴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魄。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贺明洲）

石家庄集中营日军罪行见证

我被捕入石家庄集中营，已过去 50 多年了，但这座人间地狱的悲惨景象，仍历历在目。今天，我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将我在集中营、井陘煤矿和“无人区”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所犯的滔天罪行，昭示后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被捕

1942 年，我在冀中十分区休养一所任司药，年 17 岁。一次休养一所所长高雅轩带领部分医务人员随分区部队执行战地救护任务。政治指导员路光军带我们这部分人员在安新一带负责伤员的医治。

农历腊月三十日那天，我和夏敬先躺在堤上休息。午后两点左右，突然被轰鸣的汽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两汽车日本兵正从车上往下跳，村边满是敌人。一部分呈散兵队形迅速向堤坡运动，另些骑兵也向村子包抄。我见到这一切，迅速对夏说：“快跑！”夏说：“不能跑，跑就暴露了”。瞬间，一队骑兵向我们所往的方向赶来，并站在堤上张望，看样子敌人确实没有认出我俩来。因为我象十五六岁、小夏只象十三四岁的孩子。我俩背着筐假做搂柴，想以此蒙混敌人，相机逃跑。片刻间，敌人向我俩方向吹号，十几名伪军向我俩赶来，我看到情况不妙，迅速从大袄衣袋里掏出汇报和介绍信以及钢笔、日记本等埋入土中。当我们赶快背起筐就向别处走时，已被敌人包围了。六七个伪军对我俩拳打脚踢、用枪托、枪柄在我身处乱砸乱打，不停的问：是不是八路？我回答说：不是八路，是这村的人。这些“皇协军”们，仍穷凶极恶地边打边问。因我说不出村里的亲属姓名，也说不出具体住哪条街，伪军就喊我：“小政治”。此时，我感觉敌人已认定我是八路军了，因为这些伪军大都是本地人，听出我口音明显的不像本地人。从衣着看，都是被服厂制的，从单衣、大袄的打扮也与本地不同。就这样我被捕了。被捕后，敌人把我带到距该村四里多的酒庄据点。

傍晚，我们被转到牢房。我们按事先商定好了的统一口供，宁牺牲个人，也绝不能暴露秘密，然后又研究了如何抓紧逃跑，并且留下夜间值班了解敌情动态的人，大家入睡了。

在新城监狱

夜里，日军从新城调来军用卡车，由六七个鬼子把我们押往县城。天没亮时，我们到达日军驻地，都收寄在卫兵室。两个荷枪值勤的鬼子野蛮地用火炉筷子敲击我们的头，还用吸着的烟头烧我们的耳朵。

天亮后入狱，这是由两间厢房组成，用粗笨的栅栏隔成的牢房，都押满了人。窗户被砖堵死，牢里黑暗、潮湿，只有从门缝里射进来一缕光线。人们挤坐在潮湿的地上。牢狱意味着审问和处死。我们乘值勤伪警不在和同牢人不注意时断断续续地补充假口供和研究如何掏墙跑出去。在两三天里，从同牢人言谈中知道，只要是八路军人员被抓到这里，只有进来，没有出去的。并从伪警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前些天还枪毙过三四个八路军。这使我们从思想上做了最坏的准备。对于死大家都抱定一个信念：做为革命者，为党壮烈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是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光荣时刻！

第四天，敌人开始了审讯，不断对被俘人员进行严刑拷打。敌人在“宁错抓一百，也不错放一个”的口号下，对错抓的无辜平民，既已抓来了，就要给戴上一顶政治帽子。不论承认不承认，都在表上填上共产党、或是“通八路军”，然后送集中营。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军屠杀无辜的罪恶用心！

次日，轮到我们几人，第一个审完后仍放回原牢房，使我们能知道敌人问了些什么，商量如何应付。结果都顺利地“通过”了。这天下午“放风”时，伪警给我们训了话，要我们作准备明晨要去石门劳工教习所。

初进集中营

次日晨，由几名伪警将我们 40 多人押上了去石家庄的火车。我静坐窗前，举目皆是那连绵不断的土岭和深深的封锁沟，沟与路口的联结处耸立着大小奇特的灰砖或红砖的岗楼，三里一个，五里一个，像星斗密布。

到石家庄站时，月台上混乱的人群拥挤不堪，他们是先于我们到站的，正在整队出站。这么多平民百姓也是被抓往集中营的。月台上混杂的人群，渐渐变成四路纵队，经过大石桥，走过大石头街，一直伸向两里之外的“南兵营”。路两侧都是煤炭、垃圾和空旷的荒地。没有厂房、没有店铺、没有人家，一片荒凉。远远看见那高高的土围墙，那装有斜式、立式相结合的铁丝网，之上，还有那四层的电网。我跟着缓缓行进的纵队，终于走近了它。围墙外有又深又宽的环绕土墙的封锁沟，墙里还有环行公路。四角高架着木制岗楼，可清楚地看见日本鬼子持枪的身影。进入“劳工教习所”的大门，由 4 名鬼子把守。突然听见有人喊：“边走边脱衣服！拿着衣服往前走！”随后，人们边走边把衣服抛进衣服堆上，被赶进一个“消毒间”。浓浓的来苏味扑面而来，这里一个人先把你推进水池，另一个人手拿木棒敲打你的头，把你按进水里，进行所谓的全身消毒。接着每个人围着广场跑一圈，来到事先准备好的衣堆上去拿穿的衣裳。这些衣服是何等的污秽而褴褛，又是那样的杂乱和破旧，不成捆，不成套，没有经过蒸气消毒或药物消毒，现在又让人们穿上，这与刚才的“全身消毒浴”形成多么尖锐的讽刺！

拿衣服时不能停留，不容选择，常常是个子高的人拿了件小衣服，裸露着前臂小腿，通常拿到的根本不是一身，还有人拿到女人带大襟的棉袄，也有人拿到手上的只是件夹衣服，只好找根草绳连上衣和棉裤扎在一起，靠它御寒过冬，这就是入营的一切！我和陈交通穿上这不合体又发臭的衣服，刚坐在地上，有人把我俩带进走廊，分别指着审问科和处理科的门说：“今后你俩管这两屋的扫地、打饭”，又带到一个门口说：“就住这里。”这是一间不足七八平方米的木制房间，屋内有一木板通铺，铺上只有些草秆和画报纸片，这里已往有和我们年纪相仿，负责扫地的人。然后，又让我们去登记填表。最后，每人发一长四寸、宽三寸的白布条，上面已填写好数码，戴在左胸前。晚上，我做完扫地、封炉火的事去找陈交通员联系，他们四人和我们住在同一排木房里。这些房子根本不像是永久性的建筑，倒像是夏季临时性的兵营。房的外层从地基到房顶，是用长约三米、厚一寸，宽半尺许的木板钉在一起的“百叶窗”，房内壁也是板子钉成的。房内是相对的两排大通铺，大部分铺上是光板而不见草蓆。窗玻璃已不少破碎，窗钩已经失落，凛烈的西北风加着雪花吹进来，在入睡或生病的劳工身上冻结成硬硬的冰层。大家只好围坐在一起，渡过这日夜熬煎、饥寒交迫的集中营生活。因为在酒庄、新城据点都想逃跑，没有成功。所以当我们到石门后不久，就曾几次研究如何掌握这里的敌情，抓紧跑。

地狱里的煎熬

这里经常性的反动奴化教育由教育科组织，每日早晚点名，全集中营人员都参加，常有翻译巡视。有人带领呼反动口号，据说站在中间和后面的人都不喊，也有很多人巧妙地改喊成革命口号，用以表达他们人心不变和对党

的忠诚。

这里的一日生活是，早点名后约7点半开饭，饭后则外出做苦役。近处则拿着铁锹步行，远处多是乘汽车，去干筑路、修堡等沉重的体力劳动。直到下午5时方能回营吃晚饭，中间至少10个小时的持续重劳动。吃的上顿下顿都是已发霉的小米，没有任何绿叶菜，全是熬胡萝卜，有时很远就能嗅到恶臭的海鱼干味，这就是吃的一切！一个上百人的普通班，只打给少半筐干饭，半脸盆胡萝卜，半桶开水。筐箩一放，饭立即被一抢而光。没有抢到饭的，只好挨饿到下一顿，而那些体弱生病的“劳工”则更难抢到饭，也更难于支撑那已疲惫和饥饿的身躯。但只要能动就要外出服苦役，稍有怠慢，必遭毒打，直至命归黄泉！吃饭没有碗筷，每人都是找个罐头盒当饭碗。这样，日复一日，久而久之，很多人患了营养性浮肿病，在劳役中低糖性昏迷更屡见不鲜。加之久食霉小米、臭鱼干，和又无水洗手洗脸，洗饭桶的清洁设施，腹泻等流行病频频蔓延。人们被折磨成披头长发、胡须满面、眼睛发炎、四肢浮肿、行动艰难的活鬼。一些人就这样在夜间的严寒中再没有爬起来，再没有醒来！他们在万分困倦和难忍的饥饿中离开了人间！他们在受毒打的痛楚和饥寒交迫的折磨中离开了人间！他们在饱尝过日军精神摧残染病之后离开了人间！我看到早晨大家都去吃早饭时，又有哪么多人已冻结在床板上。细看他们眼角的泪水已结成了晶莹的冰块，有的依然张着嘴，象是对饥饿的呐喊！有的睁大眼睛，象发誓要看到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们的死，是对日本法西斯的控诉！他们的死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裁判！他们的死，是日军在华罪恶的有力铁证，他们的死是声讨万恶不赦的战犯的宣言！

每当我清理完屋子去倒垃圾时，就看见来拉尸体的那辆胶轮马车，有时甚至两辆，趁劳工们都上工走后的时机，到尸体房拉那些已被脱光衣服、已经骨瘦如柴、已是血迹斑斑的同胞的尸体。垛的老高的、横七竖八的几十具赤裸的尸体就是通过广场的那面太阳旗下，被永远的抛离人间！他们中有不少是无辜的百姓，却被日寇抓来，并迅速地折磨得离开了人间。

正月的一天上午，科里的人都走空了。又是总班长来到各屋检查，见我一人屋，就命令说：“去看展览！”当我走进这些反动宣传室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以“赫赫战果”用来鼓舞士气的。我以一个1938年入伍，与日军多次交战的普通一兵的身份作证：开战时那些以立姿、跪姿、卧姿均能高命中率成年日军士兵已大大减少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已经血洒异国、殉道他乡了。现在，在张张图片上看到的大都是些娃娃兵的面孔。

正像在一首歌中唱道的那样：

江水如海红又红，星光儿闪闪月牙儿明。

夜风吹来森森冷，水面上有鬼魂哭声痛。

他说道：家住东洋三岛上，爹娘二老都在高堂。

展览中，一本《名将之花殒落太行山中》的小册子闪现眼前。这不就是在我晋察冀一分区黄土岭被击毙的阿部中将嘛！那是涞源日军集中机、炮、骑500人马闯入我埋伏圈，被一举歼灭；为此敌人特调遣1500人，由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中将这个所谓山地作战的专家督战，在两天后，又进入我伏击圈，结果这位“名将”也遭到他前任旅团长常岗被击毙于战地的下场！是的，一切发动和参与侵略战争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集中营劳工是不准许在院子里停留的，更不允许相互交谈。但在人们利用各种场合、方式谈论逃跑的话题是禁止不了的。集合点名、开饭上下工、“上课”前后和夜晚，人们都在交谈，特别是听说谁是第二次甚或第三次被抓回来的，更是人们询问的对象。这些人从煤矿上跑出来的经历，使不少劳工学到了经验，增强了信心，产生了办法，学会了过封锁区的本领，接受了再被捕的教训。据他们介绍，煤矿管得不严，容易逃跑。不过从东北跑回冀中，路途遥远，经过封锁线多，再被抓的可能性也大。

正月初几了，劳工里传说，过几天要送一批劳工去东北阜新煤矿，按符号数字该我们走了。大家商量，一起走的好处是，都是原部队的，有事好商量。不利的是：过封锁线多，万一遇上敌人，大家既要应付紧急情况，又要照顾我们，恐怕到时候难以周全。正在这时，我们被告知有一批人要去井陘煤矿。终于轮到我們走了。

到井陘煤矿

离开集中营的早晨，和每一批劳工被送走时一样，200名劳工挤满两个大闷罐车厢。

列车到达了井陘矿站，我们被带到南大沟。这是一处离南门不远的政治犯人监狱。从墙上高架的电网和墙外绕有封锁沟和日伪联合警戒就立即明白，又是一个戒备森严的集中营。去的路上，走过无数黑水泥潭，那枯草、树丛、荒野、壕冢，满目疮痍。南大沟一个临时工棚，六七排红砖矮房，被杂乱的树丛包围着，四五排已住满了劳工，其它两三排仅是半敞的棚子，是为劳工起伙做饭用的。在这里要自己领锅、刀、碗、筷、粮、油等，自己做饭。200人同住在一同大通铺上。带队的张炳臣就睡在我身边。

这里不编班排、不站队形，三五成群的到了井架。工头负责把新来的和老劳工安排在第五层。当我们挤进电梯，开始令人头晕的下降，只见通过一层又一层坑道的灯光。电梯停下后，走进漆黑的坑道，只有头上的瓦斯灯闪着暗淡的微光，满地流着黑水，四壁是用圆木框架支撑，头顶上架有通风管道，脚下是推煤车的铁轨，人群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坑道岔，才到达作业面。人们几乎都脱光衣服作业，不一会儿，人们除了可见湿漉漉的眼睛外全变成黑人。这样高浓的煤灰粉尘，可以使一个青年人三五年内出现严重的煤肺病，当他还未到壮年时就早已丧失劳动力；像这样缺乏任何保护措施的作业，没有沐浴、不给分文，无任何补助，没有休息日，更无保健措施，发生创伤、疾病也无人诊疗服务；早上5时半上工，下午5时半离井，持续十多小时的超时、超重劳动，回去还要自己起火做饭，每天只发给发霉的小米，根本不见蔬菜，普遍地营养缺乏病在劳工中蔓延；长年见不到阳光，使人体生理机能都在退化、老化。肉体上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使许多劳工倒在煤坑里，再也没有起来。日寇“挖煤就是一切！”根本不顾劳工的死活，劳工的骨髓榨干了，丢进“万人坑”中，那里是乌鸦盖地、野狗成群、恶臭弥漫、白骨鳞鳞。南沟矿曾多次发生塌顶、冒水和瓦斯爆炸，不少人被困在井下，矿当局未采取任何抢救措施。

逃出虎口

有一天，张炳臣从岗位上回来对我俩说，在值勤时结识了矿警单珍，他总问及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情况，张原来是冀中某分区一个机炮连的副指导员，当然他会作出合适而恰当解释。次日，单又提及这个话题，还对张说：“新到一个地方，有何难处尽可以说。张没有说个人的事，只提及我和小陈

年纪很小，总下井非死在矿上不可。单立即答应说：“可以想法让他俩出去。”

第四天，张炳臣回来要我俩到井下分别弄一矿工证，我们利用下工前休息后的作业时间搞到了普通劳工的矿工证。当晚，张详细告诉了我俩出城的安排。次日凌晨，我俩照常随上工的人群带着包袱混出门，并在提前安排的坟地里换好老百姓衣服，随着下井工人站队出了矿工证出城，找到矿警单珍住处，张、单二人检查完下井工人后，由单送我三人通过了外壕哨卡，我们爬上山梁前与单珍挥手告别。

我们三人避开道路，绕过村庄，拉开距离在山间中快步穿行。从山岗远望，有田地不见人耕种，有道路不见车辆行驶，有村落不见炊烟缭绕。直到天黑下来，三人才敢距紧距离，摸索前进。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一个村落。但仍然看不到灯火，没有狗叫，细看可见处处是残垣断壁，院落破碎、满地瓦砾，枯草丛生。因我们已跑了一天又大半夜，有几分饥渴，但这里找不到一口水井，想找些萝卜吃，但只在一棵树下摸到三五个黑枣。我们猛然醒悟，这是敌人制造的‘无人区’。敌人曾对盂县、平定、井陘等两百多村子进行清剿，裹挟村民到聚居点，杀牲口、毁庄稼、填水井、抓劳工、逼军妓等，制造了家家蒙难、户户送葬的惨案。

黎明前，我们正快步赶路，抬头望见那条长长的“边墙”，是它把“无人区”与解放区隔离开。这是用石块砌成的，绵延起伏在山岗上的墙，是条约两人多高，三四米厚，伴有两米深封锁壕，共达百余公里的一条石头墙。在制高点和要路口上矗立着一个个碉堡。企图封锁解放区的扩展。我们三人迅速翻过之后，当回首望去，已是红日磅礴欲出之时。

下山六里的村落，分区的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当知道我们仍愿意返回冀中时，立即开了介绍信经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到冀中政治部。在这，张分配去抗大二分校学习，我俩返回了正在北岳集训的十分区卫生处。

（原北京军区军医学校郝丰和）

赵菊老人谈战俘劳工集中营的惨景

在庆祝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搜集石家庄战俘劳工集中营资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我们来到了赵菊老人的家——石家庄市桥东区的一个居民小院。老人去年摔伤了一条腿,行走靠拐杖不太方便,但头脑却非常清楚。提起过去的事,他一连可以给你讲几个小时。在讲到当年日本侵略者残害战俘劳工的暴行时,更是义愤填膺。下面是他谈话的记录。

从伙夫班到拉尸队

卢沟桥事变时,我家 4 口人,父亲、母亲、妻子和我。第二年我又有了儿子。我们虽然是农民,但没有土地,只有 3 间土坯房。因为生活贫困,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不管多脏多累的活,只要能挣钱,别人不干我都干。休门是个大镇,上面经常来人,来了人需要接待,安排客人的饭菜,准备牲口的草料,镇长都叫我去支差。旧社会经常有穷人饿死街头没人管,镇长就派我们几个家庭较穷的年轻人把尸体抬走埋掉。有时镇上给几个钱,有时不给钱。时间一长,我们成了镇公所的当差人,人们都叫我们“伙夫”,镇上只要有事,镇长就叫我们几个去干。

1937 年 10 月 10 日,日军占领了石家庄。休门镇也住进了日本人,镇公所又多了支应日本人的差事,第二年麦收前,日军突然在休门镇南圈起了几百亩庄稼地,先拉铁丝网,后用土打墙。不管谁家地,都不给赔偿。强圈硬占,不久便建起了南兵营和衣粮厂。

南兵营开始往日本兵,后来就变成集中营,专门关押战俘劳工。由于集中营条件恶劣,不少人进去后,就被折磨而死,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死了人需要拉出来埋掉,日军不准战俘劳工出营埋人。就把拉尸体埋葬的差事交给休门镇公所。于是我们伙夫班又成了集中营的拉尸队。埋一个尸体,镇上结我们 4 元钱,即日伪联合银行币。开始,这 4 元钱可以买 10 斤小米,后来只能买两个馒头。尽管给点钱,也没人愿意常年干这埋死人的活,可是日本人惹不起。愿意干得干,不愿意干也得干;给钱得干,不给钱也得干。

我是日军实行第五次(大约是 1942 年)强化治安时,被镇公所派去拉尸体的,一干就是两年多,后来还是因为生病,才辞掉这个差事的。当年我们村被派去拉尸体的共有 13 人,领头的是赵秋来、赵福群、刘东来。什么时候去拉?去哪拉?往哪埋?都听他们 3 人安排,我和其他人都是干活的,记得还有彭贵子、张丑子、赵妮子、赵臭妮、杜臭妮、赵润、吴存子……

南兵营周围是用土打的墙,约两米高,墙上有个砖帽,以防雨水冲刷,砖帽上立有木柱,柱上拉着几道电网。围墙四角有岗楼,白天黑夜都有日本士兵站岗。围墙内三五米处有一道深沟,深宽各约三四米,直上直下,沟内的土堆在沟外侧,沟外沿装有电网,沟内侧拉有铁蒺藜网,网内由战俘中挑选的人站岗。这同衣粮厂不一样。衣粮厂是围墙外有沟,不让外边人接近围墙。南兵营是里面有沟,不让里面人接近围墙。通往大门的路口设有铁蒺藜做的路挡。我们每次进出南兵营拉尸体,经过两个门口,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验证登记。

战俘劳工们住的房子是用木板钉的,墙是木板的,房顶是铁皮的。透过门窗可以看见屋内是木板做的大通铺。两面是铺,中间走人,没有看见被褥。

战俘们一进南兵营,先让脱光衣服,跳进冷水桶里洗澡,洗完澡在院子里列队跑步,身子跑干后白乎乎的一层,人们都说桶里是石灰水。然后每人发两件先来的战俘脱下的旧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冬天发棉衣只给一件,

发了棉衣不给棉裤，发了棉裤不给棉衣。不少人在数九寒天还穿着半截棉袄或单衣单裤。

战俘们吃的饭，不是霉小米，就是高粱米，没有碗筷，每人用一个罐头盒子当碗。开饭时，伙房把盛饭的木槽子抬到院里，战俘们拿罐头盒子挖一碗，用手抓着吃，象喂猪一样。因饭少人多吃不饱，经常可以看到战俘们在伙房附近的煤碴堆里寻找饭渣和菜根吃，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人不人，鬼不鬼。里面还有几十个女战俘，她们的处境可能更艰难，我们拉尸队的进去后不准分开，不准乱走，也不准同里面的战俘劳工讲话，一进战俘营，就感到阴森可怕。

棺材板与尸体垛

战俘营宿舍最南边一排是病栋，在病栋的西头，有两间坐西朝东的木房，这就是集中营的停尸房。每天死的人都抬到那，等着我们去拉。开始，一些尸体上还有衣服，后来死的人都是光屁股。据说集中营缺衣服，死者的衣服被缺衣的人扒去穿了。因为停尸房很少有人去，所以老鼠成灾。每次走进去，都可看到成群结队的老鼠，大的有一尺多长。一些尸体的鼻子耳朵都被老鼠啃掉了，这些老鼠不怕人，每次得把它们赶走才能拉尸体。

从南兵营往外运尸体，有时用人抬，有时用车拉。开始时，用棺材装，一人一个棺材。所谓棺材，实际是用薄木板钉的长木盒子，木板一寸厚，大小刚能盛下一个人。我到南兵营拉尸体时，还用这小棺材装人。后来战俘营里面死的人越来越多，棺材做不过来，又要花很多钱。日本人不让再埋棺材，而是把尸体倒出来埋了，把空棺材拉回来反复使用。这样过了一阵子，因死人太多，日本人就让用草蓆子卷，一张蓆子卷一个尸体，用绳子捆一下，装在车上拉走。再后来，蓆子也不够用，只好象码秫秸垛一样，把尸体码在大车上，用蓆子在上面一盖，用绳子简单捆一下拉出去。

每次去南兵营往外拉尸体，都是先由镇公所和南兵营电话联系，告诉当天有多少死人。死的人多，就多去人；死的人少，就少去人。每天都死几个，通常死二三十个，多的时候死七八十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去三个车，一辆人拉的排子车，两辆牲口拉的大马车。车不够或找不到车时，也用人抬。当时我年轻，身体比较壮，所以干抬尸体的活都有我。

一次，敌人从南兵营押了一批战俘到南栗村兵营干活，押去一大批，回来只剩下18个。一个个都瘦的皮包骨头，不知敌人用这些人做什么试验，胳膊都肿着，还有抽过血的黑斑痕迹。我们去拉尸，见他们18个人都躺在北大门两侧墙根的蓆子上，有的一张蓆子上躺3个，有的一张蓆子上躺两个。那天我们去了3人。没有找到车，只好用人抬。抬之前，用蓆子把尸体裹起来，有的一个蓆子裹3个人，有的一个蓆子裹两个人，我们前面一人，后面一人，我在中间抬双杠。从南兵营到万人坑要走三四里地，我们一连抬了四次，硬是都抬去埋了。人们都说：死沉、死沉，死人很沉。如果不是这些人骨瘦如柴，没有斤两，我们三人一次怎么也抬不走5个人的。

拉尸体一般都在下午5点以后，有时早晨也拉过。一年冬天，南兵营战俘劳工暴动越狱，被电网电死几个。敌人一大早就打来电话，让我们去拉尸，我们走到电网跟前，尸体已经僵硬，看到战俘劳工被电死的惨状，心里很不是滋味。

休门义地——万人坑

事变前，休门有两块义地。一块在村北（现长征街上）；一块在村南。

休门到元村的路上，是和尚寺的地，专门埋一些没家没亲，病死街头的人。日军来后，北面的地被占了，南边的地被圈进衣粮厂。日军又让休门镇负责掩埋南兵营死难战俘。休门镇便在南兵营东南方买了东岗头村一块地，即现在东风西路北侧石家庄地区运输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内。先买了4亩，两年后因已埋满，挨着义地北面又买了4亩。开始人们叫这里休门义地。因埋的人多，时间长了，义地塌的坑坑洼洼，人们又叫它万人坑。在休门义地里，有三间小北房，砖墙平顶，东间的墙上有一个个小窑窝，原是准备放骨灰盒的。西边两间可以住人，我们的工具放在里面。房子南面有两座烧煤的炼人炉，据说建成后，烧过两个死人，因为烧煤炉温低，尸体烧不化，后来就没再用。炼人炉两边有一口水井，原来是浇地的，后来供看坟人生活取水，我们干完活也在这里洗洗。

由于埋的人多，埋得又浅，经常有野狗从坑里拉尸体啃；加之我们的工具放在这里没人看，容易丢，需要找个人看坟地。于是大家想到在市里卖鸟的李小可。

李小可是束鹿人，事变前在市内以卖鸟为生，日本人来后兵慌马乱，谁还有心养鸟，他便靠拣粪为生。一天我们见到他问：“小可，拣粪怎么样？”他说：“不行，顾得了吃饭，交不起房钱。”我说：“你去看坟吧，也给我们看看家伙（埋人的工具），可以不让你交房钱。”小可说：“行。”就这样，小可夫妇带着领养的小女孩，搬进义地的房子里，一边看坟，一边拾粪，在坟地的边沿种几棵瓜，点几粒豆，贴补生活。

拉尸埋尸，最难的就是尸多地少无处可埋。埋一次尸挖一次坑太麻烦，后来我们就给李小可一点钱，让他帮我们挖坑。事前在义地挖出两米宽、两米深，长短不等的一个个大坑。把尸体拉来后平搬进去，每层放十几个，然后埋上一层土。下次拉来尸体，再摆上一层，然后再埋上一层土。一般都埋二、三层。

南兵营的尸体上大多有个布等，写着死者的姓名住址。对于家在附近县的死者，估计家里有可能来领尸体，我们就单独埋个地方，或者插个木牌，在记录簿上注明第几号坑第几层东边数第几个人为某某。然后找个认字的给他家写封信，说，你家某某已死，如果要尸体，请在几天内到休门镇寺东口茶馆找某某联系。有不少家属得到消息后，前来认尸，我们和李小可帮人家挖出来，用水洗净，装殓运走，人家也给我们买点烟酒，或给几个感谢钱，大伙分分，买几个烧饼吃。

325

我们拉尸队有个记录拉埋尸体的花名簿，原来是彭贵子记录，后来彭贵子不干了，他们说我上过几年私塾，能认几个字，就让我记录，我生病后又把这个花名簿交给刘东来。花名簿是毛头纸订的，四五寸宽，一尺多长，一本250页，两面写。每页用毛笔记着几十个死者的姓名、籍贯、某年某月埋。后来死的人太多，就只记人数。我经手记录的就有七八千人。整个拉尸队共记了几本帐我不知道。我们就凭着这个帐簿和南兵营每天的死亡通知单到镇上去领钱的。

十八个贩米人

南兵营关押的人有被俘的八路军、中央军（即国民党军），也有不少是抓来的老百姓。藁城邱头村有18个贩米人，经常从乡下运米到市里卖，来后时常住在休门赵二福家。赵二福不收他们房钱，有时也管几顿饭。贩米人运

来米卖不了，由二福代卖，二福可以使个利钱。因经常在镇上来往，我们都熟悉。后来石家庄住进一支日军的 1417 部队，经常在周围各县和市区抓人。一天，1417 部队特务队外出扫荡，把这 18 个贩米人抓了，米被没收，人被关进南兵营。就在他们关进去不久，日军把赵县的“皇协军”（即伪军）也关了进去。

敌人怀疑赵县“皇协军”对日军不忠，假称到石家庄换装，把他们带进了南兵营。等他们进南兵营看到战俘劳工的悲惨遭遇，才知道上当了。他们不甘心被送到日本当劳工，进去没几天就搞暴动越狱，藁城那 18 个贩米人也参加了暴动，结果 17 个被打死，只跑出一个杨老席。据杨老席讲，暴动这天夜里，他的同伴高宝群摸到门口，猛一下把门口站岗的日军连人带枪抱住，让大伙赶快跑。后来他把敌人往门岗边一摔，扔到一边，但敌人没死。这时暴动的声音惊动了睡觉的敌人，敌人打开探照灯，用机枪扫射。高宝群出门顺着马路跑，被敌人的子弹打倒。这次暴动不少人被日军打死，第二天我们埋了 70 多人。埋人时，看到高宝群的上身还被绳子捆着，头上和胸部被敌人扎了好几刀。看来高宝群被打倒后，只是负伤还没有死，是敌人后来用刺刀把他杀害的。

把活人当死人拉出

一次，镇公所说南兵营今天死了 7 个。我和臭妮找到吴存子，三个人一块去南兵营拉尸。象往常一样，一进南兵营，里面的人先给我们 3 人身上喷洒了药水，然后才让我们到里面去，吴存子到病栋找管事的，我和臭妮去停尸房抬尸体。电话上说 7 个，可进屋一数 8 个，其中一个尸体脑袋肿的象柳罐一样，还流着又臭又脏的脓水。病栋的管事人远远地站在一边，一直看着我们，当时我还很纳闷，但也没有理睬。我同臭妮开始抬尸体，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我刚把手伸去抓住一个人的手腕，对方一下也抓住我的手腕，我头发根子象触了电一样竖起来，难道活见鬼了。我定睛一看，这个人没死，是个活人。过去听说有人把活人当死人救出来过，但我知道，这是危险事，让日本人发现了是要杀头的。现在碰上了怎么办？我们要是报告了，这个人肯定没命，都是中国人，何不救他一命。我伸出另一只手在他脑门上拍了一下，自言自语，也是暗示他的，说了一句小时候闹着玩的话：“你知道我知道，光着屁股睡过觉。”他听后，知道了我的意思，又装成死人不再动了。在那头抬脚的臭妮着急了，说我：“你念叨什么哩，还不快抬。”幸好这天我们去的 3 个人口有 4 只眼，臭妮和存子俩都是一只眼有毛病，看东西不太清楚，所以这尸体堆里有活人，他俩都不知道。通知单上有 7 人，只能拉 7 人，拉 8 个人出不了门，于是我们拉了 7 个，用席子盖上捆住，故意把那个脑袋肿大流着臭水的“尸体”露在外面。

到大门口，见到站岗的日本兵，我主动走上去，“太君，眯路眯路的（看看）。”日本兵一见车上那散发着臭味的尸体，急忙用一只手捂鼻子，嘴里说到：“快地，开路开路的！”没有查验就让我们出去了。

走出南兵营一里多地，赵秋来了，我想告诉他车上有个活的。他急忙止住我不让我说。到了没人处，他责备我：“满街都是人，你瞎说什么。”我给他讲了装车的经过，他点了点头，说：“到义地再说。”

到了义地，天就黑了，我们把尸体往李小可挖好的坑里一倒，那个人呼地坐起来。赵秋来急忙让他躺下别动。这时我才把情况告诉臭妮和存子。当时那个人身上一丝不挂，周围又没有藏身的庄稼，只有义地边上的几棵干扫

帚棵还没有拔掉，我们把那个还活着的人藏在扫帚棵里，等天黑的看不见人了再想办法。

接着，我们继续往尸体上扔土，掩埋完毕，我坐下来抽烟，琢磨怎么办？藏在扫帚棵里的那个人又跑过来问我要烟抽，说几个月没闻到烟味了。我把点着的烟递给他，他烟瘾还挺大，几口就抽完了。我问他叫什么？哪里人？他告诉我叫田四群，正定府人，休门村赵合媳妇是他妹妹。这时我才想起赵秋来前些日子给我一个条子上写的名子叫田四群，说有个亲属让打听这个人的下落。

田四群没穿衣服怎么进市，我们领他到李小可的房前，小可正做晚饭，已烧了一锅开水，我跟小可说，你另烧一锅吧，先把这锅水给他洗一洗身子。可找来盆子让他擦洗了一遍，又从屋里找了两件衣裳给他穿上，田四群这才象个人样。

等天黑的对面看不清了，我和赵秋来一前一后带着他回到休门，把他送到他妹夫赵合家，他在赵合家住了几天，派人从王定家中拿来良民证，才把他送回去。

屠刀下的 26 个冤魂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南兵营发生暴动不久，天上飘着雪花，外边特别冷，下午五点，南兵营来电话说死了六七十人，我们拉尸队的人全体出动，赶着马车，拉着排子车进了南兵营。刚走进大门，日军就把我们挡往，不让往二门里面进，朱翻译说：“站着别动，等一会儿再进。”我们不知发生什么事，停下来往西边一看，原来日本人正在杀人。

在南兵营西北角，日军宿舍北边，西围墙东边，日军不知什么时候让人挖了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大坑，坑边的土高出地面一米多。大坑四周的土台上，跪着 20 多个从背后反捆着手的战俘，听说都是前些日子暴动的参加者，日本人把他们关在地牢里好多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一个个饿的连抬头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让他们跑他们也跑不了。周围站着一圈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一个高个日本胖军官，大约 30 多岁，穿一身白军装，打着红皮裹腿，手里提着把东洋刀，沿着俘虏背后转，走到一个战俘身后，把东洋刀举起来，向右一抡，向左一劈，那个战俘的脑袋就被砍下来滚进沟里，接着身子往前一倾也栽进沟里。就这样，这个日本军官一刀砍一个，约半小时，围着沟转了一圈，接连杀了 20 多人。看到这个场面，我们都惊呆了，这么多中国同胞被敌人活活杀死真是令人气愤。

后来敌人没让我们拉这些尸体，找人就地埋进事先挖的坑里。我们看见 3 个人用铁铲端了三个人头走过来。这时朱翻译边走边骂地说：“日本人真狠，一下就杀咱们 26 个人。”当走到我们跟前说道：“今天你们都看见了，出去可不准乱说，当心你们的脑袋。”这才放我们进去拉尸体。等我们拉尸体出来到二门时，看见门口立了个一米多高的木桩，木桩上钉块木板，那三个人头用钉子钉在木板上。第二天，我们又去拉尸体时，看见人头下面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恐吓和警告战俘们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日本人杀人，那情景让人可怕恶心。几天后还神魂不安，不久便大病一场，从此我就再没去南兵营拉尸体。事情过去 50 年了，想起日本人的罪恶，真是可憎可恨，这段经历我一辈子也是不会忘的。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何天义党福民采访整理）

当日本劳工的苦难日子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也是我们这些中国“劳工”在异国土地上获得解放、自由的 50 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今天，我要把在日本当“劳工”的苦难经历告诉大家，告诉年轻一代。这是我的责任。

我叫杨万贵，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村人。1937 年“七七”事变后，我们雁北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我于 1938 年 10 月参加了一二 师独立六支队，那时才 14 岁。1942 年 10 月，独立六支队更名为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1944 年 10 月 10 日，我们支队特务连在平鲁县上井沟村后山上，与平鲁城出来“扫荡”的 300 多名日伪军发生了遭遇战，我们先后 3 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多人。可惜，后来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钟子清连长只好下令撤退，撤退时我班负责掩护，我和班长李明等六人因负伤被敌人抓住。被俘后，我们被押送到朔县日军红部（日军特务机关）坐了三个多月的牢。5 月初，朔县日军红部又把我们送到大同劳工所当劳工，那里已有 60 多名劳工，其中有八路军战士，也有国民党部队的士兵。我在大同劳工所当了三个月劳工，不是在火车站装煤，就是在铁路上抬石头扛枕木，每天起早摸黑，干着又重又脏又苦的活，可连饭也吃不饱，每人每天只给吃六七两高粱面窝窝头，饿了只好用野菜、树叶充饥。大同日军红部的便衣特务经常到劳工所进行策反，妄图收买我们给其当帮凶，想派我们到各抗日根据地破坏活动。我们一起被俘的 6 个人，除 1 人外，我们 5 个人都拒绝给日寇当特务。8 月初，我们被押送到北京西郊的战俘院。

我们被押到战俘院时，那里已关押了 1000 多名战俘。他们个个身带伤痕，面黄肌瘦，有的连路也不能走。在战俘院住了 10 多天，便进行编队。我们这个大队编了 200 人，大队长叫李进波，是山东人，原在傅作义部队任少校营长，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俘虏。编队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这个大队的战俘们被押上火车，运送到天津塘沽码头，关押在一座楼房里，敌人看管得很严，看管人员都佩带着“警备员”的袖章。他们手持木棍，看谁稍不顺眼就是一顿毒打。晚上睡觉时，警备员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一旦听见我们说梦话，看到我们翻身，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一棒。大小便还得报告，先挨上两棒才允许你去。在塘沽待了 7 天，真是度日如年。

9 月上旬一天下午大约 5 点钟，我们 200 余人被押上一条运煤的货船。上船时，沿公路两旁每五六步就站着一个日本兵。那些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手里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嘴里还不断怪声怪调地叫喊着。上船后，我们被关进一个临时改用的船仓，里面什么设备也没有，大家坐在卞板上。气笛一声巨响，船开动了，全船 200 多名难友都伤心地哭了，泪水从每个人的脸上滚滚而下。汉子的哭声把巨大的马达声也淹没了。夜幕降临，船里越来越黑，在微弱的电灯光下，大家面面相觑：“这一下还不知道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何日才能同亲人相见”。我们坐的是临时改装的货船，日本人在船边用木板搭了个“吊桥式”厕所，大便时抓不紧栏杆就会掉进大海里去。在这次长途海运途中，我们有 10 多个难友就是从“吊桥式”厕所掉入茫茫大海而丧生的。

货船在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来到了日本南面的一个小港口，据说这个地方叫门市。下船后又上了另一条船，3 个多小时后，便到了日本国的八幡钢铁株式会社。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奴隶般的劳工生活。

我们到了八幡，住在靠近山坡的一幢三层楼房的第三层上，屋里没有床

铺，每间房里 20 多个难友，每人睡在不足一平方米的水泥地上。那里的气候很热，屋子里人又多，热得受不了。第二天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兰色的印有“战俘”二字的衣服，强迫我们当八幡钢铁厂的搬运工。工作地离我们住所约有 10 华里，每天天不亮就吃饭，早饭是二两重的馒头两个或一个玉米面做的大饼，有一碗白菜萝卜汤。吃完饭，监工便带着我们去干活。在这里当劳工的战俘很多，有美国的、苏联的、印度的……中午不许回住所，只让在工地上休息一小时，午饭和早饭一样，天黑才收工回住所。晚饭是二两米的稀饭。每天劳动 18 个小时，两头不见日，干的活是从船上卸煤、矿石、废钢铁等，累得浑身筋骨疼痛。当装卸工是重的体力活，劳动时间长，又吃不饱饭，加上不服水土，我们的体质一天天下降。有的难友坐在地下就站不起来，有的难友走起路来东倒西跌，但还得照样干活，稍一休息，被监工发现了，轻者踢你一脚，重者便是一顿毒打。在那里干活，除非你病得起不来，才准休息。你若违反了“规定”，除了挨打还得受罚，如跪地、站晒太阳等。站晒太阳是最难受的，许多难友都被晒得昏倒了，有的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我被罚过一次站晒太阳，差点昏死过去。小时曾听人说过地主对长工敲骨吸髓的榨取，日本鬼子对劳工的残酷超过封建大地主何止十倍、百倍！

干了不几天，不少难友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得很厉害。起初这件事没有引起日方看管人员的注意，认为是装病，不给治疗。没几天，全队 190 多人都得了这病，十来天死了 40 多人。我们一起去日本的 5 名战友中，有 2 人因痢疾死在日本，他们是原雁北支队特务连 7 班长李明，连部通讯员赵付才。赵付才死得最惨，这个小同志到日本第 5 天得了痢疾，一天拉肚子 20 多次，再加上想家，时常啼哭，双眼也看不见了，我们因被迫整天干活，无法照顾他。他每天躺在水泥地上，动也不能动，浑身上下到处是屎尿，就这样痛苦地死于异国他乡。现在，我一提起这些被日本折磨死的难友，眼里不由地掉泪，一股仇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怒火不由地从心中升起。

八幡是个多雨的地方，我们到达的时候正赶上了雨季，几乎天天下雨。可下雨不停工，照样干活。日方还每人发了一件“蓑衣”。不穿它淋得不行，穿上它又热得不行。潮湿的暑气蒸得你胸闷头昏。到了冬季，气温降到零度左右，我们这些劳工仍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监工和工厂里的工人都穿上了棉衣或呢子服装，里面还套有毛衣、绒衣，可我们劳工还是穿着来时发给的那套已经破烂不堪的兰制服和衬衣，即使把那两套单衣都穿上，还是冷得不行。再冷也得干活，怎么办？我们想了个办法，用棉毯当棉衣，每天早晨 4 点起床，起了床先穿好衬衣，然后两个一对互相把棉毯绑在衬衣上，再把兰制服套在棉毯上，我们就是靠那块棉毯抗御严寒度过了冬天。

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当劳工，每天除了挨打受饿，没有一点自由，过着度日如年的国破家亡当亡国奴的悲惨生活。

1945 年 3 月，我们又被转移到日本富士县富士港当码头搬运工。富士港是日本的一个大港。我们来之前，就有 400 多名中国的战俘在这里当劳工，加上我们 150 人，共有劳工 550 人。我们住在一个离码头不远的战俘管理所，这个管理所和监狱一样，高高的围墙安装着电网。我们每天的“任务”是到富士港码头卸货。主要货物是从中国抢劫去的煤、食盐、大豆等物资。当我们看到一船船来自祖国大同、开滦的煤，长芦的盐，东北的大豆时，心里充满愤怒和仇恨，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目的，就是侵占我国领土，统治我国人民，掠夺我国财富。有一次在卸大豆时，

大家不谋而合，每人装了半口袋大豆。晚上回到战俘管理所用喝水杯煮了起来，大家边吃边说：“我们又吃到祖国的食品了”。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可恨的监工知道了。第二天晚上回工时，他把大家集中起来进行大搜查，从一个陕西籍的八路军劳工的口袋里搜出一把大豆。监工就当着我们 500 多人的面，把那个战友毒打了一顿，直打得他浑身上下鲜血直流。此时此刻我们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喊：“不准虐待战俘，不准虐待战俘！”监工见我们一张张愤怒的脸，怕事闹大不好收拾才停止了毒打。从那以后，我们得出了条经验：只有团结一致进行斗争，才能制服狗强盗。我们斗争的方法还有一种，那就是消极怠工进行破坏，有时卸大米和食盐时，我们专门把 3 股绳弄得不一樣长，造成大米、食盐翻包掉入大海。

我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是多么渴望能见到祖国的亲人。一次，我们在富士港卸食盐时，突然发现一艘挂着中国国旗（后来才知道是汉奸汪精卫伪政府的）的船进了港，晚上我们回到战俘所里，大家议论着中国船进港的事，还有人提出能不能混入中国船内，让同胞们带回祖国去。第二天干活时，有一名河北籍的难友，在收工前上了那艘中国船，可刚上船就被汉奸押送到日本警察所，关押了 10 多天后，才送回战俘管理所。回来时，只见他浑身上下血迹斑斑，过了三四天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日本强盗杀害了。这是汉奸卖国贼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犯下的罪行。我们深深体会到国家不自强，人民便遭殃！在异国的土地上，我们举目无亲，人地两生，想跑也没有地方，只好忍气吞声地给日本资本家当牛做马，过亡国奴的生活。

岁月易流逝，可我们在日本的日子却多么难熬。在富士港受苦 6 个月，就好象过了几年一样。1945 年 8 月 14 日，我们在卸货时忽然发现日本士兵把船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来，当时大家觉得很奇怪。第二天收工回来，我们在战俘管理所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高兴得不能用言语表达，眼泪夺眶而出，连晚饭也顾不上吃，自动走到院里，唱呀，跳呀，整整庆贺了一个通宵。

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了，我们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战俘，也在异国的土地上获得了解放。

1945 年 10 月 8 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我们 2000 名中国劳工，从日本首批起程回国。回国的消息是日方在起程前十多天通知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欢呼雀跃起来。为很快能回到祖国，见到亲人而兴奋不已。同时，想起在异国土地上牺牲的难友，心情十分悲痛，我们在回国前，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会，悼念悲惨死去的难友。我还特意把班长李明的骨灰盒找到，带回祖国。船在大海里航行了几个昼夜，终于在 10 月 17 日回到祖国。船快要进天津港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在甲板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走下船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见了面，特别是见到久别的亲人，更是热泪盈眶，激动得互相说不出话来。我回天津后，住在天津小王庄附近的一个营房里，天津各界人民代表慰问了我们，并发给每人一套棉衣，50 块银元。此时国民党汤恩伯的军队已到天津。负责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说：“现在国家需要人，愿当兵的可留下当兵，不愿当兵的可以回家。”我们大部分难友都想回家和亲人团聚，我也不愿和国民党沾边。10 月底，我们办了手续，从天津站上车，坐火车到青龙桥。一过青龙桥就进入解放区，步行经宣化、张家口、阳高等地，途经各地都受到热情接待。11 月下旬（大约是 25 或 26 号），我和薛如、余得水、王贵华 4 人回到

左云城，在西街找到雁门军区政治部，受到了热情接待。政治部负责接待的同志妥善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并让我们先回家看一看亲人，随后再听从组织的召唤。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我又响应了党的伟大号召，于1946年11月再次参军，被分配到绥蒙军区独三旅九团(原警备六团)一营四连当战士。1947年4月7日，在一次战斗中，我右臂负伤致残，伤好后于1948年5月退伍回乡，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使我国人民蒙受了严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一定要牢记过去的苦难，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独立、繁荣、富强而奋斗，让我们的祖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受欺凌，不再受压迫！

(杨万贵口述李建国高星炎杨国荣整理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日寇魔爪下的北京劳工

我叫王世宗，北京大兴县西芦城村人。50多年前的1944年被抓到日本国北海道做劳工，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400多名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我是幸存下来的人，劫后余生，每当提起那段非人的生活，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1944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村北地里刨花生，保长派人把我叫到村公所，对我说：“世宗兄弟，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日本人在长辛店开了个大工厂，现在正招工，每天吃大米白面，还给一块五毛钱。咱们兄弟不错，我看你家里困难，才给你透个信。怎么样，你去不去？”我一想，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兵慌马乱，人心惶惶，日子难熬，有个事干，挣点钱养家也不错。就说：“好，我和家里商量商量再说。”保长说：“这次招工名额不多，你得快点儿给我回话儿，不然就没份了。”回来与家人商量了一下我就答应了。过了两天，保长通知我带着行李、干粮去集合，我索性还把要买三斗麦种的钱也带上了，就跟着保长到狼垡村集中去了。到了狼垡我一看，光我们辛庄乡就有十几个人，都是青壮年。一共几十人，到齐后，由庞各庄伪警察所的警察，把我们“带”到长辛店伪宛平县警察局。警察局门口有几个日本兵站岗，端着三八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进到院子里一看，周围高墙上拉着电网，到处都有的警备队持枪兽戒，如临大敌。我一看就知道上当了，可再想走，连门儿也没有了。行李和干粮被没收了，钱也被翻走了，我们几十个人被押进一间大屋子里，门一锁，象犯人似的被关了起来。

在这里关了我们两天两夜，又有很多人被陆续押到这里。互相询问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有的跟我一样，是以做工的名义骗来的，有的是以各种借口抓来的，但准也说不清把我们这些人弄来干什么？只是觉得关在这里准没好事。

第三天，在很多日本兵和伪警察、伪警备队的监押下，我们被带到长辛店火车站，上了闷罐子车，随后几名日伪军也上了车，在车门口把守。车门一关，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请，更辨不出东西南北。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火车停了，等下了车才知道是到塘沽了。

关押我们的地方离海边很近，那里只孤零零的立着十几栋木板房，房子周围拉着电网和铁丝网。木板房很大，每栋大概能容纳近千人，房子里没有隔断，是通着的，两排面对面的大通铺。我们这些人就住在这里。

被关在木板房里，不准我们出屋，相互之间不准说话。每栋房子里放着两口大缸，是解手用的，解手前要请示报告。吃的是用发霉的混合面做的一种又黑、又牙碜、又有霉味的饼子，用海水和面，腥臭难闻，还不如猪食。就是这样的饼子，每人每天才给3个，每个有2两重。晚上睡觉时，必须脱光，把衣服交给看管我们的日本兵保管，每人一条破毯子，连铺带盖。睡觉时，人得头脚花插着躺，躺下后，连身都无法翻。

看管我们的人，每人拿一根有茶碗口粗细，五尺长的三楞木棍，上涂黑漆，写着一个“劳”字。他们只要看谁不顺眼，也不管是脑袋还是屁股，上去就是一棍子，打死白打。发现有生病的，不给药吃也不给找医生看，抬出去就活埋。有个从山海关抓来的劳工，被抓前是小学教师，他不堪忍受这非人的折磨，就串连了一些人，想打死看管的人后逃跑，但因事不秘，被看管的人事先察觉了，就调来几百名伪军，把他们包围起来，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那个领头的小学教师被日本兵用棍子给活活打死了。

半个月后，我们被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上了运煤的货轮。货仓里装着煤，煤上铺着一层芦席，我们大伙吃喝拉撒睡都在上头。船到了海上，我们这些从来都没有下过水坐过船的“旱鸭子”有不少人晕船，呕吐不止，有的连苦胆汁都吐出来了。还有的人得了痢疾，又拉又吐，在船上又不准我们上厕所，大小便只能就地解决，弄得货仓里恶臭熏人。得了痢疾的病人，还没断气，就被日本兵扔进了大海。在海上走了十多天，我们就有十几个弟兄被丢进海里，葬身鱼腹了。

到了日本北海道后，开始了我们象奴隶一样的劳工生活。日本人先给我们编了号，我的号码是 265 号。在长盘坑煤矿，把我们编号后，就让我们下了煤窑。每天两班倒，一下去就是十几个钟头。我和东芦城村的赵九儒、北程庄的王振山 3 人分在一个组，每夫要挖四五十吨煤，全都是手工操作。弯着腰用镐刨煤，然后再跪着爬着，手脚并用的把煤拖出去，真是象牛马一样。吃的是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每天三个，每个有三两重，下窑时每人发给一个窝窝头带着作为中饭。有的人饿极了，忍不住把发的窝窝头先吃下了肚子，如果被工头发现了就得挨打，为了应付检查，我们就用胶泥（粘土）捏一个“窝头”带在身边，工头们检查时，攥在手里晃一晃就过去了，虽然躲过了工头的检查，但等到中午，粘土“窝头”不能吃，肚子又饿得咕咕叫，只好咬着牙坚持到下工。

北海道的天气很冷，从 10 月份开始下雪，到第二年 5 月才化完。我们每人一身衣服，冬天填上棉絮就当棉衣，天暖和后，抽掉棉絮就是夹袄夹裤，换来换去总是这一身破衣服，没有换洗，时间长了，每人都长了一身虱子。住的房子四面透风，没有床，每人睡在一个木盒子里，下面垫些棉花套子和稻草，简直成了跳蚤窝。当了亡国奴，不光日本人欺负我们，就是日本的老鼠也欺负我们。那里的老鼠个很大，有一尺多长，不怕人，遍地跑。我们睡着后，经常有人被咬伤。

长期不得温饱，卫生条件又极差，很多人生了冻疮、长了疥疮。一次，我的腿上长了疮，又没有药，烂得流脓滴水，疼得钻心。就是这样，每天还得下窑挖煤，少挖一点就挨打。如果病了不能上工，马上就会被送进隔离室。隔离室实际上就是等死室，是活人的停“尸”房。10 个人被送进去，就有 9 个人不能活着出来。有一回我得了感冒，发高烧，日本人说我得了传染病，把我送进了隔离室。和我一同进去的 64 号是个唐山人，得了鼠疫，浑身发紫，没几天就死在隔离室里边了。我病好后，日本监工没让我出来，把我留在隔离室侍候其他病人，这样，我又在里边呆了两个月。我看到，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在里边，有时一天就死好几个人。有一天，两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进了隔离室，不一会儿工夫，就把一个还活着的病人给解剖了，取出血淋淋的五脏，拿走了。

在北海道，我苦撑苦熬了近一年，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了，我们这些过着非人生活的中国劳工从此也获得了自由。这年 12 月，我终于活着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

据我所知，我们这一批劳工，光大兴，宛平两县就有 400 多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只活着回来 203 人，其余的人全在那里丧了命。狼垡村去了 6 个人，只回来了 2 个。就是有幸活下来的这些人，也有一半落下这样或那样的病症。

在日本侵略者的眼里，我们中国人的命，还不如一条狗值钱。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心中就充满了悲愤。小日本凭什么敢如此欺负我们？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国家落后吗！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好形势下，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人民的日子富裕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要更加一把劲，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强大，更兴盛，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永远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

（工世宗口述邢友廷、王观凤整理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四、违反国际公约的生物、化学战

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罪行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如今，历史的这一页虽然已翻过去 50 年了，然而，让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了解它、认识它、谴责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活动由来已久。它的这种罪恶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主要是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对细菌战的狂热鼓吹和在日本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各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以及防疫的研究。石井四郎对细菌武器的浓厚兴趣得到了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于是，他开始青云直上。1930 年，陆军省第一课课长永田铁山这个被称为“最能理解细菌战的人”、“支持石井意见最有力的人物”派遣石井四郎以驻外武官身份两次到欧洲作“特务放行”。在欧洲，石井四郎获得了法西斯德国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情报和一些最新资料，回国后极力鼓吹进行细菌战的必要性。为此，他“常在日本陆中省和参谋部高级官员中间发表言论，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他还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的必需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恶性膨胀，战争狂热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的主张也更得到了日本政府、军部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的大力支持。他们提出了进行细菌战活动的计划，并上奏天皇而且得到了批准。1932 年 8 月，日本军部根据天皇的敕令，晋升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担任“军阵防疫”教官的石井四郎为军医正（少佐），并为其配备了 5 名助手，组建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从此，他们便在“防疫”之名的掩护下，正式开始从事细菌战的罪恶活动，犯下累累罪行。1933 年，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批准，“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它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的培养、使用和防疫方法的研究，同时还研制装有这些细菌的地雷、榴弹、枪弹和水面使用的玻璃弹等爆炸装置。于是，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武器的研制中心。石井四郎则称其为日本“制造军火的楷模”。

1933 年 8 月，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加紧培养各种细菌，研制各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发展到了大规模实验的阶段。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石井四郎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递交了一份报告，说：“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日军大本营批准这个报告，并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日本之所以作出祸移中国东北的这个决定，其险恶用心，主要是在东北容易获取活人作为细菌战实验的材料和“北进”对苏作战的需要。因此，1933 年 8 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建立新的细菌战基地“石井部队”，其化名

被告梶塚继续受审经过，《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09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 年印行。

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同前引书，第 117 页。

“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 年 2 月 8 日。

为“加茂部队”，对外也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此同时，在距哈尔滨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还附设了一个细菌实验场。后来，背荫河实验场发生囚犯越狱事件。于是，石井四郎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了迁移和扩大石井部队的计划。这个计划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1936年，“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秘令在满洲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这两个极端秘密的部队，一是哈尔滨平房的“满洲第731部队”，即“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二是长春孟家屯的“满洲100部队”，即“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日军731部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细菌战基地。在120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区”内，有本部大楼、实验中心大楼（四方楼）、特设监狱和水源地、供水室、火力发电厂、铁路专用线、专用机场、物资仓库、锅炉房等附属设施以及宿舍、神社、广场、礼堂、运动场、花园、医院、学校等生活设施。它拥有庞大的研究、生产、实验机构和3000多名人员，年经费达1000万日元以上。其本部下设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疹疗部等8个部和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特设监狱的“特别班”。此外，731部队还分别设有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等4个支队和大连卫生研究所。它具有大量的先进设备和设施，其中，孵育器就达4500具，几天内就可生产3万万亿细菌及传染媒介物。所以，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能力上，731部队都远远超过了法西斯德国秘密设立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一次视察后说：“那里制造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与生产活动之巨大规模，竟使我极端惊异”。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特别是在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过程中，不仅仅设立了一个731部队，更不仅只是进行了细菌武器的试验，而是实施着一个全面的庞大的细菌战的战略部署和计划。在长春设立的100部队与731部队是一对孪生的恶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中，它们担负着不同的任务，731部队是研究、制造和使用杀害人类的细菌武器的。100部队则是研究制造和使用杀害牲畜的细菌武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意、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日本在不断扩大其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加紧进行细菌战活动，继在中国东北建立731部队和100部队之后，又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秘密建立了一批研究、制造、实验细菌武器并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和基地。其中，有北京大坛附近号称“北支甲1855部队”的北京细菌武器研究所、南京的宽松字第1644部队、广州的波字第8604部队；在侵华日军的各军团内，还设置了“防疫给水部”和“兽类防疫部”，它们是在各细菌战基地指导下进行细菌战的野战部队。这样，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战略网。在这个战略网中，除731部队、100部队之外，华北、华中、华东等地的细菌战基地和特种部队的细菌战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罪恶也是非常严重的。仅以“华北防疫给水总部”为例，它“经常培养的霍乱菌，能消灭全世界的人口。”它和731部队一样，不仅利用动物进行细菌战的实验，而且也惨无

“起诉书”，《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

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91页。

长田友吉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94页。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人道地使活人进行细菌战的实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揭露，这种实验除在其本部进行外，更经常的是在它的济南实验场进行。曾在济南这支部队里担任翻译官的崔亨振说：这支部队平均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对活人的细菌传染实验，每次要害死 100 多名被俘虏的中国军队官兵，他在这个部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就看见死亡的俘虏有 1000 多人。

在日本侵略军的细菌战战略网中，731 部队是研究、实验的基地和指挥中心。石井四郎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不仅有权指挥关东军的特种部队，而且还有权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设在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在此期间，由于 731 部队和其他细菌战部队在细菌的大量培植、细菌武器的制造、细菌战人员的训练、细菌战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及准备均大有进展并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石井四郎在给日军参谋本部的报告中说：“731 部队在创造有效的细菌进攻武器的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已经解决，该部队下一步的活动，则是完善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的过程和散布细菌的方法；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战的手段和方法，已达到可以用去实际达到战争目的程度。”于是，731 部队等先后在诺门罕、宁波、常德等地和浙赣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由实验活动发展到了实战阶段。

日本侵略军在准备细菌战的过程中，与利用动物、植物进行细菌战实验活动并大量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的同时，还进行着以活人为标本的细菌及细菌武器效能的实验。这种实验是极为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从 1931 年至 1945 年，日本侵略军通过这种实验杀害的中国军民数量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据日本细菌战犯川岛清供称：“第 731 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亡的囚犯，大约不下 600 人。”“从 1940 年到 1945 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 3000 人。”另据当时在平房基地负责印发机密文件的园尾估计，3000 人死于这种试验。

731 部队问题专家，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记者下里估计，受害者达 1 万人。上面的两个数字，仅仅是 731 部队这一个“杀人工厂”5 年间杀人数量的估计，而不是所有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杀害中国军民人数统计。显然，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细菌部队杀害中国军民的实际人数何止 3000 人、1 万人，而其准确数字比这种估计不知要多出多少倍！

用活人作为细菌战“实验材料”，早在 731 部队初创时期的背荫河实验场就开始了。他们把这些人称为“丸太”（即“马路大”，日语“原木”的意思）。石井四郎使用的第一批“实验材料”是 3 名中国抗日志士。石井四郎即从中苏边境的鼠疫传染疫区捕捉来 40 只疫鼠，并在其身上取下染有鼠疫的跳蚤 203 只，然后从这些跳蚤体内提取液汁注入到 3 名中国抗日志士体内。结果：第一个人，19 天后发烧达 39.4 度；第二个人，12 天后发烧达 40 度。最后，他们都在昏迷的状态中被解剖了。对此，石井四郎还亲自写过一份检验报告。

南朝鲜《中央日报》，1989 年 7 月 21 日。

转引自《日军 731 部队罪恶史》，第 244 页。

转引自“日本关东军第 731 部队”，《吉林文史资料》第 14 辑，第 68—69 页。

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1 页、第 121 页。

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1 页、第 121 页。

据原 731 部队队员证实，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方法五花八门、数以百计，手段更是惨不忍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各种细菌传染实验。其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法”和“菌液内服法”，即采取欺骗或强制手段，把掺有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的牛奶、瓜果，让被实验者吃掉；或将其注射到他们的体内。通过灌菌的观察发现，霍乱、肠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的效果最明显，死亡率较高。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大部分人 3—7 天即死亡；白喉菌也能产生致人于死地的效果；鼠疫菌通过胃肠传染的效果极差，仅有个别人死亡。疹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曾指导军医和技师把破伤风菌分为最低致命量的千倍、百倍、十倍接种给 10 个人，还把进入人体内产生毒素的芽胞再接种给另外两个人，结果，3 名破接种破伤风菌的人死亡。原 731 部队实验分队队长山下升供述：“在我担任细菌分队长的一年多时间，仅灌菌实验就使用了 100 多名抗日分子，他们多数死亡了，没死的又通过另外一种实验方法把他们都杀害了。”

第二，三种细菌传染方法的对比实验。1942 年，731 部队的三谷班用 45 个人作为鼠疫菌的注射、埋入和内服三种方法的对比实验对象。每种实验又分为 0.1 克、0.2 克、0.3 克鼠疫菌液 3 组，每组 5 人；埋入量、内服量、注射量相同。实验结果：注射传染法效果最明显，注射最低量（0.1 克）的被实验者 1 天以后即死亡；其次是埋入传染法；发病最慢的是内服法，被实验者经过 6 天才死亡。

第三，两种疫苗的对比实验。1942 年，731 部队细菌班成立了一个“A”号人体实验队，实验内容是对渡边和山内使用超声波制造的疫苗和中黑大尉和细井雇员使用日本陆军军区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进行对比实验。他们选定了 20 名无辜的中国人做活体实验，首先由小林嘱托和细井技师对被实验者进行预防接种，给其中的 8 个人注射用超声波制造的霍乱疫苗，对另外 8 个人注射了用陆军军医学校制造的霍乱疫苗，其他 4 人没有进行预防注射。20 天后进行人体感染实验，即把含有 2‰克霍乱菌（对人体致死量为 1‰克）的牛奶让 20 名被实验者喝下去，实验结果，接种超声波制造的疫苗的 8 个人中，除 1 人稍有腹痛、头痛之感于第二天复原外，其他人均无任何反应；而注射了军医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的 8 个人中，3 名重症、1 名死亡；没有进行预防接种的 4 个人第三天全部死亡。这次实验之后，731 部队又改用鼠疫菌进行了多次对比实验，结果相同。

第四，冻伤实验。为此，731 部队第一部专门设立了冻伤研究班。他们首先以动物为对象作冻伤实验，进而又残忍地以活人作实验材料。

第五，毒气实验。这是 731 部队以活人为材料的实验方式中最残酷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亲眼看到 731 部队队员每天将被关押的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注入不同浓度（1 度、2 度、3 度）、不同种类的毒气进行实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这种实验对象多是冻伤实验的幸存者。731 部队除利用活入进行毒气实验外，还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反抗实验的被关押的中国人、苏联人。

《朝日新闻》，1984 年 8 月 16 日。

中央档案馆档案：山下升供词。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词。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词。

第六，解剖观察。731 部队对人体的细菌传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和病理观察三个阶段。它的解剖观察，一般是作尸体解剖，但根据其需要，也进行活体解剖。活体解剖既有对病理的解剖，也有对健康人的解剖，以便对其进行对比观察。对人体的解剖，731 部队的刽子手们常常采取乱刀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这种解剖室里的种种罪恶行径活生生地暴露了日本细菌战犯们刽子手的凶残及其狰狞面目。原 731 部队队员田村良雄记述了他看到的尸体解剖的具体情景。他说：“有一天，我跟着宇野城技师进了特别班的解剖室，一张解剖台的排水口正在往下滴着鲜红的血，是刚刚作完解剖；另一张解剖台上，停放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一个等待死亡的被实验者。现在，就要对他进行死亡观察了。随着铃木‘开始’的命令，田村递过了解剖刀和止血钳。这时，被用脚镣、手铐固定在解剖台上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是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眼里充满了愤怒的泪水，极干渴的喉咙里象是要发出追究暴行的叫喊似的，然而，他已发不出声音，嘴仅是动动而已。与此同时，用左手转着中国人脖颈的细矢用右手的手术刀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咔嚓’一声就切了下去，血‘吱’地流了出来。遭受鼠疫病折磨和被宰割痛苦的中国人把头左右摆动着，颞部的绳索勒了进去，头部忽然下垂，昏迷过去了。细矢马上用手术刀切断了这个中国人的颈动脉。至此，中国人已经不能动了，嘴角微弱地痉挛，留下了一句充满仇恨的话：‘鬼子！’于是，他的脸色迅速变了，咽气了。接着，细矢倒拿着手术刀，从尸体的上腹部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到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然后，又拉开骨锯，锯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20 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分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他们看着这个被惨杀的尸体，象一群吃饱了的狼。过了一会，他们又回到解剖室连续‘作战’了。”

731 部队除进行上述实验外，还有将马血注入人的动脉血管的换血实验、将人塞进密封的真空实验室的环境实验、人体倒挂实验、人体各部位、器官移植实验、在女人身上的梅毒传染实验，等等。

731 部队为了检验它生产的各种细菌、病毒、毒药和细菌武器、毒气武器的实战效能，还不断以活人为靶子，进行野外实验。它把这种实验称为“实战演习”。为此，731 部队在平房附近的城子沟和安达、佳木斯、陶赖昭、肇东、呼伦贝尔、牡丹江等地设立了固定的或临时的实验场。其实，这些实验场是比实验室规模更大、更残酷的杀人场。

731 部队以活人为细菌战的实验材料，罪恶累累，证据确凿。1983 年秋，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博士研究生儿岛俊郎在东京神田旧书店中发现 731 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两份报告书，一是《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一是《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接种时的肌肉“时值”》。它对 731 部队以人体为对象的实验作了明确的记载。同年 8 月 15 日，日本的《每日新闻》首先对这两份报告书的有关情况作了报道。8 月 16 日，中国的《人民日报》也以“日本发现原关东军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报告书”为题发表了消息，1985 年，《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以及《日军 731 部队

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词。

〔日〕田村良雄：“细菌战——七三一部队的野蛮行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第 27 页。

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一书中均载录了这两份报告书及其介绍文章的中译文。两份报告书的发现和公开发表，对日本国内那些企图通过否定 731 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进而再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严正判决的极力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四）

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是实验和实战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的。1939 年 5 月，诺门罕战争刚刚开始之际，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视察了 731 部队后命令石井四郎尽快制订出配合作战的方案。石井四郎即接到参战命令后，派出 731 部队部分细菌战人员，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7 月 12 日，他们潜入哈拉哈河旁，在 1 公里的河段上撒了各种细菌溶液 22.5 公斤。此外，731 部队还加紧了细菌武器的生产，如细菌榴散弹的生产等，并送往诺门罕前线。731 部队使用细菌武器不仅使苏蒙军队受到伤害，而且日军也自食其果，除大批人员患伤寒、赤痢和霍乱等疫病外，还有 40 余人因细菌传染而死亡。

731 部队不仅祸及东北，而且还殃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广大地区。它多次派出远征队，与日军其他部队协同进行细菌战，杀害中国军民。1940 年 10 月 4 日，日机在浙江衢州县投撒了混有染上鼠疫菌的“人鼠共同蚤”麦粒、粟子等物，38 天后，该地区 22 名鼠疫患者部不治而亡。22 日，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日机又在宁波上空投撒了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和麦子、棉花等物，此后，该地发生鼠疫，99 人染患，仅有 2 人被治愈。同年 11 月 26 日、27 日，2 架日机两次侵入金华上空投撒鼠疫菌，造成鼠疫蔓延。被传染鼠疫病者，东阳县 94 人，死亡 92 人，义乌县 308 人，死亡 257 人，兰溪县 36 人，死亡 12 人。另外，日机还在上虞、汤溪等地也投撒了鼠疫菌。1941 年春，日军为了破坏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枢纽常德及其铁路交通沿线地区，731 部队又派出了第二批远征队，用飞机投撒染有鼠疫的跳蚤，引起该地发生鼠疫，400 多人死亡。1942 年，它的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 1644 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 130 公斤的炭疽热菌、副伤寒菌、鼠疫菌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发生鼠疫，中国军民大批死亡。对此，原日本 1644 部队的一名成员向东京审判时的国际检察局提供了《日军罪行证明书》，他说：“在敌军阵地后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沮丧其士气，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了颇为恶劣的后果。”

（五）

1945 年夏，日本帝国主义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于是，日军 731 部队开始准备逃离和销赃灭迹。为此，它杀人灭口，使用速效能毒气，将特别监狱里关押着的“实验材料”400 多中国人全部杀死，再浇上汽油焚烧。对其他不再需要的中国人用注射氰酸化合物的办法将其毒死，连同存放的细菌实验标本等，一起用汽车运至松花江边，扔入江中。尤为可恶的是，731 部队仓皇逃离之时，把他们生产的各种传染病菌投撒出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根治的遗害。事实证明，凡是有日军细菌部队侵驻的地方，在其逃离之后都曾发生过瘟疫。1946 年 6 月，哈尔滨平房地区的后二道沟屯、义发源屯、东

井子屯发生瘟疫，共死亡 110 人。经过医学专家进行的病体检查和病源调查认定，731 部队逃跑前有意放出大量鼠类和跳蚤。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鼠疫之后，鼠疫疫源固着下来，形成了哈尔滨疫区。自 1946 年至 1954 年，哈尔滨疫区发生 6 次鼠疫。另据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范说：“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撒放带菌的鼠蚤，1946 年至 1947 年的两年内，在哈尔滨、长春、通辽、乾安、扶余、热河各地区，猖獗的鼠疫同时并发。1947 年东北的鼠疫患者达 3 万人之多，仅通辽一地就死亡 12000 余人。热河、乾安、扶余等疫区各死亡 1000 余人。”在中国南方，731 等日军细菌战部队染指的衢州县也于 1946 年、1947 年几度遭受鼠疫的侵袭，死亡人数达 201 人。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会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充分认识它的侵略性、疯狂性、野蛮性和凶残性，永远记住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可耻和罪恶的一页，并以实际行动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培林）

《东北日报》，1950 年 2 月 9 日。

《东北日报》，1950 年 2 月 9 日。

附：野田实 太行山麓解剖中国活人的自白

1945年4月，我所在的原一一七师团野战医院，驻在河南省有名的煤矿区焦作镇。

一天，院长军医少佐丹保司平找我，说明天要搞“军医教育”，按照去年10月郑州十二军司令部举办的“教育”样子搞。还说宪兵分队答应并弄来活人做试验。

接受任务后，我便拟订行动计划交给院长，并着手准备。

第二天下午，宪兵带一个中国人到手术室来，这是一个约摸二十五六岁，看上去很健康，穿着黑衣服的淳朴的中国农民。这时我忽然想到，他就要在这里被杀掉。过一会儿，军医、卫生兵在先，塌鼻梁留着小胡子的院长随后都来了，院长问：“准备好了吗？”我向水谷示意做全身麻醉，又对宪兵说：“给他讲，要检查身体，躺在这手术台上。”那人看来不懂宪兵的话，满脸讶异的神色。宪兵把他推进手术台，我指着手术台，焦急地用中国话说：“睡觉吧，睡觉吧！”宪兵把那人举上去按倒在台上，我们六人分别按任他的手、脚、肩膀、头部和腰。水谷迅速将浸了麻药的纱布往口、鼻上盖。那人猛力挣扎，大家拼命按住，弄得手术台嘎啦晃动，我两手抱住他的头，他脸上露出可怕的怒火，咬紧牙齿屏住呼吸，左右摇头想甩掉盖在嘴上的纱布，为了让麻药快生效，我用两个拇指用力按他的两颊，使他的嘴张开，把纱布塞进去后，他呼吸立即短促了。我向发呆的水谷喊道：“加麻药！”他慌慌张张地拔开瓶塞往纱布上倒。挥发的麻药气味冲进我的鼻孔后，感到全身无力，我才意识到药量过大了，便让改用乙醚，叫卫生兵把那人两脚绑在手术台上。进入深度麻醉了，我让森下卫生军曹负责麻醉，让水谷洗子准备手术，卫生兵搬来手术器械。

卫生兵帮我把那人脚上的绳解开，脱掉身上的衣服。我见他后背有几条似乎经过严刑拷打的青紫色的伤痕，我无动于衷又把两脚捆上。

军医各就各位了。这时我眼前浮现出去年在郑州十二军直辖兵站医院，对一位抗日战士进行“解剖活人”的情景：我紧张地屏住呼吸，和二十几名“被教育者”军医一同站着，从北平第一陆军医院派来的教官，长盐军医中佐突然喊了声“立正！”他向领导这次“教育”的十二军军医部长川岛清军医大佐报告：“从现在开始，”之后又发出“敬礼！”号令。我想这是按照病理解剖死者时搞的仪式来对待眼前的活人。

新田和水谷用一块苫单盖住那人，我学长盐的样子喊“立正！”对院长报告：“从现在开始。”他傲慢地点点头，我又喊“敬礼！”此时我想的是，这个中国人是“皇军军阵医学尊敬的牺牲者。”

我有着军人的父亲，从生下以来便被灌输着天皇教和武士道精神，培育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坩埚里，因此，对这样的举动是得意的，这种行为渗入了我的骨髓。为表示所谓的敬意而搞的一套虚伪作法，和实际上干的为人道所不容许的凶恶勾当相对照，这恐怕是日本武士道的一个特征吧！

“教育”的过程是这样的：

最初将右下腹切开十厘米，搞形式的盲肠手术。摘出的阑尾细得象蚯蚓，完全是健康无异状的。

接着从剑突到脐下在腹部正中切开三十厘米，之后检查内脏，剥开大网

膜找胃，拉开肠子看到肝脏里边露出的蓝黑色胆囊。活人内脏的血腥气、粪便气味冲进我的鼻孔，对此我只感到愉快。它使我回忆起在河北省保定时宪兵队藤木大尉说过的：“活人的肝可以治百病，可总没有弄到手。”查完内脏，拉平腹膜缝合，我从苦单下边拉出那人的手查脉搏，脉稍弱，但无大变化。这回两人一组，分两组同时在活人身上做截肢——右臂、左大腿的手术。洗完手在右臂、左腿根部系上止血带，走走形式做了皮肤消毒。我在左股下三分之一处切开皮肤向上剥离，再把活人的大腿顺骨缝处切开。我让高岩尝试一下非外科医生体会不到的感触，叫他拿一把大切断刀，用持刀的胳膊压住大腿，一下子切断。还提醒他，止血是麻烦事，必须切开肌肉见骨头。高岩用力切掉周围软组织，鲜血象瀑布似的喷出来，伸展的肌肉痉挛收缩一会儿被切断了。高岩急忙拿止血钳止血，我说：“这血总是要流的，光不用管。”他赶快用两手分开肌肉，剥离大腿骨上的粘着的肌膜、骨膜，露出了雪白的大腿骨。我用厚厚的纱布把肌肉断口包住向上提起，让高岩用骨锯靠大腿上端锯断。锯子锯到半路夹住动不了，我让持脚的卫生兵把脚往下放放，高岩就势猛劲锯，顺利地锯断了大腿骨。我一面讲解，一面帮高岩结扎主要血管，我用长辈的口吻告诉他：“在处理神经时，必须从上头拉出顺理好，以免日后假肢会痛。但今天不必担这份心。”

左股骨切断结束后，我们喘了一口气，右上肢的截肢手术也结束了，我揭开单子看那人脸相，是昏昏沉沉陷入深度麻醉之中。两三个小时前的健康相貌完全没有了，脸色苍白，口唇发青，脉搏细微，瞳孔缩小，使人感觉他有着强韧的生命力。

最后一项做“喉结手术”，做完气管切开手术之后，全部“教育”按计划完成了。

院长交待迅速做好善后清理，便匆匆走开了。我换完衣服点上一支香烟去厕所，回到手术室再看，苦单已被拿走，从所未见的活生生被截断左腿和右臂、残不忍睹赤身裸体的人，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室一角放着截下来的大腿和胳膊，卫生兵在冲刷着木条地板。

我感兴趣的是要看看往这个男人的静脉里注射多少西西空气可以致死。让森下拿来五西西注射器，五西西空气推进去没有变化，我感到很意外，让再试试二十西西的。森下推进一点点，用大拇指拚命顶，还是不动。我说：“躲开，让我来！”看看针头没堵，我使用小肚子顶住胳膊肘子使尽全身力气推，推了约摸一半，那人左胸心脏部位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下腭轻轻动了一下。我拔出针观察，他大喘了两口气垂下头来，苍白的脸上一下子变成了死色，森下取来听诊器，听不到心音，听到的只是人在临终时心脏停止跳动后特有的“刷——”样响的杂音。

我对呆在一旁的森下说：“行动秘密些，弄到马厩后面挖好的坑里埋掉。”

天开始黑了，回到医官室见到水谷，我们一同回宿舍，走了一会才停下来。我问他，那男人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好象是八路军的密探。我心想确实是个农民。农民也好，密探也好，都与我无关。但从听诊器中听到的，那人在咽气时的杂音顽强地在我耳边回荡。如今过了11年，依然在我耳边回荡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是连绵不断的太行山，山麓连接着河南肥沃的土地，在那里，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在辛勤地劳动。然而，就在这块土地下面，埋葬着多少被我夺去了生命饮恨而死的人们；我想到这里只是悔恨，简直想撕开自己的胸膛。

本来是一般人所想不出的事，为了侵略战争，我从容地干了。

本来说，“医者仁术”，医学应该为人类社会服务，为了侵略战争，我有意识地将医学用于杀人，冒读了医学。

从我的切身体验中彻底否定了战争。中国人民使我重新觉悟到做人的良心和当医生的使命，并给我指出了生活的方向。对此，我是衷心感激不尽的。

为此，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誓为反侵略战争而战斗不息。

（俞静方摘自《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白》一书）

日军在浙江空中降横祸

1940年11月，宁波《时事公报》转载国民社方岩2日电：“本省鄞、衢各县，先后发生鼠疫，疫菌传系敌机投下，证之近来敌机屡次在金华散布白黄色粉粒，不为无因，敌人居心险恶，放毒事属可靠。昨记者往访省府当局，据告化验结果，断为毒素，且似鼠疫菌”。11月4日，宁波《时事公报》又登载《钜祸！全体市民一齐起来扑灭鼠疫》的文告，披露了宁波鼠疫流行的情况。这些报导，记载了战争狂人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用细菌残害无辜中国同胞的罪行。

浙江，地处东南前哨，一直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浙东，处于沪宁杭三角洲之南侧，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侵华日军盘踞上海的东南外围和南进太平洋的一个基地。侵华日军早已觊觎占领浙江。

日军自1937年11月5日在杭州湾的金山卫强行登陆后，12月24日占领杭州，不到两个月，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整个浙西杭嘉湖地区。

日军为达到“速战速决、独霸中国”和“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1941年4月发动了宁绍战役。关东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为配合作战，从1940年下半年起先后在浙江实施惨绝人寰的细菌战。

关东军731部队又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日军入侵东北后，于1933年8月在哈尔滨南郊建立的一支细菌武器部队，后成为日军在中国细菌武器的研制中心，属世界最大的细菌部队，分8个部门，有3000多人从事细菌研究和细菌生产。惯用活人体作鼠疫、伤寒和霍乱等实验，“每年几不下六百人死于七三一部队”。每月能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八至九百公斤，炭疽热细菌五百至七百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建立了细菌部队。“中支那防疫给水部”是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939年建立的一支细菌部队，通称“多摩部队”，匿名“荣”字第1644部队。下设12个支队，拥有1500余人，配备有各种细菌专家，有培养霍乱、伤寒、鼠疫和各种细菌。日军在1940年下半年对浙江的一次细菌战中，就投放烈性传染细菌伤寒与霍乱菌120公斤，鼠疫蚤5公斤。

日军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造成浙江传染病泛滥成灾，宁波首先遭受鼠疫惨祸。仅1940年10月29日至12月6日的34天内，宁波一地就发现染疫者99人，死亡97人。宁波元泰绍酒店一位罹难的幸存者钱贵法控诉说：“1940年10月22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北方向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扔下了许多小麦，面粉和栗子。”“当天恰下一场大雨，把屋瓦上的麦粟物冲到居民接水缸里，发现缸里有许多红小跳蚤浮在水面。到29日就在开明街等地发现鼠疫病人，次日即有人死亡。不几日我也染疫送进隔离医院，眼见同我一起住院的病人都相继死亡，只有我是死里逃生出来的，我们元泰绍酒店共死6人。”当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1941年《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1940年11月1日上午10时，鄞县卫生院长张方庆接鄞县东镇镇长毛稼生电话报告，在县城开明街、东后街一带发生疫病，死亡已10亲人。院长即于是日下午2时半亲赴疫区调查，并将患者5人中择其较轻2人送中心医院诊查，发现患者均具有显著的鼠疫临床证状。同时，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将患者淋巴腺穿刺液作检，并作动物试验及细菌培养，“即断定该开明街来之病人为腺鼠疫。”宁波《时事公报》在11月3日至7日登载了具政府发布的第291号《布告》和5篇有关东后街、开明街等地日机投

下蚕麦物后发生的疫症已“断定为鼠疫”的报道，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从这次宁波暴发疫病经过、症状、死亡率很高及动物接种验证的结果“断定系鼠疫无疑”。

省卫生处陈万里、王毓棒等赴宁波督查后向重庆国民政府作了报告，称鄞县城区开明街、东后街一带于10月30日发现鼠疫，经科学检验证实，确系敌机投掷疫菌所致。

在衢州古城，鼠疫流行严重。衢州位于浙赣铁路中段，为两浙门户，扼三省通道，是东南军事重镇。从1940年至1942年，日军多次投放细菌残害居民。据1940年12月省卫生处陈万里、刘经邦、柯主光致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电文中呈词：“衢县于10月4日上午六时半，敌机一架侵入市空，飞行极低极速。警报解除后，在柴家巷罗汉井一带发现大麦、荞麦、粟米及死蚕等颇多，当时目睹青均以为奇，有柴家巷阜成纸庄许静山者，拾集麦粟及死蚕等送该县防护团转省查验。”

11月18日下午，浙江公路局副工程师董介如在赴衢报告中称：“具城内罗汉井一带自十二日以来患急症死亡者七八人。”

11月21日，衢县警察局长致电县长：“本城居民传染鼠疫，死亡者……共计8人，并本日查到柴家巷5号内陈龙生、寅序巷一号内周氏亦已传染此种疾病”。这些患者多有头痛、畏寒、发热呕吐及鼠蹊腺肿等症状。此后衢县卫生院院长张秉权与县防疫队对小狮子巷16岁男性患者许立志作涂液涂片检验，发现了鼠疫杆菌。

30日，福建省卫生处防疫专员柯主光到衢县协助防治，经对患者蔡金初的临床诊断，淋巴腺肿穿刺液涂抹片镜检、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验证，“均见有鼠疫症状和杆菌”。当年曾赴衢县对疫病人作过动物接种镜检的盛伯梁也证实，“确手腺鼠疫与坏血性鼠疫，防疫人员也有两人死亡。”

衢县这次鼠疫，自11月12日至12月5日共24天，先后发现鼠疫患者21人，均死亡。其中男性11人，女性10人，20岁以下者有9人，最小者为8岁，最老者力70岁以上。曾任衢县及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邱明轩调查后指出：衢州之鼠疫在1941年大肆蔓延，仅2月至11月的10个月中衢城鼠疫发病者竟达281人，死亡274人。当时由于日机轰炸衢城，居民被迫疏散到农村，以致将鼠疫带到农村，鼠疫流行范围越来越大，到年底，波及13乡22村，死亡人数在1000人以上。

在金华，据国民政府浙江省卫生处陈万里等1940年12月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报告中称：27日，赴衢具视察鼠疫防治情形，途径金华，“见敌机一架散布白色物品，且有白雾一缕随之”。29日在衢县又接到方岩来电：“悉28日金华空袭时，又有敌机两架在南门外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有人收集并送民众医院检查，见有革兰氏染色法阴性杆菌。后即派在衢州做防疫工作的吴昌丰返金华，详密检查”，告谓“确系鼠疫杆菌”。次日，浙江省卫生处陈万里、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长刘经邦、福建省卫生处防疫专员柯主光、浙江省卫生处第二科科长郑介安等5人同时由衢州赶到金华，即在民众医院会同检查，于显微镜下共同鉴定，“其形态确系鼠疫杆菌”。12月5日，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致重庆蒋介石电，称“上月28日敌机在金华散布之白色颗粒，经严密检验，辨别系鼠疫杆菌”。12月6日，顾祝同致重庆蒋介石电，“查敌机近在浙省境内散播毒物，业经该省卫生处检查断为鼠疫杆菌。”在这次鼠疫中共有167人死亡。

日军 1940 年在浙江用细菌残杀和平居民的事实，在 1949 年 12 月前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讯日军战犯的供词中也得到证实。被告柄泽供认：“在 1940 年的下半年，我奉长官铃木少佐的命令，准备了 70 公斤伤寒菌和 50 公斤霍乱菌。……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为石井部队长培养了 5 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又据 731 部队总务部长兼生产部长川岛证实：1940 年夏季，由 731 部队的飞机队在宁波一带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结果那里发生了鼠疫流行症。

以上仅仅是日军在宁波、衢州、金华施行细菌战的情况。其实，日军早已把浙江作为它细菌武器的实验基地，曾多次在浙江温州、金美、诸暨、义乌、兰溪、永康、东阳等县施放。

由于日军多次施放细菌，导致疫病蔓延，使无数居民染疫病亡。据记载，东阳 1941 年 11 月 25 日至翌年 5 月，巍山区乡村染鼠疫病者有 95 人，死亡 92 人。何楚齐一家就有 9 个被毒杀；义乌县在 1942 年 5 月前就有 308 人传染鼠疫病，死亡 257 人；兰溪 1941 年 8 月至 10 月发生真性霍乱，死亡颇多，染鼠疫病者 36 人，死亡 12 人；丽水病死者上百人。此外，还有浦江、温州、平阳等地无数居民惨遭不测。

1942 年 5 月，日军为打通浙赣线，占领衢州，消除浙西南空军基地对日本本土上的威胁，并掠夺浙江中部地区的莹石矿产资源，不仅调集华中 13 万兵力，而且使用特种部队，即第 731 部队和南京“荣”字第 1644 部队，配合在浙赣作战，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所谓地面传染方法”。即“在日军退却后，在行将放弃的区域内将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污染蓄水池、水井、沼泽和民房，以便引起瘟疫。”从而在浙江制造了一场大规模的细菌战。

关东军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在接到大本营司令部的命令后，即于 1942 年 6 月召开两次 731 部队全体指挥人员会议，组织了第二次“口”号会战，要求柄泽班加码生产细菌。他们几乎每天用 150 支试管培养伤寒、霍乱和斑疹伤寒菌种，保证培养三百罐细菌的需要量。这样，他们在两三个月时间就生产细菌 140 多公斤。

为了解决细菌的抗热性，技师三谷恒夫担任研制干燥菌的任务。据田村良雄证实，从 1941 年 1 月至 5 月，柄泽班每 20 天即向三谷班提供 9 公斤鼠疫菌和炭疽菌。1942 年 4 月仅一个月向三谷班提供同类细菌 24 公斤。另又据上田弥太郎证实，1942 年 4 月起仅用 2 个月时间生产了鼠疫干燥菌 40 公斤。这些细菌有的当时就装入细菌弹，有的在 731 部队出发前由菌种仓库主任松岛叫雇员把盛有细菌的瓶装箱，送到专用机场，装在标有“给水”字样的专机上运往华中。铃木在远征前又吩咐柄泽备制了 130 公斤的副伤寒和炭疽菌，运往南京。

1942 年 7 月，731 部队远征队 120 名官佐及雇员，在石井四郎率领下，到达南京，会同“荣”字 1644 部队部分官佐和士兵，参加浙赣战役。

日军在与中国军队的作战中，一路施用毒气进攻。1942 年 5 月 28 日，上饶顾祝同致蒋介石电，我四十五师一二团一部在建德洋溪镇与敌激战，退至白沙。“敌机三架轰炸白沙，投下毒气弹数十枚，我守兵中毒三分之一。”同日，顾祝同致何应钦电，“在汤溪以西地区与敌作战，敌使用毒气，我中毒者不能言语。”30 日，上饶顾祝同致电蒋介石，称宥午敌机 8 架猛炸我白沙阵地，并投瓦斯弹多枚。在衢江北岸的姜家坞、孔家山、杆山，皂头和武义南七里的大岭和林村、巨万、金亭等阵地，敌用喷嚏性毒瓦斯和催泪性毒

气向阵地猛攻。

同时，日军又派飞机撒布细菌。据“荣”字 1644 部队防役科科长榛叶修供词证明：“昭和 17 年（1942）6 月中旬至 8 月末，在浙赣作战中，中支派遣军直属第一六四四部队曾用飞机装载各种细菌如霍乱、赤痢、鼠疫等撒布在金华、兰溪一带的中国驻军地及其后方，致使无数中国军民染恶疾而死。”第一六四四部队卫生兵长立泽忠夫证实：“他曾乘飞机到前线去撒布病原菌。”

由于施用毒气和细菌进攻，日军于 1942 年 5 月 28 日占领金华，6 月 7 日占领衢州，接着连陷玉山、广丰、丽水，于 7 月打通了浙赣线。

日军占领浙赣线后，即于 8 月 20 日开始从衢州一带退却，8 月 31 日，司令部也撤退到金华。这期间，石井四郎在衢州战地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据 731 部队川岛供词证实，远征队的细菌攻击动作与日军在浙赣一带采取的战略退却同时进行，原定 7 月末，后来推迟到 8 月底进行。远征队在那里停留了约两周，于 9 月中旬回到上海。“这一动作完毕后，我才知道当时是用撒放方法对中国人施行了鼠疫、霍乱及副伤寒症细菌攻击。”鼠疫细菌是用跳蚤散布的，而其余的细菌则是直接将其投放到蓄水池，水井、河流等等的方法散布的。又据亲身参加浙赣细菌战的古都交待：“我在井里与蓄水池中以及和平居民的住所散布传染性细菌。”同时远征队还特制了 3000 个放有伤寒与副伤寒菌的烧饼，然后送到在该地区设立的两个中国战俘营，分给 3000 个被囚而又十分饥饿的战俘，让他们吃了之后，将其全部释放，以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大面积流行。另外，还特制了三四百块“蛋形和长扁形的饼干”，也和烧饼一样染有细菌，后交给日军上兵掷到居民院墙旁边，树木下面及行人休息地点，仿佛是日军士兵忘掉似的，使中国人食后染上细菌。

日军为了拔除浙赣地区的中国机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致使这一地区先后发生大范围疫病，造成大批和平居民死亡。义乌江湾乡崇山村就是一例。当年幸免于难的老人王勇良回忆：1942 年 10 月上旬，日军飞机由西而来，尾部撒下白烟，落到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接着，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最多一天死者超过 20 人。鼠疫在崇山村流行两个月，全村发病 391 人，死 386 人，有 19 户死绝，天天有哭声。日寇还在村里纵火，烧了三天三夜，其状惨不忍睹。就是当时参战的日军士兵也有几千人染上疫病。当年杭州日本陆军医院塞满了日军士兵传染病患者，医院室外也铺上子，每日死亡三至五人。这是日军进行细菌战得到的报应。

日军在浙江进行灭绝人寰的细菌战，铁证如山。人们决不会忘记历史上这惨痛的一页。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黄梅英）

宁波成为“黑色疫魔”的试验场

14 世纪，“黑色疫魔”——鼠疫的足迹踏遍了欧洲大地，一座座繁华的城镇成了凄凉的墓地。这个万恶的疫魔，夺走了 2500 万人的生命，占欧洲人口四分之一。因为死者往往多处皮下出血，全身呈黑紫色，所以被称为“黑死病”。鼠疫一直位居烈性传染病之首。在我神州大地，一提及鼠疫，便会使人想起“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的惨状。

19 世纪末，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和瑞士细菌学家耶辛，于 1894 年在香港发现了引起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此后，不少科学家和医学家纷纷探索防治鼠疫的途径。可是，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及其石井四郎等一小撮灭绝人性的细菌学者败类，却利用鼠疫杆菌这个凶恶的疫魔，将中国人民作为试验品，进行屠杀。宁波市区的开明街一带成为最早的一个人为鼠疫肆虐的试验场，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利用黑色疫魔作为侵略武器的一个基地。

灾难的发生

1940 年 10 月 27 日，距宁波沦陷前 6 个月，也是日寇首次在镇海县登陆被击退后的 3 个月。早晨 7 时，天气阴霾，一架日本飞机侵入宁波上空，散下传单，传单上有漫画，并写有“重庆在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内容。下午 2 时 20 分，又有一架日机入侵，撒下大量面粉、麦粒。日机过后，当地居民立即发觉跳蚤骤增，血红的颜色，种类各异。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而鼠疫病人来源，则是日本 731 细菌战部队在我国哈尔滨市郊外的荒堡中，将鼠疫杆菌注入中国平民体内所造成的人为鼠疫患者（被折磨染病而牺牲的达 3000 余人之多）。该部队的支队又遍布我国各地。例如，南京的荣字 1644 部队也是一个培育疫蚤的基地。据日本战犯供认，在宁波空投了一批黑色疫魔，就是以荣 1644 部队作为出击地。时隔两天，就有人染疫发病。30 日，开明街口的滋泉豆浆店的赖福生夫妻俩首先暴死。接着，隔壁的开明街王顺兴大饼店和中山东路的无泰酒店、久和祥烟纸店、宝昌祥内衣店等相继死了人。至 11 月 3 日，死亡 16 人。次日又死 7 人。一天后，再死 20 人。以致呼天唤地的哀号声此起彼伏，丧服 身者比比皆是，愁云惨雾，骇人听闻。天公也洒下了痛惜之泪，在干旱季节，意外地下了一场大雨，把麦粒和疫蚤等从屋瓦上冲洗下来，漂浮于住户的天水缸水面上，免使疫蚤外逸。未几，从水缸旁的石板缝里长出了麦苗，成为细菌战的见证。据查证，这场鼠疫有姓名、地址可查的死亡人数有 103 人，其中宝昌祥户主蒋阿宝及其家属、职工共 15 人，仅幸存 1 人；全家死绝的有 12 户，计 45 人。绝大多数深埋于南郊老龙湾的土地上。

病原体的确诊

疫情发生后，鄞县县立中心医院（今宁波市第一医院）院长张方庆医师，奉命率领医务人员至疫区查诊。见患者有高热、头痛、步态蹒跚、神志时而不清等症状，初误诊为恶性疟疾。因疫势凶猛，病情险恶，旋即疑为鼠疫（宁波过去从未发生过鼠疫）。11 月初，县立中心医院医师孙金对该院职工武顺

以往记载日机投毒时间为 10 月 22 日，现查证为 10 月 27 日。见《时事公报》1940 年 10 月 28 日第一版：常石敬一：《罪证——七三一部队对美军谍报活动》第 34—35 页，1984 年，东京大月书店出版。

泉的父亲武春元（住中山东路 256 号上海书店），抽血作涂片镜检，华美医院（今市第二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对东后街 167 号的王仁林患者，作淋巴结穿刺液的涂片镜检，都找到了典型的鼠疫杆菌。丁立成还把鼠疫疑似患者俞元德（住东后街 134 号）的血液和淋巴结穿刺液，注入豚鼠体内作动物实验，两只豚鼠均于 24 小时内死亡。取其腹股沟淋巴液作细菌培养和涂片镜检，又找到了鼠疫杆菌。标本送交浙江省卫生试验所，经吴昌丰技师作最后鉴定，确诊为鼠疫杆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9 年 12 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原日本关东军第 731 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军医中佐招供：“我曾经看到过 1940 年 731 部队的派遣队，到中国中部活动情况秘密映画。飞机仓装载一些特殊容器，在飞机机翼下安装了播散器，把内盛染菌鼠蚤的特殊容器放入播撒器中，然后飞机升空向目标地飞去。接着，就出现了中国军队在移动和农村等场面。从机翼下冒出烟雾来，表明已经播撒了鼠蚤。飞机回来，银幕上便映出‘作战終了’字样。飞机着陆后，人员离机，最先出现的是石井四郎中将和碓常重少佐。消毒人员赶去消毒飞机。待‘结果’两字出现后，就映出中国报纸和日文翻译，说明在宁波突然爆发了鼠疫。最后映出中国的卫生兵和医生前往疫区进行消毒处理。我看了映画以后，完全明白日军在宁波试用了细菌武器。”

731 部队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也于 1949 年 12 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是他奉命将杀人细菌装入特殊容器的，由远征队带走。按地理条件，选择南京的荣字 1644 部队作为出击基地，细菌在那里培育，投毒飞机也从南京出发。这次在宁波投下的毒物有疫蚤 5 公斤、伤寒杆菌 70 公斤和霍乱弧菌 50 公斤。

对疫区的控制

在宁波各界人士的敦促下，鄞县（宁波系鄞县城关）具政府发出第 291 号布告，于 11 月 3 日晚上派出警察 120 余名封锁疫区，其范围是：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北，开明街以东，北太平巷以西，一块约 5000 平方米长方形的地区。疫区内的小学停课，戏院等公共娱乐场所停演、停业，禁止居民出入。先用绳索拦阻，沿街浇了石灰水，以后则筑起隔离围墙，并在墙外挖了 3 尺宽、4 尺深的隔离沟，撒上石灰，以阻止交通，并防鼠蚤外逸。同时，先对疫区内 69 户居民住宅用硫磺蒸熏消毒，以后则改用福尔马林、石炭酸、来苏尔等消毒药物。所有消毒人员，都穿上防蚤衣靴后进入疫区操作。据曾任消毒队副队长的钟辉告称：“进入疫区时，我穿了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看到下半身有很多平时没有见过的红色跳蚤。凡是麦粒落下越多的人家，死人就越多。”

笔者曾采访了而今还健在、年已 77 岁的泥水匠威信荣，他曾经参与 1940 年 11 月对开明街一带鼠疫疫区封锁隔离围墙的建筑，以及尸体的掩埋。在他的脑海里还留下极为深刻的鼠疫患者的临死前惨状。他说：“我亲眼目睹患者脸红似醉汉，两眼充血发红，表情惊恐痛苦，两手乱抓头发，头向墙壁乱撞，胡言乱语，狂叫一阵之后，疲惫不堪，终于昏了过去。由于死人多，棺材供不应求，有时只好把两具尸体台放入一口薄皮棺中，其状惨不忍睹，

日本外国语出版社：《公判记录——七三一细菌部队》第 30—32 页、东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出版。

常石敬一：《罪证——七三一部队对美军谍报活动》第 17 页，1984 年，东京大月书店出版。

使死难者家属痛哭流涕，不能自己。”

疫区内居民和部分感染者深恐死亡临头，群情惶惶，朝不保夕，纷纷外逃，或回老家，或投亲靠友。仅中山东路 260 号的宝昌祥内衣店，店主蒋阿宝夫妇俩偕子蒋信发逃往西门外源源里，学徒林小狗逃出后死于中营巷 44 号，学徒孔阿兴逃在庄桥孔家，学徒张阿信回奉化县的孔峙老家后死亡。因此，导致疫情复杂化，并有扩散之势。在 11 月 7 日的防疫会议上，浙江省卫生处王毓榛技正强调指出，必须追同外逃者加以隔离或治疗，以免疫情扩散。于是，立即成立搜查队，以查户口的办法进行搜索。7 日当天追回鼠疫病人和死者 4 人，8 日追回嫌疑病人 14 人，9 日追回 4 人，其中 2 人死亡，10 日又追回 6 人，一直到 14 日还追回 10 人。逃出疫区在外死亡的达 32 人。凡疫区居民和患者居住过及病死的地方有 95 处，其中市区 83 处，郊区和外县 12 处，远及慈溪县和奉化县。对这些住处，都作了消毒两次的处理，有的还作了一周的隔离观察。

经确诊为鼠疫后，从 11 月 3 日起就成立了扑灭鼠疫临时办事处，设在开明街明光戏院（在疫区对面）内。凡发现高热的可疑病人，先送该办事处初诊、然后再送南门外大禹王庙内的临时隔离医院诊治，其他医院不得收治。以后，为方便起见，改在疫区内的东后街 130 号同顺提庄内，并设临时甲部隔离医院，收治鼠疫病人；在疫区对面的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营业处内，设乙部隔离医院，以收容疫区居民和处于潜伏期的可疑患者。但当时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仅注射福白龙（含奎宁退热药）、康福心（含樟脑强心药）、百乃定（增强抗病能力药）等针剂，并口服阿斯匹林片（镇痛退热药），以致病死率极高。甲部隔离医院收治 16 人，除钱贵法及陈和尚 2 人幸存外，其余患者全都死亡。

从 11 月 9 日起开始，为居民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注射，由疫区向四周辐射性扩大，总共注射了 23343 人次。

宁波发生鼠疫后，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当局。11 月 10 日，中央防疫十七队队长叶树棠率队员 4 人赶到，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也前来。19 日，军政部第四防疫分队第一卫生工程队工程师高惠民，偕同技士张学渠也来协助。至 11 月下旬，疫情已基本控制。为杜绝病源，决定焚毁疫区。11 月 30 日晚上 7 时，在疫区内分 11 处同时点火，顿时火光烛天，将 115 家住户的 137 间房屋，尽付一炬。从此，在宁波留下了一片占地 5000 平方米的废墟，称为鼠疫场。

1991 年 8 月 12 日，以森正孝为团长，成员崎祈美子和糟川良谷组成的“日本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一行 3 人，专程来宁波，本文笔者参加了这次的接待和活动。13 日上午在华侨饭店向他们介绍 1940 年宁波发生鼠疫的经过情况，请年逾古稀的罹鼠疫幸存者钱贵法讲述当年亲身的遭遇，他说：“当年我才 16 岁，在中山东路 266 号元泰酒店当学徒。不料祸从天降，店里 20 人中，竟有 7 人感染鼠疫，我也是其中之一。他们 6 人不幸先后相继死去，我被送入设在同顺提庄内的临时甲部隔离医院，历尽疫魔的痛苦折磨，才得死里逃生。如今重提往事，悲愤难消。一定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使用细菌战来屠杀宁波人民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许惨无人道的旧事重现。然后我们一起到鼠疫场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还核对了他们在日本所搜集到的史料，认为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在宁波的暴行铁证如山，罪不容诛。

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细菌战罪犯已经受到了历史

的应有惩罚。中日两国人民进入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时代，宁波市和日本长冈京市于1983年缔结友好城市后，通过亲密交往合作，友谊与日俱增。为了使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下去，双方一致认为有责任把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使用细菌屠杀宁波市无辜平民的滔天罪行，如实地告诉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孙。调查团三位成员在离开宁波前，还用中文留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题字，以表达共同为防止悲惨的历史重演而努力的心愿。

（黄可泰吴元章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杀人细菌侵广东

我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调查、取证，证实侵华日军曾在广东进行罪恶的细菌战，杀害了大批的广东和香港人。现在我要把掩盖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过去鲜为人知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披露出来，让世人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当年侵略者的凶残、暴戾和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以激励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精神，为振兴中华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一、日军在粤细菌战的大本营

以石井四郎中将（中将为日本军医最高军衔）为头子的日本关东军 731 细菌部队在东北建立基地后，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细菌战作为日军既定的秘密的战略战术也扩大推行，先后在北平、南京、广州、浙江、牡丹江、林江、孙吴、安达、湖南、江西及东南亚（大本营设在新加坡，编成冈军第 9420 部队）等地建立细菌战部队或实施细菌战，使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对此，日本人伊香俊哉的《旧日本军细菌战队关系图》（载日本《战争责任研究》季刊）已有所揭露。石井四郎也承认：“除指挥关系军细菌战部队外，还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的细菌部队。”他们不顾国际公约，残害无辜。据日方的统计就有过 36 次细菌战的“重大胜利”，其杀人之多，造成危害之大，罄竹难书。

在广东进行细菌战的是日本波字 8604 部队，始建于昭和 13 年（1938 年）9 月 7 日，初建时称为“第 21 野战防疫部”，以井上少佐为首，约 150 人，组建于大贩市。这一年的 10 月 12 日，该部队在广东大亚湾登陆，10 月 31 日抵达广州，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设置本部，作为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部队。以后，兵力逐步增加，并改名为“波字 8604 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首任部队长是田中严军医大佐，以后相继是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一、龟泽鹿郎。除本部外，他们将兵力分派到广东各地及华中福建省、广西省、香港（九龙）等地区，打着为中国人防疫、救护等和平旗号，进行“圣战”。

该部队大本营设在原广州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当时该大学已迁往后方），即现在的广州中山二路 74 号的中山医科大学里。

1993 年，原日军班长丸山茂在东京参观 731 部队的罪行展览后，良心受到很大的震动，在座谈会上，第一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粤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他说：

“当时我是广州波字第 8604 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兵长，部队对外称是华南防疫给水部，（当时）部队长是佐藤俊二（军医大佐）。该机构较为庞大，配属 1200 多名（一说数百人——笔者）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 6 个课。其中专业将校 100 人（根据内山武彦的战地日记，不包括兵区医院的人数）。

总务课，是后勤保障、人事、财务管理部门，由熊仓卫生少佐任课长；

第一课，是细菌研究课，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本课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索班（主任：佐藤大尉）、培地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约 80 人，其中将校官 10 人，中国劳工 7 人。

第二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卫生少佐任课长；

第三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任课长；

见郭成周等人：《侵华日军的细菌战》，载《军事史林》1992 年第 6 期。

见本田幸一：《编印名录的通告》，载《日本华南派遣军波字第 8604 部队战友名录》。

第四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第四课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禁止与外部人员一切交往。食宿等一切生活都在里面进行，很可怕。只有晚上点灯时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情况，里面的棚子里挤满了石油罐。有时从外面运来很大的行李，连哨兵也不能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另据日本 1994 年 11 月 6 日《新潟日报》载，丸山茂还说：另一栋第四课地下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体的尸体，第四课长每天都进行解剖。石油罐里面盛着收集到的作鼠疫实验用的老鼠）。

第五课，是器材供应部门，其课长忘记了。

我根据丸山茂两次提供的地图核实，其本部、部队长官、总务课、第一课、疟疾研究室、动物室均在现中山大学图书馆旧楼里，第二、三、四、五课，经理部、宿舍、酒吧、马房、细菌培养室、检索班等均在旧图书馆附近，包括现中山一院部分地方。

我访问徐球（中山医大行政科长）时，他说：“我今年 59 岁，生长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动物中心后面（当时是农村），几十年来都在此居住。抗战时期，在原中大医学院也驻有许多日本军队。我见到当时驻在此处的日本军队不像打仗的军队，有不少日军穿着白大褂，像医生一样，还养有一些马。他们办公、居住的地方都戒备很严，有武装守卫，有的还用铁丝网围起来，不让无关的人员进入，我不知道他们里面是搞什么的。”徐球还带我观看了当时日军的马房，其顶部是用日本产的铝板村建成的，现还保存完好（现在中山一院门诊部东边）。

我访问了长期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和中山医科大学工作的明华生副主任技师。他说：“50 年代初期，我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即现在中山医学院保健室）二楼听课，就发现有两张椅子背后写着‘波字第 × × × × 部队’（号码不记得了）的字。我还看见过一些旧家具也写有这些字。1972 年，我被派到华南农学院附近办农场，有一华农退休干部指着老拖拉机站的房子对我说，日本鬼子曾在这里搞过细菌战研究。根据日本人提供的简图看，可以肯定日军波字第 8604 部队就驻扎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即现在的中山医科大学院内。”

广州退休老人李俭（70 多岁）说：我在广州惠爱路（即现中山四、五、六路）生活了半个世纪多了，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发现侵华日军每晚向日本商店和日本人居室，发放捕鼠铁笼，每天上午由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人用军车收集，一车一车活老鼠从惠爱路向东运去。

二、用活人做试验，杀害大批难民

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前身是广州惩戒场，建于民国元年，面积 47 亩多，后改名惩戒场，并逐步扩充。1922 年，每月收犯人在 1200 人以上。内有作业工厂 6 座，建于犯房四角及两旁。

日军侵占广州后，日伪决定在广州南石头旧址恢复惩戒场，在惩戒场的西北边设立粤海港检疫所。该所所长是日本人岛义雄，曾任台湾总督府医院院长。该所共有 78 人，其中日人 12 人。

见《惩戒场沿革及进行概说》，载《广州市政概要》，广州市政厅 1922 年编。

见伪《广东省政府公报》第四期，1940 年 8 月出版。

见广州市档案馆敌伪 33 宗 1—523 卷。

见《粤海关海港检疫所职员表》，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号：敌伪 679—1338。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侵占香港等地，大批香港难民被迫遣返回到广州。1942年初伪广东省政府将惩教场改设为难民收容所。

8604部队，在这偏僻荒凉的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秘密地研制、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了大批来自香港以及广东本地的难民，造成了惨绝人寰的一幕。

此事被有意严密地掩盖了半个世纪。原8604部队日兵班长丸山茂于1993年在日本东京参观731细菌部队罪行展览会后，在座谈会上第一次揭露说：他所知道的这次大屠杀发生在1942年2月—5月，受害者是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后由水路逃到广州的难民。屠杀的指挥官是波字第8604部队（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简称南水部）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执行者是南水部第一课的细菌检索班的场守喜卫生伍长等人。

他说：昭和17年（1942年）4月，我和另外两人被派到南石头作疟疾调查。在这里见到了的场守喜。……的场守喜把我带出屋外，走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告诉你我正在做的事，但为了你自己的安全，这事一辈子也不能说出去。’军方为了保证广州市区的治安，把来广州的难民安置在南石头收容所，但由于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命令南水部，用细菌杀死他们。很不幸，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到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小心完成任务。”“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投放在饮用的汤水中，……当晚就出现了患者，……死亡率很高，死亡者不断出现，死者由省政府负责埋葬，在先埋尸体上不断重叠放上新来的尸体，到最后，连掩盖尸体的土也没有了。”丸山茂还说，后来他听说“要把收容所的200多难民转移到北江上游占领区以外地区。听说给他们发了数量不少的法币、粮食、衣服。被送到占领区以外的人大概是感染了肠炎沙门氏菌未发病，或是发了病，但病较轻而幸免于死的人们，他们都是‘带菌者’”。丸山茂说：“这是军方坏到骨髓的战法，他们连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都不放过，把他们当作‘菌种’，在敌方阵地展开细菌战。”

为了证实日军在广东搞细菌战的罪行，我作了调查。在原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附近的几个村，许多知情的老居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所见所闻的情况。

南石西居民吴伟泰（68岁）说：“日军占领广州后，把惩教处改为难民收容所，男女老少都有，人数很多，日军不让难民进入广州市区。……难民中常常饿死、病死好多人，起初，日军把难民的尸体集中到一大土坑里，想用硫酸之类的药水化掉这些尸体，但没有成功，尸体的气味很臭，大风一吹过，我们就闻着一股很腐臭难闻的气味，晚上还会见着磷光。”“我还记得日军占广州后第4年（1942年），亲眼见到日兵在稻田中用纱布袋捞子虫，又找人给饭食后让蚊子叮咬，然后抽出血来做试验。”后来他又说：“我姐夫被日军捉入检疫所喂蚊，后得病，三几年后病死。当时南石头村死人不少，拆了六成的屋，生活很艰难。”

曾在南石头难民所待过的冯庆章（后改名冯奇）回忆写道：“1942年春夏间，香港沦陷后，有大批香港难民一船一船运到南石头收容所，约三四千人之多……日本人强迫难民打‘防疫针’，但很多人打后发高烧、抽筋……不几天便倒地不起。这时已建好两个大化骨池，死了的或快断气的都丢下化骨池。……不时有日本人来难民所宣传招人去做工，选些青壮年的人，送去检疫所，据说开始几天让人选者吃得叫些，等到人选者肥胖时，将其关入黑

房，放蚊虫、跳蚤吸血（按：这是活体试验），这些人便渐渐消瘦，直到死亡。一批批从难民所出去，却不见有回。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前难民所剩下的难民很少了。香港夹的难民所剩无几。

其他证人陈嫻、肖永光、梁檬、钟瑞荣等等都讲到类似情况，由于篇幅关系不一一列举了。

战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写的《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中也谈到上述情况，除了难民死亡原因、难民数字缩小等等外，其他基本情况与丸山茂和中国知情人所谈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据查敌伪档案，1942 年，广州主要流行疫症首要是伤寒，这也证实了 8604 部队长佐藤俊二下令用沙门氏菌引起伤寒病大批杀害难民，由于大批尸体简浅埋与一部分带伤寒菌的难民离开难民所而导致此病的严重流行。其时间、地点、疫情、病症等都十分吻合的。

当时南石头不仅有陆地上的难民收容所，而且还有船上的难民收容所。据当时从香港返回的难民何琼菊（80 岁）和其儿子冯芳标（61 岁）揭露说，1942 年初他们从香港坐轮船回到广州南石头被日军拦住不给上岸，说要检查瘟疫，验大便。如认为有问题，就拉入广州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这个地方是有入无出。何琼菊曾在船上大约月余，到她设法离开该船时，原来的 480 人，最后只剩下 40 余人。她见到有几个人在船上死了，被日军丢下河里去，其他的进了传染病室，没有回来。

三、尸骨累累，罪责难逃

日军在难民所内用混凝土建了两个并排在一起的化尸（骨）池，每个大约 20 余平方米，高约 4 米。由于屠杀的人太多，两个共约 160 立方米的化尸池都来不及把无辜者的尸体“化”掉，日军要伪省政府出面雇用了 6 名抬尸人，用 3 张担架，加上一辆板车（雇 2 名拉车人）来赶运被杀害惨死的尸体到附近的邓岗（当地人又叫邓岗斜，即现在南箕路一带，属广州造纸厂的土地）掩埋。当地许多老年人都曾亲眼见到这些情景。我分别访问了一些知情者，他们提供的证词语言不一样，但内容是相同的。

南石西农民吴伟泰说：“收容所雇用一些人搬运来不及“化”的尸体到东南边广州纸厂附近的山坡上掩埋起来。我村有一人为生活所迫，被雇用去搬运和掩埋难民的尸体……”。

棣园村老农民范有生说：“我看见抬尸人有 4—6 人，两人用帆布床抬一个尸体，有时抬二三个尸体，有的咀还会动，会叹气，也抬去一起埋了。抬尸人有肖秋，去年已死了。……”

棣园村居民何金（77 岁）说：“1942 年，我父亲因烂脚，被强迫拉入南石头难民所，第二天就死了。我们花了钱进难民所化尸池找我父尸体，化尸池有两个，并排着，每个约 20 平方米，几米深，我翻开 6 个尸体才找到我父尸体，然后运回广州石溪老家安葬。我村有几个人死在里面。”

我的调查只是初步的，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把所得材料全部展示在读者面前。但是，上述材料已充分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实违反国际法准则，在广东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残忍地用活人做细菌试验；军国主义者罪责难逃，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和谴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日本国内还有那么一些战争贩子和军国主义的遗臣，他们喋喋不

休地宣传“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日本当时没有侵略的意图”，“并没有打算侵略亚洲”等等。尤为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不但不承认战争罪责，悔过自新，反诬受害国家对日本持有成见，使日本蒙受了冤枉。要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无耻之徒绝非少数战争狂人在胡言乱语，他们在政界、思想界、教育界乃至一般平民中还有一定的势力，在日本政界仍不时有其代表人物出场公开为战犯歌功颂德，为侵略战争诡辩，他们的反动思想、恶毒谬论还有一定的市场。这就告诉我们，在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完全死亡，他们还在散发臭气，企图毒化人们的心灵。对此，我们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包括日本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有足够的认识，保持高度的警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沙东迅）

鼠疫杆菌染常德

1990年7月6日，日本《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题为《旧日本军“常德作战”资料：在空中喷撒注入鼠疫杆菌的跳蚤使市民感染鼠疫》的报道，文中写道：

“在日中战争期间的1941年11月，旧日本军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由空中向地面喷撒注入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使市民感染上鼠疫。每日新闻社最近获得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资料首次表明了这一‘常德作战’使中国居民遭受损害的实态。资料为在当地进行调查的医生的报告书。报告书上记载了对感染鼠疫后死亡的市民的验尸记录以及和空中喷撒鼠疫杆菌的关系的调查结果。关于该作战存在的材料，散见于停战之后不久的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进行的军事审判记录和美国及英国的文件。而这次的资料给与了证实。战史研究家等比较重视，认为‘这是证明旧日本军731部队等不仅研制了细菌武器，而且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喷撒了鼠疫杆菌的最重要材料’。”

731——这支杀人恶魔的日本细菌战部队，因其残忍地用活人作细菌武器试验，而早已为世人所唾弃，所痛恨。人们对它在实验室内用活人作细菌实验已不陌生，但对它将研制的细菌武器在湖南常德大面积的实际运用实验却知之不多。《每日新闻》的文章，通过各方面的资料，将常德的鼠疫灾难与731部队的罪行联系起来。它在介绍了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主任医师陈文贵，在731部队喷撒鼠疫杆菌20天后到该市调查受害情况后写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以及国民政府卫生部王诗恒写的《关于常德鼠疫灭除方法报告书》等资料后，还引证了苏、美、英等国的有关资料：

1949年12月，在原苏军驻地伯力举行的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上，前日本军军医少将佐藤俊仁曾作证说：“731部队于1941年用飞机向常德市喷撒了鼠疫跳蚤”。

美国国家文件馆存有的1942年4月11日高斯递交给国务卿的信件，报告了731部队在常德市喷撒鼠疫杆菌的情况。

英国国家文件馆也存有前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军事负责人递交陆军部的报告书，汇报了日军在常德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

《每日新闻》社的文章最后引用神奈川大学常石敬一教授的话说：“报告书符合苏联和美英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死者的姓名等受害者的概况，甚至中国方面对鼠疫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说常德作战的实质因而被解释清楚了。弄清侵略战争的实际情况又进了一步。”

显然，所谓的“常德作战”，是731部队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武器实际运用。常德人民是这一实验的牺牲品，常德人民为此蒙受了巨大灾难。

那是1941年的11月4日。

天刚破晓，常德城就响起了令人胆颤心惊的空袭警报，人们纷纷往防空洞躲避。不一会，一架大型日军飞机由东向西低飞而至，它围着常德市上空盘旋了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低飞至城区上空。当人们正为这架敌机既不投弹，又不扫射而诧异时，更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从日机里投下了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等粮食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什物，散落在市区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街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城外石门桥一带的地上、屋顶上，有的甚至击破屋顶散落到了居民室内。

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人们面对满地的杂乱什物感到奇怪：敌机为什么不扔炸弹，却扔下这些东西呢？

虽然这些不是炸弹，但它毕竟是从敌人的飞机上扔下来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谁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花样呢？居民们把这些东西扫拢来，大约有四五百斤，除了由警察局取了一点样品存于玻璃瓶里以备检验外，其余的全部烧毁。

敌机投下的谷、麦等样品由常德地方当局和警察局分别送到省有关部门及常德的广德医院进行检验。在广德医院，检验人员采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离心沉淀，以及抽取腹水病人的腹腔积水，置于试管内作细菌分离培养等方法，对谷麦样品沉渣涂片作格兰氏染色法检视，均发现除了许多格兰氏阳性杂菌外，还有不少两极染色较深的格兰氏阴性杆菌，与鼠疫杆菌图谱极相似。

请看广德医院医生汪正字的一段话：

空袭警报解除后，当时的政府机关送来一包敌机投下的谷麦等物到东门外的广德医院要求检验。彼时我是检验室负责人。我和同事们都怀疑这些物品带有鼠疫杆菌，因为我们曾在报上看到日寇在浙江衢州等处投掷过鼠疫杆菌。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揭露日寇残忍卑污的行为，我们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检验工作。其检验方法是这样：

第一步，取少许空投之物浸泡在无菌生理盐水中，半小时后，用数层无菌纱布滤去浸泡物，将滤液用无菌方法移置于无菌试管内，用离心沉淀器使其沉淀，取沉渣涂片，固定后用格兰氏液染色，在显微镜油镜下检视，除格兰氏阳性（紫色）细菌外，发现有格兰氏阴性（红色）两极着色深的划形杆菌，很可疑为鼠疫杆菌。

第二步就是细菌分离培养。由于我院临近前线，随时可能遭受日寇的空袭和进攻，因此，平时未作细菌培养基的准备。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院病房中住有一位患肝硬化的女病人，她的胸腔内积水甚多，只好用无菌方法抽取其腹水数十毫升分装于三支无菌试管，以两管培养敌机所投之物。另一管用粮店买来的谷、麦、豆子、高粱作对照培养，及时将三管一并放入 37℃ 恒温箱内，经 24 小时后检视（与此同时，日夜赶制各种培养基备用），在敌机所投之物培养管中之液较浊，而对照管中之液较清，遂取两液分别涂片，同样用格兰氏液染色，在显微镜下发现浊液片中有多数格兰氏阴性两极着色的杆菌，而对照管液之涂片只见很多格兰氏阳性细菌，未见两极（两端）着色深的阴性杆菌。因此，我们的疑虑就更深了。

第三步就是将两种不同生长的培养液，同时分别进行动物试验以测知其致病力。由于家鼠一时很难捉到，而豚鼠又无饲养，只有用兔子二只供作试验：虽知兔子对鼠疫不易感染，然姑一试之。其结果，经注射有格兰氏阴性两极着色杆菌生长液之兔的体温略微增高，另一对照兔经注射无上项菌生长液后，则正常，继续观察两兔均无特异，因此对这一试验即行停止。

根据这一初步检验结果，以及日机空袭的反常情况，有关部门初步判定敌机空投物中有类似鼠疫杆菌的存在，遂向上级报告。

敌机投下谷、麦等物的数天之后，常德市大街上开始出现死老鼠，有的老鼠在大街上缓缓爬行，甚至被人践踏而死。这些怪事，虽然引起了街谈巷议，但缺乏经验的人们并未将其与前几日机的空投物联系起来，没有人将死老鼠送医院检验，地方当局也没有引起注意。

鼠疫悄悄地在常德传播开来……

11 月 12 日早晨，广德医院来了一位急诊病人，她是家住关庙街的 12 岁的女孩蔡桃儿。头天吃晚饭时，蔡桃儿还有说有笑，到晚上 9 点时，忽然畏

冷、寒颤，继而发高烧，周身疼痛，整整吵闹了一夜。其母见病情严重，天一亮就带她到广德医院就诊。医生汪正字当即抽取病孩的血液和淋巴节液进行检验，确诊为鼠疫症。医院采取了隔离治疗。当夜，蔡桃儿病情恶化，虽尽力抢救，还是于13日上午9时许死亡，距发病时间仅36个小时。

一个无辜儿童成了这次细菌杀人试验的第一个牺牲品。

蔡桃儿死亡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的居民中接二连三地发生类似病例，病人往往不及医治就死亡。染疫人数越来越多，平均每天都在10人以上，而且传染迅速，一人患病，波及全家甚至四邻。

当年住在鸡鹅巷的聂声扬控诉了当时的情景：

“在敌机空投后的三四天里，街头巷尾和房屋的角落，都发现了许多死老鼠，有的老鼠还在地上缓缓地爬行。当时大家不以为然。几天后，我姐姐聂春桂突然觉得怕冷、打寒颤，发高烧，全身剧痛，坐卧不安。周围邻居中也有许多人得了同样的病。经常德广德医院的医生诊断，发现这是鼠疫症。不几天，鼠疫很快就蔓延开了，医院住满了，有的只好在家里隔离治疗。我姐姐当时也在家治疗。由于她的病很重，多方治疗无效，不久，便离开了人间。听我姐夫讲，姐姐死后全身呈紫黑色。姐夫家邻居一家老少五口，全部被鼠疫夺去了生命。”

鼠疫在常德市严重的蔓延，全市民们惶恐不安。当局从长沙及重庆派来了多支医疗防疫队进行防疫和治疗，并采取了一些灭疫措施。首先，在东门外约2华里的韩家大屋，迁走10余户居民，临时改建了一所隔离医院，周围以一道深1.5丈、宽1.2丈的灌水壕沟与外界隔绝，专门收治鼠疫病人；在西门外设一火葬炉，专门火化病亡者的尸体；划定敌机空投物最多的鸡鹅巷、关庙街、高山巷等为疫区，实行警戒封锁。接着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没有注射预防针的不得离开常德。同时，发动群众灭鼠灭蚤。

虽然采取了许多灭疫预防措施，但鼠疫已经在常德流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之人们当时对突如其来的鼠疫既无思想准备，又缺乏深切了解，特别是人们对隔离医院和火化尸体的恐慌心理，使得鼠疫的控制十分困难。一些群众怕隔离，怕火葬，往往有病不报疫情，对死了的就在夜晚偷运出城埋葬。还有的为逃避检查注射证，偷偷在城墙上爬进爬出。这样，导致鼠疫在常德以外地区的流行。

桃源县马鬃岭一位姓李的布贩来常德贩布，住在旅社中。一天忽然觉得头痛发热，他怕被人发现后送在隔离医院，当夜雇舟潜行回家。第3天他就死在家中，他的两个儿子、媳妇等也相继患同样的病死亡，还波及邻居，共死去了十四五人。他的岳父是个巫师，闻讯后，特意赶来为他设坛祈攘，事后也得了同样的病丧生。卫生防疫人员赶往该地防治，诊断为肺鼠疫流行，历时半个月，才得以控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至次年的二三月间，才使常德的疫情缓和下来。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已有众多的无辜百姓被这场飞来横祸夺去了生命，仅当时设在西门外的火葬炉，前后就火化了360余具尸体，加上许多不愿火化或不报疫情的死难者，仅常德市死于这场鼠疫的就在600人以上。

为了彻底探查疫源，常德鼠疫发生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军医署和卫生署，派遣德籍犹太人鼠疫专家伯力博士（R·polrzer）专程前往常德，负责剖验鼠只和测定跳蚤的工作。经过对大量老鼠的解剖检验，博士断定常德市流行的鼠疫是老鼠和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与此同时，从重庆率医疗防疫队

赴常德的国民政府军政部主任医师、细菌学教授陈文贵，对病死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与广德医院对敌机投下谷麦物的检验结果相对照，发现二者的细菌完全相同。通过对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判断，陈文贵教授认定常德鼠疫是由敌机空投物品所携的鼠疫杆菌所致，并撰写了《常德鼠疫报告书》。这就是那份前面提到的，被日本战史研究家认定为：能够证实731部队“实际上在中国国内喷撒了鼠疫杆菌的最重要材料。”它是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公约，对常德人民，也是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历史见证！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刘建平）

倾销毒品谋财害命

把鸦片当做商品强行向中国倾销，以牟取暴利，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恶手段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也不例外，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它公然违背刚刚签署的禁止麻醉品国际公约，在其占领的中国东北，强迫、引诱东北人民种植、吸食鸦片，以此掠夺巨大财富，毒害中国人民。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华战犯之一，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鸦片既可攫取中国巨额财富，又能征服中国人，向关东军总部献计献策，提出一套对中国东北实施鸦片毒化的政策。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第三课长原田熊吉和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次长阪谷希一、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等进行一系列筹划之后，“确定了满洲国鸦片政策的根本方针”，大开烟禁。1932年秋，驹井德三在报纸上发表谈话，无耻他说鸦片是中国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为适应人民的需要，将来由政府专卖，准许人民领鸦片栽培证，许可栽种，领鸦片吸食证，公开吸烟。9月，日伪废除了原中国政府颁布的各项禁毒法令，公布了《暂行鸦片收买法》，设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公布了《鸦片法》和《鸦片法实行令》。不久，又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正式实施鸦片专卖。

日伪抛出《鸦片法》使其鸦片统制、毒害政策合法化。

(二)

日伪在实施鸦片专卖政策最初时，由于鸦片的缺乏，尤其是素称“鸦片王国”的热河省尚未侵占，故从朝鲜、印度、伊朗等国筹集鸦片达300多万两，在东北各地专卖。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后，热河成为东北乃至东亚的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1936年，日伪在热河省六个县公布下列栽种罂粟的奖励办法。一、凡按指定面积种植者，免土地税。二、凡种植面积超过5亩者，免土地税和兵役。三、凡种植面积超过20亩者，可获县政府奖励，并享受前二项奖励。四、凡种植面积超过50亩者，可当村或县的头面人物，并成为社会职务的候选人，同时将得到前三项规定的奖励。在日伪的提倡、利诱下，鸦片种植区域和面积急剧增加。据伪满官方统计，到1937年，栽种鸦片的地区由热河一省扩展至七省，被指定的栽种面积由30万亩增至68余万亩，而实际种植面积约100万亩。1933年鸦片收购量为250余万两，1937年猛增到800余万两。日伪收购来的鸦片，由各专卖公署统一送到各署所属专卖工厂，加工为鸦片成品。奉天专卖工厂是当时最大的毒品制造厂，每年可生产成品鸦片800多万两。制成品最后由专卖公署配售给各地指定的鸦片零售商零售。1937年时私营零售所约有2000个。按《鸦片法》规定，吸毒者只须持有伪满民政部发放的吸食证，即可公开吸毒。

为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人民的鸦片毒化，日伪特从大连和台湾请来鸦片“技术专家”黑井技正与丹野技正，安插在伪民政部内，让他们把日寇在大连、台湾毒害中国人的“经验”，扩大到东北和其他省份来。伪民政部总务司长

古海忠之笔供，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第811页，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金名世证词，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第815页，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伪满中央称专卖总署，在奉天，吉林，哈尔滨等11个地区设公署，各公署又设专卖工厂，负责鸦片的加工制造。公署下还设有分署若干。

热河地区，因地理气候条件适宜，历史上栽种鸦片。军阀汤玉麟统治时，更提倡种植鸦片，使热河成的著名的鸦片产地。

竹内的一番话，道出了日本侵略者这个毒害中国人的罪恶目的。他说：“军阀统治东北时，鸦片瘾者得不到良好的鸦片，还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取缔。满洲国是王道国家，对鸦片瘾者将随时供给廉价良好的鸦片。”据伪满官方统计，1933年鸦片瘾者为5万余人，到1937年猛增至81万余人。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个统计。据时任伪专卖总署署长卢元善供认，1937年全东北鸦片瘾者达到100万人，每年约有一亿多元资金从中国人民手中流入日本国库。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公开实行鸦片毒害政策，招致了世界舆论的谴责、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东北人民的抵制、反抗。为应付世界舆论和掩盖其罪行，遂在1937年10月，伪满政府颁布了《鸦片断禁方策要纲》。《要纲》谎称，从1938年起，要在10年内根绝鸦片吸食者。为此，伪满政府成立了中央禁烟促进委员会，作为执行鸦片政策的中枢机关，1939年又设立禁烟总局，作为管理鸦片事务的执行机构。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是挂羊头卖狗肉，以迷惑世界视听。按《要纲》规定，鸦片瘾者不登记就不卖给鸦片，但实际却采取了申请者可不经医疗检查就准登记的单纯登记制，使吸毒者更方便了；规定10年断禁鸦片，却未制定对鸦片瘾者的具体治疗计划，等于不限时间；规定鸦片种植面积逐渐减少，但却指导奖励栽种罂粟者，改进种植方法和选择良种；改变了鸦片私营零售制，实行了政府直接管理的公营制，销售渠道更加畅通了。罂粟栽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随之迅速增加，受害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1941年12月，日本与英美之间暴发太平洋战争以后，日伪在扩充战时经济的名义下，扯去断禁的各种伪装，毫无顾忌地强化鸦片毒害政策。据日伪内部统计，指定鸦片种植面积1937年是68万亩，到1944年则增至73万亩；1939年鸦片瘾者100多万人，到1944年除正式登记者外，还有的120万潜伏瘾者（即未成年和轻微瘾者）。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十几年鸦片毒害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日伪鸦片毒害政策的强制推行，使当时的东北罂粟花遍地开放，大烟馆比比皆是，瘾君子成群结队。在沈阳市北市区，1936年烟馆达400多处，当时曾流行着这样的民谣：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指制毒技师），十户之内准有白面。在中毒者当中仅有1/3可能治愈，其余已完全没有希望，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另据伪禁烟总局统计，从1939年至1944年末，已登记的鸦片痛者和吗啡瘾者在这六年间死亡约7.4万人。以此计算，从1933年至1945年的12年中鸦片中毒者死亡不会少于17.9万人。实际的死亡人数要大大超过这个统计，因为很多中毒者是不登记的。当时的哈尔滨道外是中国穷人居住区。据该处第一管烟所所长供认，从1944年2月起，每天来所吸、买鸦片者多达3200余人，售出鸦片6500份，到1945年春，每天来所吸、买鸦片的人增至3700多人，售出鸦片达7000余份。很多吸食者倾家荡产，无处可去，流落街头，葬身沙丘。这个所长亲眼所见，从1943年到1945年，道外钱塘街一带，几乎每天部发现四五具鸦片瘾者的尸体。尤其是在冬春两季死亡最多，经常有汽车往外拉运尸体。广大的农村也深受其害。1941年，伪呼兰县共设8个管烟所，中毒农民达1万余人。据被害人辛玉昌控诉：他家住呼兰县许家村，经伪警察“动员”领取了4个鸦片吸食证。他家10个成人中有9人吸鸦片，结果家破人亡。到1944年，家中仅有的三间房子也卖掉了，9人中有7人中毒相继死去。中毒死亡者可以用数字来统计，但还有无法以数字来统计的，这就是鸦片毒害从精神上严重摧残了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许多吸食者在吞云吐雾中不仅耗尽了财富和肉体，鸱衣鸠面，骨瘦如柴，而且

混灭了灵魂，丧失了人格，成为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志的日本统治者的“顺民”。这比死亡更为可怕。

罌粟花，罪恶之花，杀人之花。这杀人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旭天)

五、经济掠夺

垄断淮盐

盐，不仅是国民生活中无法代替的必需品，而且也是化学工业、国防工业中的重要原料。

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缺乏制造海盐的理想的广阔海岸滩涂条件，所以日本产盐尚不敷民食之用，大量工业用盐一向由国外输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渴望已久的掠夺中国海盐的野心得以实现。

早在 1936 年 10 月，日本大藏省专卖局会议纪要中就明确提出：“鉴于碱及其它化学工业用盐之需，将达 179 万吨左右，其中八成（135 万吨）之供给，须由外地及邻邦设法保证。”这里的“邻帮”不言而喻主要就是中国。这个《会议纪要》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急于掠夺中国盐资源的迫切心情。随着向中国东部沿海进军得手，1938 年 10 月，日本大藏省又拿出一套掠夺中国海盐的完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1942 年，中国沿海产区要保证供给日本 200 万吨盐，到 1945 年，要保证具有 350 万吨的对日供给盐能力。”

据史料记载：“1915 年至 1924 年淮北盐区平均年产量占两淮 70%，其中 1924 年淮北盐产量就占全国盐产量的五分之一。”当时，淮北盐产号称“馈食偏六省，税课甲宇内。”故日本把掠夺淮盐放到整个掠夺中国盐计划中的重要位置。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淮北盐场所辖的板浦、中正、临兴、济南四个盐场以及临近盐场的连云港，于 1939 年 3 月相继沦陷，侵华日军立即实施日本政府掠夺淮盐的罪恶计划。

首先是在沦陷区强制推行民食用盐的配给制度，以压低民食用盐的手段，保证不断增加淮盐向日本的输出量。特别是在盐产量不足和运输工具缺乏，食盐供应紧张时，日本侵略者便以牺牲中国人的民食来满足其发展军事工业，扩大侵略战争的需求。自 1941 年始，日本兴亚院在华中、华北占领区域内的中小城镇强制实行民食用盐统制和配给政策，各地配额统归兴亚院直接掌握，即使汪伪中央政府都无权变更。最初规定每人每月配给食盐 1 市斤，但实际上兴亚院批准的配给数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一年，华中辖区共有 3630 万人，而日本兴亚院批准的配给定量为每年只有 9 万吨，年均每人每月食盐量仅为 0.4 市斤。而对居住在南京市内 1 万多名的日本人，兴亚院规定每人每月确保 1.5 市斤精盐。在华中地区，由于车船等运输工具掌握在日军手中，后来成立的中华盐业公司无力承运整个华中区的民食用盐，但又企图垄断，不准场商自运，这就给民食造成极大困难。有些地区每人每月由规定 1 市斤减为半市斤，复由每人半市斤改为每户每月 1 市斤，最后甚至完全停售。

日本侵略者为尽量掠夺更多的淮盐输回国内，在对我沦陷区居民强行实施食盐配给制的同时，对我抗日根据地则实行严格的食盐封锁政策。“昭和”15 年（1940 年）8 月“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说明书”中明确规定，将盐“作为特别重要物资，禁止流入匪区。”为此，在徐州特设一个“对匪区禁销委员会”。并在伪海州区盐务管理局拼凑一支有 3200 多人的税警队查缉私盐，并经常派宪兵检查食盐运输和销售情况，稍有怀疑，即行扣留、没收、封店、抓人。同时，为控制食盐流通，大肆削减食盐销售点，江苏五、六岸（即苏

北地区 11 个县)原有 300 多个销售官盐的店铺,日寇借口,“因连续发生不法卖盐事件,去年(1939 年)10 月强化改善机构,根据组织制度,销盐店减少到 60 所。”

这种统制配给和封锁政策的结果,势必导致盐荒,一些投机盐商勾结敌伪各级官吏乘机大发国难财。他们垄断居奇,哄抬盐价,操纵黑市交易,中饱私囊。官价盐无货供应,私盐售价为官价的好几倍。1945 年初,宁、沪一带,盐的零售价格每扣约 9600 元,已属惊人,而黑市盐价竟高达每担 3 万元,造成沦陷区人民长期饱受淡食之苦。然而,盐场和周边地区民众,不堪日寇压榨,大规模抢盐事件时有发生。单海州地区自 1939 年 7 月至 1940 年 11 月,即发生抢盐事件 56 起,打死伪盐警 291 人,共夺走盐 6100 余吨。

其次,日寇采取以低价低税,甚至免税等卑劣手段,对准盐和盐业生产进行大肆掠夺与野蛮摧残。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之后,要我国向日输出海盐,并不是平等贸易,等价交换,而是一种强行掠夺。当时市场盐价,淮北盐场价 1940 年为 16 元/吨,1941 年为 26 元/吨,1942 年为 88 元/吨,1943 年为 54 元/吨,1944 年为 178 元/吨,而输日盐价格,除 1940 年与场价相同外,其后四年均为 24 元/吨,强行坚持四年不变。仅从 1941 年—1943 年三年中,侵华日军向其国内输入淮盐 179435 吨计算,就无偿占有中国盐价值总计达 1983055 元。1942 年 1944 年日本进口淮盐,实际只付出相当于中国价格的 6.3%13.5%。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用竭力压低向日本输入盐的价格的方法,以维持对中国沦陷区盐业的最大限度的榨取,扼杀了中国盐业的生机,使广大沦陷区盐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同样,在盐税的税率上也大大压低输日盐税率,以最大限度地攫取中国盐业经济。

由于汪伪政权的卖国政策,造成沦陷区经济日益衰退、财政枯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它又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经济掠夺的恶果转嫁于民,不断提高盐税。据民国盐务史资料记载,华中沦陷区从 1939 年 11 月至 1945 年 6 月这六年中,就提高过六次盐税,且增长幅度空前惊人。自 1938 年始至 1945 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前夕,盐税与盐价都飞涨了 100 多倍,其危害人民之烈,令人咋舌,沦陷区八年,是中国盐务史上税价上涨最激烈的年代,也是盐税与盐价最混乱的年代。

尽管沦陷区盐税如此暴涨,到 1945 年 1 月每担盐税高达 600 元(中储券),而输日盐的盐税仍保持战前水平,淮盐每担仅 5 分钱,几乎等于无。其实这个低税率的形成,在战前就是日本胁迫的结果。

日本不仅从中国沦陷区掠夺低价低税盐运往日本,而且其侵华日军在各沦陷区还大量强索免税的所谓“军用盐”,供侵华日军人、马食用,甚至以此走私牟利,中饱私囊。据江苏盐业史介绍,淮盐被侵华日军强索的“军用盐”逐年上升,1939 年 1100 吨,1940 年 3600 吨,1941 年 4580 吨,1944 年 103000 吨,1945 年 165000 吨,总计达 277280 吨(后两年中有部分浙盐)。日寇将这“军用盐”走私牟利,中饱私囊的也不乏其例。如 1942 年初,荣第 1628 部队仓库由华北某日军部队装运军盐 3000 余担至上海,以日军票 3 万元的价格交某日商行承售。后汪伪政权与日本兴亚院虽表面上进行了干预,

但最后成立妥协，表面上由荣第 1628 部队缴纳盐税每担日金 7 元，共 20053，74 元，然后又由伪盐务管理局以运费名义给日军 17475 元。结果 80% 以上的利润仍然装进日军的腰包。

由于大量强索军用盐，占用了大量的沦陷区火车和各种民用运输工具，因而挤掉了民食用盐的运输，造成民食盐匮乏。1943 年 9 月后，海州盐（即淮盐）改海运为陆运，而大部分陆运的运盐车辆都被运送军盐占用，结果 1944 年 4—6 月三个月，海州运出军盐共 19.6 万担，而民食用盐仅 12.9（按原配给计划，民食盐占 82% 弱，军盐占 17% 强），致使各地盐荒四起。当时，南京已有五个月未配盐，安徽蚌埠、芜湖等地已六七个月未配盐。日军将淮盐源源不断运往日本。据日伪《华北交通月报》统计记载，从 1941 年 4 月至 1942 年 9 月，仅 18 个月中，日本通过连三港港口运往日本的淮盐，共达 110789 吨，这与满铁经济调查部嘱托岗崎弘文撰写的《连云港经营现状的概况及改善经营的措施》一文中的“中支向外输出盐是用船进行输送的，平均每月向日本输出一万吨左右”的说法，基本吻合。据陈家港运销栈老工人回忆，当时，日本海轮几乎每天进出陈家港码头，一般载重都在 3000 吨左右，其中较大的如“瑞康丸”载重达四、五千吨。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 8 年中，运用各种手段从中国掠夺的盐，占沦陷区产盐量的一半，即在 110 万吨以上，使中国盐税损失达 20 亿日元之巨，其中淮盐也约在 50 万吨左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之下，使名闻遐迩的我国淮北盐场的盐业生产奄奄一息。

祸不单行，就在日寇铁蹄于 1939 年 3 月踏上淮北盐场以及连云港海州地区以后，当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淮北盐场又遭受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海啸袭击，淹死了 1900 余名盐工及其亲属，灾后断墙残垣、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盐田设备等生产资料遭受严重破坏，日本帝国主义仍乘机采用卑劣手段，加紧掠夺淮盐。他们打着修复盐田设备、恢复生产的幌子，在销盐中加征所谓“复兴费”，1941 年为 2 元/吨，1942—1943 年为 6 元/吨，1944 年为 18 元/吨，而输日盐一律免收复兴费。事实上复兴如何呢？在“昭和”15 年（1940 年）8 月《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说明书》中找到了答案。“第一期复兴工程……已错过施工季节，很是遗憾……本年度第二期复兴工程方案预算 96 万元，许可支出 40 多万元，但也和上次一样，错过施工季节，不胜遗憾。”他们搜括的所谓“复兴费”去向，不言自明。

日本帝国主义贪婪的掠夺，使淮盐生产日益萎缩，如淮北盐场济南场七公司因日本压低出口盐价和场价，使制盐不得不敷成本，资金困难，入不敷出，日渐衰落，到 1941 年已负债 150 万元。汪伪财政部为维持这个两淮最大盐场的生产，乃由财政部出资，将这七家公司改为官督商办，但由于运输仍为中华公司所把持，车辆奇缺，销售渠道不畅，又不许场商自运，结果使这七家公司处于奄奄一息的困境之中。接着，1942 年日寇又把它“以战养战”的策略具体化为“自给主义政策”，从沦陷区筹措军需，致使这七家公司以及经营盐业生产的其他场商无法维持其生产经营，濒临于破产，各自争相开始前所未有的大拍卖。原济南场的大德、大阜、大有晋和公济等公司大部分股票，均为大汉奸丁敬臣所收买。不久，这些公司全部宣告破产，转变为日为资产和汉奸资本。场商破产，盐民生活更加困苦。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淮盐的掠夺是殖民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资源掠夺的一种表现形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一经验教训。

(许燕鎏方一清中共江苏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野蛮开采河东盐池

山西省河东盐池是镶嵌在黄土高原运城盆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盐池在旧中国位居池盐之冠，也是全国著名的 13 个产盐区之一。所产潞盐具有 3000 余年的开采历史，行销晋、陕、豫等省。河东盐池因潞盐而闻名于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各地相继沦陷。1938 年 3 月 5 日，日军占领运城，盐池也沦入敌手。

日寇侵占运城后，为了便于对盐池进行掠夺，便宣布对盐池实行军事管制，并命名为“军管理四十工厂”。

日本帝国主义对河东盐池觊觎已久，早在侵华之初，日“兴亚院”就拟定了所谓“华北盐业开发纲要”，组织了所谓的“华北盐业股份公司”，策划“开发”长芦、山东等地的海盐，以及运城河东池盐。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服务于其侵略战争。

在开发盐地的名义下，日本占领军组织了伪“河东盐务局”，统辖盐池各盐场，把持盐政，对盐池资源大肆掠夺。

一、不择手段掠夺潞盐

首先是明目张胆的抢夺。日军侵占运城不久，就明火执仗地对盐池进行了一次公开抢劫。日军在汉奸、伪军的配合下，开着汽车、驾着马车到盐池抢盐，并强迫老百姓为他们装车搬运。在遭抢劫前，盐池共有存盐约 16 万吨，这次被抢劫食盐 10 万多吨。在抢劫潞盐同时，日军还将各盐场准备晒盐季节用的近万石粮食洗劫一空，甚至连生产所用之工具、器材都成了他们抢夺的对象。经过这少强盗性的劫掠，盐池几乎十室九空，盐场物资损失殆尽，生产难以为继，致使 1938 年生产陷于停顿，整整一年粒盐未收。

其次是控制潞盐运销，从中渔利。潞盐的运销向来由行商经营。日军占领后，一改惯例，取消了由商人贩运的旧制，盐池所产潞盐全部由“伪‘阿东盐务局’统一收购，然后分配给敌伪各‘合作社’至行配销。”盐商只有生产盐的责任，而没有销售盐的权利。在生产极不景气的情况下，本来不多的食盐除一部分供应当地食用外，多数由日军统制。在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的政策下，他们组织了“新民会合作社”，具体推行统配方案。通过这一作法，不仅掌握了供应，而且控制了盐价。日军还把沉重的税务负担强加于盐场主。据统计，在日占期间，每年从各盐场搜刮的盐税盐折合伪联银币约达 200 万元之多。此外，日伪还通过控制潞盐运销向盐场主勒索所谓“运动费”。统配统销使日伪控制了盐价，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盐价却不能随之上涨，致使场主常常赔钱亏本。盐场主“为了提高盐价，维持经营，便只好拿钱向日伪‘运动’，这笔钱被称为‘运动费’”。盐场主每次为了提高盐价，都要与日方讨价还价，直至付出一大笔“运动费”。这笔“运动费”动辄数万元，竟达提价增收部分的盐 50% 以上。“运动费”一般由伪“河东盐务局”和伪“山西盐务局”（住太原）共同分享，进了那些大大小小强盗汉奸的腰包。

再次是巧立名目多方搜刮。在日军占领运城期间，对盐池的搜刮不仅限于明抢和税收，他们巧立名目，多方蒙取。除了税收外，还为军队、工厂强行征收军用盐和工业用盐。在“庆祝”所谓“日本帝国建国两千六百周年”时，日伪盐务局就强迫盐场商为日军捐献飞机一架，仅此一项就从盐池勒索了食盐 400 余吨。1944 年一年就利用各种名目从运城盐池白白刮走了食盐 2000 多吨。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其掠夺变本加厉。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

伪“河东盐务局”利用抗日根据地食盐严重缺乏之机，将手中掌握的潞盐以高价换取根据地的蜂蜜、黄蜡、棉花、桐油、食油、牲畜、车辆、麻绳、木器等战争和生活必需品，盐池成了日本侵略战争的一个名符其实的物资供应站。

二、明目张胆掠夺化工资源——硝板

硝板（学名白钠镁矾）是河东盐池特有的一种矿产，是重要的化工资源。硝板的生成主要是由卤水的成分决定的。由于卤水中含有钠、氯、硫酸、镁，每到冬季，便生成硫酸钠（芒硝）。但到春季气温上升以后，又分解为氯化钠和硫酸镁。氯化钠于夏季气温炎热时，经过日晒蒸发结晶析出，卤水中的硫酸镁便留在畦中，到秋季则生成硝板。由此反复，一年又一年，盐池里的硝板便愈结愈厚。”硝板厚度多达3.5米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厚达十数米。作为硫酸钠和硫酸镁结合的复合盐，硝板富含多种化学成分，除氯化钠、硫酸钠外，还有硫酸钙、硫酸镁等。因为数千年来，盐池只产盐不产硝，所以在硝板中硫酸钠（芒硝）的含量较大，占到总含量的30%以上。硫酸钠不仅为造纸、制皂，印染等化学工业所必需，而且是钢铁工业、军事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

盐池有史以来虽单一产盐，然而对卤水、硝板中所含化学成分早有认识，只是囿于客观条件，未及开采。因此，日军占有盐池后，在充分了解盐池资源状况的基础上，把盐池化工资源——硝板作为其在盐池进行掠夺的又一个主要目标。

日军占领盐地后，为了“名正言顺”地掠夺盐池的宝贵资源，便以“开发”为名，组成了股东包括日本三菱洋行、王子造纸厂，及伪山西省政府、运城盐池盐业场商公会在内的所谓“化工厂”。这是个敌伪合流的、具有政治性质的经济组织，化工厂的一切权力均由日本掌握。运城盐池盐业场商公会之所以被列为股东，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以便无代价地掠夺盐池化工资源，掠夺硝板。化工厂名义上是要开发化工产品，实际上是个既无厂址、又无设备的空招牌，唯一任务就是掠夺盐池化工资源。几年中，日寇借化工厂之名，先后动员大批人力、物力、财力，用人力车、胶轮车等交通工具，不分春夏秋冬，四季不辍地抢运硝板。经年累月，日寇总计先后从盐池运走的硝板多达数十万吨。这么多宝贵的化工资源就这样被日寇明目张胆的掠夺而去，白白地进入强盗之手。1942年，日寇为了加快抢运硝板的速度，又在盐池设立了所谓的“芒硝公司”，同时抢修铁路专线，建筑仓库等，后因战败投降，自行停顿。

抢运硝板之余，日寇还在盐池盗挖盐根。“根”者，本原也。所谓盐根，就是生产卤水的矿藏。盐根埋得很深，一般不外露，其氯化钠含量高达84.47%，是盐池的重要资源。日寇对盐根的盗挖是相当野蛮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三、掠夺的直接恶果

日寇的强盗式掠夺，不仅使盐池损失了大批资源，而且对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破坏。长期以来，秦、晋、豫等省的食用盐都仰赖河东盐池供应。日占期间，因日寇对潞盐的控制和掠夺，食盐的供应大幅度削减，据统计，1937年实放潞盐472956担，1938年减少到133545担，1939年则仅有

65 担。因盐池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一般是头年产盐，次年才供应市场。故 1938 年所供之盐，系 1937 年所产。1938 年没有产盐，1939 年即几乎无盐可供。结果不仅邻省因此得不到最低限度的食盐供应，常常被迫淡食。就是产盐的山西省也不得不组织力量到外省运盐，以解不时之需。驻在山西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就曾设置“山西民盐运济处”，专负运甘盐入晋之责。该机构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方才结束。在食盐供应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些过去被政府禁绝的不能食用的土盐、私盐也准煎晒，征税行销。

日寇掠夺盐池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使潞盐生产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河东盐池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在 1928 年、1929 年的兴盛时期，盐池共有盐场 64 家，临到沦陷前夕，也还有 44 家。运城沦陷期间，盐场主不堪忍受日寇的压迫和掠夺，纷纷携资外逃，一些盐场相继停业，解池盐场中、西两个分场的晒畦几乎全部荒废，盐工也被迫远走他乡。抗战胜利后的统计数字表明，“到 1945 年底解畦荒畦高达 459 号，占全池盐畦总面积的六分之五。1938 年盐池全年没有产盐，1939 年仅产盐 5416 吨，不及正常年份盐池产量的十分之一。就是日占期间生产情况较好的 1941 年，产量也只有 23417 吨，仅有正常年份产量的一半。

在盐池面积缩小、潞盐产量下降的同时，盐池各场资本家的资本也在迅速减少。1937 年底，盐池各场的资产总计约为 800 万元，经过日伪的抢劫和长期的掠夺之后，到日寇投降时，所剩下的就很有有限了。如盐池有名的盐场卞合兴，在日寇侵入以前，大约有资本十几万元，日寇侵入以后，资金便逐年下降，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盐池各场基本上都没有继续维持生产的能力，整个盐池生产奄奄一息。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日占期间，河东盐池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运城沦陷前，盐场职工便自动组织起来，在盐池附近群众的配合下，抢运一部分食盐出池。盐池沦陷后，盐工反对掠夺抢运食盐的斗争继续坚持。据国民政府盐务局统计，在 1938 年 6 月至 1940 年 7 月的 26 个月中，从盐池抢运出的食盐就达 22.634 吨。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经常活动在盐池南面的中条山、吴村、庙前一带，伺机打击敌人。盐工则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以便游击队出动武装袭击盐警，使盐警处于内外夹击之中。一些盐工还走出盐池，直接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中。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活动在盐池周围，在打击伪盐警的同时，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馮雒春普）

残暴贪婪的“米谷统制”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港湾河汉纵横交错，几经沧桑，孕育了市区东南这片膏腴良田。这里素有“北国江南”之美称，其特产质优味美的“小站稻”早已驰名中外。“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与“以战养战”的战略的加紧实施，天津小站稻及这一地区所产稻谷便成为日本侵略者攫取的重要对象。为了掠夺更多的稻谷，他们霸占土地，残害农民，实施严酷的“米谷统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霸占良田强行米谷统制

日本侵略者垂涎天津这片肥沃土地为时已久。早在“七七”事变前，它就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控制了冀东。随后，又指使汉奸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 22 县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从而使它可以在包括天津在内的冀东为所欲为，在“善邻友邦”、“共存共荣”的幌子下，公开进行经济侵略。他们用低廉价格收买大片农田，组织各种农业经营组织。据史料记载，天津东南的“宁河县属之大北涧十八村土地肥沃，兼有三河汇流，……最宜种稻，早经垦作水田，享有厚利。倭奴于十年前（1936 年）组织冀东政府时，查知大利所在，强占民田十余万亩，且招韩农（朝鲜农民）千数百家为其佃户，……造成肥美稻田约有六十华里面积……迫令每亩领价一二元不等，当时已熟稻田每亩价值千元内外，早苇各地每亩价值四五百元，所有十八村三千余户，丁口一万余人，均不领价。倭奴拘各地户，……勒令出售，村民以生命危险，不得已而领价者有若干家。”

又载：“（日本人）以五千万日元在天津组织大众农业公司，并于军粮城、北塘附近租妥农田三万亩，津塘一带沿海河两岸膏腴之地……多被日人买去。”

日本驻天津的领事馆也直接插手掠夺这块肥美的土地，它们在津设立了“华北农场试验所”，从事巧取豪夺。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更以征服者的姿态大举侵占农田。日本特务机关和伪政权下的保甲组织专门建立了“土地调查委员会”，强迫农民按户登记土地，以便根据需要实行强买强占。一次，日本人长谷部义范等人看中了天津县梨园头村的大块土地，在日本军队的胁迫下，无代价地圈占了民田 2000 多亩，开办了“长泰农场”。这是日本侵略者强占民田的许多暴行中的一个例子。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几年内，日本人就抢占了 92.17 万亩良田，约占当时天津县、宁河县两县耕地面积的一半。

日本侵略者攫取农田后，建立所谓“米谷统制”制度，对水稻的种植收割到征购、配给、运输多环节全面控制。他们推行“米谷统制”是采取经济垄断和军事统治并行手段。他们组建了华北垦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米谷统制协会作为垄断天津大米生产和销售的组织。当时，日本人在天津一带共办了 120 个农场，这两大垄断集团除直接经营农场外，还控制了绝大部分日本其他集团和个人经营的农场。日本侵略者办农场的办法是将大批破产的当地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迫令“游民”“垦荒”为他们纳租。还从朝鲜大量移民为其垦植。此外，在农忙时那些被抓起来准备送到日本和“满洲国”当劳工的中国人，也要拉到农场为他们干活。为提高稻谷产量和质量，他们将稻种贷给农民，秋后新稻谷全部由华北垦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米谷统制协会强行征购。

《档 20 宗，1946 部》存天津市档案馆。

《中国农村》2 卷 12 期第 5 页，1936 年 12 月。

他们不许农民吃自己种植的稻米，而要农民吃他们配给的劣质粮食。他们给农民发放粮食配给卡片。卡片上记载农户户主姓名、家庭人口、租稻田亩数、出售稻谷数量和配给的粮食数量等。农民凭卡一月购买一次配给粮、火柴、肥皂、煤油等。配给粮都是掺有沙子的豆饼渣、变质的军马料、腐烂的杂粮磨制的混合面，不仅难咽，而且时有食后中毒亡命者。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完全成了毫无自由的奴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军需供给更趋紧张，他们进行“米谷统制”的手段也更加残酷，由经济垄断发展到军事统治。1943年8月，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以军事头目为主体的天津米谷统制会。该会事务所在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内办公，下设天津、军粮城、咸水沽、小站、葛沽、芦台六个支部；并在北京设置了事务所、河北昌黎设置了支部。在各河川地区又设置了农事合作组织。该会有属员近千人，重要职务全部由日本军界和华北、天津伪政权的要员担任，如日本北支派遣谷第4201部队高级参谋出中正司、天津陆军联络部长松井熊次郎、谷第4203部队队长井上太三郎、天津宪兵队长笠原一郎、伪河北省政府省长陈曾拭、伪天津特别市政府市长张仁蠡等任顾问；天津日本总领事馆总领事太田知庸任委员长；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经济课长、商务书记官加藤日吉任副委员长。从组织成员情况可以看出，天津米谷统制会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经济组织。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用“以华制华”的卑鄙伎俩，在米谷统制会下建立了反动汉奸武装组织“勤农训练队”。勤农训练队总队长、分队长、小队长职务由日本人担任，队员大都是当地的地主、流氓、地痞无赖。他们在米谷统制会的指挥下对稻农耕种、收割、运输、交粮进行控制监督。监视稻农是否用日本稻种、是否按时插秧、施肥、用药。秋收时，地头、稻场上都有勤农训练队检查巡视。农民交粮时，由勤农训练队武装押运，还在要道路口建卡设哨。这些汉奸走狗，横行乡里，打家劫舍，强奸妇女、杀害百姓，为虎作伥，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残害农民的刽子手。日本侵略者还拿出一定“犒赏”让伪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他们充当帮凶。傀儡政权天津特别市政府市长张仁蠡曾专门下令伪警察局对推行“米谷统制”要给予“特别援助”。

二、米谷统制下的累累罪恶

天津米谷统制会每到收获季节，都要制定收买“实施要领”，对收买方针、收买机关，收买时间、地区、目标、方法，收买品目等作出详尽规定。昭和十八年（1943年）的收买实施要领规定：“非指定收买商社或该社之收买人，不得收买收卖。凡违反本统制者均依照日华官宪之规定处罚之，且其违反物之米谷没收之。”昭和十九年（1944年）的收买实施要领中又规定：“鉴于从来之状况，天津市、塘大地区已流入敌区甚多，故于市、县境及主要道路、河川、要所设立临时检问所，实施严重取缔移动，特别对于天津市大宗暗盘收买者更加严重办理。对于米谷收买集积地及种米地带周边等主要地方，实行分驻游动警备。违反事件发见时立即出动或处置之。”每到收获季节，日本人总是由日军武力协助，把农民辛勤种出的稻谷抢劫一空。仅1943年天津米谷统制会制定的稻米征收目标就达六万吨以上。

日本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榨取，使天津农业生产逐年下降，农村经济萧条，农民生活日益困苦，连最低生活也难维持，只得以野菜充饥。许多农民倾家荡产，流落他乡。每年冬春之交，许多农民因饥寒冻饿而死。在日本农场服役的农工更是苦不堪言，他们每日被迫在稻田劳作十二三个小时，农忙

季节更是不分昼夜。农工劳动全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按规定进行，稍有差错，就以“故意破坏军谷”生产论处，轻者处以劳役，重者由护场队施以酷刑，甚至枪杀。农工住的是冬不避寒，夏不挡雨的窝铺，吃的是连牲口都不闻的混合面。农工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种稻子的农工玩命干，整天吃的是猪狗饭，顶着星星来，扛着月亮散，小日本的军谷是农工的血和汗。”

为了防止农民“偷吃”稻谷，日本人将各村的碾米工具砸毁；在路上设岗检查过往行人；有时夜静三更还观察各户烟囱，看到冒烟，就入户检查。一旦发现有吃稻米的，就处以重刑，甚至打死。咸水沽的王家场村，有一刘姓妇女丈夫死后，与独生女儿相依为命。1942年10月，刘因病数口米水未进，女儿到地里拾了一篮子稻穗，回家捣成米，给母亲熬了一碗稀米糊，又找乡亲借了点钱，架着母亲到咸水沽镇看病。走到花店桥附近，正遇日军检查，日军抓住刘，不问青红皂白便向嘴里灌了稀屎，刘一阵恶心，吐出一些稻米饭粒，日军大吼一声，向刘的腹部捅了一刺刀，顿时鲜血四溅。日军拉住痛哭的刘女，将其扯进桥头的水车房里强奸。刘女悲愤至极，一头扎入河水自尽。日本侵略者就连为他们办事的乡保长也不放心。一次驻芦台的日军召集会议，请他们喝茶吃点心。日军事先设圈套在茶水中放了药，乡保长喝完茶后全都呕吐。日军一见吐出来的有稻米，便——处置，许多人被灌了凉水，遭了毒打。

然而，帝国主义的暴戾恣睢，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在艰难悲惨的岁月里，被压迫的天津农民还是作了在当时条件下可能进行的抗争，他们千方百计让稻谷减产，如破坏新稻种试验，造成稻秧短缺；故意不把化肥撒均匀，甚至将整袋子的化肥埋入地下；浇灌时掘堤放水；收割时不割干净，打捆时不捆紧，丢下大量稻穗；捋稻子时只捋稻捆外面不捋中间；扬场时把饱满的各粒洒到稻壳里；运输途中趁日本人不注意往路旁的沟里扔粮包。机米厂的工人则消极怠工，破坏机器、制造故障。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人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李文芳）

掠夺祁县人民的口粮

祁县是晋中平川经济发达的县份，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业是经济中居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的生产项目，生产玉米、谷子、小麦、高粱、山药蛋等粗细杂粮，并有大豆、芝麻等抽料作物。全县耕地面积在抗日战争前后达40多万亩以上，河渠系列水田面积占15万亩多，自古迄今都是山西省主要产粮地之一。抗战爆发前，正常年份各类粮食产量6000万斤左右，人均粮食500斤以上。粮食作为祁县居民尤其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除食用外，一般转入商品贸易的粮食占全产量的15%—20%左右。外地客商大户一次购买粮食可达十万至数十万斤，每年有400万斤左右粮食销到外地，本地粮食储备据1934年对民间社仓调查，有146座，存粮140多万斤。所以，祁县是一个自给有余的农业县。

日本侵入祁县后，占据了城镇和平川富庶地区。军事上，这里是同蒲、白晋两条重要交通线的结合部，是控制晋南、晋东南的要地；经济上这里可以掠夺物资和财富，向中国老百姓榨取粮食等物资。所以，日本侵略军对祁县极力加强军事占领和法西斯统治，设碉筑堡，派兵驻扎，严密防守，以使之成为法西斯的所谓“治安模范县”。特别是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出于战争经济的需要，把对占领区的统治变成“建设大东亚战争后方基地”的资源掠夺体制，在祁县更是以粮食为中心，不择手段地实行全面掠夺。日伪当局曾宣称：“谁得到粮食谁就能得到胜利。”伪政权的首要任务即是征粮夺粮。伪县长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叫嚣：本县县政会议的主要工作，第一就是催收杂粮，力求达到100%的目的。

日军对祁县的粮食掠夺，体现在侵略军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他们实行所谓“一体化”、“总力战”，军（日伪军）、政（伪政权）、警（警察）、会（新民会）、社（伪合作社），通力合作，互相配合，像恶狼，成群结队，向农民张开血盆大口，猛扑过去，征粮、骗粮、抢粮，对抗日根据地则烧粮。在掠夺粮食的罪恶行动中，日军是罪魁，每年收获季节，他们都组成凶残无比的“督励班”，由一部日军为主，率伪军政警人员，分赴各村活动。“督励班”无恶不作。所经之村，农民血汗换来的收成尽落魔手。1942年秋，日军向祁县所属4个区派出“督励班”，每“班”除日军外，有伪警察20人，伪军1—2个小队，武装配合伪政权、伪合作社掠夺粮食，给祁县百姓造成巨大灾难。

日军掠夺粮食，采取“竭泽而渔”的摧残性政策，把富裕的地区变成饥民饿殍遍布的人间地狱。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抢掠粮食总量达15000万斤以上，烧毁或损毁粮食达1亿斤左右，加上其他财产损失，10余万人口的祁县，每个百姓平均被侵略军掠夺粮食2500斤以上。

日军的“模范治安县”，掩盖不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日益贫困的“王道乐土”，更激发人民群众抗击法西斯的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祁县人民在敌后坚持正义战争，依托山区建立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在平川开展反掠夺斗争。当时，祁县境内形成了三类地区，即敌占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和敌我双方力量都可达到的交叉区。然而，对日本法西斯来说，它所要奴役和掠夺的是自己可能到达的所有地方；要榨取的是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百姓。所以，不论是哪一类地区，他们都要掠夺、破坏。

在敌占区，日本法西斯用武力和刺刀建立血腥统治，掠夺的特点是，彻

底垄断、全面统制；超额派购，廉价攫取；重税折实，无偿劫掠。

粮食统制，1942年8月1日，日伪华北物价处正式提出了“稻米统制要纲”。1944年前后，日伪军的粮食来源日枯，供不应求，进而又对小麦、杂粮实行统制。每到夏秋收粮季节，日伪政府不仅下达命令，分配任务，以武装力量强迫农民到指定地点交纳粮食，而且对市镇粮食的经营活动也严加限制，进而全部禁止。1939年7月规定：不经批准，粮食不准外运出省。1942年又对粮食在省内的经营、运输全面统制，不准私营粮商经营贩运，不准城市商民私藏粮食，凡存粮超过半年的就要严厉惩处。日军统制和垄断的结果，城乡粮行全部倒闭，民间存粮一扫而空。1941年社仓只剩下22座，存粮只有992石。1942年以后，全部被掠夺。民间积谷制度随之消亡！

粮食派购。就是用军事和行政力量廉价夺取粮食，于1940年开始实行。根据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小麦杂粮收购要纲》的要求，日伪县政府按粮食播种面积，估计产量，确定收购总数，然后逐级摊派到户，限期交纳。同时还规定了赏罚条例：第一，凡隐藏粮食不能按期交售的，以刑事犯罪论，并将所有粮食全部没收；第二，对按期交售粮食的农民发给证明书，由日伪合作社配给一些棉布、火柴、食盐等日用品，以粮款数计算配给的款额，且数量一少再少。据统计，1940年配给品的款额占到售粮款额的60%，1943年下降到40%，1944年仅为30%。以低价收购粮食，高价配给日用品，剥削农民。派购收回的粮食，主要保证日军的需要，因而控制特别严格，并按所谓“中央优先地方”的原则，划归“华北平衡仓库”，供侵华日军使用。

日军粮食派购估产数往往高于实际产量数，以高额高比例硬派强征，加大人民的负担。据祁县同蒲铁路以北地区的80多个村庄统计，粮食产量估高到5000多万斤，征购量则达到2000多万斤，占到40%左右；而以当年实产量计，派购额高达60—70%。用如此方式向老百姓强征粮食，可知侵略军的贪欲多大。1944年日伪资料反映，该年度夏季征购抢粮（大麦和小麦）300万斤，秋收派购抢粮1000万斤，两次合计1300万斤，占平常年景全部产量的25%，但当年减产和受战争破坏影响，根本达不到平常收成，实际征抢粮食比例远远高于25%。

日本侵略者统制和派购粮食，就是压价收进，高价卖出，名为收买付款，实际变相夺取。在1944年日伪《粮食收买要纲》中规定，华北地区小麦每百公斤收买价165—200（伪币）。杂粮价格，以小麦价为100%按比例折合：小米折为83%；谷子折为54%；高粱折为40%；玉米折为70%。日伪的官定价格与当时粮食市价比，二者相差甚远，1市斤小麦官定价格是0.85—1元（伪币），小米折小麦83%。每斤价格只有0.6—0.8元左右，而当时居民买小米每斤1.4元。随着伪币低跌，最低时日伪官定价格仅为市价的27.1%，白白夺走了农民一半或2/3的汗水所得。

重税折实，表现为“以粮代税”。1942年以后，日伪又在派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粮代税”的办法，扩大掠夺数量。山西日伪政府明知本省产麦较少，却把税收的标准定为小麦，规定每亩麦田交纳小麦15公斤，不产小麦的地区，按粮种折合，其比例为：每100斤小麦折谷子160斤，折小米120斤，折其他杂粮200斤，交纳日期分“上忙”和“下忙”两期。6月1日至8月底谓之“上忙”；10月1日至12月底谓之“下忙”。农民心须按规定限期交纳，过期课以510%的滞纳金。根据日伪田赋额与战前期间的最高田赋额相比，1936年祁县为85625元，1942年日伪山西省政府下达额是106795

元，祁县实际解省数为 94778 元，为战前的 111%，而当时敌占区面积比战前面积小得多。其税额折算粮食以每 4.6 元计，等于无偿掠夺农民粮食 15000—20000 石，约占总产量的 10%。

在游击区和双方交叉区，日军主要靠武力抢骗。以掠夺为目的收刮粮食。主要特点是征抢并用，既骗复夺。抢，一是制造借口，滋生事端，以抢粮、交坏粮等名义强行“没收”。1942 年夏天，峪口村被没收小麦 22 石，中梁村 30 石，北团村 60 石，北梁村 70 石，4 个村就被“没收”小麦 182 石，约 25000 斤；二是武装出动，对数个村甚至十数个村大范围搜粮，1942 年秋天，日伪军确定以大韩、段家窑、南社 3 个村为武装征收区。10 月 12 日对山地上、下八洞等 6 个村武装出动抢粮 10 余次。骗，是重复派购，先诱交再加额。1943 年，后营、南社两村刚分别交纳完 102 石、400 石的派购粮，日伪军又给两村各下派 40 石的新额。如果骗不成，就硬夺，西管村已交清了派购粮，敌人找借口到村里没收了一次，不讲任何道理就把粮食抢走。1943 年秋，北建安一带的村庄，日伪军不管多交少交，挨村挨户普遍“没收”，穷富不论，见粮就拿。

对抗日根据地，日军实行的是“三光”政策，既抢又烧，肆意破坏粮食生产，企图致抗日军民于饿死困死之绝境。1940 年后，日伪军在根据地的抢粮活动，结合“扫荡”、“清剿”、“蚕食”等进攻，连续不断地进行。1943 年，日伪军联合进攻根据地 175 次，伪军警单独活动 105 次，合计 280 次，几乎天天到根据地捣乱。日伪军抢粮不只在收获季节，更恶毒的是春耕秋播期进行有目的抢掠。粮食、种籽、牲口一起抢，全力破坏农业生产。1943 年 4 月 25 日、27 日，日伪军对君寨、砖八洞等村袭击 2 次，抢去谷子 6 石，莜麦 7 石，山药蛋 1500 多斤，把老百姓种籽抢光。1944 年秋，正值秋耕之际，日军一次就抢走南羊圈村耕牛 30 多头。1945 年春，日军在黑峰行政村扫荡，把正在耕地的牲畜成群抢走。日军时祁县的粮食掠夺及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给祁县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

日军侵占土地修碉堡挖封锁沟，滥用民力，直接间接对祁县农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日军抢掠各种财物的重大损失。以折粮计算，金银 20688 两，折小米 2533357 斤；衣物 76102 件，折小米 2197750 斤；用具 771404 件，折小米 1705378 斤。三项共折粮 6436455 斤。

日军不但抢掠粮食，榨取祁县人民的血汗，并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同蒲铁路以南地区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杀死，投毒死亡和病死饿死人数达 3589 人；被抓丁抓夫或逃难外出下落不明者 682 人，共计 4271 人。同时，被日军折磨致残者 364 人，长期患病者 368 人，无衣无食无房屋的难民 2744 人，合计 3476 人。

日军对居民生产生活基础物资造成的破坏，仅房屋和牲畜两项分别是：房屋烧毁 3644 间；烧损需修理者 2818 间；牲畜损失 1440 头，分别占战前总数的 1/3 以上。

日军对祁县的粮食掠夺和侵略战争的破坏，使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年年缺粮闹饥荒，但日伪当局仍然疯狂地征派抢掠粮食。处于水深火热的祁县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剥削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中共祁县县委党史办郝仙槐翟相卫）

在东北强征粮食

日本帝国主义为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早在 1937 年春就由伪“满洲农业政策委员会”决定对稻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实行“购销”“统制”政策。次年 11 月公布了《米谷管理法》，规定以稻米为主的粮食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政府控制。1939 年 10 月又公布《主要特产物专管法》，对油料作物实行垄断，进而又实行了残酷的“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政策。对东北农产品实行全面垄断，强行征收或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压缩居民粮食销量。“粮谷出荷”（强制征购粮食）就成为套在东北广大农民脖子上的枷锁，给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开始，为引诱农民交售粮食，伪满当局推出了“出荷奖励金制度”。秋收时节，以粮食每百公斤计算，凡在 10 月出售者奖 1.20 元，11 月出售者奖 1 元，12 月出售者奖 0.8 元。但农民对这一措施反应冷淡，粮食征购并未达到预期的数额。伪满当局又代之以“预约契约制”（又称先钱制度）。办法是：春播时按播种面积确定一个基本的农产品“出荷”数额，按每百公斤给 1 元定钱，同农民签订契约。订立契约时，由于伪满政府人员欺骗诱导，或者代替不识字的农民签字，多报“出荷”量，结果农民往往不能兑现契约，因而遭到迫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把掠夺粮食列入“物动计划”中，不管农民种植粮食的面积与产量，而是单凭战争需要强行征购，即“战时摊派制”。对农民粮食的掠夺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每年春季，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都要召集伪省长会议，确定该年度各省粮食的出荷量。他说：“当亲邦进行大东亚圣战的时候，满洲国的主要国策就是竭尽全力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来支援圣战，这是中央和地方官吏应尽的责任，也是满洲人民应尽的义务”，要求“在战时体制下，人民必须忍受一切痛苦，多出一粒粮谷就是增加一粒子弹”。伪省长为向日本主子邀功请赏争相表忠心，不断追加数码，把灾难强加在广大农民身上。

1942 年金名世任伪吉林省长，行前武部六藏亲自训示：“吉林省是谷仓地带，担当粮食出荷的数量最大，占全国的 1/5。吉林省出荷好坏，是与满洲国协助大东亚圣战有重大关系，希望你到省长任后，务须特别努力，一定要完成每年所指定的出荷责任量”。金名世到任后，马上用两个月的时间，亲自到各县旗，督励征粮，连续两年提前完成“出荷”量，还追加了 10 万吨“报恩粮”。为此，武部六藏大加褒奖：派红包，送锦旗，鼓励各伪省长效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其他伪省长也纷纷加重搜刮地方，讨好上司。伪滨江省人口 500 万，年产粮 200—220 万吨，但粮食“出荷”就达 120 万吨。

农民口粮一年短缺 50 万吨。该省伪省长王子衡因在收缴“出荷”量之外，多次追征“报恩粮”，深受武部六藏的赞许。该省双城县伪县长王奉璋残暴无比，惯用木棒殴打无粮可出的农民，人称王大马棒。他还介绍经验说，农民不打不交粮，一打粮食就出来了。由于他心狠手辣，压榨农民手段残忍冷酷，所以，无粮农民被逼典当物品，再从黑市高价买米“出荷”。

伪四平省是主要粮食生产省，但“出荷”成绩一向不佳，日伪遂调得力干将曲秉善任职催征。曲行前亲自聆听武部六藏的训示：

金名世：《收买伪省长掠夺粮谷》，孙邦主编《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第 179 页。

金名世：《收买伪省长掠夺粮谷》，孙邦主编《经济掠夺》第 179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子衡：《为“圣战”掠夺粮谷》，同上书第 223 页。

“去年由于办理的不当，没有完成中央的要求。你必须改善以前的办法，务必完成中央指定的粮谷出荷量”。曲到往后，多管齐下：一是派出伪官吏、警察组成“出荷”督励班，下到各县村屯，领导督促各地交粮；二是拉拢县府大员和街村小吏，每个伪县长各奖500元，街、村长“出荷”有功者授予奖状、奖杯；三是指示协和会专门组织“白旗出荷青年行动队”，对农民打场、装车、运粮等秋收作业环节都插上白旗进行全面监视，统一行动，实行集体“出荷”，防止农民隐藏粮食。由于曲秉善搜刮有术，当年伪四平市不但完成了定额，还追加了5万吨“报恩粮”，曲秉善也从武部六藏那里领取了3000元的奖赏。

伪满掠夺出荷粮，由政权机关、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三位一体紧密配合。政府机关负责领导，督励；协和会负责监视、宣传；兴农合作社则负责具体征购。他们对农民的迫害直接反映在督励人员的暴行上。

秋收时节，省县一级的伪官吏、伪警察几乎全部人马都编入“出荷”督励班，下派到各村屯，同伪村公所职员、村丁一起逐村逐户地催逼交粮。村前屋后，掘地三尺。翻到农民埋藏的粮食后，农民轻则挨打受骂，重则判刑治罪。伪警察还在交通要道和路口设关卡，搜查车辆行人，一旦发现携带谷物，货即没收，人即受罚。整个伪满农村“出荷”督励班足迹所至，暴行累累。

1942年11月18日伪林甸县副县长日本人中村茂率领20多人的“出荷”督励队来到新生地保生甲，召集村长和各甲甲长全部到村公所听中村训话，下令各甲长回去催粮，有多少交多少，交多的甲长有赏，不交的唯一甲长是问。有一个甲长说：“全屯一粒粮也没有，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哪有粮交？”中村一听勃然大怒，一边吼叫着：“你的粮食的不交，死了死了的有！”一边抓起木棒朝这个甲长头上打去，打得他太阳穴破了一个鸡蛋大的窟窿，血直往外喷，人昏死过去。其他甲长吓得腿直打颤，乖乖答应即刻回去催粮。第二天，中村领人到了保生甲。他把全屯百姓集中到场院，威逼大家交出粮食。人们说：“家里连吃的都没有，让我们交什么？”中村头一横，“不交的不行，不交通通地打”。喊了半晌，见无人答话，中村就点一个大户王金山的名字，想让他带头交粮。碰巧一个贫困户王青山听错了名，应声而出，勇敢地说：“都几天没吃饭了，用什么交？”督励队副队长贞包（朝鲜族人）窜上去照准王的后脑就是一棒子，当场就把王青山打死了。王青山的亲属上前抱尸恸哭，在场的乡亲也十分悲愤，哭声、喊声响成一片。打手们立即冲上前连踢带打，不许人们哭丧。中村又乘机威胁说：“粮食的不交，通通死了死了的有！”

中村领人挨家挨户搜粮，一连搜了几家，没翻到一粒粮食。中村气急败坏地下令点火烧房。刘德志家三间草房被点着了。刘家子女和亲友正想冲进屋里往外抱东西，被狗腿子迎头一顿木棒打回去，眼睁睁看着房子和里面的东西化为灰烬。

日本侵略者“粮谷出荷”，野蛮地从东北农民口中抢走了他们赖以维持生命的粮食，使千百万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14年中，东北究竟有多少农民死于侵略者的“粮谷出荷”，已无法精确统计，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桦南县幸福村农民牟金顺种租日本开拓团 2 垧地，每垧地地租 1.1 石，秋后收粮每垧 2000 多斤，交租 770 公斤，“出荷”粮 350 公斤，剩下的口粮，种子已经不足。搜荷班搜出埋在地下的粮食后，又逼着交了 250 公斤。王贵一家“出荷”后，再无一粒粮食，只好靠吃野菜、豆渣度日。四月的一天，误食灰菜中毒，一家 7 口人全都脸青头胀，3 天后，7 岁的小儿子死去。到冬天，王贵典当几件破衣服买点玉米，准备磨点面卖饼换糠麸糊口，被警察发现，认定王贵私藏粮食，犯了“国法”。王贵苦苦哀求，警察凶狠地在王贵背部砍了一刀，王贵当场口吐鲜血昏了过去，就此卧病不起。不久，全家唯一能劳动的大哥冻死，老伴病死，大儿子被抓去当劳工，王贵只好忍着病痛逃难他乡，不知所终。1942 年伪三江省鹤立县 300 人因无粮自杀。伪佳木斯市郊一农户全家 4 人无粮绝望自杀。5 月 1020 日这 10 天中伪望奎县山头村五户农民中 30 人无粮自杀。生活无着落而逃荒的人也越来越多。1943 年初伪三江省勃利县三合村 14 户农民 100 人断粮挨饿，只好迁往他乡觅食。5 月，伪奉天省新民县后营子村粮食匮乏，连野菜也难采到，整村男女老幼相携乞讨。10 月伪营口市有 268 户共 1989 人因无粮而迁往外地求生。11 月伪清原县约 520 户农民 2500 人苦于无粮而逃荒。12 月伪辽阳县约 400 户农民 1700 人饥饿难忍成群结队向北安方向乞讨觅食。

这只是一些零星的事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给中国东北农民造成了多大灾难。

（于庆祥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掠夺琼崖铁矿

海南岛，又称琼崖，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是我国华南和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素称“天然资源宝库”。1939年2月，为实现“南进”目标，取得海上封锁作战基地和获得海南岛的地下资源，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海南岛。日军一方面推行血腥的殖民统治，不断强化军事占领；一方面设立“经济局”，拟定所谓“开发”五年计划，着手全面掠夺战略资源，把琼崖变为它的物资供应地，以支持其长期的侵略战争。

琼崖铁矿资源丰富，“有世界良质铁矿（含铁量57%），是建造舰艇用的最好钢铁原料”，为了掠夺这一资源，日军相继兴建了石碌铁矿和田独铁矿，残酷役使劳工，犯下了滔天罪行。

石碌矿区位于海南岛西部，是一个铁、铜、钴等多种金属矿区，尤以丰富的富铁矿著称（最高含铁量达68%）。矿体北起石碌河，南至羊角岭，西起石碌岭，东至红头山，方圆16平方公里，主矿体分布在今石碌镇正南一公里处。

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曾在该矿区开采过铜矿；1935年，国民党琼崖实业局派员调查铜矿，发现了铁矿，计划开采。但一直未实施。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者曾派遣谍报人员到琼崖刺探资源方面的情报。日军侵琼后，立即派来中桥本多地质调查队和“日室海南资源调查班”，进行地下矿产资源勘探，于1940年4月在石碌发现矿床，当时推定储藏量达到4亿吨（实为3.14亿吨），品位之优为世界罕见。于是，同年6月日本政府授命“日室素肥料株式会社”（次年改名“日室海南兴业株式会社”，社长久保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开采。日本侵略者曾制定每年递增100万吨铁矿石的掠夺计划，预定分三期实现，第一期年产铁矿石100万吨，第二期年产200万吨，第三期年产300万吨。

日军出于侵略战争需要，把掠夺石碌铁矿作为“当务之急”，在日政府的再三督促下，驻守这一带的日军横须贺镇守队第四特别陆战队（简称横四特）司令极垣亲任现场开发督战队队长，指挥军队将管辖处的居民强行逐出，征用各地劳工，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突击动工，建港口、筑铁路、开矿山。

曾任北黎日室公司庶务课长的日本人河野司在其《海南岛石碌矿山开发记》中称：“海南岛石碌矿山的开发是在大东亚下，南方地区的最大开发企业”；“从日本来的工作人员有四千余人”，可见日军对该矿的重视程度。为掠夺石碌铁矿，日军先后共投资2.2亿日元，占其在琼矿业总投资的80.4%。1940年10月，开始兴建八所港码头（两个五千吨级泊位之一作输出石碌铁矿用）；1941年，石碌铁矿投入生产；1942年4月，石碌至八所53公里铁路线通车；同月，铁路第一次运出铁矿石，八所港第一船矿石出港；至1944年2月，在14个月里，为抢运铁矿有41艘矿石船驶往日本。此后，由于盟军飞机的空袭，矿石输出日渐减少。至1945年1月，因海上交通被盟军切断，矿砂不能运出，石碌铁矿被迫停产。据统计，在整个开矿期间，共采掘铁矿695274吨，掠运日本694945吨。其中：1941年开采5000吨，运走1620吨；1942年开采95724吨，运走96690吨；1943年开采393553吨，

王伯符译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琼内幕》。

〔日〕河野司：《海南岛石碌矿山开发记》序文。

〔日〕河野司：《海南岛石碌矿山开发记》。

运走 397855 吨；1944 年开采 200997 吨，运走 198780 吨。

日军的野蛮洗劫，给矿山造成极大的破坏。

田独矿区位于海南岛南部崖县榆林港东北处（今三亚市田独镇东南黄泥岭西北山麓），为一中型富矿，含铁 58.29%。

日军侵占海南岛后，1939 年 3 月即派海军特务部北浦大佐带领地质队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资源调查，发现了田独铁矿资源。后又派“石原株式会社”技师松山到田独详加复勘，勘查结果认为，该矿区储量虽不多（当时估计只有 150 万吨，实际上为 500 万吨左右），但质量优、品位高。因此，日本政府授命“石原株式会社”投资开发，先后分三期进行掠夺性开采，为运输矿石并专门修建田独至榆林港 11.5 公里铁路线。

石碌和田独铁矿的劳工来源很广。外国劳工有从朝鲜、印尼、印度等国抓来的。中国的劳工主要来自台湾、上海、广州、汕头、厦门、青岛、香港、澳门等沦陷城市，绝大部分是失业工人和学生，也有 10~12 岁的重工。这些劳工有的是日军直接或通过伪政权用暴力手段抓捕来的；有的则是利用日伪机构在各地开设各种承包公司，用欺骗的办法“招”来的。如上海的吴淞劳动部、香港的合记公司就是他们的“招工”机构。他们张贴广告，到处宣传，说：“到海南岛做工好，每日三餐吃得饱，还有椰子、菠萝，每月另有 21 元（日本军票）工资，去时还有 30 元安家费，一年为期”等等。据当时被日军从台湾抓来幸存至今的老工人们回忆，那时日本人在台湾以招工为名，说来海南做工，每天工钱两块日元，时间半年。这样，处在侵略者铁蹄下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劳苦人民，许多人上当受骗，签了合同书，然后一个个被塞进“猪仔仓”船运来琼崖。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利用欺骗和暴力手段抓来的外地劳工先后有 68 批，每批约 300~500 人，共 25000 余人（仅 1940 年 8 月一个月，由香港入岛的劳工就有 2700 名）；加上日海军特务部在海南岛各地通过日伪县、乡、保政权强抽的 1 万余人，总计 4 万余名劳工。

从各地来的劳工分别被驱赶到矿山、码头、铁路和电厂等处做苦工。日本侵略者掠夺石碌和田独的矿产资源，是以半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进行的。当时，矿山运输系统大部分未建成，电铲设备仅用于开拓层面及公路，对于生产层面的矿石采掘及装车，全部靠劳工体力来完成。人力装车后，用卷扬机运往矿仓，再用 20 吨矿车运往八所码头。由于生产流程比较简单，劳工的劳动强度极大，并随着日军的加紧掠夺而不断加重，每天劳动时间长达 11~14 个小时，矿工每人每天要挖矿石 8 吨，运矿工每人每天要抬矿 4 吨，挖土方每人每天要挖 5 立方米，完不成任务就不给饭吃，或遭毒打。

日本侵略者还收买一批汉奸、卖国贼做总管、头目、二手等，充当他们的鹰犬。在日军派遣队和工头的残酷统治下，劳工们进矿山犹如进了阴森恐怖的地狱，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他们穿的是麻布袋和洋灰袋做的衣服，吃的是黑糊糊的饭团，住的是几十人挤在一起的茅棚和临时帐篷。每天天不亮，工头就吹起哨子，手拿皮鞭赶劳工下床，点名上工，病了被看作是偷懒，不给饭吃，还遭毒打；染上传染病便被活埋或烧死；逃跑抓回来或者捆绑毒打，或者立即枪毙。劳工王茂松得病未死，日军见再也榨不出油水，命令抬去埋

《海南铁矿志》（1939—1983）第 5 页。

《八所港史》1963 年本。

《海南铁矿志》（1939—1983）第 4 页。

了，他在担架上枯黄的面孔被眼泪所浸湿，但抬到坑边，也和死人一样被毫不留情地抛入坑里活埋了。1943年秋，两个因劳累无法忍受的广州人，趁黑夜逃跑后被抓回来，总工头把劳工集中起来，当众就将这两个劳工斩首（地点在今河南市场西侧），并声称如果谁想逃跑，就是这样的下场。当时对付劳工的十大刑罚有：（1）水电交错；（2）“吊飞机”；（3）折骨；（4）割筋；（5）狼狗咬；（6）滚水浴；（7）当活靶练刺刀；（8）鞭与棒；（9）半截活埋；（10）砍头。此外，还有电牢、火牢、水牢、狱牢等等名目。

劳工们起早摸黑地做苦工干重活，可连肚子都填不饱，特别是1943年后更糟，日军名义上规定每个劳工每天配给三两二钱米，实际上经常用玉米、蕃薯干和南瓜代替，还被总管、头目、二手和饭堂层层剥削，到工人口里的粮食就更少得可怜了。由于劳动强度大、伙食差、环境恶劣、气候炎热、饮水不卫生，因此矿区发病率、死亡率很高，常见的是发高烧、下痢、烂水脚等，许多劳工因劳累生病、惨遭毒打后浮肿、伤口发炎无法治疗致死。对死亡的劳工，开始还能一个一个地火葬，后来死人多了，专门成立一个埋尸班，每天要挖一个坑，把所有死亡的劳工扔到坑里，然后放火烧，烧死尸的地点有两处，一处在今石碌西桥，一处在钢铁厂高炉处。

从大陆沦陷区来的劳工，最不幸的是女青年学生。1942年春后，日本侵略者在石碌矿山脚个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以招护士、女工等为名先后从大陆骗来300多名青年妇女强迫送进“慰安所”作慰安妇，她们中，大部分是大学生和中学生，日军在周围设置了森严的警戒网。来“慰安所”的都是日军官兵和工头，慰安妇在接客时稍有怠慢，便惨遭毒打，许多人被折磨至死。一个来自香港叫黄玉霞的慰安妇，因不堪凌辱，乘夜深人静在一棵弯弯的大树上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逃出苦海后，却无颜再回家，从悬崖上纵身投海，沉尸异乡。到日本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人。

1944年，惨无人道的日军制造了“十所大屠杀”事件。原来日本侵略者在八所村办一“富民公司”，内设茶室、赌场、烟馆，以供头目、二手等享受，后来对外也开放，只要有钱不管什么人，包括一般劳工都可以进入。这年秋的一个晚上，日军借口说有游击队潜入活动，将整个村包围起来，一下抓走100多人，除个别头目被保释外，其余的于翌日夜里被用汽车拉到十所桥附近秘密枪杀。

在日军侵占的六年中，石碌铁矿劳工病死、饿死、被打死、烧死、活埋的，不计其数。到日本投降时，原4万余名劳工仅幸存5803人。1945年平均每日死亡达8人之多。日军使用法西斯手段掠夺资源，致使无辜的劳工惨遭杀害和深受磨难。据老人们回忆，直到解放后的1952年前后，在石碌山半山腰，还能看到当年死难劳工的累累白骨，令人触目惊心。

《昌江文史》第2辑第45—46页。

《海南铁矿史》第二章第三节。

《日伪时期石碌铁矿死难矿工纪念碑碑文》，1965年10月1日立。

地点即今石碌河南派出所和县供销贸易公司的所在地。

何十里：《石碌铁矿“慰安妇”调查实录》；《石碌铁矿史》第二章第五节。

《昌江文史》第2辑第46页；《八所港史》1963年本。

《海南铁矿志》（1939—1983）第6页。

田独矿 1944 年 5 月份有劳工 7940 人，到 12 月份仅存 5792 人。据不完全统计，田独矿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 5 年多中病死、饿死、烧死、打伤、活埋、枪毙的劳工共有近万人之多，都埋在田独村旁的土坑里，人们把它称为田独万人坑。这个“万人坑”是日本军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杀害中国人的历史见证。

田独铁矿从 1939 年动工，1940 年投产。日军先后投资 2000 万日元，占其在琼矿业总投资的 117%。到 1944 年共开采矿石 2691623 吨，掠走 2687689 吨。1944 年因盟军飞机封锁而停产。

日军在占领海南岛期间，从石碌、田独两矿总共掠夺了矿石 338 万多吨。

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海南资源特别是铁矿资源犯下了滔天罪行，是日本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1945 年，王钦寅编著的《琼崖抗战纪》一书叙述日军在琼“掠夺矿产及物资”情况时写道：“敌寇南侵，原为抢掠物资，供给军用，以补其先天之不足，登陆后即着手强征民夫，整理公路，修筑海口、黄流、榆林飞机场，建设书场码头、潭口铁桥，开筑榆林军港，及铺设石碌到榆林 200 余英里之铁路，凡诸措施，皆为掠运物资而设，故其开掘定安羊角岭水晶矿、石碌、田独铁矿，倡设东方水电厂、莺歌海盐田、八所渔场制冰厂，并设抽水机灌溉干燥高原，增加稻谷产量，所有收获及诸物资，皆运往日本供其需要。上述建筑开掘，均征民夫，或死于棍棒，或死于土水，或死于积劳，或死于蛇蝎，开山死于峭崖崩压，凿港死于深水沉溺，统计数不下七八万人。”日本侵略者掠去的海南资源，无不沾满了中国人民的血泪，对这一空前的浩劫和惨剧，海南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目的罪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谁也无法抹掉的！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徐冰曹燕）

《海南铁矿志》（1939—1983），第 5 页。

另据《琼崖抗战纪》一书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海南岛被日军杀死人数 20 余万，饥病死亡者不下 10 万。

掠夺马鞍山铁矿资源

位于安徽省东部的马鞍山矿区，是我国七大铁矿区之一。以马鞍山矿区资源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马鞍山钢铁公司，是一个具有年产 400 万吨钢铁生产能力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半个世纪以前，它曾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强行占领和肆意掠夺。

马鞍山矿区亦称当（涂）繁（昌）矿区，发现于 1911 年。1912 年起，除私商勘探外，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等先后对这片矿区作过考察和研究，写下了详细的调查纪实和论著，确定繁昌的长龙山、三山和当涂的姑山、钟山、龙山、钓鱼山、和睦山、南山、凹山、东山、戚山、梅子山、平岷岗等处均有铁矿。一批私商和军阀、官僚相继成立了裕繁、宝兴、福利民（福民和利民两公司合称）、益华等公司进行开采。

当繁矿区的发现和开采之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酝酿与爆发之时。当时，列强军备竞赛激烈。钢铁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世界市场“钢铁之需要骤增，生铁价格每吨曾涨至 300 元以上”，铁矿石价格也从每吨 4 元猛涨至 14 元，最高达 20 元。在这样的形势下，当繁铁矿对既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又苦于资源缺乏的日本军国主义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觊觎的目标。他们迫不及待地吧魔爪伸了进来，在“军力所不逮”的情况下，日本垄断资本从 1913 年起即借所谓“经济提携”，以资本输出形式控制当繁铁矿，掠夺资源无数。

仅 1916 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 20 年间，日本军国主义以低价从繁昌、当涂地区掠夺铁矿石共达 524 万吨。

日本军国主义对当繁铁矿资源的掠夺，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和有关人民团体的愤慨，激发了制止当繁铁矿输日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各界抗日救国会对铁矿石输日这种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动员社会舆论，采取经济制裁和敦促政府加以防范等各种措施，加以谴责和制止。《新京日报》1933 年 2 月 18 日刊登的一则消息说：“首都（按：指南京，下同）各界抗日救国会，近据各方报告，安徽当涂马鞍山之利民及宝兴等铁矿公司，迭售大批铁石与敌，供制枪炮原料之用。并据密报，近日敌轮又往该地装运……该会闻讯之下，除即分别函呈行政院、安徽省党部严予制止外，并特派该会常委倪光和等多人，驰赴当涂商同慈镇抗日会设法制止”。在民众的压力下，福利民公司被迫具结下不再供给日本铁矿石。但不到半年，该公司又“假借中日停战”为名，恢复对日输出。为此，当涂县抗日会召集各界会议予以谴责。首都抗日救国会再次向福利民公司提出警告，并于 9 月 16 日举行第 41 次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了对福利民、宝兴两公司售铁砂与日本的制裁问题，作出决议，“呈请市党部及函实业部、安徽省党部设法制止”。这些斗争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退让，未能完全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对当繁铁矿资源的掠夺，但起到了一定的抑止作用。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同年 12 月 10 日，占领当涂，次年 2 月 24 日，占领繁昌，当繁矿区全部沦陷。在此之前，日本军国主义主要是通过资本输出控制当繁铁矿；从这时起，他们就利用军事占领，把矿区攫为己有，直接地肆无忌惮地进行大规模掠夺。

1938 年 4 月 6 日，日人矶谷光亨、白石元治郎等在上海北四川路阿瑞里

《马鞍山钢铁公司志》第 28 页。

《矿业周报》53、57、248、249、256 号。

2号设立华中铁矿有限公司，同年12月16日改称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章程》中公开宣称：“本公司以统制开发华中矿产资源为目的。”该公司打着“中日合作”的幌子，实际上完全由日本控制。在34名股东中，日方占19人。董事长、副董事长、常务董事全由日人充任。公司下设11个矿业所，悉由日人督管。11个矿业所中，在当涂矿区的有马鞍山、太平、桃冲3个。马鞍山矿业所包括南山、凹山、东山、向山、梅子山等铁矿，太平矿业所包括钟山、小姑山、钓鱼山等铁矿（以上各矿均在当涂），桃冲矿业所包括桃冲铁矿（在繁昌）。

早在1938年2月至4月，日本当局就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调查员池田早苗等入专程详查了当涂铁矿区各铁矿点的位置、储量及交通情况，并绘制了矿床地质图，攫取了大量矿藏资料。华中矿业公司成立后，即把当涂福利民公司之南山、小姑山，宝兴公司之大凹山，益华公司之黄梅山、萝卜山，振冶公司之钟山作为第一期开采的矿点，其中以南山为重点开采区。马鞍山矿业所雇用华人矿工1500名，搬运工、路工百名，日籍监工及技术员工等60名。仅南山的采矿工人就多达千人，采用钻机探矿和大爆破量采矿，山上筑碉堡3个，山下有全副武装的日军和护矿队。从南山脚至江边码头，有全长19.6公里的轻便运矿轨道。据伪维新政府实业部主办的《实业月刊》第一期（1938）报道：当涂铁矿，近来以“福利民为最旺，年产达23.7万吨，振冶次之，年产18万吨，宝兴又次之，年产6万吨，益华最少，年产4万吨。”1939年，该区产矿石54万吨，平均日产1500吨，全部运往日本。其中，大凹山铁矿因含磷较多，仅供日本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鹤见工场专用，其余各铁矿均由华中矿业公司交“中支贸易联合会”，由该会统筹分配日本铁厂使用。

据统计，1938至1943年间，日本从南山地区共掠去矿石3342867吨。

太平矿业所又称华中公司采矿工程处，社址设在当涂城北。1938年9月，日本人进驻钟山。1939年4月正式开采钟山、小姑山。同年又开采钓鱼山。1941年又开采大姑山。日本侵略者占领期间，太平矿业所所属各矿被掠走铁矿120余万吨。日本人对矿石块度和品位要求很高，中块以下矿石和品位低于51%的矿石全部遗弃，因此，本区损失的铁矿资源远远大于120万吨。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开采、掠夺当涂各矿的同时，加紧了对繁昌桃冲矿区的掠夺。1938年3月至9月，日军派遣随军地质人员尾崎博对桃冲长龙山铁矿床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地质调查。华中矿业公司成立后，设立了桃冲矿业所，并于1939年3月开始对裕繁公司的矿山进行改造，恢复采运系统。1940年1月矿山恢复工程结束，正式开采。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继续露天开采长龙山铁矿的同时，又进行地下巷道掘进，掘成各类巷道2731米。1940至1941两年，日本侵略者共将桃冲矿石30万吨运回国内。日本人在桃冲狂采乱掘，采富弃贫，使长龙山矿床露天部分危崖陡立，峭壁倒挂，而井下更是被切割得支离破碎。1942至1945年共产矿石约5万吨，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运中断，无法运走，分别积存于采场和江边码头。

1939年，日本人在向山地区进行铁矿资源勘探。于1940年底发现了硫

《南山铁矿志》。

《日伪华中矿业所所承各矿简介》。

《姑山铁矿志》。

凌运舟、夏孝富、唐良平：《裕繁铁矿兴衰史话》。

铁矿床。因为硫磺是制造弹药的重要原料。所以，日本侵略者发现硫铁矿藏后如获至宝。1941年6月，日本中支那调查机关联合会矿业分科赴向山进行重力探矿，写出了《安徽当涂南山向山附近物理探矿调查报告》，证实该矿区蕴藏硫化铁矿。同年10月，华中矿业公司董事长矶谷光亨即向汪伪政权“申报”取得了开采权。1941年12月正式破土凿井，井下开采硫铁矿。采矿方法极度落后，矿工的劳动强度很大，用平锤、钢钎等原始生产工具，在岩壁布凿炮眼，装进炸药引爆，进行大面积崩落。崩落下的矿石由工人用铁箕子搬入小矿车，推至井口车场注入吊桶，用小型卷扬机提升到地面，再由装卸工转装上火车运往江边码头上船，经连云港转运日本。日本人在向山硫铁矿实际开采了4年，共掠走含硫40%以上的原矿达60多万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因海上运输受阻，将矿石运回日本冶炼发生了困难，于是在1942年底设立了“日本制铁株式会社马鞍山制铁所”，着手在马鞍山建10座日产20吨的熔矿炉（炼铁高炉）利用马鞍山矿业所所采铁矿，就地冶炼，用以制造军火，“以战养战。”制铁所所长为日人绵贯保一，制铁所的各课室和生产车间均由日人掌管，有日人职员和技工100余人，华人职员和技工100余人，“苦力”1800多人，共约两千二三百人。1943年9月21日，第一座熔矿炉点火投产，到1945年初10座熔矿炉全部建成。但即使在最盛的1944年6月，也仅有4座正式投入生产。从1943年9月开始生产到1945年5月停产，共产生铁约3万吨。生产的生铁被调往南京兵工厂生产武器，马鞍山制铁所铸造车间用生铁就地加工制成手榴弹外壳和迫击炮弹壳共达12万余枚。日本投降前夕，曾将堆放在马鞍山江边的1万多吨生铁装在一艘名叫“宗象丸”的轮船上运回日本，结果被美机炸沉在呈淞口外。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掠夺铁矿资源，推行“以人换矿”、“以人换铁”的血腥政策，用中国工人的生命去换矿、换铁。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没有劳保福利，即使是高炉和炼焦等高温岗位也没有防护用品。工人们在炉前披的是打包用的麻袋片，脚穿木屐鞋，伤亡事故几乎天天发生，而工人因工作伤残是不发工资的。1942年，凹山一个塘口塌方，一次就有33名矿工活活地被埋掉。1943年冬，在凹山北坡一个塘口几个干活的工人发现头顶上悬崖出现了裂缝，日本工头不理睬工人的意见，用刺刀强迫工人继续掏矿，结果悬崖倒塌，6名矿工被埋住，其中1名矿工被落石压在石头缝里，急呼救命，而日本人却用枪镇压工人，不许营救。工人中流传一首歌谣：

要想吃碗饭，
就得拿命换，
死了填山沟，
活着也难受。

采矿工人均为“包工制。”包工头子把他们分成若干“铺”，每“铺”30—40人不等，由一小包工头监管。每天由监工驱赶着，象囚犯一样，在阴暗、狭小的矿井下进行牛马般的苦役。矿工们受尽肉体上的折磨和经济上的剥削。为了强化对矿工的监视和控制，日本人规定工人进出矿山，脖子上都要挂个木牌，作为苦力的标记，并接受搜身检查。如不服从即被罚工、罚款，

向山硫铁矿史志办：《向山硫铁矿的建矿与发展》。

《马钢史话》、邓绍康：《马钢一铁厂的前导——日本制铁株式会社马鞍山制铁场》。

直至开除。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矿山和制铁所的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日本人住的是楼房，中国员工住的却是用竹子缠上稻草，糊上泥巴的草房，“苦力”工人则住既黑暗又潮湿的名为“滚地龙”、“滚地篷”的通间草棚。日本人食堂吃大米、白面、鸡鸭鱼肉，中国工人一天干活 10 多小时，所得工资只能买到一斤多杂粮，或配给的玉米面、高粱糠、豆渣饼。正如工人歌谣说的：

睡觉滚稻草，
起来围麻包，
天天吃不饱，
干活累断腰。

由于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他们较普遍患有矽肺病、结核病、关节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疾病。日本人怕工人把疾病传给他们，在凹山脚下用芦席搭了个大草棚，美其名曰“大病房”，实际是把生病和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的矿工集中到那里。“大病房”四周围了铁丝网，不准病人外出，不准亲人探望，更没有医生治疗。又在离草棚不远的地方挖了两个大坑，把病死的矿工尸体集中掩埋，这就是有名的“侏子坟”和“烧骨堆”。马鞍山江边的老鹰窝，是有名的“万人坑”，死者多是江边装运矿石的工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用中国人的血汗与生命换取铁矿石，用掠夺到的矿石，炼成钢铁，制造枪炮弹，再用这些枪炮弹来杀戮中国人，这就是他们恬不知耻地宣扬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真实内容。日本军国主义者独霸亚洲，奴役亚洲人民的美梦，随着日本战败而破灭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洗刷了近百年的历史耻辱，而且彻底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日关系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日本，还有那么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歪曲历史，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肯反省军国主义的罪孽。这就令人不能不怀疑他们是想卷土重来，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洪文侠施鼎新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组稿）

掠夺京西煤炭

掠夺殖民地的物质资源，是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京西煤炭的疯狂掠夺，典型地表现了帝国主义者的贪婪。

一、蓄谋已久，武力攫取

距北京城西 20 多公里的九龙山下的门头沟、房山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明末清初，这里的煤炭开采就已具有一定规模。据史书记载，“门头沟民皆市石炭为生”，“亨师百万户皆仰给于西山之煤”。这就是说，这里的煤炭不仅是当地百姓生计之源，而且直接关系到北京地区几百万居民的生活。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看中了这块肥肉，并开始涉足京西煤炭的生产。1916 年，日本臼井洋行与中国的陈少武合作，在门头沟杨蛇村北，成立了“中日杨家蛇煤矿机械公司”，日本人内田忠亮任总经理，陈少武仅得为副。从第二年开始，日本矿业株式会社又连年派员到京西勘探煤矿资源。“日本矿业在民国六、七、八年（1917、1918、1919 年）及民国十三年（1924 年），对斋堂及大安山煤田之调查，民国八年（1919 年）对矿区申请，民国九年（1920 年）以后，逐渐得到矿权。”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活动，为以后大规模掠夺京西煤矿资源准备了条件。

如果说，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是依靠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投资”的方式，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来掠夺京西煤炭资源的话，那末，在“七七”事变以后，他们就是以武力进攻开路，又以武力为后盾，对京西煤矿资源实行赤裸裸的、海盗式的抢劫了。这种抢劫，有的是不付任何代价的“接收”，有的是象征性地付款“收买”。1938 年初，日本川南工业株式会社派吉富重雄“接收”了西山煤矿，并把该矿改名为“门头沟川南煤矿”。利丰煤矿是民族资本家胡仙洲苦心经营多年的一个大矿，年“出煤实数为 14 万吨”，但却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被日本马场强（马场忠俊）仅以联币 30 万元买去”。日本官方机构“兴亚院”联络部 1939 年下达 306 号命令，许可东京市丸内品川白炼九株式会社的马场忠俊“主掌”利丰煤矿有限公司的“一切”。日本垄断资本是在军人刺刀的支持下从经济上掠夺中国人民的急先锋。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对英美在华资本还不便公开动手。珍珠港事件后，它也就不客气地进行抢劫了。“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是中英合办、资本雄厚的大公司，拥有京西最大的煤矿。“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时，资金估计约 430 万元。”国民党行政院 1947 年 1 月 16 日《关于门头沟煤矿产权的决定书》对日本帝国主义排挤、强占这个公司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缘门头沟煤矿系国人周奉璋与英人威廉麦边等人合伙组成，内周奉璋所代表华方之股份为百分之五十一，麦边所代表英方之股份为百分之四十九，曾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依照部令向前实业部领有采字六二五号矿照两张，开始经营。七七抗战后平津陷敌，该矿因有英人股份，日人未能强占，惟对该矿停供硝磺炸药，阻挠运输。嗣后该矿之英方代表为谋困难之解决，曾雇用日人白鸟吉乔为顾问。1944 年夏初，白鸟乘华北环境日趋恶劣之际，乃藉军部为后盾觊觎矿产，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遂迫令麦边签订契约将其所代表之股份百分之四十九（即全矿股份）无条件转让与白鸟，而

以与周奉璋所代表之股份合作共同开采，并将该矿直接置于日军部之下。”1942年2月27日，麦边和白鸟吉乔正式签订了把该矿的英方股份“让渡”于日本的契约书。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就把“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攫为己有，并把矿名改为“中日合办门头沟煤矿”。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个矿实行了军事管理，军事管理人就是白鸟吉乔。

日本帝国主义除占有门头沟原有各矿外，为满足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还利用自己了解京西煤炭储藏情况的条件，先后开了数座新煤矿。据史载：“昭和16年（1941年）8月20日，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宫心得盐泽清，批准在河北省房山县横流水村、杏元村、英水村石炭开发。”在新开煤矿中，以大台煤矿为最大。“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八日，日华北派遣军领出大安山开发许可证，并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受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之命，开始在大台村采挖，……该矿所有人为日本矿业股份公司。同时，该公司在大台村建立了采炭所，所长为古川，公司派驻该矿的代表是竹田四郎。”1940年10月，日采炭所开凿大台平洞880公尺，正式开始采煤。

二、血腥统治，残酷剥削

京西矿区紧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矿区后，为防备八路军的袭击和矿工的反抗。对各大矿都实行了严密的军事管理，用大量经费修筑碉堡等设施，却不添置一台机器设备。该矿史料保存了1942年白鸟吉乔到矿后修建的建筑物清单，内有碉堡、矿警所的费用，修日本职员和中国高级职员住房费用，修围墙的费用，以及修煤池、医院、学校的费用，其中用于修碉堡、围墙、矿警所的费用高达2.4万元。在川南煤矿，日军驻扎了一个小队，修起了四座炮楼。矿区地面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在井下，日本人也随时监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利丰煤矿老工人张永清回忆说：“当时利丰矿的四周都拉着电网。还有专门管井下的日本鬼子。我们井下工人每一个班，都有两个鬼子监视，他们手里拿着羊角小锤，看哪个工人不干活，就用锤子打谁。”日本兵及伪矿警们经常打骂工人，甚至随便杀害工人。门头沟煤矿工人任满仓，为人仗义，好练武功，日本兵无端怀疑他是八路军，把他活活吊死。日军进攻协中煤矿时，遇到正在搞测量的工程师鲍贵，怀疑他是八路军，把他绑在一棵杏树上，用刺刀挑死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京西矿区，对煤炭实行野蛮开采。保安煤柱是井下安全生产的必备条件，但日本侵略者却下令把井下大巷边的甚至井筒四周的保安煤柱全部采空。这种疯狂的掠夺，不仅大大缩短了矿井的寿命，而且夺去了无数矿工的生命。“煤窑的饭，拿命换”，这是当时广大矿工生活的真实写照。“上罐笼挤死，掉落井筒摔死，落顶砸死，炮崩死，电触死，水淹死……种种死亡危险包围着矿工，伤亡事故不断发生。1942年，是门头沟煤矿解放前产量最高的一年，产煤55万吨，同时也是该矿公伤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仅领取因公死亡抚恤金的人数就达48人之多。该矿在1942年发生了一次冒

查自门头沟煤矿档案资料。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号59。

查自门头沟煤矿档案资料。

查自门头沟煤矿档案资料。

门头沟煤矿档案资料。

顶事故，砸死7人。当时井下工朱凤江被埋在井下没有死，喊救命，但日本人不顾工人死活，只顾让工人继续挖煤，不让工人去救人。工人们坚决不干，用双手把石头一点一点扒开，才把朱凤江救了出来。老工人任样海回忆道：“1944年的一天，井下发生透水事故，我和几十名工人被堵在里边，如果不关水闸门，我们都能跑出来。但日本人为保护井下机器，怕耽误出煤，强行关上了水闸门。我和几名工友侥幸从小煤窑窑口里爬出来，其他几十人都被淹死在井下了。”

恶劣的生产条件，吞噬了无数矿工的主命，摧残了广大矿工的健康。很多矿工未老先衰，很早就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受害最重的还属童工。童工的工资只及成人的一半，使用童工可获更大的利润，所以，在京西各矿，日本人大量使用童工。史料记载，该矿在日本统治时期，童工一直占全矿工人总数的30%左右。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许多童工被折磨得身体畸形发展，十几岁的孩子，看上去象个小老头。他们幼小心灵和身躯在死亡线上挣扎。当年的一首童谣沉痛地诉说了童工们的苦难：“厚铁板，窄又长，上边爬着个男儿郎，饿着肚子把煤推，不知小命在何方。”

日本帝国主义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榨干了矿工的血汗。他们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无法再低的地步。1941年12月29日，中英门头沟煤矿顾问白鸟吉乔在给该矿经理的信中说到了限制对工人粮食供应的数量问题。他写道：“强壮成人每班能达一吨以上效率的每天两斤，绝对需要的儿童劳动每人每天一斤。”十几岁的孩子们，他们正处发育年龄，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繁重的井下劳动，最多只得到一斤粮食，可见他们的日子是怎么熬的。日本人发给工人的工资更是少得可怜。据史料记载：“1942年9月，童工月工资是：50元以上者3人，30元以上者28人，30元以下者519人。包工的月工资是：30元以上者75人（包括工头在内），30元以下者2800人。而1942年11月份的物价是：玉米每斤八九角钱，高粱每斤六角四分。”这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京西矿工一天的工资，只够买一斤玉米。这是他们对矿工的敲骨吸髓的榨取的写照。

三、巧取豪夺，垄断矿产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矿区后，对整个京西煤炭的生产、销售，实行了超经济的强制垄断，把全部矿产据为己有。

白鸟吉乔在门头沟设立了西新井收煤所，专门“收购”各小煤窑的煤炭。1943年，白鸟吉乔召开了有27座煤窑的窑主及总管参加的“宣誓”会。会上他要大家“宣誓”将所生产煤炭不外运自销，保证卖给日军管理的门头沟煤矿公司，否则按规定论处。在白鸟吉乔的逼迫下，窑主及总管们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宣誓书”上按了手印。自此到抗战胜利前夕，白鸟吉乔在门头沟共收买百余家私人经营的小窑之产权，联合“贩卖”。从1943年初到1944年11月“西新井收煤所收取了十余万吨煤炭。”这些煤炭都是日本人以低价买进的。

为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盗行为，门头沟的民族资本家们进行了强烈的反抗。1943年初，民族资本家胡仙洲，联合了一些小煤窑的窑主及煤栈的

门头沟煤矿档案资料。

《门头沟文史》第五辑第90页。

查自门头沟煤矿档案室。

经理，集资成立了“宛平县门头沟煤业生产运销合作社”，独立销售煤炭。但这个合作社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同年3月，“白鸟吉乔将胡仙洲等十几名参加这个组合的窑主、煤栈经理，押进日军宪兵队，以私通八路为名，关押了十几天才放出去，迫使‘第二组合’不得不解体。”为了严厉禁止小窑煤主自由买卖，日本人在门头沟地区各桥义路口，都设立了卡子，派兵把守，不许小煤窑主私自向外运煤。如有违反，就要遭到酷刑惩处。“有一次，竟有五十多人被抓去，惨遭毒打。”

日本的贪婪掠夺，造成大批小窑破产和倒闭。1930年，门头沟煤窑有562家，可到了1944年“煤业又凋敝、销路迟滞，各矿窑均感精疲力尽，纷纷倒闭者已达70%以上。”京西的民族资本工业在日本统治时期生产降到了最低点。

四、抢走煤炭，百姓遭殃

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帝国主义者朝思暮想的就是掠夺他国的资源，沦陷后的京西煤矿自然就成了他们掠夺的对象。在抗日战争时期，京西各矿年产煤大部分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抢走了。“门头沟煤矿的煤有65%被运至日本”。1947年11月23日，白鸟吉乔作为战争罪犯受审讯时也供认：每年华北地区有大量的石炭输入日本和满洲。

本来京西的煤主要供应平津地区需要。据有关方面计算，当时仅北京每年需供应煤炭48万吨左右，方可基本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可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把京西煤炭大部分掠走，结果京津地区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困难。“都市民众专以煤为唯一燃料无可代替，更兼电力机械一切工厂等消耗煤量非少数生产所能济事，溯自七七事变以来，华北各地无日不闹煤荒，而一般民众皆感有钱无处购煤之苦。”1944年冬，天气异常寒冷，平津两地市民急需煤炭取暖，但身为“北平煤炭组合理事长”的白鸟吉乔，却仍只顾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大量外运煤炭，从而造成京津两地严重的煤荒。当时北京的小学生们上学都要带块劈柴，大学生们则要求早下课，还有的学校被迫停课。

京津地区不仅煤炭短缺，而且煤价又完全由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操纵，年年暴涨。白鸟吉乔称：“三十三年（1944年）以前，煤价统由大使馆规定，三十三年十一月以后，改由军司令部规定。”“三十一年（1942年）块煤每吨二十四元，原煤二十元，煤沫十五元。”各种煤平均价每吨不到20元。在日军操纵下，煤价不断上涨。“三十四年（1945年）奉军司令部命令，提高煤价，平均各项煤价为三百元一吨。”短短三年，煤价上涨了15倍。

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京西煤矿，罪行累累。抗战胜利后，战犯白鸟吉乔被逮捕归案，于1947年11月29日判处死刑。侵略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门头沟文史》第六辑第150页。

《门头沟文史》第六辑第150页。

《世界日报》1947年11月23日。

《北京经济》第49至50页。

北京矿务局党史办资料。

北京矿务局党史办资料。

北京矿务局党史办资料。

(北京矿务局党史办张启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铁蹄下的淮南煤矿

1938年6月4日，日寇的侵略铁蹄踏进了淮南煤矿。

淮南矿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地处华东腹地，接近沪、宁，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强占淮南煤矿以后，就疯狂掠夺煤炭资源，采用“以人换煤”的罪恶手段，残酷榨取工人血汗。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期间，广大矿工横遭蹂躏，受尽欺凌，数以万计的矿工和人民死于非命，淮南煤矿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疯狂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以战养战”的阴谋，在侵占淮南以后，就立即开始掠夺淮南的煤炭。1938年6月29日，日军特务部淮南炭田调查队来淮南煤矿进行第一次调查。8月25日，日本铁道省调查团、三井及三菱调查班等，以一个月的时间对淮南煤矿又作了详细调查。9月21日，大通煤矿交给日本垄断集团三菱饭冢炭矿经营，淮南煤矿局（九龙岗矿）交给三井矿业公司经营，是年11月27日，日寇开始掠夺开采。1939年4月21日，日本兴亚院在华联络部将两矿合并改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直接在日本侵华军军部控制之下。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在淮南设立“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大通矿长进上诚，九龙岗矿长藤义魂。

所谓“日华合办”“股份有限公司”，是掩人耳目的，是强盗式掠夺的代名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工矿企业的掠夺几乎全部是以我国原有企业为基础的。他们入侵后，对我国工矿企业派进日本兵把守，由日本人控制，挂一块“台办”的牌子。就算是“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了。“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如此。他们将我国大通煤矿和淮南煤矿局合并，加进日本的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三井矿业株式会社、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华中矿业株式会社四家企业的名字。这就是“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帝国主义对淮南矿区的掠夺开发，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供给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需要。日本《淮南炭矿》一书“公司之使命”一节中赤裸裸地说：“华中经济建设，蒙皇军圣战之余绩，已迈出雄健步伐”，“我社在皇军的庇护下，一面警备，一面采煤，同时准备应付国际局势的突变，尽一切努力完成年产200万吨煤炭的五年计划，为东亚新秩序的建立作贡献。”这段自白，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靠日军的枪炮支撑的，是“圣战的余绩”，是服务于战争、服务于日本独霸亚洲的。他们的“公司”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日本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制定的《增产五年计划》规定，淮南煤矿的煤炭生产，要从1939年的21.5万吨，达到1946年的235.2万吨。短短的七年，要增加11倍。因此，他们就实行疯狂的掠夺式采煤，开采时既没有计划，也不管生产秩序，而是取易撇难，拣肥丢瘦，乱挖乱掘，到处打井，任意破坏，结果把一个蕴藏丰富的淮南煤矿糟蹋成“矿场险象丛生，并筒走动，下风道时断，水仓淤塞，巷道坍塌”的百孔千疮的局面。

八年期间，日寇没有增添过设备。后来，为了加速掠夺更多的煤炭，在提绞方面改用了蒸汽绞车，加强了运输系统的能力。但是，直接生产的采煤工具，仍沿用笨重手镐，井下运输用人力推，掌子面出煤用大筐抬，冲电矿灯只供给日本人或职员、监工用，工人还是几个人合用一盏小油灯。由于设备简陋，生产工具落后，加上工人遭受奴役，劳动情绪和生产效率非常低。

最高年产量只有 80 余万吨，始终未达到战前 100 万吨的水平。

从 1938 年 6 月至 1945 年 9 月，日寇共经营七年，掠夺和断毁丢弃的煤炭资源达 1230 万吨之多，回采率不及 40%。1938 年 22,632 吨 1939 年 143,798 吨 1940 年 435,057 吨 1941 年 771,485 吨 1942 年 895,554 吨 1943 年 878,350 吨 1944 年 882,046 吨 1945 年 25,901 吨合计 4,294,823 吨日寇掠夺的煤炭，除少数在矿山就地出售外，主要用于侵华战的铁路、船舶运输上。服务年限，给以后的开采造成极大的困难。

血腥统治

日寇为加强对淮南煤矿的控制和掠夺，在煤矿推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统治淮南的最重要机关是领事署。领事署下设有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备队、矿警队等军事组织。据《淮南煤矿志》记载，当时仅一个矿警队就有自卫队员 154 名，配备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 152 支。许多老工人回忆说，当时的大通矿是岗哨密布，日本鬼子兵整天荷枪实弹，端着刺刀，牵着狼狗，肆意横行。

整个矿区戒备森严。大通矿场四周布满了电网，仅“南公司”，“大兵营”不足一平方公里地区内，就修了 13 座碉堡，加上附近的日寇据点，共有碉堡 30 多座。矿场内外还设置了监狱、刑场。地下水牢有两座，一座碉堡水牢在矿南日伪警备司令部的西南角，地面上是碉堡，下部是水牢，水牢的直径 7 米，深 2.2 米。另一座秘密水牢在大通矿南门内东侧，日寇将水牢的地面刑房伪装成“办公室”，这座水牢长 3.5 米，宽 2.5 米，深 3.2 米。

整个煤矿笼罩着恐怖气氛。日寇使用屠杀、监禁、拷打等野蛮手段来统治和迫害工人，他们常用的刑罚有：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狼狗咬、站立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入麻袋抛到河里等等。1941 年冬，日寇一次就把矿工阎希洞、谢兴才等 260 个同胞装入麻袋，用刺刀捅死后投入淮河。特务爪牙经常以企图逃跑，破坏矿山、闹罢工、不是良民等罪名，将工人逮捕治罪，严刑拷打、逼供。

日寇还使用了一条毒辣的手段，就是“以华制华”。他们收买、利用中国人中的民族败类，充当他们的走狗和爪牙，依靠他们作帮凶。日本劳务课长在给各矿劳务系长的秘密指示中说：“对于工人及附近居民有不现行为者，（日本人）不要任意鞭打、体罚，可处以罚金或扭送中华民国（指汪伪政权）警察机关处置。”这就是要日本人在背后，由汉奸、走狗出面镇压工人，以达到他们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目的。

日寇收买利用的监工、把头，大多是地痞流氓，有些还是封建会道门头子。大通矿的总监工王长明就是青红帮的头子。他的徒弟不仅布满整个矿区，而且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的一些地方也有。他身边有五大弟子。他们倚仗日寇，骑在矿工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日本帝国主义和这些封建把头同是压在矿工头上的两座大山。

日寇在淮南煤矿的统治体制十分严密。其特点，一是大权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课长以上头子和大小单位的正职都是日本人。重要部门，哪怕只有几个人也要一个日本人负责。如九龙岗变电所只有 4 人，也派一个日本人负责。二是实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统治管理。各矿都有武装矿警队、稽查队、监工、包工柜等多种统治机构，直接管理工人的是包工柜。三是使用极其野蛮、残酷的统治手段。这些统治者都有生杀大权，他们打伤人、打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日寇对工人控制得极为严密。工人们形容说：“煤矿就是阎王殿，进矿处处鬼门关。”工人一进矿先在劳务系登记，每个矿工都要填写登记卡，登记卡上项目繁多，连身体特征和皮肤颜色都要写上。他们还采用指纹管理法，硬逼着工人在指纹纸上按上十个手指和左、右手掌印，最后发给每个工人“号条”和劳工证。日寇在矿场、工房监管工人，押工人上下班。工人每天上班要过五道“关”，即进矿门、领灯、下井、上井、文工牌子。关关要过，关关提心吊胆，尤其是进矿门和上井这两道关更难过。工人进矿门时一面掏工牌，一面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行礼。除了这种污辱人格的礼节外，还要经过搜身后才能进矿，动作稍为慢一点，便遭毒打。工人王贵山在井下干了两天两夜，没有得到休息，也没有吃饭。他实在撑不住了，想上井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监工、工头说他企图罢工闹事，逐将他逮捕起来。他们用烧红的铁丝，穿透王贵山的腿肚子，后来又把他送进水牢里泡了十几天。出狱时，王贵山全身的肉都被水泡烂了。工人就象奴隶，象牛马一样被套上了枷锁，完全失去了自由。

那时，矿里矿外经常传出受害者的惨叫声和鬼子野兽一样的吼叫声。淮南煤矿变成了一座法西斯的集中营。

“以人换煤”的铁证——“万人坑”

日寇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掠夺淮南煤炭，决心“尽一切努力完成增产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他们既不增加设备，也不改革开采技术，单凭增加工人数量和劳动强度来采煤。日寇强行募集劳工的文件中记载：“随着军用煤炭需要量的激增，强行募集劳工，采取使劳工补充顺利化为目标的方法，实为我社存在和发展的急务。”这里清楚地供出日寇“以人换煤”的罪恶行径。就这样，数以万计的矿工遭到惨死，尸抛“万人坑”。

日寇强化募集劳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毒辣手段，主要是骗、派、抓。

骗：即用欺骗的方式招收劳工。1938 蒋介石炸毁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鲁、豫、皖广大地区遭受大水灾，劳动人民离乡背井，逃荒要饭。1939 年日寇乘机派出大批招工队，编出一套套谎言，到处进行欺骗说：“矿上吃的是白米洋面，烧的是煤炭，坐的是电梯，穿的是 6 个鼻子大皮鞋，推的是 4 轱辘的斗车……”“干不干一天两斤半，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月头还发给工资。”招工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契，让农民按上手印之后，就集中在一起。为了防止有人中途逃跑，招工队便以“人生路不熟，路上易失散”为借口，用绳索系在每个人的臂膀上。就这样，他们扶老携幼，一批一批地、成串成串地被塞进了闷罐车。把头赵凤祥一次就从山东枣庄骗来 300 多人，中途不准下车，大小便都在车上。由于车小人多，途中就被踩死 3 人。成千上万破产农民、逃荒灾民和失业工人就这样被骗到了淮南煤矿。

派：就是派壮丁。日寇通过汪伪政权定淮特别区署，在淮南附近强制按保、甲抽派农民，编成“农民爱矿队”到矿上当矿工。这是矿业所长川口忠给日军联络部长中山贯一的报告中提出的花招。据日本档案记载：“周边地区劳力依存，定淮特别区署长发案，农民爱矿队编成，定淮特别区全域农民中，适合炭矿劳动者，行政予以供出，各普通区长、乡长当组织编成，送进步矿劳力强化，本年约 2000 名劳力供出……”“农民爱矿队”每期规定在矿服役 6 个月，实际上被派出的农民，很多一去就回不来。日寇经常对“农民爱矿队”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说征农民去当矿工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实际上，对“农民爱矿队”，从一开始就是实行法西斯式的管理。日寇

除派兵看守外，还有“逃亡监视哨”日夜巡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有逃跑的，被抓回后，以逃兵治罪，并向工人示众。

抓：单靠招、骗的方法，还不能满足日寇的需要，他们就采取“抓”的手段，以“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嫌疑犯”等罪名，横加逮捕，抓来充当劳工。

据当时不完全资料统计，仅从1941年3月至1944年6月的三年零三个月中，日寇骗、派、抓来的劳工人数达70671人。

日寇只顾要煤，根本不管工人死活。他们肆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矿工的劳动时间名义上是一班12小时，实际上有的竟达16小时以上。井下采煤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用的是落后的原始工具，打眼用的是旱锤，采煤用手镐挖，采下来的煤在掌子面高一点的地方还可以直起身来两人用筐抬，低的地方只能用筐往外背。当时工人在井下干活都是赤身裸体，一个班下来，有的两个肩膀都被磨破。在上行出煤时用小铁托往外运，但巷道又矮又窄，直不起来，只好把车上的绳子套在肩上，跪在地上，爬着向前拉。由于通风不好，井下常年高温，污水又多，空气污浊，臭气难闻。繁重的劳动，把工人折磨得弯腰驼背，骨瘦如柴。

井下安全设备极差，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当时工人们说：“下井七分灾，不知上来上不来。”许多矿工葬身于井下。仅1941年一年中，淮南煤矿井下被闷死和被鬼子、把头打死的就有109人。旧历六月初三大通矿发生透水事故，朱广汉等9位工人被淹死，老工人余月和、李富先两人就是虎口余生者。那天，余月和和工友们在一号井西部北四槽的掌子面刨煤。掌子面上部顶板的水沿着岩层的裂缝直往下淌。当时，工人们看情况十分危险，便撤出了掌子面，并把情况告诉了监工尹耀山。尹耀山把日本鬼子监工蒲田找来了。蒲田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挥着手枪，硬把他们逼回到掌子面。刚干一会活，“轰隆”一声，支柱就成排倒了下来，随后，大水象山洪暴发一样从放炮眼里猛冲出来。余月和、李富先攀着一根柱子，才幸免于难，其他9位工友全部被淹死。巷道口被堵住了，余月和他俩靠啃木头，喝污水维持生命。后来，由于日寇舍不得丢掉那里的煤炭，又叫工人重新开采，他俩才被工人兄弟救出来。他俩被活埋井下整整19天。1943年春天，大道矿井下西四石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日寇、把头根本不予抢救，以至伤亡100多名矿工。同年，西六石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日寇明知里边还有许多工人，不仅不予抢救，而且在石门口打了一道火墙，40多名矿工全部被堵在里面，活活的闷死了。解放后，工人们在开采这里的煤炭时，发现许多矿工的尸骨。同年，鬼子逼着矿工在大通矿西六石门北四槽被堵死的瓦斯区挖炭。两个日本监工在里面吸烟，引起瓦斯爆炸，当场炸死40多名矿工。日本监工滕永德太郎也被炸死在里面。另一个鬼子监工却又逼着矿工进瓦斯区背这个鬼子的尸体。结果进去一个熏倒一个，又连续倒了30多名矿工。当时还有些炸伤未死的矿工也被日寇埋掉了。

日寇把中国人当奴隶驱使，所给的报酬低得可怜。据史志记载，当时工人平均一天挖出的煤按市价可卖45元，而工人平均工资一天只给0.5元，仅占他所创造的价值值的1.6%，其余98.4%，都进了鬼子的血门和把头的腰包。工人干一个班只发半斤半霉烂的豆饼和麸面。

工人们吃的是野菜和霉麸面做成的粑粑。吃了这种食物以后，嘴里发苦，肚中发胀，头脑发烧。下井后又没有水，只好喝井下的污水，时间一久，就

拉肚子。特别是 1942 年秋天，矿工中传染病流行，得了这种传染病，便高烧不止，四肢抽筋，全身起斑，上吐下泻，大批大批的矿工含恨死去。老工人袁孝云回忆说：“我亲眼看到从河南来的 11 个工人，住在阴暗狭小的工棚里，由于吃了馊子面馒头，肚子膨胀，加上疾病，第二天全部死去了。”老工人胡继云回忆说：“1942 年的冬天，我亲眼看到一间房子里睡着 7 个工人，只盖两床破被，第二天全死了。”

日寇、把头及其走狗，看到死的人太多了，怕影响工人下井挖煤，就采取了一条凶残的“防疫措施”——设立“大病房”。日寇在大通矿南设立了两处“大病房”，把患病的工人强行拖去，集中在一起关起来。所谓“大病房”，就是临时搭成的大芦席棚，四周围上电网，门口设有岗哨，不准病人出门，不准亲人探望。里面既没有医疗护理，伙食又跟喂猪的差不多。工人说：“名曰大病房，就是停尸房，进了大病房，十人九人亡。”里面到处屎尿横流，恶臭难闻，病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土炕上。自“大病房”设立的那天起，每天都有大批的病人被拖进来，每天又有大批的尸体从这里拖出去。老工人回忆说：“大病房”天天死人，一天要死七八个，最多一天死了 21 个。日寇指使总监工王长明，强迫工人组织拉尸队，老工人胡继虎就是当年拉尸队的成员。他回忆说，当时的“劳务系福利课”门口，每天都准备两人多高的芦席，后来芦席也不给了，用筐抬，用绳索系住脚脖拖，把尸体抛在南山一带。因为死难者大多是北方人，俗称北方人为“侂子”，所以当地群众把南山一带叫做“侂子林”。更为惨无人道的是，有的病重的矿工还没有死时就被抬出去扔掉了。老工人董德保，就是当年从“大病房”芦席卷里被工友们救出来的。那天，董德保上完中班半夜回到家，觉得口渴身上发烧。他爹爹第二天上班刚走，把头来查工棚，发现他还没有起床，就把他拖进了大病房。他爹爹下班听后，连急加气，当天就病倒了，接着也被拖了进去。就在董德保被拖进“大病房”的第八天，几个汉奸狗腿子，七手八脚把他拖到一张芦席上卷起来，他急得四肢乱动。董德保的父亲挣扎着爬起来，扑到他身上，护着不让拖。狗腿子一边骂，一边朝他爹胸前猛踢了一脚，他爹顿时口吐鲜血而死。野兽的凶残，激起了“大病房”难友的愤怒，大家围了上来，几个狗腿子见势不妙，拔腿跑了。这时，围在电网外面的许多工友和病人家属，闻声冲了进来，在工友和家属们的帮助下，董德保才出了“大病民”。可是他爹爹却被拖上了南山侂子林，后来连尸体也没找到。

1942 年冬，大雪覆盖青整个矿山，也覆盖了“侂子林”数以万计的尸骨。第二年春天，大雪融化，尸骨被暴露出来。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指使总监工王长明纠集日伪军警、汉奸、把头用刺刀、皮鞭，逼着工人在南山挖了三条长 20 米，宽、深各 3 米多的大坑，把满山遍野的尸骨集中抛入坑内，丢一层尸骨，撒一层石灰，就这样形成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日本法西斯疯狂推行“以人换煤”强盗政策，一批批的中国煤矿工人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把头李小楼有一次从河南招骗来的 220 人，两三年内，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就有 219 人。后来，大通矿工人给活着的这个工人起个绰号叫“二百二”。这个“二百二”的故事，在淮南矿区流传甚广。据日伪档案统计的资料，仅 1943 年的半年多的时间内死亡矿工就达 1.3 万人之多。“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就是日本强盗在淮南矿区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中外淮南市委党史办公室执笔：张兰荣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组稿）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

- 1、1960年中共淮南矿委宣传部编《淮南煤矿史（初稿）》；
- 2、1960年中共淮南市委革命斗争史资料办公室《关于淮南中党的革命斗争史材料综合整理》；
- 3、淮南大通“万人坑”展览馆；
- 4、1992年淮南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淮南煤矿志》。

疯狂掠夺焦作煤炭资源

1938年初，侵华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进。2月17日，占领新乡后，由于国民党军新八师炸断了郑州黄河铁桥，遂沿道清（道口——庸化）路西犯。2月18日，日军抵达修武，19日，占领焦作。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一踏进焦作大地，便开始疯狂的烧杀抢掠，并把魔爪伸向了焦作煤矿区。

焦作，座落在黄河以北，太行山南麓。这里山川秀丽，资源丰富，是中国著名的无烟煤之乡，以其煤质好、储量大，成为全国七大煤矿之一。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帝国主义捷足先登，在焦作占地挖煤，把焦作煤矿划为其势力范围。“七七”事变后，英帝国主义害怕日本人抢占焦作煤矿，就在焦作张贴告示，宣布焦作煤矿归英人所有，示意日本不得插手。然而，日本侵略者不买英国人的账，在其占领焦作的当天，就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焦作煤矿。但英国人极力抵制，在第一个回合的争夺中，日军没有得手。

1939年春，一支抗日武装以焦作北厂（英福公司矿场）为突破口，袭击了市内日军。日本侵略者乘机以英人掩护中国军队为借口，暗地唆使大汉奸、伪焦作矿区管理施行委员会委员长李润身带头排英。1939年7月，在日军的策划下，李润身网罗了一批汉奸走狗，贴标语，呼口号，游行示威，阻止工人给英人上班挖煤，制造了桩“华人要求收回矿权”的排英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人一面装作是英国人的朋友，假意“劝阻”所谓的排英势力，一面压英国人交出矿权。

1939年8月2日，日伪河南省政府发布第十一号通告，宣布接管焦作煤矿。9月8日，日军驻焦司令部命令矿区英国人离开焦作。10月初，伪焦作矿区管理施行委员会接收焦作煤矿，复工生产。焦作煤矿从英人手中脱离后，名为华人负责，实为驻焦作日军和日本兴中公司占有。随后，日本侵略者连这块遮羞布都不要了。1940年6月1日，伪焦作矿区管理施行委员会，以“自己无力办矿”为由头，拱手把煤矿交给日本兴中公司直接经营，至此，日本帝国主义从英帝国主义手中完全攫取了焦作煤矿的全部开采经营权。

日本侵略者在夺取焦作煤矿后，为加紧对煤炭资源的掠夺，首先建立了各种经济、军事、政治组织。

1940年11月27日，为便于对焦作煤矿资源的掠夺，驻焦作日军撤销了兴中公司，成立“焦作炭矿矿业所”，隶属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以“接收”的方式无偿地吞并了王封、李封、凭心三个煤矿以及附近的小煤窑。“矿业所”是侵华日军在焦作的最大经济实体，理事长为日本人秋田忠义，梅原小次郎为常务理事。矿业所机构庞大，所员达662人，由日本人、汉奸和原中福公司的部分华人留守人员组成。矿业所在理事长总管下，设有部、处、科、系。劳务科有指纹系，专门审查矿工指纹。他们靠残暴的法西斯统治，维持生产，工人稍有反抗，就被扣上“身份不明”等帽子横遭惩处。

为镇压煤矿工人的反抗，日寇在焦作矿区建立武装组织，时矿区严加控制。矿井四周设有碉堡、炮楼，进出口设岗、放卡，还有便衣特务四处巡逻。矿工往来必须出示通行证，接受日军的搜身检查。日军除派兵把守矿区外，还新建了700余人的矿警大队，分驻在王封至焦作公路两侧的碉堡里和各个矿区，实行“强化治安”。

为加紧对煤炭资源的掠夺，日军强迫工人加班加点超强度干活，工人经常在井下连续干48小时，甚至几天才上井。平时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节

假日也不给休息。而井下通风、防水、防毒等设备极差，塌方、瓦斯爆炸，冒水等事故经常发生。1940年王封矿井下西大巷掘进时，发现瓦斯超常，日本技师不顾工人生命安全，既不检修也不让离开现场，结果发生瓦斯爆炸，死亡10人，烧伤20人。1942年王封矿北大巷瓦斯爆炸，死30多人，伤10多人。1943年，李封矿井下西大巷因电线跑火引起瓦斯爆炸，死18人。1945年1月，王封矿再次发生瓦斯爆炸，死16人，伤6人。

驻焦作日军为了降低采煤费用，大量招募使用重工。童工大多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最小的年仅八九岁，主要承担井下运输——拉筐的任务。童工们每天四肢着地，跪着、爬着，象牲畜一样艰难地拉着几十斤重的大筐。由于人小，力薄，吃不饱，一干十多个小时，这些童工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体力，忍受被巷顶的石块和煤矸砸破擦伤的痛苦。童工付出的劳动量相当于成人，而工钱却不到成人的一半，还经常挨日伪、监工和把头的皮鞭抽打。现在一些老工人身上留下的象“纹身”一样的黑斑，就是当年日军掠夺焦作煤矿、压榨矿工血汗的历史见证。

驻焦作日军只顾增加产量，不管矿工的死活和煤炭资源的浪费，强迫采取“高落式采煤法”。这种方法，由于没有开采规划和科学程序，危险性大，而采煤率只有30%。由于先从底板送道，然后来个“通天”，使煤块一层层从高处塌下来，经常砸死工人，矿工们诅咒这种采煤法为“以人换煤法”。

在驻焦作日军的残酷统治和疯狂掠夺下，焦作煤矿广大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在监工、把头的皮鞭下，矿工们每天劳动长达12小时以上，而得到的只是几个霉豆皮，后来只能得到二斤半发霉的橡子面。如此低下的待遇，还要遭受把头、包工的盘剥榨取，不仅不能养家糊口，连自己也食不果腹，许多矿工及其家属靠野菜、观音土充饥，挣扎在死亡线上。

矿工母顺典（解放后任王封矿矿长），全家23口人，饿死了19口人。矿工赵山祥每天下井，而每次领来的豆皮只能让一家6口人喝两顿菜汤水。生活逼迫使得他将刚满9岁和不满8岁的两个儿子带到井下拉筐。父子三人空着肚子干啊，干啊，流尽了血汗，终于有一天，赵山祥刚上井，便一头栽倒在地，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家人生活更加艰难，刚满6岁的四儿子对他妈说：“妈，我去拾煤吧！”然而，这个刚想替母亲分担生活重担的6岁孩子，没拾回来一块煤就被狠毒的矿警活活踢死在煤场边。1942年，仅李封东侧的大沟窑洞里居住的矿工及其家属，就饿死了六七十口人。王封东侧的大沟窑洞里居住的73户人家共卖掉亲生儿女76个，饿死380多人，东西大沟有96家绝了户。

在驻焦作日军的法西斯统治下，矿区变成了人间地狱。西大井有位矿工的妻子路过矿井岗楼，日军强行将这位新婚妇女扣留，迫其脱光衣服卧地接受检查，任意侮辱。日寇还经常窜进矿工家里抢粮抓丁，奸淫矿工妻女。西大井一个十七八岁的矿工，一天下班后在桥上行走，鬼子为了取乐，开车把他撞倒桥下，当即摔死。日军经常以“私通八路”、“怠慢皇军”等罪名，施用“灌煤油”、“老虎凳”、“鞭抽镐敲”、“刺刀穿”、“狼狗咬”，“大刀砍”、“烙铁烙”、“活埋投井”、“打活靶”等种种酷刑来迫害矿工。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焦作的七年多时间里，掠夺焦作煤炭资源500多万吨，破坏煤田资源1500多万吨，屠杀矿工及其群众数万人，烧毁房屋数万间，

月山寺、妙乐寺等著名古迹被日军破坏殆尽。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焦作，掠夺焦作煤矿、残酷剥削、压迫和摧残矿工的滔天罪行，十恶不赦，罄竹难书。

（中共焦作市委党史办赵宗军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掠夺浙江萤石矿

萤石（又称氟石）在冶金工业上用作熔剂，为炼钢、制铝的必需辅助剂。浙江萤石资源相当丰富，储量大，品位高达 70—80%、（外国一般只在 25—50%之间），且分布集中，开采便利。

日寇掠夺浙江萤石资源蓄谋已久。1914 年日本商人就进入浙江新昌看牛湾盗采萤石。那时，浙江采矿商所采的萤石，全由他们设在上海的三义、黑木、小林三家洋行垄断收购，其中大部分供给日本国内军用钢铁基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8 月 13 日，进攻上海。11 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12 月占领杭嘉湖地区。当时由于日军兵力不足，较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国守军在钱塘江两岸成对峙局面。

1941 年 4 月，日军占领浙江东部的象山县后，迫不及待地前往石浦五狮山茅洋萤石矿窥探矿源，测绘建房、铺轨、修路。但由于象山萤石矿规模小，远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于是，侵华日军于 1942 年 5 月发动了浙赣战役，为了配合这次武装掠夺，日军专门从国内征调了地质队伍，组成一个以日本自然科学研究员中东秀雄为首的“从军调查队”。“从军调查队”于 10 月间写就了一份 8 万余字的《武义——义乌两地区主要萤石矿产地精查报告》，对新昌、嵊县、诸暨、义乌、东阳、金华、武义等 7 个县的萤石矿床都作了详尽的论证，《报告》说“从萤石资源调查实施结果看，就武义为东方第一。武义萤石产地的开发，对于发展我国轻金属（制铝）工业，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矿物”，为此，日本作出了“五十年开采计划”，妄图“永久占领”这一资源。

当日军达到了侵占萤石产地的目的后，马上收缩兵力，围绕矿区进行部署。在主要矿区附近，挖堑壕，筑炮台，严密监视矿区内外的动静。矿区周围的村庄，则被日寇放火烧光。

日本侵略者对浙江萤石资源进行破坏性掠夺是十分惊人的。日寇侵占武义 3 年期间，盗采萤石达 30 万吨。日寇在一些萤石产地进行破坏性的开挖，既不作开采前详细勘探，也不作开采后的资源保护，他们在武义一个县挖的矿点就有数十处之多。

日本侵略者对浙江萤石资源的掠夺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对萤石矿进行直接经营管理，并由华中矿业公司下设浙江机构统一负责。华中矿业公司在义乌设有“南山矿务所”和佛堂矿务所”，在象山茅洋也有一个类似的机构。经营规模最大的是“武义矿业所”，它有雇员 400 多人，所长、课长和系长均系日本人。

日军还有计划地从水陆两路抢运盗采出来的萤石。日军在象山石浦堆石场码头调集了专门运载萤石的“兴亚丸”等 7 条船及 50 吨级大驳船数十艘，把从茅洋五狮山采下的萤石，源源不断地运至上海港，再海运到日本。

1942 年秋，日伪华中铁道公司组织抢修浙赣铁路金华至萧山段，1943 年春修复通车。日军为了抢运武义的萤石资源，又修建了一条从武义萤石矿通往金华的铁路专线，与浙赣铁路相衔接。日寇强迫金华、武义等地的三四万民工，日夜赶筑。日军对民工动辄棍敲、刀砍、刺刀捅，加上因爆破、塌方等事故，民工死亡达千余人。在这条长 45 公里的铁路专线上，每百米就铺设着两具以上中国民工的尸骨！日军还把金（华）兰（溪）铁路线上的火车头拉到金（华）武（义）铁路线上专事盗运萤石。贪婪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嫌萤石运得不够快，又在武义修筑公路，用汽车加紧抢运。

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开采萤石矿，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矿工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和丧尽天良的人性摧残。

日本人把矿工分为诸暨班、永康班、南京班、山东班等，通过工头分别管理。这些矿工实为“苦力”，衣背上都标上白布号码，以便计数，防上逃跑。

矿工们每天劳动 12 小时以上。矿洞里灯光昏暗，巷道低矮，矿工连身子都伸不直，只能猫着腰走。矿道通风严重不良，不少矿工被憋死。矿洞里生产秩序混乱，毫无安全保护措施，“冒顶”等事故几乎三天两头地发生。有一次下暴雨，一个矿坑塌方就压死 30 多矿工。

矿工生病就意味着死亡。1943 年下半年，各矿区内伤寒、霍乱蔓延。北方矿工不服南方水土，很多人染病，又吐又泻，天天死人。900 名北方矿工竟死了 500 多人。

日军灭绝人性，把所有染病的矿工关进既无医生、又无药物的“隔离所”，甚至连水都不给喝，任其病死饿死。有的矿工还未断气就被抛到荒野任狗咬鸟啄。

日本侵略者针对矿工的不满情绪和反抗，制订了严厉的“矿区法令”。违反“矿区法令”的，即遭毒打或枪杀。矿工朱小奶受不了矿区非人的生活煎熬，半夜里逃跑被日寇抓了回来，把他绑在树上，先是用火烧，后又对他剖腹挖心，狼狗撕咬，手段比禽兽还狠毒。一青年矿工不堪工头虐待，将工头劈伤后跳出矿井，越过敌防卫区逃脱。日寇恼羞成怒，竟一连抓了 10 个矿工，不分青红皂白用刀一一劈死。在杨家湾开采区，由于违反所谓的“矿区法令”而被打死，吊死的矿工就有 300 多人。

在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仅武义塘里、杨家两矿区，被迫害致死的矿工就达 2000 人以上。象山茅洋萤石矿丧生的中国矿工也有 2700 多人。整个矿区都成了“人间地狱”。在武义县菱道乡杨家村，有一矿工墓地，埋藏着日军侵占武义掠夺萤石时，矿工惨遭迫害遗留下来的 305 具尸骨。这是日本侵华期间所犯滔天罪行的一个历史见证。1957 年 9 月，浙江全体萤石矿工人，于墓前立碑，上书“纪念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死亡埋葬在此的三百零五名工人阶级兄弟”。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王彬彬）

大肆掠夺上海经济

日本侵略者要推行它的“以战养战”的政策，就必然把上海这个地区作为重点掠夺的对象，所掠夺的数量是巨大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经济掠夺的重要一环是夺取中国关税。“八一三”后，日本帝国主义曾正式通知原来控制上海海关的英国当局，将过去关税存入英国汇丰银行，改为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当时，英国政府期望日本进攻苏联，因此执行绥靖政策，同意日本这一做法。以往中国政府所借外债，有好几种是以关税作押的。可是当正金银行收存关税后，却不把关税另行拨出作偿付外债，而是把这些款项用于套取外汇和充作日本侵华的经费。结果，偿付外债，由我国中央银行垫付。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上海等地全面推行金融统制和金融垄断。他们先是强行滥发军用票和由汉奸维新政府发行华兴银行伪币。这种“货币”根本没有什么保证金，发行额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从来没有统计过。日本帝国主义用这种花花绿绿的纸张强迫市民和郊区农民接受，“换取”大批物资，并且用这种“货币”“换取”中国的法币再兑换美钞、英镑等外汇。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1941年1月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币中储券。而中储行的命运是掌握在日本顾问手中的。按照他们的规走，日本正金银行只要在中储行账面上有一笔空收的军用票存款的账目，就可连续不断和毫无阻挠地提取大量中储券。日方就可以拿这种中储券“换取”中国人民的商品、财富。

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一带还大肆贩卖鸦片、白粉等毒品，以此掠夺上海人民的财富和残害无辜市民。大批人因吸毒而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大批烟民尸骨堆于荒郊野外。有的还未死亡的烟民，为了满足烟瘾，竟把那些尸骨煮汤来喝。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敲骨吸髓地吞噬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来满足他们侵略战争的需要。

对华资工厂，日本帝国主义尽其欺诈豪夺之能事，想方设法归其所有。“八一三”战争结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地区，成立了“清扫班”，进行公开掳掠，他们把因战争损坏的工厂机器、物资，归其所有，数量极大，堆满了虹口地区好几个大广场。1938年12月，日军成立了“兴亚院”作为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统帅机关，提出“建设重于破坏”，“开发重于封锁”的口号。口号的实质是榨取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补救它日益枯竭的财政经济。他们对尚能利用的华资工厂根据不同情况，以多种形式进行强占，有：（1）军事管理。凡和军事有密切关系的工厂，如电力厂、造船厂、机器厂等，由日本军部直接控制。（2）委任经营。强迫华商业主“同意委托”日商经营，如业主拒绝，以“无主产业”名义直接“委托”日商经营；一经“委托”，经营管理权和利润都归日商。这些都属于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工厂，如棉纺织厂、面粉厂、卷烟厂等。（3）“中日合办”。实际上“合办”有名无实，是日方独占。（4）“租赁”。“租赁”条件由日方单方面确定，没有商量余地。（5）“收买”。“收买”价格由日方确定，业主拿到的是军用券。这样，上海的造船、水泥、缫丝、棉纺、面粉、橡胶、火柴等大批华资工厂都被日军攫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宣告全面沦陷。

日本把美、英籍工厂也都霸占。对设于租界的华资重要工业品和工业原料等又采用各种办法加以掠夺。(1)以“加强统制”的名义加以掠夺。12月17日，日陆海空军最高司令部颁布《重要物资申报布告》，宣称要查清上海物资储存底细，威胁说：“如隐匿不报或呈报不实者。依军法处置。”所谓重要物资，包括范围甚广，棉纱、布匹等民用必需品，以至钢铁、五金、汽油、药品、橡胶等。华商迫于日帝的淫威，不得不把存货申报。1942年3月27日，日本又以上海方面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名义发布，凡使用、制造、贩卖18类物资者均受统制，倘无日本“兴亚院”许可，概不得移动。这18类物资有“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麻及麻制品、皮革、橡胶及其制品、木材、矿油类、煤炭、药品原料、颜料及油漆、油脂及树胶、医药用品、机器及附属品、米及食粮、纸类。总之，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都被列为统制对象，受日方控制。(2)1942年3月，日本侵略者以“征购”军用物资名义命令新药业同业公会提供大量重要药品及制药原料，限期查报。“征购”价格只有市价的10%。同业公会感到这种“征购”太苛刻，要求减少“征购”数量和品种，提高“征购”价，放宽交货期限，则遭日方封厂、扣货的灭顶之灾。(3)1943年8月，他们的借平抑飞涨的物价为名，由伪政府“商业统制会”出面，强制“收购”全市棉纱、棉布。龙头细布以28%的市价“收购”，棉纱以25%的市价“收购”。支付分两期，第一期付一半，其中自收购日起3个月付给半数，满一年再付半数，第二期的一半，以伪币“中储券”支付，分三年付清，每半年付六分之一。当时伪币贬值迅速，三年以后伪币打了很大折扣。如果业主拒绝日方“收购”，则除货物没收外，还将判处一至五年徒刑及5万元罚金。据伪政府“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宣称，共计“收购”棉纱、棉布达206244件。1943年起又强行“收购”华商工厂各类机床，如五兴机器厂被“收购”4台铣床，开价时约合黄金400两，可是最后付款只有黄金20两，实际上只有原价的5%。如有人不愿接受“收购”，日方就在看中的机床上面挂一张牌子，写着“本机械是海军第一经理部儿玉机关所属，任何人不得移动，如敢故违，按军法处治”。接着强行搬走。(4)所谓“捐献”钢铁给日军制造武器。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越来越不利，钢铁资源越来越缺乏。名义上由日商纱厂“捐献”，实际上把华商、英商工厂大批机器设备拆除“捐献”。在这样情况下，大批华商工厂已不能生产，即使尚能动工生产也仅能支撑门面而已。著名的阜丰、福新等5家面粉厂开工率仅9.71%。35家华商橡胶厂，停工及半停工达20多家。其余各行各业也大致相同。

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这是人类一段悲惨而可耻的历史。那些坚持法西斯立场的人妄图否认和抵赖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历史事实。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张义渔)

对北平经济的统制和掠夺

掠夺华北资源，实行日本、满洲、华北经济一体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战争而制订的基本国策。1937年12月24日经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制定的“事变处理大纲”在“华北处理方针”中就明确提出：“经济上以建立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华北后就采取直接霸占和强制开发两种方式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

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以野蛮的直接霸占为主。日军每占一地，对中国的工业企业，不管是官办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他们认为必要，就以军“管理的”方式霸占。在“军管理”期间，军队对该企业的财产有绝对支配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将企业委托给日本的有关公司在经营。当时，协助日军实行军管理，随后受托经营较多企业的是“满铁”属下的兴中公司。至1938年8月，兴中公司在华北搞了11个公司，其种类有电业、矿业、棉业等，基本上是靠军管理强行霸占的。在北平被强行霸占的企业有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清河制呢厂等。北平至华北各地的铁路运输业，更是日军霸占的重点。华北铁路上全部设施均被日军当作“战利品”占为己有。其中有铁路工厂10个，机车300余台，客货车4600余辆。

武汉战役结束后，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因而把对华北的资源开发作为经济掠夺的主要方式。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掠夺，日本侵略者把华北的一些主要的工矿、交通运输业划为“统制事业”，由专门成立的“国策会社”独占；未划入“统制事业”的企业称“自由事业”，允许日本人私人经营。

在华北的“国策会社”又称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它于1938年10月30日成立。按照上述《事变处理大纲》的规定，这个会社的任务是“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有关主要的交通运输业（包括港湾及道路）、主要通讯事业、主要的发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业及其化学工业等。”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成立后，通过“综合调整”，很快把华北原有的各类工厂30余家统制在自己的名下，成为它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包括生产、运输、原料、动力等方面，每个子公司又有分子公司，形成庞大的垄断网系。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垄断华北经济命脉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把战争初期日军强行霸占的企业，从“受托”经营的日本大公司手里统制到自己的名下。如石景山炼铁厂原由日军委托兴中公司经营，从1940年12月开始被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制起来，改组为石景山制铁矿业所，进行增资扩产；二是以“中日合办”为名侵吞企业。如华北交通会社，在形式上是“中日合办”，规定资本3亿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出1.5亿元，满铁出1.2亿元，伪华北政府出3千万元。从股份上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占50%，满铁占40%，伪华北政府只占股份的10%。因此，实际上华北交通会社是日本人的会社。应特别指出，伪华北政府的3千万元股金是以华北铁路器材设备作为“现物出资”的形式。而华北铁路工厂和铁路车辆的最低折价也将近1.5亿元。可见，华北交通会社的资金基础乃是被他们霸占的中国原有资产。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制之外的事业，作为“自由事业”，任由日本私方

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上），第56页。

“满铁”是南满洲铁道公司的简称，是日本政府掠夺中国东北经济的经营机构。后来势力渗透到华北。

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112页。

进行掠夺。随着日军的军事占领，日本的财阀、投机商人、高利贷者，以及贩毒浪人、妓院老板等各色冒险家纷纷涌入华北，谋求发迹。到 1941 年 6 月为止，日商在北平的企业达 2182 家，其中属于工业的 399 家，绝大多数是 1938 年以后开设的。

日本私方开设的企业，有些是靠掠夺中国的场地、资源新开设的，如“北京锻造株式会社”、“琉璃河水泥厂”、“北京酸素株式会社”、“厚生橡胶厂”、“北支乳胶制品厂”、“北支制药株式会社”等，有些是以“合办”为名霸占的，如燕京造纸厂、永增铁工厂、海京铁工厂、日华合资门头沟炭坑株式会社、东安市场、东来顺饭庄等。所谓“合办”，多数属于日本人不出一分文或出少量的钱“收买”企业的部分股份，然后操纵企业的经营权或者坐吃企业利润。如日本浪人久津太郎没有任何印刷设备，到处包揽生意，然后用低价转交京华印刷厂承印，从中谋取暴利。他到厂里俨然是个太上皇，强行指挥生产。厂里稍有违抗，就以“与皇军不合作”治罪。

无论“国策会社”经营的“统制事业”，还是日本私方经营的“自由事业”，其经营方式都是极其野蛮的。日本经营者在企业里以征服者自居，视中国人为奴隶。他们为所欲为，暴戾恣睢，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的血汗。他们在企业里的管理手段一般都是通过两大系统。一是作业系统，即企业中的作业管理人员（包括领工、监工）均由日本人担任；所谓管理，实际是拿着刀、枪、棍、棒，牵着狼犬，监视着工人劳动。二是特务系统，即在企业中设“劳务课”等特务机构，配有武装或便衣特务，监视工人的言论行动，可以任意逮捕、迫害工人。如石景山制铁所，日本人在厂里及其周围村庄建立的特务组织中，仅日本特务就有 1200 多名，还豢养一批汉奸、走狗作帮凶，对工人进行严密监视，随时镇压反抗的工人。再如门头沟煤矿，矿内外设十几个炮楼，炮楼上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岗哨监视工人，矿内有驻兵和日本特务机构——谍防部，还有伪警察所。矿工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严密的监视下。整个煤矿如同一座监狱。

日本侵略者除侵吞和霸占中国企业外，还在金融方面进行野蛮的掠夺。1938 年 2 月 12 日成立的由日本侵略者操纵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简称伪中联），总行设在北平，3 月 10 日正式开业。开业后大量发行无储备的不兑现的纸币“联银券”，全凭军事需要滥发，依靠暴力强制华北人民使用。发行数量从 1938 年 3 月伪中联开业至 1939 年底，发行“联银券”达 4.56 亿元，到 1942 年 1 月底，已突破 10 亿元大关，到 1942 年底发行额又猛增至近 40 亿元。“联银券”的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涨。最初发行的“联银券”，票面只有 1 元、5 元、10 元三种，后来随着发行量的增大，印刷速度跟不上，就增发 50 元、100 元票面大钞。到 1945 年 3 月发展到增发 500 元票面大钞。刚过两个月又增发 1000 元票面大钞。最后到日本投降时，竟出现了 5000 元票面大钞。据一直任伪中联总裁的汪时璟供认，在他任职期内共发行伪钞 1238 亿元。当时在华北被日本侵略者统治的人民不过 1 亿人，平均每人占 1238

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 114 页。

见《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 822 页；《文史资料选编》第 34 辑，第 209 页。

见《驰名京华的老字号》第 300 页。

见《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 817 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 73 页。

元。物价飞涨的速度，在北平以玉米面计，1939年每斤1角左右，1942年12月涨到每斤1.05元，1944年8月中旬每斤涨到5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每斤涨到1000元至1400元。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内玉米面的价格上涨了1万多倍。

日伪在发行“联银券”同时，极力排斥和打击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1939年3月，伪临时政府颁布《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宣布法币禁止流通，强令人民用法币以低值兑换“联银券”。日本侵略者将掠夺到的大量法币到国统区套购外汇和购买物资，补充军用，从而又加剧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对劳动力进行残暴的掠夺。1938年6月18日，北平以伪新民会的名义成立了“首都指导部劳工协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办理“劳动供给”事务。1940年8月22日，伪新民会又在北平设立劳工总署，负责统制华北劳工。1941年7月8日，直接受日本军部和日本特务机构兴亚院控制的伪华北劳工协会在北平成立，取代了原来的伪新民会劳工总署等掠夺劳工的组织，成为统制和掠夺华北劳工的统一机构。日本侵略者掠夺劳工的方法：有的是以招募劳工的方式，使大批失业者上当受骗；有的是用武力强行抓走。当时在北平的大街上、娱乐场所。经常出现日伪军警围抓青壮年，立时押上汽车运去当劳工的残暴景象。北平地毯厂工人崔占宝、小商贩何贵生就是在街头被无端抓走的。据统计，仅1937年—1942年期间，被日伪从华北抓走和骗走的壮丁就有529万人。日本侵略者把抓到和骗到的劳工运往伪满、蒙疆和日本的工矿企业去做苦工。日寇把劳工不当人看待，任意杀害、虐待。被他们杀害和虐待至死者，不计其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把华北作为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因此，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更为加剧。掠夺的方式是开发和抢夺并用，开发更为加紧，抢夺简直明火执仗。

在北平，日本侵略者以没收“敌产”为名又进一步抢夺原属英美的企事业及财产。如，协和医院、燕京大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即被日军霸占。一些日本人借机发迹，把他们看中的民间产业，也当作“敌产”肆意侵吞。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就已实行所谓物资统制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经济掠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1943年6月21日，伪华北政府发表布告，规定从即日起，禁止粮食自由买卖。随后又制定了《华北扰乱经济统制紧急治罪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囤积重要物资隐匿不报、私行移动大量物资者，除没收其物资外，还要处以罚金、徒刑或死刑。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以检查“统制物资”为名，任意闯入工厂、商店和私人住宅，查抄“统制”的物资，并加罪于主人。他们在北平仁立地毯厂查封了库存羊毛原料，迫使工厂停工停产，工人失业，生活陷入绝境。崇文门外谦益隆布店的库存棉布折合黄金近百两，被日本宪兵以“私通八路”为名查抄运走。

在日伪的物资统制政策下，许多工厂断绝了原料来源，被迫停产。尤其是北平的轻工业，如纺织业、制革业等，多数工厂停了产。仅皮毛业倒闭者就不下百十家。纺织工业有3/4的机器因原料断绝而停开，只有1/4机器为

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第280页。

蔡德金：《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213页。

日本纤维公司加工。一些手工业作坊，如食品、铁工、针织等作坊，亦多数停产。通州曾有铁铺 14 家，此时只剩下三家。广大失业工人流离失所，饥寒交迫。

在日本侵略者所霸占的企业里，对工人的榨取更加野蛮。他们增大工人的劳动强度，不顾工人死活。如在石景山制铁所，1942 年 7 月曾发生一次炼铁炉结瘤事故，日本监工强迫工人冒着高温钻入炉内扒料，渣料塌落，烫死 5 人，重伤 18 人。据 1944 年 3 月的“北支制铁作业月报》记载，这一个月发生大小工伤事故 31812 次。工伤事故次数已超过在厂工人 25000 人的数字。在日军统治的八年中，石景山制铁所共炼出 25 万吨生铁，全部运往日本，可以说每吨生铁都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炼出来的，在门头沟煤矿，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出煤，竟把井下大巷边的保安煤柱也采空，不知有多少工人因此而丧生。

当时北平各企业工人的生活已从饥饿线下降到死亡线上。1943 年前后，由于日本侵略者通过“物资统制”把大量粮、棉、油、盐等物资掠走，造成北平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在石景山制铁所，工人穿的是麻袋片和洋灰纸袋，吃的是“混合面”；还要在日本人的棍、棒、刺刀下挣扎着劳动。每天都有许多工人因饥寒病饿而倒毙。1943 年 10 月 5 日，在工作场地附近，一次处理因饥饿死亡的工人尸体就有 36 具。1943 年 7 月一个月内，因饥饿和疾病流行，死亡达 2000 多人。而此时，日本人却不顾中国人死活，正在该厂增建日产 20 吨小型炼铁炉 11 座、日产 380 吨大型炼铁炉 1 座、日产 300 吨炼焦炉 1 座，以加速掠夺华北的铁矿资源，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日本侵略者除加重对企业的掠夺外，对北平市民的掠夺和压榨也变本加厉。首先，加捐加税，横征暴敛，加重北平人民的负担。如 1942 年 9 月，日伪华北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将原所有税额增加数倍，并加重所得税。此外，日伪政府还搞了些五花八门的“献纳”运动，如“献金”、“献机”、“献木”、“献袋”等运动。所谓“献金”，即搜刮民间铜品供给日军用于制造武器。1942 年 1 月，伪北平市公署成立“金品献纳委员会”，负责搜刮民间铜品、铜物，至 1944 年初，“献纳”铜品达数十万斤。北平居民的家用铜制器皿、门环等，都被强行掠去。故宫的铜质文物，也被强行运走 2000 多斤。所谓“献机”，即伪市公署向市民强征“献机”基金，购买飞机“献给”日军，支援“大东亚战争”。仅 1942 年两次“献机”就有 8 架，价值近百万元。所谓“献木”，即由伪市公署负责将北平成材树木全部砍伐，“献给”日本，计有 2 万余株被日军掠走，许多有保留价值的古树亦被掠走。所谓“献袋”，即由伪市公署征集“大东亚战争慰问袋”，“献给”日本侵略军。

在日伪加捐加税，强征暴敛的同时，对北平市民的生活物资实行严格的统制及配给。由于日本侵略者把大量物资掠走，造成物资严重短缺，所谓配给，实际上已经无物可配。1942 年底，日本侵略者计划 3 个月内掠夺 3000 万担粮食运往日本。而北平市民在 1943 年已经连“混合面”也难以买到，有的人靠吃草根树皮度日，甚至有的人在日本军营附近拾马粪充饥。这个时期，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时常可见因饥饿而倒下的尸体。在天桥一带每天都要往

《北京工业史料》第 314、518 页。

《北京工业史料》第 314、518 页。

永定门外拉走十几车死尸。这种惨象，是日本侵略者对北平人民敲骨吸髓地榨取所造成的。

从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北平，到日本投降，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整整统治了八年。这八年间，日本侵略者对北平人民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的野蛮掠夺，以及敲骨吸髓的压榨，给北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广大北平市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这是北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也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荣国章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稿）

扼杀天津的民族工业

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永远昭示后人，妄图以残暴征服世界的狂徒——日本军国主义者，将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世人所唾弃，和平与发展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天津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于1937年7月30日陷入敌手，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长达八年之久。津城父老绝不会、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兵燹津门，凶狠肆虐地攫夺了他们祖祖辈辈辛勤劳作所创建的工矿企业，将他们积累的财富劫掠一空。这种旷古未有的掠夺贯穿于日军占领天津始末，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不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交叉性。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倚强凌弱的“经济开发”，不仅导致了天津民族工业的凋零衰败和畸形发展，而且大大加深了天津殖民化的程度。

恣意侵占，巧取豪夺

日本侵略者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超过中国，认为在短时期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实现其迅速占领中国的目的。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北平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溃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战争初期，即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到1938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军事上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相适应，便对天津工业实行恣肆无忌的直接掠夺，以保证侵华战争的军需供应和国内军工、民用企业生产的需要。

日本侵略者掠夺天津民族工业的基本方式是：“军事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购买”等。

所谓“军事管理”就是指原由中国人民经营的厂矿企业，一是因经营者逃亡，或其厂矿企业遭受战争的破坏无力恢复，而日本方面认为必须迅速恢复生产的重要企业，由日本当局实行“军事管理”。日寇占领天津初期，采用“军事管理”的方法掠夺了大批华资企业，移交给私营会社代为经营（所有权属于军方，私营会社只有经营权），二是规定，凡属交通、电器、通讯、采矿、钢铁、化工、纺织、军工、机械等行业均可实行“军事管理”。

“委任经营”则是日军将掠夺的部分企业全权移交给日本私营会社经营。也有一些日本工商业者趁日军进攻天津之际，自行劫夺了部分工厂并将其纳入“委任经营”之列。与“军事管理”不同的是无论企业的所有权或经营权都操纵在日本会社手中，与军方无关，不受日本军部的管制。沦陷时期，属于“委任经营”的主要有制革、榨油、制药、制糖、烟草、针织、酒精、电器、肥皂、油漆、丝织、毛织等行业的部分企业。

“中日合办”是由日本国营会社将自己控制、经营的工矿企业强行与华商企业合办，被迫与日方合作的华资企业也要隶属于日本国营会社之下，在资金、管理、生产、销售等方面均要听命于日方。在供电照明、邮电通讯、铁路机车、轮船运输、化工原料、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煤矿开采等行业均有所谓“中日合办”的企业。此外，日本还通过胁迫性的“租赁”，夺取华商经营的主要涉及机械、纤维、化工、日用、水产、制盐等行业的厂家。日本商人还和军方勾结，以低廉的价格强行“收买”沦陷区的华资企业或设备及产品。所谓的“中日合办”、“租赁”、和“收买”等三种方式实际上也是依靠武力胁迫、政治讹诈来推行的，在本质上无异于“军事管理”和“委任经营”。所谓的“中日合办”实为日本独占，所谓的“租赁”、“购买”

无非是巧取豪夺的代名词。

天津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于1906年先后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公司。这两个公司从开办后一直保持着高额的利润。此后他又创办了华北新纺织有限公司，下设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厂，获利颇丰。在开平、滦州两矿合并后，周学熙又着手1922年3月创立了青岛耀华玻璃公司。这是我国北方著名的近代化企业，所生产的玻璃，品质优良，全国驰名。对于这些企业，日本侵略者很早就有染指之心，“七七”事变后，启新和开滦被日方以“军事管理”的名义霸占，华新公司下属天津、唐山两纱厂及耀华玻璃公司也被日方以“中日合办”为名，掌握手中。又如，天津唯一制造硫酸的企业利中酸厂在“七七”事变前就遭到日货的排挤，但是该厂依靠改进技术，降低成本等途径，使工厂得以生存和发展。日军占领天津后，在与利中酸厂的竞争中惨遭失败的“大清”、“金山”、“清山”三家日商，便以“军事管理”为名，带领日军占领该厂，并将企业的总技师扣押，然后送至日本“受训”，这位总技师因受精神打击过甚，归国后不久即忧郁而死。日本商人，以侵略军为靠山强行霸占该厂后，经理、技师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均由日本人充任，攫取了酸厂的全部设备和产品。此外，还有面粉、水泥、火柴、冶金、翻砂、造纸、印刷等行业的部分企业也被日本当局以“军事管理”的名义霸占。

横征暴敛，竭泽而渔

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期间，不仅以上述五种方式对工矿企业进行鲸吞虎噬，而且还以“统制物资”为名，规定与军需、民用有关的钢铁、粮食、棉纱、棉布、皮毛、烟草、火柴、建材、染料、汽油等40余种主要物资实行管制，严禁自由经营和贩运。这是日本侵略者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政策，肆意劫掠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具体表现，对于惨淡经营的中国民族工业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天津的橡胶工业有十几家工厂，日本当局将生胶、棉纱、汽油等必需原料列为“统制物资”，严重限制了工厂的生产，加之日本“福助”、“中村”等橡胶厂的商品倾销，使天津的橡胶工厂岌岌可危，无法维持正常生产。专门制造机器轮带的飞龙橡胶厂购买了一批汽油、煤油等原料，被日本清水部队发现后立即没收，并将该厂的负责人逮捕扣押。

日本侵略者还规定，机器染整各厂不准自由经营，只能为日商“三井”、“三菱”等洋行代染加工色布，并不准备厂储存白色坯布和染料。仅同顺和、万新两厂就被日方抢走色布500余匹，漂粉精120桶和其它染料。万新染厂的经理因抵制这些暴行，曾被抓到宪兵队审讯。与此同时，敦义、天义丰、同聚和等30多家染整厂也同样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劫夺，均陷入停工状态。

沦陷前天津有四五十家炼油厂，沦陷后日本当局将矿物油也列为军用品，禁止华商生产和贩运。在占领者的宰割下，最后只剩下恒达、兴记、新亚三家，而且把炼制煤油改为炼制黑油，勉强开工。此外，日本侵略者还以“征购”军需品为名，实行公开的横征暴敛。1944年4月，日军正准备进攻我中原地区，需要大批自行车充作军用。日商昌和洋行便和日军相勾结，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先将春立德、华立成、同丰、兴立德等几家大车行的存货全部查封。随后又借口“协助大东亚圣战”，勒令自行车业公会在浙江会馆内成立“协助东亚圣战完成临时购车委员会”代办购车。这次共“征购”自行车1.5万辆，只给了1%的代价。同年10月，专门给日军搜集战略物资的长

城公司经理、日本浪人野崎丰，勾结伪商会及日军，查封了全市的车行，将自行车行业的所有存货洗劫一空。多次遭劫的天津自行车行业从此一蹶不振，较大的几家行车行均相继破产倒闭。

天津沦陷初期，日军以津城作为掠夺华北的中心，并由天津向华北辐射，使整个华北成为它扩大侵华战争的军事基地。日本当局通过凶残、贪婪、直接的劫夺，获取了大量的军需和民用物资。据统计，仅在 1937 年至 1938 年的一年中，日本占领者就以“军事管理”的名义从天津掠走了价值约为 64 万英镑的物资。特别是日军封锁了天津的水陆交通，控制了天津港，并接管了天津海关之后，天津便成为日军战略物资的加工和集散地，凡是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均为其所劫夺。天津的工业完全纳入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

由于“军事管理”、“委任经营”等方法都是竭泽而鱼的手段，伴随着大批工厂的停产和倒闭，日本当局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以保证其不断扩大战争的需要。

诡谲狡诈的“开发”，藏形匿影的巧取

日本侵略者在直接掠夺天津原有工业的同时，为了避免杀鸡取卵所带来的恶果，还在华北和天津投资新建或扩建工矿企业，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进行生产，以维持长期战争的供给，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就是日本推行的所谓“经济开发”。日本实行“经济开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政策，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敢公开投降，出现了持久抗战的局面。在 1938 年 10 月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已陷入长期战争的困境，各种矛盾明显地表现出来，特别是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日本国内军费剧增，资金极度缺乏，经济非常困难。由此日本华北后要实现的经济目标，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计划开设津石铁路和扩建天津新港，以便将掠夺的工业原料和其它物资运往日本。到 1942 年，日本又针对华北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个“三十年计划”，其宗旨是将华北作为日本的经济附庸，提高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能力，为日、“满”，提供成品和半成品，使华北在日本战时经济体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华北是日本在关内进行“经济开发”的重点区域，天津则是在华北进行“经济开发”的重点城市。它不仅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和贸易中枢，工业基础较为雄厚，而且是日资比较集中的地区，早在 1936 年，日本在天津的企业已有近 2000 家，资本额高达 2400 余万美元。沦陷期间，日本除了扩建原有的工厂企业外，又新建了包括钢铁、机械、电力、化工、橡胶、纺织、造纸、火柴、建材、制药、皮革等各种类型的工厂。

纺织工业。棉纺织业是天津民族工业的主干，抗战以前，天津拥有华新、裕元、恒源、裕天、宝成、北洋等六大纱厂。到 1936 年，由于日本当局和日商的排挤，恒源、北洋、裕元、宝成等已相继停工停产。不久，华新、宝成、裕元被拍卖给日本钟渊、东洋拓殖会社等财团，裕大也因有日本投资而被日商接管了。日商通过设立新厂和兼并中国原有的工厂，已经垄断了天津的纺织工业。天津沦陷后，日本建立的“华北纤维统制协会”更全面地控制了棉花的生产、销售。同时，还大量增加了对天津纺织工业的投资，由 1936 年的 2557 万日元增加到 1938 年的 6977.9 万日元。增加了 1.7 倍。先后建成了上海、双喜、大康等几家纺织厂。到 1940 年，天津日商纱厂的纱锭比 1937 年增加了近 1 倍，线锭增加了近 1.5 倍，织机增加了 2 倍以上。这时天津纺织工业曾一度达到纱锭 555952 枚，布机 10281 台，其中日资占纱锭的 80% 以

上，占线锭、布机的 90% 以上。

机械工业。日本当局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对基础性的机械工业采取了扶植和控制政策，建立了一批新的机械厂。到日本投降时，天津已有机械厂 300 余家，其中属于日资的有 75 家。工作机械共约 2000 台，其中 30% 为日本制造，其余大多为天津制造，也有青岛、上海和英美等国制造的。这些厂家主要为日方生产军械和工业机械。

冶金工业。1938 年以后，日本当局加快了“经济开发”的步伐，进一步掠夺天津的冶金工业。到 1945 年，日本在天津拥有冶金企业 14 家，已具有炼铁、炼钢、轧延、冷拔、合金、制造金属品和耐火材料等生产能力。主要有：1938 年，伊藤信广在天津河东小孙庄建立的伊藤兴业株式会社（天津轧钢四厂的前身）。1939 年，原日本海军军官石川爱三郎在天津陈塘庄设立的兴亚钢业株式会社（天津第一钢丝绳厂的前身）。1943 年 10 月，中山钢铁所和北支那株式会社在天津河东娄庄子合办的天津制铁所（天津钢厂总库前身）。以上企业都操纵在日本各大财阀手中，直接为军事服务。天津的民族冶金企业在日本的“开发”和压榨下，处于瘫痪状态，勉强维持生产的二十余家工厂也被日本当局控制，仅能为日方加工军需产品。

化工油漆业。这一时期，日本在天津已开办了大清、维新、大丰、福美、东亚、大和等化工厂，其中以 1940 年成立的东亚油漆公司生产能力最大，可以满足当时华北涂料需求量的 50%。化工油漆业的生产基本上被日方独霸。

橡胶工业。日本在占领天津期间扩建了原有的日资橡胶工厂，又新建了 5 个同类工厂，其设备比较先进，生产能力较强。产品包括采矿业所需的各种胶管、胶带，汽车内外胎、医疗橡胶用品等。到 1945 年，日资橡胶工厂的产量约为天津橡胶工业总产量的 80%。为日本掠夺中国矿藏和运输及医疗用品提供了保证。

面粉工业。天津的面粉业由于受战争影响，大部分厂家原料中断，很难维持。1938 年日本收购了嘉瑞面粉厂，更名为“三吉面行，又改名为“东亚制粉株式会社天津工场”。1939 年又增加了 6 台磨粉机，日产 300 包。生产的面粉主要是保障日军的供给。

火柴工业。1939 年 2 月，日本在天津成立了火柴联营社，并在天津、青岛、上海设立了分社，由天津分社负责控制华北地区的火柴生产。火柴联营社垄断了该行业的原料供应，生产和销售，华商的火柴厂也被日本统制。天津在华北火柴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1939 年华北火柴产量约为 17 万箱，其中天津生产的有 11.6 万多箱，占该年华北火柴产量的 69%。

制盐工业。在日本入侵之前，天津沿海地区有汉沽、塘沽、新河、邓沽、大清河等盐场，盐田面积多达 24 万余亩。日军占领天津后，鉴于盐田是工业用盐和民用盐的主要来源，并能补充日本国内的需要，便成立了华北盐业公司，同时指使汉奸成立了兴芦公店。沦陷期间，先后开辟了盐田 25.3 万余亩，华北盐业公司和兴芦公店的原盐大多输入日本，每年达几十万吨。

为了掠夺天津和华北的资源物产，日本从 1939 年开始扩建塘沽新港，到日本投降时，新港基本建成了四个 3000 吨级的杂货泊位和一个 5000 吨级的煤炭泊位。日本从天津港口运出了大量的煤、铁、盐、棉等工业原料，并掠走了成千上万的华工。

通过所谓的“经济开发”，日本对天津民族工业进行了全面的掠夺，天津的经济命脉完全控制在日本当局手中，成为日本在华北乃至全国的武装和

经济侵略的基地。然而，这种“经济开发”到了1943年底便由于日本陷于即将战败的困境而结束，代之而起的又是对天津民族工业疯狂的直接劫夺。

欺无罔地的阴谋，贻害无穷的祸患

“物资统制”和“经济开发”导致天津民族工业畸形发展。日本当局在华北和天津实行“物资统制”和“经济开发”主要是为了保证军需，因此，“物资统制”必然导致部分工业原料的缺乏而影响相关企业的生产，只有那些不受“物资统制”的行业才能得以生存，但这仅仅是极少数。同时，在“经济开发”的招牌下，生产急需军用品的工厂企业能够得以发展，而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却日趋衰落。例如，日本当局对天津纺织工业备厂所需的原棉、毛纤维实行统制分配，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军用部分所占比例逐年增加，1942年为45.8%，1943年增至55.2%，1944年又增至64.2%。最初，毛纤维的60%作为军用，几年后竟高达94.6%。天津纺织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天津东亚、仁立两厂主要依靠为日本加工产品维持，因开工不足，难以以为继，东亚曾一度转业生产西药。天津制革业在1937年以前曾发展到100余家，到1942年只剩下42家。华北制革公司在抗战前有职工120余人，每天可制皮革100余张。天津沦陷后，在日本当局的压迫下，不断拆除设备，只留下少部分勉强维持生产，但由于购入的原料有限，只好转产织牛毛鞋里或制土线袜子维持。天津面粉业在沦陷初期，还能从本地市场购进少量小麦，或从洋行进口一些小麦作为原料。在1939年日本建立“华北小麦协会”后，小麦全部由三井、三菱等会社统购，对各面粉厂实行原料统配，一部分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另一部分工厂则被迫完全停工。

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开发”中的投资具有很强的掠夺性和欺骗性。日本为了推行所谓的“经济开发”，在华北和天津进行了一系列投资，投资额较战前有了很大的增长。1938年日本在华北的投资比1936年增长了137%，其中在天津的投资增长了374%。从同时期日本在关内的投资比例来看，天津所占的比例从9%上升到25%，达到4亿多日元。抗战中期，日本在天津的投资继续增长，1942年比1939年又增长了38%，日方开办的企业和所谓“中日合办”的企业达240余个。这种投资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在于：第一，日本在华北和天津投资的实际增长值是要大打折扣的。日本原有的投资能力有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力殫财竭，严重的限制了本身的投资能力，为了继续推行它的开发计划，日本当局便欺世盗名，大量增加了合资企业，即所谓的“中日台办”。1938年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它的融资额1945年比1939年增加了近600倍，华北开发公司规定，所属合资企业，中国方面出资45%，日本方面出资55%，中国出资除现有资本外，还有现物资本，即由原有的设备、器材等折算而成，折资多少完全由日本方面决定。至于日方的出资则经常是空话，即便交足也大部分是军用票、公司债之类的废纸。第二，所谓的投资开发实质上是日本侵略者骗取中国的资金和人力、设备来为日本的战争经济体制服务。1941年以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自给主义”原则，要求沦陷区中日本控制的企业，必须从中国榨取资本而不得从日本输出资本。如果说日本侵略者对天津工业的掠夺以前还需要下一点本钱的话，那么此后它就一点本钱也不愿花了。

日本当局的“经济开发”是为其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因此，这种开发也不断加深了华北和天津的殖民化程度。这些工矿企业的建立实质上是日本侵略者利用从中国抢掠的资本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杨生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稿)

霸占“永久黄”化工集团

永久黄集团创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之中，发展于中华民族危难之时。该集团是包括中国第一个精盐厂（久大盐业公司），东亚第一座大型苏尔维法制碱厂（永利碱厂），亚洲第一流水平的制酸企业（南京永利硫酸铵厂），第一个中国民营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学研究社）及一系列化工企业的民族实业团体。

1937年，“永久黄”经历一番艰难创业之后，事业蒸蒸日上。仅碱厂就有工人1000多人，职员100多人，其中老的技术员都具有20年的制碱经验，年轻技术人员也都是阵容整齐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用旧的机器设备，制出比进口还强得多的产品。在1936年产碱量达到55410吨，烧碱年产4646吨，是建厂以来的最高记录。设在南京卸甲甸的硫酸铵厂于1937年2月正式出产农肥和军需产品，日产硫酸铵250吨，硝酸40吨，趁春耕之机，产品运销到苏、浙、闽、粤乡村，大受农民欢迎。

可是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响，使永久黄诸企业毁于一旦。

强盗的逻辑

日军侵华有如洪水猛兽。铁路交通中断，原料不能进来，产品无法运出，永久黄所属各企业都在沿海地区，生产经营难以进行。国难当头，永久黄集团为了保存国家建设力量，支援抗战的军需物资，补充后方的民用供给，“宁举丧，不受奠仪”，决定全部西迁抗战到底。久大盐业公司经理李烛尘任内迁总指挥。他根据永久黄总负责人范旭东的意见，指挥久大、永利、黄海的主要科技人员，拆掉关键仪表，整理起上万张图纸，绕道进川。永久黄在江苏、山东等地的企业也先后溯江西迁。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8月7日，塘沽沦陷，日军象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顷刻间吞噬了规模庞大的化工之城。黄海化学研究社成了敌军的运输司令部，明星小学进驻日本特务机关，联合村和太平村变作马厩和堆栈，新村由效忠敌人的汉奸占据。汉奸殷汝耕和他的日本主子在塘沽大街上耀武扬威。掠夺华北丰富的经济资源，是日本重要的国策。他们起初通过各种渠道，向天津、南京、香港分头游说，企图收买永久黄的企业。

天津沦陷后，永久黄将总办事处迁往香港。甫抵香港的范旭东立即被盯上了。一个日本人闯进范旭东的寓所，不通报姓名，就说：“日本兴中株式会社派我和范先生商量，准备买下您在天津塘沽的厂子。”范旭东轻蔑地一笑，说：“我的工厂不卖，你们若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日本人灰溜溜地走了。

范旭东气愤之余，立即电嘱在天津的李烛尘及公司同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天津法租界内永利公司总管理处，日本兴中公司代表刀根几次来“拜访”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要求与水利合作经营，企图以“合法”的身份，“名正言顺”地霸占碱厂。李烛尘起初与之周旋，后来干脆避而不见。软钉子碰得刀根十分恼火，日本军部也觉此事棘手。他们一方面炫耀武力，以逮捕反日分子为理由骚扰久大、永利和总管理处，进行威胁恫吓；另一方面由三菱公司出面，提出两家合办永利。李烛尘说：“我们是民营企业，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我个人无权更改公司章程”。“三菱”公司碰了硬钉子。

日本帝国主义者感到“买”不行，“合办”也不行。就将掩盖强盗嘴脸

的“遮羞布”扯掉，强占！

12月9日，刀根来到天津法租界的永利公司总管理处，将一份预先拟好的水利公司把碱厂交给日本兴中公司接办的协定文本，放在李烛尘的桌子上。说：“你的，签字吧”。透过刀根这张瘦脸，李烛尘看到了带血的刺刀、冒烟的枪口，而自己却身处祖国的沦陷区……。李烛尘万难压住怒火。他一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拍案而起，怒斥刀根：“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你们要拿就拿去好了！今后我们一定要收回来。也一定能够收回来！”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正气和抗日必胜的信心。

12月10日，日本军部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日本兴中公司的人员随之进入厂内。

与此同时，久大盐厂也被日军霸占了。

位于南京对岸卸甲甸的南京硫酸铵厂，所生产的硝酸是军用必须品，设备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侵略者对此早已垂涎三尺。他们知道该厂只要改动几道工序即可充当军工厂。如果能够得到该厂，他们即可就地生产炸药等军工产品，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他们施加压力，以“中日合作”为由，想占据该厂。范旭东坚决不肯。盛怒之下的日军将永利铵厂纳入他们的重点轰炸范围，以摧毁这个化工基地。他们公然蔑视国际法规，趁沪宁战局紧张，于8月21日，向铵厂发动攻击。工厂四处中弹，中国的酸业——永久黄人的心血结晶，瞬间毁于敌手。

12月5日，风雨交加，寒意袭人，侯德榜和铵厂最后一批技术人员和职工，带着能带走的仪器、图纸撤出卸甲甸。

疯狂的劫掠

永久黄被日军侵占后，与全国沦陷区一样，面临着日本强盗空前野蛮和贪婪的大劫掠。

为了控制永利、久大等华北工矿企业，并把其生产完全纳入日本侵略战争的经济体制。日本兴中公司进驻永利碱厂后，首先实行“军事管理”，后移交给日本的“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控制。日本国内的垄断集团三菱公司出技术和资本，接收永利。

为了盗名欺世，三菱集团通过日本“华北开发公司”要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面，动员永利原有部分股东承认自己的股权，以标榜永利为中日“合办”企业。1939年永利公司正式宣布“合办”并成立董事会。1939年8月31日，中日“合办”永利公司正式隶属于北支那开发公司的华北盐业公司。

所谓中日“合办”，只不过是“以合办”为名，“合法”地占有这些企业，实际上，企业的经营、管理，产品销售均由日方掌管。

日本侵略者占领永利碱厂后，于1937年开始检修，1938年7月15日出产品，他们在永利从事掠夺性经营，对永利进行法西斯统治，1936年纯碱日产185吨，1940年以后，产量略有提高。

日本对中国盐的掠夺也是十分贪婪的。“由于红海沿岸和美国等地海盐的来源已断，日本便尽力掠夺中国的盐业资源。久大盐厂被日军霸占后，整个长芦盐区都被日军控制。他们在大沽设立“盐田办事处”，控制着盐及副产品的生产。从此，长芦盐输往日本每年平均高达30多万吨，占全年产量的75%以上。

日军对永利硫酸铀厂的霸占，更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强盗本性。1937年12月13日，日本三井占领永利硫酸铀厂后，便将该厂全套硝酸生产设备拆运到日本九州，安装在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进行生产。这套设备有八座吸取塔，一座氧化塔，一座浓硝塔。合计28套设备，1482件。总重550吨，全为高级合金钢板制成，其中仅作催化剂用的铂金网，就值四万美元。他们用以制造硝酸炸药，强化日本的军火工业，进行罪恶的侵略战争。

永久黄的其他企业也在劫难逃，不再一一赘述。

日本侵略者不仅疯狂地掠夺经济资源，而且对工人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非人迫害。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他们用尽了各种毒辣手段。

工人没有屈服。他们不甘忍受亡国之苦，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导下，进行怠工、“弄”碱斗争，为破坏日本的经济掠夺，做出了一份贡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永久黄得以收复工厂、企业，中国化工事业才有了重振的希望。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孟宪龄）

六、摧残文化抢劫文物

强制施行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目的是把中国永远变成他的殖民地，奴役中国人民。为此，他不但要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对中国的统治。在扶持起伪“满洲国”，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经济统治后，他便极力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从意识形态等方面来腐蚀中国人。这种奴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促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妄图使东北人民忘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忘记自己的祖国，当帝国主义的顺民；主要途径是强制学习日语，把日本的“神”强加于中国人民，歪曲、捏造历史。

语言是人们交往的工具，它没有阶级性，但却有鲜明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为了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忘记自己的祖国，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首先就从语言入手。

1933年，伪满文教部在日本人的主持下开始新编中小学教材，学校日语课的课时逐渐增加，到1935年，已编成22种39本教材。日本教员随之进入中小学，掌握教育实权，强行规定日语为主课。伪满编审部在编写“满语”（即汉语）教材时，塞进一些“协和语”，即将日本人惯用的汉字用来作“满语”词汇。如把“街”写成“町”，过十字路口写成“过町”，“电影”变成“映画”，以及“你的挺好”、“我的如何”等似通非通的语言也上了课本。同时，他们还把理化专用名词也完全用日语表示。1937年，伪满颁布“新学制”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加深。“新学制”以缩短修业年限为特征。在小学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前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阶段则把原来的三三制六年改为四年一贯的国民高等学校，并分设农、商、工、矿、水产等科，加强所谓“实务教育”，其实是强迫劳动、“勤劳俸仕”的代名词。

“新学制”把日语上升为“国语”，在教学上以日语为主，1938年在全东北普遍推行。不但讲受日语课全部用日语，其他课程也用日语讲解，不管学生们听懂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为了弄清楚课程的内容，不得不努力学习日语。在每日规定的朝会上，日本教员向学生训话时，除非极重要的事情用翻译外，一般都用日语。在教职员会议上，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或日本教员讲话时也都用日语，这就迫使教职员也必须学习日语。学校规定，中小生日语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不能升学，这就迫使学生们不能不努力学习日语。学校还规定，学生早晨到校要用日语向老师问安，下午离校时也要用日语问安。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用这样的教育环境，使学生耳濡目染，在不知不觉中便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对已步入社会的成年人，也同样从语言入手进行奴化教育。当时，伪满各类机关中的公文都使用日文，机关实际负责人也都是日本人，他们都用日语分派工作任务。当职员的中国人的听不懂日语，不会写日文，就难于应付工作。为了保住饭碗，这些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学习日语。

1936年，伪满政府制定了“语学检定”制度，日语按不同程度分为四等：特等、一等、二等、三等，若检定合格，青年学生在毕业、就业方面给予优待，公职人员则发给语学津贴，津贴也分四等，分别为25元、15元、10元、6元。各等级津贴以三年为限，三年后，不能升等者则停发津贴。

（二）

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心灵上腐蚀中国人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犯下的又一罪行。

日本人有一种独特的信仰，认为冥冥之中有一个“天照大神”，他是日本皇族的祖先，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一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即“天照大神”的化身；凡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为神。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忘记自己的祖国，日本侵略者却硬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强加于中国人民。

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的占领军——日本关东军第四课课长片仓衷就不断地在伪满的大汉奸们当中鼓吹统一宗教的重要性，说：祭祀满洲国所有人都崇敬的神，通过经常叩拜统一国民精神，这对满洲国是绝对必要的；唤起敬神观念，使人们有所寄托，提高道义感，这种精神工作是应该做的。日本侵略者尽管也意识到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会引起强烈反对，但他们断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会扎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间，也会习以为常，于是就把这种“移植”工作付诸实行。

1939年初，伪满皇帝溥仪的御用挂 吉冈安直在溥仪的寝官对他说：“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同”。随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进一步向溥仪表示：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不久，新继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满洲国”大使梅津美治郎通过吉冈安直向溥仪摊牌，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

1940年5月，伪满傀儡皇帝溥仪奉命“访问”日本，一是祝贺神武天皇纪元2600年大庆；二是迎接“天照大神”。日本侵略者为了把强加于人打扮成“请求迎接”，还郑重其事地安排了一出闹剧：在会见日本于皇裕仁的时候，溥仪拿出了吉冈安直事前为他写好的台词，照本宣科，说：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裕仁还故作勉为其难地回答说：“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然后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向溥仪讲解说这三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就是代表天照大神的“神器”，就是“祖宗”。从此，“天照大神”便被定为“满洲国”的“建国原神”。

溥仪回到东北后，在“帝宫”旁修建了“建国神庙”，供奉由日本捧回的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并成立祭祀府，任命桥虎之助为总裁。此后，按照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溥仪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官员们都要前去祭祀。东北各地也按照规定建立这种神庙，各机关学校也建立“神龛”，按时祭祀。全东北共建神庙295座，无论何人走过神庙，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否则就要治罪。为了强制人们敬奉“建国原神”，日本侵略者还在《保安法》中增加一条：如有对建国神庙有不敬者，判处一至七年徒刑。由于人们都厌恶这种“神庙”，不肯向它行礼，因此，凡神庙所在，都成了门可罗雀的地方。随后，日本侵略者又代溥仪写了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宣称“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庇荫下，在天

“御用挂”的全称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于这个名称爱新觉罗·溥仪曾作过解释，说这是一个日本的名词，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关东军好象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

皇的保佑下建立、兴旺起来的，国民应与日本一德一心，永远奉祀天照大神，祈求其保佑。这样，“满洲国”的国本就算是“奠定”了。

在供奉“天照大神”的同时，日本人还有一套独特的“神道”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点，用日本神道学权威人士作的通俗比喻来说，就是日本的“神道”好比一棵树的根，这棵树上的枝，就是各国的宗教。又比如说，日本的“神道”是纯净的清水，而别国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回教、道教则是些酱油、醋、酒之类的东西，都是发源于日本的“神道”。所谓“八纮一字”，意思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这实在是荒诞不经的谬论。

1942年，为纪念伪满“建国”十周年，日本侵略者为溥仪写了一道《建国十周年诏书》，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

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后业，以尽报本之至诚……”

这些咬文嚼字的语言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亲邦”？“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几句大白话对他们作出了通俗明白的解释。他对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作满洲国的父亲。所以，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盟邦友邦，应称亲邦”。咬文嚼字说了半天，意思就是一个：溥仪是儿皇帝，东北是日本的殖民地、附属国。此外，日本侵略者还为“满洲国”制定了一个《国民训》，共五条，其中第一条便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于皇帝陛下”。意思也是说东北的老祖宗是日本。

日本侵略者制定这些文件，目的不仅是要溥仪承认自己是儿皇帝，更重要的是要我国东北人民承认日本是自己的主人，死心踏地的给他们当奴隶。为此，他们规定：中、小学要设建国精神课，讲授“日满一德一心”、“日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背诵《国本奠定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和《国民训》并进行考试，考试不及格者不能升学、毕业。他们辽说：惟神之道不本的史学“权威”白鸟库吉，曾编写过几本关于“满洲”历史地理的书，胡说东北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满、汉、蒙三个民族争霸的地方。他的这一荒谬论点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主要根据之一。另一个史学“权威”天野仁则把东北说成是满蒙人的住地，诬蔑汉族是“强入”者（即入侵者），胡说东北的历史就是满蒙人驱逐汉族维护其“住地”的历史，由此推论，东北从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不过是被霸占了多年，被误认为是中国的领土罢了。现在“满洲国”成立，与中国脱离关系，正是“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更荒谬的是他们竟胡说什么东北原来就是日本的，在中国人尚未来到此地很早很早以前日本的神就降临了。因为他对当地人有功，当地人感谢他，还为他建庙，这个神就是日本天照大神的儿子“素盞鸣尊”。1940年，日本煞有介事地专门派来一个以侵华老手川岛浪速为团长的所谓学术调查团，到吉林一个庙作调查，说这个庙的建筑方式和庙中所陈列的祭器，执事（金爪，斧钺，朝天镫）跟素盞鸣尊所用的东西有相似的地方。由此下结论说，这个庙原来就是祭祀素盞鸣尊的庙，根据日本历史，某年某月，日本神素盞鸣尊降临此地，建立国家，这个国家的成立是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存在过任何民族的时候。由此引申为日本

侵略东北不是别的，而是日本人返回老家。

在把天照大神移置到东北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编造历史，说天照大神在有人类历史以前就存在，她不但是日本的祖先，而且是全人类的祖先，当然也就是满洲人的祖先。40年代，日本侵略者制作了一个长达一米六七，宽约一米的世界历史图表，上面用彩色绘成世界各国历史年表，排在最上面的是日本，其次是埃及，再其次才是中国。这个捏造出来的历史图表在各地伪满机关、学校，军营都有配挂，其含义不过就是说中国无论在历史上文化上都比日本人晚几辈。中国有句古话：“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讲得出不要脸的话！”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些作为，不仅暴露了他们的无耻荒唐，而且充分暴露了他们侵略的野心。

（四）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是以刺刀棍棒为后盾的，稍有异议就实行暴力镇压。

满洲国一成立就发出通令：不准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1932年3月到7月，日本侵略者在全东北强行焚毁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650余万册。所有书店，凡有关内图书未支出焚毁者都要受到惩处，轻者查封书店，重者被投入监狱。1932年10月20日，伪满政府公布《出版法》，明确规定：凡带有民族意识，共产主义内容的书籍报刊，一律禁止出版。与此相反，日本的报纸、杂志、书籍却大量输入，充斥东北文化市场，极力宣扬、鼓吹“日满一体”、“共存共荣”、“天皇至上”、“王道乐土”等殖民主义思想。仅1939年一年内，日本进入东北文化市场的报纸就达5494余万份，杂志827余万份，书籍1440余万册，这个数字是当年中国关内进入东北报纸的10倍，杂志的4.7倍，书籍数的14倍。

日本侵略者的焚书、篡改历史、移植宗教、以及其它奴化宣传，组成了一道“封锁墙”，使普通百姓听不到别的声音，知识分子看不到进步书籍。可是，侵略者还是不放心，他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人的一举一动。动辄加上“思想犯”的罪名予以逮捕。上至伪满官吏、下到青年学生，言语稍有不慎就有牢狱之灾。1934—1936年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连串镇压知识界的惨案，其中较大的有：安东教育惨案，本溪思想犯案，吉林教育惨案，磐石教育惨案，黑山师范中校事件等，在这几次事件中被捕的多达500余人。最严重的一起是安东教育惨案，被捕教师达300余人，通化、安东一带的教师几乎全部被抓走，中小学不能正常上课。他们望风捕影，随意捕人，刑讯逼供，在知识界制造恐怖气氛，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丧失民族气节，接受奴化，俯首贴耳地为他们效力。比较典型的是发生在沈阳文会中学的“一分钱运动”案。1935年10月，日伪对在沈阳与欧美各国有关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教师、学生、牧师等进行一次大搜捕，共抓了200多人。敌人首先审问文会中学的钱福来，神学院学生张某，英美烟草公司职员陈守义。起因是钱福来是文会中学的高材生，父子俩笃信基督教，由于家境贫寒，钱福来在校学习难以为继，所以作为同乡的张某和陈守义就发起了一分钱运动，向社会呼吁每人每天省下一分钱，帮助钱福来读书，有募捐册和启事，册子上详细记录着捐款人的姓名，捐款的数字。日伪在大搜捕时发现了这个募捐册，便认为这是共产党组织，对钱福来等三人酷刑逼供，第一次三人被灌凉水，继则用木棒拷打。他们受不住酷刑就胡乱招供，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头子是牧师刘国华，机关在小河沿，作礼拜是开会等。刘国华牧师也为此惨遭多种酷刑。

沈阳女青会的张干事遭逮捕后，日寇审问她：“结婚没有？”她回答说没有。鬼子追问说：“没结婚，怎么乳头这么大？”于是用刑时专打她的乳部。日伪侮辱人格骇人听闻。除这些大的惨案外，伪满时期中国人因言语不慎往往遭逮捕受迫害。1940年，五常县国高农中班的学生于国珍和同学金玉珠闲谈时说了一句：“日满亲善为什么事事都是日本人说的算呢？”不料被金告密，于国珍被捕，先后有20多名学生被牵连，遭严刑拷打，于国珍的手指差点被夹刑夹断。本溪小学教员王殿卿因其6岁小儿子在课本第一课“皇帝陛下”旁边写了“大王八”三个字，被抓去严刑拷打。伪铁岭市市长徐渐九对供奉“天照大神”发牢骚说：“是什么东西，把老张家的老祖宗硬教老李家供”。结果被密探告发，以不敬罪被判七年徒刑。

日伪统治东北14年间，为奴化东北人民可谓软硬兼施，费尽心机，卑鄙无耻到了极点。又极尽血腥残暴之能事，然而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极力实施的奴化教育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罪状。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的，也决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巩艳王宜田）

南京文物的劫难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南文化名城。作为我国古都之一，经历代经营，古迹名胜遍布紫金山麓，秦淮河畔，文化遗存比比皆是，史籍图册，藏量极富。抗战爆发前，它又是我国文博图书、文化教育、科研事业的中心。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上日本曾受到中国南京文化的深刻影响。据史书记载，南京成为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后，南京和日本的交往就日益增多；东晋时，日本多次派人来南京学习缝织技术，现在作为日本民族象征的和服，在日语中又称“吴服”。日本许多古建筑，如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朝建筑艺术东传的结果，“梁式”风格的建筑如今已成为日本受保护的“文化财”和“国宝”，日语中“南京”一语具有不同一般含义。《日本国语大辞典》中的“南京”一词，除表示南京是中国城市外，还表示：中国人的别称，从中国等外国来的物品，及稀罕珍奇之物。冠以“南京”词头的名称，也是司空见惯。如“南京钱”（中国铜钱）、“南京京口”（中国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烧”（中国瓷器）、“南京米”（中国大米或印度大米）、“南京锭”（洋锁）……

然而，南京与日本的友好往来的历史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军国主义者曾无耻又残暴地亵渎南京。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和侵占南京期间，无视国际法规，在制造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同时，公然以轰炸、焚烧、洗劫等野蛮手段摧残和毁灭中国文化，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横遭劫洗的文物

“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字画古物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他们就疯狂地掠夺中国文物。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早在侵占苏州时，让人搞到苏州古物字画的一览表，按图索骥，——抢走。到了南京，日军在杀戮血洗南京时，又对南京文物进行一次大洗劫。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rnperry），于1938年3月编著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揭露道：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抢劫，从城外抢到城里，从城内各角落抢到难民区，凡日军所到之处，无地不抢，从12月上旬到翌年2月中旬，长达两个月之久。“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1938年2月，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S·C·Snivthe）主持历时3个月的对南京灾情的调查，其调查结果表明，南京住户损失：52%由于纵火，33%为日军抢劫所致，而市区损失63%由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烧毁之前，已经被彻底地、有组织地搜掠了里面财物，而实际幸存下来未毁的11%，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士兵，遭到同样的洗劫”，“字画及其他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掠劫的对象”。在这大规模的洗劫活动中，文化古物在劫难逃。

中国难民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庠的字，岳飞的亲笔题字，钱南园的画，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竟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日军进城后，见物就抢，不仅在占领区抢，还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使馆区的“安全区”抢。安全区内一位美目侨民诉说，12月16日，日本兵

闯进在大门两侧挂有美国国旗的使馆进行抢劫，连中国外交官王正廷博士所赠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也抢走了。使馆区外交官员将所见所闻的日军在使馆区的暴行，逐一记录，向日本外交当局进行抗议，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抗议材料，1939年编印成《南京安全档案》，其中也有许多被日军抢劫中国文物的记录：

“第87件，12月20日，阴阳营47号，一天内被日本兵洗劫7次，很多文物全被抢走”。

“第166件，12月27日下午，三名日本兵闯入宁海路33号，……抢走了贵重文物多件”。

被劫公私文物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从下几例中窥见一斑：

南京库存国家古物原共19580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27箱，留南京2953箱。后被日军劫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古物，由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保藏物品，计古物类85件又一箱，书籍类55件又2柜，书籍以湖北官书局和金陵官书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种拓本为多，古物则有南京刻石佛一尊（棲霞山齐塔内出之），山百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棲豆等8件，同治五彩瓷盖碗20件及古墨砚、对联、字画等，俱落入日军之手。另有书籍2箱，运至越南海防市，因滇越路炸断，未能运入云南，1941年日军进据越南时，也被劫走。

12月13日，日军闯进宁海路8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抢去大批书籍、古物、字画。被劫图书共1700册，其中有湖北官书局版之十三经注疏，毛边纸本王应麟玉海，古香斋本史记，汲古阁本汉书、后汉书，竹筒斋本三国志，扫叶山房本资治通鉴正续编，金陵局刻文选，汉碑30种。古物玉器金石约50余种，如星云镜5面，蟠螭镜3面，菱花镜3面，宋镜4面，玉质素壁一具、玉璜玉珩10个，铜质汉印3方，铜质六朝印5方，铜质唐印5方，石质虎符一个。铜器部分，凤纹尊1个，夔龙纹角尊1个，青铜剑一柄，青铜戈4具，青铜带钩2具。另有存于南京阴阳营23号的该校古文字、经典、器物等，计有殷墟龟甲兽文字183片，原为刘铁云藏物，极为珍贵，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壁画天女像一幅、缙丝山水一幅、大理石插屏、其他贝器、康熙瓷器、山水书画甚多，也为日军劫走。

私家收藏被劫不可胜计。如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卒间未携出，悉被贼劫。”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筱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字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购买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绝，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2000余件。中华门外卢冀野先生，“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被倭寇焚窃。”

中国难民蒋公谷看到，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吻鸱”也被敌人拆去了。“吻鸱”也叫“鸱尾”或“螭吻”，是安装在屋脊两端的建筑装饰物，是用来“禁压火灾”的。这种装饰东晋时传入日本，日本人称之为“鸱”。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的那对鸱尾，现今还在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两端，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人员战时财产损失报告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古物文献损失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白芑：《今日之南京》，南京晚报社出版部，1938年11月。

在日本视为“国宝”。而比日本“国宝”还古老得多的朝天宫鸱尾被日军拆走，不是说明文化掠夺是日本军国主义整个侵华战略的组成部分与罪恶目的，还能有何种解释？！

日军在南京郊外建飞机场时，铲掉了一座莹光闪闪的古坟，发现其中竟有唐玄奘的舍利。侵略者借口“弘扬东亚佛教”，竟将部分唐僧舍利盗往日本，藏在埼玉县那座与中国西安同名的慈恩寺中。在藏入该寺前，“日本浪人”水野梅晓又将其中一部分偷偷装入瓶中，带回家中。日本随军记者小侯行男，战后还在平沼府上的一间屋中看到舍利，同时还看到大批中国珍贵书籍，“10张塌塌米大小的室内展开了满满一屋的贵重书籍。据说，这一件件都是宋唐的书。”

抗战前南京比较有规模的图书馆有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市立图书馆、以及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及其所属部会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西撤时留有大量图书。

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筹建，至1937年已有藏书15万册，西撤时仅带走图书130箱计1万多册，其余留在南京。其中存放在朝天宫库房的有4万册，战后封存时只有3万册，其余存馆本部的为敌所劫。中央图书馆存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四库全书等典籍3.5万余册，日军占领香港后，为日人竹藤峰治劫运日本，分藏于东京上野图书馆和伊势原等处。该馆所有国学书局刻片板片150余种，7万余片全部遗失。

清凉山麓的国学图书馆最初为清道光两江总督陶澍的惜阳书舍，后改为江南图书馆。1937年已藏书24万余册。日机轰炸南京时，仓卒“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存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地库隐匿，日伪多次悬赏发掘，1940年2月日伪冲破地库，将该馆善本移竺桥伪图书馆专门委员会开辟专库贮藏，战后封存接收，缺少善本书184部1643册”。丛书及地方志，舟运苏北兴化罗汉寺及北门外观音阁，计3万余册。兴化藏书大部为日军焚毁、劫掠，小部散失。善本书籍15万册，仍藏龙蟠里，后被日军移竺桥地质陈列馆，战后发现，其中宋、元版本的部分图书，被日军掠往本土，只剩下30多部。

南京市立图书馆毁于火，损失无法计算。金陵大学图书馆以藏地方志著名，中国古代农业与动植物书籍，也独有珍奇，其中有日本和朝鲜的刊本，也有元、明朝刊本、宋代殿本。日本投降之初，这部分古籍被日军盗去，损失不少。

国民政府文官处及各部会、学校的图书被日军运走的不下60万册。1946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处函件指出，“查本院图书馆抗战前收藏图书在10万册以上，二十六年（1937年）政府西迁，因交通关系所有图书并未迁移，迨本年复员，曾由南京区清理文物委员会发回图书若干，但截止最近综合仍不及原数五分之一，即收回各图书亦多残缺不完，损失之巨，概

[日]小侯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第6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7月版。

王长喜《抗战胜利后金陵文物的封存与清理》《南京档案》1994年第2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卷号11685。

《省（江苏）立国学图书馆呈报该馆善本书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5，卷号11685。

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辑。

“ 考试院一处损失图书就达 8 万册以上，据此，中央各部会损失图书 60 万册，绝作虚估。

日军侵占南京后，设有专门抢劫图书文物的组织，在珠江路设总站，下设调查、发掘、抢劫各组，与日军事机关密切配合。1938 年 3 月起，日军又动用军队、特工人员进一步搜集南京的公私图书。1986 年 8 月 17 日，日本《赤旗报》刊登《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的文章，一位住在日本东京国分寺市的 77 岁老人青木实以当事人的身份披露了这次鲜为人知的抢劫内幕：

日军特务部的九名人员接到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立即检查南京市年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的命令，他们乘坐三辆汽车在南京四处奔走，检查了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共 70 处，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日军在费了一个月时间，动用军队，以“接收”名义，将搜来的图书装上卡车，每天搬入十几卡车，在调查所主楼一、二、三层的楼房中，堆起 200 多座书山。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每个房间里堆放的图书都堆到了天花板。约有图书 70 万册。他们在图书杂志上标号分类，然后再搬到指定地方。参与“文化大屠杀”的人员有特工 230 人，士兵 367 人，苦力 830 人，动用卡车 310 辆次。劫夺图书、文献达 88 万册。（当时最大的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藏书是 85 万册，大阪府立图书馆藏书 25 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极为珍贵，其中不仅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公报，而且还有 3000 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

文化遗存在大火中燃烧

侵华日军在南京见文物就抢，抢不走的就破坏，就焚烧。大量古迹文物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日军用枪炮击毁了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而这是公元六世纪留存下的石刻艺术瑰宝。他们毁坏了明初建造的世界第一砖石南京城墙。陵寝、寺庙、殿宇横遭破坏，战后中山陵园管理处的报告说：“昔日荫毓葱茏，斗艳争妍之景色已不复于今日”，中山陵一地就损失 3389000 元。

日军侵入南京城后，一把大火，燃了 39 天不熄，大火从夫子庙一直烧到新街口，“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不少文化古物又葬身火海。清凉山国学图书馆存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 6488 宗及尚未整理的 60 余大篓，成了日军炊饮的燃料和纵火的引薪。南京市图书馆和夫子庙也同时为烈焰吞噬。夫子庙位于秦淮河畔，建于北宋 1034 年，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处所，也是江南学宫所在地。整个建筑群占地广阔，雄伟堂皇，布局 and 结构“居东南各省之冠”，日本学界也公认孔子对日本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可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纵火烧毁了作为古代南京文教中心的夫子庙，“一泓淮水依然绿，两岸烧痕不断红”，夫子庙的大成殿、魁星阁、得月台、奇芳阁及所有配殿、楼阁等有名建筑，均荡然无存。

宗教文化古迹，也横遭摧残。一把大火，日军便烧掉了中华门西街年代久远的清真寺。日本本是以佛教为立国宗教的国家，佛教是经中国传入日本。战时日本在东南亚佛教国进行宣传，将侵华战争说成是“弘扬东亚佛教的圣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的松井石根自称是笃信观音的“圣将”，他还把从上海到南京的染血泥土带回日本，制成“兴亚观音”顶礼膜拜，直至战后临

刑。然而，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焚毁了南京牛首山佛教寺院。牛首山在南京南郊，一千多年来梵宫琳宇，佛寺相连。唐贞观年间，香火鼎盛，传及四友。日本传教大师最澄迈来南京，将“牛头宗”带回日本。抗战爆发时，古寺仍有不少蔚为壮观的建筑。六朝时宋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始建的幽栖寺，天王殿高二层，回廊与大雄殿相通。天王殿后再拾级而上，为大雄殿，三世佛、观音、十八罗汉，金身巨刹，殿宇轩敞，山中有文殊洞、观音洞，寺依山岩悬空而筑，飞阁运迤，下临无地。牛首山翠谷丹崖，古柏掩映，“牛首烟岚”被誉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1937年12月10日，日军将满山古树砍伐一空，接着一把大火，将历代佛寺烧得一千二净。从此，好端端的牛首山便成了一座荒山。千年佛寺被焚的罪恶之火，映透出东洋恶魔对中国文物古迹的妒忌心态和狰狞面目。

南京的文物损失究竟有多大，根本无法计算，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究竟掠走了多少无法准确统计，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文物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但战后初步调查所作的《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就有：书籍类，公方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字画类，公方464件，私家7256件另6箱；碑帖，公方损失无算，私家38引件；古物类，公方24491件，私家2093件；仪器，公方979件另63箱，私家11种；标本，公方13414件另1165箱，私家7200件；杂件，公方648368件。中央研究院殷墟所报书籍、古物、拓片损失单未列损失详细件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标本1052箱内有考古组之人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因价值卓特无法估计，均未列入损失表中。该统计详列损失者姓名、单位住址、损失品名数量及估价。从表中可见，此损失统计是极不完全的，所报损失局限在城区，民间古物损失仅列胡小石等69人之所报。南京沦陷后“十室十空”，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人家成了绝户，不可能再报损失，所以私家文物损失绝对不只69家。

文物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也是世界文明的象征。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文物情有独钟，这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好事。但因喜爱而明火执杖地抢劫，只能被唾弃为强盗行径。日本帝国主义对南京文物的掠夺，并不表明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喜爱，而是反人类文明的暴行，十足地暴露了他们的无耻与下流。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孟国样执笔）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

《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卷号11710。

古城劫

南国名城荆州，以其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享誉中外。本世纪 40 年代，随着侵华日军铁蹄的踏入，一场浩劫从天而降。珍贵文物，日军非抢即毁。于是古刹泯迹，黄钟失鸣，经碑玉碎，名画云消……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至今仍忘不了那怵目惊心的一幕一幕！

凶神恶煞的日本兵突然闯进古刹

荆州城自古就是佛道两家传经布道的胜地，素有“三步一寺五步一观”之称。位于小北门内的承天寺，是众多寺观庙庵中最负盛名的一座古刹。这不仅因为它有 1500 余年的悠久历史，还因为它有宏大的气势。全寺由五殿一塔组成。寺内古木参天，飞檐流丹，雕梁斗拱错落有致，金身佛像栩栩如生。

公元 1941 年春，正是日暖花开草长莺飞时节，一向繁华喧闹的古城荆州却显得清冷静寂，阴森恐怖。唯有承天方内仍香烟缭绕，钟声不绝，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佛门无祸。善良的僧人们哪里料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向大慈大悲的佛祖和他的弟子们袭来。

“皇军有令，你们的统统离开！”一群凶神恶煞的日本兵闯进了承天寺。正在闭目诵经的寺僧还未明白过来，一场特劫的黑色帷幕已经拉开。

这群日本兵不由分说，便在寺内四处搜查珠宝古董。

众僧怒不可遏，大骂禽兽，奋身阻拦，可怎斗得过这伙全副武装的凶残恶魔？——僧人的血，染红了大雄宝殿……

顷刻间，全国罕见的高大铜钟、铜香炉、汉魏碑帖以及历朝名人字画等稀世珍宝，成了日寇的“战利品”。

罪恶并没有就此结束，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这伙日寇行劫刚去，驻城日军第二十九步兵团团长两角业作少将的命令传进寺来：“皇军要在这里修建军用飞机场。”

一队荷枪实弹的日军押着一群强行抓来的民工进了寺院。

众僧跪在佛祖金身像前大放悲声。

日兵对众僧拳打脚踢，将他们赶出山门。众僧盘坐门外痛不欲生。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圆通玉殿、无量宝殿、势至殿、万寿殿眼睁睁地被拆毁了，建于梁代的僧伽妙应塔也轰然倒下了。只有大雄宝殿，这座建于东晋永和年间的主体建筑，还屹立在断砖残瓦之间，高昂着它不屈的头颅。

日军的兽行在这座古老建筑物身上得到了最疯狂的发泄。他们找来又粗又长的钢丝绳，调来两部大汽车，随着一阵阵刺心的狂笑，48 根高达数丈的圆形立柱被拽倒……

大一点的木料运走了，日军要用这些木料修建兵营；剩下的杂料被付之一炬，大火整整烧了 15 天。

一代名刹就这样毁灭了！

一声旷世逸响惊动了豺狼之心

古城西门内侧的开元观，是一座极具盛唐风韵的古老建筑，观内巍峨的天门上有一处绝世景观——

当你沿着石阶拾级而上，经意或不经意地一抬头，眼前便会倏尔一亮：一只铁铸的黑虎昂首雄视悬吊观顶的一口九龙小钟，黑虎维妙维肖，小钟金光灼人。

这便是远近闻名的荆州“小八景”之一——抬头黑虎望金钟。

相传有一年，乾隆下江南来到荆州，夜宿开元观，梦见一道长手持九龙金钟，被一只黑虎追赶。眼看道长就要葬身虎口，乾隆大惊而醒。他颇觉蹊跷，便问随臣。随臣道：“龙虎相戏，天下太平，此乃瑞兆也。”乾隆龙颜大悦，传令召募荆楚名匠，依梦中情形铸成金钟铁虎，置于开元观内的天门之上，昭喻天下。

其实，有关这一景观的来历的传说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口九龙钟确非凡俗之物。荆州城遍布寺观庙庵，黄钟大吕数以千计，唯有这九龙金钟仪态万方，绝伦超群——那九龙蟠然的造型，那金钟旷远的逸响，堪称天下一绝。

“当——”，1944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凌晨，开元观里传出的一声绝响，惊动了一颗豺狼之心。

正在巡城的日军军官次雄带着一队宪兵闻声闯进观来。他们遍击观内铜钟，终于将贼手伸向了悬挂在天门上的九龙金钟。

国宝遭劫，守观道长余道净欲哭无泪，怒火中烧。

就是拼了自家性命，也要夺回金钟！老道长横下一条心，出门跟踪追击。

沙市轮船码头，一条满载铜钟的小驳船正准备启航驶往汉口。老道长抚摸着这些即将沦落异国他乡的国宝，禁不住老泪纵横。

这些铜钟都是日军从荆沙各处寺观庙庵里抢来的，都是具有千百年历史的珍贵文物。

小小九龙金钟乃宝中之宝，被藏在船舱里面享受“特殊优待”。

押船的日军尚未到来。老道长向船家苦苦相求：“这口九龙金钟是国宝中的珍品啊，岂能眼睁睁让东洋人抢走？”

老道长的一片真情感动了船家，船家冒着杀头之险“完璧归赵”。

此事很快被次雄发觉，到手的鱼丢了，他岂肯善罢甘休。老道长刚刚藏好金钟，次雄便跟踪追到。

“老东西，快把宝物的交出来！”次雄血红着眼，枪口抵住了老道长的头颅。

任凭怎样辱骂殴打，老道长一口咬定金钟是次雄抢走了，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次雄无可奈何，下令掘地三尺。

埋在三清殿前香炉底下的九龙金钟，还是落入了虎口。

古老的城楼变成了匪寇的营房

清代以前，荆州城雄踞江诸，故而西有安澜门，南有曲江楼。其时登城放目，但见“孤峰烟中落，长江天际来”，山川竞秀，美不胜收。后来江道南渐，荆堤也越筑越高。到现在一登城南望，已是江帆隐形，青峰藏首。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但老市民说，倘若曲江楼还在，便不会有此遗憾。

此话应是不假。

明代政治家张居正当年自京师还乡，故地重游，登临古城东南隅的仲宣楼，曾信笔题诗一首，开头两句便活托出仲宣楼的恢宏气势：

一楼雄此郡，万里眼全开。

然而，无论地势之险，还是营构之奇，仲宣楼都不及南门城头的曲江楼。因而人说张道辅之诗移诸曲江楼，当是诗情画意，珠联璧合。

曲江楼建于宋代，其后数百年间，城垣几度毁于兵燹，又几度重筑，城上古物荡然，唯曲江楼幸存下来。是她巧夺天工的匠心和望云听涛的神韵令

人情有独钟么？

曲江楼飞檐流丹，翼然欲举，虽不及唐代楼树的浪漫夸饰，却极尽宋代建筑的典雅俊逸。登高览胜，可见白帆点点浮天际，落霞曼曼染巷里，远畴近陌，一览无余，荒村野树，星罗棋布，俯仰之间，顿觉胸襟一亮，心旷神怡。

公元 1940 年 6 月 8 日，日军自襄北南践，荆沙沦陷。据城日军为修建兵营，公然拆毁二十余处名胜古迹。曲江楼亦未能幸免。楼毁之日，举城扼腕，相对成泣。

这是日本侵略军破坏荆州古城历史文物的又一铁证。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荆国）

大祸从天降

千年书院被摧毁

湖南大学，位于宽阔清澈的湘江西岸，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麓。它的前身是闻名遐尔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北宋、元、明、清等朝代，至1903年，晚清政府实行“新政”，将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1938年4月11日，星期天，湖南大学的校园里异样寂静、冷午后2时左右，尖厉的空袭警报，撕心裂肺。人们扶老携幼地奔向防空洞或其他可以隐蔽的地点。

隆隆的飞机马达声震耳欲聋。27架敌机由北而南呼啸着闯入长沙，径直飞往岳麓山上空，在那里低空盘旋，俯冲。少顷，位于岳麓山麓的湖大校区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湖大图书馆成了一片火海。敌机飞走后，师生员工纷纷赶到这里救火，但火势太猛，无法近身。他们望着被炸塌的钢筋水泥骨架，望着这幢屋柱仅剩下4根的孤零零的落成还不到5年的现代建筑；望着数万册图书在烈焰中化为灰烬，随着滚滚浓烟四处飘落，无不痛心疾首。有的老教授垂胸顿足，痛哭失声。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啊！这其中有多少中华文化的精华啊！

科学馆大楼大部分被震倒，馆内科学仪器和机器设备大部分被破坏。

第五学生宿舍被大部震塌，学生财物，舍内设备，损失惨重。3位学生没有来得及跑出，被炸死在门口。宿舍前面的路上，横躺着一具四肢残缺腹部爆裂的尸体，他是科学馆的工友陈玉泉。

第一学生宿舍楼外的草地和校区正中心落下一颗重磅炸弹，炸出的弹坑又大又深，飞溅的弹片，巨大的冲击波浪，把这栋刚刚落成一年，时为湖南大学最好的宿舍，变成了门窗破碎，墙壁倒塌，弹痕累累的破楼。来校访友的两工人被炸死，血肉模糊尸体摆在楼前，使人目不忍睹。

日本帝国主义者几分钟的肆虐，带给这个千年学府的是残垣断壁，焦树枯枝，弹坑遍布，满园凄凉。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八百余青年学生，一时陷入无法可读，无处安身的惨境。”

湖南大学有珍藏典籍的传统，从书院的御书楼到藏韦楼，到图书馆，历经千年，绵延不断。藏书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历朝经典、珍本、善本、孤本。1933年11月竣工落成的新图书馆，藏书量在全国图书馆中屈指可数。可是，这样一座图书馆，在日机的轰炸下，霎时变成了一片废墟，多少代人的心血被烧得一干二净。

在湖南大学遭到毁灭性轰炸的同时，岳麓山风景区的名胜古迹云麓宫、自卑亭等处也遭到了日机的严重破坏。后来，爱晚亭、白鹤泉的遮亭、古麓山寺的前殿、云麓宫殿宇神像碑刻等，先后被日军所毁。

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中国文化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千年重镇成废墟

衡阳，地处湘江中游西岸，南岳衡山南麓，粤汉、湘桂铁路在这里交会，水陆交通十分便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把侵略的国光投向了这里。他们利用空中优势，妄图控制这个战略要地。

1937年9月，日机首次空袭衡阳，以后不断轰炸，多达100多次，终于

把一个繁华的古城炸成一片焦土。

193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晚，衡阳人正在过中秋节。谁也没有料想到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特别是深更半夜，会有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大约10点多钟，9架日机趁着皎洁的月光，由北而南侵入衡阳上空。轰隆隆一阵猛烈的爆炸声过后，城内北正街一带，火光冲天，房屋倒塌。人们惊呆了，许多人被弹片夺去了生命。一对刚刚举行婚礼的新婚夫妇，双双被炸死，新娘的腿被炸得飞挂在屋外的树杈上，新郎的尸体则被气浪掀到了树下。一个欢乐团圆的良宵佳节，变成了家破人亡的恐怖之夜。

这以后，武汉、广州相继沦陷，长沙又被国民党烧成焦土，衡阳就更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因而，日军对衡阳的空袭日见频繁，破坏日见猛烈。

1939年4月6日，日机18架窜入衡阳上空，分批轮番轰炸。从11点多钟一直炸到黄昏。大半个城区被毁、长约二华里的长街全部化为灰烬。停泊在万寿宫河面的木船、木排全被烧毁。据统计，这一次全城烧毁房屋2000余栋，同胞死难7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经济损失达2000万元以上。当时冒着浓烟赶往灾区采访的《大刚报》记者写道：“但见折椽断柱，裂壁但垣，凡所经历，触目酸心；而残墟余烬之中，我受创同胞之血肉模糊，尸体焦炙，尤属惨不忍睹！”无家可归的难民，“在夕阳西下，暮烟四起的傍晚，有成千上万的人群在寻觅栖身之处，只是找不着。”他们能到哪儿去找呢？他们的家“已变成了焦土”“只有暮后的黑神，给他们一群一群遮盖着。”1940年8月10日，一场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在衡阳人的头上。日军出动90架飞机，对衡阳实施毁灭性轰炸，把三年来对衡阳的空袭推到了顶点。

上午10点，第一批敌机，飞抵衡阳上空，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90架飞机在衡阳上空盘旋，肆虐，遮天蔽日。到下午1点，3个多小时内，在衡阳城里投下了700多枚炸弹和燃烧弹。

熊熊大火，燃烧了数日。从南正街到北门外的五里长街，变成了一条大火龙，学前街、铁炉门河街、潇湘门河街、泥湾河街，只剩下断壁残垣。江东岸，日机投下了几十枚重磅炸弹，整条马路全被炸毁，所有的居民住房和店铺都毁于一炬。人们站在郊外的山岗上，田野里，目光呆滞地望着被浓烟吞食的城市。他们的眼泪哭干了，他们的心碎了，他们的神经木然了，只是不停地喃喃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这次轰炸，给衡阳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当时的报纸称：“以90架飞机轰炸一个城市，除了我们的战时首都重庆外，就是衡阳了。”一位从硝烟中钻出来的记者，用14个字描述了当时衡阳的惨状：“同胞之血遍地流，满街尸首无人收。”

可是，对已成一片废墟的衡阳，对露宿焦土的难民，日机仍不放过，它们时不时飞临衡阳上空，投掷炸弹和燃烧弹，有时一月数次，恨不得将衡阳这个湘中重镇化为灰烬，让它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掉。

一直到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号称“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攻占衡阳，便成了日军“一号作战”的突破口。

6月19日，日军大兵团长驱直入，锋芒直指衡阳。6月23日，日军兵分三路向衡阳发动全面进攻。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17000余官兵奋起反击，使日军原拟几天内就攻占衡阳的计划落恼羞成怒的日军，利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再次对衡阳进行狂轰滥炸，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在衡阳的市区，不仅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型炸弹和燃烧弹，还投下了很多毒气弹、催泪弹。

被炸死、烧死、毒气窒息而死的平民百姓和守城官兵，不计其数，仅 5 月 11 日的一次轰炸中，野战医院的 1000 多名伤兵和医护人员，被炸死，烧死和毒气薰死的就有 700 多人。

守城最高指挥官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本军守城官兵，住宿无处，避弹无拦，雨淋日晒至痛，炮轰弹炸而死，比比可见，情状触目心伤。”

据战后统计，日寇侵华期间，使衡阳市居民死 29000 多人，伤残 25000 多人；5 万多栋房屋，完整存在的仅有 5 栋，尚能住人的也不过 60 栋，其余几乎全部被毁，183 家工厂被摧毁，37.5 万亩田上被荒废。1946 年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在写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关于请建衡阳抗战纪念城的呈文中所说：“比诸德之汉堡，尚有过无不及之处。”美国总统代表哈里逊在视察了市区之后，说，衡阳：“灾情惨重，甲于全国。”

衡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他们带来的巨大苦难！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陈峰）

七、扶持傀儡政权

一手炮制伪满洲国

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国策。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胜方与俄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从俄国手中夺得了我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及南满铁路的所有权。年底，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逼迫中国政府承认他从沙俄手中抢得的利益，并进一步逼迫中国政府开放辽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16个城市作为日本人通商和居住的地方。日本侵略者把辽东半岛称为“关东洲”，设立关东都督府，作为侵吞中国东北，进而灭亡全中国的基地。1911年至1916年，日本侵略者勾结清朝余孽肃亲王善耆和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策划“满蒙独立”，企图把中国的东北和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1927年4月田中内阁上台后，加速推行侵华的“大陆政策”，于6至8月多次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策划“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

为了实现上述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侵略中国的同时，积极寻找、培植、控制能够与之合作，为其侵华所利用的代理人。清王朝废帝溥仪、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父子，以乃中华民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的段祺瑞、张宗昌、张作霖等军阀政客，都曾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对象。随着各派军阀的败亡和张作霖的被除掉，日本人最终选中溥仪作为伪满政权的傀儡。

爱新觉罗·溥仪，清醇亲王载沣之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10月被慈禧太后立为嗣皇帝。同年11月，年仅两岁的溥仪被抱上皇帝宝座，成了大清朝最后一个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华民国给了清王室许多优惠条件。当时订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拨经费银400万两（后为400万元）；允许暂住宫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幼年的溥仪得以在紫禁城里关起门来做了13年的小皇帝。溥仪在享受皇帝的锦衣玉食的同时，也被灌输着封建帝王思想，复辟的种子种入了小小的心田。

1924年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国民军进了北京城，发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决定永远废除大清宣统帝的尊号，将每年补助费由400万元降为50万元，勒令清室即日移出宫禁。被轰出紫禁城的溥仪，丧失了皇帝的尊号，失去了皇帝养尊处优的种种生活，有着保深的失落感。在封建余孽的包围下，复仇复辟的欲望十分强烈。日本帝国主义最终选定溥仪做傀儡，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同时也因为清王室与其发祥地东北，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稳固地统治中国东北，需要溥仪当傀儡。溥仪为了复辟大清朝，再当皇帝，也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二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罪恶目的，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勾结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拉拢、扶植和控制溥仪，实现其罪恶目的，软硬兼施，使用了各种阴谋手段。]

长期豢养博取信任

1924年11月5日，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仪面临严峻选择。摆在他面前的出路有三条：一是彻底与过去决裂，做民国的公民；二是静观待变，伺机恢

〔日〕小浦贯一：《森格》。

复优待条件；三是出洋或寻找外力势力支持，图谋复辟。第一条路是溥仪不愿走的，可选择的是后两条道路。在这紧要关头，力主靠外国复辟的罗振玉等人编造了冯玉祥和过激分子将有不利于溥仪的行动，必须躲避的流言，促成溥仪秘密出走日本使馆。扶植控制溥仪正是日本人求之不得的事。因此，对溥仪的到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欣然接受。热情接待，特意腾出一座楼房专供溥仪使用，设立了奏事处和值班房。“大清皇帝”的一班人马和束看望的前清遗老，来奏李的人臣们出出进进，俨然一个流亡的小朝廷。而芳泽公使不仅为溥仪的居住、办公提供方便，还亲自出面与段祺瑞的执政府联系，取得对溥仪出走日使馆的谅解。帮助把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接到日使馆。特别是当溥仪过 20 岁生日时，日本使馆更为祝寿提供方便，使溥仪重温皇帝的滋味，溥仪不禁感激涕零，认为“日本人是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对日本人这样做的意图，时人曾有过一针见血的揭露：“此次溥仪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宠，为将来之机械也”。“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上述看法已被历史证实是十分精辟的。

溥仪在日本使馆蛰伏四个多月，日子过得虽然舒服，但终非长久之计。为圆复辟梦，溥仪决定出洋去日本。宠臣罗振玉与日本使馆商量，认为出洋的事应到天津去做准备。溥仪接受了这个意见，在日本军人、特务和警察的保护下，于 1925 年 2 月 23 日到达天津，住进日租界张园。从此时直至“九一八”事变后离津至东北，在近七年时间里，溥仪被日本军人、政客、浪人及清王朝余孽所包围。天津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及日本浪人团体黑龙会，在拉拢、扶植和控制溥仪方面费尽了心计。其措施主要是：

严密控制。溥仪一到天津，总领事馆即负起保护责任。除派武装警卫外，还派了便衣警察。明说是保护溥仪安全，实际是监视溥仪的行动。日军司令部则设立了名为“二野公馆”的特务机关，专门做张园的工作。这个机构收买了罗振玉、荣源、谢介石等人，通过他们了解溥仪的思想和行动，贯彻日方意图。

培植亲日势力。当日本领事馆得知溥仪要送弟弟溥杰、三妹大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时，积极力他们推荐日文教师，总领事吉田茂亲自回日本联系留学，还争取到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帮助。

承认宣统皇帝，支持复辟帝制。日军司令部经常派参谋给溥仪讲时事，分析中国内战形势，说“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中国的“民心”唯有“宣统帝”才能收拾。日本人还通过各种活动，让溥仪感到日本承认他这个皇帝，尊敬他、保护他。如日本总领事吉田茂请溥仪参观日本侨民小学，在往返的路上，安排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溥仪欢呼万岁；每逢新年或溥仪寿辰，日本领事馆的官员和军队将佐必定到其住地祝贺；到了日本天长节，约溥仪参观阅兵典礼，其司令官特意骑马到溥仪面前给他敬礼；当北伐军接近天津，溥仪决定到日本去时，日军部派军队护送，田中年阁按对待外国君主之礼接待溥仪。日本人所做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

收买、拉拢溥仪。而这种手段却深深地感动了溥仪，使他感到日本人是值得信赖的、能助其复辟的可靠力量。特别是当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花重金收买的各派军阀纷纷垮台后，溥仪更把复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人身上，对日本人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诱骗挟持潜往东北

1929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日本帝国主义断了通过控制东北军控制中国东北的希望，遂决定武力占领东北。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经过周密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东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侵占中国东北后，采取何种形式的殖民统治，曾经作过种种设想。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分三个阶段，也即三种形式，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第一阶段，打破现状，成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扶植傀儡政权，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第三阶段，完全占领满蒙领土，将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直接变为日本领土。同年6月19日，日本军部为确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经陆相南次郎同意，在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密令下达关东军司令部，其中明确规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指明要实行“占领满蒙”领土，划入日本版图。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会见了参谋本部特使建川美次。随后，建川又会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建议“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召集会议采纳了建川的意见，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其内容是：一、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二、“新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要“由日本管理”；三、“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经费，由新政权负担”；四、任命熙洽（吉林地区）、张海鹏（洮、索地区）、汤玉麟（热河地区）、于芷山（东边道地区）、张景惠（哈尔滨地区）五人为镇守使，维持地方治安，总之，这个方案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彻底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际上掌握在日本手中的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对东北各地实行武装侵占的同时，积极拼凑伪政权。在收买策动汉奸“独立”，建立辽宁、吉林、哈尔滨、内蒙古地方伪政权，以及在日本人主持的“自治指导部”指导下建立各县伪政权。与此同时，积极策划实行了诱骗，挟持溥仪到东北的阴谋活动。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吉冈安直（时任日本鹿儿岛驻军联队的大队长，后为关东军常驻满洲国代表）托溥仪之弟溥杰捎信给溥仪，说中国东北“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向溥仪发出日本人将启用他的信号。“九一八事变”后，溥仪立即派人前往东北联络，探询他“重登大宝”的可能性。日本方面一经确定建立以溥仪为盟主的伪政权，即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即给天津日军司令官打电报，委托“保护”溥仪，并特派上角利一和溥仪手下积极主张投靠日本的罗振玉到天津去接溥仪。

1931年9月30日，驻天津日本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叫溥仪到日军司令部“谈一件重要事情”。溥仪到司令部后见到上角利一和罗振玉，罗振玉拿出已投靠日本的熙洽写给溥仪的劝“驾”信，要他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

大计”。他们还煽动溥仪，说东北三千万“子民”正热切地盼望他回去，关东军也愿意叫他去“复位”。当时东北局势还没平静下来，溥仪没有立即同意，说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香椎见溥仪犹豫，就威胁说天津治安情况不好，希望能考虑关东军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溥仪及其左右商量的结果，认为东北局势还没有大定，应当派人摸清情况后再决定是否去，因此拒绝了马上去东北。这时，日本方面也考虑到关东军武装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尚在进行，因此，由溥仪派人去东北带回了日本的“真正意图”：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即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请上（指溥仪）临幸沈阳”。溥仪去东北的事暂停。

日本帝国主义在基本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后，立即着手扶持傀儡政权的工作，诱使溥仪出逃投敌。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在溥仪出逃中起了关键作用。11月3日，溥仪会见土肥原，土肥原表白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时机。要很快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关于新国家和日本的关系，土肥原说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并保证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当讨论到新国家的国体时，溥仪坚持应当是帝国，并说如果是复辟就去，不然的话就不去。土肥原则保证“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得到上述保证后，溥仪答应了去东北。

为了使溥仪尽快出走。土肥原还采取阴谋手段，制造出往溥仪住处送炸弹，写黑信、打电话等种种事端，使溥仪感到在天津住下去不安全，非马上离开不可。为使溥仪顺利出逃，土肥原还导演了“天津事件”，借口在日租界戒严，把静园与外界隔绝。

在做了周密准备后，11月10日，溥仪藏进一辆车的后箱里溜出静园，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开到敷岛料理店。换上准备好的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换乘一辆日军司令部的军车，来到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上，上了一只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没有灯光的小汽船，与郑孝胥父子会合。船内还有具体执行护送溥仪出逃任务的吉田等四个日本人及十几个日本兵。小船在日军护送下，躲过中国军队，驶出大沽口，上了等在那里的日本商船“淡路丸”，于13日到达营口市满铁码头。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挟持下从天津逃到东北，投入日本人的怀抱，走出了叛国投敌关键的一步。上了日本人早已设下的圈套。

粉墨登场充当傀儡

溥仪到东北后，没有象他想象的那样立刻当上皇帝。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引起国际舆论谴责，处境孤立，国联正开会处理，日本政府不得不放慢建立伪满洲国的步子，把溥仪软禁在汤岗子、旅顺。

1932年1月3日，日军攻陷锦州，武力攻占东北的野心得逞。关东军认为建立伪满洲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加速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1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拿出了处理满洲问题的指示，提出要建立一个脱离中国本部的“名副其实”的独立国。1月6日，坂垣带着本庄繁的指示赶回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取得政府的认可，由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炮制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决定物色中意的，有一定影响的傀儡人物，拼凑一个脱离中国的伪政权，作为日本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1月13日，坂垣带着纲要回到沈阳，加紧拼凑伪政权。1月22日至2月25日，关东军司令部连续召开十余次“建国幕僚会议”讨论如何建立伪政权及控制

伪政权的问题。为了蒙蔽国际舆论，日本侵略者决定纠集东北四省区汉奸头目，召开所谓“建国会议”。汉奸张景惠秉承关东军的旨意，召集辽、吉、黑三省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到沈阳开会。2月16日“建国会议”开幕。17日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具体负责筹建“新国家”，18日，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从此与中华民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各区完全独立。从2月中旬至月底，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自治指导部”为中心，组织汉奸出面搞“促进建国运动”。他们印制大量传单，利用报纸、电台造舆论，强迫群众悬挂“新国家”的旗帜，参加游行活动，并连续召开“市民大会”、“全省联合大会”、“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千方百计伪造“民意”，为傀儡戏的开场做好了准备。

当一切准备基本就绪时，剩下的就是要让溥仪俯首贴耳甘当傀儡。溥仪回东北的目的是要复辟，当一个八面威风的皇帝。这和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的傀儡是有距离的。因此，他们在相互勾结的同时，也出现了矛盾。1931年1月29日，当坂垣到旅顺探询溥仪的想法时，溥仪明确表示愿意就任新国家的元首，但应当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称号。坂垣对此置若罔闻，操纵“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溥仪得知后，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交给坂垣，并让郑孝胥、罗振玉找坂垣谈恢复帝制问题。2月22日下午，溥仪会见坂垣时被明确告之“这个国家的名号是满洲国”，“由满、汉、蒙古、日本族及朝鲜族等五个民族组成”，由溥仪出任“执政”。溥仪听后很生气。他认为皇帝的称谓取消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请关东军重新考虑，不要取消皇帝称号，双方就此问题争论了三个多小时，没有结果，次日，坂垣召见郑孝胥、罗振玉，告知“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在关东军强硬的威胁下，溥仪被迫答应出任满洲国执政，“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这场争论，以溥仪的失败告终。

3月1日，“满洲国政府”宣布成立。在日本关东军的刺刀导演下，汉奸们演出了“接驾”闹剧。经过三次敦请，3月8日，溥仪在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乘车到达长春，3月9日举行就职典礼，当上了伪满洲国“执政”。随后，溥仪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日满议定书》，规定“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请”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伪满的铁路、海湾、水路、空路等均“委请”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施，由伪满洲国负责供应；日本人可充任伪满官吏，其“保荐”和“解职”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日本有权开发矿山等资源；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从这个条约可以看出，“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人事大权均被日本人掌握，只不过徒有独立国家的虚名，是地地道道的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组织法》虽然规定溥仪这个“执政”有“执政统治满洲国”，“行使立法权”、“执行行政权”、“执行司法权”、“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统帅陆海空军”，以及掌握“大赦、特赦、减刑及复判”等权力，但这些都是官样文章，一条也不能兑现，溥仪甚至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1934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好地控制溥仪为其效力，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终于当上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控制的伪满洲国儿皇帝。

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采取了外表上保持独立国家的形态；在内部严

格控制的两面手法。在 1933 年 8 月日本内阁制定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中，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了便于其统制，使之维持以总务厅力中心的现行体制”。按照这个纲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总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就是太上皇。在关东军看来，“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为了操纵控制溥仪，关东军司令部特设了第四课，专门负责“满洲国政府”和溥仪处的工作。设“帝室御用挂”职务，派一专人常驻伪满皇帝身边，掌握、支配溥仪的思想和行动；在伪政府中设立总务厅，“在军部掌握下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强化总务厅的人事统制权”。在国务院各部设总务司。总理满洲国的事务。满洲国的各级政权都由日籍官吏掌握。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下，溥仪的一言一行都要听命于日本人，他的职权就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旨意，在各种文书上画大大小小的“可”字，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傀儡皇帝。

（中共中央党校刘晶芳）

“冀东自治政府”出笼记

1935年冬，华北大地朔风呼号，寒流滚滚。一条挟着冰霜的消息从这里传出，深深刺激着中国人民：殷汝耕“脱离中央”，组织了所谓“冀东自治政府”。在这寇急患深、民族危难之际，殷汝耕的叛国之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所谓“冀东自治政府”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制造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热河后，1933年又开始策划在华北建立辛日的傀儡政权，扶持第二个“满洲国”。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步步退让，相继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出卖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从1935年起，加快了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步伐。9月20日，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在天津公开发名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宣称：日本要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乐园”，“华北正是上述对华政策最易并最速实施的地区”，因此，华北必须脱离南京政府，确立华北政治新结构，实现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日军将不惜使用武力“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9月23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24日，多田骏又发表题为“日军对华北的态度”的谈话，公然鼓吹：“（一）华北五省应结合成一联合自治政权；（二）交日本指导；（三）彻底扫除反满抗日分子；（四）建立经济独立单位；（五）与南京政府彻底绝缘；（六）联合五省实力共同防赤；（七）吁请华北人民速起倒蒋自救”。接着，日本当局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连串促使“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多田骏等四处奔走，游说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宋哲元等华北实力人物联合自治。日本特务机关竭力怂恿支持华北的在野政客、军阀带头发难。日本特务、浪人纷纷到各地组织收买土匪、汉奸兴风作浪。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又名金壁辉，清末肃亲王之女，日本浪人川岛速浪之养女）也奉命赶到平津，联络日、朝浪人、土匪，策划破坏交通，进行暴乱。10月20日，为日本人收买的劣绅武宜亭在日本宪兵支持下，制造了“香河事件”，组织“香河县自治政府”。25日，汉奸、流氓在天津骚乱，要求“自治”。随后，河北安次、庆云、曲阳等10余县发生“自治运动”，“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人民急救会”等伪组织纷纷出笼鼓噪。一时间，“华北自治”的恶浪滚滚，铺天盖地，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的主要目标是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他们分析：一是宋哲元系具有实力的西北军将领，与蒋介石素有宿怨，且在处理察哈尔日军侵略事件中，被国民政府妥协政策牺牲，罢免了察哈尔省主席，对蒋介石产生新的不满，不欢迎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制，这一点与日本军部驻外机关的利害也是一致的”，可以利用。二是宋哲元二十九军控制平津，在“华北自治运动”中地位重要。若宋哲元率先“自治”，即可以利用平津在华北的地位和宋哲元对西北军老袍泽韩复榘的影响带动山东、山西、绥远加入“自治”，实现分裂华北的目的。为此，日本侵略者双管齐下，一是以“支持宋哲元为华北自治政府首脑”来利诱，二是用武力威胁，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发布动员令，限所部11月15日前作好从长城外向华北进军的准备，令空军作好20日进驻平津地区的准备并将陆军四个师团、空军六个中队集结在海关、绥中、锦州地区，扬言“将不惜用刺刀威胁持观望态度的华北将领，使其必须断然实行华北自治”。天津驻屯军也“进行必要的部队调动”。向

宋哲元炫耀武力。臭名昭著的侵华急先锋、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对宋哲元软缠硬逼，迫其就范。

11月11日，日本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用最后通牒形式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该方案确定，成立高度自治的政权——“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地域包括晋、冀、鲁、察、绥华北五省和平津二市。政权首领为宋哲元，总顾问为土肥原贤二。这个政权在经济上“与日满结一单位”；金融上“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目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信仰上“扑灭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代以东洋主义”；外交上“亲日反共”。并限宋哲元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夺取河北、山东”。显然，这是一个完全把华北置于日本控制下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方案，土肥原使出浑身解数鼓动宋哲元接受这一方案，充当实施这一方案的傀儡。日华北驻屯军司令也发出恫吓：“土肥原之要求，必须实现，无商讨余地”。但宋哲元不为所动，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同时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其他实力人物的游说，日本特务操纵汉奸、土匪的暴动，都遭到了惨败。于是，土肥原改变策略，放弃对商震，韩复榘的策动，“暂时停止对宋哲元的说服工作”，把突破方向和主要力量转向国民政府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生于1885年。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培养、教唆、拉拢下，有浓厚的亲日、媚日思想。回国后，他在各军阀间进行政治投机，曾参与郭松龄对张作霖倒戈的活动，兵败后逃入奉天新民县日本领事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黄郛，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担任翻译等职。蒋介石看中他是“日本通”，起用他办理对日交涉。他先后参加过淞沪停战谈判和《塘沽协定》签字前的对日交涉。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中国军队从长城沿线后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今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冀东22县大片国土划为“非武装”的停战区，国民政府在该停战区分设两个行政区。一为蓟密区，设通州；一为滦榆区，设唐山。殷汝耕被任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为陶尚铭，陶到任不久，因不能取悦日本即被解职（一说病逝）。1935年8月，殷汝耕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

冀东地区总面积与构成日本本土的四大岛之一九州岛面积差不多，且为东北通向华北的必经之道，战略地位重要，日本侵略者早犹图谋霸占。1933年，日本关东军就在山海关、通州、唐山等地设立了特务机关，归土肥原指挥，策划分裂冀东。而早就存心媚日求荣的殷汝耕，对日本的侵略，逆来顺受，“接受了关东军的领导和各种援助”。当时，日本侵略者通过秦皇岛一带大肆走私，殷汝耕非但不阻止，而且对运来的日本商品大为欢迎，只征收象征性的“检查费”，拼命向日本侵略者表示“友好”。

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狂潮迭起，殷汝耕觉得他卖身投靠日本、攫取高官厚禄的时机已到，10月下旬，他亲自潜往东北，晋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表示愿为“华北自治”效劳，并于11月15日致电宋哲元、韩复榘，要求他们接受日本的“自治方案”，同时操纵停战区内各机关发出与之相呼应的“请求”。殷汝耕的主动投效，适应了日本侵略的需要，引起了关东军和土肥原特务机关的兴趣。当日本策动宋哲元及华北其他实力人物计划受挫后，侵略者决定降格以求，先全力扶植殷汝耕在冀东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接着利用宋哲元怕权力地盘遭到吞噬的心理，诱逼宋哲元同意冀察平津“自治”，土肥原认为“如殷汝耕很积极的话，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11月23日，土肥原在天津将拟定先行建立冀东“自治”政府的计划出示殷汝耕，殷欣喜若狂，对“计划”“不仅同意，并且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决心。”殷汝耕这样丧心病狂的叛卖行为连侵略者也感到惊讶，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殷汝耕在天津宣布于停战区实行“自治”，并连夜赶回通州。11月24日，殷汝耕发表“自治宣言”，扬言“情势切迫如此，若不另辟途径，决难图存”，“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正式成立。一个月后，伪政权改称“冀东反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行政长官。辖区除冀东22县外，还包括延庆、龙门、赤诚3县和唐山、秦皇岛两市，人口500万。伪府设通县。下设秘书、保安、外交三处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及税务管理处、货物检查处等。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发行冀东纸币，编有伪军5个师。还创办《冀东日报》，冀东广播电台等。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政权，日本通州机关长细木繁是这个政权的“太上皇”，伪政权的一切举措都必须经过他。伪政权的各厅、处、所，保安队（后改编为伪军）各总队，各县都设有日本顾问、特务。北宁路各站、沿线重镇都驻有大量日军，所属保安队须听日军调遣，甚至中学、师范学校都派有日本教官，小学有日语教员，所属各县市中小学一律增设日语课，并规定为主课之首，向青少年施行“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等奴化教育。冀东地区的经济运行被纳入日本侵略者的轨道，“和满洲共同提携，互通有无”，国民政府在秦皇岛和塘沽征收的华北关税，长芦盐税，蓟县、平谷、密云等地的钨矿、金矿及冀东的各种农副产品，皆被日军任意掠夺，用于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屠杀中国人民的需要。殷汝耕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成为中国人民皆曰可杀的汉奸。

冀东伪政权一出笼，立即遭到平津及全国各地民众的谴责和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也于1935年11月26日明令通缉殷汝耕，“厉行缉拿，依法严办”。殷汝耕只好龟缩在日军卵翼之下，腆颜偷生。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由此诱使宋哲元响应“自治”的阴谋，遭到彻底失败。多行不义必自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7月29日，素具爱国心的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指挥张庆余和第二总队指挥张砚田发动起义，击毙日本特务细木繁等300余人，一举摧毁伪政权。日本侵略者煞费心机经营一年零八个月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以其可耻的结局宣告结束。抗日战争胜利后，将殷汝耕逮捕归案，1947年，被执行枪决。卖国求荣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李东朗）

拼凑压降王牌——汪伪政权

本世纪 30 年代起，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灭亡中国的步伐，其如意算盘是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施侵华计划制造的又一挑衅事变，并由此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使用了其总兵力的 94%，动用空军、海军，结果，不但“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破产，而且受到沉重打击，军队伤亡 50 余万人，战争经费每月高达 1.5 亿美元。巨人的消耗和战争趋向长期化，使日本帝国主义深感已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加上国际风云变幻，世界大战日益迫近，日本统治者希望保留较多的力量，以便在世界战争中乘机捞一把，实现其称霸亚洲的目的。这就要求日军迅速从侵华战争中脱出身来。于是，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调停”，诱降国民党，企图不战而胜；但因条件苛刻，蒋介石不敢贸然答应而不能实现。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938 年 1 月 16 日，日本首相近卫文 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近卫的声明，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们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以武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另一方面决心扶植和成立汉奸伪政权，实现它对中国的殖民统治。

1938 年 7 月 8 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两个文件，规定：如果国民党政府不投降，就要在国民党内部“积极帮助亲日反共势力，策动抗日阵营内部崩溃”，“尽快促成中国中央政府分裂”。7 月 12、15、19 日又先后通过了《随形势发展的对华谋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和《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政策是扩大和加强已有的各地伪政权，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政权”或“新中央政府”，以代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个新政府不仅要“成为处理这次事变的中国方面当事人”，而且要“使它成为解决中日两国过去因各种矛盾失和，而确立从大处着眼的善邻基础的中国政府”。为此就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在此之前，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已建立了一些汉奸政权。继 1932 年由日本帝国主义挟持利诱溥仪建立的“与中国内地决裂，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而实权则操在我（即日本国—注）方手中为目的”的“伪满洲国”后，1937 年 12 月，日本网罗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等汉奸，在北平建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1938 年 3 月，日本又策划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同年 9 月，迁往南京），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此外，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等。但是，日本侵略者很快就发觉，这些卖身投靠的无耻政客，声名狼藉，“并无群众威望”，他们“不是旧社会的遗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靠这些人来维持时局是不可能的。不仅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吸引力，反而激发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仇恨。

于是在物色“中国第一流人物”充当傀儡时，土肥原贤二几经筛选，最后终于把目标定为汪精卫。

[日]《本庄日记》附录 P373“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

汪精卫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是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就迎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干了许多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坏事。在他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期间，积极支持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破坏了上海抗战，出卖华北主权。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散布亡国论调，认为中国战必败，一再宣扬：“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能和就和”，“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和日本讲和不可”，并在国民党内网罗陈公博、周佛海等民族败类，结成以他为首的投敌小集团，一面鼓噪向日本屈服，一面派人与日本侵略者勾搭。1938年1月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后，汪精卫、周佛海就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由上海前往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与日本搭上了关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被日军侵占。汪精卫集团公开发出对日求和乞降信号。10月12日，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大门”，愿以“日本和平提议”，“为讨论之基础”。10天后，他又对外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目前战事，非吾人所发动，吾人愿随时和平”。同时，汪精卫连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是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光”，使“大家都变成大贫”。并联系1935年11月他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被刺事件，狂妄的叫嚷：“三年之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了三枪，我在今年，还是主张和平！”

汪派投降集团骨干分子高宗武、梅思平积极活动，与日本方面多次联系。日本政要几经洽商，确定“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公开向汪精卫集团招降。

11月20日，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和汪派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江湾日本占领区一座称为“重光堂”的楼房内，举行了秘密谈判，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等，商定了汪精卫叛逃与日方配合的行动计划。《协议》规定：（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同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赔偿日侨损失；（六）协议以外的日军，于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此外，他们还估计中国西南几省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会参加他们的“和平运动”，汪精卫可以待机在云南、四川建立几十万的军队。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按照与日本帝国主义商定的步骤，以“赴蓉讲演”为名，乘飞机逃离重庆，绕道昆明，于19日抵达越南河内。陈公博、周佛海等投降小集团成员亦相继外逃。

在得知汪精卫出逃后，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宣称，日本愿意和“中国的同感忧虑及其有卓识之人士”合作，根据“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原则”，“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29日，决心当汉奸的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近卫的声叫，公开

要求重庆国民政府应即以近卫声明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不可再失此良机”。为了结束战争而开展“和平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对汪精卫的出逃感到兴高采烈，以为汪精卫脱离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即可分裂，对日抗战即可瓦解。汪精卫也相信，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只要登高一呼，响应者必接踵而来。地方势力和将领、重庆国民政府要员都会有人跟随他，蒋介石会不打自倒。他可以登上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最高宝座。然而，事态的发展恰和日汪设想的相反，汪精卫叛逃和发表“艳电”，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上下和海外华侨，迅速掀起反汪讨逆的巨大声浪。重光堂会议时预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龙云、邓龙光、张发奎及四川军队将领，非但没有附和，还通电指斥汪精卫为“民族罪人、吾邦败类，人曰可杀，法在必诛”，予以愤怒声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1939年3月30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商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转移汪精卫到“安全”地方。5月6日，汪精卫被“保护”到上海。从此，汪精卫成为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傀儡。

自汪精卫被“保护”到上海后，日本帝国主义马上露出主子对奴才的面目。日本政府确定对汪精卫的方针是：“要依照我方的政策，来左右他的行动”。

1939年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新中央政府”只有在适应日本战争全局需要时，才准予成立，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其构成分子不仅包括汪精卫，还须包括临时、维新政府头目及原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成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实行“分治合作主义”原则，即“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在地域上，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当时日本对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的统称，即长城线以北地区）是国防上特别对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最密切地区。华南沿海必须考虑对南方的国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军问题在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对“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与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其存在，唯国旗和党旗的上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黄色布片，军队只用大书“反共和平”的黄色旗。

汪精卫在日本呆了近20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藏相。汪精卫同意在华北设立一个“政务委员会”，给予“比较大的自治权限”；至于维新政府，待后研究方案；关于国旗，同意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方加上被周佛海称为“猪尾巴”的黄色三角，上书“反共、和平、建国”字样。汪精卫接受了日方意以“和平”形式独吞中国”的三个条件：（一）在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最高指导方针中，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的主旨。（二）国民政府于返还南京时，立即确认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并发表相应的宣言。（三）国民政府根据上述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调整邦交。最后还确认，“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成立的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方面密切联系后决定”。汪精卫俯首听命，全盘接受《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换得了日本政府的支持。

1939年6月18日，汪精卫回国，他用一个多月南北穿梭，紧锣密鼓地筹建伪政权。然而却遭到日本占领军和南北老牌汉奸的抵制。那些趾高气扬

的日军将领，根本看不起汪精卫；老牌汉奸头目也不愿受制于汪精卫，从儿皇帝的地位降为儿皇帝的臣仆。王克敏以自己风烛残年为由，说他想离开北平，要求汪精卫拟议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梁鸿志赤裸裸地提出，新中央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部、院长维持原状，行政院长仍由梁本人担任。9月19日，汪精卫率投降集团骨干与王克敏、梁鸿志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议三方合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中央政府”事宜。同时，三方各自的后台，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临时政府的幕后操纵者喜多诚一，监视和控制汪精卫集团的“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等，也举行会议，协商汪、王、梁三方合流事宜。但汪、王、梁会谈一开始就陷入僵局。王、梁都表示：因为没有从日军在华北、华中机关接到任何关于汪的提案的通知，所以无法答应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他们对汪拟的条例内容非常不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只是在日本方面干预和影佐、原田、喜多等直接参加下，三巨奸会谈才得以继续，但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汪精卫组织政府失败的根源在于日本方面。王、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日军将领则是因为没有国内本派系的明确的指令，不愿表态；另外，汪精卫在日本所作的各项承诺，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和保证前，日本是不会全力支持汪精卫的。就是说，只有汪精卫充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日本才肯促使王、梁等与汪“圆满的结合起来”。汪精卫集团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从1939年11月1日起，与日本“梅机关”就汪日密约开始谈判。谈判以日本政府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为基础。日本的条件又比以前苛刻多了，不仅包括了过去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的全部内容，而且远远超出6月6日日本政府提出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连“梅机关”也一再碰壁、焦头烂额的汪精卫却“毫无反对”，虽“觉得与近卫声明旨趣有相当的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该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历时两个月，日本谈判代表一面对汪“作严肃忠告”，迫令就范；一面花言巧语，甚至对汪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汪精卫完全答应了日本的条件。1939年12月30日黄昏时分，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了《关于调整日中关系协议书》，内容有《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和《极密谅解事项》两部分。双方规定，这一协议书“永不公布”，连王克敏、梁鸿志亦不允许知道。

通过日汪密约，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几十年梦寐以求而在临时、维新两伪政府那里尚未完全得到的权益：日本得到了汪精卫伪中央政府对“满洲国”的承认和在外交、教育、宣传、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对华北、内蒙的控制及对上海、厦门、海南以及附近岛屿的实权。军事上，日本获得以“防共”、“治安”名义在中国广大地区的驻兵权，控制了驻屯区域所有铁道、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中国军”所聘日本顾问和教官有指挥权。经济上，日本拥有全中国航空支配权；有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特权，有沿海海运权，在华北拥有经营无线电通讯权和指导华北经济行政权等；还通过财经技术顾问控制中国的海关和经济，等等。这个密约，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日本扶植伪政权的罪恶阴谋，也暴露了汪精卫甘当“儿皇帝”的丑恶面目。

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讨得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1940年1月6日，日本兴亚院正式作出“建立中央政府的决定”，两天后日本内阁追认批准，困

扰汪精卫组织伪政权的障碍消失了，1940年1月下旬，南北汉奸齐集青岛，举行分赃会议。“梅机关”操纵会议并拟定了所有文件，包括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一览表及青岛会谈要领，日程等。由于是主子号令，后台老板彼此意见一致，登台表演的傀儡自然也毫无异议。会议“顺利”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大纲、政纲及政策，并预定3月26日组织“政府”、“还都南京”。

汪精卫踌躇满志，即将袍笏登场了，时距叛逃重庆已近一年半，从赴东京谈判算起也有9个月之久了。汪精卫曾多次拟定伪府成立时间表，但未得日本准许而一延再延。正当汉奸政要齐集南京、汪精卫兴高采烈准备“黄袍加身”之时，又一盆冷水兜头而下。1940年3月19日，日本当局通知汪精卫：“组府（日期）延到四月十五日”。原来，日本已认识到汪精卫无力结束中日战争，在支持汪组伪政府的同时，又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此时，日军总部与宋子良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日本当局对之寄有厚望，不愿因汪组府而受到影响。日蒋谈判对汪精卫绝对保密，汪精卫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意外和吃惊，群奸为之泄气，经汪等再三哀求，加之日蒋谈判因重庆的答复与日本的期望相距过远而暂时停顿；日本方面考虑到延期对汉奸情绪的影响，会“引起参加政府的人动摇和脱离的情况”，同时又怀疑宋子良出面的谈判是重庆破坏“新政府的谋略”，日本当局遂九汪延至月底组府。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操纵下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出台了。在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警戒中，汪伪政府成员举行了“就职典礼”，汪精卫发表了《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宣称要执行“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对外要“与日本共同努力”，“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则强调反共并否认重庆政府，“革除独裁”、“摧陷廓清”阶级斗争学说。汪精卫煞有介事地要求重庆政府军政人员务必于近期内到南京报到，一般官兵即日对日停战，“以待后命”，并宣布“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由日本导演的在沦陷区存在5年零4个半月的汪伪政权这场闹剧开场了。

但是，汪精卫并未立即登上“国民政府”主席宝座，而是以“行政院长”代理“主席”职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汪伪政权是日本一手炮制的，但日本政府却没有立即给予承认，汪精卫曾再三请求，极力表白“要克日把邦交调整起来”，但日本政府仍然慢腾腾地对待，使汪日“缔约谈判”迟至这年7月5日才开始，经过54天15次会议和一系列非正式谈判，将汪日密约及“日本的全部主张写进了条约文本，但日本仍不正式签字。这一切的缘故，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当局与重庆的秘密谈判一直在进行着。日本把汪精卫等一批议奸要组建的傀儡政权当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讨价还价的法码。直到11月27日招降蒋介石的工作没有成功，日本政府才决定30日与汪伪政府缔约，并要汪“于签订条约前就任国府主席”。29日，汪精卫登上企盼甚久的“主席”宝座，30日，日汪《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缔结，日本宣布承认汪伪国民政府。

同所有的傀儡政权一样，汪伪政府完全受制于日本主子。日本当局在汪伪政府内设立了一个“最高军事顾问部”和一个“最高经济顾问部”，这两个“顾问部”如影子一样，时刻伴随着汪精卫，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操纵着汪伪政府的一切。尤其是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纯粹是汪伪的“太上

皇”，汪伪政府的一举一动都须看他们的主子的眼色行事。另外，汪伪政府还要受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部、兴亚院在华联络部、日本在南京的“大使”等各方面的指挥和节制。在各省各县，则有日本特务机关派出的“联络官”对汪伪政府加以监督。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尽可能地限制汪伪政权的权力，他们推行“分治合作”原则，把沦陷区割裂成几大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际上仍是两个独立的政权，非但汪不能过问政事，就连国旗也各树一帜，分别是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在汪伪直辖的华中、华南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也是大力安插维新政府旧人。各地伪政府完全在当地日军的控制之下，汪精卫只能在南京城内过他的“主席”瘾，一个汉奸也把这个汪伪政权称为“政令不出城门的小朝廷”。

历史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汪精卫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徒劳的。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他的“主席”职务由陈公博代理。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汪精卫惨淡经营数年的伪政权，顷刻间土崩瓦解，大大小小的汉奸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共中央党校李东朗）

